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比较现代化

编者／[美] 西里尔·E·布莱克
译者／杨　豫　陈祖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

比较现代化

编者／［美］西里尔·E·布莱克
译者／杨　豫　陈祖洲



上海译文出版社

Cyril E. Black ed.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76

根据纽约自由出版社 1976 年版译出

图字：09—1996—122号

比 较 现 代 化

〔美〕西里尔·E·布莱克 编
杨 豫 陈祖洲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625 插页 2 字数 441,000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01-10,000 册
ISBN7-5327-1386-5/F·037
定价： 34.70 元

译者前言

一

奉献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本《比较现代化》已经是第七种文字的译本。1979年西里尔·爱德华·布莱克教授主编的《比较现代化》英文版的问世使现代化理论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在中外学者的面前展现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无疑首先发生在西欧，然后再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和北美，从本世纪开始，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所有国家也都先后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最初的现代化理论家都把现代化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十七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①把现代化进程看作是西方文明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实质上是把现代化简单地理

解为西方化。它充其量不过是西方中心论的翻版。对于西方中心论我们并不陌生。在西方的许多著作中，这种观点从十八世纪以来就占有统治地位。当现代化理论诞生以后，这种观念又控制了研究方向，这与现代化理论诞生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现代化理论究竟何时诞生，以哪本著作为标志？对这个问题，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者似乎并不过分追究。社会变化是个古已有之的现象。任何社会相对于过去的社会而言都是现代社会。过去的历史学家是用神意或循环论来进行解释的。直到十八世纪，启蒙学者才开始用理性的发展作为线索试图作出全面的解释。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则从进化论的原理出发，用生物体的进化来比拟社会的进步，试图寻找出其中的规律。二十世纪以后，又有工业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等种种解释。这些理论固然对社会的进步作出了更有力的解释，但几乎都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经济方面，甚至产生了现代化即工业化或经济增长的观念。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进步是个多层次的变化时，感到需要用一个崭新的概念来替代这样的现象。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创建了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并创办了该委员会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由霍塞利茨任主编。1951年6月，该杂志的编辑部在芝加哥大学举行

① 勒纳："现代化"，《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纽约，1965年，第324页。

了学术会议，讨论了当时有关贫困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美国的对外政策以及有关的各种理论。与会者感到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现代化这个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了。1958年，丹尼尔·勒纳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他提出了相互对立的两种社会系统。在勒纳的理论框架中，一端是传统社会，另一端是现代社会。现代化则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此后，各个研究领域中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为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理论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形成了一股很有影响的学术思潮。这些学者建立了学术联系和交流，创办了刊物，发展了系列丛书。他们虽然没有建立独立的学术团体，却形成了共同的使命感。人们于是把从事这种研究工作的学者称作现代化理论家。

这种早期的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有它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五十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民族独立运动浪潮，新兴的独立国家纷纷诞生，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的形势对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严重挑战。美国政府为了重新调整它的对外政策，需要对新兴国家的发展的背景和前景进行研究，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在这种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自然带上了由它所产生的那种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烙印，是并不奇怪的现象。

但是，现代化理论家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理论框架中的这种偏见严重地影响了它的科学性，从而使现代化理论走进了死胡同。这样的理论引起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判。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教授提出了用比较的方法和跨学科的方法展开现代化研究的主张。他主持的研究小组首先对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行了比较，出版了《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一份比较报告》和《现代化的动力》，为现代化理论指出新的研究方向。① 他认为，早期的现代化理论过多地强调了西方影响的作用，尽管这种作用是应该重视的，但明显的缺陷是忽视了对各类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内部文化传统的研究，而"现代化理论与其他任何社会变化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应当把四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研究领域。第一，它应当重视评价前现代社会中产生的有利于或阻碍现代化的各种因素。第二，它应当把反映在科学革命和技术革新中的知识进展看作社会变革的原动力，正是知识的进展使这类社会变革区别于过去的任何社会变革。第三，它应当着重于检验某个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进步所提供的可能性面前利用这些因素的能力。第四，它应当批判性地评价某个社会的领导者如何利用各种政策去改造传统制度和观念的遗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1967年；布莱克编：《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纽约，1975年。

产，目的在于在这样的基础上利用可行的政策来有选择地向先进的现代社会借鉴，并推动现代化的进程”。[1]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布莱克教授选择了有关的文章，主编了《比较现代化》一书。正如他所说的，“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处在提出问题的阶段”。这本论文集出版后推动现代化理论家重新检验过去提出的理论和观点，从而开辟了研究的新方向。它的影响标志着美国的现代化理论从七十年代开始的方向上的重大转变。那种认为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视为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仿效的榜样，因而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观念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观点遭到了批判。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它的现代化过程必定要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现代化作为社会变化的一种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同传统文化发生互动。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相比，如何对待来自外界的推动力毕竟是属于第二位的问题。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作的功能上的适应。因此，现代化理论的首要任务是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当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

① 布莱克和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载《国外社会科学》，1989 年第 4 期，第 1 页。

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这种基本观点对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我国经过了一段时期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之后再来回顾这个观点，它的重要性就更为明显了。由于这个基本观点贯穿在《比较现代化》一书的始终，因此将它译为中文，奉献给广大读者，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1987年，译者有机会同这本书的主编西里尔·布莱克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相处并且共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除了在他主持的《亚洲内陆现代化》研究工作中经常与他以及来自美国一些大学的现代化理论家就有关问题交换观点和看法外，每周还有两个小时同布莱克教授在一起讨论有关现代化理论的各种问题。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在有关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我们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当我准备把这本《比较现代化》译成中文时，布莱克教授欣然表示积极的支持。我们曾打算给这本论文集的中译本重写一篇序言，这就是我们合作完成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一文。[①] 为了系统地归纳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成果，我们还编写了一份参考书目：“比较现代化参考书目选”，准备在这本书再版时作为附录发表。

后来，布莱克教授提出，“现代化和政治发展”一文的内容过于狭窄和专门化，而《比较现代化》一书涉及的领域很广，需要另写一篇序言，概括性地介绍

① 发表于美国的《世界政治》杂志和中国的《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上。

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作为阅读本书的基础。布莱克教授答应由他来完成这项工作。遗憾的是布莱克教授在编写《亚洲内陆现代化》一书的后期染上重病，卧床不起。尽管如此，在我回国临行前的晚上，他还专门打来电话，重申他将遵守诺言。可是，不久就得到布莱克教授溘然长逝的消息，为这本书重新作序的任务只好由我自己来完成，以此作为对布莱克教授的纪念。

二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是多层面同步转变的过程，是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概括起来，现代化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这种转变的动力从根本上来说是产生于人类在科学革命的推动下所获得的空前增长的知识，从而不断增强对环境的控制能力。而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就是对这种变化过程的系统认识。从比较的角度对这类转变过程进行研究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

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理论，笼统地说，凡是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为线索来探讨社会变化的理论统统归纳在现代化理论的范围内。有些学者并不同意把现代化简单地归纳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例如查尔斯·蒂利，但由于他在

讨论问题时实际上已经落入了这种两分法的窠臼，因此也被人们认为是现代化理论家之一。现代化理论的任务是对这种转变的性质、动力、过程及其有关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与其他各种社会变化理论相比，现代化理论具有更强的明确性和准确性，有利于在各门社会科学之间展开交流和对话，因此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合作的焦点。现代化理论对整个社会科学界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六十年代末达到高峰。这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明。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回忆他1963年下决心转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原因时说，“是那里的现代化理论吸引我作出了一生中仅次于结婚的重要选择”。①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现代化理论家建设理论体系的任务基本完成，此后的重点是运用这种理论去进行地区的个案研究，并且检验和修正有关的理论和模式。正是这个原因，有关现代化的纯理论性的著作近年来不再出现，有人据此断言现代化理论已经式微。事实上，以现代化理论为框架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行研究的著作不断地出版问世，这反映了现代化理论正在进入新的和更高的阶段。

现代化理论家既然把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作为基本的研究内容，就需要首先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定义及其本质差别作出科学的说明。现

① 斯通：《我的学术生涯》，《美国学术委员会理事会通讯》，第36卷（1985年），第16页。

代化理论家用“现代性”(modernity)和“传统性”(tradition)这两个概念来区别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凡传统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称作传统社会,而现代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称作现代社会。

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和传统性的定义和外延呢?传统性和现代性究竟是互不相容的终极状态还是共存的过渡状态呢?这些是现代化理论中分歧较大的问题。对于前一个问题,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家用不同的方法作出了不同的理解。经济学家认为,现代性是指工业和服务业在社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并起着主导的作用,可以用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也可以用三个产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马里昂·列维则认为以非生命能源的运用在全部能源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比较科学,比例较高的社会就是比较现代的社会,反之就是比较传统的社会。[①] 沃尔特·罗斯托主张,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具备有经济上自我持续增长能力的社会。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好是理解为进入大约二三十年的比较短暂的时期内社会以及作为社会一个部分的经济所发生的带有自动性质的自行转变”。[②] 他认为任何社会迟早都会经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一般都可分为五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提聚集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的阶段和高频消费阶

① 列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纽约,1976年,第13页。

② 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经济增长”,载《经济学杂志》,第66卷,第261期(1956年),第25页。

段。在第一个阶段上，对经济的投资被人口增长以及不利于合理经济活动的结构和心理态度所抵消。当生产的增长超过消费的增长时，额外的资本流动使经济能够以自我持续的方式成长，经济现代化首先需要有一批精英认识到它不仅是符合人们愿望的，而且是可能实现的，它的基础是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发展的金融机构和合理的经济组织的形成，从而使经济获得足够的推动力，开始起飞并进入自我持续的增长。起飞阶段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生产投资率，即当年的工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从5%以下上升到10%以上；第二，有某个或某些生产部门呈现高速度的增长，成为先导部门；第三，存在或很快出现有利于促进现代化成份的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①

但是，社会学家，特别是结构—功能主义者认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社会分层化和整合的程度。他们使用宏观社会学的方法，把社会系统当作分析的基本单位，分析“泛能化的”传统农民社会及其向“功能专门化的”现代社会发生转变的各个阶段中三个基本方面，即结构的分化、功能的专门化和整合。很明显，他们的方法来源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即把社会发展过程看作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例如，斯梅尔塞用结构分化的程度和功能的成熟性来区别传统

① 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经济增长”，载《经济学杂志》，第31—32页。

社会和现代社会。现代性指的是社会系统中维持系统的潜在功能，处理紧张关系的功能，选择目标的功能，适应和整合的功能。它表现为五个方面的根本变化，在政治领域中，简单的村社权威系统让位于以普选制度、党派制度和科层制度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教育领域中，减少文盲，增强经济生产技能；在宗教领域中，世俗化的信仰系统代替传统的宗教；在家庭领域中，扩展型的亲缘纽带失去控制作用；在社会阶层的分化上，地理和社会的流动趋向于失去固定的、裙带关系的等级系统，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出现三种类型的变化，即结构的分化或功能更加专门化的、自主性更强的社会单位的建立；整合，即平衡由于分化而造成的破坏；以及由于分化和整合之间的脱节而产生的社会动荡。又如埃森斯塔特指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系统中，都存在着变化的内在倾向。正是系统的'制度化'造成了变化的可能。任何系统中之所以都有变化的内在倾向，根本的原因在于任何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并从社会的各个方面获得资源，必定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活动、角色和组织的制度化。维持社会系统存在的资源必须从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动员出来。因此，各个社会群体的成员不仅在现有的制度（例如现有的政治系统）中组织活动，而且在其他制度中组织活动。"① 因此，埃森斯塔

① 埃森斯塔特："变化过程和中央帝国的政治系统制度化"，载佐尔桑和赫施编：《社会变化探索》，纽约，1964 年，第 432—451 页。

特把现代化看作高度的结构分化、社会流动以及规模更大的、统一的、集中化的制度建立的过程。按照这个观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产生出不断吸收各种社会变化的能力，因为这些变化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不断产生的，所以是不可避免的。①

政治学家主要是从政治结构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来解释现代化。例如亨廷顿提出的政治现代化包含两个关键的领域。第一，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的分配必须首先具有革新政策的能力，即通过国家的行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改革；其次必须具备能成功地把现代化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吸收进政治系统的能力。以这个理论为基础，政策的革新应当从权力分配中得到鼓励，这样的权力分配既不是高度集中的，也不是过分分散的。现代化是政治系统内部权力的再分配，即摧毁地方的、宗教的、种族的或其他的权力中心，把权力集中在国家的政治机构中。这样一个急剧的变化需要把新的社会力量吸收到政治活动中来。反过来，要维持现代化的速度又必须依赖系统的被接受以及新加入的社会群体的适应能力。政治结构上的这两个要求是相互直接联系着的。

研究现代化的心理学家认为社会行动者性格结构中的某些变化是社会系统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因

① 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第46页。

素。例如麦克勒兰德提出的“成就动力论”(achievement motivation)认为儿童的培养方式是促进还是阻碍成就动力值(achieve)形成的关键因素，并与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的企业家能力有密切的内在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从资本形成率等经济因素来理解，还要从成就动力值水平的角度来理解”。[①] 成就动力值并不是遗传的，而是儿童在童年生活的经历和社会化的过程中获得的。他对一些国家小学二、三、四年级学生的读物和童话故事进行了调查，发现某个时期内儿童读物中的成就水平值与一代人以后的国民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联。为了准确地衡量成就动力值，他还提出了一个计量的标准，即计算这些故事中有关进取和以获得成就为欲望的主题出现的频率。麦克勒兰德指出：“成就动力值较高的社会将会造就精力更旺盛的企业家。反过来，又是他们推动了更迅速的经济发展”。[②] 他还指出，这个结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适用的，“由于是人们头脑中的变化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因此成就动力值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先进工业国家之所以出现非同一般的经济发展，“关键因素是‘企业家精神’，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又是哪一种类型的人能够在经济组织中获得领导地

---

① 麦克勒兰德：“土耳其和伊朗的民族特征和经济增长”，载派伊编：《交流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63年，第172页。

② 麦克勒兰德：《贤选社会》，普林斯顿，1961年，第205页。

位”。①

美国的另一位心理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提出的现代人的理论是国内比较熟悉的。他指出，在现代化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只重视如何用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现代化的水平，政治学家也忙于从政治机构和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来解释社会的现代性。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现代化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忽视了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人，不去讨论他们的心理特征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是否跟得上现代社会的节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就是严重的错误，因而也不可能对现代化的各种问题作出满意的解答。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引进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方法、政治制度和形式、教育体制甚至全部课程，并且希望先进的技术在本国结出丰硕的果实，使它们跻身于先进国家之林，但结果往往是失败和沮丧。这些沉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的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② 英克尔斯强调说，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发

① 麦克勒兰德：《贤选社会》第300页。

② 英克尔斯和史密斯：《走向现代》，坎布里奇，1974年，第5页。

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中的行政人员都获得了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否则，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制度和观念，即使发动了经济起飞，也不会有自我持续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①] 他根据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归纳出了现代人的九个心理特征，从中又"可以归纳出现代人的四个最重要的心理特征：即他是参与型的公民，并有丰富的知识；他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在受到传统势力影响的时候，特别是在处理个人事务上作出决策的时候，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即是头脑开放的人"。[②] 英克尔斯把现代人的这些心理特征称作"现代性的精神"。现代性的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不发达和落后是一种心理状态。精神障碍和心理因素阻碍了许多国家有效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所以，培养现代的心理特征、态度和行为的策略是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各种策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但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认为，无论是麦克勒兰德的成就动力值理论还是英克尔斯的现代人的理论，都着重于讨论人格结构的外部表现，例如态度和观念等等，"对于解释和预测人的行为来说，作用并

---

① 英克尔斯和史密斯：《走向现代》，第 13 页。

② 同上，第 290 页，第 313 页。

不大，因为它无力深入到人格的内在状况中去进行测量和分析”。[1] 他们认为过去的现代化理论对人的行为所作的研究很不充分，原因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的时候只考虑了人的态度、观念和人格，却没有认真思考过人的行为的变化方向。因此，关于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发展中社会里的人的态度观念和人格结构的变化的结论也是不充分的。他们提出了一种“行为调适理论”(theory of behaviour modification)，试图取代其他的心理学理论。这个理论着重于“研究个人所表现的外部活动及其与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关系。它是关于如何使用积极的奖励和消极的惩罚来制约个人行为的模式”。[2] 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决定了人的行为，行为反过来又改变人的价值观念、态度和人格结构。这个过程是相互交替的。因此，必须集中力量研究这个交替过程是如何进行的。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强化。不同的刺激手段造成的强化形成了某种行为方式，个人的行为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是因为有不同的系统和刺激，它们鼓励某些反应，或抑制某些反应，导致了行为方式的形成和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模式应当从社会系统中的操作制约(operant conditioning)上加以

① 昆克尔：《社会与经济增长：行为主义的社会变化观》，纽约，1970年，第259页。

② 同上，第267页。

解释。[3] 也就是说，并非人的态度、价值观念和人格特征决定行为的方式，而是操作制约的程序决定人的行为。只要改变操作制约的程序就可以达到行为调适的目的。“一切人都属于操作制约系统中的一个部分。因此，若要改变人的活动，只需要改变操作制约系统中的某些成份，而没有必要去改变人的价值观念”。这种理论还认为，如果要使行为发生某种变化，那么，首先要在强化刺激上发生变化，这只有通过社会的某些领域的改变才能实现。这些领域的改变对操作制约程序中的某些成份产生了影响，故而决定了行为方式的变化。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每个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在新的环境下，他的行为方式受到了新的强化。经济发展的问题于是成了社会环境中与学习新型行为方式有关的领域中的变化、而不是人格或人格中的某些因素的变化。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必须依赖于精英的角色作用，因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可能造成全体人口的行为方式的变化，但可以造成少数人的行为方式的变化”。[4] 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从决定行为的因素方面、而不是仅仅从人的内在特征去考察经济发展的心理前提”。[5]

---

③ 操作制约是斯金纳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一个术语，指通过系统地处理先前行为的结果来控制行为的制约形式，主张了解（或）强化在特定情况下的产生，是预测（或控制）行为的充分和必要的条件。

④ 昆克尔：“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第13卷（1965年），第266页。

⑤ 同上，第276页。

三

正如前面所叙述的，最初的现代化理论家主要强调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共性。他们把现代性和传统性看作是两种极端状态，非此即彼。按照这个观点，“现代化是社会的变化，欠发达国家通过这样的社会变化获得了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① 因而必然得出现代化即西方化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并没有真实地和准确地反映现代化过程的实质。按照布莱克教授的观点，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性。相反，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这种观点并不否认外部刺激对某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但是它更为重视研究传统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对现代性要求的适应。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清除了西方中心论在现代化理论中的统治地位，从而把现代化理论的重点转向了对欠发达国家本身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互动关系的研究。

既然现代化过程的本质是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

---

① 勒纳："现代化"，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第386页。

代性要求的适应，那么，划分现代化的类型就应当以此为依据。在当前的现代化研究中划分现代化类型的方法有许多种。例如，有人从现代化起步的时间早迟可以把现代化分为早生的现代化和晚生的现代化。也有人用典型国家为代表，划分为英国型、法国型、德国型或尼日利亚型等各种现代化的类型。从逻辑上来说，类型的划分总是人为的，只要始终坚持某个始终一贯的标准，不妨有各种分类的方法。但是，为了更准确地进行分类，坚持以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互动关系为标准也许是更科学的。全球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说明，有些社会，例如英、美等国家，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较强的兼容关系，它们的现代化主要是从社会自身不断发展出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来实现的。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可以称作内生型现代化。表现为内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为数极少，因而可以看作是特例。更多的国家由于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而是在英、美等国现代化起步以后而产生的外部刺激下，或者说外部压力下，开始作出反应而逐步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大陆的国家都属于这种类型，可以称作应激型的现代化。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更是对国际压力的反应。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应激型的现代化其实质同样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

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认识，应激型的现代化是在

现代性和传统性不兼容的条件下逐步实现现代化的，这就是说它自身缺乏推动现代化的因素，因而需要采取强制的手段，对现代化的前提进行补偿。补偿的方式可以是经济、社会、文化、技术或心理的，最终要通过政治的形式，即国家政策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国家政权在现代化过程中作用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十九世纪以后，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农奴制改革，增强自由市场的调节作用，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二十世纪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途径，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国家指导下的经济—社会计划来推动现代化。新兴的独立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以上两种不同的因素，产生出一种可以称作混合型现代化的新类型。这种以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兼容关系为标准对现代化的类型所作的划分也许更能够从实质上反映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现代化，关键都在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互动。所谓传统性是指某个社会或社区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形成的比较稳定的制度和观念。但是，传统性的根本特征又在于它的可变性。把传统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现代化研究应当把重点放在如何通过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来改造传统文化，使它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结构的因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固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是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变化，正如

利普塞特所说的："结构方面的条件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文化因素才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社会规范的差别上。帕森斯在《社会行动论》中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社会则通过奖励和分配系统对角色期待提供保护。社会的角色期待及其保护机制构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具有制约和强化每个社会成员行动的能力，在个人社会行动的选择过程中使角色期待得以实现。进行社会选择的价值观念从选择范围而言，可分为依据血统、出身背景以及与某个（或某些）社会集团或个人关系的特选型和不依据这类关系的机会均等的全选型。从选择标准而言可以分为只重亲缘关系或裙带关系的亲选型和依据个人成绩和能力的贤选型。于是，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在社会选择的过程中就表现为四种类型的标准：(1)全选—贤选型：这种价值观念本质上是个人主义和反权威主义的，个人可以在多种目标中进行自由选择，同时也可以自由地选择达到目标的手段。(2)全选—亲选型：这种价值观念本质上是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取决于个人的成绩和能力，个人的愿望和成就不受到重视，而国家被视为达到发展目标的手段。(3)特选—贤选型：这种价值观念体系本质上是集体主义、权威主义和传统主义的，个人的等级地位和亲缘关系受到极大的重视，个人的成就和能

力虽然也受到重视。但是，这种成就和能力只是指个人登上了社会等级结构的某个阶梯，而不是指某项具体任务的完成状况。(4)特选—亲选型：这种价值观念体系是传统主义的，只有稳定和亲缘关系受到重视，绝无"论功行赏"、讲求效率和理性的观念。帕森斯认为，这四类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各自在一定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前两种依次对经济发展起着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后两种依相反的次序对经济发展起不同程度的阻滞作用。

从帕森斯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霍塞利茨认为，先进的经济与欠发达的经济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的社会成员在获得经济角色选择过程中全选—贤选型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角色在功能上表现为高度的专门化。在全选型的价值观念指导下，角色选择主要以成绩和能力为依据，即使掌握了权力的社会成员也必须保持具有经济意义的社会目标的集体性。相反，在欠发达社会中社会角色的选择标准，即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特征是特选型和亲选型的，与此同时，社会角色的功能发生泛化。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取向是力图成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有权力或有影响的角色(即官本位的取向)。正是欠发达社会中的传统主义的社会—文化特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对现代新型经济活动的适应能力。因此，除非欠发达社会能够获得先进国家那种文化社会特征，否则便不可能有效地推动经济的转变。从事实出发，全选—贤选型的价值观念体系最有利于

工业社会的兴起，但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称作贤选社会(achieving society)。特选—亲选型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只是存在于最原始的社会中，称作亲选社会(ascriptive society)。绝大多数的社会在不同程度上实行的是中间两种类型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许多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特选—亲选型的价值观念体系。例如日本的企业组织往往把特选—贤选型和全选—贤选型结合起来，在日本的许多企业中，经理人员的选拔是依据贤选的原则，但在晋升和提高工资上则上司有很大的决定权。事实证明这种类型的结合有效地提高了效率，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这些社会学家看来，所谓现代化就是从亲选社会向贤选社会的过渡。

四

由于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缺乏足够的兼容能力，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地出现中断。现代化的中断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普遍出现的现象。所谓现代化的中断(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是指现代化过程的连续性的中断。它可以表现为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动乱、政府的更迭或政策的急剧转向。现代化的中断并不等于现代化的终结。历史的事实证明，现代化的进程一旦开始，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就是不可逆转的进程。发生中断的现代化或迟或早都要重新起步。然而，现代化的中断却是延缓现代

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它甚至可能使欠发达国家在机会出现的情况下失去把握机会的能力。如果有人问现代化是否有捷径可循，那么可以完全有把握地回答，应尽可能地防止和避免现代化的中断。因此，对现代化中断现象及其根源的探索是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现代化中断现象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即使先进的工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发生过中断的现象。理由并不难理解。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变化，是打破传统的各种程序，即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但是，社会的稳定又是现代化的保证，可以说，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现代化。现代化和社会稳定必须动态地处在不断调适的过程中。此外，现代化和社会稳定的调适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步到位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一个社会是否能产生出建立和维持现代化和社会稳定之间的调适关系的能力才是保证现代化成功的关键。综观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在早期的现代化阶段上，由于外部因素造成的中断比较多见。但是，在现阶段上，由于内部的紧张而造成的中断更为多见。

一般说来，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中叶，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外部刺激下触发的。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西方技术和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忧国忧民和寻求真理的精英。由于历史条件和时代的限制，这个时期的现代化过程主要表现为在原有的制度下进行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的改革，例如埃及的阿里改革、土耳其的基马尔改革，以及中国的戊戌变法。但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强国决不允许欠发达国家通过现代化的进程强大起来，国内的统治阶级也害怕改革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通过外来的武装侵略（土耳其），发动政变（中国），或帝国主义与这些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顽固派和保守派联合起来，把改革运动埋葬在血泊之中。现代化进程由此发生中断。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欠发达国家的有识之士通过血的事实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决没有实现现代化的可能。要实现现代化，首要条件是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通过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并且在完成政治整合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在国际梯次位势上不断提高本国的地位。五十年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泛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非殖民化运动标志着全球范围内欠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新起步。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化的正常进程是先有社会的分化，然后通过整合来补偿由于分化而造成的秩序的脱节和混乱，逐步形成良性的循环，使社会获得现代化的能力（即是使传统性适应现代性要求的能力）。内生型的现代化和早生型的现代化大抵属于这种方式。但是，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把这个序列颠倒过来了，它们一般是先经过整合然后才运用整合后的国家政权的力量

来推动分化。因此造成了欠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先进国家有根本性的差别。

在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起着异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现代化的倡导者、计划者、推动者和实行者。推动现代化的首要条件是有效地动员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其中动员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支持又是首要因素。为此，现代化的推动者必须向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证明现代化的合法性，并且证明现代化终将为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带来巨大的利益。为达到动员支持的目的，通常的做法是描绘现代化的远景和步骤，即通过提高期望值来获得支持。

由于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起点较低，一旦通过国家政权的作用来推动经济发展，极易造成一个时期内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人们的最初期望得到满足。再加上大众交流媒介的“放大功能”，结果，人们的期望值急速膨胀，甚至认为现代化最终实现是指日可待的。殊不知现代化进程中的真正困难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出现。传统社会的机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使欠发达国家的政府缺乏足够的效率和能力使资源的重新分配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要求。由于经济高速度增长造成的机能失调引起经济秩序的紊乱。国家职能机构要培养出克服紊乱的能力需要时间。但是，期望值颇高的人们并不理解，他们只看到了物价的飞涨和市场的混乱。他们原以为唾手可得的满足无法实现。这时必然产生“期望值的挫折”，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对变化的承受能力不足。

更严重的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失调会给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提供不同的机会。某些社会群体抓住了机会而率先获得利益，甚至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传统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本身就是亲选社会。这种特征的长期保留使有些群体或个人有可能通过各种关系不合理地获得变化带来的利益，造成社会报酬和奖励与对社会的贡献脱节，出现收入倒挂现象。其次，某些群体或个人凭借裙带关系或通过腐化手段取得了占有资源的优势，以牺牲他人利益而致富。这些事实都引起人们对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的怀疑和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大众交流媒介再次发挥放大作用，期望值的挫折引起了人们把对物质分配不公平的不满转向政府部门，怀疑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提出了政治领域的要求，从而为政治动乱和社会的不稳定提供了基础。然而，欠发达国家由于在政治发展上的不成熟，缺乏恰当和灵活处理不稳定因素和行为的有效手段，由此造成的压力足以使变化停顿下来，甚至发生暂时的倒退。等到政府领导人调整政策重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时，却又往往错过了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发展和进步的重大机会。

五

本书的翻译工作属于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比较中心的国家七五项目中的一部分，在整个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始终得到该中心主任罗荣渠教授的

关心和指导。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得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潘龙杰先生的鼓励和具体指导。译文出版社德劭年高的姚楠先生呕心沥血为本书的译稿认真地进行了审阅和修改。

本书承蒙主编布莱克教授的允许，根据美国自由出版社1979年英文版译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比南教授对本书的翻译给予了关心和支持。导论和前三编由杨豫翻译，后二编由陈祖洲翻译，全书的译稿由杨豫统校。由于现代化理论涉及到的领域很广，它不仅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立的理论系统和术语体系，而且与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有密切的联系。译者深知自己在理论水平和翻译能力上远不能胜任。由此而在本书中出现的谬误和疏漏仅由译者本人完全负责，并恳切希望得到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和指教。我们愿借此机会，谨向以上提到以及由于篇幅所限而尚未提到的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给予关心、支持、指导和帮助并作出了巨大努力的许多同志和朋友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杨　豫

于南京大学

1992年2月

目 次

第三编 社会的转变

第四编 高级现代化

第五编　国际一体化

导论

现代化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关于人类发展的解释，有几种概念占了支配地位，一种主要是神学的历史观让位于较有批判性的思考模式。进步的观念是十八世纪的这种转变的早期成果。但是，它的倡导者往往过高地估计了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因而把先前所有历史时期都加以贬低。随着十九世纪初民族国家的形成，人们开始重新评价过去。这种趋势导致了大批文献资料和政治文件的研究和出版，而这些资料和文件对于从王朝帝国废墟中产生出来的民族国家的传统遗产都起着支持作用。然而这种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研究方法往往把一种民族传统与另一种民族传统对立起来，因而不能为全面解释世界历史提供基础。

与此同时，有些哲学家力图将人类发展解释为抽象观念的产物，以此为世界历史提供某种统一性。黑格尔将历史看作

是自由原则在一系列阶段中克服了对自由的种种束缚这样一个辩证过程的实现。这种看法对后来的思想家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在他对历史的解释中使用了这种辩证法，期望无产阶级经过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的长期斗争后取得全世界的胜利。在这个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看法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释历史的基础，并以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形式在今天的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中占据着统治地位。

在十九世纪奠定基础的、对史料的研究和批判所形成的共同传统是当代一切历史著作的基础。这些批判原则由于借用了其他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而大大地完善了。人类学有助于加深对口述史料和考古史料的理解和使用，也有助于加深对那种把一个社会的全部文化和世界观考虑进去的全面参照系统的价值的认识。经济学不仅有助于比过去更加准确地观察农业活动和工业活动与社会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而且也有助于对经济增长的规模和结构作出更精致的度量。政治科学家们分析了权力组织和决策机构，并对政治参与的性质殚精竭虑地作出评价，这对社会研究很有用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们研究了人类的生物性对社会与生活的关系，研究了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的认识的发展，以及这个认识怎样影响了行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则在分析形成一切人类行动基础的社会结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他们还研究了世界各个不同民族所创造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在社会的凝聚和发展中如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功能。

所有这些趋势造成了美国教育体系中讲授的那种历史观。但是，对历史材料总的解释被限制在种族中心论的视野之

端于西欧，而西欧一些社会和它们在新世界的支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般地说是最成功地利用了这些知识去改进人们的生活。这些社会在卫生、教育和福利方面所取得的比较高的水平已得到普遍的承认，作为一个群体，它们已经成为衡量其他社会的榜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最“现代”的社会。因此它们认为它们的制度应当最适合于其他社会去仿效，也就毫不足奇了。

这种与西方化观念相关联的历史解释在美国学术界仍占支配地位，它特别关注个人摆脱国家的不应有的束缚，关注代议制政治体制的建立，关注一种以最少的国家管制以便于资本积累和投资的制度。它还关注尽量促进与公共秩序和平等相符的个人自由。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反映在“自由”(Liberal)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上，而且是这种信念的核心。

当然，西欧国家和英语国家的现实与自由主义所持理想并非总是毫无差距的。然而，总的说来，这些社会的一般人民比其他地方享有更大的发展和自我表现的自由。在受到希特勒主义的真正威胁和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已被感觉到的威胁危机时，这些社会中的人民就以勇气和决心谋求捍卫自己的自由遗产。虽然与现代知识的潜力相比，这个自由显然总是十分有限，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相比，它又是非常确实的。

对作为西方传统特征的自由主义理论提出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的问题，并不等于对西欧和英语国家比其他社会在提高人类福利方面所取得的较高成就提出疑问。现在争论的问题不在于这些成就的大小，而在于从这些成就中得出的关于世界历史解释的结论。那些赞成西方化的人主张，西欧和英语社会取得的**成就的水平和制度**——即取得了**什么成就**以及取

得这些成就的方法——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他们从这个观点出发，推论其他社会如果想要赶上西方，不仅应当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且应当采用西方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等制度。

反映西方化观点的一个极端事例是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围绕着是否可以不要基督教而能建成铁路所展开的辩论——因为已经建成铁路的国家全是基督教国家。我们现在知道的答案是没有基督教（或民主制）也能够建造和经营铁路，不过不能没有现代工业所必需的其他一些特征：科学和技术知识，为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动员大量资源的能力，以及与农业社会中通常的工作习惯显然不同的工作习惯。如果一个社会为了人类福利而要利用知识的进步，那就必须具备某些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并不一定要包括西方社会所采用的所有制度。

对西方化历史观的批判已集中在这一区别上：即现代社会中确实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与个别先进国家不同的制度传统在当代的各种变体中的那些特征之间的区别。这种批判既来自西方各社会内部，也来自那些受西方影响的其他社会。在这些其他社会中，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应当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遗产，以便利用现代知识呢，还是应当促使自己在制度方面的遗产去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西方先进社会产生的最初影响是那么深刻，以致其他社会往往倾向于抛弃自己的制度而去全盘照搬西方先进社会的制度。这样的照搬多半是不成功的。富于思考的观察家于是逐渐得出了结论：从长期来看，使本国的传统制度适应新的功能比或多或少原样照搬西方的制度更为有效。

“现代化”的概念包括有关人类发展的一系列解释。但是，

强调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而不大强调西方模式或其他模式，更强调现代化的过程，而不是它的目标。

伴随用现代化对社会变革所作解释提出一些与其他看法稍有不同的共同观点一起，在主张这种解释的学者们中间，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方法也许是把经济增长看作社会变革的主要根源，并将其他任何事物都与它联系起来。这种方法所产生的问题之一是没有对引起经济增长的原因作出解释。它对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制度的传统没有给予适当的注意，把一切社会都看作在现代化过程中趋于一致。另一种方法是把经济增长看作理所当然，只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和社会的变革上。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社会变革的某些著作可能会增长我们对某些专题的知识，但是它往往不能把变化的更大的背景考虑进去。还有一种抱负更大，但也更冒险的方法则是试图全面叙述科学和技术革命对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产生影响的全过程。这种以人类学家为典型的整体论解释，试图使用一种极为广泛的方法去研究社会，并且特别注意社会变化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要这些关系可以达到用量来计算，就有可能在一个"体系"中显示出各个社会和民族的活动。

前文指出过，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法研究现代化的概念之间的差别，可是这些差别产生于对同一个论题的研究，因此不可避免会有许多共同之处。学者们用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或现代化的观点对某些专题进行研究时写出来的著作，差别可能不大。重要的差别在于由这些专题形成的一部分趋势和型式。

比较现代化

对社会发展中一些范围狭小的方面往往可以从各个国家的经历中进行最好的研究。但是，对于各个社会之间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共性和差异等比较广泛的问题，只能用比较的方法加以考查。现代化比较研究就是谋求了解知识的进步——科学和技术革命——如何对社会发展产生作用有所帮助。这样的理解自然涉及各个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中应当加以考虑的内在机会和危险。

这样一种分析从表面上看似乎规模很大，但对现代变革过程的任何研究都必须置于全球的和跨学科的框架之内。现代化比较研究首先要观察在现代知识的进步、政治发展、经济增长、社会流动和心理适应中所发生的空前变化。它试图认识和理解这些变化，评价世界上各种社会对待变化的不同政策所产生的后果，研究不同的制度传统对变化过程带来的接受能力或阻力。比较方法的应用可以减少种族中心论的偏见。它并不认为当前在先进社会中的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型式必定适用于其他社会，更不认为这些政策本身不会有激烈的变化。

例如，就知识进步而言，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所关注的是：现代化以前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领导人物的世界观；学术争论的模式和结构；致力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社会资源分配比例；受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它的交流网络的范围和性质。对于欠发达的社会来说，主要考虑的则是它们向比较先进社会的借鉴能力，它们是否雇用外国

专家以及它们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接受专门训练的兴趣。所有这些关注或多或少可以衡量出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在政治领域中，现代化的比较研究集中考虑协调和控制的中央结构与构成社会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规模的大小和专门化的程度是衡量国家官僚政治发展水平的指标；这个水平还可以通过中央官僚机构的经费支出与地区和地方官僚机构经费支出的对比来衡量。政治制度还可以通过它的执政效率，即通过它维持秩序，不用暴力而能持续统治和获得公民支持的能力来衡量。个人参与政府决策的程度，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地区和全国的代议制机构等社会的正式机构来衡量，也可以通过政党和特殊的利益集团等非正式的社会机构以及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和其他的社会利益集团对政治决策的影响来衡量。各种社会之间的比较还可以用主要的政治思想意识去进行，特别是当这些政治思想意识涉及公私部门的作用的时候。

在经济领域中，无论是经济活动的结构变化还是经济增长率，都可以进行比较。人们习惯上把经济活动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人们习惯上也是从这三个经济部门分别使用劳动力的比例、吸收投资的比例、在国民总产值中占有的比例，以及各自的增长率来考虑。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虽然这些估计并不十分准确，但能充分反映各个社会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差别。某个社会的经济与其他社会的经济之间的关系还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增长率、原料和工业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构成以及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来衡量。

在许多方面，对人类福利影响最明显的变化领域是所谓的社会流动——这种变化把社会从许多彼此孤立的、规模很小的社区转变为一个用教育、通讯、交通运输、城市化和共同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大社区。由于知识的进步而使卫生状况得到改善，导致出生率的突然上升，超过了死亡率，结果是人口爆炸，在好几个世代的时间里都无法恢复稳定。仅仅是这项因素，就给人类福利造成了障碍，因为如果人们要获得利益，生产力不仅必须有绝对的提高，而且必须有相对于人口增长的提高。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经理人员、各类专家、产业工人、职员和有技术专长的农场主构成的现代社会必须从一般由农民占五分之四的人口中产生出来，而这样的转变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现代以前乡村中的社区意识和自助的意识都在某种程度上在城市生活方式中，在国立学校体制中的普及教育和儿童社会化中，在报纸、广播、电视和正在扩大的通讯体系中，在国家水平上产生出来。然而，即使在最先进的社会里，人际关系仍然比农业社会中淡漠，亲切感和聚合力不强，个人具有一种难以衡量和估计的孤独感。此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层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收入的分配往往跟不上去。虽然从长期来看，一切阶层的收入都有显著的提高，但即使在最先进的社会里，收入的分配依然是非常不平等的。

个人的性格产生于生物特性与社会环境——近亲、社区和个人所接触到的更大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生物属性和环境不同，性格也有差别。在现代总的变化过程中，形成个人性格的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若要理解个人性格的适应性，需要衡量或者至少需要估价的是个人与他的熟人圈

子以外的其他个人心领神会的能力；个人对变革必要的接受力，以及对于为了获得未来的利益而有必要暂时推迟眼前满足的认识；还有个人对于同类人是按照其表现而不是按照其地位去评价他们的能力。与过去时代的个人相比较，现代的人格可被说成是更加开放，更加宽容，更加关心对环境的控制，而且或许更少自恃，更不安于现状。现代化的心理方面不属于广泛研究的主题，不过十分清楚的是，现代人的特征是可以衡量和比较的。

作为一个过程的现代化

有关现代化的大多数论著都是讨论某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某些特定问题。但是显示这些问题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怎样相互发生作用也是重要的。现代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更直接的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从那时起，人类对于环境的知识迅速发展，而且看来很可能要继续发展到无限的未来。这种知识的增长对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无数细小的行动中产生了作用，而这些行动汇合起来就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把这个进程划分为各个阶段的做法当然都是人为的，但是，如果要使这项研究得以进行，这样做也并非不需要。

本书对现代化的进程作了最为简单的分期，即：准备时期、转变时期、高级现代化时期和国际一体化时期。这种现代化进程的分期依据作者的目的和观点而各不相同，但是，对这些进程的叙述全都依据共同的资料。关于这些时期的特征，本

书在各编的序言中将加以概括，并且在所选论文中详加说明。

本书的各篇论文都是从已经发表过的成千上万篇论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用比较方法研究政治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的典型成果。这些论文是作为这一课题的导论而选出来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促进研究的兴趣，而不是把各个方面和各种观点包揽无遗。尽管在这个领域中论著甚多，但适合于本书的论文并不多。许多论文要么太长，要么太短，要么太笼统，要么太专门，要么太平淡，要么太怪僻。各种各样的观点都在本书中有其代表，读者会注意到许多论著对正在展开的比较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作了公开的或含蓄的批评。不过，还应当记住，用现代化的概念对社会转变进行解释只有一二十年的时间，目前它的特征仍然是问题多而答案少。这既是一种不足，却又是一种挑战。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型式最普遍地适应当前的科学和技术水平？

研究现代化的大多数学者并不打算关注在这种意义上形成的理论，至少在这一概念目前的发展阶段。他们的兴趣在于用一种更充分地考虑到人类事务复杂性和相互关系的解释，并且利用由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提供的解释，去取代他们认为对社会转变所作的那种简单化的政治解释和社会解释。想要包罗万象地说明整个人类经历的任何努力都是不够的，但是比那种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一切的努力更充分些。对那种认为这个概念缺乏严密性的批评，我们应当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估价，那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中，理论的严密性究竟可能达到什么程度，而那些被认为更为科学的概念或理论，又能达到什么程度？

有人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保守的观念，这种批判产生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实质上，这个问题最好用**发展与分配**之间的冲突来表明。无论是经济、政治或社会的发展，都涉及积蓄率和投资方式，而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没有中央的协调，这一切都是难以达到的。苏联和日本在许多方面是处于社会主义一资本主义两分叉中对立的两端。它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有较高的积蓄率以及对资源和人材的集中控制。有关现代化的许多研究注意到，拥有一个高效率的中央政府传统的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苏联，但也包括西方国家)比十九世纪以前那种尚未作为自主的政治实体存在的国家具有更强大的发展能力。

如果一些社会为了发展而动员资源，那么，政治上的控制和协调往往是一个前提。支持迅速发展的政策往往会使少数

特权人物以外的其他所有人暂时不能（或者至少推迟）获得满足。有些研究认为现代化是人们向往的进程，从长期来看，它给社会成员带来了利益。这种研究被批评家看作只考虑到上层社会、官僚和银行家的利益和政治权力的集中，而牺牲了劳动和缴税的绝大多数民众。从这种意义上看，后者是被剥夺者，要求他们暂时放弃满足，而少数特权人物却可得到眼前的利益。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将在本书第三编的序言中加以陈述，它所作出的估计，证明在社会转变过程中，全体人口中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之间在收入分配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分配——即划归收入和福利的而不是用于投资的资源配置——一般被视为与经济迅速增长相对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展似乎已经导致了一种资源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一种转变，即从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转向优先考虑福利。一种典型的民粹主义观点认为，统治美国和苏联两国的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不顾广大国民的自由和福利，而是导向经济增长、战争和腐败。毛泽东思想的方法是选择另一种政策，把财富的平均分配和收入平等看作高于一切。有人会认为，中国采取这种政策是由于非采取不可，因为它的人口与粮食和其他资源的供应能力相比，为数过多，而在先进国家中，如果它们的贪得无厌迫使它们退回到现有资源的极限时，它们也不得不从发展转向分配。同样，以全球为基础来看，可以作出这样一个论点，即强烈要求富国与贫国分享财富，而不是牺牲贫国而使富国推行其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发展和分配在讨论中往往被当作是对立的，但实际上，生产投资和福利分配却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混合在一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那样发达。

对于来自上述第二个方面的批判，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对于来自第一个方面的批判，应当作出的总的回答是要使人们注意到，有关现代化的著作实际上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观点，但非所有著作都明确地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那些使用这个概念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来说，既不同于那些强调政治制度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同于各种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在形成这个概念的那些人中，也有多种多样。其中有极少数人认为“现代化”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但大多数人认为苏联类型的社会正在采纳可供选择的当前各种现代化政策中的一种。在这批人中，还有一些狭隘地拘泥于“自由”制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看法，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拘泥于“计划”一样。不过，在这批人中，大部分更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即当前各个社会正在试图使它们的价值观念和制度适应科学和技术革命所提供的发展机会，在这样的适应中，它们正在颁布多种多样的政策——这些政策有的来自各自社会的文化传统；有一部分来自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外国的影响；也有一部分来自年复一年地在适应和借鉴中获得的有实用价值的经验。

对现代化概念的批评者往往还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先进社会和对发展中的社会应当同样予以注意。有大量文献讨论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往往把它们称作“后工业化社会”，有的还讨论民族国家结合成为更大单位是必然结果。虽然有些人把国际组织，特别是跨国公司，看作一种以强凌弱的工具，但另一些人却认为它们是世界性融合的先驱，正像在建国过程中，全国性的机构逐步占据统治地位，压倒了地区性的和

地方性的机构一样。

首先，我们必须记住，从现代化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得出诸如概括、一致或“规律”等，尚处于详细阐述的初级阶段。许多人急于想得出包罗一切的假设和“理论”，却很少有人注意对各个特定社会进行比较研究，也不注意对有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指标的发展进行比较研究。

1. 现代化的概念

詹姆斯·奥康内尔

〔编者按〕 奥康内尔在这篇富有思想性的论文中，讨论了现代化的概念，强调现代化的普遍性，它既不同于特殊的西方政治形式，也不同于常常在对这个课题的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奥康内尔所强调的现代化的三个主要方面是普遍进程中共有的，虽然在具有不同传统的社会中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

奥康内尔教授系尼日利亚阿赫马都贝洛大学政治管理系主任，他曾与L·格雷·科恩和D·G·斯坎伦共同主编《非洲的教育和民族的形成》(1965年版)。

在社会科学中，有一个名词用以指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社会或前技术的社会逐渐消逝，转变成为另一种社会，其特征是具有机械技术以及理性的或世俗的态度，并具有高度差异的社会结构。这个名词就是**现代化**。①它

不是一个十分确切的名词，并易于产生一些含糊不清之处。它也绝不是认为直接引导到今天的是一种线性发展——犹如每个时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都不是现代一样。不过，我们已经使用了这个名词，而且比使用其他名词更方便。本文意在探索它的精确含义。换句话说，本文试图摆脱变化的一般方面，这些方面涉及传统社会的消逝及存在于当代世界上所谓先进的和经济上繁荣的国家中的那类社会型式的到来，而且以此作为前提。②

在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过渡中发生了变化。对这些变化形成总的认识比较容易，然而，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必须用更详细的方式罗列出标志这个进程的各种变化，从而使我们获得更充分的认识，这样，我们就有更充分的资料可以用来解释。在西方和日本的社会转变过程中(即成功的现代化社会的典型)有一些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而人们将看到当代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出现这样的变化：陈旧的农业工具和耕作方法让位于拖拉机和化肥；食品的多样化和更好的医疗条件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机械的速度使距离缩短；通讯方法的改进使较大的

---

① 最近出版的两本书，即派伊编的《交流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63年)和拉帕隆巴拉编的《官僚制度与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63年)载有各类作者对现代化的精辟讨论。派伊和拉帕隆巴拉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表现出极其富有思想性。同样，《亚洲文化研究》第三卷(1962年10月号)所载"日本现代化研究"一文也有价值。

② 见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格伦科，1958年)。简言之，传统社会的特征是：口述传统和血缘关系占主导地位，使用(广义上的)巫术，缺乏发达的工具。贝拉赫写道："原始社会是典型的传统社会，其倾向是相信宗教和巫术，正如韦伯在这个意义上所说的，它们渗透生活的一切方面。每一种道德规范，每一个行为的责任，往往受神灵的约束。这样的社会基本上又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实际上，它也只可能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因此，原始社会的组织集中反映在两极上：一个是血缘关系，另一个则是宗教仪式，两者都具有普遍性"(见"现代日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变化"，《日本现代化研究》，第15页)。

政治单位可以存在；印刷和其他视听交流手段补充了口头交流；过去孤立和独立的社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渐形成；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城市化迅速实现；货币更为广泛地用作交易媒介，取代了笨拙的物物交换制度；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出现；通过计划部门使经济增长的控制制度化；对消费品的爱好逐渐多样化；正式的学校取代了私人传授；世袭的或继承的社会地位让位于通过成就取得的社会地位，或者说，那些拥有世袭地位的人用既得的地位来巩固他们自己；职业更需要技能和专门化；工业和其他部门的工资雇佣制度开始广泛实行，比较非个人的劳动关系占据主导地位；按照合理和机会均等的原则建立的文官制度取代了不想有所作为的宫廷和村长的个人行政管理制度；劳动和悠闲之间也出现了鲜明的区别。

这些及其他一些尚未提及的现象不是一并出现的，它们在任何一个单独的社会或在相互关联的一群社会中也不是以同样的步伐出现的。因为这些现象多种多样，出现又不平衡，所以正在现代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这些变化能维持多长的时间，可以容忍到什么程度。正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面临的问题来自公认的制裁手段被削弱，家庭解体，在现代化部门中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生及对社会和文化的认同产生不安感，所有这一切又给社会成员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紧张。①

试图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明显的诱惑，就得收集所有上述这些资料并且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解释。用“**现代的**”和“**传统的**”这两个词使用于两种社会，实际上往往是设想把高度工

---

① 见博安南：《社会人类学》(纽约，1963年，第392—397页)。他对“脱离部落状态”作了令人感兴趣的叙述。

业化的社会和离开自给自足的农业不远的社会进行对照。然而，现代化远远不只是工业化。[①] 这里只要谈两点就够了。其一是经济增长本身只要通过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和农业的技术变化（广义的），就可以开始。其二是高度机械化的工业可以存在于一个国家中，尤其是存在于采掘工业占优势的地区，而不严重影响社会观念和社会结构。用经济增长这种广义的范畴——即用单位产品和服务的增长率——来解释现代化要使用高度计量化的变量指数，因此是有用的；在现代化社会中，经济增长颇能为人理解，因为它很容易解释为涉及到广大民众生活的问题，从而使政治领导人为了社会变化而组织力量予以最切合实际的优先考虑。但是，这种解释——虽然使用了比工业化更能令人满意的统计标准——仍然是不够充分的。正在出现持续增长的经济所涉及的不仅是经济成就。发达的经济只是由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各种成份组成的体系中的一个因素，这个体系还包括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包括适合普遍性标准的理性态度、成就的标准，以及为了完成高度差异的功能和使用复杂技术而系统地组织教育，以提出课题。[②]

如果不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经济增长，那么同样重要的是，也不要把它与民主制度的发展等同起来。事实证明，现代社会对技术的很高要求与民主观念之间存在着一些联系。[③] 技术为普及群众文化培植力量，推动知识的全面利用，

---

① 在现代化的论述中，有些论述比本文更强调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见莫尔：《社会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3年，第89—112页。

② 见弗兰克尔："技术变化的某些概念问题"，载《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巴黎，1963年，第53—59页。

③ 见利普塞特："经济发展与民主"，载《政治人》，伦敦，1960年，第45—76页。

增加社会成员和社会阶级之间的交流媒介，而且往往按照本领和能力使社会地位有所差异。然而，尽管有迈向更加平等的趋势，最近的历史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技术进步与社会观念的出现之间并无明确的联系，这种观念包含着尊重个人，容忍少数人的权利以及对政府实行制约，这些综合成为我们称之为民主的难以捉摸的现象。总之，通过技术而使之有可能出现的集中和控制，不论是开明的(或极权的)专制制度或技术专家的独裁制度，目前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容易形成。俄国和中国即是证明。

我们敢于称之为现代的那些社会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像马克斯·韦伯那样伟大的学者以其一生中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研究西方经历这个过程的性质和细节。西方是首先成为现代的社会。① 因此，注意西方的现代性在形成过程中的那些成份，会使我们得到一些启发。这些成份是：希腊人关于宇宙的有序信念，最后该信念被关于上帝创世的基督教教义从多神教的裁定中清除出去，而在犹太与基督教共有的信念中却被保留下来，并且加以巩固；罗马人制定的理性的法律体系，它的个人主义倾向较少，并且能适应各地条件并与法兰克—日耳曼民族的习惯法结合起来；罗马教会在关键性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利用有文化的官僚(教会文书)，基本上从血缘义务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开始世俗化，而世俗化的文化在启蒙运动时期又得到了巩固；中世纪末期对

① 贝拉赫在其对欧洲现代化的研究中概括了韦伯对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贡献。埃卡瓦里亚在"可应用于拉丁美洲的发展理论模式"(载《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社会方面》，巴黎，1963 年，第 21—49 页)一文中充分讨论了韦伯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式。

人类精神的启迪，似乎促使人们以历史上未曾得见的顽强努力去追求知识，并且应用所得的知识——在那个时代，可以看到探险家扬帆出海去寻找新大陆，科学家则致力于新发明，早期的资本家(其中包括清教徒以及他们的先辈和后继者)正在发展商业和工业。所有这些成份——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成份——都融入了西方的现代化中。

但是，如果以为这些成份的积累本身便形成现代性，那就错了。归根结蒂，所谓现代，就是一种观念，它给予各种成份以形态。同样重要的是，有关人类思想中自发的和完全属于个人的方面，无论有关资料收集得多么充分或如何解释，都无法完全将它概念化，也无法将它纳入规律的范围内。[①]个人的思想或行将构成文化的各种思想的相互作用具有特殊的个性。这种特殊性的存在，对于在西方影响下正在实现现代化的文化来说，是重要的。我们将在后文再谈这个问题。这里只需要说明几点以便澄清我们目前全神贯注的问题就足够了。非西方文化接受了首先产生于西方的某些形式和技术。但是，绝大部分这些形式从认识论来说，是现代的而不是西方的。它们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而不属于它的任何特殊的表现。在新文化中，本土成份与外来的成份混合在一起，使现代化具有一种不同于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形式和速度。但在新文化中，同在西方一样，人们有可能分析那些有关的、成为现代的先决条件的看法。现代化便是以这种看法来结束的历史过程，虽然必须理解，对现代的看法与真理本身一样，属于观念范围。[②]它是从

---

① 查尔斯·皮尔斯试图用"第一性"(firstness)这个范畴来研究这种思想观点。见他的《论文集》，坎布里奇，1931—1935年，第一卷，第306、307、422、426页。当代现象学的核心便是强调这种自发性。

任何特定时间取得成就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代化的全部体现或完成中才有其意义。在进行这些初步的历史和理论思考之后，现在应当转而对现代化的实现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更详细的研究。

如果要找到一种简单的表达方式来说明现代化进程一旦发展到"起飞"时的精神状态，那么，可以用"创造性的理性"来表达。这几个字意味着创新和秩序两个概念的结合。如果超过这几个字的浓缩表达来分析现代化，便可以看出其中包括三个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基本方面：(1)对事物的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的存在，有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维持着一种连续不断的、系统的和创造性的知识探索——换言之，便是具有分析因果关系式的观念和创造发明的观念；(2)产生于第一种观念并加以促进的工具和技术的大量增加；(3)在个人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接受不断变化的愿望，与此同时又具有保留个人和社会特色的能力。

1.分析因果关系和创造发明的观念：分析因果关系的方法是现代化的核心。世界有一个秩序，一切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任何事情的发生无不有一个原因；凡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有可能对它提出问题，进行分析，迫使它呈现出奥秘。任何思想都是活动的，任何知识状况都不是终极的。有一些陈述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但没有完全的和绝对的真理。这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发明创造的方法(科学精神)产生了系统的方法论(科学方法)。科学研究工作通过观察、假

② 关于真理属于观念范围的论述，见皮尔斯，《论文集》，第5卷，第416、565页。又参见里科尔的吸引人的论文"哲学史与真实的统一"，载于他所著《历史与真理》，巴黎，1955年，第53—73页。

知识。①

机器以及使用机器的技术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包含着理性的和普遍适用的规范,从而约束了使用它们的人,往往促使个人态度和社会态度大致上越来越接近于机械的规范。例如,产业工人不能像传统的农业劳动者那样比较不受拘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必须服从以机械时钟为标志的严格的劳动秩序。在另一个领域中,想认真促进经济增长的政治领导人发现,他们的决定必须仔细考虑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在可行性研究中提出的迫切需要。孩子们能从机械玩具中开始学到科学方法,像上物理课一样。在发展中国家里,孩子们受到的不利之一就是他们必须从学校里正正式式地学习思想和方法,而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孩子们随时都可以从家庭和周围的环境里学到这些思想和方法。

不过,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决不要夸大现代技术和机器与人类经验之间的联系。人类的经验将控制技术和机器的使用而又受到它们的束缚。例如,在经济分配中不可能完全按照计量来决定重点。领导人和计划人员都按照他们的性格、价值判断和其民族的社会制度,或明或暗地规定重点——这种做法往往只是为了政治上生存的需要。②同样,虽然不同国家的作家都利用小说作为一种有机的形式来表达"情感",但对洞察力的表达则不同——作家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促进人类认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③在欧洲范围内,人们只要把特罗洛普

① 派伊干脆说:"交流的压力导致传统社会的崩溃。"

② 拉帕隆巴拉讨论了韦伯提出的官僚制度理想类型具有的价值,并提出这种理想类型是有用的,尽管它也造成了对经济增长状况的误解。见拉帕隆巴拉,《官僚制度和政治发展》,第48—55页。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一番比较就够了，不用说印度和日本的小说中表达出来的各种情感了。

现代人手中的工具和技术使他们用改造世界的征服者的新精神去探讨世界。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受自然力量的摆布。他们认识到在许多地方已经去除了饥饿的威胁，而且很快还能在任何地方去除积年累月的饥饿威胁。尤其是城市居民，他们生活在一个由自己构造起来的并且有其形象的世界中。这样的征服给现代化的人们在宗教思想和习惯方面带来了问题。[④]大多数传统社会的宗教是多神教。现代科学及其对解释的信心，以及它对工具的控制，使上帝再也不能进行干预，也使世界非神秘化。新的交流系统打开了与新世界相适应的但曾被封闭的宇宙论，这在旧神话中是闻所未闻的。因此，风暴现在只不过是一系列自然活动；风暴之神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即使对一神论的世界宗教来说，科学也提出了问题。长期以来，教徒们一直在呼唤着上帝的干涉，帮助他们去应付这个世界。而现在，人类显然可以自行对付这个世界了。因此，马克思能够说，人们应该希望在现实世界中设立他们的天堂。甚至在基督教一神教中，一些德国神学家们，尤其是布尔特曼也一直在勤奋研究，试图把他们的宗教信仰与自然宗教以及由季节产生的意象分离出来。[⑤]然而，就在这个科学时代，有些思想家过于急躁地宣告了上帝连同一切神灵业已消亡。神灵之所以消亡，是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现有事物的活

③ 利维斯：《大传统》，伦敦，1948年，第2页。

④ 达尼埃卢从基督教的立场对当前形势的合理评价，见他的《真理的孔阐》，英译本，伦敦，1962年，特别是其中“基督教与技术文明”那一章。又见冯·巴尔塔扎尔：《科学，宗教与基督教》，英译本，伦敦，1958年。

他社会成员在某种条件下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由于缺乏这种能力来预测可能发生的情况，信心便随之崩溃。于是，裙带关系破坏任人唯贤的准则而只信任家族关系，部落制不适当地信任宗族关系，腐化不顾客观要求，只是追逐钱财积累以求保障等，这些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转变时期的特征。[1] 然而近来的大部分历史证明，这些问题在成功现代化的社会中可以很快地得到克服。

机器既有可能使大型的社会群体形成（例如尼日利亚），又能巩固现存的社会群体（例如俄国——确实，俄国一直都有能力融合基本上属于苏联领土上的中亚各民族）。但是，在现代的社会结构中，规模大小不是决定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复杂的结构差异，功能的专门化和系统目标的构成——所有这一切都以发展速度为条件。从喷气式飞机到电子计算机的一系列机器使这样的速度成为可能和必要。从方法论来谈，集中讨论比较广泛的和比较正规的结构群体在社会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官僚制度的作用是比较有益的。但与此同时，注意到这些变化已经深深地扩展到家庭结构内部，也是重要的。在一夫多妻的大多数传统社会中，婚姻制度围绕着长者的经济统治而转移。新的技术秩序及其工资制度和劳动力流动，大大促成了年轻人在经济上取得成就，从而使年轻人有能力较早地赚钱娶妻。这种情况对旧秩序是个消极的打击，因为一夫多妻的价格系统更难保证他们的子女得到教育培训，而接受教育又是在新秩序下取得成就的关键。同样，人们有可能研究某些

---

[1] 赖斯和辛普金斯：《发展中国家中的腐化》，伦敦，1963年。他们作了有趣的比较并提供了有用的细节。但是，作者提供的最重要资料是否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是值得怀疑的，他们的分析也有许多有待于进一步推敲。

态度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只有通过技术发明而出现的各种消遣——电影、电视、长系列录像片和在国外度假——而产生。但是，与技术社会内部的变化速度和复杂关系相比，由官僚们（政府官僚和私营组织的官僚）构成的那些有正式组织的群体才是功能组织的前提和工具。① 一般说来，在这种群体内部存在着适应新形势的内在愿望；特殊技能得到奖励；社会成员可以按照他们的成就和功劳得到承认和提升；社会成员的就业由合理的稳定性来给予保证。行政机构在它依然保留在个人手中的同时，又不得不与社会保持关系。在与社会的联系中，行政机构行使其功能，并尽可能提供不是为了某个人的服务，不受亲戚朋友提出的要求的干扰，正是这些要求藐视了客观的准则或规定。

主要起协调作用的官僚是政府中的那些官员。他们负责全面地推行福利和维持现代国家的秩序。虽然某些最终的决策是由政治领导人作出的，但通常都是由文官们——即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员——提出、制定和执行政府的决定。早在西方思想家领悟官僚们的即将具有的重要性之前，黑格尔就把官僚称作"影响全体的阶级"，他们负责"在特殊的领域中维持国家的普遍利益和合法性，并且负责进行将这些权利归还给全民的工作……"。② 要了解当代的官僚与传统社会中无所事事的统治者及其宫廷相差多少，了解他们与过去西方国家中半职业性的官僚相差多少，只要考虑一下在经济发达的先进国

① 作为现代化价值观念的载体，官僚制度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它本身还不是现代化的保证。见芬索德："俄国和苏联的官僚制度和现代化"，载拉帕隆巴拉：《官僚制度和政治发展》，第 233—240 页。

② 摘自《法哲学》，英译本，伦敦，1953 年，第 189 页。

会被某个人创造出来。这是不可逆转的情况。它的传播有可能缓慢下来，但它不可能绝对被阻止。……一项发明只要出现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就一定会向全世界传播。技术革命将汇聚在一起，而且正因为它们会汇聚在一起，所以不会受文化限制。我们可以说，世界性的技术是存在着的，不过它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发展得比较缓慢罢了。①

某种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旦经受住了现代化在知识、技术和组织等方面的冲击，并且甚至开始突然出现自动的发展，那就不必害怕借用和模仿。如果说借用和模仿的过程意味着一个社会采纳西方的思想观念并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组织形式，那也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和节约时间，把现成的东西拿过来——西方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逐渐地形成了与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论相适应的结构。西方化的表象不能蒙骗住那些仔细观察的人。在西方形式被证明是有益的地方，这些形式就迅速在其他背景下产生了另一种速度和特征。确实，通过世界各种伟大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近、相互了解并能把彼此的成就进行比较，我们颇有希望使这些日子获益更多些。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例如，非洲不仅为西方音乐提供了新的节奏，而且为西方的很大一部分艺术提供了创造性灵感。反过来，西方也为非洲民间音乐的精致发展提供了音乐形式(其中包括交响乐)，使之具有更高级的艺术成就。西方也正在教

① 摘自里科尔："世界文明和民族文化"，载《精神》，1961 年 10 月，第 440—441 页。

会非洲雕塑家一种自觉理论的技术。世界上这样富有成效的交换是最自然的事情。与世隔绝的文化必定会停滞不前，历史的坟场上就遍布着这种僵尸。伟大的文化总是从其他文化中学习思想观念，并受到这些思想的激励，同时，他们也惊讶地注视着他们的思想观念被其他的文化所借鉴，并在其他文化中开始产生出新的生命。实际上，各种文化只有通过某种程度的比较才最有可能自觉，并且认识到自己与众不同。当两种伟大的文化力图以同情之心相互理解，诚恳地相互模仿时，他们各自都会得到成长，他们在相互接触之后能够更忠诚地各自保持其本身的全部特征。

在结束本文时，还可提出两点。第一点是过渡社会不同于技术先进的社会，它还需要有多重文化的个人。[1] 它需要有人去评价前科学传统的价值，而在精神和道德上都有能力去理解和贯彻执行现代世界的普遍规范。这种行为模式有利于预示，从而在发展中世界的新国家形成团结和信任。这种模式的建立需要很多的知识和很大的勇气。第二点是那些在现代世界上发挥主要作用的一切人物（他们在交流中得到的成长是多么少，而他们具有的能量却又是那么大）需要有一个比我们可以称之为“行星意识”更恰当的东西。这样的人应当在设计和支持世界性机构，特别是政治机构方面起领导作用，这些机构使各种人类社区理性化并努力相互协调。只有把明智的良好愿望组织起来，才能超越有时代错误的政治划分和狭隘的自私心理，才能使技术带来的好处尽快地被发展中国家所分

① 博安南：《社会人类学》，第394—395页。他将“多重文化的”和“脱离部落状态的”两种定语作了比较。

享。而只有通过同样明智的良好愿望，世界上的一些民族才能避免为他们现在掌握的可怕力量击得粉碎，相反地可以把他们的资源联合起来。

2. 导致变化的变化：现代化，发展和政治

塞缪尔·P·亨廷顿

〔编者按〕 这篇文章是对现代化的全面讨论，仔细考虑了政治结构内部的变化过程。本文作者对这一过程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之后，叙述了当代学者使用体制—功能方式对政治发展、社会进程和比较史学开展研究的形形色色观点和方法。本文最后评论了学者们当前以新的理解提出从新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变化的最新理论，从而对现代化的概念作出了总结。

塞缪尔·P·亨廷顿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有关现代化的主要著作有《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并为《现代社会的专制主义政治学：一党制的动力》的编者之一。

政治学与政治变革

政治变革是社会科学探讨的问题之一。但是，举例而言，社会学家经常为他们缺乏有关政治变革的知识而扼腕。1951年，塔尔科特·帕森斯坦率地用黑体字写道："**在当前的知识状况下还不可能获得社会系统中关于变化过程的一般理论。**"十三年以后，唐·马丁达尔说在这一方面仍看不出有什么进展。他论证说，社会学只能说明结构，却不能解释变化。他同样用黑体字写道："**社会变化的理论是社会学理论中最薄弱的环节。**"其他一些社会学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① 然而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相比，他们的处境还要好一些。与过去的政治学轻视政治变革理论的情况相反，社会学对社会变化的理论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关于群体的动力、有计划的变革、有组织的变革以及革新的性质，大批论著补充了这些比较一般性的研究。相比之下，政治学理论总的说来直到最近尚未涉及变革问题。戴维·伊斯顿在1953年写道："七十五年来，政治研究基本上把自己局限于对已知状况的研究，忽视了政治变革。"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看来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虽

---

① 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格伦科，1951年，第486页；唐·马丁达尔为乔治·K·佐尔桑和沃尔特·赫希编著的《社会变化探索》（波士顿，1964年）写的导言，第12页；以及阿尔文·波斯科夫："功能分析作为社会变化研究中理论积累的来源和研究任务"，第213页；罗宾·威廉斯：《美国社会》，纽约，1960年，第568页。但是，到1969年，威廉斯对于变化的社会学研究即将出现突破的前景比较感到乐观。见他的著作《美国的社会学和社会变化》，圣路易，华盛顿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国际发展比较研究，第4卷，第7期（1968—1969年）。

② 戴维·伊斯顿：《政治系统》，纽约，1953年，第42页。

然政治科学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代(他最关心的问题是“考虑成长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但现代的政治学却产生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在西欧和北美的稳定的政治系统中发生的急剧变化被视为这种政治制度的暂时偏离,或者是异常的功能失调。用帕森斯的话来说,政治科学家可以研究一种体制中的变化(诸如政党或国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变动),但他们并不关注体制的变化。① 政治科学家们忽视变化是因为他们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变化本身看来似乎没有多大问题。

政治学中较为标新立异的运动的反历史倾向强化了这种趋势。政治学诞生于无规律的历史学,但它只有摆脱这个起源才可能使自己确立为一门学科。结果,政治学家们降低他们与历史学联系的重要性,强调他们的学科更加接近于其他社会科学。政治学不断把心理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哈罗德·拉斯维尔)、社会心理学(四十年代末戴维·杜鲁门及其研究小组的方法)、社会学(五十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经济学(六十年代的均衡理论、投入—产出和运筹学理论)的思想、概念和方法灌输到自己的学科中来,从而得到发展。他们强调行为科学的调查资料,社会调查和参与—观察等方法,进一步排斥历史学。

政治学家的目的是试图解释政治现象。他们把政治看作因变量,于是他们自然希望在其他的社会过程和制度中找到对政治的解释。这种趋势被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派很高的理智气氛所加强。政治科学家所关

① 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系统》,格伦科,1951年,第480页起。

现代化的背景

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比较政治学的新发展包括把关注的地理范围从西欧及其有关区域扩大到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科学家们不再忽视变革。确实，他们似乎在倾注全部精力去研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所发生的许多变化。政治科学家们接受了现代化的理论，他们从现代化的背景来注视比较政治学。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概念有可能取代在政治分析家心目中已经牢固建立的许多其他象征：民主、寡头政治和独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专制主义和立宪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显然，这些范畴仍然被使用着，但到六十年代末，政治科学家们虽然在每次讨论中仍然在使用"立宪主义"和"专制主义"等范畴，然而，在更多的讨论场合中，他们不得不数以十倍计地使用"现代的"和"传统的"这些范畴了。

这两个范畴当然是在最近才被用来表明比较落后的社会和比较先进的社会之间的两大极端。在近百年来的西方社会思想中，这种用法已成为一个共同的特征。这两个范畴的具体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五十年代初，帕森斯和爱德华·希尔斯提出的型式可变性中首先详细阐明了这些范畴。此后，在 1955 年，弗兰克·萨顿在他的论文"社会理论和比较政治学"中从"行为者"面临的"选择"中把这些范畴扩大到他所研究的社会体制的特征。①弗兰克·萨顿概括了现代社会和传

统社会(或者用他的说法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两类社会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特征，而且已被大多数人普遍承认：

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
1. 以归属性，维护自身利益和泛能型式为主	1. 以全体性、专门化和以成就决定地位的准则为主
2. 稳定的地方群体和有限空间的流动	2. 高度的社会流动(指一般意义上的流动，未必是“垂直流动”)
3. 比较简单和稳定的“职业”分化	3. 发展完善的职业体制，与其他社会结构无关
4. 泛能作用的“低差异”的分层	4. 以职业成就的一般化型式为基础的“平等的”阶级体制
	5. 具有特殊功能的、独立的结构，即“协会”的盛行

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主张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而这种控制能力又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知识扩大的基础之上。例如，对马里恩·列维那样一个社会学家来说，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是指这个社会的成员使用无生命的能源并且(或者)使用工具使他们的努力能产生更大的效果”。[②] 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论证，现代社会产生于“历史上演变的制度……对迅速变化的功能的适应，这些‘功能’反映出对随着科学革命而来的，环境可以加以控制的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③] 在政治科学家中，丹克瓦特·A·拉斯托认为，现代化

① 萨顿：“社会理论和比较政治学”，载埃克斯坦和阿普特尔编：《比较政治学》，纽约，1963年，第67页起。

② 列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普林斯顿，1966年，第1卷，第11页。

③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1966年，第7页。

的含义是“通过人类之间的合作迅速扩大了对自然的控制”。[①] 在几乎所有的理论家看来，人类控制其环境的程度差别反映了他们对环境的根本态度和期望的差别。现代人和传统人之间的差异就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的差异。传统人是被动和安于现状的，他们期望自然和社会的稳定，不相信人类有改变或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相反，现代人既相信变化的可能性，又相信变化的可取性。他们具有信心，认为人类有控制变化的能力，并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在知识方面，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有关人类环境的知识得到巨大的增长和积累，并通过扫除文盲、大众交流和教育的方式传播这种知识。与传统社会相反，现代社会还包括健康水平的很大提高、寿命的延长以及更高的职业和地区流动性。占主导地位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在社会方面，家庭或其他具有扩散作用的初级群体在现代社会中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被具有专门功能的次级协会所取代或补充。在经济方面，随着少数简单的职业让位于许多复杂的职业，出现了经济活动的多样化；职业技能水平和资本对劳动的比例比传统社会有很大的提高。农业与商业、工业和其他非农业的活动相比，其重要性下降了，而商业化农业又取代了仅能维持生存的农业。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地区范围比传统社会有了很大的扩展，出现了全国范围经济活动的集中、全国性的市场、全国性的资本来源以及其他全国性的机构。

现代政治体与传统政治体之间的差别产生于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上述一般特征中。政治学家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来

① 拉斯托：《世界大同》，华盛顿，1967 年，第 3 页。

表达这些差别，其中最简明但最完整的表达或许可以算是罗伯特·E·沃德和拉斯托所提出的那几项特征。[①]他们认为现代政治体具备的以下特征大概是传统政治体所不具备的：

（1） 一个有高度差异和功能专门化政府组织体制；

（2） 这种政府结构内部的高度一体化；

（3） 理性的和世俗化的政治决策程序；

（4） 政治决策和行政决策数量多，范围广，效率高；

（5） 人民对本国的历史、领土和民族性有广泛和有效的认同；

（6） 人民怀有广泛的兴趣积极参与政治体制，虽然他们未必参与决策；

（7） 政治角色的分配是依据个人的成就而不是依据归属关系；

（8） 司法和制订条例以主要是世俗的和非特指某一人的法律制度为基础。

更概括地说，现代政治体与传统政治体的差异以下述各点为特征，即理性化的权威，差异性的结构，大众的参与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能够实现各种广泛目标的能力。[②]

沟通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这两大极之间的桥梁是现代化的伟大过程。学者们对现代化过程的大致状况和特征，也取得了基本上一致的看法。大多数作者或明或暗地提出了现代化过程的以下九个特征：

（1） 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这是直接依据现代社会和传

---

① 沃德和拉斯托编：《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普林斯顿，1964年，前言，第6—7页。

②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纽黑文，1968年，第32—37页。

成为现代社会过程中的社会。

(5) 现代化是**长期的**过程。现代化所涉及的整个变化需要时间才能解决。因此，从传统社会中发生的变化来看，现代化确实是革命的过程，但从这些变化所需要的时间来看，现代化又是进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需要好几个世纪。当代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就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化的速度加快了。但是，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所需要的时间仍然要用世纪来计算。

(6) 现代化是**有阶段的**过程。一切社会进行现代化的过程有可能区别出不同的水平或阶段。它显然是从传统阶段开始，以现代阶段告终。但是，这两个时期中的过渡阶段还可以划分出几个小阶段。因此，可以根据社会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的道路上的转变程度对它们进行比较。在现代化过程中，各个社会之间在领先地位和具体方式方面会有差别，但一切社会都要经过大致相同的若干阶段。

(7) 现代化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以许多不同的类型而存在。确实，有人认为传统社会除了缺乏现代性外，几乎没有其他共同之处。相反，现代社会却基本上相似。现代化在社会之间产生了集中的趋势。现代化意味着"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社会趋向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各个社会趋向于最终结合"的运动。"现代的思想和制度所具有的普遍性可能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各个社会是那么同质，以致有可能形成一个世界国家。……"①

(8) 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某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55、174页。

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基本上是个长期的趋向。某个社会经过十年后在城市化、文化和工业化方面达到某个水平，那么在以后十年内，它不会大大降低这个水平。在各个社会之间，变化的速度将出现很大的差别，但变化的方向不会不同。

(9) 现代化是进步的过程。现代化的精神冲击很多，也很深刻，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代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人心所向的。在转变时期，尤其是在转变时期的初期阶段，代价和痛苦是巨大的，但是，现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所取得的成就足以弥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现代化增加了全人类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幸福。

思想史中的现代化理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现代化理论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西方思想界盛行的历史进化理论和社会变化理论比较，有明显的不同。当时的社会理论对人类和社会的未来持非常悲观的态度。这种悲观论可以区分为两个学派。一派以奥斯瓦尔德·斯班格勒、维尔弗雷多·帕内托、皮季里姆·索罗金和阿诺德·托因比为代表。他们集中研究某些文明或文化的进化模式，试图概括出人类的这个大社会的起源、成长、成熟和衰退的关联。他们的理论本质上属于历史循环论。他们对当代西方文明得出的教训是它正处在或已经越过了鼎盛时期，衰退的过程正在开始。另一派悲观论者更是非常集中在对西方社会的研究。它的辩护者往往认为，西方社会较早成为一个整体，导致人类自己潜在能力的充分发挥。然而，西方社会在过去的某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根本变化，西方历史开始走下

坡路。人类社区的破坏，宗教准则的衰微，社会陷入异化和反常状态，大众社会的突然出现，所有这一切都是世俗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的产物。五十年代被人们宽容地视为现代化的过程，在三十年代却被人们惊恐地看作是解体的过程。有些作家认为这种解体从宗教改革就开始了，有些作家则认为是从文艺复兴、产业革命或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总之，西方历史在某个时候偏离了轨道，一种特殊的过程开始了。它始于对宗教的否定和人类社区的破坏，从此不可抑制地不断滑坡而下，滑到大众政治、世界大战、清洗、审判和达豪集中营。这种本质上属于保守主义的世界观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现代自由主义成为不过是潜存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下的根本误解的"婉转"说法而已。赖因霍尔德·尼布尔说："几乎各种事实都证明共产主义扎根于现代自由文化所共有的失误……"T·S·埃利奥特表示赞同，他说："如果你不要上帝（上帝是要求绝对忠诚的），你就会去崇拜希特勒或斯大林。"①

另一些思想家不太强调宗教的衰落，而更强调工业化和民主化。像卡尔·曼海姆和汉纳赫·阿伦特那样的人警告说，大众社会有专制主义的倾向。② 还有些人不大愿意把西方的衰落上溯到十六世纪，甚或十八世纪，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转折点。拉斯维尔论证说，历史的趋势大约从那时开始逆转，"从向自由人的世界大同进展转向另一种世界秩序，在这

① 尼布尔：《基督教现实主义与政治问题》，纽约，1953年，第5页；埃利奥特：《基督教社会的观念》，纽约，1940年，第64页。

② 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伦敦，1940年；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纽约，1951年。

个世界秩序中,拥有警卫—监狱的国家恢复了被等级制度束缚的社会体制"。从1938年开始,沃尔特·李普曼以同样的意向形成了他的观点。他认为1917年是真正革命的一年,政府从此在战争和骚乱的重压下开始崩溃,西方社会开始陷入瘫痪、混乱和极权主义之中。① 两次大战之间的现世悲观主义反映了工业化、城市化等过程给西方社会带来的灾难和混乱,等等。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现代化乐观主义却反映了已被看到在同样的过程中带给西方社会的是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功。

因此,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现世悲观主义截然相反,却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进化乐观主义有十分相似之处。二十世纪末的社会理论更接近于十九世纪末的社会理论而不大像二十世纪初的社会理论。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风格如同维多利亚时代家具的风格一样,在五十年代末突然受到青睐。1861年,亨利·梅因爵士把地位和契约视为两极。1887年,腓迪南·汤尼斯把社区和社会列为两端。这些都为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两极划分方法提供了最有影响的原始形式。当然,马克斯·韦伯关于权力的传统起源和理性起源的讨论也有重要影响。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理论家给现代化的伟大进程确定的许多特征和后果同

① 拉斯维尔:"普遍的危险:反复的危机和警卫—监狱国家",载布利森、芬克尔斯坦和麦克伊维尔编:《对多灾多难的十年中科学、哲学和宗教的透视,1939—1949年》,纽约,1950年,第323页;李普曼:《大众哲学》,波士顿,1955年,第3—8页。

② 梅因:《古代法及其与早期社会史和现代思想的联系》,伦敦,1961年;汤尼斯:《社区与社会》,莱比锡,1887年;韦伯:《经济和社会》,第1卷,图宾根,1922年。

样可以在十九世纪的赫伯特·斯宾塞和卡尔·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找到它们的起源。两者都把人类社会看作是沿着一系列越来越有利于人类的并且可以识别的阶段向前运动，它是对本质上属于经济的原因作出的反应。

十九世纪的进步理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经济崩溃、政治混乱和极权主义中丧失信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能为未来提供准确的解释。问题仍在于，二十世纪的进步理论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功。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家对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曾经充满信心，就像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一世界的革命充满信心一样。后者用过去的延续来预言未来，而前者则以过去的转变来预言未来。一种理论的失败提醒我们对另一种理论是否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要持谨慎态度。

十九世纪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他们对那时西方社会正在取得的进步所作的反复思考，憧憬着斯宾塞所描绘的未来工业社会的天堂或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大同世界。这是对未来的进步所抱的一种乐观态度。相反，二十世纪现代化理论家的乐观态度本质上是对回动的进步充满着乐观。满足于现在导致对过去的乐观，因此对其他社会也持乐观态度。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极少讨论甚至不讨论现代社会的未来。它们认为西方的先进社会已经"到此为止"；它们的过去之所以令人感兴趣，不仅仅因为它显示了西方的未来，而且因为它为正在从传统性向现代性转变而奋斗的其他社会显示了它们的未来。五十年代，现代化理论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都得到异乎寻常的承认，一部分来自下述事实，即它一方面满足了西方社会的自得心理，同

时又给予非西方社会以希望。于是，现代化理论把国外发生的变化和国内的现状合理化了。它给现代性的未来留下了一片空白。特别相信现代性的过去充分有效，对现代性未来的潜在可能性不作任何想象。现代化理论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①

现代化的修正主义

正如任何社会理论一样，现代化理论由于产生于特定的时间和社会，因而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此外，现代化理论本身还存在着一些逻辑的、固有的缺陷。对此，有些学者在六十年代后期作出的反应是部分地加以纠正。他们往往指出现代化理论主要倾向中存在的问题。与修正现代化理论有关的理论家有约瑟夫·古斯菲尔德、米尔顿·辛格、赖因哈德·本迪克斯、劳埃德·鲁道夫和苏珊娜·鲁道夫、S·N·埃森斯塔特和F·C·希斯特尔曼等人。②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这些学者中有许多人集中其大量工作去研究二十世纪最复杂的传统社会制度。这些分析家对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所作的评论集中在：(1)现代性和传统性这两个概念的意义和可用性；(2)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关系；(3)现代

---

① 六十年代末出现了"后现代"的理论。然而提出这一理论的主要学者首先关心的并不是分析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这些理论的产生是由于关注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而不关注它对传统社会的影响。见丹尼尔·贝尔："有关后工业社会的几点说明"，载《公共利益》第6卷（1967年冬季），第24—35页；第7卷（1968年春季），第102—118页；还有布热津斯基，《在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电子技术时代的作用》，纽约，1970年。布热津斯基和贝尔两人都有可能把现代化的上述九个特征中的许多特征归纳为现代性向下一个阶段转变时具有的特征。他们两人都站在乐观主义立场，因此更接近于现代化理论家而不是二十世纪初的悲观主义者。然而，其他一些人却惊恐地看待后工业社会和电子技术社会的前景，对他们进行了批判，更甚于对现代化理论家的批判。不过，政治科学家们正在深入地探索这种新的历史转变的含义。

化概念本身存在的含糊意义。

首先，正像许多现代化理论家自已指出的，现代性和传统性本质上是两个不对称的概念。现代的理想列出来后，凡不属于现代的任何东西都可贴上传统性的标签。拉斯托说，现代性“可以明确地下定义”，而“传统性却基本上仍是个残留的概念”。[③] 然而，把“正面”概念和残留概念结合起来的两分法在分析中极易产生错误。实际上它们根本不是相互对立的。这种概念造成的趋势是认为残留概念也具有正面概念所具有的一致性和准确性。结果，残留概念的许多现象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就模糊不清了。事实是，残留概念的某个表象与同一概念的另一表象之间的差别，同残留概念的任何一种表象与准确定义的两极中的另一端之间的差别同样大，甚至更大。然而，这样的事实也模糊不清了。许多两分法都有这种共同的问题。例如“军政关系”的概念就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对社会中军事集团与各种非军事集团的关系的正确理解。这些非军事集团之间的差别往往大于它们与军事集团的差别。[④] 正是因为传统性存在着太大的差异，因此无法用作一种

---

② 见古斯菲尔德：“传统性和现代性：社会变化研究中的错位”，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7卷（1966年），第351—362页；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1967年4月），第293—346页；鲁道夫夫妇：《传统性中的现代性》，芝加哥，1967年；S·N·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失败”，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第12卷（1964年7月），第345—367页；“传统性，变化和现代性”，希伯来大学埃利泽尔·卡普兰经济和社会科学学院；希斯特尔曼，“现代印度的传统”；辛格编：《传统的印度：结构和变化》，费城，1959年；科塔里：“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政府与反对派》，第3卷（1968年），第273—293页；小惠特克：《传统性政治学：1946—1966年尼日利亚北部的连续性和变化》，普林斯顿，1970年。

③ 拉斯托，《世界大同》，第12页。

④ 亨廷顿，“文官对军队的控制：理论陈述”；载奥伊劳，埃尔德斯维尔德和雅诺威茨编：《政治行为》，格伦科，1956年，第380—385页；“军政关系”，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纽约，1968年，第2卷，第487页。

分析概念。属于传统社会的特征与属于现代社会的特征是对立的。假定非现代社会是各种各样的，把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去"适应"传统性的理想类型显然是任意的和不准确的。俾格米部落[1]、德川时代的日本、中世纪的欧洲、印度教的村庄，都是传统的社会。然而，它们之间除了贴上那个共同的标签外，很难看到还有什么共同之处。传统社会在价值观念上存在着差异，在结构上也不同。[2] 此外，把传统性作为在本质上是不变的概念也受到批判。据论证，传统社会并不是静止的。"传统性和革新必然是对立的观点，看来已被开始认为是过分抽象，也不符合事实"。[3]

现代性概念同样有些模糊，这是因为把现代性与美德等同起来的趋势而产生。一切好事都认作是现代的，特别是对现代和西方没有加以区别。现代化理论没有指出西方社会——指二十世纪末的西欧和北美社会——的模式与现代社会的模式之间哪些东西是可以比较的，或者甚至是对立的。实际上这两类社会被暗中等同起来。现代社会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多方面的，都是西方社会。但是，对于非现代的和非西方的社会来说，现代化过程和西方化过程确实是截然不同的。这个问题一直被掩盖着，因为在现代社会与非现代社会以及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的全面解体中，现代非西方社会这个盒子至少到目前为止仍然是空着的。然而，据说日本已经进入或正要进入这个盒子。因此，一位日本学者会毫不奇怪地首先坚定地提出

① 非洲丛林中的原始部落。——译者

② 尤见辛格：《传统的印度》，前言，第10—17页；希斯特尔曼：《现代印度的传统》，第242—243页。

③ 古斯菲尔德：《传统性和现代性》，第352页。

这样的问题：现代性在多大程度上是西方的，西方社会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现代的。[①] 两个现代社会——其中一个是非西方的现代社会——之间更相似呢还是两个西方社会——其中一个是非现代的西方社会——之间更相似？（这里还应当注意，非西方社会像非现代社会一样，也是一个残留概念。两个非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别会大大超过任何一个非西方社会与一个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别）。

其他一些问题是由于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而产生。比较简单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两者是互为消长的关系，随着社会中现代性的增强而来的是传统性的削弱。然而，从许多方面看，现代性是对传统性的补充而不是取代。现代的习惯、信仰和制度只不过是传统的习惯、信仰和制度的增加。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是相互排斥"的观点是错误的。[②] 现代社会并不单纯是现代的，而是现代加传统的。现代的和传统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尽管在表面上完全是不协调的，但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融合在一起，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会相互并存，安然共处。此外，人们还可进一步证明现代性不仅可能和传统性并存，而且它本身可以强化传统性。它可能使原来存在的文化，例如宗教中的某些重要成份获得新生。希斯特尔曼说过："现代的发展不止一次地强化了传统，并且给它以新的重要性。举一个人所共知的事例来说明：现代性意味着广泛的交流，例如广播和电影（梵语四吠陀和印度古典音乐广播或者以神话和虔信为主

---

① 岸本秀夫："东方的现代化与西方化"，载《世界史杂志》（法文版），第7卷（1963年），第871—874页；又见希斯特尔曼：《传统性和现代性》，第238页。

②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第326页；又见小惠特克：《传统性政治学》，第3—15页。

题的电影），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史无前例的传播。”部落和赞美神灵的“传统”特色可能会得到鼓舞，其方式是“传统”社会中从未有过的。反过来，传统的态度和行为也可能有助于现代化：扩展型的家庭可以成为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企业单位；社会等级也可能成为推动实行政治民主的群体。“传统的象征和领导形式可以成为支持现代化的结构价值观念基础中至关重要的部分。”①

现代性和传统性概念固然有某些含糊不清之处，但与现代化概念的模糊不清相比，它们的轮廓显然具有比较概念的清晰性。总的说来，有关现代化的著作在描述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征时比描述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过渡中所发生的运动过程更为成功。他们比较集中于描述由此及彼的变化方向，而对变化的范围、时间、方法和速度则注意得不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这些理论可以说是“静态比较”的理论，而不是变化的理论。② 两分法的发展理论对于它们假定的那些阶段是历史演变中的实际阶段还是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讲得也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是理想类型，那么它们就是抽象的模式，可以用来分析任何时候的社会。但是，它们如果是历史概念，那么传统的类型可能失去其恰当性，而现代的类型则会得到它。这些概念的双重性于是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概念的两分法。任何实际社会显然融合了传统理想类型和现代理想类型中的

---

① 古斯菲尔德：《传统性和现代性》，第352页；希斯特尔曼：《现代印度的传统》，第243页；鲁道夫夫妇："印度等级社团的政治作用"，《太平洋事务》，第33卷（1960年3月），第5—22页。

② 穆尔："社会变化和比较研究"，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5卷（1963年），第523页；庞西奥恩：《社会变化分析再探讨》，海牙，1962年，第23—25页。

一些成份。因此，一切实际社会都处在转变中；或者说都是混合的。如果从静止的理想类型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分析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人们仍然可以用传统和现代的模式去识别或联系任何特定社会中的传统特征和现代特征。然而，如果把它看作是历史的理论或变化的理论，再加上一个过渡的类型，往往会把传统阶段和现代阶段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传统社会（像自然状态一样）只能作为存在于过去非常遥远的一个假设的起点。如果传统的残余在遥远的未来消失，那时真正的现代社会才可能存在。因此，传统性和现代性就不再是历史过程中的阶段了，它们只是历史的起点和终点。但是，如果一切实际的社会都是过渡性的社会，那就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在过渡性社会中发生变化的形式和过程。这恰恰是两分法的理论没有能力做到的。

除此之外，这些最初使用简单方法想象现代化的每一种设想都可能引出问题。它与现代化是革命性的观点相反，可以论证说，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大。不仅现代社会包含了许多传统的成份，传统社会往往也有许多一般被认为只有现代社会才具有的那些特征，例如机会均等的原则、任人唯贤的倾向、官僚制度等等。[1] 社会内部存在的文化、心理和行为方面的连续性在传统阶段和现代阶段上可能比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异大得多。那种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过程的主张同样受到指责，理由是现代化只在某个范围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他范围内的变化只不过是那个有根

---

①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第313—314页；古斯菲尔德：《传统性和现代性》，第352—353页。

地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美国社会科学学会的比较政治学委员会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中看出来，尤其可以从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知识界领袖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的著作中看出来。

1960年，在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和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持下，阿尔蒙德和詹姆斯·S·科尔曼主编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这部著作在推动政治学家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问题方面无疑起了重大作用。这部大作的内容，包括叙述和分析五个发展中地区共同的政治形态。此书在知识界起主要影响的是阿尔蒙德所写的导言，其次是科尔曼所写的结论。他们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把政治体系的一般概念应用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研究。阿尔蒙德使用这个框架把"发达的"与"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政治体制加以区别。发达的政治体制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发达的政治体制是传统社会的特征。阿尔蒙德使用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概念或者像他所喜欢使用的那个"理性"概念，用帕森斯的话来说是源于社会学分析的主流。阿尔蒙德在这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坚持"一切政治体制在文化上都是混合的，把传统和现代的成份结合在一起"。一切政治体制——西方发达的体制和非西方不太发达的体制——都是过渡的体制。他恰当地批判了那些鼓吹"理论上不幸的两极划分"的社会学理论家，批评他们不承认政治体制中的这种"双重性"。①

《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不是一部关于政治发展的著作，而

① 阿尔蒙德和科尔曼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普林斯顿，1960年，阿尔蒙德所写的导言，第23—24页。

是一部比较政治学的著作。此书只提供了比较政治学分析中使用的行为和体制方法，没有对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或理论作出描述，整本书里显然未曾出现过“政治发展”这个词。它所关注的是对发展中（或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政治体制进行分析，并且把这些体制与据说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政治体制进行比较。它的主要范畴是体制、任务、文化、结构、功能和社会化。其中除了社会化以外，所有的范畴都不是用来描述动态过程的。这些范畴在进行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时是必不可少的，却不是针对研究政治体制的变化和发展的。阿尔蒙德罗列了若干在任何政治体制中必定要发挥作用的一些功能，然后把使这些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构对体制进行比较。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把政治功能和政治结构分开来。”阿尔蒙德还主张：“如果我们想要准确地理解这个差别并且有效地解释政治变化的过程，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双重性的模式而不是一元化的、平衡的和发展的模式。”[①] 阿尔蒙德等人在这本书中描述了政治体制的双重性模式所包含的成份，但他们没有试图阐明有助于理解“政治变化过程”的一种“发展模式”。

六年以后，阿尔蒙德与C·宾厄姆·小鲍威尔共同撰写了另一部重要理论著作，把上述的任务提了出来。此书不同于前书，关注政治的动态发展，它显然集中于研究政治发展并把政治发展当作主题和基本概念来对待。阿尔蒙德承认前一部著作有局限性，没有与政治变化联系起来。他说，那部著作的框架“主要适用于对某个特定时间的政治体制作横向的分析。我们没有用它来探索政治发展模式，解释政治体制怎样发生

① 阿尔蒙德和科尔曼编：《发展中地区的政治》，第25页。

(7) 民主建设；

(8) 稳定和有秩序的变化；

(9) 动员与权力；

(10) 社会变化多方位过程中的一个方面。

派伊曾致力于综合，试图把政治发展中最共同的问题概括为趋向于下述方向的运动：即在与政治体制的关系中，个人的平等地位提高了；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政治体制的能力提高了；在政治体制内部，制度和结构的差异提高了。他认为，在政治发展过程的核心中可以发现这三方面的趋势。[①] 另外也有人试图把政治发展的定义概括为四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即理性化、国家一体化、民主化，以及动员或参与。[②]

用约翰·蒙哥马利的话来说，[③] "对政治发展的探索"必定会引导政治学家去解决三个更一般的问题。第一，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目前的倾向实际上是把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等同起来，而政治发展只是现代化的多种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在何种类型的变化构成了政治发展的问题上，政治学家们的意见可能会有分歧，但不管他们作出什么选择，几乎大家都想把他们所选择的变化作为现代化一般过程中的一部分来对待。从这个观点出发，塞缪尔·P·亨廷顿在1965年提出了一种主要的不同观点。他认为，非常需要把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区别开来。他说，把两者等同起来太多

---

① 派伊：《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波士顿，1966年，第31—48页。

② 亨廷顿："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落"，载《世界政治》，第17卷（1965年4月），第387—388页。

③ 蒙哥马利："政治发展之探索"，载《比较政治学》，第1卷（1969年1月），第285—295页。

"未必能轻易地合在一起"。相反，"从历史上来看，通常的趋势总是在平等的要求、能力的需要和更大的差异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阿尔蒙德用同样的方法认为任务的差异、分支体制的自主性和世俗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多样化"的"趋势"。但是，这三个变量当中的每一对关系"并不是必然的和一成不变的关系"。[1] 的确，阿尔蒙德提出了一种双轴模式，在一根轴上是世俗化和任务差异，而在另一根轴上是分支体制的自主性。这个双轴模式有九只盒子，每一类型的政治体系各占一只。这样也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政治发展无所不包，那么，什么是政治发展呢？反之，如果把政治发展解释为单一的概念，那么，它要么是狭义地作解释——例如亨廷顿将它完全等同于制度化——结果剥夺了它在通常情况下具有的许多内涵和丰富的内容，要么就是非常一般的解释，就像阿尔弗雷德·迪亚曼特那样实际上是把单一概念的标签贴在复合概念上面。[2]

在探索解释时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发展属于哪个范围，是描述性的概念还是目的论的概念。如果属于前者，那么大致可以说，它所指的，用它的内在特征来说，要么把政治发展过程解释为一个单一的过程，要么解释为一组过程。相反，如果它属于目的论的概念，那么，政治发展便被设想为达到某个目标的运动。它就不是依据它的内容而是依据它的方向来解释了。在较为一般的现代化情况中，政治发展的目标当

① 派伊：《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第 47 页；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第 306 页；关于这些问题引起人们兴趣的分析，见里格斯："发展冲突的辩证法"，载《比较政治研究》，第 1 卷(1968 年 7 月)，第 197 页起。

② 迪亚曼特："政治发展的性质"，载芬克尔和加布尔编：《政治发展和社会变化》，纽约，1966 年，第 92 页。

然被积极地加以评价。如果能够用明确的标准和相当准确的指标(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政治上的对应值)来衡量向这些目标前进中取得多大进步,那么依据目标给政治发展所作解释就不会产生什么难题。然而,由于缺少这样的标准和指标,一种强烈的倾向就会出现,认为学究式的分析家以及他们可能正在分析的政治人物需要政治发展,因此政治发展便出现了。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任何事情,尽管从表面上看可能是逆转或倒退——例如政变、种族斗争、革命战争等——几乎都成了政治发展过程的组成部分"。[1]

这些在解释政治发展时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个真正现实的问题,即把政治发展作为一个概念有什么用处。谈到派伊开列的政治发展十项定义,拉斯托认为"至少有九项显然是多余的"。[2] 然而实际上还应作进一步考虑,如果说政治发展有十项定义,那么十项都是多余的,这个概念可能本身就是多余的,不起作用的。在社会科学中,概念如果能起到集合的作用便是有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概念具有若干共同性的次概念,那么这些概念就是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化是包括许多组成部分的概念。或者说,概念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具有区别的功能,那就是由于它有助于把一些看起来无差异的事物分离为两种或更多种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的表面功能和潜在功能都是能作出区别的功能。

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是否具备这些方面的功能,令人怀疑。政治发展被认为是包括了多种不同过程的综合概念。前文谈

① 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第390页。

② 拉斯托:"政治科学研究的主题:变化"(政治科学委员会圆桌会议开幕式上宣读的论文,都灵,1969年9月),第1—2页。

到过，阿尔蒙德和派伊就是如此设想的，但事实往往证明，这些过程除了贴上同一个标签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够说明在政治发展这个标签之下包含了哪些成份。勒纳站在一个不同的方面所说的现代化这个标签包含着更广泛的过程；这些过程之所以在一起出现是因为“从某种历史意义上来说，它们必须共同出现”。可是，在大多数关于政治发展的复杂定义中包含的那些成份显然并不一定共同出现，事实上也往往不是共同出现的。此外，如果政治发展包含了阿尔蒙德所说的差异、分支体制的自主性和世俗化，那么，正像阿尔蒙德在结论中所暗示的那样，真正令人感兴趣而又重要的问题不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吗？因此，政治发展这个词的使用会造成错觉，认为在其他过程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和相似性，而对最重要的问题反而不去讨论。另一方面，把政治发展同某种单一的特殊过程，即与政治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起来，显然更是多余的。在分析过程中若能用另一个名称来称呼一个好名称，收获是什么？总之，政治发展无论是用作综合的概念还是用作区别的概念，都是多余的。

在政治学家看来，政治发展发挥的主要功能事实上既不是用以聚合，也不是用以区别，而是用以使之合乎逻辑。因此政治学家可以这样说：“喂，这里有些东西在我看来是有价值的，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句话揭示了对于政治发展的含义所展开的争论对这门学科的主要作用所作出的贡献。使用这个概念在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民主化与政治发展之间关系的辩论中。还有在政治学家们考虑“苏联在政治上是发达的吗？”这个问题时长期存在的心神不安。因此，政治发展这个概念实际上只标志着学者们的

爱好，而不是一种用于分析的工具。①

政治发展的概念之所以在政治学家当中广受欢迎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在政治方面应当有一个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概念。从这方面看，政治科学发现它本身在方法上正处于它的两个邻近学科之间，立场是同样含糊的。从研究对象的范围来看，政治学比社会学更狭窄，但比经济学更广泛。从政治学家对这门学科的目标所持的一致意见来说，他们比社会学家当中的分歧小些，但比经济学家当中的分歧大些。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无所不包，经济学则集中研究自己的目标，政治学不同于前者，也不同于后者。社会学理论中出现的折衷主义和冗赘散漫是由于其研究主题范围之广，是可以原谅的。经济学理论的褊狭和短浅是由于它的准确和精致，也是可以谅解的。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学家要借鉴社会学家的概念和仿照经济学家的概念，那是十分自然的。社会学的现代化概念完全可以扩大并应用于政治分析。政治发展的概念是依据经济发展的现象而创造出来的。根据模式的选择，人们可以概括地说，一个学科一般往往要在邻近学科中选择结构更严密的和"更科学的"榜样来模仿。当然与那些一般"误用具体观念"一词联系起来的做法相比，这样做会带来一些困难。据说，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的含义以及如何衡量经济发展上有很多分

---

① 也许有人会说，切莫投鼠忌器。可是我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落"中确实把政治发展解释为政治的制度化。对此，我可以作出这样的回答：这样的解释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我并不在乎投鼠忌器造成的实际效果，如果说我在改弦易辙，那么，我也鼓励别人改弦易辙。我在1968年写的那本书《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以1965年的那篇文章为基础，但悄悄地抛弃了政治发展的概念。相反，我只着重讨论了在我看来是最关键的那个问题，即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重大关系，我并不关心"政治发展"应贴上什么标签这个问题。

歧。然而，若与政治学家在使用政治发展这个概念时遇到的困难相比，经济学家的分歧简直小到无足轻重。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学家以社会学家作为自己的榜样，仿照社会学家讨论社会变化的方式来讨论政治变化，而不是仿照经济学家讨论经济发展的方式来讨论政治发展，他们也许可以避开他们自己发现的许多有关定义和目的论的问题。

研究政治发展的方法

许多研究工作往往贴上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标签，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们并不是真正的政治发展研究。政治发展研究不是去研究某些社会在某个特定发展水平上的政治。如果这就是政治发展研究的话，任何不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政治研究几乎是没有了，因为那些通常被认为是发达的政体仍然可以看作是发展中的政体。把欠发达社会的政治研究当作政治发展研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据说突尼斯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因此它的政体是发展中的政体；因此，研究突尼斯的政治便是研究政治发展。这个推论的错误是只看到了研究的主题，而没有看到研究这个主题时使用的概念。对约翰·F·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的研究由于依靠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以及因此提出的问题，便成为对如何使用权力、机构制度化、立法--行政关系、舆论一致的形成、领导人员的心理、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作用的研究。或者也可以将这种研究设想为政治发展的研究或政治变化的研究。对哈比卜·布尔吉巴担任总统期间的研究也同样有可能属于这种类型。同前一种研究相比，它并没有更多“发展”的含义。准确地说，有关发展中社会的军队、官僚和政党作用的无数研究也属于这种类型。很简单，这些只

是对特殊类型社会中的特殊机构进行的研究，而不是对变化或发展进行的研究。由于研究这些对象时依靠概念的框架，因此研究军政关系、有组织的行为和政治行为，如同研究政治发展那样容易进行。只要使用的范畴按变化来确切地阐述，它们就是后一种研究。

当然，变化可以说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它实质上与政治本身同义，不能将它当作另一个主题来研究。对此的反驳是，政治肯定是变化，但也是思想、价值观念、制度、群体、权力结构、冲突、交流、影响、相互作用、法律和组织。政治可以用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来进行研究，而且也一直在这样研究。每个概念都从自己不同的角度阐明主题，解释不同的领域，提出不同的关系和作出归纳。那么，为什么不用变化或发展来分析政治呢？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各类学者实际上正是这样进行研究的。他们使用了许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不企求全面和系统的概括，集中说明其中的三种方法或许是有用的。它们是体制—功能法，社会过程法和比较历史法。

体制—功能法

在政治发展的分析中，严格地说，体制理论与结构—功能理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确实，不使用一些政治体制的概念，就不可能应用功能方法。塔尔科特·帕森斯、马里恩·列维、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戴维·艾普特、伦纳德·宾德、弗雷德·里格斯等这些名字就表示出体制—功能法中的各种理论。这些学者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一套用以分析和比较政治体制类型的概念和范畴，其中心是

"体制"和"功能"，其他重要概念还有结构、合法性、投入和产出、反馈、环境和平衡。这些概念以及与之有关的理论提供了政治体制的完整模式，也从结构方面提供了区别政治体制类型的基础，这些结构发挥了所有政治体制中必须发挥的功能。

体制—功能法的优点显然在于它在分析面上展现出一些概念的主要部分。不过，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政治变化也有一个美中不足的问题。它主要是个概念的框架，这个框架未必能概括经得起验证的假设，也不是那种往往被称作"中层归纳"的东西。使用这个框架的学者们可能提出这样的假设或概括，但它在这方面究竟是起阻碍作用，还是起推动作用，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方法也无助于学者去挖掘以经验为根据的资料。它的趋势确实是朝着反面的方向走。理论本身变成了目的。令人惊讶的是，不仅在列维那种全面研究的两卷本著作中缺乏事实根据，就连宾德试图应用体制—功能法对伊朗进行的个案研究等，也缺乏事实根据。①

更根本的问题是这种方法本来就不集中研究变化问题。人们可以在动态的范畴内运用"体制"概念，集中研究落后、领先和反馈。然而，用体制方法把政治发展的研究理论化，并不是主要使用那种方法讨论动态因素。它的重点在于详细描述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模式，而不是描述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变化的不同类型。例如，列维在《现代化和社会结构》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中讨论他所提出的两个成份时，重点讨论后一个

---

① 列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以及宾德：《伊朗：变化中社会的政治发展》，伯克利，1962年。

成份。这部著作用大量的篇幅专门讨论一般的社会特征，然后把“比较现代化的社会”与“比较非现代化的社会”的特征加以区别。关于现代化问题及其政治方面的组成部分，这部八百页的著作只用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简短地加以叙述。前面已经说过，阿尔蒙德自己认识到他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中使用的框架有一定的局限性。他和小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研究方法》一书中提出的一种更精细的以研究变化为方向的计划，也不能完全避开这个难题。在研究体制-功能传统直接与政治发展有关的著作中，戴维·艾普特的《现代化的政治》一书，或许是对于变化的速度、形式和根源的动态研究最获成功的。然而，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对规范问题和意识形态进行独立研究，这些问题并不来自他也使用的体制—功能框架而有其他来源。正如卡尔曼·西尔弗特指出的，对研究极其原始的社会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和对研究极其复杂的社会感兴趣的社会学家（如帕森斯）首先使用了结构—功能方法。它对于理解正在发生根本变化的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在社会学范围内对这种方法进行严厉批判的时候，政治学家为了研究政治变化却拾起了这种方法。社会学研究对变化的研究并不关心，因此用处也有限。

有人指出，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试图讨论变化的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是，“均衡”这个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同体制-功能法或明或暗地发生着联系。均衡的概念假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在功能上有联系的变量组成的体制存在。一个变量的变化引起了另一些变量的变化。正如伊斯顿指出的，这种概念与多重因果论和多元论有密切的联系。此外，均衡也可以指维持

"一种互起作用的特殊模式"的体制中的变量关系。[1] 这种理论在其纯粹形式中把平衡看作静止状态。各种形式的"均衡"理论都含有恢复原来状态的趋势,或从理论上解释均衡状态。

均衡理论作为一种探索政治变化的框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的,这个理论"并不关心变化的内在根源,也不预测保持某个方向的变化(如果发生了紊乱,只有通过这些变化才能恢复均衡),因此,不准备讨论过去发生的一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却显然对目前状态下的体制具有影响"。[2] 实际上,变化被看作外部的反常。按照这种理论,变化也是压力或紧张的产物,它产生的补偿运动往往减少压力或紧张,从而恢复本来的状态。变化是"非自然的",稳定或静止才是"自然的"。有些思想家想通过动态均衡的概念来调和均衡和变化。然而,这个概念本身就不足以说明变化。如果均衡保持不变,而其本身又只是作为整体来移动,那么这个概念就无法解释这一运动的原因和方向。如果均衡本身是在变化的,那么,动态均衡实际上便意味着多重均衡,这样又需要某种理论来解释一种均衡为另一种均衡所接续。

社会过程法

研究政治发展的社会过程方法不是从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概念出发,而是研究作为现代化的某个部分并与政治变化有关的社会过程——诸如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文化扩

---

① 伊斯顿:《政治体制》,第266—267、272页;拉斯维尔和卡普兰:《权力和社会》,纽黑文,1950年,前言,第14页。

② 穆尔:"社会变化和比较研究",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5卷(1963年),第524—525页。

展、职业流动性等。研究的重点在于过程而不在于体制。与体制一功能法相比,这种方法更具有行为科学和经验论的倾向。在类型上它属于大量的资料积累,往往是计量性质资料(如调查资料或综合的生态资料)的积累,然后试图把政治变化与社会过程联系起来。使用体制一功能法的学者想把一切归因于功能,使用社会过程法的学者则想把一切都同过程联系起来。他们可能会越过相互联系,进一步试图探讨因果关系,通过各种因果分析或轨线分析的技术去说明后者。

使用这类方法去研究政治发展并把它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遇到的一些问题联系起来的学者中,最杰出的有丹尼尔·勒纳、卡尔·多伊奇、雷蒙德·坦特尔、海沃德·阿尔克、菲利普斯、卡特赖特和迈克尔·赫德森。勒纳的《传统社会的消逝》(1958 年)和多伊奇在 1961 年所写的论文:"社会流动与政治发展",[①] 是最重要著作,对后来的学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使用体制一功能法的学者从政治体制的概念出发,区分出政治体制的不同类型或模式,最后试图对这些区别作出结论并讲清楚它们的含义。他们的研究方法关注行动方式同整个体制的联系,那就是要使它等同于体制内部的功能。相反,使用社会过程方法的学者则关心某种行动模式和另一种行动模式的联系。

社会过程研究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力图建立各种变量之间

---

① 多伊奇:"社会流动与政治发展",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 55 卷(1961 年 9 月),第 493—514 页。他把阿尔蒙德、亨廷顿和苏联比较政治学学会提出的政治发展的理论与已有的计量资料联系起来,作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工作,见霍普金斯:"资料的综合与政治发展研究",载《政治学杂志》,第 31 卷(1969 年 2 月),第 71—94 页。

系要通过个人的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微观"变化作为媒介。在大多数社会过程分析中，对后者的解释据说是存在的因果关系连锁中最薄弱的一环。目前处理这种问题的最流行和最有效的方法是各种形式的"相对剥夺"和"挫折—进攻"的假设，用以把社会经济变化同政治不稳定联系起来。① 最后，在因果关系连锁中的因变量因素一端上，社会过程的分析家们在确定政治变量因素、识别衡量这些因素的指标，以及取得这些指标所需要的资料方面，也常常遇到困难。

社会过程法关注政治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和社会，这引起了更广泛的批评。经济和社会对政治有重大影响，那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达到中级水平的社会中，这种影响也许特别重要。公平地说，大多数实际使用这种方法的人极少使用纯粹的社会过程法，但他们没有给社会结构留有余地，更不用说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和政治领导了。社会过程法在政治变化研究中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要克服这种一开始就存在的缺陷，寻找一种方法去赋予文化、制度和领导等因素以独立作用。

比较历史法

研究政治发展的第三种方法比前两种方法在形式上更多样和更折衷一些。实际使用这种方法的人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看法，但他们是松散地聚在一起的。他们既不是从某种理论模式出发，也不是去集中讨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因素

---

① 多伊奇："社会流动与政治发展"，第493页。又见戴维斯："革命理论导论"，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7卷(1962年2月)，第5页起。

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的演变进行比较。使用体制—功能法的人所谓的“体制”和使用社会过程法的人所谓的“过程”，对使用比较历史法的人来说，就是“社会”。然而后者感兴趣的不是一个社会的历史，而是对两个以上的社会进行比较。使用体制—功能法的人用概念来思考，使用社会过程法的人以相互联系来思考，使用比较历史法的人当然用比较来思考。关注政治发展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家就属于这一流派，其中首推西里尔·布莱克、S·N·埃森斯塔特、丹克瓦特·拉斯托、西摩·马丁·利普塞特、小巴林顿·穆尔和赖因哈德·本迪克斯，还有卢西恩·W·派伊。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这一流派。

这些人的著作往往十分重视经验，但不十分重视计量。他们对社会过程分析中感到难以精确阐明的因素确实也很关心，例如制度、文化和领导。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按照一切社会都必须经历的一般阶段或过程，或按照不同的社会可能通过的不同渠道，对政治发展的型式进行分类。例如，穆尔把现代化分为三种型式：资产阶级型式（英国、美国）、贵族型式（德国、日本）和农民型式（俄国、中国）。他承认可能还有第四种型式（印度?），但这种型式是否有概念化的可能，他很怀疑。因此，每个现代化的社会可能会通过自由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主义或革命的共产主义找到各自的方式去实现现代性。与此相反，西里尔·布莱克一开始就验证一切社会必须经历现代化的四个阶段：最初对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层的巩固；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转变；以及包括社会结构彻底重新安排在内的社会一体化。然

后，他又提出了五项标准来衡量各种社会进入了哪个阶段，并且在这五项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当前的各个社会划分为“七种政治现代化的模式”。这样，他把纵向的范畴和横向的范畴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真正无所不包的比较历史体系，并且恰到好处地在他的著作上加上了一个副标题：“比较历史研究”。①

丹克瓦特·拉斯托和社会科学研究院比较历史学委员会使用的方法略有不同，他们试图识别出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面临的问题有哪些类型，并通过依次讨论这些问题来比较这些社会的演变。拉斯托认为，政治现代化有三个关键的必要条件：“认同对民族来说是必要的，权威对国家来说是必要的，平等对现代性来说是必要的。这三个必要条件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② 各种社会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同时还是依次来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以什么样的次序来处理这些问题。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拉斯托提出认同—主权—平等的次序导致了成功最大和代价最小的现代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比较历史委员会以大致相似的精神和同时进行的研究提出，任何社会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要对付五种危机：认同、合法化、渗透、参与和分配。这两项研究工作与阿尔蒙德的研究工作看来是大致相似的：

---

① 小穆尔：《独裁制和民主制的社会起源》，波士顿，1966年；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纽约，1966年。

② 拉斯托：《世界大同》，第36页；有关政治发展各项因素的有创见的讨论，见诺德林格：“政治发展的先后次序和变化速度”，载《世界政治》，第20卷（1968年4月），第494—520页。

阿尔蒙德—挑战	拉斯托—必要条件	比较历史委员会—危机
民族形成	认同	认同
国家形成	主权	合法性
		渗透
参与	平等	参与
分配		分配

有趣的是，美国社会科学院比较历史委员会最初还提出第六个危机，即一体化，也就是关于“大众政治与政府行为的关系问题”。[1]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相当难以把握的危机，相当模糊，而且无法捉摸，因此最后将它删去了。

比较历史法的最大优点是一开始就注意到社会的实际演变，试图将这些演变归纳为若干型式，然后试图对哪些因素是型式发生差异的原因提出了假设。总之，它从历史的“真实”材料开始，在方法上与体制—功能法及其使用的抽象的体制模式是对立的。这种方法与社会过程法一样，也不认为城市化和不稳定性等变量因素能不受它们的背景限制，因而可以单独挑出来并作出概括。因此，这种方法显然缺乏通用性，事实上它回到了集中研究现代化在历史上不相关联的现象，讨论具体社会在演变中的具体阶段。像大多数对“发展”的分析那样，它的概念与“平衡分析的概念相比，不大普遍适用”。[2] 与使用复杂概念的体制—功能法的人和使用了高度计量分析的社会过程法的人相比，使用比较历史方法的那些人像是一些比较缺乏想象力、拘泥于传统的沉闷苦干的人，其成果也缺乏理论上和科学上的精确性。另一方面，他们与前两派不同，往往能

① 派伊：《政治发展的各个方面》，第62—67页。

② 拉斯维尔和卡普兰：《权力和社会》，前言，第15页。

核心,从特征来说,它们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因素和关系。第四,这些框架有足够的灵活性,包括讨论政治系统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下发生变化的根源和变化的型式。第五,这些理论与较早的一些政治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相比,总的说来更为复杂,包含的变量因素更多,并考虑这些变量因素之间更广泛的关系。

1968 年,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转变性的研究方法。在这部著作中,集中研究政治变化,把它看作是参政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决定了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参政范围扩大的根本原因是非政治的社会经济过程与现代化等同。现代化对政治稳定的影响是通过社会流动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挫折和非政治流动机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参政和政治制度化的相互作用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亨廷顿用了几个等式来表示这些关系:①

① $\frac{\text{社会流动}}{\text{经济发展}}=\text{社会挫折}$

② $\frac{\text{社会挫折}}{\text{流动机会}}=\text{政治参与}$

③ $\frac{\text{政治参与}}{\text{政治制度化}}=\text{政治的不稳定}$

这种方法以社会过程法中最主要关注的现代化为起点,即从研究社会经济的一些变化(城市化、工业化)为一方,以政治参

①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 55 页。

与、政治不稳定和暴力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开始，由此对社会结构(流动机会)和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化)的成份进行分析。

亨廷顿关注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前者的根源归根到底是现代化过程。那么，后者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一点他并没有公开地说清楚。但他含蓄地指出两个主要根源。其中一个是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在制度化方面，有些传统的政治体制比其他一些传统的政治体制更为高度制度化(即有更大的适应性、复杂性、凝聚性和自主性)。这些体制更能维持现代化，提供更广泛的参政型式。此外，亨廷顿还提出，在现代化过程的特定阶段，某些类型的政治领导(贵族的、军事的、革命的)和某些类型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政治结构的制度化。

然而，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一个可以从现代化的各种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关系。后者可能是参政中发生变化的重要历史根源，但参政发生变化的根源不止一个。而且，参政和政治制度化的相互平衡问题是在任何发展水平上的社会都要遇到的问题。六十年代末美国发生的那场有黑人和学生卷入的动乱就可以用这个准则来进行有效的分析。在各大城市和大学中，现存的结构受到了挑战，要求它们提供新的渠道以便使这些社会群体能用当时的方式"参与和他们有关的决策"。

这种理论方法最初是集中注意两个政治变量因素之间的关系。它也可以加以扩展，把更多的因素和不同的因素包括在内。研究政治发展的许多著作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它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变化的**目标**，而是变化的**方向**，这当然反映了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研究。然而，威廉·米切尔指出，分析政治变化的第一步只不过要识别

出“变化可以达到的目标”,① 即识别一种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是什么,或者可能是什么,然后确定它们与变化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些关系确实存在着的话。因此,这种方法是集中研究**组成部分的变化**。

一种政治体制可以被设想为各种组成部分的集合。这些组成部分都在变化中,有的变化速度快,有的变化速度慢。于是,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成为:某个组成部分的哪种类型变化与另一些组成部分中类似的变化或不发生变化有什么关系呢?在整个体制中,组成部分变化的不同组合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因此,政治变化研究可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集中讨论那些看来属于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2)确定这些组成部分中发生变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3)分析一个组成部分的变化与另一些组成部分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政治体制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下定义,也可以设想为有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例如有下述五种:

(1)文化,即与政治有关的并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态度、取向、神话和信仰。

(2)结构,即有形的组织,诸如政党、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官僚机构等,通过这些组织,社会才能作出权威性的决策。

(3)社会群体,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和经济群体,它们参与政治并向政治机构提出要求。

(4)领导,即政治机构中的个人和集团,他们在确定价值观念方面比其他人有更大的影响。

(5)政策,即政治活动的型式,其目的是有意识地影响社

---

① 米切尔:《美国的政体》,纽约,1962年,第367—370页。

会内部利益和惩罚的支配。

从分析这五个组成部分的变化以及分析某个组成部分的变化与其他组成部分变化之间的关系着手，政治变化的研究便可望有丰硕成果。在一个体制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与结构的变化的关系如何？新社会群体动员进入政治与机构的演变之间有什么关系？领导人的更迭与政策变化的关系又如何？开始的假定将会是，这五个组成部分在任何政治体制中总是处在变化之中，但是在同一个体制中和不同的体制之间，各个组成部分中的变化在速度、范围和方向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在有些情况下，某个组成部分的变化也许接近于零，但无变化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变化速度，这种速度如果在实践中确实存在，那真是罕见的。而且，每个组成部分本身就是各种因素的集合。例如，政治文化可以包括许多亚文化群；政治结构可以表示各种机构和程序。政治变化既可以从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来进行分析，也可以从每个组成部分的各种因素的变化来进行分析。

组成部分和因素是变化的对象。但是仍有必要指出哪种类型的变化对于政治变化研究来说才是有意义的。有一种显然与组成部分或因素的权力变化有关系。的确有人可能会论证说，权力的变化是政治分析应当关注的唯一变化。但是，如果只集中于研究权力，就取消了政治的意义。政治分析所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制度、社会群体、领导人和政策的权力。但是，政治分析也关注这些组成部分的内容以及内容的变化与权力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这里，“权力”在政治分析中可能有本来就赋予它的通常的含义。[①]相反，“内容”却必须按每个组成部分来确定其不大相同的含义。政治文化的内容是指在社会中占

主导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的实质。另一方面，社会政治制度的内容则包括互相作用的型式，这些型式赋予它们以及与它们有关的利益集团和价值观念以特征。政治群体的内容是指他们的利益和目的，以及他们对政治体制提出要求的基本内容。领导的内容是指领导人的社会—经济—心理特征以及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当然，政策的内容包括政策的实质以及利益分配和惩罚制度。

在第一种情况下，政治变化的分析可以针对政治体制中的组成部分和因素的力量发生的简单变化。但更重要的是各个组成部分和因素的力量变化与内容变化之间的关系。如果政治分析局限于分析力量的变化，那就永远无法掌握它们的前因后果。政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涉及力量和内容的平衡协调。政治思想意识的力量发生的变化（用拥护这种思想意识的人数以及拥护的强度来衡量）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思想意识基本内容的变化呢？在什么情况下领导人力量的迅速变化需要他们的目标和目的发生相应的变化（即力量的"节制"作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改变目标又能加强领导人的力量？例如历史证明在自由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极权社会中职业军官只有放弃或改变保守的军人价值观念才有可能获得政治力量。[②] 在大多数体制中，要加强思想意识、制度、群体、领导

---

① 当代社会科学家有关权力分析的重要论著包括：拉斯维尔和卡普兰的《权力和社会》，第74页起；西蒙："政治权力的观察和衡量"，载《政治学杂志》，第15卷（1953年11月），第500—516页；马奇："权力的理论和衡量导论"，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49卷（1955年6月），第431—451页；达赫尔："权力概念"，载《行为科学》，第2卷（1957年7月），第201—215页；弗里德里希：《人和政府》，纽约，1963年，第159—179页；帕森斯："权力的概念"，载《民意季刊》，第26卷（1963年春季）。

② 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剑桥，1957年，第80—97页，以及其他各处。

人或政策的力量必须以改变其内容为代价。但是，这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要说明不同组成部分的力量和内容在不同情况下的协调平衡必须作出具体的说明。政治体制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实际上也许就是某个因素的力量得到显著加强时必须在内容方面付出多大代价。可以说，某个政治系统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它为力量付出的代价也就越高。

因此，政治变化可以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分析。一个组成部分变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可以同其他一些组成部分变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可以揭示这个政治体制中稳定和不稳定的型式，并揭示一个组成部分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一些组成部分的变或不变，或者说明它们之间的变化有多大关系。例如，一个政治体制中的文化和制度与群体、领导人和政策相比，可以设想前者在这个体制中是主要的。因此，稳定可以解释为一系列特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所有组成部分都在发生渐变，但文化和制度的变化速度慢于其他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反过来，政治停滞也可以解释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政治文化和制度很少变化，甚至没有变化，而领导层和政策却迅速地发生变化。政治不稳定也可能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文化和制度的变化比领导层和政策的变化更快，而政治革命则包含体制中五个组成部分都在同时发生迅速的变化。

政治变化分析的第二个层次是体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个因素在力量和内容方面发生的变化可以和同一个组成部分的其他因素在力量和内容方面发生的变化进行比较。例如，这种分析涉及对思想意识和信仰，对制度和群体，以及对领导人与政策的兴起衰落进行分析，并对这些因素的内容所发生的

变化以及与此有关的力量关系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最后一个层次也是分析中最特殊的层次，它集中注意力于分析任何一个因素的力量变化和内容变化之间的关系，力图验证力量在目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方面所付出的代价之间的等量关系。

这样一系列比较简单的假设和分类既可以作为分析许多社会中出现的比较一般的变化问题的起点，也可以作为深入分析某个特殊社会的变化型式的起点。它可以提供一种方法，把有关态度、制度、参政、群体、上层人士、政策的研究中取得的成就集中起来，以便理解政治变化。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丹克瓦特·拉斯托分别提出了一种与此略有不同的研究方法，集中讨论**危机变化**，并为分析政治动力提供一个总的框架。阿尔蒙德认为，较早提出的各种比较政治学理论和发展的理论可以按照两个范围来分类。[①]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平衡模式还是属于发展模式？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预测决定或选择？阿尔蒙德在评论许多对这些问题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之后，想出以下的分类，见表。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平衡	发展
决定	1. 帕森斯 伊斯顿	3. 多伊奇 穆尔 利普塞特
选择	2. 唐斯 达赫尔 里克尔	4. 哈桑伊 莱塞森

他后来又进一步论证说，这些研究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方

① 阿尔蒙德："决定一选择，稳定一变化：对当前政治理论中争论的思考"，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1969年8月。

起来，而又保留了每种方法的特殊长处。这种模式特别适用于分析有限时期内的巨大变化。因此，阿尔蒙德和他的合作者把这种模式应用于研究界限分明的历史危机，例如英国1832年的议会选举法修正法案的提出，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建立，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墨西哥的卡登纳斯改革，也就不足为奇了。①

拉斯托通过类似的努力提出了一种大致相同的模式。②他提出，政治变化是不满现状的产物。这种不满导致了政治行动，而政治行动确实总是不满的结果。政治行动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如果它获得成功，那么对此有功的组织、运动或其他群体要么产生新的目标，要么衰落和死亡。如果争取变化的努力失败了，进行这种努力的群体要么解体，要么继续追求老目标，但对于达到这项目标的期望减少了。此外，拉斯托认为，参与建立政府或征服权力的各种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与那些支持政府和保持个人或群体权力的力量很不相同。政治变化理论必须说明这些差别并且使之系统化。因此，拉斯托像阿尔蒙德那样，特别重视政治领导必须作出的选择。

分析政治变化的第三种方法是由罗纳德·D·布伦纳和加里·D·布鲁尔提出来的。③他们在政治方面现代化的研究

---

① 关于阿尔蒙德模式的起始应用，见科尼利厄斯："墨西哥革命中的危机、结盟和政治活动：拉扎罗·卡登纳斯社会改革中的政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历史危机和政治发展研究项目，1969年。

② 拉斯托："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变化"，第6—8页；又见拉斯托："共产主义与变化"，载约翰逊编：《共产主义体制的变化》，斯坦福，1970年，第343—358页；以及"向民主制过渡的动态模式"，载《比较政治学》，第2卷(1970年4月)，第337—363页。

③ 布伦纳和布鲁尔：《有组织结构的复杂性：经验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纽约，1971年。

中提出了一种研究复杂变化的模式，含有二十二个变量因素和二十个参数，其中的十个变量因素和八个参数是按农村和城市划分；三个变量因素和三个参数构成人口分系统；九个变量因素和六个参数构成经济分系统；十个变量因素和十一个参数构成政治分系统。这些变量因素和参数之间的关系用十二个等式来表达。这些等式产生于一般现代化理论以及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土耳其和菲律宾的演变所作的分析。这个模式包括一些可以直接受到政府行动的影响的变量因素，也包括其他一些不受这种影响的变量因素。使用了这个模式，就有可能说明政府政策的变化——例如控制生育的计划使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百分之五，城市税收增长或下降百分之五，以及农村和城市占政府支出相对比例的变化——对政府所得到的支持可能产生的影响（按投票支持执政党的人口比例来衡量），对生活水平可能产生的影响（按人均消费量计算）。此外，对某个政策参数——例如政府偏重于农村还是偏重于城市——可以进行细致的分析，以说明这个参数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对于政府得到的支持或生活水平等变量因素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布伦纳—布鲁尔的方法为政治分析开辟了新领域。它在理论上提供了一种十分简单但又十分精确的政治体制模式，其中包括人口、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许多变量因素，这些变量因素之间的关系还可以用等式来表达。在实践上，它为科学探索指出了方向，使这种研究最终可以为决策者提供一种方法，用以分析政策选择可能产生的结果与他们的目的是否有直接关系。这种模式的建立实际上是把经济学中长期以来普遍用以对变量因素之间关系所作的复杂分析引入政治

在我们的政治概念中引进某种变化的观念是否为时太早？”①

① 拉斯托："现代化和比较政治学研究和理论的前景"，载《比较政治学》，第1卷（1968年10月），第51页。

3. 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的批判

迪恩·C·蒂普斯

〔编者按〕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社会学系工作的迪恩·C·蒂普斯承认,使用现代化概念的作者们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人们注意形成社会转变的各种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他对现代化概念是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提出疑问,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为理解现代化的变化提供一系列最充分的类型。

对于蒂普斯教授在本文中提出的若干观点,那些主张使用现代化概念的学者们很可能要提出异议,但本文仍提供了一种很有价值的批判,既探讨了有关撰写这个专题的文章中存在的弱点,又合情合理地分析了对现代化概念的各种各样的批判。

具有当前这种含义的"现代化"概念起源不久,但到了六十年代,它已经是一个在美国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际社会科学——的语汇中得到确认的词语。尽管它相当迅速地

传播开来，但是对它的正确含义还远远没有相应地达成普遍一致的意见。关于现代化的各种不同定义的大批出现，实际上已经表明使用这个术语的那些人与使用另外各种定义的人相比，似乎更接近统一。现代化概念的普及决不是因为它作为学术交流的工具而具有的清晰性和准确性，而是因为它有能力揭示那些用来概括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随着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社会生活各种转变的含糊和笼统的想象。诚然，这些想象已被证明有充分的说服力，以致无人否认“现代化”这个概念所表达的现象确实存在。至于应当如何准确地使这些现象概念化，人们见仁见智。有些批评者自己已经提到各种各样概念化的相对优点，但是无论是支持者还是批评者，实际上都往往认为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是有用的，只不过在概念化的方式上存在着问题。

下文试图对此作一番批判性的考察。卡普兰曾经说过："科学概念的功能是指明一些范畴，这些范畴比其他范畴体系更能说明我们的研究对象。"① 于是，这里要提出一个问题：现代化概念是否能够发挥这一功能？当前对这个概念的各种说法存在哪种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可能在这个概念的另一种理论体系中得到最好的解决？或者说，是否应当将现代化整个模糊的想法抛弃掉而用另一种研究方法来取代它？如果后一种可能性值得认真的考虑，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是否存在着确实可以“告诉我们更多东西”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概念来取代现代化概念呢？

我的目的是想论述前两个问题。以下的讨论将分成两个

① 卡普兰：《探索行为》，旧金山，1964年，第52页。

部分，第一部分是作为第二部分分析的前言，概括地叙述现代化理论的来源和特征。[1]核心论点将在第二部分中提出。为了全面地了解当前由于使用这个概念而产生的问题，在此对过去的各种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作出回顾，并在必要时予以补充和修正，而将修正后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来评价现代化观点的科学功用。

初步思考

现代化理论的由来

现代化理论的起源大致可以追溯到美国政治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环境的反应，特别是冷战的影响，以及在欧洲殖民帝国解体下第三世界社会的同时出现，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成为杰出的角色，所有这些现象在同一个时期聚合在一起——而且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知识界的兴趣和精力越过了美国甚至欧洲的界限，转向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社会进行大量的研究。战后的二十年间，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及其研究生在美国政府和私人团体的慷慨资助下，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向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文化变革等问题。

绝大部分注意力致力于详细阐述各种概念系统，并且在许多方面用这些概念系统取代传统的方法来探索这些社会中

---

① 本文通篇使用的“现代化理论”一词仅指以现代化概念为主要特征的主要文献。

发生的问题，这种探索在过去几乎是未曾有过的。[①] 由于社会科学家在研究中的设计、实施和解释不能再依靠过去积累的文献作为指导，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当转而求助于西方思想界中他们所熟悉的那些知识传统，即对社会变化的性质所作思考，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公认的传统所产生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现代化理论中。虽然现代化理论家使用的术语有些新奇，但他们对非西方社会中社会变化进行研究的方法却深深植根于早在十九世纪末以前就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牢固确立的进步论。确实，罗伯特·尼斯贝特近来(1969 年)论证说，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一种观念，即社会变化可以类比于有机体的生物性成长。这种传统产生于苏格拉底以前的学派，经过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进步论和当代社会科学的社会进化论，从而在西方有关社会变化的思考中占有优势。[②]

在这种思想传统中，进化论和二十世纪的功能主义在形成现代化理论过程中特别有影响。它们产生的影响可以现代化理论的许多特征为证，例如：经常使用两极对立类型的结构和概念，诸如"社会差异"和"社会体制"等；强调对渐变和连续变化的适应能力，作为稳定的正常状态；把因果关系作为变化的内在根源；以及把社会变化当作一个有方向的过程来分析。应当指出，现代化理论的这些特性与较早各种理论并非简单地呈明显的平行状态，许多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贡献出于勒纳、

---

① 西尔斯："论新兴国家的比较研究"，见吉尔兹的文章，载《旧社会和新兴国家》，纽约，1963 年，第 11—12 页；施沃茨："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看'传统性—现代性'解释范畴的局限性"，载《戴达罗斯》，第 102 卷(1972 年)，第 74 页起；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西方的发展理论》，纽约，1969 年，第 240 页起。

② 参见波克："进步论和进化论"，载卡恩曼和波斯科夫编：《社会学和历史学》，纽约，1964 年。

列维和埃森斯塔特等属于功能主义学派的人，他们学会了功能主义理论而且是在产生这种理论的知识环境中培养出来的。[1]

现代化理论的特征

要从上面罗列的非常一般特性之外去鉴别现代化理论的"特征"，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现代化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包括广泛的兴趣、不同程度的抽象以及对定义问题的不同程度的注意。由于本文的目的不在于一个个地批判这种或那种现代化理论的说法，而是把现代化理论本身当作一种理论的发展方向或"思想体系"来评价，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必须是建立某种使批判得以进行的共同基础。

也许人们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方法论上的两个相似之处。第一个是现代化理论家对定义内涵的探索。用某一作者的话来说，现代化一般是被看作"一个多方面的过程，包括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中的变化"。[2] 因此，这个概念是个"概括"的而不是"差别"的概念，也就是使用足够全面的方法去明确说明它的意义，不致使这个"多方面的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可能的部分被遗漏。对现代化下定义的尝试旨在告诉我们现代化是（或者可能是）什么，而不是告诉我们现代化不是什

① 马兹鲁伊在"从社会进化论到当前的现代化理论"，载《世界政治》，第21卷（1968年），第69—83页。他讨论了现代化理论和进化论的平行发展。他往往强调达尔文主义对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见波克："进步论和进化论"，第35—37页；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161—164页）。关于功能主义理论对当前比较研究的影响，强调现代化的政治方面，见柯林斯："政治社会学的比较方法"，载本迪克斯等编：《国家与社会》，波士顿，1968年，第42—67页。

② 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52页。

根到底是某种类型的社会变化，这种社会变化在影响上是改革性的，但在效果上则是进步的。还有一个普遍承认的观点认为，就现代化范围之大而论，它是个"多方面的过程"，不仅涉及到社会在某个时间的每一个制度的变化，而且从方式上来看，每个制度内部的转变往往导致另一些制度内部与它有一定关系的转变。①

除此之外，要将各种研究方法的异同分门别类，恐怕更加困难。例如，这个术语的多种用法就很难归纳在同一个单一的分类框架中。在某种情况下，这个概念原本就是一种分类方法，例如列维按照使用的工具和非生命能源的程度区分"相对现代的社会"和"相对非现代的社会"。② 对其他学者来说，这个概念乃是鉴别一种特殊的和无止境的社会变化，例如历史学家本杰明·施沃茨应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按照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合理控制能力的增强来解释现代化。③ 还有一种对现代化定义的倾向不是把现代化看作变化的一种类型，而是对变化的一种反应，例如阿尔朋所下的定义强调制度对迅速和连续变化的适应或控制能力。④ 然而以上这些用法的不同往往是很微妙的，尤其是因为各种不同的倾向往往可以结合在同一个定义之中。例如，埃森斯塔特主张现代化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个是变化的类型（结构的分化），

---

① 见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他对现代化的特征作了系统的论述。

② 列维：《现代化和社会结构》。

③ 施沃茨："'传统性—现代性'解释范畴的局限性"，第76页；又见霍尔："日本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第21页；拉斯托：《世界大同：政治现代化问题》，华盛顿，1967年。

④ 阿尔朋："民族和国际社会中的现代化革命"，载弗里德里希编：《革命》，纽约，1966年。

另一个是对变化反应的类型(即制度吸收"不断变化的问题和要求"的能力)。[①] 定义方面的这种多样性在人们经常探索更准确的概念时大都可以找到。因此,有些人把现代化同工业化或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而另一些人对它下的定义更广,强调人类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增长的控制能力,还有一些人后来居上,提到了人类存在的一切方面所发生的整个转变,从个人的性格到国际关系。

然而,"现代化"一词的各种用法之间可以找到一个区别,这个区别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为下文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奠定了基础。现代化的大多数概念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关键因素"论,意思是把现代化等同于社会变化的一种类型;另一类是"两极对立"理论,这种理论把现代化解释成为这样一种方式,它概括一个过程,"传统"社会由此获得了"现代性"的属性。前面引用的施沃茨和列维的研究方法代表了"关键因素"论的两个实例。对施沃茨来说"现代化"可以视为合理化的过程,而列维则用衡量工业化的两个技术指标来解释现代化。事实上,在他那部论述现代化的新著问世十年以前,列维已经在一篇文章中使用过同样的定义去解释"工业化"一词,而不是为现代化下定义。另一个用"关键因素"方法来为现代化作出概念的例子是威尔伯特·穆尔的著作。[②] 他比列维先生更加坦率一些,认为现代化在绝大多数方面可以等同于工业化,然后以后者的前提、伴随状态、组成部分和后果来讨论前者。这些例子说明,"关键因素"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可以任

---

① 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第43页。

② 穆尔:《社会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3年,第89—112页。

意地用其他术语来替代“现代化”。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用“关键因素”来解释现代化的方法没有被现代化理论家广泛采纳。

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宁可将自己的定义纳入“两极对立”所提供的比较广泛的概念框架中。在这方面，十九世纪进化论的影响最为明显。现代化理论家把传统性和现代性属性之间的理想类型加以对照，这种方法只不过是人类学的翻版并借助帕森斯的模式来作概括。梅因、特尼斯、涂尔干等在进化论传统方面曾经作出过努力，用地位—契约、共同体—社会等对立类型之间的转变来概括社会的转变。[①] 现代化于是成为一种转变或一系列的转变，从初级的自然经济向技术密集的工业化经济转变，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从封闭的亲选体制向开放的选贤体制转变，从扩展型的亲缘单位向核心型的亲缘单位转变，从宗教的意识形态向世俗的意识形态转变。[②] 按照这种观念，现代化决不仅仅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应当用它所趋向的目标来下定义的过程。

现代化理论之批判

正如本文导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研究的每一种方法都难免受到人们的批判。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批

① 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190—192页。

② 参阅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第43—75页；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9—26页；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第1—19页；斯梅尔塞：《社会变化过程》，第718页；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32—35页。

判不仅不多，而且范围非常狭窄，异常分散，其至往往被置之不理。不过，若是把这些批判集中起来便可以构成一个有益的起点。只要把这些批判加以概括，并且在必要时予以补充，便可以为更全面和更彻底的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提供基本的方向。

本节的任务有两个方面：第一，系统整理现代化理论容易受到的各种各样的批判；第二，评价这些批判对现代化理论的前景有什么关系。按照现代化理论批判的正确程度，在两个可供选择的做法之间必须选择其中一个做法。一方面，现代化理论可以进行修正。这就需要形成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种说法，虽然这种说法有希望更能够应付由较早一些说法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反驳。另一方面，现代化观念可以完全抛弃。第二种主张是"激进"的，意味着需要形成另一种研究方法，更适合于分析现代化理论所要注意的那类问题。过去的各种批判在方向上完全是"持修正论的"，而这里的批判，目的在于从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观点出发对现代化理论的前景加以考虑。

关键因素法

将概括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法和"两极对立"法进行对照的方法招致一些不同的批判。这里之所以首先研究"关键因素"法，不仅是因为这种方法不大被采用，而且还因为可以用比较简单和直接的方法对它进行批判。相反，"两极对立"法则需要作比较详细的涉及面更广的讨论，不仅因为它提出的问题更加复杂，同时也因为它代表了现代化理论思想中的"主流"。

"关键因素"法虽然不常使用，但并非没有优点。它把现代

化概念化作为无止境的过程而不是作为达到目标的过程，并且用比较仔细和具体的方法解释现代化，使这个概念在运用时有较高的明确性，因而避免了“两极对立”法所遇到的许多困难。然而，遗憾的是，“关键因素”法有自己的缺陷。在对一个已经用其自己的独特词语识别的因素下定义时，“现代化”一词的功能不是用作一种理论的词语，而只是用作一个同义词。例如，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等同于与工业化有关的指标，而对工业化这个概念的用处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反而使“现代化”这个概念成为多余。这种玩弄术语的做法产生的唯一后果是在一个本来比较明确的概念上加上了一个常用语（“现代化”），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精确性。当然，一旦解释清楚，研究工作可以在这样设想的“现代化”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好处。但是，这种规定必须说清现代化一词的全部含义，否则便是多余的了，而且只会失去优点。总之，把“现代化”当作已经有明确定义的某种变量因素的同义语来使用，不可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最后当然应被抛弃。因此，相对于“关键因素”理论而言，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前景的研究，必须采取第二种“激进”的方法。

两　分　法

现代化的概念化，加上传统性和现代性对比的一些说法，是不能不予考虑的。为了充分说明针对这类理论所作的批判中的含义，最好是将这类批判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第二个层次是从经验主义出发的，第三个层次是方法论或“纯理论”方面的。

迪克斯所说的"欧洲经历的普罗克卢斯特床"。[①]

现代化理论家试图把历史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念和制度普遍化。这种做法至少可以理解为一种方法。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刚刚从大学毕业的"不发达地区"的学者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理解一些社会发生大事的过程，而对他们来说，那些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组织显然是陌生和不熟悉的。这时，他们可以依靠这种方法去解决认识过程中的危机。两极对立法逐渐演变成传统性—现代性对比的形式后，完全可以令人羡慕地适用于填补这种知识上的空白。[②] 它为现代化理论家提供了一种认识图式。其中包括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公民直接从经验中获得的熟悉而稳定的一些范畴。按照这个图式，取自"相对非现代化"社会的资料可以汇集起来进行分类，并作出解释。此外，这个图式不仅为排列这些社会现状的次序提供了一系列范畴，而且把现代化描述为朝着"现代"方向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过程，从而也可以窥见自己的未来。这样的观点由于确认这些社会将沿着西方自己熟悉的道路走向现代性，因而使它得到更大的安慰。

不过，这种观点不仅是由于现代化理论家在探索新的研究对象时认识方向不明确所致，也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旨和臆想所致。两分法的传统在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

---

①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9卷（1967年），第323、309—312、316页；鲁道夫夫妇：《传统性中的现代性：印度的政治发展》，芝加哥，1967年，第6—8页。

② 两极对立传统的早期理论也有同样的功能。见波克："进步论和进化论"，第28—29页。在这一点上，有趣的是要指出，现代化理论在人类学家当中似乎最不受欢迎。人类学对非西方社会进行大量研究的时间较任何社会科学更久。现代化理论家将他们的观点应用于研究自己的社会时广泛地遭到失败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初期形成的时候，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对工业主义的矛盾心理在充满传统色彩的“失乐园”的怀旧中反映出来，导致对社会的浪漫主义幻想。也就是说，人们在这个社会中虽然在物质上是贫穷的而且缺乏教育，却过着与自然和谐的朴素而满足的生活。他们被强烈的感情纽带与一个集中和凝聚的共同存在联系在一起。[①]

这种传统观点一直有影响，这可从它长期持续的倾向来说明，这种倾向是把现代化对个人造成的所谓伤害性影响——即将个人从田园式的传统环境下驱赶出去——加以形象化。[②]但是总的说来，现代化理论家一直受到其他一些原因的激励。到十九世纪中叶，那种在许多方面习惯于早期的“传统性—现代性对比”形式而对工业主义产生的矛盾心理已经消失。因此，当代的对比形式所受到的传统怀旧观念的影响比较少。影响较大的倒是现代化理论家自信的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是善与进步的结合，“传统性”则是实现“现代性”的障碍。用这样的倾向来描述现代性的特征，与过去描述传统性特征的方式相比，其选择性和浪漫主义色彩相差无几。[③]试看下述一段雄辩的叙述：

> “现代性”意为：地方纽带和地区性的观点让位于全球观念和普世态度；功利、计算和科学的真理

①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9卷，第294页。

② 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证明，见因克勒斯：“现代人的形成”，第223—224页；劳埃：“谬误的科学化和合理化：社会变化理论的中立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6卷(1971年)，第882—885页。

③ 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第884—886页。

压倒了感情、神圣和非理性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单位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互联系不是依据出身而是靠选择；他们以主宰者的态度而不是用听天由命的态度去对待物质环境和人类环境；认同是被选择和被获得的不是被硬性确定和被认定的；工作在行政组织中进行，而不在家庭、住所或社区中进行；成年期被推迟，年轻人准备承担他们的任务和责任；人类的寿命延长，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将把很多权力交给年轻人，男人把他们的权力交一些给妇人；人类不再作为种族分开而在社会和政治中认识到共同的人性；政府再也不是超人的权力象征，不让普通人进入，而是以参与、允诺和对公众负责作为它的基础。①

这一段叙述把理性主义、进步论和自由主义的倾向结合起来了，看上去更像是自由的空想而不是分析的构思。再也看不到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等人的著作中所描述的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那种矛盾心理。②

现代化理论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和认识充分反映了产生这种理论的社会和历史条件。现代化的观念主要是美国的观念，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内提出并在六十年代中期进入鼎盛时期的。这个时期有两个明显的特

① 鲁道夫夫妇：《现代性中的传统性》，第3—4页。

② 尼斯贝特：《社会学中的传统》，纽约，1966年，第264—312页；休斯：《意识和社会：欧洲社会思想的转变》，纽约，1958年；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载《比较政治学》，第290—293页；参见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202页起。

征：第一是广泛地对美国社会抱着自满的态度，第二是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在全世界扩张。人们对美国社会往往抱有基本一致的看法，把它与民主主义框架中无可比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结合起来。此外，那些可能存在的社会问题不是被看作流行的弊病，而是当作脱离常轨的暂时现象，可以在现有的制度下用正常的政治手段来解决。在二十年混乱后，战后繁荣和稳定的宁静状态看来并未告终。现代社会的前景现在看来已经获得了保证，似乎只有“发展中地区”的未来才存在着问题。这种自满自得的气氛只可能促使社会科学家想当然地认为“现代性”纯粹是好事，至少在他们的理想中认为美国社会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应当成为另外一些比较不幸的社会模仿的榜样。

不过，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态度本身只是在对美国在国际领域中发挥作用给予了新的关注时才产生出来。当西欧帝国的各个社会面临着国内的重建任务而在国外面临着非殖民地化时，美国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工业和军事力量的高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而这次战争在世界政治中有一种特殊的观念，认为它是善与恶的斗争。如果希特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恶的化身，那么，斯大林就是战后恶的化身。美国在这种信念的刺激下，在欧洲盟国的鼓励下，在国外经济利益的扩张中，僭取了“自由势力”中的领导地位，不仅卷入了国际事务，而且卷入了许多国家的内政，力图从共产主义阴谋的威胁下拯救世界，保证世界稳定，而有利于它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事业。①

面临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崛起，非殖民地化开始向前迈进。第三世界的社会如何默许这些利益集团，越来

越成为问题。结果，在美国政府内外的上层政治人物考虑冷战冲突时，这些社会开始占有重要地位。社会科学家对第三世界社会研究的迅速发展在许多方面就是这种新的关注的副产品，因为政府机构和私人基金会鼓励和资助这类研究，以便在美国，特别是在政界扩大有关这些社会的情报交流。

在这样的背景下，带有种族中心论的现代化理论大量出现毫不奇怪，特别是只要回想一下，在美国和英国社会史上的早期扩张时期，类似的发展理论也十分普遍，就不足为奇了。[②] 总之，这种理论由于隐藏着种族中心论，所以能够偷偷地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不相称的力量提供含糊的辩护。这些理论尽管还有其他各种作用，但首先是它们可以指出"现代化"的目标。[③] 实际上，这种理论也可用来为欧洲殖民主义作辩护。许多现代化理论家适应时势并用这种理论来进行自由政治的宣传，尽管没有这样公开地使用现代化这个概

---

① 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一种富有趣味的讨论，见译文："对美帝国主义的解释"，载《经济史杂志》，第 32 卷第 1 期(1972 年)，第 316—360 页。他确定，美国的扩张一干涉主义政策有三个来源：相对狭隘的但地理位置优越的私人经济利益集团，军事官僚制以及"国内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成功做法的延伸"(第 358 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国际上的扩张反映在军事开支在这个时期占有很高的比重。美国内战后的三十年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内，联邦政府的军事开支在国家预算中降到百分之三十以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二十年内，它的军事开支平均占国家预算的一半以上，尽管用于福利事业的支出比早些时期也有上升。见利伯森："对军事一工业联系的资料研究"，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76 卷，第 4 期(1971 年)，第 574 页。

②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进化论最为盛行。而在十九世纪末，美国政治界和学术界普遍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与美国的帝国主义情绪相吻合的。见伯罗：《进化与社会：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理论之研究》，伦敦，1966 年；霍夫斯塔特：《美国思想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波士顿，1955 年。

③ 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 201—212 页；鲁道夫夫妇：《现代性中的传统性》，第 9—12 页。

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过去往往只是简单地提到，甚至完全被忽视。现代化理论以及它所发挥的功能与产生这种理论的特殊背景之间的关系一旦被认识，就有可能把这个理论置于正确的观点和立场上。由于现代化理论目前还远远没有被普遍应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因此，现代化理论的实际情况只反映了某一社会（也就是说美国）在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确实，随着产生现代化理论的条件发生变化——例如，政治暗杀，种族冲突和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冲突以及对外战争和国内暴力行为等的步伐加速，和谐一致已经让位于冲突和自我安慰，对于美国的未来表示关注——许多与"现代性"有关的基本准则，例如理性的准则和进步的准则等，都受到了攻击，而令人感兴趣的是，现代化"理论"的新潮流似乎也已减退。

从意识形态方面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对于理解现代化理论的性质很有必要，但是，这仅仅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功用进行批判性评价的开端。这种仅局限于对现代化理论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成份所作的批判，本身还不能提供充分根据来决定现代化概念应该进一步考虑呢，还是应该完全抛弃。在原则上，没有理由认为现代化概念本身与各种形式的种族中心论天生是对立的，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革命的现代化理论或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不可能产生。当代的现代化理论大多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但不能说没有产生其他形式的可能。即使有人认为现代化理论应当完全抛弃，因为不能完成它所提出的任务，但是无论用什么研究方法来取代它，也都不会不受制于这样或那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对现代化理论作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只就它诞生的动机、认识和目的而言，没有直接讨论这个理论的实际内容。从考察的

绝大多数论述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由于政治偏见而选择出来并加以歪曲的认识是错误的，但是，只能具体地依靠可以利用的证据来证明其虚伪性、不完整性或把人们导入歧途。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解释和指出它在实证方面的缺陷，但不能证明这些缺陷。因此，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必须以其他方面的批判来予以补充。这就是我们要开始讨论的第二个层次上的批判，即经验主义的批判。

从经验主义出发进行的批判

虽然这个范畴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无所不包，但是归纳在这种范围内的各种批判有某些共同之处。每种批判都注意到现代化理论中资料的不足，它在形式上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引人误入歧途的经验主义陈述，这种陈述已纳入现代化理论的体系中，而有的则批判它忽视了一系列重要现象。由于针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主要是在这个层次上进行，从经验主义来进行批判的主要论点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这里有可能作比较扼要的概括。

同某些传统理论在发展中遇到的情况一样，现代化理论所受到的批判是因为这些理论将社会变化基本上看作是各种内在变化过程的结果。[①] 从前面对现代化理论的起源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分析来看，这种批判并不使人完全感到意外。现代化理论家基本上都集中于讨论有关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内在因素，所以低估或忽视了对社会变化来说十分重要的许多

①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324—327页；科林斯：《政治社会学比较方法》，第57—61页；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170—174、275—282页。

上,"传统社会"好像没有变化,仅仅是因为把它们限定在一种方式中。这种方式认为传统性之间没有区别,除了朝西方经历的方向变化外,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由于传统性一现代性的对比只集中注意所谓传统社会之间的相似性,因而拒绝承认传统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多样性。于是,类型最不相同的社会结构也被统统纳入了同一个范畴,它们所共有的不过是"传统"的标签和一个事实,即它们不是现代的工业社会。由于这种两分法忽视了传统社会的多样性,也恰恰忽视了那些社会之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却有助于决定它们发展的特殊性质。列维对中国和日本经济变化的不同道路的对比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①] 此外,从传统社会内部和传统社会之间也可以找到这种多样性。克利福德·吉尔兹在一篇关于"整合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一个简单的、凝聚的、广义的种族结构,例如在大多数工业社会中发现的那种结构,并不是传统性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标志。"[②] 克利福德·吉尔兹也许夸大了工业社会之间的同质性,但他的基本论点仍是对的:许多传统社会并不是高度浑然一体的,也不是在社会和文化上性质相同的共同体,而是包含着多种"传统"。[③] 把

---

① 列维:"中国和日本现代化因素比较";又见罗思曼:"英国的现代性和传统性",载《社会研究》,第28卷,第3期(1961年),第297—320页。

② 吉尔兹的文章,载《旧社会和新兴国家》,纽约,第155页。

③ 本杰明·施沃茨最近主张,在现代性和传统性的两分法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况,见施沃茨:"传统性对现代性作为解释范畴的局限性"。又见劳尔:"谬误的科学正统性",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36卷,第5期,第884—886页。关于传统社会的补充叙述见古斯菲尔德,"传统性和现代性:社会变化研究中的错位",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72卷,第4期(1967年),第351—362页;莱文:"传统文化的灵活性",载《社会问题研究》,第24卷,第4期(1968年),第129—141页;希斯特曼:"现代印度的传统性"。

“传统的”和“现代的”这两个形容词加在同一个名词——“社会”——前面，同样会使人误解，因为它使“传统的”社会和政治单位向一个拥有领土的国家所保持的民族社会转变含糊不清。确实，传统内部的多样性往往与这一转变过程混在一起，因为有许多这样的“传统”单位融合成了一个单一的民族社会。①

新兴国家的殖民地经历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由于通过征服某个“传统”，把尽管是属于“现代”的东西添加在一个或其他好几个“传统”之上，从而产生了一个混合的社会，用现代化理论家惯用的术语来说，它既不是“传统的”，又不是“现代的”社会。把这些经历聚合成为对立的传统性—现代性，只会产生更大的困难。要么，把殖民主义看作现代化的工具——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论点往往为殖民统治的合法化辩护——要么，把它当作“传统性”向“现代性”过渡的阶段。这两种解决办法都不恰当。殖民主义像“传统性”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推动“现代化”，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构成现代化的障碍。殖民统治的影响决不能像“传统性”那样可以不予考虑，因为殖民统治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往往同殖民化以前的范围和时间同样重要，尤其是殖民统治经历了许多世代的地方，更是这样。②

还有一系列批判针对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传统性和现代性体现两个相互排斥而在功能上又相互依存的属性。这个观点可以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第一，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属性是

---

① 参见吉尔兹的文章，载《旧社会和新兴国家》；库帕和史密斯编：《非洲的多元性》，伯克利，1969年。

②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323页；吉尔兹：《旧社会和新兴国家》。

相互排斥的；第二，它们各自的属性在功能上是相互依存的。有几种针对第一种说法的批判认为"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在所谓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会长期存在，并在形成这些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性。而其他一些批判则主张，在"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中，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用一套属性取代另一套属性，即不是以"现代性"取代"传统性"，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①] 主张现代性和传统性是相互排斥的观点，用鲁道夫夫妇这两位批判者的话来说，是强加一种"人为地构筑起来的'分析差距'，用以否认创新、相互适应和综合的可能性，从而可以硬说有一种在范畴上和历史上可能存在的帝国主义"。[②] 一旦这些可能性得到承认，现代化就不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传统的毁灭，因为后者并不是现代化的前提——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不是阻碍而是促进与现代化有关的社会变化——它本身也不是现代化的充分条件——因为"传统"的毁灭，例如被殖民主义统治所毁灭，可能导向"现代性"以外的方向。

这就使我们要谈到第二种说法，它涉及传统和现代性的"系统"特征。一般地说，对第一种说法的批判往往也是对第二种说法的批判，因为一旦承认现代性和传统不是相互排斥的，那么，认为它们各自构成一种封闭的、在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属

---

① 关于这些观点的论据，见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316、324、326页；埃森斯塔特："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思考"，第40—52页；古斯菲尔德："传统性和现代性"；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第295—296页；劳埃："谬误的科学化"，第885—886页；惠特克："政治变化的紊乱过程"，载《世界政治》，第19卷(1967年)；罗思曼："英国的现代性和传统性"，载第28卷，第3期，1961年。

② 鲁道夫夫妇，《现代性中的传统性》，第6—7页。

克斯曾经说过，这种分散的“现代化”未必导致“现代性”。现代的医疗、晶体管收音机和现代军事设施都是在这种意义上“现代化”的事例，它们每一种都表示获得现代性的某个迹象或一系列迹象。然而，这样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最终获得“整体”的现代性，仍是个问题。确实，现代医疗由于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可能只会增加贫困，晶体管收音机也可以被利用来加强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拥有尖端技术的军队可以为最反动的政权服务。因此，这种有选择的现代化可能会强化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一个领域中迅速的社会变化可能只会用来阻碍其他领域中的变化。①

现代化理论的各种批判聚集起来，列举出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的论点和论据，揭示出现代化理论对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性质、动力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观点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此外，这些局限性基本上用经验主义的依据来论证，证实了从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的批判所作结论的预言，意即现代化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歪曲反映出它在经验研究的局限性上。因此，对现代化理论的经验主义批判提出的每一点在其历史概念方面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同现代化理论中最基本的种族中心论的某种表现相联系，它把历史视为向“西方”社会那种乌托邦式的现代性发展的、直线的、进步的变化过程。诚然，经验主义的批判强烈地提出，现代化理论用这种态度对待“传统”和“传统的”社会，不仅是种族中心论的，而且也是折

① 前一个注释中提到的那些作者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政治学家也越来越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即“现代化”与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是相背的，其中，亨廷顿“政治发展和政治衰落”，载《世界政治学》，第17卷(1965年)，及其《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对这种观点作出了影响最大的辩护。

衷主义的。

从这些大量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哪些问题将决定现代化理论的未来命运。应当以某种"修正"的形式在新的背景下和资料更加充分的体系中保留现代化的观念呢，还是应当采取一种"激进"的解决办法，将现代化理论全盘推翻？站在经验主义立场上向现代化理论提出异议的批判者在这些问题上莫衷一是，各有各的辩护者。不过，事实证明，第一种观点，即"修正"现代化理论的观点至今仍深得人心。本迪克斯、埃森斯塔特、亨廷顿以及其他一些批判者仍然认为——虽然有时是含蓄地认为——现代化理论以及它的传统性—现代性的对比方法中还是有许多可取之处，因而经过适当修正以后，还可以使用。比较起来，在这些批判者中，只有惠特克明确地主张应当将现代化理论全部抛弃掉。

对于选择修正现代化理论的人们来说，问题仅在于消除现在一些理论中比较明显的错误。于是，他们主张对现代化研究采用一些方法来回避有关传统制度的性质及其对现代化过程的作用这样一些含糊不清的设想，这些设想把"外部刺激"当作重要的因素，把现代化主要看作是多线的发展，既强调现代化过程中的功能联系，又强调它的非连续性。[①] 然而，惠特克对现代化理论的前景，却远远不抱乐观态度。在他看来，如果现代化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它不取代传统性便会失败，那么整个理论应被抛弃。他还主张，假若传统和现代性不属于相互排斥的范畴，那就是"取消这两个词的

①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埃森斯塔特："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思考"。

含义，也就是把类型截然不同的社会混为一谈”。[①] 惠特克指出，由于“现在仍然缺乏一些比较成熟的模式”，目前看来在比较有限范围内的，以经验主义为根据的概括比试图构成另一些与现代化理论同样抽象的模式，更实用些。[②]

只要认真思考一下，无论是修正派的观点还是惠特克的观点都是不能接受的。修正派观点的主要困难在于它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它对现代化理论的用处没有认真地提出问题。在这方面，惠特克的观点比修正派的观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他的观点是否基本合理，也令人怀疑。本迪克斯、埃森斯塔特和其他一些修正派已经阐明，仅仅证明被纳入现代化理论的某些具体设想或假定是不正确的或令人误解的，还不能否定现代化的概念。意识形态的和经验主义的批判所积累起来的力量，显然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惠特克的结论是正确的，至少不能证明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方法的用途是有疑问的。然而，这些批判没有说明它的无用究竟是现代化理论本身固有的呢，还是因为它不能为它的分析找到适当的准则——这个结论会支持修正派的观点。只要对后一种可能性加以认真的考虑，那么现代化的定义、类型结构和“理论”便会像神话中的希德拉一样无限地增加，每一种现代化“理论”受到攻击并被摧毁以后都会增加出两种理论来取代它。

---

① 惠特克：“政治变化的紊乱过程”，载《世界政治》，第190—192页。

② 然而应当指出，虽然有人认为应当将研究工作集中在确立一定范围内的经验主义普遍原理，但这种建议很难构成另一种前途颇有希望的理论来取代现代化理论。仅仅靠概括或积累微观研究的结果，还不能完成解释宏观社会结构的转变。此外，如果没有某种较大的比较准则，也无法“确立”有关各种社会之间转变的普遍原理。

纯理论的批判

最后一种批判是方法论的，或者因为它集中批判包含在现代化理论及其功用的概念中的基本策略，所以是“超理论”的。因此，它把重点放在修正派和其他基本观点之间进行选择而提出的中心问题上。这个层次的批判尽管很重要，但不如前两个层次上的批判所作的探讨彻底。

在任何概念或任何一系列概念的定义中，一直存在着比较性的逻辑要求和诠释性的逻辑要求之间的矛盾。前者力图引向越来越多的普遍性，以便将概念的应用性范围扩大到尽可能多的情况下，后者的方向则相反，力图越来越增加定义的独特性，以加强其辨别力量。前面已经提到，现代化理论家选择了前一种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然而他们竭力想在描述中达到包罗一切时，却依赖两种极为含糊的现代化概念。现代化理论家不是去说明这个词在适当应用时必须具备的最低条件，而是试图把它包含在实际上从十七世纪以来的每一个“进步的”社会变化的概念中。此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对现代化所下定义是那么无边无际，以致这个定义几乎不可能准确地鉴定这个概念所要表达的一系列现象。

当人们考虑某种接近于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情况有无可能时，这些困难便非常明显。当现代化的概念被解释为制度要适应“伴随着科学革命而产生的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的空前增长”时，① 或者将它解释为“遍布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技术、经济及生态变化这一事实”时，②便很难说明它的应用范围，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7页。

因而也无法认定现代化的解释究竟要阐明什么。此外，当现代化被看作是“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中的一种多方面进程”时，[③]这个定义的真正内容所能起的作用只不过使理论陈述变为毫无意义的赘述而已。[④]

此外，不无讽刺意义的是，现代化理论家不厌其烦地想描述得更加全面，但是这个理论提出的所有要求正好相反。这对真正的社会比较研究起不到一点推动和促进作用。其原因不难找到，而且本文的前一节已经提到了。也就是说，现代化理论家着重考虑“传统的”和“现代的”属性区别时，却没有考虑这两个形容词所形容的名词，即“社会”。结果，这个名词所指的实际事物往往按照两极对立法出现了两个极端的变化。前已述及，在“现代的”一端，典型的情况是，民族社会是指拥有领土的国家边界内的社会。在“传统的”的一端，这个范畴的残余性质反映在包括文明、文化地区、帝国、王国和部落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有关事物。由于比较分析首先要求将整体放在同一领域中或同一论域中进行比较，[⑤] 那么，如果不说明确定“社会”一词的共同标准而把“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当作可比较的概念来使用，必将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这两个概念都在当前一些论著中使用，不仅这两种类型之间的比较实际上

---

② 斯梅尔塞：《社会变化》，第717—718页。

③ 亨廷顿：《导致变化的变化》，第32页。

④ 列维在《现代化和社会结构》(第10－11页)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这里还应当提出，修正派观点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使现代化理论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是概念的而不是理论的，因为用更有“争议的”、不确定的论点和假设去取代较早的那些更确定的但在实证方面更含糊的论点和假设。

⑤ 卡勒贝格：“比较的逻辑：政治体制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载《世界政治》，第19卷(1966年)，第69—82页；亨佩尔：《科学解释的若干方面》，纽约，1965年，第137页。

已经被取消，而且在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概念所使用的“社会”一词的范围本身就缺少一系列共同的实证事物。于是，每个类型内部的比较也被取消了。

然而，现代化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根本缺点并不是定义问题，也不是比较问题，而是把概念误以为事实的倾向；事实上前两个缺点在许多方面不过是后一个缺点的表现而已。这种倾向并非现代化理论所独有。尼斯贝特论证说，这是讨论变化的一切发展理论所共有的特征。[①] 这个缺点也不能说是最近才被认识。早在七八十年以前，埃米尔·涂尔干就谴责过这种倾向。他指出，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沉湎于研究自己提出的观念和想象而无视它们与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之间的关系，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中以特有的笔调讨论了用概念研究代替社会现象研究的倾向：

> 人们生活在某个环境里不可能不形成对于这种环境的观念，并根据这种观念来规定自己的行为。但是，由于这些观念对我们比较接近，较多存在于我们的精神范围内，而离它所对应的现实却比较远，因此，我们往往自然而然地用它们来代替后者，并且把它们当作我们思考的真正对象。我们不去对事物进行观察、描述和比较，而是满足于集中精力去感知、分析和综合我们的观念。我们产生的不是有关现实的科学，只是一种对意识的分析。
>
> ……这些观念或概念，无论我们把它们称作什

① 尼斯贝特：《社会变化和历史》，第240页。

有依赖已经完善的科学才可能确信这个假设的过程的存在，因此，它不能构成探索的直接对象，而只是思想中的一个概念，却不是事物。”①

人们并不需要完全赞同涂尔干的认识论观点，以便评价他在这里所说的话及其对现代化理论所作的批判。毕竟，他的论点是相当基本的。社会科学家研究工作的要素是提出和探索有关具体社会现象中某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无视产生他的概念和观念的实际经验的有关事物，如果不再关注他的陈述中的真实内容，社会科学家就不成其为社会科学家了。最终，他的社会观念和想象将同外行人的社会观念和想象无异。当然，这不是说社会科学家已经无事可做了。韦伯曾经指出，社会科学葆有“永恒的青春”，社会科学的历史“是而且依然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试图通过概念的构成去分析性地理顺现实的头绪，通过科学视野的扩大和转移而使这样构成的分析式的概念结构解体，并依据如此转变的基础重新构成概念”。②韦伯强调指出，这个辩证过程的必要条件是这种分析式的概念结构与来自经验的事实经常发生互动。因此，虽然涂尔干和韦伯以不同的观点来写作，但他们看来都对社会科学家内在的危险特别敏感，因为他们把自已概念中的来自经验的有关事物看作是已知的因而是不成问题的。

不幸的是，我们不能证明现代化理论家有同样的敏感性。涂尔干的批判虽然是针对着孔德的，但也是针对现代化理论的同样有力的批判。现代化理论家普遍地认为，现代化这个概

① 涂尔干：《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第19—20页。

②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纽约，1949年，第104页起。

念"尽管有其含糊性，却是有用的，因为它会引起当代读者的共鸣"。[1] 但是，只要对这种"共鸣"的经验主义内容批判地进行一次研究，便立即会明白，现代化概念就是涂尔干所说的那些"日常经验产物"之一。就现代化来说，提供这个概念的基础以及它所引起"共鸣"的"日常经验"可以从人类在近几个世纪里所经历的深刻变化中找到，其中包括民族国家的兴起、群众参政的开始、工业化、城市化、官僚政治化、人类知识的迅速扩展以及文化的日益世俗化。这许多转变不均匀地在各个社会中分布着。现代化理论家试图用可以概括和排列的这些转变的某个单独的有关事物或一系列有关事物来解释现代化。因此它就被解释为某种有形的属性（即理性化或结构差异化），人们认为这些属性是这些转变的共同标准，或者认为是某种属性或一系列属性（即与传统性—现代性的对比中有关的属性）的获得，就可以把经历过这些转变的社会与尚未经历过这些转变的社会区别开来，或者认为这些转变中的某个方面（例如工业化）与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因果关系。

然而，认识那些确实经历过一些深刻转变的社会是一回事，而靠某个科学概念来综合所有这些转变则是另一回事。前者的模糊想象必然会产生后者的同样模糊的定义。不过，这还不是唯一的难题。确实，随着现代化概念的更为精确，问题似乎也更多了。最精确的（而且也是最罕见的）构思是那些集中在某个重要因素上的构思。然而，正如在针对这种方法的批判所指出的，当使用某个单一的因素诸如理性化或工业化等来

[1] 本迪克斯："再论传统性和现代性"，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292页。

概括现代化时，它的作用不过是作为已经被解释清楚的其他一些概念的同义词而已，因此不仅是多余的，也是混乱模糊的。另一方面，比较常见的做法是把现代化当作集合名词来解释，它涉及多重的属性和过程，但这种方法也无济于事。经验主义的批判对这种方法的破坏性特别强，其中最有破坏性的或许是那些对现代化的“系统性”特征提出异议的人。他们证明许多与现代化有关的变化过程可能会孤立地发生，与其他过程无关，这些变化过程中的某些过程与其他过程是不相容的，而且由于现代化开始的时间和起点不同，在某种背景下与现代化有关的制度变化过程并不需要在其他背景下重复。按照这种看法，如果说现代化可以设想为各种因素的集合，那么它确实是一种非常奇怪的集合，因为即使在缺少某些因素的情况下，现代化也可能会发生，显然不会因为某些因素取代了另一些因素而受到影响。

因此，由于定义含糊，现代化的概念不仅缺乏准确的界线，而且对有关它的来自经验的有关事物的性质所作的设想，经过考查，有许多也是不正确的，或者是令人误解的。现代化理论家试图将本应加以区别的、互不相关的社会变化过程集合在同一个概念之内，结果并没有什么帮助，只会妨碍对经验事实的分析。本来，用两分法中的与两个极端有关的两三个范畴来研究“社会”的普遍进化过程的具体化形象是最有用的，但实际上也只不过为理解几个世纪的社会转变中人类经验的多样性提供了一种不适当的工具。①

总之，与这个概念有关的最重要的事物是标准化的，而不是经验性的。现代化的概念被剥去了科学的伪装，就变成了仅仅能够区分“进步”的社会变化过程和“不进步”的社会变化过

程的分类方法而已。它的作用只是用深刻变化的含糊而肤浅的想象——同时也是充满了种族中心论和过去的进化论遗留下来的传统智慧的想象——去取代对这些模糊看到的转变所作的经验主义分析。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已经证明，这个概念的功能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和认识上的，也就是涂尔干所说的"把我们的行动和环境和谐起来的"概念。涂尔干还说，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有用的概念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但由于它以一个科学概念面目出现，因而也是更危险的。哎呀！现代化概念完全属于这种情况。

现代化理论的概念化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它的作用显然不能促进我们对人类社会经历过的许多转变作出理解。[②] 它鼓励人们专心致志于描述和分类的问题，却忽视或含混了根本性的问题。凡是现代化理论中没有错误或者没有被人误解的地方，往往也是最无关紧要的地方。它几乎没有促进经验主义的研究，对实际社会设想的"现代化"作出解释，更没有推动系统的比较研究。相反，它把"理论"和探索之间、现代化理论家与从事"地区研究"的实际工作者之间永久留下一道鸿沟。对现代化的概括所作的努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它的

---

① 只要一刹那的思考就能揭示这种阐述的原始性质。如果当代化学家不得不在研究中使用古希腊人的四元素法则，他当然不会满意。然而，许多社会科学家却完全满足于使用仅有它一半的范畴去解释三个多世纪的社会变化。这似乎意味着社会世界不如物质世界复杂，更能够容忍教条的概念。但是哪个社会科学家会承认这样一个假设呢？换一种说法也许更适合些，那就是现代化理论与有关人类社会转变的未来研究之间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希腊人的元素分类法与当代化学元素周期表之间的关系。

②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没有可能在现代化的全部论著中零散地找到一些有用观点，而是说，这种论著不仅只是偶然涉及现代化观点，而不是依靠它，由于现代化理论不适当，这些论著变得更加含混和不完善了。

含糊性上，都证明它是徒劳无用的。[1] 现代化理论家最大的失败也许就在于他们忽视了解释工作，来解释他们的理论恰恰要解释的东西。现代化理论家显然共同关注对社会转变的变化程度进行分析，然而，他们的"理论"往往是含糊的、混乱的、描述的，而且最终是不能比较的，因为他们没有建立以经验为根据的富有成果的问题结构，而这个问题结构却能构成他们研究工作的核心。

也许将来总有一天人们可能发现某种无所不包的社会变化过程可以有用地称之为现代化。但是，上面的批判说明这一天决不会在近期到来。目前，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主义方面的，以及纯理论的批判所积聚的压力加在一起，得出的结论可以引用卡普兰的格言来说，现代化理论的概念结构"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决不会**比别的范畴更多"。因此，对现代化理论进行的批判显然支持"激进的"立场。即使不断地对现代化理论加以修正，也不可使现代化的幻觉有什么实质，因此，现代化理论必然要被抛弃。[2]

结束语

卡普兰提出，我们的概念应当"告诉我们更多东西"。这个标准，显然是相对的标准。如果那种反对现代化理论的论证

---

① 库恩在1962年提出，某种理论以多种形式出现是表明范例危机的共同迹象。按照这个标准，现代化理论一出现就处于危机之中。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1962年，第69—72页。

② 这个结论并不排除纯粹正常使用的"传统的"和"现代的"这两个名词来指某个社会的过去和现在。但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只有语言学上的作用，而没有分析的作用。这个结论也不意味着不可以用这些名词以及其他有关的名词来指那些定义比较严格的实在概念。

度，用以严格遵循比较分析的逻辑。但是，无论取代现代化理论的另一种理论最终可能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们都需要一种根本的重新思考，想一想怎样才能做到对长期和宏观的社会转变进行分析。现代化理论诞生将近二十年的结果不能证明在第三个十年中能够继续存在。开始为树立另外一种范例而努力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4. 现代化概念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A·R·德赛

〔编者按〕 印度孟买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名社会学家德赛教授曾就印度的农村和城市状况写过大量著作。1971年，为纪念该系建系五十周年，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由他主编《不发达社会现代化论文集》，①本文即其中一章。德赛教授谈及当前现代化的著作将“现代化”这一概念不加区别地应用于范围极广的现象。这些著作往往主张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认为发达社会已经成功地得到转变，其他社会可能有完成这种转变的能力，也可能没有完成这种转变的能力。他承认现代化概念有潜在的用途，但指出后进行的现代化国家所走的道路不同于先进行的现代化国家。其核心过程可能颇有普遍的适用性，但按照他的看法，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们应

---

① 德赛编：《不发达社会现代化论文集》，两卷本，孟买，1971年。本文刊载在第1卷，第458—474页。

分析工具的锐利作用。内特尔和罗伯特森十分正确地指出，这些名词表现出三大缺点：(1)混乱和含糊；(2)在描述现代化的过程时，规范式的陈述和意识形态的偏见颇为明显。“在这一点上要注意的最明显倾向——有时隐晦，有时明显——是认为现代性的典型情况在性质上属于西方民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特征”。(3)与第二个缺点大致相近，在意识形态上出现的另一种偏向是“现代性体现了事物的极终状态，也就是说，人人都应当努力去模仿在西方社会中出现的，也是能够取得最大成就的‘状态’”。还有许多出自现代化一词的名词，诸如“分裂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中断”、“后现代”等等，实际上都是从语义学的角度施放的某种特殊“烟幕”，用以逃避这种歪曲事实的幻想所带来的麻烦。这种幻想就是把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奉为理想类型，或者说它们代表了新的乌托邦。

价值观念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腔调成为现代西方学者使用现代化概念的基础。它产生了一些危险的后果，使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人类社会在最近时期内正在发生的变化过程。

这些学者带有这种特有的亲西方偏见，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观察和分析那些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变化过程的能力。这种偏见歪曲了各个国家已经进行的现代化和正在进行现代化时所经历的历史阶段。它也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方面产生了错误的幻象，并且往往提出一些实际行动、政策和措施方面的治疗方法，而实际上这些方法却阻碍了这些国家按照正确类型的过程来进行现代化。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使学者们强烈要求的措施甚至有可能导致现代化的中断，产生深刻的“危机状态”。若干学者的较早热情是以粗糙的进化论为基础，由于认识到了上

述情况，对不发达国家正在出现的发展趋势反而持非常悲观的态度。贡纳尔·米尔达尔的《亚洲戏剧大全》是这种倾向的缩影。

使用现代化概念时假定的核心过程

在指出了现代化概念为什么需要重新评价的原因时，人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与西方学者用来理解变化中社会实情的其他概念相比，**现代化**概念在描述近三百年来所发生的社会转变的某种核心过程方面，还是比较有用的。许多著名学者，包括魏因纳、艾普特、勒纳、布莱克、因克勒斯、本迪克斯、马里昂·列维、斯梅尔塞、埃森斯塔特和内特尔等都试图阐明这些核心过程。

按照这些学者的说法，"现代化"既是过程，又是产物。若与城市化、工业化、西方化或欧洲化等相比，现代化表达了一种更复杂的过程，并且表示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形式的同样复杂的产物。这个被称作现代化的过程不仅局限于社会实体的某个领域，还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基本方面。

我们将扼要地对现代化标题下所包括的这类过程进行评论。

在思想领域内，现代化表现为新知，它"可能探求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合理解释"。这种态度认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都是受规律制约的，有规则性、一致性和因果关系，可以被认识，因而可以凭人类的理性去改变和调节。这种理性态度是现代化的核心过程。①

这种态度在历史上第一个阶段发展的最显著标志是培根

的著作《新工具》，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狄德罗等人组成的百科全书派所提出的影响巨大的无神论唯物主义观点，以及佩里尔的理性法则，标志着通过法国大革命而产生了现代。这种态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三大思想潮流中体现出来，即实证主义和先验主义及其许多变种；以笛卡尔为开端而以黑格尔的深奥的辩证唯心主义集其大成的理性主义，以及新黑格尔主义和新大陆主义；第三个思潮是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构成了认识自然现实和社会—文化的人类现实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

理性态度成长的历史发展，推动和阻碍着理性态度发展的各种社会力量构成了现代的一个迷人的特征。

现代化的其他一些特征是与崇尚神灵相对立的世俗主义的发展，即与彼世观对立的今世观的发展，几乎是合乎逻辑地继理性态度之后而产生。“人类——及其在这个世界上的安全、发展和改善是衡量人类奋斗和规范的尺度和目的”（人本主义）；不凭信仰去承认任何事物，一切事物必须经过批判的、理性的审查；与抵制变化的态度相对立的重视变化的、向前看的态度。

作为“体制转变”的一个复杂过程，现代化体现在称为“社会流动”和“结构变化”的某种社会—人口的特征中。

社会流动意味着“这样一种过程，其中大量的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方面的信仰都失效和崩溃，人们可利用社会化和行为的新方式”。②

---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7、10页。

② 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第41—42页。

社会结构的变化。现代化是"个人活动和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和专门化","个人所有的不同任务——特别是职业和政治中的任务以及他们与家庭和亲缘关系之间的任务——发生了分离"。"专门化"而不是"泛能化"指任务的分化和任务的获得不取决于以任何固定的血缘、领土、种姓或等级基础为依据的亲选原则,而是以成就为依据的"自由浮动"。①

政治变化。现代化包含四个主要特征:

1. 国家主权的合法性不是来自神授,而是来自本来属于人民的世俗的认可,并以对公民负责为基础。

2. "政治权力"不断分布"到广泛的社会群体——最终分布到全体成年公民,把他们结合在一个大家同意的道德秩序中"。

3. "领土范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通过中央的、法律的、行政的和政治的社会机构的权力加强"。

4. 现代社会的统治者无论其性质如何——专制的、官僚制度的、寡头制的或民主制的——都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统治者,"承认其子民作为对象、受惠者和使政策合法化的重要性"。现代民主形式的政府和半民主形式的政府之间的差别在于多大程度上允许他们在"政治自由以及福利和文化政策"方面"在政治机构中作规定的表达"。②

经济变化。现代化本身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1)非生命的能源,例如用蒸汽、电力和原子能来取代人力和畜力,作为生产、分配、运输和通讯的基础;(2)经济活动从传统的环境中

① 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第2页。

② 同上,第41—42页。

分离出来；(3)"机械和技术日益取代工具"；(4)随着技术达到这样的高水平，庞大的第二产业部门(工业、商业)和第三产业部门(服务业)产生，在质量和数量的重要性上都超过了第一产业部门(农业)；(5)经济任务和经济活动——生产、消费、销售——的单位日益专门化；(6)在经济上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持续增长能力——至少足以经常提高产量和增加消费；最后，(7)日益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主要特征。①

在生态领域中，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城市化程度的增强。

现代化在**文化领域**中以下列方式表现出来：

1. 文化系统中的主要成份之间的差异性不断增强，"传播文化和世俗教育的推广；形成了以知识学科为基础的更复杂的知识和组织系统，以执行培养人才和提高专门化的任务"。②

2. 出现新的文化观，其特征是强调进步和改善，强调幸福和自发地表现自己的能力和感情，强调个人价值的发展和效率。

3. 出现新的人格定向，品性和特征，这表现为有更强的能力去适应正在扩大的社会视野，具有某种自我灵活性；兴趣范围不断扩大；与其他的人和环境日益增加潜在的同感；对自身的进步和流动的评价日益提高；日益强调现在作为人类存在的有意义的世俗领域；加强对他人的尊严的认识且增强尊重他们的意向；不断增进对个人的认识，认为他的世界是可以信赖的，认为在他周围的人和制度也是可以依赖的，会完成对

① 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第4页。

② 同上。

他们的委托和责任；日益相信科学和技术，日益认识到奖励应当依据一个人的贡献，而不是来自与其贡献无关的某种异想天开的念头或特殊的所有权。

4. 最后，现代化也意味着“社会的一种能力，以产生一种制度结构，它能够适应不断在变化的问题和要求”。按照埃森斯塔特教授的看法，这种灵活性的产生构成了现代化的中心问题和对它的挑战。[①]

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上述的过程和特征基本上包括了那些“核心过程”。

作为生产的基础，从使用人力和畜力向使用非生命动力转变，从工具向机器转变，及其在财富增加、技术多样化、差异化和专门化等方面所涉及之事，导致了新型的劳动分工，而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特征。国家合法性的依据从超自然转向世俗；政治权力的扩大并在居民中更广泛的范围内的散布，以及将法律的最高权威置于其他规定制度之上，也被承认为现代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同样地，以贤选原则作为社会地位分配的原则的社会结构转变为以个人的成就和功劳为基础进行社会地位分配的社会结构，使社会地位的真正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因而使社会结构的真正基础也发生了变化，这也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在社会团结的原则上，从建立在前契约的、泛能化的和单一主义基础上的“机械”原则向建立在契约的、专门化的机会均等的基础之上的“有机”原则的转变也被承认。学者们还承认，现代化过

---

① 内特尔和罗伯逊：《国际体系和社会现代化》，伦敦，1968年，第38—41页；又见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9页。

主义国家征服他们并且将他们置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铁蹄之下时，它们是在完成一种文明使命。现在也有人说西方高度现代化的新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行利他主义的活动，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援助，帮助传统上不发达的落后社会现代化，并且认为这种援助将帮助这些不发达国家很快达到起飞阶段，而且推动它们进入和谐的现代化道路。

六十年代出现的学术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研究的第二个支流。它不把现代化过程简单地看作传播，而是试图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认识到与现代化问题有关的深刻作用和重要性。这种观点并不认为现在的不发达的传统社会将自动地转化为现代化的社会。它认识到，即使有发达国家的援助，不发达国家未必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按照这一派学者的说法，这些国家中还存在着现代化过程中断的巨大危险。他们看到了不发达国家中发生的变化正在造成这样的威胁。这种威胁有可能导致"现代化的中断"。他们对这些国家中的变化给三分之二的人类将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深感不安，甚至恐慌。埃森斯塔特、艾普特、内特尔、罗伯逊、本迪克斯、贡纳尔·米尔达尔以及一大批其他学者已经在更成熟的水平上开始探讨现代化的一些问题。

这些学者也认为，整个现代化过程发生在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现代化限于西欧、美国和讲英语的自治领内，在内部力量的推动下出现了本地的现代化和发展——传统社会重新组合，形成了自主的现代社会。在这个阶段的现代化中，最重要的结构特征和文化特征是"各种新的组织规模较小；产生了许多有比较专门目标的组织；尚为有限的市场和在主要的制

度范围内自由浮动的资源得到发展；代表社区和职业的公共制约和分配的方式较占优势”。这个阶段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在工业化起步之前，在广泛的社会群体和阶层迅速怀有政治愿望之前，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现代的、集中的政治体系”。①

这些学者认为，属于这个阶段现代化的国家已经产生出一个强有力的现代的政治和民主的结构，因此有可能和平地、逐渐地取消对它们的限制，进入一个现代化持续增长的阶段，即表现为社会流动、工业化、经济增长以及由此造成的更广泛的阶层进入到已经存在和确立的结构中去。因此这些学者认为，现代化在较早一个阶段已经获得稳固的中央结构，所以有足够的灵活性和生存能力，以吸收进一步的现代化方法，并满足广大群众和社会群体不断提高的政治愿望。它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创造资源去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的能力。因此这些国家已经逐渐发展出持续增长的力量，可以不受阻挠地扩展现代化进程。它们面临的挑战基本上是属于小规模性质的，不大可能导致现代化的中断。

按照这一批学者的说法，世界上的其余地区基本上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组成，它们与现代化了的社会相比是不发达的。从历史上来看，它们从二十世纪初才开始现代化，而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从外国的统治下把自己解放出来，走上积极的现代化道路。

这些在现代化中的“后来者”所面临的问题与先进的现代化国家面临的问题有几个方面的不同。

1. 在从外国统治下解放自己的过程中就有了群众性的

① 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第52—53页。

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动员。群众对中央政治权威的冲击作为一种新现象已经出现。称作"群众方向"的日益增长的有意识的群众参与是这些不发达社会的特征，与较早的现代化国家相比，它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进行积极的现代化。

2. 社会流动不断加快速度，"首先以大规模的、多重目标的、专门的社会群体和协会的产生为特征，亦即产生了非生态的和非血缘的群体和协会"。它的第二个特征是在社会制度领域内的各种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和相互渗透。

3. 它具有"不断发展和扩大城市化和不断普及大众交流媒介的特征"。[①]

先进行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动员是逐步的，对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和对已经存在和确立的中央政治结构的冲击较小。相反，在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中，当新的中心刚刚确立时，社会流动非常迅速，对群众发生的直接而剧烈的冲击，突然出现，性质各不相同。其次，各种制度领域中的社会流动速度与在第一阶段现代化社会的社会流动速度不同。新解放的大多数国家蒙受经济极端落后之苦，由于它们对帝国主义宗主国有一种独特的依附关系，因此"在政治、生态和教育领域中的分化和社会流动过程比在工业和经济领域中更强"。

后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征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下述左右为难的处境中：它们深刻地认识到贫穷、苦难以及低下的生活水平，群众愿望不断上升的革命，越来越尖锐地要求中央政治当局保证资源以满足这些要求，中央当局则由于经济和工业基础薄弱而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文化机制，

---

① 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第 53 页。

无力增加资源，因而也就不能满足这些要求。

这些学者认为，不发达社会面临着下述关键性问题：

1. 以已经现代化的社会状况为基础产生出来的新期待和新希望由于现代大众交流媒介的扩展而大大加强，而且十分尖锐。这些新的期待和新的希望在无力迅速增加资源以满足它们的情况下，促成了一种尖锐的变革要求。

2. 在这些传统社会中，群众的需要迅速成为群众的要求。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数千年来一直是贫穷的，缺乏资源，不能享用许多基本必需品。然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觉醒，那就是认识到这些需要能够得到满足，生活水平能够得到提高，资源能够开发来满足这些需要。这种觉醒把需要转变为群众的积极要求，"大众交流媒介的放大作用"以及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的榜样又加速了这些要求的提出。

3. 这种新觉醒的要求越来越具有进攻性，结果是一方面产生了摧毁现有结构的愿望，因为它没有为绝大多数人民服务。另一方面，那些掌握一些东西可以改变社会结构的人，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使他们可以比别人更快地从日益增加的资源中获得自己的份额，于是产生了这两类人之间的殊死斗争。这导致了一种迫切的需要，想建立一个合适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它能产生资源去满足长期的和加速增长的要求。

属于第二个支流的学者们感到，欠发达社会现代化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用"足够的速度增加供给以平衡不断增加的需要，那就产生了新的痛苦，使贫穷具有新的意义，并已成为影响顺利的、渐进的、和平的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这一派学者和前一派学者一样，也认为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正在援助欠发达国家迅速使自己实现现代化。但是，他们并不像前一派学者那

2. 这些学者认为，现代化理论基本上是用来描述在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大框架——有时被说成“自由企业经济”或“自由经济”——中发生的转变过程和转变体系的。现在提出的各种名词都避免打上“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词的烙印。“开放的社会”、“特别的社会”、“自由的社会”、“积极的社会”、“选拔人才的社会”、“世俗的社会”等等都得到鼓励来描述这些社会，以强调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过程。很少学者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他们各种各样描述的社会的共同基础。

研究现代化过程的学者们基本上都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概括。这些社会要么是西方高度工业化的新资本主义社会，要么是一部分在独立后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欠发达社会。这些学者还试图在这个有限的研究范围内详细阐明一些普遍规律。在俄国十月革命后走非资本主义道路而且构成了当前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那一些社会，要么被看作是畸型的和非正常的社会，不值得去考察和分析，要么就是泛泛而论，或者略作肤浅的观察便一笔带过。这种对研究对象的忽视产生于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亲西方偏见，甚至直到现在还不愿意把中国大陆、东欧国家、北朝鲜、北越、古巴（甚至苏联的大部分地区）等直到最近才不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欠发达国家包括在考虑范围之内，其实这些国家同其他欠发达国家一样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这些国家在性质不同的社会组织原则上，也在进行现代化。这个原则的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的目标是为了满足估定的人民需要而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资料私有者对利润的追求，并仔细制订了一个在性质上不同的社会阶层划分和财富分配的原则。我认为，对这些也在力图从欠发达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国家不去进行科学

的分析，不把它们的成就和局限性与那些沿着资本主义道路作出同样的努力来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性进行比较，学者们就会失去极其重要的丰富研究领域，那是个严重的缺点。

现在正是学者们应当坦白承认现代化过程体现为两条道路的时候。正如彼得·沃斯利正确地指出的，现代化本身没有什么东西，从它的有关内容来看，要么是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要么是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前者……出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轴线内，资产阶级是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后者出现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轴线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推动力量已经消失了。

我的看法是，以两种道路为基础划分现代化，有助于我们区别各个不同国家正在经历的核心过程的性质。它也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正在经历现代化的社会所作努力和倾向的性质。它还将使我们消除谬误，这种谬误通常是由于我们在选择一些根本无法进行比较的研究单位时产生的。按照一条道路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以及其他方面与按照另一条不同道路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是不能比较的：经济与教育方面则可与政治等方面比较。

由于不能或不愿意承认这两条发展道路包含着质的差别，当前的现代化概念产生了某些混乱。我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来澄清我的论点。

这两种现代化道路的某些过程是共同的，例如，两者都有我们所说的“社会流动”的过程。它们都试图把以亲选原则的社会结构转变为贤选原则的社会结构。它们都在发展结构分

化，其原则是以社会任务的专门化为基础，而社会任务的专门化又以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为基础。两者都想把以人力和畜力为基础的仅能糊口的生产经济转变为以蒸汽、电力和原子能等非生命动力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经济。两者都仔细制订了一些工业化计划，从而使以第一产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两者都在推动城市化的进程，都在建立大规模的组织去协调以法律—理性的权力系统为基础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复杂关系。两者都在改造传统的政治系统，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今世观而不是在彼世观的基础上，从而使政治权力对人民负责。两者都在建立中央机构，从而为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和越来越多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一个框架。两者都在试图制订高于其他规章体系的法律。两者都重视知识和科学的作用，并承认正规教育和大众交流媒介的作用，并把这些作为现代化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尽管有这些相似之处，现代化的两种道路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明显的差别。我将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个差别。

1.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把私营企业家，即资本家，作为已经现代化和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结构的主轴。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截然相反。它主张把资产阶级当作一个社会阶层消除掉，把公有制作为已经现代化或正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结构的轴心。显然，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这两种态度有质的差别。

2.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主张把“自由企业家”自然增加的利润作为生产的中心目标。它还主张以机械力为基础进行大规模生产，但是为了市场而生产，并且通过“自由企业家”的

竞争而起作用。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即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把满足社会的估定需要为生产的中心目的。它也主张以机械力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但不是为盲目的市场生产，而是按照估定的需要而制定中央计划的生产。

3. 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设想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和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熟练或非熟练劳动者阶级。阶级的根本差别一直存在而且永远存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依然是阶层划分的关键特征和固有特征，决定了财产分配、消费类型、生产方式和娱乐活动的方向。非资本主义的，即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建立在消灭占有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的基础上，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仔细制订一项新的阶层划分原则，按照技能的多样性把社会群体转变为熟练和非熟练的各种劳动阶层。这种划分社会阶层的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阶层的原则有质的不同。正是因为常常忽视了这个重大区别，才导致现代化研究中出现极大的混乱。

4. 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为了持续增长而采用的根本策略是为资产阶级提供主要的刺激，给与那个阶级以积极的支持。并且详细制订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措施，为那个阶级壮大自己的力量并为经济增长过程的投资创造适当的环境。政治当局竭尽全力创立和维持一种法律和社会的体系，基本上是为这个阶级的发展服务。它详细制订各种措施，对破坏这类经济发展方式并削弱企业家阶级的各种力量实行控制。相反，非资本主义道路为持续增长而采用的策略基本上依靠消灭作为一个范畴的资产阶级。它以生产资料属于全社会所有为基础，并以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措施为基础，详细制订各种发展策略。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现

的基础上获得,不顾消费者的购买力。然而尽管国家对市场进行了所有这一切侵犯,但这些因素本质上仍然是商品。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一开始就把教育、医疗设施、工作和其他种种社会娱乐当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由社会来供给。这两种在教育、医疗设施和工作等方面相反的态度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结构组织来满足这些需求。它们也决定了对公民提供服务的范围和性质。

我斗胆作出的上述一些说明,足以建立一个明确的基础,极力主张我们如果要在现代化研究中避免出现混乱,那就亟须分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现代化。如果我们想正确估价欠发达社会在进行现代化的时候应该作出哪些努力和有什么倾向,这样的区分也有其重要性。它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评价已经现代化的社会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欠发达社会之间的关系。

正在试图使自己现代化的欠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方面采取不同的形式,这取决于它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正是时候,可以使我们在这个类型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地、更加有条理地、更加客观地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

近二十年来,"第三世界"国家一直在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实现其现代化。五十年代,若干学者对这条发展道路持乐观态度,但现在慢慢地变得怀疑起来,当前的潮流已经预见到这条道路的未来非常暗淡。贡纳尔·米尔达尔的《亚洲戏剧大全》、伐隆的《世界上不幸的人们》、彼得·沃斯利的《第三世界》、霍罗维兹对二十年来第三世界发展结果的研究、贡达·弗兰克等学者对拉丁美洲"欠发达状态发展"的探索,以及像

埃森斯塔特那样的社会学家的研究，都揭示出这些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正在导致它们出现一种特殊的、错综复杂的趋势，即“现代化的中断”。威尔特姆教授总结这个严重的困境，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欠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强国’的策略能否实现现代化并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①

这个难题具有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

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难道不会把欠发达国家越来越引入爆炸性形势吗？学者们难道不应当明确地把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和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区别开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系统的研究吗？他们难道不应当更系统地考查一下，如果欠发达社会沿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或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走下去，现代化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生活会产生影响吗？

① 威尔特姆："东西方比较"，载《对现代亚洲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海牙，1964年，第12章。

第　二　编
现代化的前提

变化、进化、适应，或者更一般地说革新，是人类一切发展过程的特征。现代化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它发生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和对一种特殊的刺激——科技革命——有所反应的社会之中。现代的变化从其范围和普遍性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体现出人类事务的一场革命。

无论人们对于一般社会或某个特定社会的现代化开始于何时持何种看法，都要遇到一个问题，即现代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与在此以前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早期的学者们对于现代化过程固有的范围留下深刻的印象，倾向于认为旧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已经被新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所取代和摧毁。在那些把现代化视为"西方化"的学者中，这种意见特别坚决：议会可能是从较早的英国制度中演变出来的，但在中国、罗马尼亚和尼日利亚，只有在消灭或清除了本地的土制度以后，议会制度才能构成。显然，鞋匠和马车匠都将让位于鞋厂和汽车厂，但社会调节自己事务的制度决不会以这样激烈的方式发生变化。事实证明，在"现代的"和"传统的"社会之间划

一条比较明显的界线——虽然在社会内部现代化的辩护者有时极力反对确立近乎道德意义上的前现代制度——并不是有成效的方法，不能解决现代和前现代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

近来的研究著作倾向于下述观点，即适应与借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化过程中从传统社会带入的价值观念和制度，有些确实是影响未来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这个假定令人对前现代社会进行研究重新发生兴趣，并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很大差别。例如有时过分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把现代以前的所有社会都称为"封建的"，这就掩盖了它们的多样性。有些在现代以前的社会并不是静止的，它们产生了颇为发达的官僚制度、强有力的城市和商业网、严密的组织形式，还敏锐地认识到有必要把这些正在变化的自然和人类环境联系起来。其他一些社会在几个世代内无法发生变化，坚持它们自己的异教和野蛮的一切思想和制度。

然而在"现代的"和"传统的"对立中，有些人却又强调旧的制度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性。他们采取的态度与那些对新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印象很深的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的确，有些人过份强调了某个社会在现代化以前的经历，以致他们对一个在现代以前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发展的社会是否有实现现代化转变的能力提出疑问。

关于前提的这个总问题，或者说前现代的社会形式及其后来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化过程研究中最不受重视的方面。因此，引述一部特别集中注意这个问题的新的研究著作《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比较研究》①所提出的前提概念，作为引入这项主题研究的起点，是有益的。这部著作提出的前提作

为后来现代化过程的策略可以适用于后来现代化的国家，而不是适用于较早现代化的国家，这些前提包括：

1. 对完全是新的外国影响的接受能力。有些社会的前现代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国外，例如日本文化和俄国文化分别来源于中国和拜占庭的文化。当现代西方既作为榜样又作为威胁而出现的时候，过去借鉴外国文化的经历似乎使它们比较容易再作一次借鉴。由于种种原因，其他社会——例如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社会——必须克服严重的文化障碍才能使它们从实用的角度去评价西方。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把一切外国人都看作是蛮夷。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扩张其帝国以使更多人改宗伊斯兰教，并把西方人看作基督教异教徒，不值得模仿。

2. 管理和动员资源的能力。这一前提包括某个社会为自卫而在军事上具备反对更先进社会的能力，与此同时，又有在不使自己的民族特色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向它们借鉴的能力。日本和俄国在较大程度上具备这种能力，但在目前具备类似这种能力的发展中国家比较少。例如，人们可以发现六十年代的印度和尼日利亚，在实行激进的变革方案以及在调整本国的适应能力与向国外借鉴的关系上，同一个世纪以前的日本和俄国相比要困难得多。

3. 经济生产能力。这样的生产能力——主要是来自农业和贸易的生产能力——必须足以向交通运输、通讯和工业部门的投资提供剩余价值。日本和俄国政府有能力将四分之一或者更多的农业生产为国家的目的服务。在上一个世纪里，年

---

① 布莱克等著：《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比较研究》，纽约，1975年。

投资率的比例相当高的原因是这种较高的前现代的生产能力，而不是引进外国的新制度。这两个国家无疑是通过对农民的剥削才获得了经济生产能力，它们在发展和分配之间作了传统的选择。在短期内实行比较人道的政策是尽可能减少税收，让农民消费他们所生产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政策下，社会将会依然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在农民本人变成小业主的地方，除了他们向自己的土地投资外，强大的中央政权仍然需要建设铁路和电讯线路，维持通货，并处理对外关系。各种社会在经济增长能力方面差别很大。不具备这种能力的社会也有例外——即那些有可能发现重要资源，尤其是石油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日本和俄国相比，有能力提供大得多的积蓄用于投资。

4. 城市化能力。前现代社会不仅在经济增长能力方面有差别，而且它们在城市人口——而不是分散居住在相对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村中的人口——所构成的那一部分贸易、交通和行政网络所占的比例也有差别。城市增长的程度是前现代社会动员技术力量和资源的重要指标之一。在现代化以前，日本所具有的这种能力在程度上大于俄国，但这两个国家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更接近西方前现代的标准。

5. 对教育和知识的重视。在这个前提上，前现代社会之间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有些社会，又如日本和俄国那样，开始建立了学校制度和学术传统，这类制度易于发展为中小学普及教育以及图书馆和研究中心体系。有些社会，像中国那样，可能是十分尊重知识和对文官进行高标准的训练，但却与那种很难适应现代化目标的态度结合在一起。其他一些社会则学校很少，又缺乏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必须依赖借鉴而缺乏

适应现代的能力。

以上列举的前提是意见而不是结论。它只是指出问题的类型，这些问题在人们想知道前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制度的遗产对现代化的前景如何发生作用时是应当提出的。

很难说它是什么，但肯定不是国家。虽然统治者往往使用种族的称号(例如盎格鲁王，法兰克王等等)，但大多数不是一个种族单位，通常的形式是由好几个日耳曼民族组成的、占统治地位的武士集团。他们统治着拉丁、凯尔特和斯拉夫等族的臣民。用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来讲，法兰克人本身就是一个民族联盟，他们通过征服其他日耳曼人，例如勃艮第人和阿勒曼尼人等，并且逐渐同他们融合在一起。他们还统治着罗马化的高卢人、意大利人、从不列颠逃亡出来的凯尔特人，以及若干斯拉夫人。显然，这样的一种统治区既不能算是一个种族的统一体，更不能算是一个文化的统一体，其中有多种方言，多种语言，不同的习惯，而且每个群体通常有不同的法律。即使在地理上也是如此，因为每个统治地区只是一个大致上划分的地理单位。它可能有一个核心，却难以确定自己的边界——到处都有争夺的区域和松散地依附的、或多或少自主的群体(例如依附于法兰克人的阿基丹人和依附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威尔士人)。

因此，蛮族统治区只能用它的王，或者用它的王族来下定义更好些。蛮族统治区是由得到人民承认为王族的某个家族的人所构成。这个群体的规模及其占领的土地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是，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人认为某人是他们的王，这种蛮族统治便存在着。

这些统治区是不定形的，而且最初只是暂时存在的，但其中一些存在下去，而且正是因为它们存在下去，才迈出了走向国家形成的第一步。它们非常缓慢和逐渐地形成一种持续的同一性。某些民族占领着某些地区，长期组织起来，因而期望继续构成某个统治区。他们的统治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后，开始

产生一种感觉，认为这个统治区是政治全景中一个永远存在着的部分，它应当继续存在下去。

若说这种统治区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那是毫不足奇的，因为在中世纪初期，任何人都很难说有国家的观念。即使在受过比较良好教育的教士中长期留恋着关于国家的某些回忆，但是，连他们也不能很清楚地表达出它的意思。有些国王在教会的传统或在残存的罗马帝国传统培育下，试图将罗马皇帝的某些政府机构和公共权力保留下来，但他们的努力失败了。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成员没有想到有什么非个人的延续性公共权力。忠诚不是对国家而是对个人或家庭而言的。而且甚至对个人的效忠也不完全可靠。每一次需要人们尽义务或要求他们服从时，对个人的效忠都要受到考验。政治权力越来越多地纳入了私法的范围。它为个人所有，不能因婚姻而转变，也不能由继承人来分享。政治权力由于是属于个人的，对偏远地区鞭长莫及，也不能通过代理人去行使。因此经常出现一种趋势，国王的地方代表变成独立的统治者。各个地区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的低水平的经济活动使这一趋势加强。所有这些因素——强调对个人的忠诚、把公共权力占为已有，以及地方独立自主的趋势——在封建制前已经长期存在着，而现在得到了确立。封建制实际上不过是对这种已经存在着的政治局面的承认。

从这些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情况中建立国家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时间，特别是必须完全依靠内部的力量源泉时，更加如此。拜占庭帝国的模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罗马帝国的模式直到十二世纪法律研究复兴时才为人们所知。然而，到了那时，国家形成的某些必要步骤已经完成了。

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学者们必须对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政治环境有所关注，而那种政治环境与古时罗马法学家所处的政治环境颇不相同。他们必须考虑国家之间的关系，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封建制和半封建制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罗马法中并不是重要的。中世纪的学者将新旧两种成份糅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关于国家的理论。这种理论的要点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也就是说，它的发展经历了欧洲国家体系牢固地确立的整个时期。

这一理论在十三世纪末充分发展，打算把欧洲划分为若干主权国家。"主权"一词在当时尚未创造出来，但主权的事实已经存在，即使是采取一系列词语来描述。在对外关系方面，主权这种观念比较容易被接受，对它下定义也不太困难。很明显，有些政治单位完全是彼此独立的，并且很快就找到一些词语来描述这种独立性。十三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三世就曾经提到过"不承认在世俗事务中拥有最高权威的国王"。[1]后来，又有人创造出下面一句话，"国王至高无上，国王是自己国境内的皇帝，只要不存在任何外部权力的地方就是至高无上的"（这句话是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仍有争议）。[2]

国内主权的思想则比较难以获得承认，也难以用明确的词语去表达。这个时期的大多数学者采用了有机体的类比：国家等于人的身体，身上的各个部分都必须服从头脑，都必须为

---

① 罗伯特·W·卡莱尔和A·J·卡莱尔：《西方中世纪政治理论史》，伦敦，1928年，第5卷，第143—148页；波斯特："关于民族主义的两点看法：Ⅱ．国内主权论"，载《传统》，第9期（1953年），第296—320页。

② 同上波斯特的文章，第304—307、320页。参见康托罗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普林斯顿，1957年，第51、97页。

共同的利益而工作，等等。到十三世纪中叶，有些作者说，这个政治体是一个"神秘的身体"(就像教会一样)，意思是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去维护它。[①]这个结论很快就得出。到1300年，人们几乎在普遍地说国家的首脑可以要求政治体中的一切成员用他们的生命和财物去维护共同利益，或建立共同防御。[②]有人甚至主张，如果个人可以拯救国家的话，那他即使要犯下弥天大罪，也应毫不犹豫。这个例子证明(盖纳斯·波斯特也指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句话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创造，它早在十三世纪就已经存在了。[③]

但是，这个国内主权的理论与法律实质永恒不变、地方领主和自主的社区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和特权以及对中央政府的权力有不可取消的限制等其他理论都发生了冲突。结果，这个理论通常采用比较的语词来表达：国王具有高于别人的权威，享有"较大的权力"。[④]国内主权的理论与一些无法否认的政治事实也发生了冲突。虽然总的说来西方统治者发现对国外要求主权，乃至反对教皇，是相当容易做到的事，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国内主权所需要的权威或行政机器完全建立起来。

---

① 波斯特："关于民族主义的两点看法：Ⅰ. 国内主权论"，载《传统》，第9期(1953年)，第208页；但博韦的文森特所说的话是在《教义大全》的第7卷，第15页，而不在第8页。

② 约瑟夫·R·斯特拉耶："法国的领土防务和主权"，载《献给吉诺·卢扎托的研究》，米兰，1949年版，第1卷，第289—296页；波斯特："理智的公共功利，理智的法令和'国家利益'"，载《历史界》，第21期(1961年)，第8—28、71—99页。

③ 同上。在第96页上他提到一位匿名作者说，如果通奸能使一名妇女告发一些可能使整个共同体毁灭的阴谋，那么，通奸也是正当的。

④ 例如，当法国国王公正的菲利普试图确立对(蒙德主教统治的)杰沃丹的统治权力时，争论便集中在谁是更高的统治者，谁拥有更大的司法权或权威的问题上。A·曼松诺博：《关于1307年共有领土权的研究论文集》，蒙德，1896年，第506—507、517、531页。

结果，出现了一个很长的挣扎时期。直到十六世纪，比较先进的国家才有可能真正对一切国内事务坚决保持其主权。也只是到了那个时候，主权的理论才清除了它的某些含糊之处，以明白和肯定的措词来陈述。

然而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发生了另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从对教会的基本效忠转到了对世俗国家的效忠。这一变化更甚于其他变化，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的开端。从格列高利改革（约 1075 年）到十三世纪中叶，教会为欧洲社会确立了标准和目标。当教会的政策遭到反对时，它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而且往往能够促使臣民反对世俗统治者来胁迫他们。1250 年以后，这种策略越来越失去效力。服从世俗政府的习惯已经确立，对国家法律和统治者个人的某种依附关系已经产生。虽然这还没有发展成为爱国主义（除了极少数例外），[①]但已有了一种感情，认为外部权威不应干预一个已经确立的政治共同体的内部事务。虽然人民不大想为任何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但他们宁可为国家作出这些牺牲而不愿为教会牺牲。这是一种不冷不热的忠诚，但对其他事情也并不更热情些。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 年在位）与英国和法国的国王发生公开冲突而受到考验时，他发现几乎得不到两国中任何一国的支持。甚至教士也对他说，如果他们被怀疑为不忠于国王，他们将会失去所有的影响。从那时以后，忠诚通过许多次机会建立起强有力而富有感情的因素，唯一的忠诚是对国家或对代表国家的统治者的忠诚。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约 1300 年），国家形成在总的过程中

---

① 康托罗维茨，前引书，第 232—272 页；波斯特，前引文。

开始出现不同的型式。最重要的两种差异是形成一个单一国家的国家和在统治区分裂后诞生的许多国家。英国和法国显然是第一种类型的例子，德意志和意大利则属于第二种类型。几乎同样重要的是没有明显的地方特权的统一国家与“拼成的”国家。在后一类国家中，国王缓慢地将权力扩大到一个又一个地区，因此，每个行政地区都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独特法律和制度。英国是早期的几个统一国家中的一个例子，也是最突出的例子，法国则是“拼成的”国家的典型。

这两个差别在后一个阶段——领土国家变成民族国家的阶段是重要的。在整个统治区变成国家的地方，民族主义发展得较早，也很自然，没有遇到很大的阻碍，也无需费大力或作出被夸大了的感情用事的呼吁。在这样的国家中，人民逐渐趋于彼此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国家的大围墙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同世界上的其他人民隔绝开来。他们不得不共同工作，彼此适应。他们有时间认同，有清楚的意识，消除地区之间的某些差别，逐渐依附于他们的统治者以及他赖以进行统治的机构。当国家的体系足够强大和足够持久时，它甚至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群体中也能产生出共同的民族主义。例如朗格多克虽然更近似加泰洛尼亚，而与法国北部不大近似，但它最后却彻头彻尾成为法国的地方。

同样明显的是，统一的国家比“拼成的”国家更有利。统一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必为地方的特权担忧，也不必建立一个庞大的而且往往不得人心的官僚机构去协调和控制形形色色争吵不休的地方当局。它也不必用怀疑的目光去看待地方领袖，认为他们是效忠于地方的人。相反，他们可以被利用来解释和适应政府对他们那些地区制订的计划。他们逐渐开始想到整

个民族的利益，因为地方的利益不再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制度产生了对同一性的认识，其认识程度比另一种类型的国家中所产生的同一性更深，因为在那类国家中，某个地方的人无法理解邻近地方的行政管理程序。因此，在十五世纪，英国显然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当时法国的一位王子（勃艮第公爵）仍怀有希望，要把法国的一些地方分裂出去，与他所控制的低地国家合并，组成一个新的王国。十八世纪末法国的民族主义大浪潮与成功地摧毁地方特权并创立统一国家的努力是相互吻合的。

另一方面，有好几个国家在统治区发生分裂后成长起来，这些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要困难得多。许多这样的国家规模太小，除了对法律和秩序抱有愿望外，不足以产生出任何政治情感。即使其中一些较大的国家也发现它们很难唤起像英国和法国轻易就能唤起的同样感情。政治体系和人民的古老传统之间没有相似之处。人民感到自己应当归属的那个历史的、文化的和语言的群体总是大于他们将要效忠的国家。与此同时，分裂出来的许多国家已经建立强大的、不易被推翻的行政和军事体系。因此在十九世纪中叶，当民族主义似乎已经确保了政治上的成功和心理上的满足时，仍然需要依靠暴力去促成国家和民族的一致。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之所以能够把他们的旧统治区中的分散部分集合在一起，只是因为通过了反复的战争而且只有在高度危险的感情方面发出了民族主义的呼吁以后才能做到。哈布斯堡王朝采用的形式甚至更糟，因为它是一个"拼成的"国家，基本上是由好几个统治区的碎块组成的。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不可能产生民族主义，对于每个碎块而言，究竟采用何种民族主义也充满了混乱。奥斯曼帝

6. 从今天的现代化理论看启蒙思想家

阿瑟·M·威尔逊

〔编者按〕 这篇文章对理解现代化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法国革命前的一个世纪里一些知识界领袖们专心致志研究的问题，与今天正在现代化的社会里的知识分子们所思考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威尔逊特别明确地阐明启蒙思想家所鼓吹的社会目标。法国保守的政府机构不能适应改进的变革所带来的压力，导致发生1789年的大革命。今天，看来在一些发展中社会里，若其国内统治者或殖民统治者抵制变革，那么革命还是可能存在的。

威尔逊是达特默思学院传记学教授，曾获罗德斯学者称号，是《现代史和法国史研究杂志》编辑部成员，专攻十八世纪法国史，尤其以弗勒里红衣主教和狄德罗等历史人物的传记著作而享有盛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了一整套新型的理论研究，所研究的是帮助欠发达国家改善其不利

地位所需要的原则和技术。所有这些研究开始时都很简单，也很自然：新兴的独立国家如果不想陷入那种隐蔽的但也并非不是真的殖民主义情况，那就显然需要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冷战的竞争性使双方都愿意投入大量的财富，极力想使新兴国家投向自己的怀抱，去反对另一方。

但是，情况很快就十分清楚，仅仅提供经济和财政援助，本身还不足以带来期望中的改善。如果不按照紧密结合的理论原则去应用这些援助，援助会使用不当，或者与提供援助的目的相反。十分明显，检验假设和提高概念化，是实际和紧迫的需要。这种研究领域现在已被通称为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

首先，有人主张，只要适当地应用经济学理论就足以指导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因此不需要什么全面的社会理论。这种主张并不奇怪。因此，我们就有拉格诺·努尔克斯的《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1953 年)这部最早的著作。但是，不久大家都认识到，经济发展只有同民族生活中其他各方面的根本变革协调起来，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在沃尔特·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1960 年)一书中被明确地认识到，因而此书已成为这个研究领域中最著名和最有影响的著作。他指出"社会和心理的整个群体变化现在已被公认为创造'起飞'前提的核心"。①

因此，发展理论必须学会把网撒得越来越开些，不仅要吸收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也要依靠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观点。

①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纽约，1960 年，第 26 页。

于是，发展理论是在本身具有跨学科和比较研究的氛围中进行的。这些观点在阿尔蒙德和科尔曼、西尔维特、卢西恩·W·派伊、戴维·E·艾普特和其他一大批作者的著作中充分表现出来。①

由于经济发展成功地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取得成就而且持续下去的工业化需要对国民生活的许多方面，也许是几乎所有方面产生巨大的变化和转变。这些变化从其定义而言，是与过去的连续性发生决裂，或者至少有实质性的改变。由于这一过程对传统准则的功效进行挑战，所以它往往是痛苦的。现代化的历史是传统社会发生激烈转变过程的历史。这一挑战是内在的，而成功的变化则要让旧的去适应新的，因此社会科学的这门学科的名称本身也处在变化的过程中。“发展理论”这个词现在已被“现代化理论”一词所取代。对于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发展理论”看来仍然是适用的，但对于社会科学的大多数其他学者来说，“现代化理论”显得更加适当些。它的内容包含着传统和变革之间的冲突，并意味着这种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新兴国家吵吵嚷嚷提出的需要上，集中在它们在很短的时间跨度内实现现代化的必要。然而现代化理论家都承认，现在已经充分工业化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它们各自的历史上都曾有一些时候经历过变化和适应的相同阶段，唯一的差别是这些阶段是以从容不迫的速度完成的，因此也花费了长得多

① 阿尔蒙德和科尔曼编：《发展中地区政治学》，普林斯顿，1960年；西尔维特编：《期待着的民族：民族主义和发展》，纽约，1963年；派伊：《政治发展的若干方面》，波士顿，1966年；艾普特，《现代化的政治学》，芝加哥，1965年。

出一些过去看来是彼此孤立和无关的现象，而现在看来却与罗斯托所说的起飞前提的型式十分近似的现象。

站在这样的高度来重新考查启蒙运动的历史，人们便会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启蒙思想家所力争的任何条件，现在几乎都被认为是成功的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看到的变化，正是今天的现代化理论家告诉我们要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变化。启蒙思想家谋求的自由就是导致开放社会那种形式的自由，是现代化理论家告诉我们在各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最起作用的。本文当然并不坚决主张启蒙思想家对于什么是进步所必需这个问题上已经更甚于本能的信念。不过，本文确实主张启蒙思想家始终不渝追求的那些变化与今天的社会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完成现代化必须具备的条件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力图达到的目标和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目标。例如，现代化理论家告诉我们，正在现代化的民族不断地施加压力，要实现更广泛的平等。正如艾普特指出的，“取得平等是现代世界中一个不断扩散的道德目标。即使现代社会把不平等制度化了，但极少现代社会视之为好事。”[1] 相反，传统社会几乎无一例外地抵制着任何要求更广泛平等的压力，例如旧制度下的统治集团就是这样。

十八世纪下半叶，美国发表了一篇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这篇宣言的起草人被公认为启蒙思想家的真正榜样。法国一个较为著名的文件宣告：“人人生而平等，而且始终享

① 艾普特：《现代化的政治学》，第73页。

有平等的权利。社会差别只能视其对公共利益是否有用来证明是否正确。"最近，帕尔默所写的一部高度综合的十八世纪的历史著作出版了。他把十八世纪下半叶确定为真正的民主革命时代。

然而在启蒙主义运动的初期离革命的到来还很遥远时，要求更广泛平等的热望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对不平等的憎恨，已经溢于言表。在独立宣言发表前一个世纪，若古尔骑士在《百科全书》的"自然的平等"条目中写道："平等是一项原则，是自由的基础。……由于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人性，因此很明显，按照自然法，每个人在评价和对待别人时都应当视别人为自然平等的人，也就是说别人都像自己一样是善良的。"[①]同一作者在撰写"长子的权利"条目时，表现出对自然公正的充分尊重，并对过去类似条目的陈述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他宣称长子继承权是"违背自然权利的"："它扼杀了公民的平等，而正是这些公民创造了全部财富"。[②]卢梭大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说"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承认？"狄德罗曾经对布罗斯说过，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在君主制度下不可能解决"，显然他的意思是说十八世纪的法典是那么不平等，以致它不能容忍公正的评价。[③]启蒙思想家的意见显然是倾向平等的。甚至伏尔泰由于他在日内瓦的经历显然也倾向民主。[④]事实或许是《社会契约论》在出版后

---

① 《百科全书》，第5卷，第415页；参见韦斯：《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历史著作和国家理论》，威斯巴登，1956年，第180—182页。

② 《百科全书》，第13卷，第370页。

③ 威尔逊：《狄德罗：考验的年代》，纽约，1957年，第224—225页。

④ 盖伊：《伏尔泰的政治学》，普林斯顿，1959年，第220—238页；《人道党》，纽约，1964年，第95页。

现代化理论家除了强调正在现代化的人民要求更大程度的平等外，还认识到这些群体希望对参与国家事务有更广的意识。[1] 这种愿望在二十世纪是比较容易识别出来的。但是如果在启蒙主义运动时代也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么它又是什么呢？对此，人们必须从表面事物的下面去寻找这种相似之处。理由是十八世纪像以前几百年一样，教会和国家的专制主义机构继续强调盲从因袭和消极被动，而不强调主动参与。但是，如果人们透过表面去观察内部，就会发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感受"与路易十六统治时代法国的"感受"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沃邦和布瓦吉贝尔那种缺乏自信心的行为与雷纳尔和米拉波发行小册子的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事实是，启蒙思想家之所以为"光明的世纪"而感到那么激动，是因为他们有希望把他们的思想传播到越来越广泛的民众中去。已经增强的参与意识于是被那些试图启迪人们的人所掌握，为群众所掌握，也为启蒙思想感染到的人们所掌握。对于启蒙思想家以及人数日益增多的追随者来说，启蒙本身就标志着参与。狄德罗曾经申斥一位把过去歌颂为黄金时代的作者，他写道："科学和艺术已经有了惊人的进步。这一进步使一切残酷行为的严酷性得到缓和。无视这些进步的傲慢者应当受到诅咒。光明从未如此深得人心，这种深得人心的情况只能引导我们去获得有益的东西。不承认这种情况的傲慢者应当受到诅咒。"启蒙运动时代的这种渗透意识和参与意识也见于霍尔巴赫所写的《社会系统》(1773 年)一书的结论中：

---

① 西尔维特编：《贝拉焦讨论》，第 367 页。

"只要留心看看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切人都不会不承认先知先觉们的进步所带来的最明显的效果……连最不重要的国家也开始在思考了；它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有用的目的上，民众的不幸最终迫使人们去沉思默想，抛弃他们的那种正是幼稚的信仰。"

在启蒙运动中，对国家事务的扩大参与可在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上升中发现。这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已经明显地可以看出来了。实际上，伏尔泰在六十年代针对加来案发动公众舆论的方式中，它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1787 年 6 月 4 日，克劳德·德吕尔耶耳在法国科学院致欢迎词时说，由于若干重要著作的出版，法国人的生活在 1749 年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那时起创建了我们所说的'公众舆论的帝国'。"德吕尔耶耳后来在演讲中又提到了"公众舆论的新论坛"。他还说，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尊重并注意公众舆论"的话。[1] 德吕尔耶耳不是一个纯文艺家，而是时事评论家。他写的许多文字中都涉及政治事务，例如波兰发生的一些大事和 1762 年的俄罗斯起义，因此他当之无愧地可以被承认他是一位具有专业水平的人，有能力去评判公众舆论的效果。他在 1788 年所写的一篇题为"关于政府的舆论行动"的文章中，一开始就说，"像近年来这样大谈特谈舆论是前所未有的事。此事无可置疑地证明，一种完全可以称之为世界皇后的无形力量已经诞生。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场变化发生了。"[2]

现代化理论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时，知识分

---

① 德吕尔耶耳《文集》，巴黎，1819 年，第 2 卷，第 26、35、45 页。

② 同上，第 203 页。

子发挥了必不可少的作用。[1] 艾普特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发挥特殊作用，是因为"他们最倾向于尊重自由的文化。……知识分子是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重要媒介"。[2] 十八世纪以来，虽然术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看来我们今天所称的"知识分子"，显然就是十八世纪所称的"文人"。约翰逊博士在给彻斯特菲尔德勋爵的信中表达出来的那种自信心，也是达兰贝尔在《文坛现状之思考》(1760 年)——他认为最好还是发表出来——中所说的独立精神，显示了更高的独立意识。这些论著也可以被解释为证明启蒙时代的文人明确地认识到了他们正在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个作用(二十世纪的社会学家喜欢使用的一个词)就是公众舆论的形成。德吕尔耶耳把公众舆论的变化归功于方特内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布丰和卢梭等人的著作，也归功于马尔泽尔布政府的政策。而狄德罗则可以视为知识分子当之无愧的真正模范(这是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家所喜用的另一个词)，他在《百科全书》的条目中直言不讳地说，这项工作的目标是"改变常规的思想方法"。[3] 启蒙思想家只要如此办理，就可以从象牙塔里的超凡脱俗中走出来，可以起到似乎矛盾而又是正确的作用，使后人看到他们的学究气并不像实际上那么浓。

为了寻找证据来说明十八世纪更广泛地参与国家事务的气氛，人们可以指出，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论著中使用"公民"一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频繁。"公民"与"臣民"

---

① 西尔斯："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知识分子"，载《世界政治》，第 12 卷(1959—1960 年)，第 329—368 页。

② 艾普特：《现代化的政治学》，第 75、176 页。

③ 《百科全书》，第 14 卷，第 463 页。

随着十八世纪时间的推移，更多使用的另一个词是“国民”，如果它指的不是参与的话，至少也是指同一地方的民众。百科全书派虽然使用了这个词，但意义非常隐晦。[1] 尤其是自然法则政治论者惯于用国民这个词来表达其论点。1779 年，勒·特罗森写道：“今天，全体国民显然丧失了生活和行动，只不过是一种被动的存在，它有必要具有活力，并且动员起来，这样它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有机体。”[2] 因此，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著作使人民开始熟悉“国民”这个概念。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法律概念，没有赫德尔或费希特的那种创作神话的倾向，也没有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种族中心论味道。然而自然法则政治论的民族主义概念本质上意味着世俗化，提出一种类似于今天的现代化理论家所假定的方法去建立世俗国家的理想，这些现代化理论家声称，“民族主义就是承认国家乃人类事务中不具人格的和最高的仲裁者”。[3] 事实充分证明在十八世纪，“公民”和“国民”这两个概念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西哀耶斯教士所写的《什么是第三等级？》一书中，几乎每一页上都出现这两个词。

参与公众事务的理想是启蒙思想家以及彼得·盖伊称之为“人道党”的整个一群人富有活力的理想，这表现为对专制主义的共同憎恨。[4] 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著作虽然推崇某种

---

① 《百科全书》，第 11 卷，第 36 页，“国民”条。

② 勒·特罗森：《省政府与税务改革》，巴塞尔，1779 年，第 1 卷，第 534 页，转引自恩诺迪：《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司法控制原理》，坎布里奇，1938 年，第 34、36、37、39、41、42、57 页。

③ 西尔维特编：《贝拉焦讨论》，第 19 页。

④ 见凯布纳：“专制君主和专制主义：一个政治术语的变化”，载《沃堡和库托尔德研究所杂志》，第 14 卷（1951 年），第 275－302 页；文图里：“东方专制主义”，载《意大利历史杂志》，第 72 卷（1960 年），第 117－126 页。

所谓“合法的专制主义”，但他们所指的是法律的权威，而不是指专横的统治者。① 启蒙思想家追随孟德斯鸠所树立的榜样，用“专制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两个常用的词来进行诋毁。还有，只要有专制君主，臣民就成为奴隶。讲到奴隶，就是讲根本不能参与国家事务的什么东西。

于是就能看到，今天的理论家所强调的是，现代化要求广泛参与公众事务，许多类似之处在启蒙时代也可以找到。但是，有人可能会争辩，这不过是偶然的巧合。在启蒙思想家中，是否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他们有意识地提出要求扩大参与公众事务的基础呢？肯定有。狄德罗就曾向叶卡特琳娜二世提出建议，要让俄国人民更广泛地参与政治，要发展一个更大的中产阶级，要鼓励产生一个人数多得多的熟练手工业阶级，要“组成第三等级”。最后，保罗·韦尼埃尔重新编辑了狄德罗的《回忆叶卡特琳娜二世》，使我们从这些回忆录里判断出狄德罗是如何有意识和煞费苦心地试图影响她的政策。② 现已了解到，狄德罗在访问圣彼得堡时提出了这样的一些建议。然而，过去人们认为这些建议只是随意谈谈的，相当肤浅的，也许是他在茶余酒后消磨时间的聊天而已。韦尼埃尔的版本证明，狄德罗的这些建议是经过周密的研究后才提出来的，是系统的，而不是空想和盲目的，基于下了决心作出努力去了解俄国的实际状况，并构思出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以图阐明一个人口众多而又落后的民族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这可以充分证明狄德罗在这里显示出他本人是现代化的

---

① 恩诺迪：《自然法则政治论者的司法控制原理》，第 28 页。

② 狄德罗：《回忆叶卡特琳娜二世》，1966 年。韦尼埃尔撰写的前言，第 4、9—21 页，正文第 242 页。

它们不值得支持是因为它们对君主的意志进行抵制的一切外表不过是虚伪的表演，而国民的利益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牺牲掉，它们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勇斗争。"启蒙思想家所施加的压力总是为了摆脱传统制度的桎梏，以获得更大的自由。这一点的标志和例子可以在狄德罗针对警务副总监萨尔丁所写的《论出版自由》一书中看到。它无疑是要求更大的自由。

但是作为现代化社会特征的渴望更大平等和要求更多参与政治事务，还下过是感情而不是政策。它们需要具体化，需要实施。因此，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理论家使自己练得能够在社会和政治组织中鉴别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改革必须引进要使现代化进程获得力量和根本成功，也必须进行改革。我们将提到这几个领域中的最重要的领域，目的在于指出启蒙思想家为了达到与今天相似的目标而制定了与今天相似的政策。虽然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理论家和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具体纲领在某些方面是完全对立的，例如如何看待人口增长方面就是这样，但是，这里也不难论证在这两个世纪中，人们深深关注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却十分相似。在这两个世纪，人们感到担心的也是同类的事情。

例如，有一位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理论家关心的是在经济上是否积累足够的资本使经济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为了保持经济发展达到指望的速度，是否要聚集足够的储蓄然后恰当地用以投资。一位现代理论家对此感到关心，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具体变化。然而，资本积累和合理分配的问题不也正是十八世纪围绕着奢侈问题而展开的大论战的中心问题吗？"实际上，传统经济往往把全部生产品消费掉，因而没有什么

剩余可以用于投资和经济增长"。[1] 曼德维尔和伏尔泰等十八世纪的一些作者为此辩护，论证说，任何一种奢侈都是有益的，因为它促进就业。但是，另一些理论家，例如《百科全书》"奢侈"条目的编写者达兰贝尔，还有狄德罗，却认为有的是有利的奢侈，而有的是有害的奢侈。狄德罗还紧紧抓住一个观念，即国民经济中资本积累越多，生产能力便越强，尽管他不能将这一观念透彻地表达出来，但他对此关心。[2]

现代化理论家十分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人口问题。二十世纪的理论家担心人口太多，与启蒙思想家担心人口太少不同。然而中心问题是一样的，即人口数量与国民经济的力量和健康发展之间的恰当关系。[3] 在狄德罗那个时代，公共卫生的实际状况使他担心人口下降。他说："当我考察人口的大量减少及其种种原因时，我总是感到惊讶，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比例是十比九。"[4] 因为狄德罗也认为"人口是国家力量的主要源泉"。[5]

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家所关心的另一个领域是财政理论和税收政策的整个问题。[6] 启蒙思想家对这个问题也深表关注，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8页。

② 关于狄德罗的观点，见《百科全书》，第2卷，第414－416页；第11卷，第89－94页；《回忆叶卡特琳娜二世》，第145－160页。参见于贝尔：《百科全书里的社会科学》，巴黎，1923年，第306－307页；法热："百科全书派的人口原理"，载《人口》，第6卷(1951年)，第620－622页。

③ 见赫克斯利："启蒙思想家忽视的一个因素：人口爆炸"，载《伏尔泰研究》，第25卷(1963年)，第861－872页；雷蒙："百科全书派论人口问题"，载《伏尔泰研究》，第26卷(1963年)，第1379－1388页；法热："百科全书派的人口原理"，载《人口》，第6卷(1951年)，第609－624页。

④ 《百科全书》，第2卷，第431页。

⑤ 同上，第16卷，第467页。

⑥ 艾普特：《现代化的政治学》，第65页；西尔维特编：《贝拉焦讨论》，第445页。

育》一书，到狄德罗不具名地作出很大贡献的《公共教育》一书所阐述的内容来看，他们都宣称“学校的领导权应当属于国家警察总监”。①

技术的重要性在现代化计划中极为明显，对于二十世纪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他们对于应用技术从未有过争论。然而，对于他们的十八世纪前辈来说，技术虽然同样重要，却不是那么不言而喻的。《百科全书》的目的之一，也是它的荣耀之一，乃是全面地描述当时的技术。《百科全书》描述产品的功用是供人类使用，描述生产劳动的高贵，因而有助于传统社会的现代化。

技术除非已经退化到仅凭手工劳动的规则，便须依靠基础科学的发现以及科学研究方法中所包含思想态度来培养。对二十世纪的理论家来说，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他们要求运用科学方法的一切来源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这种意义尚未确立，这样就可以解释百科全书派为什么要赞扬培根，强调实验和崇拜牛顿。正如今天的一位现代化理论家敏锐地说，伽里略是“一般人心目中的现代化英雄。他的胜利是理性的胜利，而将理性应用于人类事务是现代性的基础”。② 启蒙运动所坚持的不是神话诗的思想，而是批判的思想。《百科全书》的许多条目中也同样坚持强调正确和严谨的方法论。例如，达兰贝尔所写的“实验”条目和其他许多条

---

① 《公共教育》，第187页。关于狄德罗与这本著作的关系，见罗思：《狄德罗通信集》，巴黎，1955年，第4卷，第234页。

② 艾普特：《现代化的政治学》，第43页。关于狄德罗谈伽里略，见《百科全书》，第2卷，第369页；关于伏尔泰谈伽里略，见盖伊：《现代异端的兴起》，纽约，1966年版，第228页。

目都是对这一事实的极好说明。他们的说法是现代化理论家十分熟悉的。他们承认它是自明之理，科学革命与现代化是携手并进的。[①]

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理论家对研究某些问题的方法尽管有时在有些人看来不免过于自信，但有一个问题尚未解决，它大大地使这些理论家困惑难解。这个问题就是现代化政府是否有成为反民主政治的或亲独裁主义的倾向。应当以何种态度看待个人统治的政府，例如恩克鲁玛的政府？虽然现代化理论家的态度十分一致，全都希望有一个最终将有利于多元主义的民主政治。因此，罗斯托在他的书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是有多元文化的人……他们有权利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②]艾普特的著作在结束语中也说："尽管进行现代化的大多数国家似乎不大可能直接向民主的方向运动，但在这些社会中已经存在着重要的亚集团。它们是民主准则历时甚久的传送者，对于民主社会的前途是重要的"。[③]

启蒙思想家在开明的专制君主制的形式上恰恰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的历史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总的说来，启蒙思想家不赞成开明的专制政治。开明的专制君主这个词是十九世纪才出现的，在启蒙运动时代尚未创造出来。它对启蒙思想家具有吸引力，因为开明的专制君主颇似革新者和反传统主义者。例如，约瑟夫二世正是因为他是反传统主义者，才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7、11、76—77页；艾普特：《现代化的政治学》，第316—318页。

②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第167页。参见西尔维特编：《贝拉焦讨论》，第357、359页。

③ 艾普特：《现代化的政治学》，第459页；参见第449、452、461、463页。

遇到了种种麻烦。应该大大赞扬启蒙思想家的是，他们顶住了诱惑。相反，他们十分明确地主张运用多元方法去解决政治、宗教和社会方面的问题。伏尔泰写道："如果英国只有一种宗教，就会有出现暴君的危险；如果有两种宗教，他们便会相互斯杀，置对方于死地。但是，倘若有三十种宗教，他们便会和平而幸福地共同生活在一起。"狄德罗也如此写道："一切专制政府都是坏的。我并不排除在好的、坚强的、公正的和开明的领导下的专制政府。在我看来，在人类社会中，反抗的权利是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权利。"[1] 康德在为"启蒙"一词释义时说："一旦赋予自由，几乎可以肯定启蒙即将接踵而至。"

如同本文那样对比较历史作探索性研究将近结束时，人们自然会问，这种方法对于研究启蒙运动的学者有何帮助？也许，它至少可以容许我们更准确地分析这个古老而令人困惑的问题，即启蒙思想家在哪些问题上真正是革命的？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困惑是因为人们必须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之中选择其一。一种观点认为，启蒙思想家除了不具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知识外，几乎在所有的方面都是革命的。另一种观点却认为，他们只是心地善良而天真的改良主义者，并不是革命的，因此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玩火。在这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之间难道不存在一种更现实的观点吗？用这种观点来说，启蒙思想家看来是现代化者，尽管没有榜样可以仿效，但是他们难道不是在试图用他们所知道的最佳方法去转变传统社会吗？这种观点也可作为某种解决长期争论的办法，那个争论以罗昆和罗斯坦德两人的名字为代表，即启蒙思想家对法国大

---

① 狄德罗：《回忆叶卡特琳娜二世》，第117页。

革命的爆发是否有重大影响。

现代化理论所使用的这种比较方法有助于我们揭示十八世纪知识界要求变化的压力的性质和内在统一性。它还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分析反对变化的各种力量。现代化理论通过衡量主张变化和反对变化的力量之间相互发生的作用，为我们提出一种假设。这种假设通过反复检验正在成为公认的原理，即成功的现代化社会在其成员中产生一种能力，可对连续不断变化的必要性作出“预测性和反应性的自我调整”。[①]因此，成功的现代化社会不致由于巨大的挫折或暴力革命而使变化中断。我从内心乐于相信，启蒙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如彼得·盖伊的《伏尔泰的政治学》一书中所阐述的伏尔泰的政治思想，狄德罗的政治思想，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科西嘉宪法大纲》和《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等书中阐述的政治思想，都本能地倾向于认为“预测性的自我调整”这个过程有助于社会接受变化。现在，正如众所周知，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法国有一次保守的反应。应用二十世纪现代化理论家的概念和方法不是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启蒙思想家的失败确实使法国革命的爆发不可避免吗？福里奥·迪亚斯在其《法国的哲学和政治学》一书中作了睿智的研究，认为正是因为法国的保守反应阻碍了对变化作出预测性自我调整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思路是令人信服的，那它就提出了一些方法，在这些方法中，这种应用现代化理论的比较方法去研究启蒙运动的历史，可以启迪我们的新感觉，并且提供富有成果的新的研究方法。

---

① 西尔维特在《贝拉焦讨论》第436页写道：“认为联合的自愿程度越高，预测性和反应性的自我调整程度必定越高，因而社会便更能与变化融合，这种论点既非不合逻辑，也非幻想。”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相信进步的。启蒙运动时代的人由于认识到人类在不断地增强能力去认识自然和控制自然（狄德罗常常说自然是人类的永恒敌人），因而产生了对进步的信念。[1] 然而二十世纪的现代化理论家同样对这种进步抱有信心。罗斯托写道："人类无须把自然环境看作实质上是自然或上帝赋予的一个要素，而应当把它看作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只要按照理性去理解它，就能够用一些方法去控制它，这些方法会导致生产的变化，而且至少在某一范围内产生进步。这种观念必须加以传播。"[2] 然而，正如威维贝格的《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历史悲观主义》一书中所表明的，启蒙运动对进步的信念不无忧虑。那种信念实际上是有些令人胆战心惊的。这种同样的信念和胆战心惊的状态，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征。启蒙思想家和当代的现代化预言家们的希望——乃至他们使用的语言——之相似，颇能见诸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所说的下述几句话："人们需要的大量正规训练所得的知识和从经验得来的知识……无助于想象力，削弱了意志。……当我们懂得可能会出现更大和更稳定的光明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闭上眼睛，痛苦地向后退却。但是……为了探索更大的光明，我们不能踌躇不前。"[3]

---

① 《百科全书》，第2卷，第431页；参见第2卷，第276页；又见盖伊：《现代异端的兴起》，第182—183页。

②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第19页。

③ 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发展中地区政治学》，第64页。

7. 殖民地和传统政治制度对后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发展的影响

S·N·埃森斯塔特

〔编者按〕 前现代的或传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遗产会使社会与变化的机会对抗，这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原则之一。埃森斯塔特对东南亚各国的社会给予特别的关注，并以较后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所面临的一般性问题为依据，评价这些问题。作为这些社会变化的特征，包括中央政府的体制对指导变化的能力各异。大多数这些国家的中央政府具有一种脆弱的本国传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较强的政府是由一个殖民国家强加的，它的工作人员、机构和制度都是与人民群众离心离德的。

S·N·埃森斯塔特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伊利泽尔·卡普兰经济和社会科学院的教授，是研究现代化的著名学者之一。他的著作中包括《帝国的政治体制》(1963年)、《现代化的抵制和变化》(1966年)和《社会变化的比较展望》(1968年)等。本文写

收入H·D·论维尔斯编:《东南亚的现代化》(伦敦,1973年)。

一

本文的主要前提是,今天我们虽然看到了传统的社会一政治秩序正在全世界崩溃,但这并不一定说发展中的体制和秩序将按欧洲产生的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来仿效,实际上后传统的秩序之间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这样的一些类型现在正在东南亚发展。

这些不同的后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不仅在它们对待变化的态度和形成中心的能力方面可能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社会和政治组织等许多重要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

下面我们将首先简要地分析传统的和后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之间的差异。然后,我们将指出各种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一些基本差别。最后,我们将说明产生这些差别的一些条件,特别是其中那些也许同东南亚社会分析有关的条件。

这种分析方法是对某些假定进行了重新思考后才提出的,因为这些假定一直在指导着现代化和发展的初步研究。

二

现代社会在什么条件下兴起,现代社会之间有什么差异,决定现代社会稳定性和延续性的条件是什么,这种研究始终是现代社会学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开始,通过它的经典时期的前辈创始人——托克维尔、L·V·斯泰因、马克

思、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复兴，在整个发展中主要关心的问题。

在社会学思想中，这个问题逐渐转变为现代社会和非现代社会之间的对立、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之间的对立，那是十分自然的，假定现代社会的概念是向"进步"或"变革"的方向前进的社会。这些对立常常成为就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而言来作解释。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对立，在现代社会分析的发展史上最初采用的形式是把两种社会都描述为或多或少是完全"封闭性"的两极对立的类型。这些类型以各种方式被表达出来，其中最著名的类型中有滕尼斯的关于"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区别，雷德菲尔德的从人种学的角度提出的原始社会、民间社会和城市社会的区别。

几十年来，尽管方法论的和带有根本性的批判群起反对这些类型学和类似的各种类型学，但在一个长时期内，它们支配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推动着许多探索和调查。其中出现的对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图景的描绘，多年来一直流行在社会学的思想之中。

在这幅图景中，传统社会被描述为静止的社会，专门化的差异小，城市化和文化水平低。相反，现代社会被看作有高度差异、高度文化并有高度的大众交流媒介来揭露情况的社会。在政治领域中，传统社会被描述为以受命于天的"传统的"上层人物的统治为基础，而现代社会则以民众的广泛参与为基础，他们不承认统治者的任何传统合法性，他们以世俗的准则和效率来看待这些统治者所要承担的责任。首先，传统社会被设想为受到它的传统性规定的文化视野的束缚。相反，现代社

会在文化上具有动力，倾向于变革和创新

这种观点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才被粉碎。对于这整个研究领域，社会科学中开始提出新的问题和更精细的分析方法。确实，把现代社会看作与传统社会对立以及把这两种社会鲜明地对立起来的概念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所谓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国家"的非西方社会向现代性的突破，引起了人们越来越高涨的兴趣，发表的意见也越来越多。然而，对欠发达社会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兴趣，与社会学分析手段的发展同时存在。这就首先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产生了更精细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对这种分析指标的两大类型，即社会人口和"结构"方面的指标进行研究，对此，本文在前面已经提到并且至少作了一部分的分析。这些新的研究方法是在关注欠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之类问题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人们对现代社会的**产生条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而不是集中精力去识别这些社会有什么特征。人们越来越重视这些社会在向现代性转变中出现不大成功的可能性，而不是把这些制度和一目了然的社会秩序的产生视作理所当然，并集中精力去对它们的性质作分析性的描述。于是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向现代性的成功"起飞"有什么前提？

由于现代社会被理解为走向变化而且必须应付不断发生的变化的社会，因此，对现代化社会中这种持续增长的条件也进行了探索。

三

许多研究放弃了过去的思考，导致产生或者依据——尽管常常是含蓄的——下述假设，即在不同的制度领域中持续的增长、不断的发展和现代化都取决于，或者是相等于现代化的各种社会一人口指标和(或)结构指标的增强。按照这个观点，一个社会结构专门化的基本特征表现得或发展得越多，社会流动的各项指标越高，它的传统性就越弱，现代化程度就越高。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更能继续发展，不断应付新的问题和社会力量，并产生一种不断扩大的制度结构。

在初期阶段，这些研究对这些难题没有作出什么分析性的区别。因此，讨论这个专题的许多著作最初都往往用颇为相似的方法来叙述现代社会产生的前提，揭示它的特征(例如，机会均等的特征、任人唯贤等等)，于是就忽视了一些更特殊的问题，即现代社会产生的条件，它们能够成功地从前现代社会中产生出来——或不能产生出来——所经历的过程?

有关不断现代化的一些不明显的假定被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经历粉碎了，当时越来越多看来很有希望向现代化“起飞”的国家，却正在走向“垮台”。

许多研究中存在的这种不明显的假定，即传统性较弱的国家更能持续增长，事实却证明这种假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一人口和结构方面的各种现代化指标仅仅表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或社区被削弱或解体的程度，用丹·勒纳那本书的书名①来释义，就是传统社会消逝的程度。然而它们本身并不能说明一种程度，使一个新的、有生存能力的、能够持续增长

的现代社会可以产生，也不能确切地说明产生的是哪种社会，它的正确的制度框架又是什么。

同样，仅仅是传统生活方式的破坏不一定能保证这种新的、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框架的解体，不论是家庭和社区的解体，有时甚至是传统政治背景的解体，往往导致更无组织、更懈怠和更混乱，而不是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现代秩序，这已经是很清楚的了。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即许多国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是在传统象征的庇护下——有时甚至在传统的上层分子的领导下——实现的。在日本或者像英国这样一些国家里，许多传统的象征——不论是皇帝、日本天皇，还是英国贵族或荷兰的乡士生活的传统象征——都被保留下来了。在许多情况下，当现代化在反传统的上层人物庇护下获得最初的推动力时，接踵而来的是试图重新恢复某些传统象征，它们甚至以阻碍现代化的方式出现。

所有这些思考有助于否定那种认为"起飞"后可保持持续增长的假定。事情已经十分明显，对这种持续增长的保证是不存在的。在经济方面，阿根廷就是最明显的例子，缅甸或印度尼西亚则是政治方面最明显的例子，说明现代化达到最初某个阶段，或者甚至有时进入相当先进的阶段后，仍然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性。

然而上述这些例子还说明，传统社会遭到破坏和摧毁的变化过程与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一种变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另一种变化。人们认识到，当

① 即《传统社会的消逝》。——译者

现代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差别是国际间相对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国际力量对不同的传统社会的冲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面临这种冲击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别。

这些现代性力量是通过破坏传统的经济结构并建立分化更大的社会和经济体系来冲击不同的“传统”社会的。它们对许多传统社会的冲击也有可能是在社会的核心产生公民日益希望参与的风尚,最明显地表现在建立平等公民制和普选制的倾向,表现为一种“参与者”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某种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力量可以对各种格局进行冲击,但这些格局中的每种格局往往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向现代性“突破”以及对制度及文化问题的不同类型的突破,这些问题是这些社会和新出现的制度不得不处理的。

关于这些差别的某些详细情况,我们还要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分析。但是不管这些差别为现代性的产生提供了什么独特背景,它却产生了一些共同的特征和问题,虽然对这些问题的反应确实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共同的问题来自传统主义的象征和结构的前提及其结构与文化方面的局限性与那些发展现代性的前提之间的重大差别。在政治领域内,这些前提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核心和边缘之间一直持续着的象征和文化上的分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试图进入某个或某些政治核心并参与政治同时受到的限制。

在传统制度中,这些前提与下述事实有密切的联系。首先,统治者的合法性基本上以传统的宗教方式表现出来。其次,从属的社会角色与基本的政治角色之间缺乏区别,例如当地社区的成员身份等;尽管它扎根于这种群体之中,但公民或

臣民实际上不能通过选举制或普选制行使任何真正的或象征性的政治权利。

在文化领域内，一切"传统"社会所共有的传统性的基本前提是共同的，尽管社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基本前提就是承认传统，承认某些过去的事件、秩序和人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象征性的），特定性被视为它们集体认同的核心，视为它们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的范围和性质，视为变革的最高批准者，视为革新的限度的划定者。

这些前提得出的最重要的推论是：（一）参考过去的某些大事来限定变化和创新的范围、内容和程度；（二）限制职位的获得，但是，在职的人就是对传统的范围和内容的合法解释者；（三）限制参与这些中心的权利，限制参与规定社会和文化秩序的合法内容和象征。

在社会的各种领域内，各种传统的生活方式不管继续到何种程度和范围，只要在中心层次上传统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就会出现向某种现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方面的突破——可能是逐步的，也可能是突然的。只要中心层次上传统的内涵不发生这种变化，那么，无论组成社会的各个不同部分在结构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无论传统有多大可能的转变，摆在我们面前的仍然还是某种类型的传统秩序。

因此，向现代性的突破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中心的象征内容的变化以及世俗化、日益重视人类尊严和社会平等的准则，另一方面是参与的可能性日益增长，即使这样的参与是断断续续的或者是部分的，毕竟这种参与是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对规定中心的象征和制度的参与。

正是传统的内涵及其重大结构内容的变化才为变化的持

续过程提供了推动力，也为认为变化本身就是积极的价值观念的感觉提供推动力。它产生的问题是在现代化的巨大挑战下如何吸收变化。

以上的分析也许揭示了后传统的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和最重要的问题——它们的普遍一致的基本特征和它们对不断变化的倾向。

这些社会取得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方面是在广泛的社会阶层对中心的不断冲击中产生出来的，也是在他们要求参与规定社会的神圣象征、要求用新的象征取代传统象征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而新的象征则又强调这些参与和社会的重要性。

当然，广泛的、普遍一致的趋势在一切类型的社会中都不可能找到它的最充分制度化的表示。在政治现代化的最初几个阶段上，它可能是脆弱和断断续续的，而专制政权当然要压制它最充分的表达。然而，即使是专制政权也想利用这样的准则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如果不考虑到专制政权也会认为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存在着这种大势所趋的倾向，并且得到统治者的承认，那就无法理解它们采用的政策以及它们企图产生普遍一致的象征了。

六

以上的讨论谈到了现代政治秩序中最突出的特征和问题。首先，它说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传统的社会一政治秩序向大众一致的秩序突破，本身就包含了在现代性中可以找到的社会变化特征：体制转变的倾向以及对变化、抵制和转变的不断要求。当然，对变化的要求可以朝不同方向发展。一种

可能是改良，要求改进现存的各种制度，但还有一种可能是以一种体制的全面转变为目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化显示出既有紧密联系而又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社会结构的发展带来了极其多种多样的结构异化和分化，结构的形式、活动和问题，还有不断变化和体制转变的倾向。然而，仅仅是这些倾向的发展本身还不能保证产生一种制度结构，它能以比较稳定的方式去应付这些不断发生的变化，并且能够随之维持社会的秩序。

因此，现代化产生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新出现的社会结构应付不断变化的能力问题，也就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发展出一种制度结构的能力，它能"承受"不断变化所带来的问题和要求。正是这个问题构成了现代化的中心变化和随之产生的问题。这是现代性的挑战，也是后传统社会秩序的挑战。

然而，如果现代性力量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给一切现代社会带来了一些共同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和对这些问题的反应却有很大的差别。

日益增强的参与、社会的公正以及各种结构方面的变化等各种各样的倾向，都与上述现代性的共同象征和结构的核心有关，而且是从它们中间产生出来的。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中，它们的具体表达或表现有很大的差别，因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模式。

七

研究现代化的第一种方法的缺陷之一就是不仅假定这些问题可能是共同的，而且认为对这些问题当然要以欧洲发

展出来的同一方向来解决。

由于从传统社会秩序向现代社会秩序的突破首先在欧洲发生，就在这里，用新的词语来解释这种秩序的问题首先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因此，有关现代社会秩序特征的最早的定义同西方产生的社会一政治秩序象征性制度型式的特殊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一定意义上就构成了这种模式的一部分或普遍性。

这种社会—政治秩序的主要形式是民族国家。它在欧洲形成于反宗教改革时期以后的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后来又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形成。

这种类型的社会一政治秩序主要特征可列举如下：(一)疆域内的居民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二)在象征性和实际意义上保持对中央的高度信任和拥护，中央与人类生存的比较原始的领域保持着密切联系；(三)明显地重视在政治上为全民确定集体的目标。

这种模式更加具体地假定，构成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第一，象征和组织方面的制度化，在社会和文化经验中寻求某种能吸引人们效忠的秩序，并在这种秩序中寻求某些参与方法；第二，在共同属性和参与共同的象征性事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的社会和文化的集体认同；第三，集体目标的形成和表达；第四，社会内部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第五，内外或国际关系的调节。这五个主要组成部分往往全都围绕着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而结合在一起。

欧洲民族国家的这些特征有许多方面是来源于前现代的社会一政治传统中的几个部分，或从中转化而来；这些传统包括帝制传统、城邦传统和封建社会传统。它们把城邦传统中强

烈的行动主义倾向、帝制传统中把政治秩序视为与宇宙和文化秩序有积极关系的一般概念以及封建社会传统中的几大宗教传统和多元成份都结合在一起。

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的传统中,这些不同的倾向都植根于一种社会结构,它们的特征表现为各种各样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对文化和政治秩序及其中心作出相对高度的支持,同时在加入这些秩序和各自的中心方面又具有高度的自主性。

关于民族国家参与和抗议形式的一些具体设想的产生是出于上述这些倾向。这些设想中的最重要的一种设想是,各种政治力量、政治上层分子和更自主的社会形式——一方面是"国家",另一方面是"社会"——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斗争,力图在民族国家的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形成过程中占据相对重要的地位,争夺制定有关规定的决定权。这就是说,结构变化和变位的各种过程——作为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它在边缘上不断进行着这种变化和变位。这些过程不仅产生了各种具体的问题和要求,而且增强了更广泛地参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要求,而边缘的这种要求参与这样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大都表现为要求加入中心。

这种现代政治秩序的模式,即使在西欧也不是一致和统一的。但是,与(西)欧洲以外的社会中产生的后传统的政治秩序相比,它又是相对一致的,至少在理想形式上如此。这些秩序已经确定成形,它与欧洲的"最初"模式相比显示出好几个不同之处,尽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一些最初的现代性模式确实受到了欧洲模式的影响。

现代化传播到俄罗斯帝国和日本帝国以外的时候,一开

始人们就可以分辨出它的差别。在这两个帝国中，这种新型的政治秩序已经产生，反过来它们成为进一步传播现代性的模式了。

不过，在许多并不采纳任何这种模式的国家中，可以在形成后传统的政治秩序时，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些差别。这些国家主要是指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的各个国家。可以用最普通的话来说，常常在这些社会中形成中心的是以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的家长式专制统治”为特征，也就是新的政治和行政中心结构的建立和延续具有一种保持传统象征或现代象征的外部内容的趋势，却没有同时对它们保持任何强有力的支持。这样的中心往往表现出几乎是唯一关心如何保住现有的软弱权力结构，从而导致一连串软弱中心的产生。

产生“民族国家”框架的这些政权或类似的政权之间的主要差别可以在许多方面看出来，诸如政党的功能、投票选举和政治参与，等等。这一切往往在所有类型的现代中心产生出来，但它们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却大不相同。

举几个例子就可说明，政党的功能在它们中间有很大的差别。在许多新兴国家中有建立一元化——但不是专制——的政党政府的趋势，说明许多这样的政党在形成某些新的共同的集体认同中，在不同的竞争者之间为获得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看来更像是充当工具的作用，这些竞争者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和(或)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这种斗争看来更多地发生在政党内部而不是发生在各个政党之间。

与此同时，官僚制度看来往往不仅是中心的行政部门，或者是对抗的小群体或其中的小派系，而且是某种共同象征和这种中心的监护者，只要这样的中心可以代表它所能维持的

国内秩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官僚机构可以同政党竞争究竟由谁来充当中心的全权代表。在一定的程度上，这种事实说明一个政党政权为什么很快就会被军人政权所取代，而每一个政权又都保持着前一种政权的某些组织框架和活动。

同样，投票选举和普选在许多这样的政权下只是表示对这种中心的一般的而不是充分表达出来的倾向。它既不像专制制度中那种对政权的完全支持，也不像在许多多元化立宪的民族国家制度中那样表达出具体的利益或意识形态。

这些政权的特殊性质可以从它内部可能发生的危机和崩溃的性质（特别是结果）中看出来。这种危机和崩溃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共同的一般原因和征兆 — 不同类型的上层分子之间的不和与分裂，中央和地方象征之间的分裂，阶级和地区之间的分裂，等等。

这些政权面临的具体危机和问题首先是它们在新的现代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其次是各种较为广泛的社会群体大量提出无节制的要求，而这些要求绝大多数是受到上层分子鼓动的，或随着资源的浪费而提出来的，它们面临着潜在于上层分子和中心内部的不断冲突。传统派的上层分子和比较现代的上层分子之间的大量冲突可以导致危机和问题的出现。许多这样的社会群体以现代的方式要求中心本身具备某种性质及其合法性的基础，这种要求可能使建立任何一种新的、稳定的、有生命力的中心的可能性缩小到最低程度。

在后果上看它们也不相同。在一个有坚强中心的社会里，其趋势更多是这个中心的“整个”突然崩溃——可能导致它在新的层次上重建。

在“家长式专制统治”的中心，这样的不稳定和摇摆往往

会随着人员的调动，局部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活动而继续下去。它们可能导致这种家长式专制统治中心的不断更替，连带着出现经济的衰退和对政治的日益冷漠无情。

不过，在某些类型的后传统的制度内部也存在着许多差异。这些制度之间在政治动员的范围、不同的机构(官僚机构、军事机构、政党等)拥有的相对优势地位、政治团体和种族—民族团体之间的关系、有关社会等级制的观念和社会阶层的组织，以及在它们各自的政府和集体政治界限的相对稳固程度等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八

各种类型的后传统社会秩序之间的差异如何才能解释清楚呢？不用说，影响这些差异形成的因素确实很多，但其中的某些情况似乎特别有趣，也十分重要，可能是值得指出的。

这种情况之一是过去的传统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中存在着广泛的差异。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样，我们已能识别出不同于最初的欧洲模式的差异。例如，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许多部落社会里就已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中心或存在着一种相对一致的种族或民族交流的状态。

即使在帝制的社会或家长式专制统治的社会里，虽然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个明确的中心和国家机构，但是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真正关系与西方传统中的那种关系都被用截然不同的方法来设想。

总之，大多数社会并没有欧洲传统秩序中所持有的帝制传统、城邦传统和封建传统。例如，在俄罗斯和日本那些亚洲

的帝制社会中，多元因素远远弱于欧洲的封建社会或城邦。在俄罗斯，没有哪一个主要社会阶层可以相对自主地加入政治和文化中心的观念，而文化秩序则往往被视为从属于政治秩序。

同样，日本也存在着把宇宙秩序和政治秩序几乎完全等同的观念，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在观念上认为自己应当高度地、几乎无条件地忠于中心，因为中心代表了宇宙一政治的一致性。

在其他许多社会里，包括东南亚和非洲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拉丁美洲的社会，（后来的）现代性力量对家长式专制统治体系进行冲击。在这些体系中，对社会一政治秩序的支持比较弱，在政治秩序和宇宙秩序之间即使存在着较紧密的结合，但它们之间积极的、自发的关系要弱得多。

几乎不能设想它们的政治传统存在着欧洲传统中那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冲突和对立。相反，它们往往强调以宇宙秩序为一方和以社会一政治秩序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和谐的但也总是被动的关系。它们的政治秩序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同于西方传统，不能想象为两种权力实体之间的对立。相反，这种关系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不同的功能在同一组织内部而以宇宙秩序中某个共同的焦点为中心的结合。

九

后传统社会之间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外形，还受另一些因素的巨大的影响，这就是现代性力量在经济的、政治的以及社会组织方面和社会分层方面的历史进程中对各种制度的冲

击。

这种状况也有可能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演变中发生；广泛的社会阶层对新格局下的变化会表现出相当强烈的抵抗，或者相反地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次等上层分子，尤其是比较接近中心的上层分子对变化的抵抗，亦即"传统主义的"抵抗，采用的是军事方式或腐蚀方式；对新格局有高度适应能力的上层分子只主张某几个方面的改革；具有改革能力的上层分子有可能采取灵活的方式，也有可能采取强制的方式。

这种状况可能在不同的制度领域暂时连续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发生，它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会发生巨大的影响。

这些各种各样的结构和时间的差异大大影响到这些社会内部所产生的具体问题的性质，影响到各种社会群体的抱负和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程度，影响到中心上层分子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的某些方面或条件，特别是影响到能使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教育资源用于形成新的制度格局的程度。

这些过程的每种格局往往产生出推动力量，推动社会一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向现代性突破，同时也推动不断的巨大变化。但是，每种格局往往又会产生不同形式的突破，产生不同类型的制度问题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要由这些社会及其新出现的结构去处理，在制度上对不断的变化作出反应的形式。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能力，或者没有能力去处理每一种类型的现代社会或正在现代化的社会所特有的问题和危机。

格局中不同的社会—政治方向和传统;现代化对这些社会产生冲击的性质;以及变化局面的结构。归纳在这三种情况下的各种变量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用来解释后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发展形式,也可以解释任何一个社会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变化的发展形式。

8. 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

奈特·毕乃德

〔编者按〕 毕乃德于1966年当选为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本文是他的就职演说（原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25卷）。他把美国和日本学者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的现代化八项标准应用于中国。一个多世纪以前，对中国和日本熟悉的人中，大多数人预测中国比日本更有可能“赶上”西方。中国的各种行政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成就都表明有更强的适应现代的能力。毕乃德限于分析至1919年以前的时期，从那时起他认为中国的领导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改造中国社会。作者还按日本的经历讨论前现代中国的长处和弱点。

奈特·毕乃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从事他的大部分学术活动，专攻中国近现代史。主要著作有《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学校》(1961年)，并担任《中国文库目录选注》(1971年第三版)的主编之一。

是指真正发生的事情，即非西方国家按照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选择了西方的某些思想和技术。在使用“西方”这个词时，我就想到从十九世纪初以来西方的影响有两个潮流，一个来自西欧和美国，有时通过日本，它有自己的一种特色，另一个来自俄国，它在近年来不断地增添了中国的色彩。

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重大革新起源于西方。这些国家必须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而外部世界基本上是由西方国家形成的，以满足西方利益，这一事实意味着新兴国家尽管由于地理上的差异和它们的文化传统不同而出现很大的差别，但它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特征。最有趣的问题之一是这些国家未来的发展究竟是更多地受到传统的和本地的因素的影响呢，还是更多地受到它们共同向西方借鉴或彼此之间的相互借鉴的影响。但是，现代化过程不仅正在新兴的独立国家中进行，甚至在十九世纪开始变化的国家里也在进行，因此，现在想回答这个问题为时尚早。有关现代化的许多讨论造成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不一定是一种固定状态，也不固定在某一时间。今天被认为是现代的东西到明年也许就不再是现代的东西了。

迄今为止，有关现代化的大多数学术分析一直在一些具体学科的界限内进行。鉴于学术界的分科增加，当前的学者们不愿因概括超出他们自己的专长而受到其他学科的专家们的批评，这是可以理解的。毫无疑问，它的优点在于促进各个学科在分析方法上的准确性和成熟性。但它也有一些缺点。由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增加对一种文化的某些特殊方面的令人难以对付的证据上，忽视或没有充分考虑其他并非不重要的证据，结果往往有歪曲整个情况的可能。这样的歪曲也许是不

点开始进行讨论，按照学科安排讨论时提出的更详细的特征和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一些有关现代化的一般定义，指出了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八项一般特征。箱根会议提出的这八项特征是：

1. 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

2. 使用非生命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广泛的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加。

3. 社会成员在广大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广泛参与。

4. 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

5. 全面推广文化知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

6. 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

7. 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以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

8. 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国际关系）。①

在箱根会议取得一致同意的现代社会特征似乎对日本比

---

① 詹森：《日本对待现代化态度的变化》，第19、27页。对于霍尔教授提出的标准我作了次序上的改动，最初达成一致意见的是有七个特征的一张表，在这基础上添加了第八个特征，作为第四个特征插入。秋加滕提出"对某个社会中的'现代'成份所做的概括"可以称作"征候的一组表现"，以说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任何其他国家更切合,因为提出这些特征的人最熟悉日本的经历,但是在我看来,把它们应用于其他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也有意义。这种做法有两点好处。第一,学者们现在专心致志于研究某种单一的文化,由此产生了狭隘的眼光和偏见。这样做可以迫使他们脱离这种偏颇,而且可在那里寻找他们并不希望发现的发展或者发现由于忽视而被他们把其重要性贬低到最低程度的发展。这样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更充实些。第二,这种特殊模式在别的地方可以受到检验,旨在确定其中哪些部分是普遍起作用的。

对于箱根会议提出的现代社会定义中的一些细节,我并不完全满意——我猜想参与提出这个定义的大多数学者经过进一步研究后是会赞成作一些修改的。尽管如此,我认为值得把箱根模式应用于191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概括和尝试性的调查。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有些武断的年份是因为我认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过去对传统文化中比较明显的缺陷大都是极为分散的反应转向广泛和积极的决心,决心要创造一个"新中国"。

从我阅读的有关现代化的经济著作中(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喜欢使用"经济发展"一词),我觉得在箱根特征的第二条上还应当加上一句话,即"人均资本的大量增加"。此外,我认为在考虑现代化的时候,还必须把一些注意力放在价值观念的变化上,这个词同现代化一词同样模糊而难以解释清楚。我赞同印度尼西亚历史学家苏约莫科的看法,即我们是那么注意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资料,以致往往忽视在人和社会中起作用的强大的诱发力量。由于八个箱根特征中几乎都涉及

到了价值观念的重大变化，所以把它当作现代社会的一个单独的特征或许不符合逻辑。可是，价值观念在这些类目中常常被忽视，所以我最后要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体系中发生的根本变化究竟有多么深刻？

我现在回过头来非常扼要地把现代社会的八项特征应用于考察中国在1919年以前的发展，看看能够得出什么初步结论。

“1. 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

虽然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生活在农村里，但在整个王朝时期已有城市，尤其是过去一千年中城市很多，规模也大。然而，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甚至在1919年之前的八十年里，有些城市人口大大增加的明显事实也未必能证明1919年居住在城市里的中国居民所占比例远远大于八十年前或八百年前城市居民所占的比例。

以城市为中心的情况看来可以用社会里农村人口对城市部分的依赖程度来衡量。在传统的中国，这种依赖性比较弱，也无法说明1919年前的几十年中这样的依赖性有所增强。据说，在二十世纪初，由于国外进口的或通商口岸和其他城市的

现代工厂生产的棉纱和棉织品的竞争，农村中纺织棉花的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在1880年和1919年之间，棉纺织品的进口数量确实大幅度上升，中国在这个时期建立的将近五十家棉纺织厂的产量一定很高。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产品向农村渗透的程度究竟多大，因此也不知道农村对城市依赖程度是否增强。据说，这个时期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找到工作的农民越来越多，农村对城市的依赖程度已经增强到这些迁入城市的居民所得的一部分收入要用来帮助养活他们在家乡的家庭。不过，这部分人与中国整个农村的人口相比，数量是很少的。

以城市为中心的情况在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村人口在思想、信息和发展方向上对城市的依赖。虽然恰当的资料几乎收集不到，但在我们考察的这一阶段中，我猜想这样的依附随着交通的改进会有一些增加。

“2.使用非生命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广泛的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加。”

人力劳动过多和资本短缺，直到今天仍在阻碍着中国减少对有生命能源的依赖。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外国人将固定式蒸汽机引进上海，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在中国沿海和内河各港口之间经营汽船运输。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南京、上海、福州和天津开办兵工厂和造船厂时，政府直接支持使用蒸汽发动的机器，而在以后二十五年中，开明的地方官员建立了一条汽船航线、两条短程铁路、两个现代采矿企业和一家钢铁厂。1882年，外国人在上海安装第一台发电机。1890年，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在广东的一家工厂里设立发电厂。

虽然中国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建立了几家使用电力的

棉纺厂和缫丝厂，但是，中国近代轻工业主要是靠外国人积极推动的。马关条约(1895年)签订后，日本获得了在通商口岸开办工厂的权利。西方列强按照对华条约中最惠国的条款也要求获得这种权利。私营的外国工业和中外合营工业一度迅速扩大，主要是在上海，大部分生产棉纺织品。中日战争以后又出现了铁路建设的高潮，几乎全部铁路都是靠给予外国的特许权和靠借外债来兴建的。1905年，日本人打败俄国后，在中国东北的南部开办采煤，炼铁，制造豆油和其他一些机械化的工业。

1900年以后，中国自己的现代消费品工业也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大部分是在租界，甚至在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工厂里也开始使用非生命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进口商品断绝，中国的工业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进口车床的价值从1913年的3.6万美元上升到1920年的62万美元，进口纺织机器的价值从1913年的61.2万美元增长到1920年的420万美元。虽然不能说蒸汽、电力和煤气能源到1919年已经显著地取代了中国一直依赖的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但一个强有力的开端已经出现，受国外影响较大的各省尤其如此。

前现代中国的资本基本上投入土地，因为比较安全。还有高利贷，获利快，利润高。有的资本投入建筑房屋，购置衣物和艺术珍品，有的用钱来提高声望，过舒适的生活。即使最成功的商人也宁愿将利润投入这些东西，因为商业和制造业会遇到种种麻烦，其中包括政府的强征暴敛和腐败官吏的敲诈勒索。中国的经济是循环流动的经济，其中的资本积累相当少。

在1919年以前开办的现代企业中，大部分资本来自国

外。但是，与外国公司合作的中国买办和一些独立的中国商人大都在通商口岸的庇护下开始创办自己的现代企业。事实上，他们的利润为李鸿章和张之洞在 1872 年与 1900 年之间开办的“官督商办”公司提供了大量资本。无论是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还是私营公司，资本积累都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中国股东们要求很高的红利(这些红利很少对生产企业进行再投资)，这样折旧费用以及为经营的发展或扩大再投资的利润便没有了。即使外国公司在中国有大量的利润再投资，1900 年以后华侨投资也日益增加，但是，这些为中国经济带来的好处，或许又被中国政府对外国政府应缴赔款和偿还外债的巨额支付所抵消。一些开发资本来源的现代方法虽被引进中国，1900 年以后政府也至少在形式上鼓励现代商业和工业，但没有根据可以认为到 1919 年人均资本有显著增加。

在 1919 年以前的六十年中，使用蒸汽或内燃机的船在中国沿海以及许多河流和运河中的航运有所发展，将近有七千英里铁路的建设也大大加快和扩大了商品流通。1919 年，中国进口的货物价值近 5 亿美元，现代工厂的产量也稳步上升。虽然这些商品大部分运往很少的几个城市及其附近地区，但我们从一些分散的资料中可以知道，有些商品最终还是运到农村去的。现代的交通运输也增加了传统产品的流通。现代交通运输速度较快，价格较低，促进了可以获得现金的经济作物，农村手工业产品有所扩大，用以运往国内其他地方和国外。因此，到 1919 年，商品的流通已经增加，尽管进一步发展还有很大的余地。

西方商人把他们自己的服务设施带进了中国，诸如银行、保险、货运和市场推销方法等，还有会计和合理化管理等业务

技术。中国人自己早就发展了这样一些服务业，但只是在相当简单的层次上。传统的钱庄办理银票、本票和汇票，兑换资金，经营国内汇兑，但他们还没有建立有制度的信贷机构，以接受储蓄并向生产企业贷款。中国商人早就有了承担货运风险的手段，但没有像在欧洲通行的那种细致的航运保险制度和其他类型的保险。遍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有庞大而效率相当高的水上运输系统，而由速度较慢、不集中和费用昂贵的车运、畜运和人力运输来补充。企业管理保守，一般与所有权联系在一起，记账方法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是合适的，但不大灵活。

西方人在通商口岸开办银行，经营保险公司。他们的轮船提供了各个港口之间可靠而快速的货运和客运，他们在中国内地积极地为现代制造业促进市场发展，并为出口和向中国其他地方销售而组织收集品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商品。外国商人与中国买办——有的是雇员，有的是代理商——一道经营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大量业务。这些买办必须学会西方的管理和簿记技术，使之适合中国的情况。这些买办或他们的后裔有许多最后成为独立商人，主要是在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分经营。

事实证明，传统的中国钱庄不能满足对外贸易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和现代政府财政的需要，结果这些业务最初基本上让外国银行来办理。中国最早的一家现代银行开办于 1896 年，到 1919 年已有两家半官方的大银行和五十六家完全由中国人所有的私营银行。但在那时，外国银行和中外合办的银行仍然控制着银行业，就像外国保险公司仍然掌握着中国的大部分业务一样，尽管早在 1875 年，中国已经开办了一家自己的保险公司，后来又开办了其他一些保险公司。中国

轮船招商局从1873年以来已在经营，还有几家较小的中国轮船公司，但英国、日本和美国的航运公司在1919年仍然支配着中国沿海和内河大港口之间的航运业。

中国政府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建立了海关，基本上由外国人管理，有效地管理着商品进出口的现代征税制度，并且采用了现代的港口管理方法、领航服务和助航制度。1896年，中国政府开办了第一所现代邮政局，取代中国私营商人经营的旧式和根本不足的邮政服务。据说，中国的邮政机构到1919年已经同世界上任何地区的邮政机构同样有效和新式。

“3.社会成员在广大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广泛参与。”

中国一直存在着某种流动：官员不得在家乡地区担任公职，政府的各级官员候选人必须通过乡试、省试和京试；军人和役卒由政府调遣；商人和运输工人在外乡工作；在经济和政治的大动乱时期，被逐出家门者到边远地区或海外去谋生。除了这些例外的情况，中国人一般只到附近的城镇，不会到更远的地方去冒险。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里，由于有了比较廉价和快速的运输工具，地理方面的流动性有所增加，尽管这样的流动很难衡量。正在现代化的城市，特别是上海，从内地吸引了人数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小康之人。年轻人涌向城市或出国接受现代教育。日益增长的国内外贸易需要数量较多的商人来往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前往满洲、内蒙或东南亚，有的短期逗留，有的长期定居。但在1919年，住在交通干线以外地区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除了在本乡的市场地区外，与外界不发生什么

定，官吏的后代除非能在科举考试中考中，一般不得保留上层阶级中的地位，因此，也存在向下降的社会流动。从古到今，官吏的地位一直是最有抱负的中国人奋斗的最高目标。但是，到了 1919 年，医生、律师、工程师等现代职业以及在现代商业和金融业中的领导地位已被开始认为具有同样高贵的社会地位。随着自我改善地位的新机会在他们面前出现，空间流动性增强，社会流动的速度也加快了。

不论属于哪个阶级，传统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是家庭。个人对家庭承担的责任高于其他一切义务。家族是最大的亲缘群体，虽然中国有些地方的族系与其他地方通行的程度有所不同。家庭和较小的已经扩大的家庭群体行使着政府一级以下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礼仪的职能。由于传统强调孝道，家长对晚辈亲属施行完全的控制，而且长幼有序通行于全社会。然而，年轻男女向城市迁移，并在现代商业和工业中获得职业，减轻了他们对家庭的经济依附，摆脱了长辈的监督。与此同时，现代教育引进了西方观念，诸如个人自由、男女平等、进步的必然性等等，这又进一步削弱了家庭的权威。年轻人组织起来反抗旧的家族关系的运动实际上在 1919 年才刚刚开始，变化还不很明显。其他传统的社会群体，例如秘密会社以及在一般性的集市社区内以寺庙和茶馆为中心的不太正式的会社，直到那时基本上还没有受到触动。

经济的、政府的、教育的以及中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现代化，都需要加强个人的专门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试图让官吏阶级的成员进入专门培养外交人员的学堂接受教育。这种做法由于任何官吏都必须受一般经典教育而失败了。但是，到 1900 年，这种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到 1919 年，人们已经普

播。

实际上，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几百年来基本上就对周围的环境持有世俗观点，现代科学的作用只不过是把它强化罢了。另一方面，大量不识字的农民，或许部分是由于他们更容易受到自然变化的伤害，对他们的周围环境不大有世俗化的看法，到1919年，情况依然如故。

“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

几百年来，中国的主要城市一直靠石子铺设的道路或者靠自然和人工的水道连成网络，到最近一百年，城市之间的交通才有发展。前面已经提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轮船侵入中国水域，而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铁路也进入中国内地，提供了廉价和快速的交通运输。1881年电报开始被采用，并逐步传播到了全中国。到十九世纪与本世纪之交，现代邮政设施也有了迅速的扩大。

十九世纪末以前，即使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生活圈子以外的事情也极少知道，消息的唯一来源实际上只有小商贩和少数旅行者，有时也通过朋友之间的书信来往。因此，报纸的引进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大事。虽然甚至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零星地出现了传教的期刊，但中国的新闻业可以说是1858年和1862年分别在香港和上海开始的，此后才逐渐发展到其他城市。最早的汉语报纸是外国人把英语报纸作为单行版发行的，或者作为独立的冒险赚钱的事业，有的则由新教传教士发行，尽管中国的出版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开始进行竞争。

报纸的发行量最初很小，但自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对改革的兴趣增加，这就大大推动了对报纸和杂志的阅读。在

十九世纪和本世纪之交，少数报纸使用白话文，但绝大多数报纸仍用文言文，所以只有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才能阅读。1917年北京大学发动国语运动以及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国语才向全国推广，几乎所有的杂志和大部分报纸都开始用白话文。即使到了那时，识字的人所占比例还是那么小，以致期刊杂志虽然可以说已经构成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网络，但还不能把它们看作大众媒介。

"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以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

前现代中国唯一全国范围的组织机构是王朝政府，其中省、府和县的官吏以及中央政府的官吏，构成了在皇帝统治下一体化的官僚制度。地方政府由地方各界领袖管理，其中有大地主、退休官吏和其他文人，只要税款能征收，秩序能维持，业已确立的习俗能坚守。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古老的制度就像它所支持的传统一样，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清王朝末年进行的调整也无法阻止王朝的崩溃和帝制的灭亡。取而代之的"共和政体"也很快地消失了。到1919年，控制中国的是分散在各地的地方军阀。他们得到了从旧政权留下来的官僚的帮助。当时，作为现代政府一致公认的特征，即官员的专门化，才刚刚开始明显。

传统中国的另一种政治组织是秘密会社。它们是由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以便相互保护，并且往往在地区联盟中统一起来。在王朝衰落时，秘密会社领导反抗不良的政治和反抗政府压迫，他们都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1912年前不久曾经领导反清运动的同盟会，与其说是个政党还不如说它更像秘密会社。到1919年继续存在的老式秘密会社比所谓的新型政党更

有力量，影响也更大。那些新型的政党仍然只不过由一个领袖及其追随者组成。

传统中国的经济机构比较简单。在城镇中，各种行业由行会组织起来，这种行会中包括企业家和手艺人。农村贸易在城镇领导下定期举行集市。清初，有两类商人得到政府给予的专卖权，即食盐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有些商号在广州与外国人经商。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人创办的早期现代工业组织成"官督商办"公司。这些公司在高级官吏的庇护下经营，其部分资金由私人投放，另一部分则向政府机构借贷，通常由拥有官职的股东代表管理。

在通商口岸，外国商行和中外合资商行的组织和经营几乎完全仿效西方，也有些适应中国的情况。大多数在这些地方的中国商行与其他地方的中国商行一样，即使有几十乃至几百名雇员，也都是些家庭企业。1900年以后，股份企业不仅在通商口岸而且在其他地方都有增加。1902年在上海开始成立中国商会。1919年，行会制度仍在各地通行，工会组织尚未出现。总之，中国经济机构的现代化也只是刚刚起步。

"8. 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国际关系）。"

自从秦始皇建立帝国以来，中国在大约二千二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即使在间断发生政治动乱的间歇时期也依然保持着文化统一，那是以一种共同的书面语言、共有的价值观念以及丰富传统的自豪感为基础的。但自十九世纪末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首先是孙中山，感到不满，由于中华民族还不够统一，民众对家庭和地区的忠诚

族内部孝敬父母和辈份关系的需要来规定，也由符合古代礼仪关系的典章来规定。传统的价值观念显然是支持政治和社会现状的。

十九世纪下半叶鼓吹改革的大部分中国人只关心用什么手段来制止欧洲人的侵略，并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借鉴只是要想加强而不是要想削弱传统的价值观念。康有为对中国显然越来越没有能力对付西方的挑战而忧心忡忡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试图变法，把孔子重新解释成为一个改革家，结果遭到了几乎所有更加保守的同僚的反对。

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受到即将解体的威胁，促进了后来对现存传统信念的动摇。1905 年，中国废除了儒家的科举制度，把传统学校改变为现代学校。1911—1912 年清朝和王朝制度的崩溃更是致命的打击。在二十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特征是意识形态的混乱，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恪守旧的信念和规范。传统价值观念的幻灭在年轻知识分子中传播得特别快，他们把观察祖国的状况与学习和研究西方的思想和理想结合起来。1911 年，梁启超大声疾呼，反对留恋过去的不散阴魂。1917 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发动新文化运动期间，提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以及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胡适要求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他认为文言文再也不能产生现代的文学了。

到 1919 年，传统理想对于现在和未来是否适用，许多中国人已经产生疑问。这种倾向是非古的倾向，随之出现了一种几乎是疯狂的对新的价值观念的追求，以取代正在被抛弃的传统价值观念。这样的倾向在 1919 年后迅速发展。

把箱根会议提出的有关现代社会的特征应用于1919年以前的中国，我认为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我们还需要对那个时期的中国懂得更多，才能真正有把握谈论中国。在本文论述的许多观点中，我们不甚了解的东西远远多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困难并不在于史料的缺乏，而在于已经搜集起来并加以分析的有关资料比较缺乏，幸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在从事中国早期近代史的研究，正在弥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不仅历史学家努力工作，而且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也正在投身于历史研究。

我的第二点结论是，1919年以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既是有限，又不平衡。最深远的变化可能发生在交通运输方面。它不仅有助于人和货物的更大流动，而且也有助于思想的更大流动。中国的国际关系、政府体制（除地方一级外）和教育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到1919年，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特别是在年轻一代，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在沿海和长江中下游的一些省份里，现代商业和工业以及有关的服务业已经在大城市中发展，并越来越多地使用非生命能源。不仅如此，城市已经有些成长，城市集中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强。新教育、新职业和新技术提供的机会多少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不过，在旧的家族体系中或在大多数其他传统社会和经济群体中，几乎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识字的农民群众——的生活同过去相差无几。

到1919年，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已经铺平，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和社会的某些层次上已经沿着这条路迈出了重大的几步。但是，前面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第 三 编
社会的转变

在今天的一百四十八个主权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经历了从前现代社会向高度现代化社会的根本转变。无须对这种转变的各个阶段作严格的定义，就可颇有把握地估计，不超过五分之一的世界人口达到了比较高的现代化水平。对于这种转变的一种衡量方法是这五分之一人口的生产占世界总产值的五分之四。

对于已经发生了这种转变的国家目前还只能提出有限的根据来对这一过程作出概括，因为这个过程当前正在影响着更多在价值观念和制度上有很大差别的民族。分析家们必须尽其可能利用现有的资料，归纳出已经相对先进的国家的共同经验，有些现代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已经把差异很大的传统中的许多重要成份融入，而有些价值观念和制度看来却又是普遍有效的。在这两者之间要加以区别。例如，政治制度可能是属于前一类，而教育水平则属于后一类。

在转变的进程中，某个社会的领导人和大多数居民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受

到不容怀疑的各种未知力量的主宰转变为主张用巨大的资源去揭示自然的奥秘使之为人类利用。1632年,伽利略在死刑的威胁下被迫宣布放弃新的科学思想,现在,爱因斯坦由于他的革命性发现而获得最崇高的国际奖,这标志着今天的先进社会已经经历过三个世纪的漫长路程,科学和技术的下断革命已经成为现代的基石。只要知识继续进步,社会就有希望发生变化。

执行推动社会转变政策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私人机构,所负的责任已经增加。国家、地区和地方行政体系的财政预算在早些时候吸收的国民财富不过是一小部分,现在却吸收了国民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例如美国政府的开支1900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2.5%,1970年已增加到34%。社会可能会达到高度的一体化,无论像瑞典和苏联那样通过国家机构发挥作用,还是像澳大利亚、瑞士和美国那样通过私人机构来发挥大得多的作用。公私机构在政治集权化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完全是文化传统和政策的产物,也是发展水平的结果。私人机构(银行、企业、运输系统)并非不比国家机构更关心取得对社会的控制和协调。在许多国家中,大多数人从生活在孤立的社区几乎不与政府接触的情况转变到今天的情况,其间不过一个世纪。在今天的社会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公民都为了纳税、社会治安和服兵役等目的在好几个政府部门里登记并对它们负责。

在现代化过程中,只有少数与经济生产的结构和经济增长有关的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如此之大。表1以数字为根据,说明经济发展的水平,揭示了这个转变所涉及的范围。

表1的数字用表格的形式充分说明了低度发展和高度发

展之间的巨大距离。但是,决不要以为这样大的差别一定表示它们同今天高度现代化社会之间的距离。今天许多最欠发达的国家在某些方面比16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期的美国和日本还要贫穷。一般说来,最发达的国家是那些在开始现代化以前就已具备最好基础的国家。

表1　经济发展水平

	低	高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1973年美元计算)①	200—300	4000—6000
能源消费(人均煤当量公斤)②	10—100	5000—10000
劳动力就业(百分比)③		
农业	85—95	5—10
工业	5—10	30—40
服务业	5—10	40—60
各部门占国民生产(百分比)④		
农业	40—60	5—10
工业	10—20	40—60
服务业	20—40	40—60
终极用途占国民产值(百分比)⑤		
消费	80—85	55—60
资本形成	5—10	20—30
政府开支	5—10	25—30

资料来源:

①布洛克:《世界经济的政治计算》,见弗利希尔斯,1974年,第80—85页。

②《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纽黑文,1972年(第2版),第326—328页。

③同上,第329—337页。

④同上,第338—340页。

⑤同上,第1版(1964年),第56—59、166—177页。

表 2 说明了社会流动水平的指标，它证明社会流动方面的差距并不特别小于经济领域中的差距。虽然这里选用的指标只限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这个范围，但它说明了一些国家只要经历几代人就有可能发生变化的程度。同经济领域一样，今天有最大程度社会流动的国家在一个世纪或两个世纪以前在大多数方面就比现在最欠发达的国家要发达些。

表 2　　社会流动水平

	低	高
城市化(十万人以上城市中人口的百分比)①	0—10	50—70
教育②		
中小学(适龄组的入学比例)	50—20	90—100
高等教育(每百万居民中的学生数)	100—1000	10000—30000
健康状况③		
新生儿死亡率(每千出生儿童的死亡)	150—500	13—25
食物供应(人均每日卡)	1500—2000	3000—3500
医生(每百万居民中的医生数)	10—100	1000—2400
交流④		
邮件(每人每年投寄国内信件)	1—10	100—350
电话(每千人计)	1—10	100—500
报纸(每千人发行量)	1—15	300—500
收音机(每千人台数)	10—20	300—1200
电视机(每千人台数)	1—50	100—350
收入分配(按收入的百分比)⑤		
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居民	8—10	4
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居民	40—50	45
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五居民	20—30	20

资料来源：

①《世界政治和社会指标手册》，第 219—221 页。

②同上，第 225—231 页。

③同上，第 253—262 页。

④同上，第 236—248 页。

⑤克拉维斯:"收入不平等的世界",载《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第409期(1973年9月),第61—80页。

遗憾的是,表中没有关于人类个性转变的比较指标。我们只能对教育、大众交流媒介的使用、城市的工业环境和旅游等那些可能改变人际关系方式的程度进行推测。毫无疑问,这样的转变的确发生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社会转变完全按人类环境的改善来描述,那是错误的,尽管这是一种能为大多数参与者看得到的方法。为这个转变而付出的代价也是很高的。许多价值观念和制度在被充分取代之前已经遭到破坏,为了力图摧毁旧的帝国并把各民族统一在民族国家内而引起的政治分裂,使千百万人的生命丧于战争。许多人承受了经济增长的负担,却没有分享到它所带来的利益,千百万的人脱离了前现代社区中那种亲密的人际关系,转到了城市和工业的冷漠无情的生活中,就有一种疏远感。贫困和失业,犯罪和精神病态也是为社会转变付出的一部分代价。

9. 法国的现代化经历

伯纳德·E·布朗

〔编者按〕 伯纳德·E·布朗是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政治学教授，著有《比较政治学的新方向》(1962 年版)和《戴高乐的共和国：追求统一》(合著，1963 年修订版)。

本文是提交给 1968 年 9 月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的论文，经略作修改，刊载于《世界政治》，第 21 卷，第 3 期(1969 年 4 月)，第 366—391 页。它以法国为例，既批判当前的现代化理论，又分析了经历过向先进工业化巨大转变的较早现代化社会。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作者认为法国的经历比美国和英国更为典型。它经历过的问题很可能在其他社会出现，因为法国领导人和新兴的发展中社会的领导人一样，在基本制度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

代的价值观念是科学的价值观念。政治统治由理性的原则来证明其正确性，而不援引君权神授或世袭的原则。

现代化意味着至少是上述各种因素之一的特殊变化，从而引起其他范畴的相应变化。社会系统所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即各部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凡是浸透了法古精神并由巫师来作出权威性决策的社会，无法维持大规模的工业经济。相反，先进的工业经济一旦出现，思想和科学的习惯以及机器生产的纪律就与封建的社会结构互不相容。这种说法是非常明白的，正如托尔斯坦·凡勃伦在一部创新的著作中指出的那样，技术水平的变化并不会立即引起相应的社会变化，这是现代化研究者所忽视的。新兴的社会阶级模仿比它们"较好"的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观点引起了一种不协调的调子。[1] 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松散的，但又确实存在。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联系，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当作一个过程来讨论。

查考一下这方面的文献，就可看出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了加强对这两种类型的对比，"传统"的模型往往被说成是那么原始，以致只能与部落社会和史前的欧洲有关。比如说，在西欧和北美，具有现代形态以前的那种传统社会，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十分复杂的，与其说它们是传统性的理想类型，还不如说它们更接近于"现代性"。这种极端的类型划分也

---

① 凡勃伦：《闲暇阶级理论》，1899 年。凡勃伦在《企业理论》(1904 年)中讨论"机械的纪律"时出色地说明了技术对社会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影响。一般的观点认为任何社会系统中的上述因素是相互联系的。但威尔伯特·S·穆尔是个例外，他强调社会结构的松散性。见穆尔：《社会变化》，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3 年。

混淆了传统社会之间的重大差别。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在其有关法国、英国和美国的著作中对这些差别已经作了卓越的论述。从分析的角度来说，以两极对比为基础的理想类型是有好处的，因为它可以为观察者提供一份一览表，或者作为一种方法，把注意力引向任何社会系统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其不利之处在于这种划分可能会自绝其路。它使观察者不去谋求借助于类型的划分来掌握政治体制的内在逻辑，而是可能把全部精力用以寻找与事实无关的类型学的抽象逻辑。

无论类型学会在计算和逻辑方面多么美好，政治学家们都可能对研究工作的成果感到关注。现代化理论能够深化我们对政治生活的认识吗？在研究组织中现代化理论会造成什么分歧吗？它有解释力量吗？回答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事实上或许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运用现代化理论去研究个别的政治体制。本文将以法国的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案例。在现代欧洲的发展过程中，法国的重要性是无须争辩的。法国对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贡献也是无可置疑的。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三位富有想象力和老练的观察家，即C·E·布莱克、塞缪尔·P·亨廷顿和斯坦莱·霍夫曼怎样用专门的现代化理论去研究法国。[①] 综合起来，他们的著作提出了法国从国家的形成通过后期工业化进入现代化历程的全面观点。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政治学中有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1966年；亨廷顿："美国与欧洲的政治现代化对比"，载《世界政治》，第17卷(1966年4月)，第378—414页；霍夫曼："法国政治共同体的矛盾说法"，载霍夫曼编：《法国研究》，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63年，第1—117页。

得较早(英国在1649年到1832年,法国在1789年到1848年),现代性的重大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在现代阶段上,它们的疆域和人口都有非同一般的连续性。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进入现代阶段后相当稳定。然后布莱克教授又论证1832年到1945年是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变时期,而1848年到1945年则为法国的转变时期。从1945年以后,这两个国家都进入了社会整合时期。

这种分析强调英国和法国现代化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主要差别只在于英国较早地让现代的领导人掌权,工业化也早一些。布莱克承认法国人从未达到英国人那种政治一致的程度。但是他指出,法国有秩序地发展的基础是1802年的拿破仑法典所设置的现代制度框架。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法国尽管在政治上不稳定,"但法国在一代又一代由大学培养出来的许多老练文职官员的治理下在行政方面经历了比较渐进而稳定的转变。"①

布莱克教授提出的七种型式的类型分析法为比较和评价世界上政治现代化的全过程提供了一种令人振奋的方法。但这种方法专门用于分析法国时却产生了好几个问题。法国现代领导权是否在1789年第一次得到巩固?布莱克的分析意谓这个阶段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在英国出现了。谁也不会否认英国的内战或法国的革命都具有的重要意义,它们是英国和法国政治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政治制度的形成和达成意见一致的发展方面,尤其如此。但是,在一切方面都有着如此紧密联系的英国和法国,却在政治现代化上相差了一个世纪,

①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第109页。

那就显然难以令人置信。英国和法国在十七世纪的过程中都出现过同一类型的挑战——基本上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能力又不愿意继续承受大大扩大了的专制君主机构的沉重负担。事实证明,法国的君主制在当时更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因此能够克服困难。尽管英国在十七世纪出现政治动乱,法国的改革家获得成功,但是看来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期间,这两个社会有同样的发展。德·托克维尔在他的那部经典著作《旧制度和法国革命》中曾经指出,国家的整个政治、行政和社会结构早在大革命以前就已转变。他在一段著名的文章中写道:"任何革命的爆发与机会无关;虽然它使整个世界为之震动,却是长期酝酿的必然结果,那一过程是经历了六个世代的间歇性作用而导致的突然爆发和猛烈的结局。即使它没有发生,旧的社会结构或迟或早也终将在各处解体。"① 新的政治领导无疑是在1789年出现的。然而,早在那以前,新的社会力量已经涌现出来,并开始参与政治系统。

另一方面,布莱克教授在论证时,说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传统制度对现代功能的相对有秩序的与和平的适应",这也许夸大了两国之间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情况确实如此。今天法国的"现代程度"大致上与英国的相同。事实证明它的传统制度(至少从法国大革命和制订拿破仑法典之时起)可能是适应的。但是,这个观点对于理解法国的发展有什么用呢?确实,法国已经现代化,但是法国现代化的步伐,由现代化产生的新社会群体进入政治体制的方法以及国家在进一步推动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都是十分不同的。

---

① 德·托克维尔:《旧制度和法国革命》,纽约州花园城,1955年,第20页。

有人认为名人集团尽管表面上进行着政治争吵，但实际上在管理着法国。这种论点是易受攻击的。对决策过程的研究认为法国同一切有复杂议会制度的国家一样，文官制度本身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主要的利益集团创造了特殊的渠道去获得官职，也可进入议会，从而在整个政治系统中造成了影响和权力的“漩涡”。例如，关于国家对甜菜生产者和酿酒厂给以津贴的争论中，法国文官之间发生了分裂；农业部的官员一般主张给予津贴，但财政部的官员一般持反对意见。于是，争论双方各自形成了自己的联盟，其中有文职官员、利益集团、立法议员和党派领袖。法国的文官制度过去一直获益于吸收才能卓著的人，但它从来就不是一股统一的政治力量，也从来不能解决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法国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对照，因为在那些国家中，对于根本的政治准则和政治制度是有普遍一致的意见的。①

塞缪尔·P·亨廷顿在他的研究美国和欧洲政治现代化的著作中，对法国大革命前的那个时期进行叙述，使我们把注意力特别集中在这个时期。他论证说，现代化包含三件事：权威的理性化（传统的政治权威被某一个单一的、世俗的国家权威所取代），专门化政治结构的发展，以行使专门化的功能，还有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参与。亨廷顿评论说：“在欧洲大陆，权威的理性化和

① 参见让·梅诺：《法国压力集团新探》，巴黎，1962 年，第 249—250、279 页。他把法国的政府体系描述为彼此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的权力中心体系。一些个案研究指出了法国决策过程的多元性，见库特罗：“1959 年 12 月的学校立法”，载《法国政治科学杂志》（1963 年 6 月），第 352—388 页；里马雷和塔维尼埃：“农业指导法补充法案的起草和表决”，载《法国政治科学杂志》（1963 年 6 月），第 389—425 页。又见布朗：“法国”，载克里斯托夫编：《比较政治学释例》，波士顿，1965 年，第 129—206 页。

结构的分化是十七世纪的主要趋势。"他把黎塞留、马萨林、路易十四、柯尔培尔和卢伏瓦称作"伟大的简化者、集中者和现代化者"。[1] 此外，十七世纪出现了国家官僚制度和常备军的成长和合理化。因此，到 1700 年，欧洲大陆在两个重要方面已经发生了现代化的过程。虽然新的政治领导在 1789 年才上台掌权，但是为走上这条道路已经作了长时期的准备。

把神授君权和世袭君主制看作现代化的力量似乎有些奇怪，但亨廷顿解释说，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是一种信念，即人类能够有目的地行动并影响变化。传统社会却渗透着习惯和根本法不变的信念。十六世纪欧洲大陆开始的现代化需要一种新的权威概念，也就是说，要有一个能够作出决策的君主。"其构想之一是新的君权神授理论，它产生于十六世纪末的欧洲。它实际上是一种宗教性的理论，在那个意义上是用传统的形式为现代的目标服务。"由于民众参与政治是以后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因此于七世纪的现代化意味着专制君主制的兴起。"按现代化来说，十七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在功能上相当于二十世纪的一党制。"[2]

亨廷顿对欧洲大陆的发展所作分析是有益，而且是必要的矫正方法。大多数观察家对法国大革命着了迷，却忽视了旧制度的现代化改革。但是把君主制视作现代化的先锋，是把法国的情况过分简单化了。专制君主制既推动了现代化的趋势，也延迟了这个趋势。它摧毁地方领主的权力，是有利于现代化的，但它美化非理性的观念，维持古代的社会结构，将极其沉

① 亨廷顿:"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现代化的对比"，第 379 页。

② 同上，第 384，386 页。

重的财政负担强加在人民头上，则又延迟了现代化。法国在大革命前推动现代化的人中还包括社会批评家。有些批评家要求实行议会控制行政的制度，有些批评家对美国革命表示欢迎，把它当作新的历史时期的先兆。

拥护根本法的人也并不全是反对现代化的人。确实，有些传统主义者呼吁使用根本法去保护全社会的特权。相反，有些推动现代化的人物也试图借助于根本法去保证民众参与政治系统，将根本法置于君主的意志之上。法国和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一样，也运用法律至上的原则来为某些政治目的服务，其中包括传播理性的合法原则。

斯坦莱·霍夫曼在"法国政治共同体的矛盾说法"一文中讨论了法国现代化的后来几个阶段。他以封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这两个熟悉的模式为起点，将法国置于统一体之中。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一个世纪里逐渐出现了一个"共和综合体制"。这个体制在 1878 年到 1914 年之间蓬勃发展。共和综合体制的基础是一种独特的混合体，既不是这个模式，也不是那个模式，而是"旧式农业社会和工业化之间的中间点"。法国的经济既是静止的，同时又是现代的，没有工业革命而发生了工业化。商业阶级采取许多已被它取代的贵族的态度，特别是重视家族的绵延不绝和煊赫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有效的生产。农业部分的地区仍然很大，基本上沿着传统的方向前进。缓慢的工业增长反过来使它难以对工人阶级作出让步，把它看作"社会贫民区群体"。霍夫曼评论说："法国一个多世纪的政治问题造成了一种适应僵化社会的政治体制。"①

---

① 霍夫曼："法国政治共同体的矛盾说法"，载《法国研究》，第 12 页。

的混合物。但这决不是独特的。一切工业社会都是以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为特征。法国的政治体制也不是批评家们所说的唯一的"松散"体制。如果法国的现代化有什么不同经历的话，那也是表现在至今为止现代化出现危机的时间上，表现在现代化各个阶段上大的社会群体的持续异化上。

现代化理论显然不是一根魔杖，它既不能消除研究工作的必要，也不可能使观察者达成普遍一致的意见。然而它确实是组织研究的一种富有成果的方法，可以用来进行政治体系之间有意义的比较。为了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我们就法国的现代化经历，概括以下几点特征：

1. 法国在现代社会以前的传统阶段是封建社会。但是，法国的封建社会比部落社会那样的社会较为先进。它的封建制度中包含一些"现代性"的重要成份。因此，法国的现代化过程是长期而复杂的，它至少开始于十一世纪，甚至还可以追溯到罗马人征服的时期。

2. 在大革命前的一个世纪中，法国的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发生转变。世袭特权的体制至少已有一部分被以财产和个人的贡献为基础的体制所取代。法国大革命是社会长期变化的顶点，到那时变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3. 为封建制度和专制君主制辩护的价值观念早在旧制度下失去了民众基础。政治权威理性化的趋势由大革命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那就是好几个世纪的发展。

4. 尽管法国在十九世纪不断地发生政治动乱，现代性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已经奠定。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时期，已经远远不是僵化的社会了，它已经具有一切现代社会

所具有的特征。

我们现在来更详细地讨论这四个特征。

1. 传统社会

封建制度在人与人之间及属员和上司之间，是一种高度的个人政治关系。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封建领主占有政府的统治权并通过封建领主来行使大部分的统治功能，这些特征使封建制度明显地区别于其他一切类型的组织。"[1]从各个方面来看，封建社会都是"模范"的传统社会。广大民众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或畜牧业，主要的社会单位是家庭，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是个人的忠、孝、勇，国家（至今仍继续存在）是家庭的组织和权力的更大形式。在直接的个人关系方面，封建制度建立在互有的义务和权利的基础之上，并以享有土地权为这种结构的基础。

如果按类型分析列出一张特征一览表，那么，法国封建社会和当代社会之间的对照实际上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历史的进程太复杂了，无法作出这样的归纳。当人们把它置于法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下来看时，封建制度与传统模式之间在若干方面并不接近。首先，整个西欧的封建制是对组织性很强的罗马帝国的衰败作出的反应。罗马的生活方式直到十世纪仍在高卢普遍实行。公民拥有土地和奴隶，必须服从国家强加于他们的种种限制。但是国家后来解体了。中央权威无力保护西

---

① 斯特拉耶："西欧的封建制"，载库尔朋编：《历史上的封建制》，普林斯顿，1956年，第16页。关于法国的封建制，又见布洛赫：《封建社会》，芝加哥，1961年；梯利编：《中世纪的法国》，纽约，1964年。一种极好的综合见图夏尔等：《政治思想史》，巴黎，1959年，第1卷，第155—163页。

欧的居民免受撒拉森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不断入侵。在这些新的环境下，罗马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观念变得过时了。防卫和安全不可避免地成了地方的责任。因此，封建制度与原始的部落社会无法进行比较，而应当把它看作衰落或败坏中的文明社会。这一差别非常重要。在封建制度下，人们对过去那种中央集权总是记忆犹新。法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坚决主张：严格地说，中世纪的法国根本没有封建制度。唯一合法的是君主制，一般都认为司法行政、招募军队和征税的职能是君主制的属性，是向封建权力的让步，或者被封建权力篡夺。① 当环境和战争的技术变化时，卡佩王朝诸国王才有可能复兴社会和民族统一的精神。作为一个政治过程，重建陷于衰落的权威与建立前所未有的中央权威是完全不同的。

最重要的是，十一世纪封建制度的兴起与城市的恢复活力相吻合，这种发展最终使封建制度的元气耗尽。法国最接近典型传统经济的时期是封建制产生前的五个世纪，而不是封建制本身存在的时期。从六世纪到十一世纪，法兰克人显然变成几乎完全从事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在这个时期，手艺人放弃市镇，返回乡村。商业急剧衰落，城市基本上被废弃，市镇管理不复存在。到十一世纪，城市化过程重新开始。城市生活的复兴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处心积虑地想在一个共同体范围内创造一种和平和安全的生存环境；运输和制造的技术革新在经济上使商人和手艺人易于聚集在市镇中；商人的普遍希望是结束游牧式的生活，削弱对地方领主意愿的依

① 洛特和弗迪厄：《中世纪法国制度史》，巴黎，1957年，第1卷前言第8页，第2卷第9页。关于"法国中世纪唯一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的评述见该书第2卷，这是对王权兴起的特别完整的分析。

附。

城市居民在各处都力图摆脱封建领主的统治。随着城市的繁荣并能招募雇佣军，这样的愿望便变得较易实现了。贵族后来发现在有些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有必要向市镇颁发特许状，实际上就是免除它们对封建领主的义务。许多城市公社所依据的显然不是传统的统治理论，而是现代的统治理论。它们是由一部分居民"共同宣誓"建立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平等的而不是上下属之间的协约。"自治市"享有完全的城市自由权，由市民选举代表会议，并委以财政和行政上的很大权力。

城市公民与封建结构互不相容。商人和手艺人靠自己谋生，掌握着钱财，不向领主承担义务，而且善于接受新观念。城市公民同样成为王权的有力支持者，单凭他们自己就能集中大量的资源并充分保证市镇的安全。中世纪的市镇是新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温床，向传统的宗教观念提出挑战，对已经确立的秩序产生怀疑，并且赞扬智力、自由和劳动的性质。①

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并不是稳步的和必然的前进。敌对力量之间的平衡经常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十四世纪经济停滞时期，它导致中产阶级衰落，教士和领主的权力和声望相应有了上升。然而，这个长期的趋势把军事藩属转变为对国王服务的贵族阶级，把契约观念转移到民众和君主的层次上。简言

---

① 关于中世纪的城市化，见穆斯尼埃：《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巴黎，1965 年，尤见第 3 章；韦尔威克："市镇的兴起"，载《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3 卷，剑桥，1963 年，第 3—40 页；阿尔封："工业和商业"，载梯利编：《中世纪的法国》，第 183—192 页；图夏尔等：《政治思想史》，第 1 卷，第 169—179 页。关于城市公民对君主制的支持，见弗迪厄：《法国卡佩王朝诸国王》，伦敦，1964 年，第 199—215 页。

各种方法进入了贵族的行列。国王有权将爵位授与一些有功的平民(通常是大富翁、政府官员和军官)。无论出身是什么，贵族都可享受很大的封建特权，因此，他们拼命要维护这些特权，抵制来自农民、新兴中产阶级乃至国王的压力。1750年以后，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权力一起上升。戈登·赖特曾指出："十八世纪的贵族越来越倾向于进攻和摧毁现状。心怀不满的贵族想要达到的革命目标是要恢复半神话式的中世纪制度，恢复据说是被专制国王及其中产阶级大臣们破坏了的一种不成文法。"①

其余的人口——约占98%——都属于第三等级。在十八世纪的过程中，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内部的兴起非常惊人。他们通过经营工业(如德克雷托、范罗拜、奥贝尔康普夫、雷维荣、迪埃特里克等企业家)、商业(特别是勒阿弗尔、波尔多和马赛的航运业)和金融业而大富。大约有10%的中产阶级能够通过投资和贷款，完全依靠红利生活，无须从事任何王作。由于中产阶级发财致富以后往往购买土地和种植土地，从而重建了中产阶级与农业的关系。据估计，到1789年，法国所有可耕地的25%到30%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大多数小资产阶级从事贸易或熟练劳动，并且通常以公司的形式组织起来。

农民内部也有动荡。1779年，农奴制最后只在少数地区存在，并且在法律土已被废除。农民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他们共占有全国土地的40%到45%。然而，个人占有的土地很少，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农民生活比较宽裕。在农业地区，无地农

① 赖特:《现代法国》，第18页。

一种政治力量;或者贵族可以把新上来的人吸收到自己的行列之中,逐渐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主要成份,从而创立一个大大扩展了的新统治阶级。但是,和平解决已经为时太晚。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尖锐,贵族抵制中产阶级的要求,力图阻止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八世纪的法国具有现代化进程尚未解决的一种政治制度的全部特征。

3. 理性和革命

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是,由于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用来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服务的价值观念也变得更加理性化。或者说,权威的理性化与其说意味着任何因果关系,还不如说它与工业化和社会结构的愈益复杂化同时并进。这种设想在法国的经历中明显地得到证实,因为1789年的大革命标志着大分裂。合法性的形式显然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但是更认真的考察便能清楚地了解,法国大革命没有创立而是强化了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它只是法国社会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在旧制度下的长期趋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它的外壳。

亨廷顿强调君主制在摧毁封建社会方面发挥了现代化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君权神授的理论比封建制度本身更合理,更接近现代。他评论说:“十六世纪在欧洲大陆开始和十七世纪在英国开始的现代化,需要新的权力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君权本身的简单观念。用博丹的话来说,这种观念是指一种‘高于公民和臣民之上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这种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之一就是十六世纪末产生于欧洲的新的君权神授理论。这个理论实质上是宗教性的,从那个意义上

说，是用传统的形式来为现代的目的服务。"[1]

亨廷顿观点的优点在于它提醒人们：理想类型如果脱离了历史背景，就毫无意义。统治者受命于天的观念是传统社会的特征；然而在十七世纪的欧洲，它却是向现代性突破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即使在这里，我们还必须谨防把历史过分简单化。君权神授不是新的理论。法兰克人在征服高卢之前已经将世袭权和选举制结合起来了。战士会议从墨洛温家族的成员中选出一位国王，这个家族可能被认为与神有关。法兰克人征服法国后，墨洛温家族试图摆脱对战士会议的依附，但只取得部分成功。卡洛林王朝和卡佩王朝兴起后重新强调选举制，因为世袭制不可能被援引来作为王朝角逐时代维护合法性的最高原则。一旦卡佩王朝的国王看到权力似已稳握在手，便谋求重新建立君权神授的原则。这一原则到十三世纪已逐渐得到承认，即使在十四世纪好几次出现过由贵族会议选举国王的情况，这种理论至少起了辅助作用。君权神授和宗教奉献的古代统治理论在封建制度下被削弱了，后来因为法国社会的中央集权力量击败了封建制度而使它得到恢复。在路易十四时代，专制君主制取代了封建君主制，在某种意义上便是君主制恢复了封建制以前的君权神授原则。[2]

专制君主对现代化起一定作用的论点也能颠倒过来，这样甚至也许会更正确些。H·R·特雷弗-罗珀用充分的事实

① 亨廷顿："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现代化的对比"，载《世界政治》，第17卷，第384页。

② 关于封建时代的选举和为宗教奉献的原则，见迪泰利：《法国和英国的封建君主制》，伦敦，1936年，第28页；弗迪厄：《法国卡佩王朝诸国王》，第48—49页；迪韦热：《法国的宪法》，巴黎，1950年，第11—17页。

论证，十七世纪欧洲的总危机就是以专制君主制的兴起为来源的。他坚决主张，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是靠牺牲城市的利益而成长起来的。大城市一个个落到了各类君主和国王的控制之下，他们的军事和行政机构是无法抗拒的。君主制有助于推动国家的统一。但是，一旦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宫廷建立起来，它就成了完全失去经济意义的寄生性的机构。挥霍无度和铺张浪费取代了经受考验的商业和工业的原则。君主制成为太沉重的负担了。明智的道路是把这班寄生虫统统消灭掉，回到那种使中世纪城市伟大的生产性生活方式中去。英国的王权进行抵制，却被清除掉了。法国的国王或许是出于走运或漠不关心，允许黎塞留削减王室开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旧体制能有苟延残喘的机会。特雷弗-罗珀认为，"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宫廷到十七世纪已经发展到如此之大，它们挥霍无度，把越来越多的吸血管如此之深地插入社会的肌体，以致它们只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兴旺发达，而且也只能在一时扩大总的繁荣局面。一旦繁荣消失，这个庞大的寄生者必然要动摇"。①

这并不是否定君主制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否定王室行政机构是革新实践中的渠道。但是，简单地使用理想类型是无法理解中世纪的君主制的，也不能认为它是现代化的唯一产生

---

① 特雷弗-罗珀："十七世纪总危机"，载阿斯顿编：《1560—1660年的欧洲危机》，纽约，1965年，第95页。又见罗兰·穆斯尼埃的相反观点，他认为君主制是进步力量，同上，第102页。小巴林顿·莫尔在《独裁制和民主制的社会起源》（波士顿，1967年）中提出法国社会现代化是通过国王发生的。但请注意阿尔弗雷德·科班提出的一种有力的观点。他认为早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的君主制内部已经没有力量对付正在发生变化的环境。见科班："法国神授君主制的衰落"，载《新编剑桥近代史》，第7卷，第239页。

作用者。法国专制君主制的兴起与法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恰好同时发生，但是，反对专制主义也是在同时发生的。

把君权神授和根本法的概念进行对照，似乎后者的特征是静止的传统社会而前者包含着变化的原则，这样也会令人误解。对王国基本法的理论确实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传统的”观点，认为根本法是由历史和上帝创造的，即使国王也没有力量去改变它。但是还有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本法是由人民制定的，人民可以通过三级会议来加以修改。这种来源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显然比君权神授和世袭君主制的理论更适合现代化的进程。拉什顿·库尔朋指出，君权神授论不是一种论证，只是一种“笨拙的观念”，一种“埋藏过深的概念”和一种“口号”。他得出的结论是，“回到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认真思考，是以非凡的原始契约论为标志的”。①

社会契约论在某种意义上是“根本法”理论在旧制度下的延伸。十八世纪的政治斗争围绕的一个问题是根本法是否约束君主的权力。一般都承认在旧制度下，君主不能改变关于王位继承的规定，不可转让国家领土，只能信奉天主教。法国有几届三级会议作出过努力，以确立议会有权批准一切新税收的原则作为根本法，但国王设法挫败了这些努力。这种根本法的观点最终导致产生一个概念，即人民本来拥有主权，然后才把这些主权委托给他们的统治者。

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现代化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到

① 库尔朋：《历史上的封建制》，第311—312页。关于旧制度下的根本法和社会契约论，见迪韦热：《法国的宪法》，第31—37页。

十八世纪，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人类是无限可能性的创造者，人基本上是符合理性的，政治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容许人类最充分地发挥创造力。戈登·赖特曾经评论说："启蒙思想所起的颠覆作用远远超过了它的倡导者本来的认识，它与旧制度所依据的主要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法国十八世纪的制度仍然建立在权威和传统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经过理性或功利检验的基础上。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旧理想与那种由自主的个人构成的巨大社会的新观念无法调和。"①

启蒙思想在法国革命前的二十年中动摇了争权双方的地位。法国最高法院基本上为了世袭贵族的利益才力图限制国王，并取得一些胜利。国王的回答是断言只有他个人拥有完全的主权。1766年，路易十五在自答会议上宣告："整个国家秩序皆本于我，有人胆敢树立与君主对抗的国家权力和利益都必然与我有关，只能掌握在我的手中。"专制君主制的主张和恢复贵族特权的建议，在当时都符合知识分子的风气。用理性和启蒙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所谓一切主权都属于国王的说法是荒谬的。法国最高法院的世袭官员代表国家的论调也不过是如此而已。待到斗争双方摊牌的时候，他们都发现自己没有民众的支持。②

政治权威的新原则本质上是理性的，是与立宪君主制或议会共和制符合的，但也标志着同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无可

---

① 赖特：《现代法国》，第31页。

② 关于国王与最高法院之间的冲突，见帕尔默：《民主革命时代》，第86－99页；雷蒙：《1789－1848年法国的政治生活》，巴黎，1965年，第31－40页。关于启蒙运动，见赖特：《现代法国》，第28－39页。优良的综合性论述，见让·图夏尔等：《政治思想史》，第2卷，第383－449页。

挽回的决裂。网球场宣誓和八月法令废除了封建制度。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标志着一个崭新的政治合法性原则的出现。它以1789年的清晰而有力的语言与例如(为封建制的不平等原则夸耀的)路易十五在自答会议的宣言和1776年3月巴黎最高法院的抗辩形成对照。人民和公民权宣言用自己的措辞草拟出来:"因此,本宣言将永远呈现在社会全体成员面前,将永远提醒他们拥有权利和责任;因此,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行为在任何时刻都应当比一切政治机构的目标更受到尊重。……"1791年9月3日的宪法"普遍地废除了侵犯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制度——再也不存在贵族、爵位,再也不存在世袭的差别、等级的差别,再也不存在封建制度。……国家的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个人,不再享有任何特权,全体法国人在共同的法律面前不再有任何例外"。

革命的政治合法性原则并没有得到保守派的承认,革命者内部也发生了分裂,结果产生了长时期的宪政不稳定。虽然在合法性的正式原则上,法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但大多数人在基本制度上并没有达成一致。法国社会的转变在继续进行。但是,法国宪政特有的不稳定严重影响了克服现代化的连续性危机的方法。反过来,制度问题争论的性质是对现代化的压力作出的反应。

4. 现代化与意见一致

科学和技术形成了一切现代社会的政治。工业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在经济中活动的重新分配。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下降了。仍在务农的人数虽然减少,却有很强的能力增加产量。从事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管理的人口比例上升了。新的社

会群体形成，并向政治体制提出要求。从历史的顺序来说，这些社会群体是一般的资本家和商人，经营管理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工业化的后期，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人数大大增加，并且在社会中十分重要，所以成为了一支特殊的力量。法国同其他经历过或正在经历工业化过程的所有国家一样，这些社会群体进入政治系统也带来了尖锐的问题。

首先的工作是要对法国社会重新组合的程度有一个全面的看法。法国的人口普查统计按照参加三大经济部门的活动的人口来划分，即按第一产业（农业、林业、渔业）、第二产业（工业、采矿业、建筑业和能源生产）和第三产业（其余一切活动，包括分配、管理和个人服务）划分。一个世纪以前，农业部门的比重大于其他两个经济部门的总和，每有一个工人和一个服务业的人就有稍微超过两个的农民。1964年，农业部门已经是三个部门中比例最小的一个部门；务农的人数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其他两个部门则有相应的增长。下表归纳出这些变化趋势：①

年份	1851	1881	1901	1921	1931	1936	1954	1962	1964
第一产业（%）	53	48	42	43	37	37	28	21	18
第二产业（%）	25	27	31	29	33	30	36	38	42
第三产业（%）	22	25	27	28	30	33	36	41	40

当代法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社会变化的速度快。在1954年到1964年的十年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减少了40%，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数上升了大约15%。

① 根据乔治·迪佩斯：《法国社会》，第33页；《法国经济图表》，巴黎，1966年，第48页，表a；《当代法国历史地图册》，巴黎，1966年，第45页。

这些趋势的政治意义是十分明显的。现在，在主要的社会群体中农民的群体是最小的。由于他们处于少数地位，他们主要是通过利益集团而不是通过谋求组成政治上多数派的政党对政治体制提出要求。产业工人虽然人数较多，但是他们本身仍未构成多数，只有同农民或中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才可能构成多数。中产阶级——商人、业主、经理和自由职业者群体——不仅由于他们所发挥的功能而显得重要，而且还是一支巨大的政治力量，其数量相当于从事工业生产的全体工人。

现在，法国像世界上的其他工业国家一样，在三大经济部门之间大致相同的平衡。1964 年，法国农业部门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 18%——低于意大利(25%)、日本(26%)或苏联(34%)，但高于德国(12%)、美国(8%)或英国(4%)。法国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占人口总数的 41%左右，而相比之下，美国是 58%，英国为 48%，日本为 42%，德国是 38%，意大利为 33%，苏联为 32%。①

法国社会在其他各方面也表现出了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居民向城市中心移动是大规模的，也是正常的。在 1846 年，法国居住在二千人以上的社区内的人数占 24%左右，生活在五千人以上的社区内的人数占 17%。到 1962 年，相应的比例已经分别为 62%和 55%。特别惊人的是巴黎市区作为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的巨大发展。现在全国大约有 20%的人口在巴黎地区居住和工作，而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个比例仅仅只有 3%。②

---

① 以上所有数据均引自《法国经济图表》，第 48 页。

② 城市化的数据引自迪佩斯的《法国社会》，第 20—21，23—26 页。

虽然法国社会结构的轮廓与其他大多数工业国家相同，但这种社会结构的演变方式却大不相同。直到1815年，法国的工业化是缓慢的，总的说来那是由于在纺织业领域中采用了英国的生产方法。法国大革命为工业化开辟了道路，它清除了封建障碍，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但是，法国的力量后来主要用于捍卫共和国和创立幅员辽阔的拿破仑帝国，直到大约1815年，工业革命才开始。但是，即使在那时，发展仍然是缓慢的。

法国商人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对金融投资比从事大规模生产更感兴趣。大革命后的法国，贵族的价值观念令人惊异地恢复原状，当时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力求模仿实际上已经丧失经济力量的那个阶级的生活方式。戴维·S·兰德斯曾经着重指出整个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企业主阶级的差别。他说："英国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赚钱的机会都异乎寻常地敏感并作出反应。这是一个着迷于财富和商业的民族。"法国的商人阶级由于把较多的精力倾注于所谓高雅的生活方式，因而使他们的成长受到阻碍。兰德斯还指出，法国社会机体内部的发展"在心理上和制度上产生了一种对现代化毒素的抗体"。[①]

法国的工业化是延缓而不是受到阻止。从1815年到1848年的那个时期，生产正常增加。煤和生铁的产量剧增。冶金和化学工业以及铁路建筑已经开始发展。在所有的领域内，

---

① 兰德斯："1750—1914年西欧的技术变化和发展"，载《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第298、463页。关于法国早期的工业化，见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剑桥，1955年；乔治·迪佩斯：《法国社会》，第35—48页；戈登·赖特：《现代法国》，第196—209、343—353页。

经济都是按英国的型式发展，不过发展的步伐稍慢，力量较小罢了。

法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开始于第二帝国，工业产量在1852年和1870年之间大约增长了一倍。路易·拿破仑的政府殚精竭虑想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而且获得了相当成功。银行系统适应了工业化经济的需要，提供了把社会积蓄输向企业家的渠道。这个时期也是法国商人进行冒险试验的时期。他们在商品领域（包括百货公司）中采用了许多革新办法，并使冶金业和纺织业完全现代化了。此外，一个庞大的铁路网已经形成。在一个缓慢的开端后，法国似乎正在顺利前进，赶上和超过英国。到1870年，法国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在此以前的五十年里，法国的经济增长仅次于英国。

法国在1870年被普鲁士击败并建立第三共和国后，出现了一个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时期，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理解为战败的后果。J·H·克拉潘说过："然而1870年的战争、更甚者是1871年的巴黎骚动以及此后多年的国家萧条和随之而来的失去自信心，使法国人心灰意懒。而没有了自信心，任何国家都将办不成大事，甚至工厂的建设也无法进行。法国在1870年以后的那一代人中，大多数对自己的政府和共和制度的价值有所怀疑，对自己的命运也有所怀疑。这与1860年的英国、1875年的德国和各个时期的美国的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的自信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更不用说自满了。"①

① 克拉潘：《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233页。

接着就是从189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进入了与第二帝国时期类似的经济发展时期。从1870年到1914年，工业产量增长了两倍，实际工资提高了大约50%。洛林铁矿的发现和开采使法国工业化得到新的刺激。与此同时，保护主义的农业政策保护了农民免受竞争的挑战。就在这个时期，"两个法国"——一个是现代的和奋进的法国，另一个是前工业的和静止的法国——之间的差异变得非常显著。1924年到1930年是短暂的经济迅速增长时期，年平均增长率约为4%。接着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全面衰落。法国遭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后，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从1950年开始又进入了一个迅速增长的新时期——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远远超过了法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从1949年到1965年，钢的年产量从900万吨增加到2000万吨，汽车的年产量从28.6万辆增加到160万辆，农用拖拉机从1.7万辆增加到9万辆，住房从51000个单元增加到412000个单元。国民收入在这个时期增长了一倍多，工业总产量几乎增长了两倍。①

从以上简单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几点：(1)法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发生在1815年到1848年(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1851年到1870年(第二帝国时期)、1895年到1914年、1924年到1930年(第三共和国时期)，以及1950年至今(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时期)。因此，法国在君主制和共和制时期都

---

① 关于法国后期的工业化，见赖特：《现代法国》，第453—463、548—567页；德尔贝格：《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坎布里奇，1964年。他辨别法国经济发展时期为1851—1868年、1879—1882年、1896—1913年、1919—1929年，以及1949年以后。

有相对停滞和生气勃勃的时期。(2)直到最近,法国经济中的非工业部分以及甚至前工业部分的规模与英国、德国、美国相比是较大的。(3)1950年以来,商人和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态度有了真正的突破。前工业时期的精神是夸耀个人和家庭企业("我的酒杯小,但我用我自己的酒杯",等等)。这种精神现在已经被赞成科学、技术和工业进步的看法所取代。但是,这些发展所产生的政治后果仍然模糊不清。第四共和国在八年的显著经济进步后被推翻了。第五共和国不时被巨大危机所困扰,它的宪法自颁布以来,一直受到反对党的挑战。1950年以来的迅速现代化并未导致对政治体制的基本准则和制度取得明显的一致意见。

法国现代化的经历引起人们去注意危机发生时间的重要性,也注意到新的社会群体登上政治舞台的方式。法国革命的严峻变化在舆论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冲击波,致使非常难以建立牢固的政治制度。贵族拒绝承认共和国,革命的受益者在君主制下又难以控制。即使用第三共和国的形式取得了一种持久的妥协之后,敌对双方的力量对于共和国应当用什么方式来建立这个问题,继续发表不可调和的看法。总之,由于偶然的时间安排,法国人虽未受到稳定的政治体制的好处,却不得不应付工业化带来的各种难题。但是,无论如何,工业化业已开始,一连串的政府都能在工业化进程中提供助力。

不规则的工业化为新出现的社会群体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些特殊问题。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现代化进程中第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是以新崛起的资本家和经理阶级为一方而以拥有土地的贵族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征是,贵族方面心怀仇恨,而商务人员方面则缺乏坚定的目标。这两

在的悲剧。

事实可能证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现代化的民主和自由的原型不是英国或美国，而是法国。今天渴望实行议会民主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如过去的法国那样，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与此同时，一部分政治上层人物有决心要尽快地使他们的国家现代化。但是，前工业的态度渗透了整个社会。工商业阶级缺乏办理企业的活力。文官和军人都有较好的组织，准备随时为国效力。而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其他革命运动则标志着工人和知识分子与国家共同体的离异。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工业化现在正在更激烈的社会对抗和不稳定的议会制度下进行着。出于比较分析的目的，在民主工业社会中选择最贴切的模式，可能还要算法国现代化的经历。

10. 现代的经济增长：发现和思考

西蒙·库兹涅茨

〔编者按〕 西蒙·库兹涅茨是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周期浮动》(1926年)、《国民收入与资本形成》(1938年)和《现代经济增长》(1966年)。曾获得1971年度诺贝尔经济科学奖。本文是他在斯德哥尔摩受奖时的演讲，并载于《美国经济评论》杂志第63卷(1973年6月)。

库兹涅茨教授由于对国民收入以及有关概念的研究而引人注意。在本文中，他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概括了他一生的卓越研究。

不管人们愿意使用哪一种现代化的定义，他们都必定要把经济增长列为其中最关键的特征之一。库兹涅茨辨别出现代经济增长共同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出经济增长率和随之而来的结构转变以及目前发达国家在全球产生的影响。他还探讨了经济增长在改变过去存在的定居型式方面的含义、社

方式、庞大的扩展型家庭以及崇敬不受干扰的自然也是不相容的。

技术进步的缘由、最受其影响的具体生产部门，以及它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数百年来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不相同，因此，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也有差别。它们的调整通过日益增长的经济引进和传播的技术变化相互发生作用。人类知识进步中的重大突破，即那些构成长期以来持续增长并且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主要来源，可以称之为划时代的革新。经济史上的变化过程也许可以划分为几个经济时期，每个经济时期都以划时代的革新来识别，这些划时代的革新产生了经济增长的明显特征。[①] 如果不考虑这样一些经济时期的辨别并确定其时间是否合适的话，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即现代经济增长指的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时间从十八世纪末开始，范围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不考虑其重大的空间作用)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分类是因为这些国家设法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的潜力，其中包括欧洲的大多数国家，西欧的海外分支、还有日本，它们只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②] 本文将集中讨论现代经济增长，但显然也需要注意到它对全世界的影响。

目前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许多观察得到的共同特征与各个较早时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有所不同，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可能用数字来表达这些特征。但我们可以列举出其中一些特征，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今天世界经济生活中具有特

---

① 关于经济时期概念的讨论，见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纽黑文，1966年，第1—16页。

② 关于目前对非共产主义发达国家的分类，见联合国《年鉴》，第156页，表5注。这些分类时有变化，与其他国际机构所作分类也略有不同。

殊性的问题。既然这些特征是选择出来的，因此难免有遗漏之憾，它只包括可以观察到的并由经验得出的特征，所以将把我们引回到只能用肤浅的观察和推测去了解一些基本因素和条件上去，至于这些特征所包含的意义，至今仍难衡量。

六个特征

以国民总产值及其组成部分、人口、劳动力等常规衡量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很高，至少到最近的十年或二十年内，可以观察到这些国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增长率比过去的增长率要提高数倍。① 第二，生产力提高的速度快，也就是说，产出高于对每个单位的所有投入的比例，即使我们把劳动这个主要生产力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也包括在投入中，情况也一样。在这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速度也是过去的数倍。② 第三，经济结构转变的速度快。结构变化主要包括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现在则是从工业

---

① 非共产主义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每年的人均生产增长率为2%，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国民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这样的增长率大致上意味着是一个世纪前的人均生产率的五倍，人口增长率的三倍，总产值增长率的十五倍以上，远远大于前现代的增长率。对于后者，只能加以推测。但据合情合理的估计，从中世纪初期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个时期里，西欧的人均产值增长率只有现代经济增长率的十分之一。见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剑桥，1971年，第10—27页。1850—1960年欧洲和欧洲移民地(即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人口增长率是1000—1850年的四倍到五倍。见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第35、38页，表2—1和表2—2。这说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提高四十倍和五十倍。

② 利用常规的国民经济核算，我们会发现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是十分快的，(在统计的意义上说)约等于人均产值的全部增长。即使将无形成本和投入计算在内作一些调整，生产力的提高仍然约等于人均产值增长率的一半以上。

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的规模发生变化，与此有关的从个体企业向非个体经营组织的转变，劳动的职业地位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①] 此外还可以加上经济结构的其他方面发生的几种变化（消费结构的转变、国内供应和国外供应所占的比例，等等）。第四，有紧密联系而且极为重要的社会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也迅速变化。人们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把城市化和世俗化视为现代化过程的组成部分。第五，经济上发达的国家利用技术力量的增强，尤其是运输和交通方面已经增强了的技术力量（包括和平的和战争的），有扩展到世界上其余地区的倾向——从而形成了一个前现代的任何时候都未曾有过的世界。[②] 第六，现代经济增长的传播，尽管在全世界产生部分效果，但仍然是有限的，因为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中，经济状况仍未达到现代技术潜力可能达到的最低水平。[③]

这里简要地概括了现代经济增长的两个数量方面的特征，它们与增长速度有关，也与结构的转变和国际传播有关，为我们提出的假设提供证据，即现代经济增长标志着一个特

---

① 现代结构转变之迅速可以很容易地用劳动力在农业（及其有关工业）和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分配变化来说明。1870年，美国农业部门占劳动力的比例仍为53.5%，1960年已下降到7%以下。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古老的欧洲国家中，农业部门在1846年占劳动力的比例为51%，1947年下降至12.5%，1961年再降至7.5%（见科罗赫等：《劳动人口及其结构：国际历史统计》，第1卷，布鲁塞尔，1968年，表D－4和C－4）。任何国家，不论大小（飞地除外），农业部门占劳动力的比例下降50%都用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相比之下，下降30%到40%只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应当说是极快的结构变化了。

② 源出欧洲的发达国家的向外扩张可以追溯到现代经济增长以前的一个很长的时间，的确，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但是，十九世纪发达国家的交通运输能力的增长使它们有可能对殖民地施加大得多而且是更直接的政治统治，使过去封闭的地区（例如日本）"打开大门"，以及"瓜分"过去未曾瓜分过的地区（例如萨哈拉以南的非洲）。

③ 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下文第四节，我们将讨论欠发达国家。

题。

上述的六个特征是互有联系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在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当稳定的情况下，人均产量的高速度增长意味着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有高速度的增长；如果平均劳动时间减少，那它便意味着每人每小时平均产量以更高的速度增长。即使我们承认最广泛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大有增加，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仍然很高，而且确实反映了人均产量和人均纯消费的巨大增长。由于后者反映技术进步的实际效用，因此，生产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技术革新对若干生产部门的影响不同，国内对各种消费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不同，对外贸易的可比利益在变化之中，情况也是如此。正如前文指出的，技术进步改变了生产厂家的规模和经济企业单位的性质。结果，劳动力有效地参与现代经济系统，必然带来它的位置和结构的迅速变化、职业群体关系的迅速变化，甚至导致劳动力与整个人口之间关系的迅速变化（然而，最后一种变化处在受到全面限制的狭窄的范围内）。于是，不仅高速度的总体增长与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有联系，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同社会中其他方面的迅速变化也有联系，其中包括家庭的形成、城市化、人类对其作用的看法，以及衡量人类在社会中取得成就的标准等等。在先于其他国家进入这一过程的国家中，现代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意味着地理上的延伸；这一过程的继续传播，在运输和交通方面迅速变化的促进下，意味着向欠发达地区的不断扩张。与此同时，制度和意识形态转变的困难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现代技术新的巨大潜力转为经济增长，因为十八世纪末限制了这种体系的传播。此外，发达国家的政策对这种转变造成的障碍，过去强加在欠发达地

区，现在仍然强加在这些地区。

如果现代经济增长的这些特征是相互联系的，即相互之间处于一种特征引起另一种特征的因果关系之中，或者说，一些共同的基本因素都在同时产生影响，那就应当注意到另一种似乎有可能而且是重要的联系。技术革新的大量应用构成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特殊内容，它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是有紧密联系的，反过来又成为技术更加进步的基础。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看来十分清楚，技术革新（许多是以当代的科学发现为基础）的大量应用，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反馈作用。它们不仅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大量的经济盈余，使这些费时很长又需要大量资金的研究工作得以进行下去，而且还有一个更特别的作用，在经济生产改革的压力下，它们使有效的新工具发展为科学所用，并为研究自然过程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资料。换句话说，发达国家中的许多生产厂家可以看作是探索自然过程的实验室和研究新工具的中心，两者都可以在科学和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过去的两个世纪，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极大地加速了对有用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而这些应用研究又进一步刺激了新的技术革新。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现代经济增长反映了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它通过大量应用的反馈，保持了知识的进一步高速度发展。除非有什么障碍来干扰，否则它就为自我持续的技术进展提供一种机制，由于宇宙（相对于地球上的人类来说）之广大，技术进展显然也是无止境的。

经济增长的某些含义[①]

现在我要简要地讨论现代经济增长的某些社会含义，讨论它对有关国家中的各种群体的生活状况所产生的影响。许多这样的影响是人们特别关注的，因为它们不以当前对经济增长的衡量反映出来，而是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衡量经济增长存在着这种缺陷，因此对衡量经济增长的限度及其局限性展开热烈的讨论。

对生活条件的影响一部分来自现代经济增长中技术革新的重大作用，一部分来自基本生产结构的迅速转变。先从后者谈起，它产生的一些重大影响，例如城市化、国内人口迁移、雇员地位转变，以及可以称之为根据才能进行职业选择的原则等等，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这些特征已经引起了注意。尽管如此，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变所造成的两组重要影响仍应该明确地提到。

第一，"城市化"造成的生活条件的变化显然含有各种各样的损失和收益，而在目前衡量经济时却没有把它们包括在内，其中一些得失甚至从未考虑过应当加以计算。从乡村往城市的迁移(一个国家之内的迁移，以及往往也有国际之间的迁移)，要承受巨大的损失，因为要拔掉老根而去适应城市生活的毫无特色和较高的开支。学习新的技能并失去过去所掌握

---

① 本节提到的许多论点，在库兹涅茨的《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书中作了详细讨论，尤其是第2章(第75－98页)讨论了经济增长的非一般成本。第7章(第314－354页)讨论了整体变化与社会结构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转变之间的相互关系。

的技能的价值，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显然都是一种浪费。如果说这些耗费仍以通常的衡量方法而不考虑进去，那么，一些收益也同样被疏忽了。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提供的快乐和精神财富是“单调和粗野”的农村生活无法提供的；人们一旦学会了新的技能，往往就获得了可以比过去生活得更富裕的适当基础。在考虑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其他转变时，对从乡村向城市生活转变所包含的得失同样也可应用，例如参与经济活动的性质、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对社会中一些越轨成员施加的新压力等。

结构变化中第二个令人感到兴趣的方面是它显示出参与具体生产部门的那批具体人口在经济中所占相对比例的变化。由于从事经济活动是对人民生活的主要影响，某个生产部门在经济中所占比例发生了变动便会影响到从事那一部门活动的一批人，影响到他们的特征，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增长势必使一个又一个人口群体的相对地位下降，例如农民、小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地位的下降。这是一种不易被接受的变化，而且事实上也像历史告诉我们那样往往受到拒绝。一些经济群体过去存在的相对地位如果持续地处于动荡之中，便蕴育着冲突——尽管各个群体的绝对收入和绝对产量都有上升。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冲突会导致公开的内战，美国内战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和现在的某些欠发达国家中，类似的例子也不少。

只有在不付出太高的代价，而且肯定不至于造成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长期被削弱的情况下解决这种冲突，现代的经济增长才有可能实现。主权国家具有以忠诚和感情一致为基础的权力，简言之，即现代民族国家，在和平解决由于经济增

内有效，并且引起经济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巨大转变。但是，这些新的效果几乎难以充分预测或事先作出恰当的估价(有时甚至在事后也做不到)。标志现代经济增长的许多事物，诸如电力、内燃机、原子能、微波通讯和计算机，由于新工业材料钢、铝和塑料而产生的发明等等，情况也是如此。即使在技术革新只是一些仿效的国家采用已知的技术时，结果也可能完全难以预料，因为它们是把技术这种已知的东西与过去从未结合在一起的某些新东西——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框架结合起来。不用说，即使在现代以前的各个时代里，标新立异和探索未知的要素同样是非常突出的，因为知识和技术上的创新是任何重大经济增长的前提。但是在现代的经济增长中，这种创新的频率显然快得多了，并且为速度更高的总体增长提供了基础。

对新事物和部分未知的事物所冒的风险，产生了许多影响。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意外**，即料想不到的结果，这种结果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事实证明，一项发明或革新如果具有大得多的生产能力，可能引起远远比发明家或首先应用这种发明的那一批企业家所想象的广泛得多的应用，产生许多更具积累性的改进。或者，一项重大发明的广泛应用可能在传播的前几个阶段造成无法预料的成本增加。正面和负面的惊奇都很多。主张熊彼特经济学说的许多企业家就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所推动的，并且最终使他们名利双收的那些革新所包含的广大范围和意义。我们大多数人也都能指出许多最初看来好像会造福无穷的技术革新或社会革新却产生了出乎意料的消极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观点是不能把意外看作是偶然：它

们是在技术(或社会)革新过程中固有的,因为其中包含着一个未知的成份。此外,重大革新的推广是一个无法准确预料的长期和复杂的过程,它的最初经济效果可能在其他过程中引起反应。这反过来又会改变这种革新对人类幸福产生影响的条件,并且进一步提出调整的问题。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很容易找到下述的先后关系,从小汽车成为大众交通工具后,接着是城市郊区的发展,富有者从市中心迁出,收入较低的和失业的居民迁移和集中到市中心的贫民区,出现了尖锐的城市问题、财政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然后是大都市不断巩固的趋势。但是,在二十年代,当小汽车在美国开始发挥它们为大众服务的功能时,这种先后关系的性质和内容肯定不明显。

确实,按照这条线索再向前推进,人们就可以论证说,一切经济增长都会随之带来一些意外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随着重大革新的巨大影响被感觉到,随着要求满足的需要得到解决,负面的后果便更显得重要。如果这个论点成立的话,那么,现代的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迅速发生的革新和这些革新推广的时间的缩短,必定会带来消极后果较高的发生率。但是不能忘记,现代以前的经济增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由于技术较差,这些问题更具有隐蔽性。即使我们不像古典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不考虑即将来临的自然资源的枯竭问题,只讨论早期的城市化,也会看到一个重大的负面后果,那就是随着人口从更有益于健康的农村向更能传染疾病的不卫生城市转移时,人口死亡率大大地上升。这里有两点是有重大关系的。第一,不管对经济增长做什么样粗略的计算,它的消极后果从未被认为超过了积极贡献,因而导致对经济增长的否定。第二,人们可以假定,一旦出现了经

济增长所带来的意外消极后果时,各种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的潜力都是被用来减轻或排除这样的后果。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消极后果会积累成严重的技术问题和社会问题,因为这些后果很难预测,不可能尽早地采取有效的预防或改进措施。即使一开始就采取行动,在有效的技术或政策处理上也会出现拖延。即使如此,从经济增长的历史来看,这样的意外消极后果曾不断被克服,因而人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虽然摆脱不了这些问题,但不管经济发展到达什么程度,由此产生的任何具体问题都是暂时性的。

欠发达国家

有两组重要因素似乎限制了现代经济增长的扩大。第一,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样的经济增长需要一个稳定和灵活的政治和社会框架,它能适应迅速的结构变化,并解决由此产生的冲突,同时又能鼓励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些群体。这样的框架并不是那么容易或迅速建立的,即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也为此作了长期的斗争。日本是那些植根于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中至今为止加入了发达国家集团的唯一国家。如果说现代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这种框架包含着欧洲文明特有的成份而又难以找到替代的话,那么,这种现代框架的出现可能非常困难。其次,发达国家的组织在制订对外政策上有越来越强烈的民族倾向,即使在许多地区出现了某些现代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但是显然受到了阻碍。这些政策从强加殖民地的地位起,一直到限制它们的政治自由,结果使政治独立和使本地社会成员摆脱其次等地位而不是经济发

年价格计算),那么,这些国家在疆域大小上,在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上,在主要的传统制度上,以及在发达国家过去对它们施加的影响上(这些影响在不同的时间,产生于不同的来源),变动范围极大。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例如在人口数量上,有中国大陆和印度那样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有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小国;西方对非洲的直接冲击与对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冲击在时间上也不相同。此外,中国和印度的文明产生了独特制度,产生了统一的和庞大的社会,直至今日都使起源于欧洲的任何社会在规模上相形见绌,它们同构成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制度不相同,与非洲形成许多部落社会的制度也不相同。

对欠发达国家进行概括必须谨慎小心,必须根据它们的条件和制度的多样性谨慎地详细研究。它们在利用现代经济增长的潜力上都遭到失败,肯定意味着它们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人均产值较低,农业或采掘工业占有较大的比重,生产规模一般比较小。但是,具体参数却有很大的差别,而且由于经济增长的阻力有重大的差异,它们也可能提出不同的政策方向。

其次,今天的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境况与现在发达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之前所处的境况在很多方面都不相同(日本也许算是一个例外,但也不能肯定这样说)。与工业化前夕的发达国家相比,占世界人口最多的欠发达国家人均产值的水平要低得多。当时这些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就比世界上其余国家先进,从未处于人均产值低的一端上。这些国家的大小以及某些基本条件颇不相同;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俄国除外)都没有印度或中国那样大,甚至连巴基斯坦或印度尼西

亚那样大的也没有。现在的发达国家没有必要根据极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去进行调整，而这样高的人口增长率恰恰是近二三十年来许多欠发达国家的特征。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老的欧洲国家通过大量对外移民，把过剩人口迁移到机会更好的地方去，从而缓解了工业化的某些紧张状态。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日本也是如此。对今天人口众多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这条道路已被堵塞。当然，今天的欠发达国家能够获得的物质和社会技术大大超过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初所能获得的。然而，正是因为较严重的落后状态和表面上看来较强的技术储备结合起来，才使得今天的欠发达国家与当时刚刚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的发达国家的处境有显著的不同。

最后，情况很可能是：尽管物质和社会技术的积累是巨大的，但适用于欠发达国家的革新措施却积累得并不多。即使有人认为基础科学的进步不一定同产生这种科学的国家的技术需要有密切关系(即使这可能有争议)，但科学的应用、发明和工具的进步无疑是对发明国的具体需要所作出的一种反应。英国工业革命的几项重大发明确实如此，说明广泛的需要是发明之母。发达国家的生产条件与今天的欠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发达国家使用的物质技术也许并不能满足革新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发达国家拥有的社会技术未必能为在制度和人口数量背景上差异很大的欠发达国家提供适用的制度或办法。因此，强调节省劳动力的发明的现代技术可能并不适用于劳力过剩而其他因素例如土地和水源不足的国家。强调个人责任和追求经济利益的现代制度也可能不适用于许多欠发达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区的较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样说不应被解释为否定现代技术中许多可以

转化的部分的价值，只是想要着重指出，能够具体适应欠发达国家不同需要的物质和社会工具可能会短缺。

如果以上的观察是正确的话，我们可以接着讨论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问题中的几种意义。对它作详细而明确的阐述，我还有些踌躇，因为观察所依据的资料和我们的知识有限。不过，至少有一种意义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看来它可以解释这个领域中目前发生的许多事情，只要简单说明一下就可以了。欠发达国家的大幅度经济增长可能需要在现有的物质技术，甚至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作出较大的改变。这并不仅仅是个借用现成的物质工具和社会工具的问题，也不是直接运用过去的增长模式的问题，而是在参数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对社会和政治结构的革新要求可能特别强烈。在共产党领导下推进高度强制性工业化的那些国家里，出现了这些结构的剧烈变化。最早的变化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以前（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它们充分说明这些变化可能包含着一种社会创新和革新。这里姑且不谈民主主义和非共产党的专制主义组织之间存在的差异，即使共产党的组织也有各种各样，这是人们熟悉的。如果认为在社会和政治结构中，这些革新主要是对经济落后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潜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的反应，那就过分简单化了，或者说这些革新是过去历史的无情后果，那也过分简单化了。但是不管为建立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而进行的斗争是不是一种反应，一旦得到解决，它的结果就会明显地形成经济增长能够出现的一些条件。对于今天的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来说，看来很有可能的是，它们还要为建立与充分的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有效的政治体制进行长期的试验

和斗争。在现代经济增长已经达到的程度与可能达到的程度之间差距有所扩大，于是这一过程将会变得更加激烈。经济学家可以论证经济增长的某些方面必须出现，因为它们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例如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等等)，即使它们的参数必定会变，然而许多特征将取决于社会和政治创新的结果，所以仅仅从过去作出推论是极端危险的。

结论

这里的讨论目的在于概括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并且提出一些对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所设想的某些含义。这样的研究从我们这门学科诞生起就一直在进行着，亚当·斯密那本奠基著作《国富论》的书名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那本书也很可以称为《国民经济增长》。不过，经济增长的计量基础和对这种研究的兴趣在最近三四十年里扩大了很多，过去的经济史和经济分析所积累的研究成果与更加丰富的数据可以结合起来，推动有关经济增长过程的经验研究。以上的概括吸收了许多国家大量而范围甚广的研究成果，这些国家大部分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尽管我的某些解释可能是属于个人的，但这里的讨论反映了广泛的集体努力。

现代经济增长最突出的特征是高速度的总体增长及其破坏性的影响和新产生的"问题"相结合。高速度的持续增长是因为以知识储备的增加为基础的技术革新被大量应用和这种知识储备进一步增加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则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高速度变化所产生的那些影响。新产生的问题是革新的传播所带来的意外和无法预见的结果

(革新一词是指新的和未知的东西)。此外还有经济增长向欠发达国家缓慢传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所有的欠发达国家都有悠久的历史,它们是分散的,相对地孤立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发源地区。因此,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现代经济增长取得的显著的积极成就往往伴随着意外的消极后果,而欠发达国家则正在努力地奋斗,力图利用现代技术的巨大潜力,以便在相互依存的同一个世界上发挥充分作用(它们即使愿意退出也不可能)。

我们已经着重指出现代经济增长中发生问题的几个方面,因为它们指出了这个领域中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些方面,即"意外"和解释含糊的"难题",不仅是指违背愿望(这种情况可能会要求改进政策)的问题,而且指我们的计量数据,特别是我们所作分析性假设,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充分的见解和解释。前面已经提到,通常用来计算国民产值及其组成部分的方法并不能反映经济和社会结构为开拓重大技术革新的渠道进行调整时付出的巨大代价,而且确实遗漏了某些积极的收益。作为这种衡量基础的旧理论用比较狭隘的方法来为生产因素下定义,在生产力上升方面留下了一个难以解释的空白,犹如衡量我们究竟多么无知一样。这种理论上的缺陷与新的发现产生了矛盾,近几年来,这个领域中引起了活跃的讨论,并试图扩大国民经济计算的框架,把至今仍隐藏着而显然是很重要的成本包括进去,例如作为资本投入的教育、向城市生活的转变、环境污染以及大规模生产的其他消极后果等方面的成本纳入计算范围。这种计算方法也会发现迄今尚未测算的某些积极收益,比如说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平均寿命的延长、较大的社会流动、更多的娱乐活动、收入不平等有所缓和,等等。与

此相关的努力还包括在经济分析体系中加上知识的增加，更加注意时间的利用，并且注意到家庭，不仅把它们作为消费方面而且也要把它们作为投资方面成为经济决策的中心。这些努力都是向同一方向迈出的步骤。有关发达国家本身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估价依然存在着某些分析和计算方面的问题，看来这是颇为明显的。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人们可以期望所分析的若干方面、国民经济的计算以及凭经验而作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也会有重大变化。这些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任务。

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有些不同。它迫切需要更广泛地提供检验过的数据，主要是指用在经济分析程序中经过仔细考查的数据。前面已经提到，有关欠发达国家的数据和经济分析在数量上比发达国家少得多——这与物质资本的供应比较少相类似。但是，近年来有关许多欠发达国家的数据已经迅速地积累起来，只有大陆中国等少数国家例外，它们把数据看作是可被(国内外)敌人利用的情报，因此政府不予公布，甚至无法搜集。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在分析这些数据时也存在着差距，因为这样的学者人数很少，不能在欠发达国家内部抽出时间来研究，同时也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首先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国家中的问题。人们可以期望(但是不能无限期期望)发达国家在完成提高分析能力和计量方法时，不要排斥或忽视欠发达国家迫切需要的研究，这些研究工作除了讨论那些看来是重大的障碍和似乎是理想的政策方案外，还应当讨论它们经济表现的数量基础和制度条件。

11. 人类的人口史

安斯利·J·科尔

〔编者按〕 安斯利·J·科尔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人口研究所主任、《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1958年)的作者之一。他还著有《美国人口和出生率的新估计》(1963年)和《地区典型寿命表与稳定的人口》(1966年)。

在社会转变中,最显著的现象莫过于人口的变化。在发达国家中,人口的变化是从高死亡率和高出生率决定的比较低的人口增长率,经过一个时期由于死亡率的下降超过出生率的下降而造成的人口快速增长时期,最后转变为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这种转变互相联系的原因目前尚未得到充分认识,但其结果已很了然。在许多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人口仍大量增长,它将超过土地供应粮食的能力而造成威胁。

联合国决定1974年为世界人口年。这表达了全世界对高速人口增长的关注,理解到人口的继续迅速增长将产生的

后果。人们对于过去的人口增长，对于从一百万年前的数千名迁徙者变成今天数以十亿计的城市、市镇和乡村居民的过程注意得太少了。人们如果想要评估目前的人口状况及其前景，理解这个过程是必要的。

对人类的人口发展作任何数量上的描述只能依靠推测，原因很简单，因为从来没有对世界总人口作过任何普查，甚至在今天，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计算过人口，已经进行过人口普查的国家，人口数字也并不总是可信的。例如美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数字，比实际人口低了 2%到 3%；其他国家，例如 1963 年尼日利亚的人口普查数字，显然超过实际人口。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数字的误差有多大，也无法作出精确的判断。

如果连今天的人口多少都无法完全掌握，那么，过去的人口数字就更难肯定了。瑞典从 1750 年开始最早的一系列人口普查，以后每隔千年或不到十年定期进行一次；美国从 1790 年起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法国和英国从 1800 年起也是如此。比较先进的国家要到十九世纪才普遍进行定期的人口普查，并缓慢地普及到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印度从 1871 年开始每隔十年统计人口，拉丁美洲若干国家虽然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计算人口，但间隔时间大多数不固定。俄国的全面人口普查在 1897 年进行，此后只进行过四次。大多数热带非洲各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统计人口数字。今天的世界人口数字之所以无法肯定，还有一个明显的原因，那就是对中国的人口状况很不清楚，中国在 1953 年公布了最新的人口统计数字，但准确性无法验证。

人们倘若要思考更早一些时期的人口数字，误差将会更大。最早计算全球人口的时间是千八世纪中叶，但有 20%的

地区的人口无法肯定。更早一个时期有人口资料可用的年代是公元一世纪初。当时罗马收集了帝国境内各个地区载有人口数字的资料。大约就在此时，中国王朝的记载中也有人口数据。对那个时期印度的人口数字，历史学家们也做过粗略的估计。如果使用这些资料来推算出其他地区的人口数字，便可以对奥古斯都时代全世界的人口作出估计。

至于推算更早一些时期的人口数字，人们必须用间接的方法去计算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可能维持生存的人口是多少。例如，根据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估计，在农业出现之前的狩猎和采集文化中，全世界能够维持生活的人数在五百万到一千万人之间。

从较早时期的这样推测和较近时期比较可靠的数据中，人类人口增长状况的大致轮廓便可构想出来。在所有这些计算中，最不能肯定的也许是原始人口的数字，也就是大约在一百万年前人类开始出现时的人口数字。当人类逐渐与自己的祖先分开时，人类发源地的人口据说有数千人至数万人。在一般认为开始于公元前八千年的农业和畜牧业开始出现的第二个时期，人类的人口数字已可估计出来。至于农业出现前的狩猎和采集文化时期最终的人口数字，有几种估计，平均约为800万人。这样，不管原始的人口是多少，在人类生存的最初99万年里(约占人类全部历史的99%)，人口的增长率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把最早的人口数字假设为两人——亚当和夏娃——在这样漫长的第一个阶段里，世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百万分之十五。

在农业确立后，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了。公元前八千年为800万人，到公元1年已经是大约3亿人(有根据的测算为2

亿人到4亿人，此是中位数)。这种人口增长速度表示年平均增长率为百万分之三百六十，用通常的表达方法，就是0.36‰。

从公元1年到1750年，人口增加了5亿到8亿左右(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翰·D·杜兰德估计范围的中位数)。现代人口异乎寻常的加速增长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从公元1年到175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0.56‰；从1750年到1800年为4.4‰，使这五十年间隔中的最后一年，世界人口达到10亿人左右。到1850年，世界人口为13亿人，1900年为17亿人。在这两个五十年时间里，增长率分别为5.2‰和5.4‰(这些人口总数也是根据杜兰德所作的估计)。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1950年的世界人口为25亿，表明二十世纪前五十年里的年平均增长率为7.9‰。从1950年到1974年，人口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多，达到17.1‰，致使今天的世界人口达到39亿。1973年，联合国进行的几个计算项目所得的中位数表明，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64亿，这样的增长意味着在未来的二十五年里，年平均增长率将为19‰。

即使从以上的简要叙述中，情况也很明显，世界人口史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相当长期的人口缓慢增长时期，另一个是时间很短的人口迅速增长时期。从人口的绝对数字与人口增长率的简单数学关系、人口增长率以及从决定人口增长率的各种因素中，可以对这两个时期人口发展有所了解。

任何增长率，即使是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只要持续下去，都会造成人口的不断增长，使世界的人口总数在异常短的时期里超过某种预定的限度。用等于六百九十三年的时间以按千人表达的人数增加计算就是人口翻一番的时间。当增长率

为 0.56‰时，从公元 1 年到 1750 年，每一千二百年左右人口增长一倍。如果预计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20‰左右，人口总数在三十四点七年时间内便会加倍。

小数目的倍增积累起来的后果对人们的常识来说是出乎意料的。这种现象可以用一个传说来说明，据传有一位国王愿将女儿嫁给任何人，只要此人在棋盘的第一格上放一粒麦，在棋盘的第二格上放两粒麦，依此类推。按这个要求，在六十四个棋盘格子里放满谷子时，谷子已堆积如山，超过今天全世界小麦总产量的数倍。

按照同样的几何级数增长规律，人口没有翻多少番就达到了今天的数字。即使我们再作假设，人类开始时假定只有亚当和夏娃二人，人类的人口实际上只翻了三十一番，平均每三万年翻一番。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世界人口是通过很低的增长率来达到现在这种规模的，这个人口增长率是按照人类整个历史的平均数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0.2‰。即使考虑近二千年来增长速度已经加快，年平均增长率还是不太高的。从公元 1 年以后，人口不过翻了四番，即大约每五百年翻一番，这意味着年平均增长率为 1.4‰。

从长期的平均人口增长率的角度来比较，今天的人口增长率似乎非常特别。然而，这种异常的繁衍源出于通常使用的按几何级数计算。目前世界人口的增长已经达到出生多于死亡的程度，而人口增长率正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之差。另一种说明这种关系的方法是，在长时期内，人口平均增长率取决于几代人数之间的比率。这个比率大致等于在生育年龄内的妇女所生儿女的数目乘以在平均生育年龄内仍活着的妇女所占的比例。由此得出来的乘积就是一个新出生的女性一生中生育

命上升到 80 岁以上，但它不会造成活到怀孕年龄的妇女所占比例有重大的变化，也不会减少维持人口现状所必需的每个妇女生育子女的人数。另一个极限是由生育率决定的。当平均寿命下降到 15 岁时，只有 23.9%的妇女活到可有子女的年龄，而每个妇女必须平均生育 8.6 个子女才能阻止人口下降。在生物学上，一个妇女生育八九个以上的子女肯定是可能的，但是还没有看到过总的生育率高于每个妇女生育八个子女的情况。

人类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准确记录甚至比人口数量的记录还要少。今天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没有可靠地记载过人口生死统计的地区。例如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所有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出生和死亡的登记都不充分。因此，只有在比较发达的国家近来的经历中，存在着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准确资料，以十八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为始，其后是十九世纪的欧洲其余大部分国家，以及二十世纪的日本和美国。人们从人口普查记录中有关年龄组成部分的资料，从历次人口普查之间发生的人口增长数字，以及从人口普查和人口调查中收集起来的资料中，可以推测欠发达国家目前的生死率。但是，有关过去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的准确数据仍然极少，要获得这些数据只有依靠对影响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

有两种因素造成生育率的差异；一种是与男性同居的育龄妇女面临分娩风险程度的差异，另一种是与男性同居的妇女在怀孕率和生育率方面的差异。在许多人口中，社会只准夫妻同居，因此制约结婚和离婚的法律和习惯影响着生育率。明显的事例证明直到一个世代以前许多西欧国家的一个普遍型

式是实行晚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多年，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英国的妇女第一次结婚的平均年龄在 24 岁到 28 岁之间，有 1%到 30%的妇女到 50 岁时仍未结婚。结果，已婚育龄妇女有分娩风险的比例减少到一半以下，诸如爱尔兰等国家甚至减低到三分之一以下。

迥然不同的婚姻习俗则有可能降低生育率，这在亚洲和北非地区是普遍的。妇女往往在 17 岁或 18 岁结婚，可是已婚丈夫的平均年龄比已婚妇女往往大八九岁。有些妇女，特别是寡妇，由于同年龄大得多的男性结婚而可能降低生育率。婚姻由父母包办，在许多情况下要付女方礼金，年龄较大的男人的财产和地位更有可能去满足年轻妇女提出的更称心如意的要求。在印度，还有另一种对生育率的社会影响，因为印度教有禁止寡妇再婚的规定。这种禁令尽管并不总是被严格遵守，但无疑降低了印度的生育率，至少比没有这种禁令的状况下要低一些。

在同居的夫妻当中，对生育产生明显影响的因素是他们是否采用避孕措施。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的路易·亨利把不按已生子女数来改变他们行为的那些夫妻的生育率称作“自然生育率”。按这种定义的自然生育率在各个地区之间并不是一律的，它受到习俗、健康和营养状况的影响。例如哺乳会延长产后闭经的时间，从而延迟了生育以后卵子的受精率。在某些人口中，生育率低可以归因于淋病广泛传染造成的病理不孕症。最后，正如哈佛大学的罗丝·E·弗里希及其同事等的著作中提出的，饮食也会影响生育率。月经初期的年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体内的脂肪含量，因而同饮食有关。此外，月经期间年龄的妇女中，按身高计算的体重下降到一定的程

度将会引起闭经。因此，在饮食不良的人口中，生育率可能下降。由于怀孕和哺乳会大量消耗热量，所以在体内脂肪平均含量接近正常的再生育周期所需要的临界量的人口中，哺乳也可能延长闭经期。

在今天的同居夫妻中，造成生育率差异的最明显的原因是使用避孕和人工流产等措施来严密控制生育率。有些现代社会里，生育率很低。例如 1930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1937 年的奥地利和 1973 年的德国，总生育率低到了 1.5‰。

国际统计研究所开始进行世界生育率的调查，但这项调查只说明现状而不是过去的状况。从某些人口生育率调查中可以知道，控制生育习惯的普及只在少数人口中获得直接证据，有些仅仅是过去二三十年内的情况。至于在过去的社会中有意采取控制生育措施的情况，可以从下列的线索中推算出来，即早婚妇女的绝育早于晚婚妇女。这类证据连同对所有已婚妇女的生育率大大降低的观察结果，证明控制生育在十七世纪日内瓦的中产阶级和法国贵族等社会群体中已经普及。诺尔曼·海姆斯在《中世纪避孕史》一书中证明，至少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许多社会都已知道避免生育的药方，从有些带有巫术性而根本无效的药方起乃至颇为有效的技术。哈佛大学的巴西姆·穆萨兰姆在博士论文中证明一种效果与避孕套和避孕膜相似的中断性交方法，这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已经十分普及，以致有七个著名的法学流派明确地对这个问题作出规定。另一方面，对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西欧的教区登记簿所作分析以及对今天的欠发达国家进行的观察，都证明有效的控制生育的习惯在现代以前的大多数农业社会里并不普遍。

在人类的人口史中，一个特征是长期接近于零的增长。这个特征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大幅度波动并不矛盾。用增长率计算毫无疑义地证明长期以来人口的增长率接近于零，但是在短期内发生的变化可能是经常性的和大幅度的。事实上我们的看法认为在几万年的时间里人口是固定不变的，但其中也有某些短暂时期的迅速增长。在此期间，人口增加了好几倍，然后又发生了灾难性的锐减。例如农业社会以前的人口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如在冰河时期那样，有些人口则作为被捕食物而消失了。一旦种植庄稼得到确立，由于瘟疫或水灾、植物病和虫蚀造成庄稼的破坏，人口时时减少。其次，无论在什么时候，人类都在通过个人的掠夺和有组织的战争而使用自己的暴力，这也造成了人口的减少。

由于较早的人口从未扩大到像二十世纪这样以几十亿计的数字遍布于世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持续的高生育率总是伴随着高死亡率。同样，持续的低出生率也总是被低死亡率所补偿。那些一直处在低生育率而死亡率仍然高的社会必然已经消失。

在人类史前史的通常概述中，据称人的寿命在较早期的任何时代里都比较短，所依据的原理是早期的人类比他们的后代面临着更多的危险。例如人们都认为，猎人和采集者的死亡率高于定居的农民，农业人口较多，确是因为粮食供给的增加。但是，死亡率的降低造成人口的加速增长这种颇有吸引力的推论，却未必一定能证明是正确的。

农业的出现只使人口增长率有小幅度上升。如果这种上升是由死亡率下降造成的，那么，平均寿命的变化是难以察觉出来的。假设在狩猎和采集社会中，每个妇女生育子女数平均

为六点五人，那么平均寿命必定是20岁。如果早期耕作者的生育率要保持他们祖先的水平，那么，造成可以察觉得到的人口加速增长所需要的平均寿命只不过增加0.2岁，而平均寿命从20岁增加到20.2岁是根本察觉不出来的。

如果有人设想，农业社会以前的人比早期耕作者的死亡率高得多，那就必须假设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生育率高得多。如果在比较早期的文化中，平均死亡年龄不是20岁而是15岁，那么，妇女生育子女的平均数目就必须是8.6人，而不是6.5人。这样的变化并不是不可设想的。农业的采用表示生活的完全改组，肯定可望对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会发生影响。然而有理由怀疑，这两个生死比率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

疾病和无法预测的饥荒都会提高初期耕作者的死亡率。乡村生活使较多成员能到附近的地区去，可为病菌的传播提供渠道，成为产生流行病的源泉。而况农业人口密度较大，会导致粮食、土地和水的更大污染。较大的人口密度以及或多或少对谷物的完全依赖也使农业人口极易因歉收而遭受损害，而狩猎和采集的文化却对灾难有更大的抵御能力。

如果死亡率由于引进农业而确实有所上升，那么出生率肯定也有所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略大。通过观察当代仍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的民族，例如非洲西南部卡拉哈里沙漠的昆部落等的出生率，可以证明这两种比率同时上升的说法是正确的。多伦多大学的南希·豪威尔对她自己及其同事理查德·波沙伊·李所做的观察进行分析，发现昆族妇女生育的间隔时间长，因而总生育率不大高。罗丝·弗里希的著作提出一种可能成立的解释，认为昆族的饮食使人体结构内部脂肪的含量低到足以引起不正常的闭经、体重减轻，再加上延长哺乳时

现在属于较发达地区的某些国家妇女生育子女数从4.5人到7.5人不等，如美洲殖民地和俄国达到7.5人以上，瑞典或许还有英格兰和威尔士则不超过4.5人。1973年，在较发达的国家中，只有爱尔兰的生育率超过3人。大多数较富裕国家的总生育率在2.5人以下。因此，两个世纪以来，所有较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实际上都增加了一倍，总生育率则减少了一半。

如果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同时下降的，那么，从1750年以来较发达国家人口的增加不太多。法国就有这种经历。法国的出生率和死亡率在十八世纪末以前就开始下降。结果，法国的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欧洲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不过合在一起，发达国家从1750年以来经历过人口异常增长时期，这样的加速增长到二十世纪初才停止。人口增长的原因是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下降幅度都超过了出生率的下降幅度，而且常常持续多年。

美国和法国一样，生育率的下降早已开始，从十九世纪初就已如此。但是，美国的生育率由于早婚的原因一直很高，所以出生人数依然比死亡人数多得多。其他大多数较发达国家的出生率是到十九世纪末或二十世纪初才开始下降。

人口转变的另一个普遍特征是出生率和死亡率稳定性的变化。现代以前，高出生率是比较持久的，死亡率却年年有变动，反映出疾病和粮食供应的变化产生的影响。在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里，这样的人口模式颠倒过来：死亡率保持不变，出生率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十八世纪末开始人口转变的原因是死亡率的下降。这个问题在社会史学家和医疗史学家中引起了争论。按照一个思想学派的主张，十九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医学发明不能算

作英国死亡率降低的原因，他们提出的主要因素却是平均饮食状况的改善。另一个学派认为十八世纪末开始采用的接种牛痘疫苗防治天花的做法足以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他们提出，十九世纪初死亡率的进一步降低可能是出于个人健康状况的改善。

第三种假设是，十八世纪以前是并非罕见的低死亡率的时期，但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大瘟疫引起死亡率极高的时期。按照这个观点，十八世纪末只是个暂时的正常时期，而十九世纪环境条件的改善扭转了下一个流行病周期的发生，否则将会造成高死亡率的再次出现。

无论死亡率开始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毫无疑问，环境卫生、公众健康和医药等方面的改善，使十九世纪死亡率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这一进程确实一直延续到今天。同样清楚的是，死亡率的降低还取决于粮食和其他物质资源供应的增加。生活水准的提高反过来又是因为种植的扩大，在西半球尤其如此，是由农业和工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高效率的贸易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而造成的。

除了十九世纪末的爱尔兰以外，比较发达的国家随着死亡率的下降出现了出生率的下降。它几乎完全是已婚夫妻生育率的下降，可以直接归因于采取避孕和人工流产的措施。然而，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发明新的避孕技术而产生的结果。在经过选择的 1910 年以前美国已婚夫妻中，在三十年代接受访问的英国夫妻中，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法国和几个东欧国家进行调查的夫妻中，控制出生率的主要方法是中断性交，这种方法总是有效的。出生率下降的原因是因为那种主张多子女既有利益也有责任的旧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但也可

能是因为夫妻在避孕是否正当的观念上有所改变。

出生率下降还可以看作是比较发达国家某些所谓发达特征的结果之一。在一个城市工业社会中，家庭不再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核心，人们也不再寄希望于子女来赡养自己的老年生活。相反，在工业化以前的农业社会里，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儿子是社会安定的一种形式。其次，在欠发达国家中，抚育和教育一个孩子的费用微乎其微，儿童很小就有可能为家庭增加收入。在工业国家中，童工是被禁止的，教育是强制性的，而且往往延长到青春期。这些条件使比较发达国家中的夫妻不愿形成规模较大的家庭，而在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中，社会准则往往支持多生育子女的行为。

据估计，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直到二百年以前一直为零。其后人口有不大高的增长，大约每千人增加四人。那显然是因为死亡率下降。死亡率下降的原因还不清楚。杜兰德曾提出，过去只在某个地区孤立地种植的主要粮食开始在地区之间进行交换，有助于欧洲的人口增长，也有助于亚洲的人口增长。特别是土豆引进欧洲，玉米和甜薯引进中国，都可能是促进人口增长的因素。

由于欠发达国家人口聚集的许多大地区至今尚无可靠的数字，因此，陈述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历史过程仍然是个颇难的课题。例如，十九世纪下半叶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增长率略有下降，这完全是因为把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估计为零，而这样估计的资料是不可靠的。不过，这些比较贫穷的国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人口开始迅速增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又开始加速增长，则是没有疑问的。

欠发达国家近来的人口巨大增长可以用人口转变来解

释，但是，这个过程在某些地区比工业国家所经历的过程更为迅速和急剧，这种转变至今尚未完成，它的未来进程也无法预测。死亡率已经急剧降低，但出生率仍保持不变，或仅略有下降。综观欠发达国家的人口状况，每个妇女生育子女的平均数为 5.5 人，平均寿命超过 50 岁，这样产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2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欠发达国家的死亡率比十九世纪欧洲的死亡率下降得快得多，主要原因是今天可以进口现代的技术，特别是医疗技术，不像一百年以前那样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发现和产生。欧洲人口转变期间，杀虫剂、抗菌素和公共卫生措施尚未为人所知，而这些在今天的欠发达国家中则已成为平常的东西。

按照联合国的估计，欠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在近三十年内从 32 岁上升到 50 岁，提高了 56%。在同一时期内，出生率的下降据估计不超过 7%到 8%。生育率的实际下降幅度更小，约为 4%，因为人口转变减少了生育年龄妇女所占的比重（虽然从整体来说，欠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仍然很高，但有些国家的出生率已有了显著的下降——下降幅度从 25%到 50%——而且下降的速度很快。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新加坡、台湾、南朝鲜、西马来西亚、巴巴多斯、智利、古巴、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波多黎各和毛里求斯。根据一些旅游者的报告，中国的生育率也有所下降，特别是在城市中）。

当前世界人口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高和其他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适中。按照联合国的研究项目，预计到 2000 年增加的人口中有 90%以上来自欠发达国家，尽管在今后的二十五年内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可望有大幅度的下降。因此，世界人口变化的未来进程主要决定于这些

国家的人口变化趋势。

人口转变的进程提供不出稳妥的方法来预测欠发达国家中的生育率何时或如何降低。工业世界的经历并不能为这样的预测提供满意的依据。过去两百年西方的人口史证明，人口生死率的正常降低是与现代化相辅相成的，但这无法提供一份有关文化水平的提高、死亡率的下降和城市化进程的一览表使人们可以估计到生育率何时将会下降。在比较发达的世界中，有一些事例可以说明在依旧属于农业社会的、文盲大量存在的、死亡率依然较高的人口中，会出现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现象，1850 年以前法国西南部的加龙河流域就是那样。另一些例子则是，只有教育几乎普及、大部分居民进入城市，只有少数人从事农业以后，生育率才能下降，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是那样。

当前世界人口的增长率为 20‰，几乎肯定是史无前例的，与人类历史大部分时期中人口增长率的标准相比，高出了数百倍。毫无疑问，这个增长时期是人类人口史上的转变时期。如果目前这种增长率保持下去，大约每三十五年世界人口便要加倍，每三百五十年要增加一千倍，每七百年增加一百万倍。这种速度的人口增长造成的后果显然是灾难性的：不到七百年，地球表面上的人口密度将达到每平方英尺就有一个人；不到一千二百年，人类的总重量将超过地球的重量；不到六千年，人类将形成一个以光速扩大的球面。如果要为未来的人口数量规定一个比较现实的极限，假设要使当前的人口不至于扩大五百倍，即不超过两万亿，又假设要使人口不至于下降到农业社会前的人口估计数以下，那么，在未来的一万年内，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或下降率必须降到接近于零，即同过去一

万年内的情况一样。

根据数字计算，在许多世代消逝以前，人口增长率必须回归到接近于零。这里无法确定的不是未来的人口增长率接近于零，而是未来的人口规模有多大，生育率和死亡率形成何种组合才能维持这样的增长率。可能的幅度是从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八个以上的子女而平均寿命只有 15 岁，一直到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略多于两个子女而平均寿命超过 75 岁。

者之一。从斯通教授的各种著作的书名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有广泛的研究领域，例如：《英国中世纪的建筑》(1955年)，《一个伊丽莎白时期的人：贺拉修·帕拉维西诺爵士》(1956年)，《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1965年)和《英国革命的原因：1529—1642年》(1972年)。

本文的写法是评述最近出版的关于日本和英国教育的几部著作：赫伯特·帕辛的《日本的社会和教育》(1965年)、R·P·多尔的《德川时期的日本教育》(1965年)、肯尼思·查尔顿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1965年)、若安·西蒙的《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教育和社会》(1966年)以及马克·H·柯蒂斯的“教育和学徒制”，载《莎士比亚研究》，第17卷(1964年)，第53—72页。

本文第一部分由詹森撰写，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由斯通撰写，但在撰写过程中，他们得益于互相商讨和评论。

一、日本德川时期的教育

1962年，东京的文部省发表了一本题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和教育》的白皮书。编写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外国观察家强调日本的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位置作出反应，它的导论要求读者注意对三个重要领域进行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本的经济增长归功于教育人材的储备；日本

集的资料。[①]与那时大量出现的府县志合起来看，这些资料似乎不是不可信的。当然，他们当时不可能考虑到识字程度问题，因为对任何社会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对于一个使用汉—日文字系统的社会来说，尤其如此。

多尔的著作中有些章节对德川时期日本教育的性质和受教育者所要读的是什么，作了极好的描述。他首先叙述了采邑学校。在德川时期武士基本上是不识字的以作战为职业的阶级。经过两个半世纪的和平时期以后，他们和土地分离，在很大程度上不再使用武器，转变成为官僚上层，三百多个采邑就在这些上层分子中选择官员。在这一转变中没有一个机构比官办的藩校更为重要的了。从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这类学校的数量迅速增加。藩校培训武士的道德态度，对一个世袭的统治阶级来说，这种道德态度被认为是职业需要。他们的学习目的并不是那么追求知识方面的乐趣或发现，而是纪律和准备服役，儒教经典由于重视身份和权威，符合这一目的，因而也受到了恭顺的对待。藩校施加一种仪式和官僚制度规定的课程，十八世纪初的课程只能用儒家的这一派或另一派的解释来分科，并逐步地局限在宋儒的正统范围内。多尔同意，“这种教育在实质上既不是促进和吸引个人兴趣的学校，对当时(十九世纪)的武士来说，似乎也不是一种用来达到个人或集团目标的手段。它极其枯燥，而且几乎毫无意义。”[②]

官办学校还用其他东西来补充儒学的精神食粮。多尔和

---

① 乙竹岩藏：《日本平民教育》，3卷本，1928年。
② 多尔：《德川时期的日本教育》，第152页。

帕辛也强调了十八世纪末日本的“民族学者”在复兴神道教时把日本语学习列入教学课程而带来的变化。到德川末年，勤王派历史学家赖山阳的著作模仿汉语课本的方式用汉语来叙述日本的过去，这本教材同汉语教材一样在学校中被广泛阅读。在许多地区，实际上是在所有重要区域，西学也列入学校课程，主要是讲授武器和战术。这些趋势使相当呆板的古典汉学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考虑这些变化时应当联系到约翰·霍尔几年前曾经提醒过我们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论点。他说，治国之道只是采邑学校教学内容中的一个部分，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武士的军事教育方面，这个领域中的教师往往是有较高级别的人。①

多尔尽管描述了儒学课程如何沉闷，但他对武士教育评价较高，不像“当时的武士”那样把儒学看作“枯燥无味”和“毫无意义”。他指出，儒学最起码是“寓教于学”。武士的思想受到了训练，而且学以致用。儒学的范畴为他们接受更现代的观念做好准备。他们也受到教育，要为政界服务和尽责，最初是为地区，最终是为国家服务和尽责。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界实际上使用的是同一种儒家经典，总的来说却没有出现同样的“现代化的大臣”。应当承认，在中国，起相反作用的因素太多了，例如士大夫带有农村的社会基础，万国之国的神秘感、科举制度及其对思想忠诚的挑战和奖励，这些都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德川时代的儒学教育本身并不排斥现代化。

---

① 见“德川时期日本的儒学教师”，载尼维森和赖特编：《儒学在起作用》，斯坦福，1959年，第296—297页。

日本的平民教育如何呢？多尔和帕辛都注意到强调“村学”这种平民教育，多尔还作了详细的叙述。在这一方面，若与满清时代中国的平民教育相比，差别更大，因为中国朝廷尽管鼓励乡村办学，但官员漠不关心，农村又贫穷，两者结合起来，限制了中国乡村学校的数量和重要作用。多尔指出，约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日本在学儿童迅速增多，接受乡村雇用的教师对他们的培训。

这些学校的教育内容也是儒学，其中搀杂了一些佛学。村学教师简化了复杂的经典，但仍然强调忠和孝。“父母如天地，师长如日月，余者如顽石”。与教育成就的直接关系是“不学则无知，无知则愚昧”。[①] 石田倍岩等平民道德学家把学习之道与伦理态度和行动等同起来。他说，“慎行为先，事尊长以公，事父母以爱，事朋友以忠，爱众怜贫……持家毋怠，量入为出，遵守法度，约束家人，为学之道，大抵如此”。[②] 多尔指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当局并不害怕传播这种教育，因为在一个公认身份制而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社会里，教育可以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恪守本分。

多尔和帕辛都一致认为，平民教育的传播是推动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对于各个社会集团来说，它都是“寓教于学”。帕辛指出，数百万个家庭把公共教育所需要的常规课程融入它们的生活方式之中，来自家庭以外的身份、声望和教育是日本大多数村庄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十九世纪，新的挑

---

① 帕辛：《日本的社会和教育》，第206页。

② 同上，第40页，引贝拉赫：《德川时期的宗教》，纽约，1957年，第149页。石田倍岩的教导主要是针对商人，但在仁宫尊视矩等乡村重建派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相同的观点。

战和新的秩序迫使政府开始把各种指示下达到这个岛国的各个地方。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政府十分易于把指示传达给人民。

不过，除了儒学强调和谐的调子和身份地位外，还有其他一些特征使德川时期的日本教育不同于现代的日本教育。多尔证明，举贤荐仁、量才录用以及与之有关的治政有责的思想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教育制度产生的必然结果。这种结果是更重视出身于特殊等级的人所取得的成就，唯一的原因是他们的人数超过了可能提供的职位。用“成就”和“抱负”等词的确很难说明德川时期末期的学校中大量涌现的人材。多尔从一份回忆录中找到了一个很突出的事例：“那个月，我们确实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多读了一页书，别人就要面如土色。我们没有时间来细嚼食物，尽可能少喝水，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把时间浪费在厕所里，让别人赶在前面——我们是多么渴望比别人多读上一二行。”[1] 虽然德川时期的社会秩序在名义上仍然坚持硬性规定的标准，但是只要有这样大量为成就和自我实现而艰苦奋斗的人，这种社会秩序就不可能静止不变。获得成就的道德标准、羞耻感、威胁和强调报恩思想，扩展到了平民当中。多尔摘录的村学格言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无知……让你本人、你的教师和父母都蒙受耻辱。谚语说，从三岁看百岁。下决心去取得成功吧，尽力学习吧，切勿忘

---

[1] 多尔：《德川时期的日本教育》，第211页。引语来自一篇回忆录，几年后刊登在一本鼓舞人心的杂志上。这样的学习强度一直保留着。一个世纪以后，当永井达夫参观日本一所遥远的“斯巴达克式的校园”时还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学生们为大学入学考试成功表现出神风队式的精神，每天早晨要齐声背诵：“别人读一遍，我要读二遍；别人读三遍，我要读五遍。把考试当作学生的战斗。我宣誓，从今天起，我要像疯子一样、狂人一样，发奋学习，来达到我的目的。”《朝日书刊》，1961年1月1日。

记失败的羞耻。"[1] 正如多尔所说，日本的各类学校都用提供自我实现的机会来鼓励这种志气。1885 年，文部大臣向师范学校的听众们保证，教育将会使他们的国家"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句话随便什么人听了也不会感到惊奇。[2]

像这两位作者一样，我们似乎也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德川时期，学校中的儒学思想影响着这样的努力，有助于导致服从更大的集体利益的方向。商人关心自己的商店，农民关心自己的村社，武士关心自己的领地。总之，多尔认为，总的说来德川时期日本教育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为政治和民族的目标承担义务。

在这方面，我们还必须注意保持谨慎的态度。首先，这种思想是通过日本的、尤其是武士的价值观念结构折射出来的，使它发挥实际作用。自我意识很强的上层分子所说的武士献身精神的责任感，意味着他们所学的任何书籍对他们都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不过，教育不是创造这种观念而是传播这种观念，首先传播到武士中，但更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这种观念传播到了农民之中，成为他们理想的伦理典型。他们毫无疑问地都可能成为现代领袖和教育家（在明治时期的日本，他们大多数是前武士）的牺牲品，但是人们对他们的一致意见也难以无动于衷，即认为武士的理想中有某些东西——例如对社会承担义务的意识、勇气和个人责任的严肃性——应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种精神也许受到了某种影响，但是被德川时期的

---

① 多尔：《德川时期的日本教育》，第 323 页。

② 帕辛：《日本的社会和教育》，第 68 页。

教育所加强，而人们必然会想知道它是否源出于学校教育。

在多尔先生对于德川时期的教育与日本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讨论中，人们还忽视了他对德川时期日本知识界生活中更广阔的潮流所作的某些阐述。他的参考材料表明他对那个时代的史料和作者是熟悉的。但是，他的著作会引起读者设想，德川时期的知识分子就像他们描述的学校教师的工作那样，非常接近于空谈正统观念。实际上，学术界近来强调日本德川时期的儒学、民族主义和西方传统等几种气质所具有的活力和重要性。我们从中了解到了严谨的儒家哲学在日本对神道教所产生的影响，了解到从事西方研究的学者与神道教学者即使不那么一致，但也建立了联盟关系。传统观念的中心不是在武士学校或平民学校，而是在私立学校中。创办这些私立学校的人往往保持着对政治权威的惊人独立性。虽然官办的藩校在德川时期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发生了转变，服从将军的指示，但是封建制度的政权分散往往容许许多地区性的智力实验。大给空井(1666－1728)等一些著名的儒学政治理论家认为必须应用古代中国的一般原理来解决日本当前的问题，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唯意志论的方法，强调不应简单地模仿哲人而应当像哲人那样行动。所有这些在培养“实用知识”方面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后来，当他们看到了更加合理和更加实际的榜样时，这种实用知识便提供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向现代目的转变的桥梁。①

关于德川时期的讨论，帕辛在各个方面都与多尔一致，不

① 见麦克伊方：《大给空井的政治著作》，剑桥，1962年。关于大给空井对日本政治儒学现代化的贡献，见丸山正夫：《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1952年。

过更概括。他更加热切地强调明治以前十九世纪的酝酿时期。在他看来，德川时期的教育中，重要的事情是上层阶级的教育所创造的方法给日本各个地区提供了“可以普遍应用的教程”，使不止一种地方群体产生了成员意识。他提出，早在明治改革以前，真正的民族意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

帕辛然后以极快的笔触勾画了德川时期教育的变化，这使他在充分思考的基础上肯定文部省的白皮书所提出的教育与日本发展的关系。首先，他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过程。明治维新以后只过了二十年，学校的入学人数就急剧上升。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虽然没有先于工业化，但至少是同工业化同步发展，最终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初具规模。职业教育并不是工业化的结果——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正像文部省力图证明的那样，但它还不足以把“道德”教科书同他们(传统上)所强调的现代日本社会中崇尚节俭、自律和高积蓄的倾向联系起来。二十年前，教育理论家罗伯特·霍尔指出日本的灾难性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代教育制度的缺陷造成的。[1] 回忆起霍尔的结论，那些认为后者必是前者的结果的逻辑学家应当从中得到有益的告诫。

以上这些思考提醒我们，现在研究日本的经历是为了解释其现代化的成功，而在几十年以前，这样的研究是为了寻找证据来证明它的缺陷，解释其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和侵略行为产生的根源。一个世代以前，现代教育家认为儒学一神道教思想意识具有相当大的威胁性，现在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比较温和的语调了。诺曼认为，日本政治的封建背景说明它的错误所

① 霍尔：《新日本的教育》，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0年。

在，而现代化理论家现在却强调德川时期制度发展中多中心和竞争性背景的好处。在这样的重新评价中，儒学教育家的原理开始占有一席地位。

重要的是，在进行这项讨论时必须牢记把时期和目的区别开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现代"儒学"和德川时期的"儒学"的区别。政府领导人由于害怕个人主义伦理的兴起，在他们有意订立的价值观念规则中以现代"儒学"作为主要内容向年轻人灌输。德川时期的儒学是通过某种范畴来观察世界的方法，也是一种可以包容大多数其他事物的传统。现代"儒学"则是一条狭窄的防护界线，防止道德的混乱。德川时期和明治时期的大多数领导人能够表现出宽怀大度和融洽和睦，因为他们扎根于一种仍有活力并充满意义的传统之中，即使他们有时也批判这种传统不适用于现代世界，但仍然坚持这种传统。但是，第二代领导人援引祖先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则是为了恫吓第三代人。由此而产生的"儒学"似乎变得越来越渺小和狭窄，歌颂它的人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现在已经到了重新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了。帕辛富有思想性的评论和多尔对德川时期背景的权威性描述为这样的讨论提供了资料，并把我们对日本教育和现代化的思考置于更坚实的分析层次上。

二、英国都铎时期的教育

近十年来，英国都铎王朝教育的数量、质量和目的成为一个活跃和精深的研究主题，最近有两本著作和一篇纲要性论文对这个领域作了研究。以柯蒂斯教授为首的一个学派把

1550年到1660年这个时期看作是真正的启蒙时代，当时政府、知识分子、绅士和商人一致认为严肃的教育对于创立一个伟大的社会最为重要，并且下决心为此做些工作。这种热忱是由多种力量产生出来的。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从教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诸如柯勒特、伊拉斯谟和维夫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经典著作及《圣经》的训练是统治阶级上层提高道德修养的必要前提；新教改革家要求普及文化，让民众阅读翻译成本国语言的《圣经》，要求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形成新一代的宗教思想；最后，还有社会上的保守派，他们希望通过培养世袭的上层阶级来担任这个新兴世俗国家的重要职位，从而支撑有等级的社会结构，把社会流动缩小到最低限度。

现在人们都同意，过去所说的解散修道院和礼拜堂的法令破坏了教育是胡说。大家也同意各级教育设施实际上在那个时期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据估计，到1660年，30%的成年男子能识字，每4400人就有一所学校（可与1870年的数字比较一下，那时每23700人才有一所学校），接受高等教育的男子所占的比例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任何时候都大。

但是，教育质量及其与社会特征的关系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贫穷劳动者的有聪明才智的儿童被拒于文法学校和大学的门外。但手艺人、不动产终身持有者和自耕农以上的儿子可以登上教育的阶梯。这些争议还涉及到学校中教授的古典语法有什么作用，各个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开设了科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等新学科，这些学校和伦敦的四所律师学院在多大程度上为绅士提供了有用的训练。柯蒂斯教授认为，正式课程表实质上虽然没有变化，但历史学、天文学和解剖学等教授

席位的创立为新的课程提供了公开的讲坛。印刷所的大量出版物为自学提供了新的机会。在纪律严明的学院生活中，私人导师制度取代了陈旧的、公认为腐朽的教学组织。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可以说，在大学旧式框架的隙缝中确实为培养行政官员、政治家和法官的有实用价值的课题提供了讲坛。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西蒙夫人持有一种不太乐观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她的最终态度又不大肯定，往往一叶障目，无法弄清她的整个观点。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为在我们掌握的这个领域中，她的著作无疑是最富有学术性和范围最全面的调查研究。她的著作对于我们了解都铎王朝初期发挥作用的人本主义和宗教改革力量之间的关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进入伊丽莎白时期后，她便显得不那么自信了。查尔顿先生的著作在学术上比西蒙夫人的著作肤浅些，但他提出了西蒙夫人未曾探索过的论题，例如私人导师制和"大旅行"的作用。他对问题的研究非常透彻，在观点上与柯蒂斯教授针锋相对。他论证文法学校的课程是单调反复的死记硬背的学习体系，不能启发学生的思想，而且破坏了风格。弥尔顿轻蔑地称之为"学究式"的教学过程，产生了更为奇形怪状的文学成果，其中有托马斯·布朗爵士的一些著作（就是把拉丁词 festina lente 翻译成"愚人之捷"的那个布朗）。至于大学，他提出这些学校依然迷恋于亚里士多德主义，在科学、历史和现代语言方面没有作出什么明显的贡献。此外，作为研究中心，这些大学甚至落后于欧洲大陆，都铎王朝的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几乎都没有产生对《圣经》和古典文学的认真学术研究，大多数教师看来都全神贯注于神学的毫无结果的辩论中，或寻找使他们有利可图的上层阶级的学生。查尔顿先生提出，假如

说地主阶级成功地避免了这种教育带来的有害影响，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对待这种教育，而是无忧无虑的度过时光。他认为伦敦律师学院同样没有起到促进教育的作用，贵族和绅士们在这些学校里只是虚度光阴而不是学习普通法。他认为都铎王朝的唯一可谓有价值的目的服务的一种教育形式是私人导师制和国外"大旅行"。他论证说，英国印刷所的出现，古典作品的大量翻译，大量技术手册的问世，使这些天生懒惰的年轻人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事实和思想。他们到欧洲大陆去旅行，开阔了思想，用他们合理的观察来评判本国的制度。

因此，查尔顿在结论中认为——西蒙夫人往往支持他的看法——英国在十六世纪就播下了现代教育的种子，但大部分没有结果。那时所取得的进步实际上是个别人的首创精神的结果，而不是由于有组织的制度习惯的变化。英国教育的现代化必须等到十九世纪末的改革，把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荣誉学位奖金制引进大学，但即使到那时，科学依然很少得到鼓励，技术更是完全得不到支持。

后文还要见到，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英国教育没有采用更现代的、实用的和科学的课程，这种责备完全符合事实。对文艺复兴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往往被认为有些批评不当的方面，查尔顿先生的著作做了有价值的修正。但是，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他对十六世纪制度化教育的结果整个加以谴责有些过分。显然有些人确实怀着由衷的感情和对古典文学的重视在文法学校里度过时光，他们利用图书馆的藏书来作判断，而且热爱古典著作，他们的作品中常常旁征博引。有些人确实以认真的态度升入大学，学会了一些逻辑学、修辞学和哲学的知识，这在他们写给父母的信和导师的叙述和信件中

可以显露出来。许多人确实学到了习惯法的大量知识，大概是在伦敦律师学院里，他们从图书馆、议会演说和没完没了的诉讼通信中作出判断。其次，大学的正式课程虽然像查尔顿先生所说的那样枯燥和陈旧，但有些迹象也表明，不时有一些进步的先生在向他们的绅士般的学生讲解比较现代的课题，而这些学生并不以考试及格来约束自己。不管怎样，查尔顿先生对教育质量的批判性研究中所忽视的是各级学校质量的非凡提高，其变化幅度之大，足以创造一个全新的知识环境。最后，培根、拉雷、本·约翰逊和多恩时代的文化成就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同寻常的。这同他们得以闻名的正式教育背景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①

人们一般都同意下述说法，即十七世纪中叶英国上层阶级的知识成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英国和外国的评论者都证实了这个事实。当时有那么多的贵族和绅士在历史、法律、文学、建筑、音乐和艺术方面具有很多知识也可支持这个事实。由于贵族、上层绅士和极少数的小绅士才可能提供私人教师和"大旅行"的大量费用，因此可以设想，正式的教育制度尽管存在着缺陷，但也在不小的程度上造就了这个文化上生气勃勃的时期。

然而，人们无论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实际价值是持乐观看法还是持悲观看法，问题仍然在于解释当时的人为什么一心一意、如醉若狂地要去掌握这种僵死的语言，而且要

① 见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牛津，1965年，第7章。柯蒂斯：《转变中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1558－1642年》，牛津，1959年；弗莱彻：《约翰·弥尔顿的思想发展》，厄巴纳，1956－1961年；斯通："英国的教育革命：1560－1640年"，载《过去和现在》，第28卷（1964年），第41－80页。

和毅力有关系。因此，拉丁语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取代了中世纪的骑士法典，发挥了与原始部落发育期仪式同样的作用，使上层阶级的年轻人脱离家庭环境，训练他们的坚强意志以便日后在成人世界中敢于冒险，教给他们一种神秘的智慧使他们有别于其余居民。这样它就加强了绅士与其他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别，产生了一种带有强烈施虐倾向的上层阶级（不知英国怪脾气的传统是否就从这时开始？）。因此，学校中的拉丁语法教学为被选择出来的少数人提供长期的发育期仪式那样的教育，这种作用的结果是加强了都铎王朝社会中的等级结构。

三、日本和英国的比较研究

经济发展史上取得成功的两个最令人惊奇的故事发生在离欧洲和亚洲大陆不远的两个岛屿上。英国是在它内部缓慢而较早地发展起来的；日本却靠有选择地采用其他国家创造的思想和技术迅速而较晚地进入现代世界。然而对十六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和日本的社会结构、教育制度和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可以揭示出一些颇有意义的东西。这里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比较：都铎王朝晚期的英国和十八世纪初德川时期的日本之间的比较；都处在革命前夕的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和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之间的比较；以及十九世纪的英国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日本之间的比较。

首先在社会结构和教育制度方面进行仔细的比较。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和德川时期的日本都在大约二百五十个贵族（大名）家族和数量大得多的绅士（武士）家族的统治之下，其

产生的吸引力。最后，英国都铎时期和日本德川时期的商界在观念上都带有强烈的传统性和保守性。创业的主动精神和承担风险的资本在这两个社会里大部分来自上层地主阶级。[1]

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些明显的不同。虽然两国都是由地主阶级统治着，但在关系的型式上，一个已经是契约型，而另一个却依然是封建式。英国把鼓励对外贸易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首要动机，日本却禁止对外贸易。在工业化以前，英国资产阶级在任何时候起的作用都比德川时期日本资产阶级起的作用大得多。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被同化为地主阶级的过程在英国相当容易（第二代资产阶级一般都能做到），但在日本，直到德川时期末期仍相当困难。在个人自由和经济生活方面，英国佃农和农业劳工的状况比日本的好得多。在日本，人身劳役制、对土地的依附以及沉重的赋税负担是正规的。这两个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都是为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服务的。但是，英国人与日本人不同，始终处在具有潜在颠覆性的各种异端例如清教和不服从国教者的严重挑战之中，由此造成的从属关系和等级在英国遵守得不大严格，而在日本则比较严格。上层阶级中的激进主义是英国长期存在的特征，而在日本直到德川时期的末期仍属罕见。

这两个社会在相当早的时期已使教育摆脱了僧侣的垄断，英国是在十六世纪，日本是在十七世纪。两国都为上层阶级设立了学校。这些学校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教育儿童服从上级的品德，以便保持社会稳定；第二是传授战术，因为这是他

① 关于英国，见斯通：《贵族的危机》，第7章。关于日本，参见赫斯迈埃：《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起源》，坎布里奇，1964年，第1、7章。

们获得特权地位的正当理由；第三是传授技术和技能，使他们具备能力在官僚制度不断加强的社会中担负繁琐的行政管理工作；第四是在学术上重视古典著作，认为一切智慧都蕴藏其中；第五是培养行为举止、各种本领和美学兴趣，以便使他们与社会上其余人有所区别。[①]在十六世纪，英国有三位先进思想家，即托马斯·斯塔基、尼古拉斯·培根和汉弗莱·吉尔伯特，都曾游说为贵族开设国家资助的学校，但没有成功。在十八世纪末，日本的幕府拨款、帮助和管理为武士设立的一所学校，即武士学校，树立了一个榜样。多尔先生对日本德川时期教育制度的描述，读起来几乎完全像是都铎时期的教育理论家罗杰·阿夏姆、理查德·马尔卡斯特和亨利·皮查姆的著作中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教育制度的描述：

> ……教育的方法是由中国著作提供的，尤其是儒学经典；它的目的首先是要提高道德品质，既把它作为人类的绝对义务，又是为了让武士更好地行使社会功能；第二个目的是从经典中学到关于人和事物的知识以及统治原则的知识，这对于武士恰如其分地尽其职责也是必要的。其他某些职业技术知识虽也需要，但不可能从中国的经典中获得。还有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研究本身也可以为不断加强美学情趣的形式给他们带来某些合法的附带好处。[②]

---

① 霍尔："日本德川时期的儒学家"，载尼维森和赖特编：《儒教在行动》，第297页；斯通：《贵族的危机》，第680页。

② 多尔：《日本德川时期的教育》，第59页。

这两个社会都对很早以前用外语写成的著作——英国的拉丁文古典著作，日本的汉语古典著作——进行仔细和反复的研究，以此作为上层阶级教育的基础。两国都把精力集中在精通几本被认为是概括人类智慧和经验的基本著作上，英国要求掌握西塞罗、维吉尔、亚里士多德和普卢塔克等人的著作，日本要求掌握四书五经。正如马基雅弗里从古典著作中归纳出治国方法的范例一样，日本人也回过头去从中国的经典著作中去寻找战术的范例。两者都认为教育是一种约束身心的形式，是一种讨厌的苦行，显然而几乎是故意避开一切享乐和知识的刺激。对儿童的注意力始终保持在语法和句法的精确性上，英国采取的是虐待性的野蛮方法，日本则依靠比较微妙的心理压力。两者都不认为学术是绅士身上一种可取的属性，热切追求学问让求取职业生涯的社会地位较低的那些人去做。在这两个社会中，学校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产生一个受过充分训练的上层阶级来为国家服务。视知识为业余爱好是这两个社会的表征，也是一切贵族的表征。不过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军事训练在日本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尚武观念直到十九世纪依然受到崇敬，而在英国，贵族教育中的军事成份到十七世纪初已经是只留痕迹了。

两国的教育制度在成绩与社会等级发生冲突时总是给后者以特权。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同日本的藩校一样，贵族子弟另设坐位，穿着也与众不同，还有随从服侍。由于英国的绅士和贵族取得学位的极为罕见，来自社会下层的学术上的直接竞争从来不会威胁到他们。在这两国的教育制度下，晋升提拔主要依靠世袭地位，成绩仅居第二位，而且只有在维护行政制度的效率时才被认为有其必要。当许多贵族成年时，他们施恩

于渊博的学者，让他们充当扈从，出谋划策，或教育他们的子女，或以此来提高声望。十七世纪日本各藩的“贤士”所发挥的功能与托马斯·霍布斯在查特沃思为德文郡伯爵卡文迪晋家族服务时的情况完全相同。霍布斯指出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的选择都需要权威的思想，与他处于同一个时代的德川家康手下的贤士林良诚的思想十分相似。贤士们为社会等级秩序的合理性作了系统的辩护。这种活动与英国都铎王朝宗教知识分子的活动完全相似，也是在国家和贵族的庇护下进行的。[1]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英国和十九世纪初的日本一样，在上层阶级教育结构之下，也产生了平民教育制度，由领主和私人慈善机构资助，为中产阶级提供了技术和图书保管方面的训练。在此以下，这两个国家还出现了初等教育的普及，主要限于基本的读写和道德教诲，当然特别需要教以服从上级的品德。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正是这个时期在欧洲取得了技术领先的地位，它主要不是依赖自己的大量发明，而是依靠率先利用其他国家的发明(这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相似)。英国人在这个时期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强烈好奇心，他们在欧洲和美洲到处旅行，并把所见所闻向国内报告。英国模仿德国的采矿技术并加以发展，向法国模仿铸炮技术，向荷兰模仿新的纺织技术，向葡萄牙和西班牙模仿造船和航海。这些进步像日本人一样，大多数出于政府的计划，而不是由于私人投资。其动机是为了

① 霍尔："日本德川时期的儒学家"，载尼维森和赖特编：《儒教在行动》，第297页。

保证国家的安全，而不是为了经济增长本身。可是政府的活动加上下层阶级的技术教育，最终刺激了国内企业的发展。1626年，一位威尼斯人说道："老实说，英国人是很有见识的民族，他们非常聪明……他们的发明非常巧妙。"[①]

对外部世界的这种好奇心以及对吸收和发展其他人的思想的这种愿望，都是因为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人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并无盲目的自豪感（只是到了十六世纪末，英国宫廷内才开始出现反应性的民族主义）。这可与十七世纪初中国人第一次面对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天文学时的态度比较一下。在中国，熟读经书的中国士大夫阶级有强烈的文化自豪感，阻止他们吸收任何别的思想。"军事失败是应该获得西方知识的技术原因，但也是不应学习西方知识的心理原因。"中国人在面临西方科学和技术的挑战时，宁可承认军事上的失败，却不愿意在心理上因承认他们民族文化的缺陷而受到的冲击。[②]

第二种比较是革命前夕的英国和日本之间的比较，也就是对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与十九世纪中叶的日本进行比较。在这两次革命的背后，两国的社会利益集团和思想有着颇为有趣的相似之处。这两次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心怀不满的绅士们举行的反叛。他们接受的教育告诉他们有统治的天职和如何去统治，但是，他们想要获得权力和责任的愿望却被少数腐败和无能的宫廷上层分子所扼制。而况这两次革命都发生在成年男子的识字率超过三分之一的时候。[③] 这两次革命

---

① 转引自契波拉：《炮与船》，伦敦，1965年，第41页，第87页注②。

② 同上，第120—121页。

③ 对于英国，见斯通："英国的教育革命：1560—1640"，载《过去和现在》。

都发生在经历了一个世代的知识分子提出怀疑并展开辩论之后，发生在旧的等级制社会关系出现了许多削弱迹象之后。这两次革命都是制订以外国为榜样的影响深远的教育改革计划的前奏。英国长期议会采取的最早步骤之一就是邀请负有盛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访问英国，提出意见。在革命时期，科学家聚集于牛津大学，制定了普及初等教育和创办第三所大学的计划。在查理二世复辟后，皇家科学院在创建的最初几年里力图促进军事和工业技术方面的发明，这些努力的效果不大，但在思想上与日本采取的步骤基本相似，不过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夕和明治维新以后采取了更为彻底和更有成效的步骤。1855 年，德川幕府设立的西学学校在几年内就教授西方语言以及西方数学和科学，而培根早在十七世纪就为英国提出建立类似的科学机构的计划却一直未获成功。

在日本，革命是向现代化大踏步前进的必要前奏，在一个世代以后，出现了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浪潮。但是，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却没有这种引人注目的经济和科学后果。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并不是愿望上存有差异，而更多是取得的成功有差异。在日本，革命领导人开始对追随他们的武士和大多数人民保持控制，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头上。在英国，革命实验遭到失败，接着就是 1660 年的旧制度恢复。不管怎样，明治时期的领导者对改革道路的认识远比奥利弗·克伦威尔更加明确。后者没有榜样可以仿效，前者却知道现代社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如何去实现。最后，克伦威尔尽管使用了军事独裁手段，但政府的权力十分薄弱，明治改革家们却掌握着更为成熟和有效的官僚制度。因此在英国，对教育、社会和法制的改革运动都失败了，技术进步似乎也受到了阻碍，国家回到

了爱好古典教育的保守的上层地主阶级的传统统治之下。通过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人数减少了，而且崇古派击败了现代派，文法学校和大学的课程到十九世纪一直保持不变，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回复原状。

第三种比较是对这两个社会在十九世纪的比较。英国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仍在地主阶级的统治之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上层阶级教育的基础一直是掌握古典学问，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维多利亚时期的公立学校得到恢复，目的是向新贵的子弟传授旧的地主阶级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并培养他们律己和充任公职。这种教育要求严格的道德品质，目的完全在于训练上层阶级，以满足这个繁盛帝国对有效率的和家长式的行政制度的需要。它也提供了一种教育，使1855—1870年的诺思科特—特里维廉的改革所创建的合理的官僚制度有可能引进竞争性的文官考试制度，也使改革后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有可能建立助学金考试制度。这些措施的目的和结果都是使上层阶级的统治一直维持到新的时代，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F·W·梅特兰所说，实现得太好了。他在1905年发动了一场斗争（当然是失败的），要求取消希腊语作为剑桥大学入学的必修课。他说："说到底，这是个社会问题。……学会希腊语——或者完全是同一东西——并自称会说希腊语便成为无法消除的阶级差别。"[1]

只有富裕的上层阶级才能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接受古典的、形式主义的文学和伦理课程的教育，也只有通过竞争性的

---

[1] 转引自菲富特编：《梅特兰书信集》，载《耶鲁法学杂志》，第75卷（1965年），第178页。

考试才可能进入政府部门充当官吏，而考试内容同样又是围绕着这一套课程进行。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与中华帝国的制度极为相似。① 两者都属于所谓"控制流动"的典型。② 在社会结构和上层阶级的标准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上层阶级从下层阶级的幼年子女中精心选拔出极少数人，按照上层阶级的价值观念实行社会化并用上层阶级的文化进行培训。这种方法使竞争受到了限制，等级制度得以保存，同时又允许某些有选择性的向上流动出现，以便弥补上层阶级在人数和人才方面的流失。

在英国，要求改革的压力来自本土，基本愿望是要在维护上层阶级权力的同时又要提供有效率的政府去管理国内的城市化社会和远在海外的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准确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中国的先例。这些措施首先在印度采用。早在1833年，印度已经开始采用考试制度，特里维廉曾经亲眼见到过这种制度的作用。③ 这种制度对于产生更好和更廉洁的行政管理来说是可取的，但是从它的功用来看，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中国，对满足现代工业社会技术需要实际上等于零。

如果我们从十九世纪的英国转而讨论十九世纪的日本，那么它们之间的某些差别就很明显。英国在1750年与1870年之间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但又保留了贵族

---

① 威尔金森：《绅士式的权力》，牛津，1964年。

② 特纳："控制的和竞争的社会流动与学校制度"，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5卷（1960年），第855－867页。

③ 见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7卷（1943年）；Y·Z·张："中国和英国的文官制度改革"，载《美国历史评论》，第47卷（1942年）。

式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失调的上层阶级教育制度。一个世纪以后，日本开始了同样的过程，但它选择的是另一种模式。它保留了许多贵族的权力结构，但摧毁了上层阶级的教育，取消了上层阶级的许多社会特权，破坏了上层阶级中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便向现代世界突破。在这个高度极权主义的社会里，一部分不顾一切地主张现代化的上层分子夺取了政权，并且殚精竭虑地抛弃了一切无助于强化国力的东西。这两个国家在工业化的整个过程中都保留了传统的权力模式——这一事实引起了经济增长理论家的极大兴趣。多尔和韦布伦的论证或许是正确的，他们指出，迅速的工业化和社会流动是压在军事等级（武士）所统治的等级制的和有高度恭顺性的社会结构之上的一种东西，由此产生的氛围和紧张关系造成了 1890—1894 年的英国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日本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勃兴。但是，十九世纪末的日本拒绝模仿中国在教育和补充政府官员方面的榜样，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对付西方各国时证明了它在军事上的软弱，而正在此时，英国却吸收了中国的榜样中最基本的成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上层阶级教育筹划了一种过去制度的改进版，它不仅保留了明显的阶级划分（而且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在课程上保持厚古的倾向，日本却正在朝相反方向前进。

1869 年，东京大学成立。它的教学目的非常明确，要把儒学的伦理和西方的技术结合起来，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铸造日本民族主义的熔炉。一年以前，著名的教育家福泽渝吉创办了庆应大学，这是日本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并提出了独立和实用的办学宗旨。通过他那些非常普及的著作（到 1867 年已售出一千万册）[①]和讲课，他努力促进社会态度的根本转

变，从而使商人从最受日本社会轻视的对象转变为受到高度尊敬的和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日本武士中产生的新精神以及强调高等教育对从事商业活动的必要性，与爱德华时代的英国形成鲜明的对照。英国接受古典教育的上层分子中普遍存在轻视商业的绅士态度，直到今天，英国商界仍然缺乏高等学校毕业生。[②]1872 年，日本颁布法令，最终取消了双重阶级的教育制度，并以法国和美国为榜样，开始推行统一和普及的全民教育制度。可是英国过了一百年以后还没有采取同样的步骤，尽管这两个国家在 1870 年同时实行了强制性的初等教育。

为什么日本武士能够接受教育制度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宁可降低他们的社会地位并削弱了他们的特权，而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贵族却想出一些新的巧妙方法来保持自己的地位，放弃了国家权力赖以生存的那种经济制度的价值观念呢？多尔先生认为，日本武士之所以默认这样的变化，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教育的功能是谆谆教诲服从思想（十七世纪英国的上层阶级备经艰苦才弄清普及下层阶级的教育与政治和社会的激进主义是有联系的，日本武士却从未受过这样的教育）。其次，阶级斗争是十九世纪英国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日本却没有（在德川时期的两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里，日本发生过一千二百多次农民起义，似乎能使人对这种恬静生活的描述有些怀疑，但多尔先生不予考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孩子们不时发脾气，并不能证明日本的政治制度已病入膏肓”）。第

---

① 指他所著《劝学篇》、《文明论概略》和《帝室论》。——译者

② 赫斯迈埃：《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起源》，第 5 章。

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工业企业家中几乎没有一个受过英国古典的和绅士式的教育。

如果我们要问日本，第一个问题就是德川时期的教育如何为明治维新以及一个世代以后惊人的经济增长铺平道路？十九世纪中叶日本的识字率极高，使日本可与任何非西方国家相比。这必定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多尔先生正确地认为，它产生了四个效果。它保证了“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审慎地获取新知识的过程”；它表明社会流动的愿望不断增强，这种愿望在明治维新摧毁了社会保守主义的外壳后终于能够实现；进步论的思想在日本深入人心；它扩大了潜在的人才网络，日本未来现代化的领导人可以从中选拔。事实证明，明治时期初期的主要企业家中有四分之一来自农民；[①] 最后，它使日本人民习惯于书面文字形式的管理。

那么，上层阶级的教育，即武士教育又起了什么作用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的教育与英国上层阶级的教育一样，都以伦理道德为目标，以死记硬背为方法，以古代经典为内容。不过，多尔先生认为这种向后看的教育也有其作用。[②] 最有说服力的论证是依靠教育的数量而不是它的质量，也就是说，只要接受了某种类型的精神训练，不管内容是什么，就会使人们习惯于认为教育本身是正常而且合理的思想。但要解释这种特殊类型的教育，产生什么有利的影响较为困难。多尔先生的第一个论点是按照达尔文——或汤因比的——理论，即适者生存，也就是说一些有求知欲的人之所以能在这个

---

① 赫斯迈埃：《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起源》，第 249 页。

② 多尔先生在后来的论文中更明确地发展了他的论点，该文载詹森编：《日本对待现代化态度的转变》。

制度下生存下来，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挑战的伤害，而是受到挑战本身对他们产生了积极刺激(正如有些人在英国公立学校的古典教育中生存下来而且存在至今)。其次，詹森先生强调指出，在这些学校里产生出非常强烈的竞争本能——它比英国同类学校中产生的竞争本能强烈得多，何况在英国，竞争基本上限于运动场内——对于创造"任人唯贤社会"的气氛，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儒学的世界观基本上是理性的，因此，按韦伯的话来说，它对现代世界很能适应。阿尔伯特·克莱格先生在最近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论证了新儒学在接受现代科学时几乎没有什么来自神学的障碍。伽里略或达尔文在基督教欧洲所遇到的那类来自宗教的抵制，在儒学的日本从未发生过。[①]

这个论点已经说得很明白，尽管观察得到的事实是现代化并不依靠某种统一的理性观点。在日本，现代化过程随着神道教的迅速兴起而产生。精心炮制的神道教是发展民族意识和实现国家统一的理想工具。尽管神道教发挥的功能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样一个事实仍然存在，即从观念上说，崇拜天皇本质上就是非理性的和原始的，对日本二十世纪初勃发的民族扩张和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起了重大作用。还需要作出解释的是，为什么儒学在日本对吸收西方思想起了促进作用，而在中国却起了精神障碍作用？

如果日本这种以武运长久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是推动教育变革的力量，那么另一个问题就是，使日本武士如此惊人地勤

---

① 克莱格："日本德川时期的科学与儒学"，载冉森编：《日本对待现代化态度的变化》。

势的时期可以追忆，他们不遗余力地准备维持和加强他们的民族独立和力量。其次，英国公立学校的古典教育所导致的自觉的业余特点和岛国民族主义意识，大大加强了英国人对过去优势地位的缅怀。在维多利亚时期晚期，每个成功的企业家都不可避免地要他们的财产和事业的继承人接受这种教育。十九世纪末，正当英帝国的海外扩张到达顶峰时，英国的工业增长开始落后，保守主义和惰性开始成为英国企业家阶级的特征。当正在进行改革的日本武士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以西方各国为榜样扩大大学和发展技术教育时，英国公立学校培养出来的政治领导人却保持上层阶级视高等教育为少数人禁区的观点，对基本的机械工艺知识持传统的蔑视态度（马休·阿诺德的反物质论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态度）。到1900年，英国的高等教育在数量上已经落后于法国、美国和德国，它的化学家和工程师也变得远远少于它的主要经济对手。业余主义的崇拜和古典研究的优势在英国大学里竟达到了如此地步，致使英国甚至在历史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内，也把领先地位让给了德国，在那里，博士生的专业培养正在全面进行。结果，在维多利亚时期晚期，尽管英国还存在工商企业家的活动，但其形式是大规模生产和分配方面的组织革新，而这些革新却是一批从未受过公立学校的古典教育也未受过牛津大学式磨练的下层中产阶级实行的，李普顿、吉尼斯、布特和考陶尔德等都属于这个阶级。一些老企业停滞不前，因为创业者的子女吸收上层阶级的伦理道德，把精力转向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事慈善事业和政治活动。①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日本武士能够比较容易抛弃他们的古典教育制度，而英国的上层阶级却以非同寻常的固执态

度去坚持这种教育制度。在这方面，人们只能做一些推测。也许是中国古典经学极其神秘幽晦，它与日本过去的历史和当代的经历都显得大相径庭，从而产生了特殊的区分。这正是现代日本思想的一个特征。把不同的知识和思想划归不同领域的习惯有助于在传统方式下训练出来的武士掌握西方的技术，不管它是来自异邦，也有助于他们并不引为羞耻和困扰地去模仿其他文化的发明和制度来作为发扬自己那种难以控制的民族主义的一种手段。

另外两个有古典教育传统的社会却远远没有认识到它们研究中的神秘性，所以没有压力迫使他们去加以区分。对中国人来说，古典著作是他们自己的历史传统中极为重要的和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若干个世纪以来，文化自豪感妨碍他们吸收西方思想。对英国人来说，古典著作实际上是外来的，但是他们力图用各种方法去认同古代世界。当英国人在十六世纪首次开设古典课程时，他们（或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把有关十二世纪王朝世系的传说向前追溯到荷马时代一位特洛伊人布鲁图斯。据说他是在特洛伊城被围时逃出了这座注定要毁灭的城市。亚瑟王的传说也被硬扯进来，证明罗马帝国与英国之间的联系，他们还经常说伊丽莎白女王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件绣有盾形纹章的袍服，在斜形纹章上划分为四个部分，上面刻有S·P·Q·R·的字样（即 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意为罗马护民官），证明她出身于古代贵族世家。②

---

① D·H·奥尔德克洛夫特："企业家和英国经济：1870—1914年"，载《经济史评论》，修订本第2集，第17卷第1期（1964年）；威尔逊："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晚期的经济和社会"，载《经济史评论》，第18卷，第1期（1965年）。

② 肯德里克：《英国的古代文化》，伦敦，1950年，第11卷。

十九世纪末,维多利亚时期晚期和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人可以而且事实上在理想和宪政方面把他们的社会与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社会认同,在对帝国使命的意识上则与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帝国认同。两个政党都在古典著作中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于年轻的自由党人里查德·利温斯顿和阿尔弗雷德·齐默恩等来说,五世纪的希腊对他们有特殊的吸引力。利温斯顿走得更远,声称:“格莱斯顿先生对自由的定义就是信任人民,谨慎中庸。去掉后面四个字,就是伯里克利的原则。”他说,“我们的工业阶级与希腊奴隶之间的差别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差别”,以此来解释奴隶制在希腊社会中的作用。罗马帝国自然对托利党更有吸引力。布赖斯勋爵、克罗默勋爵和查尔斯·卢卡斯爵士等既是学者又是殖民地总督,他们孜孜不倦地重新解释罗马帝国,以此来观察二千年后的英国存在的问题和愿望。这两个集团都能利用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著名演说和罗马帝国的许多文献来提高民族优越感。于是,爱德华时代的统治阶级便对这些思想作出反应,认为他们通过阅读古代的经典著作可以从中获得这些思想,即厚古薄今,对资产阶级的活动和价值观念以及他们本人的蔑视,民族优越感和帝国使命感,把公立学校、大学和军队作为使整个有丈夫气的社会理想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教育制度的辩护士尽管也批评学校的课程只重视形式不重视内容,而且这种缺点在二十世纪越来越严重,但他们依然坚信古典教育与有竞争性的、科学的和工业的现代国家并不是互不相容的。[①]

除了这些高度推测性的假设之外,从多尔先生提供的证据中很难看出传统武士教育的特征对于英国和日本的上层阶

级有什么影响，使他们产生十分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工业和技术。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日本同英国一样，尽管有贵族式的教育制度存在，技术更新和创业精神还是出现了。1868年以后，日本的领导人有的像英国一样根本不是由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部分是局外人，部分是公开背叛自己的背景和教育的人。确实，还有一些作者指出旧的教育制度在十九世纪是崩溃而不是继续存在，日本和西方研究的引进是新形势中的重要因素。这肯定是一种更合理的假设，而且同观察到的事实更加符合。[②]多尔先生本人也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使用这些辩护的语词为上层阶级的教育作出结论说："正在现代化的国家不得不推行这种类型的教育，但是至少有幸为自己的毁灭埋下了种子。"如果英国也有毁灭同类教育的种子，那么，它的不幸是，这些种子恰恰落在石子地上。

---

① 利温斯顿：《希腊的天才及其对我们的意义》，伦敦，1912年，第68页，239—250页；《为古典教育辩护》，伦敦，1916年，第187页。齐默恩：《希腊共和政治》，牛津，1911年；布伦特："对于英国和罗马帝国主义的思考"，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7卷（1965年），第227页。利温斯顿的话应与近百年来那些为美国南方的生活方式辩护的贵族辩护士所说的话作比较，见乔治·皮策休：《南部社会学或自由社会的失败》，里奇蒙，1854年。

② 霍尔：《新日本的教育》；赫斯迈埃：《明治时期日本企业家的起源》，第5、7章。

13. 中国和印度的医学、现代化和文化危机

拉尔夫·C·克罗伊齐埃

〔编者按〕 有关现代化的著作往往对“传统的”和“现代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作出各种区分，但是，这种态度不久即被新的认识所取代，即认为新与旧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连续性的。确实，一个社会转变的真正能力取决于领导者在其政策中保持自信心的能力。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求助于往往深深扎根于现代以前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中的忠诚。在中国和印度本地在现代以前的医学不仅保留下来，而且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事实是新旧之间连续性斗争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本文作者拉尔夫·C·克罗伊齐埃是英国罗彻斯特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现代中国的传统医学、科学、民族主义和文化变革的紧张状态》(1968 年)，并为《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共产主义》(1969 年)的编者。

展以前的本国医学体系，不让现代医学取代。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府也给传统医学以法律、经济和制度方面的支持。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传统医学的信仰和实践如何与新引进的现代医学并存（这种现象是最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极为普遍的情况），而是因为传统的、科学发展以前的医学体系如何能够在主张科学和推动现代化的上层分子中找到强有力的支持。从各种意义上说，这是在现代的西方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①] 然而，在现代的中国和印度历史上，它却又是一个清楚明白的特色。明摆着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只有传统的中国和印度才创立了独立于欧洲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医学体系，且有完善的以正式文献传统保存下来的理论基础。这不能说是亚洲传统医学的第三个大系统，因为阿拉伯医学与欧洲医学都起源于希腊。在亚洲其余地方，现代以前的医学大致上都是来自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这样的大系统。因此，只有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医学才纯粹是土生土长的成果，与从外面闯进来的医学抗衡。

不过，这还不过是这两个国家医学全貌中的一个部分，因为医学的对抗是在更为全面的危机背景下发生的。在这两个自傲和古老的亚洲文明中心（在历史上，它们惯于充当文化输

---

① 医学亚文化，例如西方的顺势疗法、自然疗法、信仰疗法明显是性质不同的现象。它们在社会中不可能得到“尊敬的”支持。有些在社会上和知识界受尊重的人物如果相信了这种医学，就被斥为个人的古怪行为。亚洲和非洲大多数国家的现代领导人坚持要有选择的使用原始医学，主要也是在个人这个层次上，不能纳入他们的公共形象和政策。剑桥大学和索邦大学培养出来的非洲一些国家的总理对某种巫医持半信半疑态度，但他们并不支持学校和研究所去保留巫医系统。

的阿拉伯医学、远东的印度和中国医学——既不同于原始医学或民间医学，又不同于现代的、科学的医学。

这种非常发达的医学体系在中国和印度都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把他们的医学传统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传说中的文化英雄人物神农和黄帝。印度传统医学称作阿育吠陀(即生命吠陀)。这个名称说明它起源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印度史上朦胧不明的吠陀时期，在此时期印度的宗教和文化开始形成。从历史上看，两国的医学和中医演变成为明确的医学体系，在时间上比一批伟大的医学著作家和医学经典的问世要晚得多，这些经典被后代世俗医生作为行医的依据。中国医典的正式编纂是在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在印度，有三部最大的医典在公元一世纪到六世纪中出现。[①]

从它们的理论原则来说，这两种医学体系基本上都主张一种健康和疾病的自动平衡论。健康是指人体组织的和谐或平衡，疾病是这种平衡在生理上或心理上(包括道德因素在内)失调的结果。中医理论运用宇宙中两大力量阴和阳的制衡关系，再加上表示在全身流动的生命力，即气，来进行讨论。气按五行(木、火、土、金、水)的相克相生运行，宇宙(包括人体的微观世界)即由五行组成。阿育吠陀的自动平衡论也依据一种体液的生理学和病理学的理论，以三种体液为基础，即气液，胆液和粘液。三液论起源于早期佛教，与古希腊的类似概念比

---

① 研究据说是世界医学史的著作在对待亚洲古代医学体系时大多非常草率，依然反映出强烈的西方偏见。有关印度医学的杰出著作有J·菲略扎特：《印度古代医学原理：它的起源以及同希腊医学的比较》，德里，1964年。另见亨利·齐默尔：《印度医学》，巴尔的摩，1948年。有关中医的西语著作颇不令人满意。最好的研究著作或许是王志明(音)和伍连德(音)的《中医史》，天津，1932年版。更完整可靠的是郑邦显(音)：《中国医学史》，上海，1937年。

较，出现得更早。[1] 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这种理论都同当时流行的宇宙观有密切关系。以这些理论为依据，微妙的生理结构便建立起来，其后果是忽视了实际的解剖研究、导致不分皂白地承认过去的权威，这甚至与中世纪欧洲的草医解剖学的全盛时期都不能相比。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社会中，宗教禁忌反对肢解人体，这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因素。但是更有甚者，忽视实用解剖学反映了整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

医学实践和医学观念之间总有很大的距离。因此，现代一些为古典医学辩护的人们往往声称，这些都是凭经验得来的医学体系，需要认真修改。这并不是说这两种医学体系经过各自的演绎和推理而产生的理论框架之中并不包含着丰富的实际经验。例如在诊断上，两者都有极其高超的诊察技术，但是也有系统化的强烈倾向，迫使这些技术都纳入主要的理论体系。同样，中国和印度的医学传统都曾积累大量的药物，其中包括许多无可争议的有效药品，在药理学上，这些药物包括特效药，更典型的是复方配剂。但是，这里也必须记住，对公认症状的处方并不完全是依据经验。在保健和康复方面，也有其他许多有用的技术，例如按摩、瑜伽、锻炼和饮食疗法等等，即使从现代医学的眼光来看，至少也部分地承认了它们的价值。不过，中医里面最吸引人的治疗技术，即针灸法，还有待于用科学的标准来证明它的效果。

总而言之，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医学体系远远不同于简单的民间医术，但是，无论它们的许多特殊治疗方法有多大的

---

(1) 菲略扎特：《印度古代医学原理》。

实用医学价值，从基础上看，它们显然又是非科学的(或者还不如说它们是前科学的)。它们在外科方面，几乎完全是不足的。更严重的是，对于现代公共卫生事业来说，它们缺乏病源理论，因而没有与流行病斗争的有效手段。这两种传统医学体系要被普遍接受，应该表现出强大的生存能力，这是人们所希望的。它们会引起医疗史学家和有关科学家的极大兴趣，也不足为奇。但是，现代中国和印度对传统医学给予的那种重视是异乎寻常的，在两国当代的文化和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医和阿育吠陀运动的发展方式大致相同。首先，传统的医师断然采取了非传统的步骤，组织职业团体，与政府支持现代医学所造成的威胁斗争。其次，远远处于医学界以外的政界和知识界人物举起捍卫“民族医学”的旗帜，把它作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反过来，这又引起了传统医学体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长期的、全面的、有时是十分激烈的毫无结果的争论。

在印度，主张阿育吠陀的人可以借助于谴责外国政治力量，指责它践踏印度的医学以至印度的整个文化。十九世纪初，在决定教育政策的斗争中，印度的亲英派战胜了东方派。从此以后，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全力支持现代医学。不过，印度的阿育吠陀和穆斯林的乌纳尼(一种阿拉伯医学)一直在民间广泛流行，只有城市中少数上层分子除外。但是，官方的方针显然是主张用新的医学最终取代旧的医学，用外国医学最终取代本国医学。印度土医生的生存受到了长期的威胁，使他们在 1907 年组成全印传统医学公会。从 1920 年起，印度最强大的民族主义团体印度国大党，至少正式表示支持印度医学，

每年通过决议，呼吁政府支持"印度的民族医学"。[1]

中国也一样，由旧式医生首先大声疾呼拯救民族医学，免受政府当局的敌视。新的民国政府所设教育部宣布国家的政策是用现代医学取代传统医学，于是旧式医生感到惊慌，于1915年组织一个院外团体，即"中华医师拯救医学委员会"。至少是因为中国的政局动荡，这个团体和后来成立的传统医学协会缺乏全印传统医学公会那种组织上的连续性，但在目的和成份上，与印度的组织却十分相似。中国传统医学也很快得到各种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广泛支持。这些民族主义者包括各种层次的人物，诸如山西省的军阀总督阎锡山和国民革命元老章炳麟等。不过，直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这种一般化的支持才找到了一个在政治上有影响的组织中心，即成立了国医馆。国医馆由国民党右翼政治家焦易堂（音）任馆长，陈氏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参加了董事会。[2]

因此，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两个国家的传统医学都在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政党中找到了栖身之地。其次，它们的支持者无论在目标和论点上还是在言语上都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然而，这两个国家虽都有诋毁科学和现代性的传统主义

---

① 印度政府卫生部：《评价传统印度医学现状委员会的报告》，德里，1959年。有关印度阿育吠陀运动的全面分析见布拉斯："印度传统医学教育的政治：印度复古倾向和现代化的个案研究"，载拉多尔夫编：《教育与政治》，即将出版；又见C·莱斯利："印度和阿拉伯传统医学的职业化"，载《纽约科学院通讯》，第2集，第30卷，第4期（1968年2月），第559—572页；"论现代印度传统医学的复兴"，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通讯》，第82期（1963年5月），第72—73页。引起我对印度传统医学运动以及中国类似的发展加以注意的首先应感谢莱斯利教授。

② 关于支持中华医学运动的发展详情，见克罗伊齐埃：《现代中国的传统医学：科学、民族主义和文化变革的紧张状态》，剑桥，1968年，第2章："作为文化和知识问题的医学"，第59—150页。

者，但持有这种观点的显然是少数，尤其是在中国。更为普遍的是希望甚至迫切要求认真批判传统医学现状中的严重缺点，强调对传统医学有进行重大改革的必要。通常采取的形式是通过直接的批判而作间接的颂扬。中医和印度医学目前的做法受到指责，例如在传统医师中有许多无知的江湖庸医，他们唯恐失掉秘方，而不是本着利他主义的原则为人民服务，过去医学中的许多智慧由于后来的腐败而丧失或被歪曲了。不过，所有这些缺点是传统医学退化的征象，至于为何造成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外族统治者（例如统治印度的穆斯林和英国人，但这种指责对中国的满洲来说不大合理）。目前的任务是恢复传统医学智慧和宝贵本质，去除其周围的糟粕。真正的传统主义者到此为止，亮出了印度教和儒教中的典型复古主义惯用语：反璞归真。

但是，在二十世纪更为普遍和更有影响的是另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保守派。他们主要关心的并不是传统的纯洁性，而是如何在受外来刺激的深远变革时期保持民族文化特色。他们可能也会经常谈到腐朽衰退和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但也感到有必要对科学、进步和现代性等一些事物抱逆来顺受的态度。这就是说，他们在接受巨变的同时看来并不主张抛弃民族传统。在医学上，它意味着可以接受采用现代医学的各种组织机构——医院、诊疗所、法律标准和职业组织——为改进医学服务，从而把民族医学保留下来。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们渴望如何把现代科学结合到传统医学体系中去。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其中充满着危险。印度传统医学或中医一旦开始现代化或“科学化”，现代科学将会把传统医学完全吸收掉，只留下少数特效药物或特殊疗法，民族传统的特色将荡

然无存。有许多现代主义者，特别是其中受过西方科学教育的人，想做医学界的民族主义者不想做的事情。当他们谈起印度传统医学与西医相结合或中西医结合的时候，他们需要一种真正的结合，即从西医和现代科学中取其精华而又不致完全丧失民族传统中独特的基本要素。

例如，斯里林萨瓦·穆尔蒂在印度最早提出并大力鼓吹结合印度的传统医学。他相信印度的传统医学基本上具有科学精神，它在表面上看来是神秘和非科学的理论，实际上涉及西方医学尚未完全认识的自然生理过程。[1] 因此，经过纯洁化的印度传统医学剔除了迷信的成份，与现代科学是完全可以共存互容的——实际上是科学的——并可同西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共同的医学。印度政府于 1925 年在马德拉斯创办了印度医学院，试图贯彻和证明这一观点。这种观点直到现在仍是现代印度传统医学运动中占有优势地位的观点之一。

自二十年代以来，中医捍卫者，尤其是在国医馆等组织中的捍卫者也普遍持这种观点。陈果夫针对这个问题写过许多论著，充分说明他试图把现代性和文化传统之间相互冲突的主张调和起来。[2] 陈果夫相信，这一点在中国医学中完全可以做到，通过拟议中的结合，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更好的医学体系，它既是科学的，但仍有明显的中国特色。这证明现代主义者已经发现，中国传统中存在着可悲的缺陷，但就在这个领域内也存在着民族精华。其次，这有助于调整科学和技术向西方借鉴上的平衡，可以对世界的医学科学作出贡献。医学特殊

---

① 见穆尔蒂："关于印西医结合的备忘录"，载印度政府卫生部：《民族医学体系委员会的报告》，德里，1948 年，第 2 卷，第 256－277 页。

② 大部分论著见《陈果夫先生全集》，香港，1952 年，第 6 卷。

论虽然常常掩盖这种论点(中医或印度医学最适用于中国人和印度人,西医最适用于西方人),但它也自满地证明,亚洲人能够在自己的民族传统中找到具有科学价值的东西。因此,这个题目在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中都深得人心。

这种民族自豪感实际上已经明确无误地反映在为中医和印医辩护的言论中,甚至在用什么名称来称呼外来医学和本地医学的语义方面的争论中也能看得出来。中医这个名称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一个新词,用来区别中国的旧医学和外国医学传教士引进的称为西医的新医学。承认"中国的"和"西方的"之间的区别,包含着对特殊传统自觉的深厚感情,它本身标志着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国医"这个词提了出来,极其醒目地把医学和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印度,作为一般的穆斯林文化和作为具体的乌纳尼医学的出现使印度人更早地意识到文化上的差别。尽管如此,近一个世纪以来,印度也发生了类似的语义方面的争论。传统的印度医学坚持用"对抗疗法"这个词来称呼西医,尽管现代的医生认为用"科学的"或"现代的"医学来称呼西医更为准确。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几十年里,印度和中国的本土医学运动的相似之处是不再停留在一般的讨论中,而是扩大到向政府当局呼吁支持所提出的具体要求的形式中,以维护各自的民族医学体系。中国的国医研究院(中医的最有影响的

---

① 对抗疗法这个词也是从十九世纪开始使用的,以区别于正规的西医在印度使用的十分流行的顺势疗法。传统印医坚持使用"对抗疗法"一词,反映他们唯恐西医把"科学的"这个词专用于他们自己的医学。这本身就明显地标志着现代印度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院外团体）在两个关键性问题上不断对政府和执政党施加压力，一个是要给予合法承认，另一个是要给予财政支持。他们在第一个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实际上使传统医师像他们的现代对手那样取得了完全平等的合法地位。至于第二个问题，尽管历届国民党代表大会都通过了有利于他们的决议，但中医的支持者并不感到满意。卫生部和教育部是中央政府的两个关键性的部，都被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派所控制，对传统医学的要求极少给予同情。实际上，大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左翼强烈反对向他们认为阻碍中国科学进步的保守势力作任何让步。最后政治压力迫使政府批准给予公私合办的南京"国医"医院和研究中心有限的经费。但1917年[1]8月爆发的战争使所有这样的计划被搁置起来。

印度传统医学的支持者遭到的同样反对不仅来自英国行政官员，也来自民族主义运动内部主张现代医学的人。现代印度民族主义者对于传统医学的复兴发生了分歧（这是对传统文化发生更广泛分歧的征兆），当二十年代印度实行双重政治制度后印度人部分地控制了许多省的行政事务时，这样的分歧便公开化了。印度传统医生感到沮丧和懊恼，因为他们发现许多印度政治领导人对印度传统医学的同情还不及英国人。对尼赫鲁等一些西方化人物的指责显然含有背叛印度文化的意思，他们被痛斥为"蛊惑民心的偶像化政客"，不懂得"离开了文化自由的政治解放不是真正的民族解放"。[2]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绪。例如，好斗的现代教育家傅斯年被描绘成这样一

---

① 原文如此，但应为1937年。——译者

② 参见"印度传统医学和国大党主席"，载《印度传统医学杂志》，第14卷，第8期（1938年2月），第281—282页。

个中国人:“除了他那张黄色的脸即使穿上西装也无法改变外,他的思想、生活和习惯已经完全美国化了。”[1]

传统派和现代派之间的分裂(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认为传统医学能够现代化的人与认为传统医学不能现代化的之间的分裂)意味着印度“传统医学的复兴”,大都仍由私人掌握——建立医学团体,创办医学杂志,开设私立医学校、医院和诊疗所。这同中国医学的现代化改革不得不依靠国医馆那样一些非官方组织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印度的联邦结构允许地区之间的不同处理。在印度人掌权的少数省份,如马德拉斯,政府承认传统印度医学机构并给予资助。然而即使在那里,现代西医仍然首先得到政府的支持。

印度独立以后,政府应当如何对待印度本土医学成为一个首要问题,[2]接着就展开了长期而无结果的斗争,这同1927年以后中华民国时期中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的斗争没有什么不同。[3]双方阵营的布局确实相似,一方是政府卫生部里有科学倾向的专业化官员和国大党内更西方化或具有四海一家思想的一翼,另一方是组织起来的本土医师及其政界同盟者。不过,支持印度传统医学的政界人物在意识形态上属于更庞杂的集团,尤甚于国民党右派。这种差异反映出国大党内部最强大的支持者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副总理莫拉尔吉·

---

① “华北国医论战速记”,载《明日医学》,第1卷,第1期(1935年),第5页。

② 在印度分治后,本土医学几乎只指阿育吠陀。乌纳尼(阿拉伯医学)虽尚存在,但对印度民族主义显然没有什么吸引力。

③ 1949年以后,台湾出现了这场争论的微弱余波,但总的说来,政府偏袒现代医学。见克罗伊齐埃:《现代中国的传统医学:科学、民族主义和文化变革的紧张状态》,第10章。

德赛为代表的极右翼，另一派是以前内政部长古尔扎里拉尔·南达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者。印度传统医学在国大党之外不但得到了印度教保守派的支持，也得到个别社会主义者甚至一些共产党员的支持。[①] 实际上印度传统医学运动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区别看来远远不在政治上而在文化上。前者的文化倾向一般更强调传统性和本土性，后者往往在国外受过教育，在观念上坚决主张世界性和科学性。

对本国传统医学的这种对立态度导致印度政府在 1948 年到 1963 年之间五次组织了大规模的调查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建议也相差很大，有的主张逐步取代民族医学，同时对传统药物进行科学研究，有的主张与印度传统的医疗方法相结合，有的甚至主张在整个印度卫生计划中给与印度传统医学以独立而又平等的地位。在国家方面，对所有这一切建议都没有采取十分具体的行动。1953 年，印度在民族医学体系中成立了一个中央研究所，印度传统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卫生部的承认，但相对于现代医学而言，它在声誉和所获经费支持方面不过处于第二位。[②] 印度各邦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在发展医学和制定医疗法规方面享有相当大的实权，印度传统医学可以得到各邦政府更多的支持。包括北方邦、古吉拉特邦、旁遮普邦和喀拉拉邦等几个重要的邦，都对印度传统医学机构给以很大的支持。但是，在大多数邦，传统医学的医师以及其学校所获得的支持仍大大不如他们的现代对手。

事实上，印度传统医学的现代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

---

① 布拉斯：《印度传统医学教育的政治》，第 46 页。

② 例如在印度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中，卫生部拨款总数中专用于传统医学的不到 3%。见印度计划委员会：《第三个五年计划》，第 651 页。

以后所获得的成果仅仅是建立了近一百所学校和五千个医院，基本上是私立的，许多学校和医院的质量很差。[1] 这种机构的现代化所取得的结果远不能令人满意，距离印度医学的复兴并使之能与外来的竞争者相抗衡的远大目标还相当远。从新的印度传统医学院培训出来的医生无论在地位上还是在声望上仍然低于西医。在印度传统医学和西医学的原理方面，还没有取得任何完全的结合。最后，最使文化民族主义者惊恐的是，好几个印西医结合的医学院为了满足学生学习科学医学的要求，竟在课程表上取消了大多数印度传统医学的课程。[2] 在与现代医生的竞争中，政府对印度传统医学院毕业生继续歧视，这自然引起印度传统医生的不满，但事实仍然是，与西方医学结合起来教学，传统印度医学往往会被取代。

印度医学传统遭到危险，加上在争取政府一视同仁的支持以保留印度传统医学的要求失败而感到沮丧后，印度传统医学运动中的一大部分人尽管仍不放弃机构现代化的目标，但完全抛弃了与西医相结合的目标。1952 年，对现状不满的印度传统医生及其同情者在孟买举行一次会议，正式掀起了纯洁印度传统医学的运动。他们提出的理想是通过恢复传授医道的旧式方法（即为人称道的师徒关系），在课程表中取消全部现代医学课程，不与西医发生有损害的联系，借以纯洁印度的传统医学。对于印西综合或结合的可取性都被明确地否定。然而尽管这些目标是反动的，但纯洁印度传统医学派对现代性医学的制度和组织方面仍试图达成一致。他们也支持学

---

① 布拉斯：《印度传统医学教育的政治》，第 11 页。

② 莱斯利："论现代印度传统医学的复兴"，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通讯》，第 82 期，第 73 页。

1949年以后在中国出现一些与印度的这些发展颇为有趣的对照。因为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一个怪现象，这个亚洲最革命、最富有战斗性的"科学"政府几乎给予传统医学以印度医学保守主义者大声疾呼而得不到的全部支持。共产党政府建立了中医的公立医院和诊疗所，在政府卫生部门中医享有同等地位和同等报酬，医学研究中心既有新式医师又有老式医师，中医专科医学院建立起来，现代医学院校的课程表中设置了与传统医学相结合的课程——实际上是印度传统医学复兴(不过只是主张西印医结合的那一派)所主张的整个计划。这些措施却被一个在大多数领域内毫不留情地反对传统的共产党政府所采取。

如果回顾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那么对这种现象就会感到更加奇怪。在这批人中，我们可以发现陈独秀和鲁迅等知名人士曾指责和嘲笑中国的传统医学是有害的中国古代迷信遗产中的一部分，新的科学时代必须将它清除掉。[①]早在共产党在野的漫长时期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旧的和不科学事物的蔑视变得柔和了些，逐渐对有用的土东西采取实用的态度。在医学方面，它反映在使用传统医学中的某些东西来替代现代医疗方面得不到的供应，并在这种供应短缺的时期容许传统医生与现代医生一道行医。

对于实用主义的革命者来说，这种立场看来是完全合乎

---

① 有关中国共产党医疗政策发展详细叙述，参见《现代中国的传统医学》，第三部分。我的"共产党中国的传统医学：科学、共产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载《中国季刊》(1965年7—9月)，第1—27页；又见我即将出版的选集《中国的文化遗产和共产主义》，纽约，1969年，第11章。

逻辑的，也是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的最初几年里对中医政策的基础。它意味着容许旧式医生和旧式医学的暂时存在，就像那些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和制度可以暂时得到宽容一样，但对它们的未来未给什么保证。可是到了 1954 年前后，政府对待中医的态度和政策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由官方鼓励所写的文章称赞旧的医学，不仅称赞它的特殊疗法，而且称赞整个医学思想是一种医学体系，表现出中国人民积累的智慧，包含着对现代科学有益的教训，促进甚至指示这两类医师之间的密切合作得到加强。不过，现在很明显的是在中西医的结合中，必须充分尊重中医的基本原理。为了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大规模的计划制订出来，要求现代医生以全部或部分时间学习中医。

在中医受到这种急剧的重新评价时，出现了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把受过现代培训的医生批评为怀有“资产阶级的偏见”，轻视“祖国的医学遗产”。这些攻击逐步扩大到卫生部某些最高级的官员，从而清楚地表明这场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开展的反对亲西方倾向和资产阶级影响的全面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共产党中国，卫生部的科学专家不得阻碍政府决定的医疗政策。为了加强纪律，改组了卫生部的上层领导，并要求一般现代医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同时，必须学习中医知识。

这一趋势一直继续到五十年代中期，并在 1958--1959 年的大跃进时达到高峰。那一时期出现的思想狂热以及群众性的贬低技术专长十分适合于强调中医传统的价值，贬低西医医学专家。强调祖传医疗方法胜过进口医疗技术，发展到了强调中医在整个卫生计划中的作用。大跃进在经济上失败后造

种信念里面也许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但决不意味着革命意志有任何削弱。

然而，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比较成功地调和了对于现代性和文化特色问题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心理压力，在制定强制性医疗政策时又不影响到民主的政治制度，他们在解决医药上的基本问题方面却不见得比印度传统医学的支持者解决得更多些。这两个国家希望达到的那种结合是吸收科学的全部优点而又保留明显的民族传统内核。迄今为止，在理论方面，中医的阴阳说和五行说正如印度传统医学的三体液说那样被认定属于科学的分析。东方和西方的医药在半个多世纪以后相遇，但没有合为一体。

回到比较问题上来说，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医学在二十世纪经历的激烈动荡在有关现代亚洲文化变迁的整个问题上，以及在这两个国家的特殊性质的问题上，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也许后一个问题比前一个问题会有较大的启发。因为印度传统医学运动和中医运动具有非常相似的问题和语言，说明现代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对传统社会产生的普遍的影响会导致类型相同的文化危机。但是，中国和印度如此明显在医学领域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有其独特之处。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了产生这种独特性的某些明显原因。这并不是说亚洲的其余国家对科学和现代性达成一致的时候，本身就能避免文化危机和一切问题，而恰恰是说，除了锡兰（现名斯里兰卡。——译者）以外，传统医学在这些国家中都没有为现代民族主义提供一个讨论的重点。

然而，传统医学在中国和印度无疑成为这样的一个重点。它说明这两个国家在现代史上的共同特征超过了纯粹的医学

问题。这两个国家都有受人尊重的医学传统，它们具有的独特性和自主性应当视为这两个古老的文化实体在历史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性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这种自主性——反映在从未中断的哲学、宗教和文学的伟大传统中——给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以认同和凝聚力以及优于周围民族的深刻意识。这就使两国的文明在遭受外国征服的时候基本上不受影响（一般公认中国比印度更是如此）。这也使印度的婆罗门和中国的士大夫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是文明人类的最高体现。在任何别的国家，这种文化信心是觉察不到的。日本肯定觉察不到，它一直处于中国辉煌历史的影子下，东南亚也不会觉察到，它的各种文化和各个帝国一直面临着印度文化或中国文化的影响并被两种文化分裂。甚至在伊斯兰世界也是这样，它们既同欧洲保持着密切联系，后来又同印度教的印度有密切关系，使它经常想起，外界的人可能是异教徒，但并不是野蛮民族。这样的文化信心和优越感无论在维护传统的中国和印度的时候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在功能上都不能完成当前现代化的任务，因为大量的文化借鉴当前已经是那么必要。文化借鉴削弱了印度和中国认同的传统基础，因而使现代的文化危机或许在这两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深刻。当然，新的认同必将出现，这个认同过程成为亚洲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然而，新的认同只有在旧的认同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从而为文化民族主义创造坚实的基础。

我的论点是，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民族主义意识渗入了中国和印度的民族医学运动。这决不是说民族医学运动的基本倾向是传统的、反现代的和反科学的。恰恰相反，这两个国家的民族医学运动并非是那么否定科学，而是试图在自己受

到尊重的传统中寻找科学。两国都愿望，只要保留中国或印度的特有传统和民族认同，就能够使医学形式和制度现代化，并且在内容上产生巨大变化。在这些方面，它们又都是非传统的。

然而，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医学运动之间尽管在具体特征上有这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对各自的文化危机作出的具体反应同样也有很大的差别。在政治上，最明显的差别表现在支持传统医学运动的缘由看来在于印度独立以后的支持来自各种各样的，但总的说来是属于保守主义的社会集团，而在中国，支持者却是掌权的革命的共产党。不过，只要更仔细地加以考察，仍然可以发现两国在这方面也有共同的类型。两国都是由那些最西方化并主张面向世界的知识分子以充分尊重科学为理由，对本民族的医学持最激烈的反对态度。他们在多元化的印度不断地使传统医学支持者的远大希望遭到挫折。在共产党中国，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专家"所处的地位再也不足以使主张对外封闭的"红色专家"所抱的希望受到挫折。但是，关键性问题在于不仅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保守派都曾支持传统医学，而且支持也来自政治激进派，这些人未曾受过西方文化的深刻熏陶，对西方都抱有强烈的政治敌意。因此，在对待传统医学的态度上，印度的社会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有一些共同之处，就像印度和中国的保守派有许多共同之处一样。

但是把这样的对比推进得太远，那是危险的。这里还有必要考虑到印度近年来出现了"纯洁派"以及它明显否定科学的现象。近四十年来，中国从未出现过真正类似的运动。要评价"纯洁派"发展的重要性并不容易。在一定的意义上，它同已被

结合的印度传统医学一样，在采用新的组织和机构计划，包括建立有效的政治院外集团，也是现代性质的。但是，“纯洁派”还根本否定科学。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那就是既然现代科学不能证明印度传统医学是永恒真理，那么科学就更无用，印度的医学和印度的文化将永恒存在。在这一方面，印度传统医学的许多支持者(他们并非都是“纯洁派”)对维护占星术那样的传统学问的成份时所使用的更独特的辩论，对科学和现代性的抵制，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中国相比，看来更激烈。在对印度传统医学的整个辩论过程中，尤其是在印度独立后，似乎证明了面向世界的现代化上层分子与更倾向于否定科学现代性以维护民族传统的强大反对派之间的分裂在印度要深刻得多。五十多年以前，胡适在谈到中国时曾经说过：“任何一个自称为现代人的人都不敢公开地藐视科学。”① 印度传统医学运动近来的发展进程都说明印度的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

① 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所写导言，上海，1923年，第3页。

第 四 编
高级现代化

我们在前面已经举出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的各项指标，从指标“高”的一栏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度现代化社会的一般结构，就某些方面而言，这些高级社会可能已经完成变革过程。在某些活动领域——初等和中等教育、城市化、工业和服务业的扩展——不可能进一步发展时，就可能会出现一种类似现代以前那种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然而，知识继续增长，随之出现的是高度现代化社会的一些问题和机会。当某些趋势似乎告终时，另一些趋势却仍然在发展，还有一些新的趋势正在出现，不过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由于经济增长而处于迅速转变过程中的优先地位的社会，因强调储蓄以供投资，把满足许多需要推迟到这些社会更加充分发展以后。一些社会把多达四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国民生产总值（1950－1970 年，日本为 25－40%，苏联为 25－30%）拨作投资之用。甚至在并没有这么迅速发展的较早现代化的社会中，也是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不是把收入分配用于福利。社会流动水平表表明，虽然低水平和高水平的城市化、

教育、卫生和交通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但在高度现代化社会里，用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比例来显示，收入的分配也不是更为平等的。诚然，欠发达国家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按比例可能是最发达国家的两倍。当然，如果把这些比例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起来，显然，在高度发达的水平上，高级社会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与贫困国家中获得总收入8%的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相比，要高十倍到二十倍。然而，经济有巨大增长，但收入分配很少或一点也没有改变，是社会转变时期的特征。一旦社会变得高度现代化，重点就会发生变化，分配开始优先于发展。一般来说，收入比较低的集团和先前受到歧视的妇女和少数民族集团，现在要求得到平等待遇，于是分配就成为一个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社会随着发展会变得更加复杂。当经济增长是主要目的时，促进工业、交通运输体系和城市的建设是比较简单的。随着专业化机构和功能的繁衍，资源的流通和分配，以及对许多迄今尚被忽视的利益集团提出的要求作出充分的反应，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社会随着发展也往往会专门化，变得越加依赖国际环境来获得市场和原料。国际竞争加剧，社会的技术革新能力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由于社会更加复杂，它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三十年前，几乎没有人会预料到过去可以被人们自由利用的土地、水源和空气会变得如此日益匮乏。人们已经普遍承认，一切社会都须限制人口增长。由于原料减少，经济增长的目标能否实现将取决于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创造发明。约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高度现代化社会（西方、日本、苏联）的生产约占全世界国民生

产总值的五分之四，而且可能消耗相同比例的能源。今天，已经查知的资源已不能按先进社会的人均水平来充分供应中国和印度，即使它们拥有达到这种水平的技术和机构。

如果有人一度将现代化等同于无限制的进步，那么现在这些人已经懂得多些了。知识的增长加强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却也加强了破坏能力。它使大幅度扩大商品生产和服务成为可能，但同时也导致人口爆炸。人们也许仍有理由认为，人口能得到充分的控制，新的能源尚可找到，使整个人类有可能分享现在只是较少的人所享受的福利。但这种挑战所产生的许多问题能否对付得了，如果价值观念和制度继续同竞争中的国家主权联系在一起，情况尤其如此。

14. 国际发展比较研究中的个性和结构领域

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

〔编者按〕 霍罗威茨系罗杰斯大学利文斯顿学院社会学教授，研究面很广，在发展研究中尤享盛名，著有《巴西革命：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1964年)、《三个发展世界：国际分层的理论与实践》(1966年)。在认知社会学领域中著有《新社会学》(1964年)、《职业社会学》(1968年)，并任《社会科学的运用和滥用》(1971年)的主编。

某个社会是否"先进"是相对而言的。用什么尺度来衡量现代化的程度或处在什么阶段，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仅仅依靠某一个指标，例如通常使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显然不能揭示多层次的社会复杂性。本文的价值在于霍罗威茨对衡量现代化程度的各种尺度作了客观的评价。他还把衡量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和心理指标加以区别，其中，心理指标表现为可以测量出来的态度。霍罗威茨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变化的速度也不一样。因此，学者们在解释何谓

"高级"社会时，要注意区别对待。

人类意志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分析发展问题的中心。在国际比较研究中，关键的任务是要鉴别相同的现象，或者至少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这些事物和事件的一致性是不受国界限制的。[①]然而，尽管问题具有这样的性质，并且人们也普遍承认找到解决办法的重要性，但对发展的比较研究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对它试图作系统研究的极少。不过，简要地分类列出迄今为止人们所作的系统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是有用的。

莫尔在比较研究类型学方面的尝试，[②]强调我们目前的困境：根据一个模式而不是根据其他模式来概括发展过程，所作决定常常是建立在策略的而不是科学根据的基础上。对研究者来说是最理想的或者对学者来说是最方便的办法，可能是对该领域本身的要求避而远之。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几乎同时按二分法、模式、体系和阶段来表达某些感知。即使研究者在一些研究策略中作出选择——这间接地表明发展的目标已经确定并进行过评价，研究任务基本上也是说明性的——但"发展"仍然是一种有待于定义的价值，而不是其实现的手段已被清楚地理解的一个目标。社会科学家面临的实际问题仍然是要作出一般性的决定，还要对什么是发展的目标、价值和过程作出评价并具体决定其时间和地点。

---

① 普日沃斯基和托恩："跨国研究中的等量"，载《舆论季刊》，第30卷(1966—1967年冬季)，第551—568页。

② 莫尔："社会变革与比较研究"，载《秩序与变革：比较社会学论文集》，纽约，1967年，第21—32页。

比较国际研究中的问题并非产生于发展研究中的独特事物，而是由于运用了方法论研究的技巧所固有的二难推理所造成的。这种技巧的产生是同其他社会研究领域例如阶级划分方法等有关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无论在什么宏观层次上进行，都不能回避方法论的基本问题。研究任务的规模只是决定采用何种方法的一个因素。不过，方法论和系统的程式对于解决比较国际发展研究领域中的问题似乎尤其重要。因此，我们将集中讨论这些问题。

"态度资料"和"结构资料"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别，但作为探索性的手段，它们应当被考虑进去。史密斯和英克尔斯曾经写道："这个术语（现代性）可以指两个截然不同的对象。用以描述社会时，'现代'一般是指民族国家所特有的、包括广泛的机械化、高速度的社会流动之类的复杂特征在内的结构因素。当用于描述个人时，'现代'是指某一类态度、价值观以及感知和行为的方式，**大概是指现代社会中的有效参与所产生的或必需的那类东西**。"[①] 史密斯和英克尔斯重视结构资料与态度资料之间的区别，但选择的是把两者在现代性的标题下联系在一起。他们解决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测量现代化，正如我谋求表明的，它同个人发展中的变化存在的联系远远大于同社会结构的联系。以下几个方面将被特别强调：

1. 同现代性有联系的不同态度模式包含两个不同的但有关的问题：(a)一致性问题，(b)顺序问题。

2. 态度资料和结构资料之间的关系性质包含两个不同

① 史密斯和英克尔斯："OM尺度：个人现代化的比较社会—心理测量"，载《社会关系计量学》，第29卷（1966年12月），第353—377页。

的考虑,(a)全等问题,基本上可以解释为态度资料和结构资料之间的适合和等值;(b)解释关系的性质。假定我们能够获得跨文化的态度资料表明它同结构资料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应,那么,我们在因果顺序上可以推导出什么?

3. 现代化和工业化之间、个人态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在质的方面包含着双重考虑:(a)决策和计划问题,(b)在国际固定环境下的国家目标问题。

态度和价值观念的测量

个人属性同规定这种属性的社会结构之间有明显的相互关系,社会学所关心的正是这种关系。主张符号相互作用的学派对人的社会特征尤其提供了洞察力,而交换理论学家和具有心理倾向的社会科学家则强调这样的论点,即个人和结构的变量都是被社会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然而,这两类资料并未落入窠臼,顽固地抵制综合。个人资料和结构资料之间之所以缺乏对应性,原因可能是:(1)变量被错误地概念化;(2)指标对于解释的目的不适用;(3)测量或抽样的错误;(4)最后,积累资料与这些资料用于研究未来问题之间相隔的时间很长。由于最后这两个可能出现的错误较易解释,我们将集中讨论前面两种错误的可能性。

一致性问题

随着社会物质基础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态度也发生变化。但问题是什么态度发生了变化?朝什么方向变化?变化的强度和速度多大?社会的工业化过程是否会同时引出文

行为领域，但一些研究过这一问题的学者却宁愿强调某些主要同重要的制度领域有关的态度和行为，例如控制生育或宗教等。他们的见解肯定是合理的。……因此，我们把问题包括在诸如限制家庭规模，对待老人和对父母和亲戚的义务，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妇女的作用，如何教育孩子，对宗教的态度，对物质和私有财产消费的态度，社区、国家和国际领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教育与社会流动，与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触等题目里。在其中的每一个题目中，人们都能确定一种可以被视为比较现代的主张和一种可以解释为比较传统的态度，尽管这种解释过程有时非常复杂。"[1]

如果用这样一种态度的尺度来为现代人下定义，那么我们必须问：在这些不同态度的范围内，"现代人"的态度有**怎么样的一致性呢**？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是现代的（假定上面所有的不同态度范围都是现代性的指标），人们能否期望他在别的方面也是现代的呢？史密斯和英克尔斯从未解释他们为什么使用"现代"一词。所有活着的人，不管是选择出来的还是必然的，都生活在当代世界里。现代思想和传统思想可以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并存，不管他所处的社会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因为它们表示对未来的看法，而不是对实际结构参数的看法。

卡尔证明如何才能直接检验现代主义的多维数，因而曾使用极其复杂的方法来"测量"现代性。[2] 卡尔从建立两个理想类型入手，即传统的理想类型和现代的理想类型。在这两个

---

① 史密斯和英克尔斯："OM 尺度：个人现代化的比较社会-心理测量"，载《社会关系计量学》，第 29 卷，第 355—356 页。

② 卡尔：《现代性的测量：巴西和墨西哥价值观念的研究》，奥斯汀，1968 年。

类型中，他列举了一系列属性各不相同的侧面。这样就有可能形成各种组合。卡尔没有使用一切在理论上有可能的组合与排列（仅按帕森斯提出的五个类型的变量，就可以产生出三十二种组合，克拉克洪提出三个主要关系及其五个分支部分，就可产生出二百四十三种组合），而是把每一个属性转变成可以相互关联的变量，从而有可能从众多侧面中获得个人侧面。但是，这种关联又有什么用处呢？

卡尔列举了现代性的十四种不同成份。每一种成份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变量，从传统的一极延伸到现代的一极，在两极之间有若干可能的中间点。他选择这些现代性的具体组成部分是因为它们同工作和职业的价值观有关系。他并不自称已列尽现代性的所有方面，或把现代性的定义限制为所有的十四个变量。这十四个变量构成为独立的只涉及一个方面的尺度。卡尔发现，他称之为现代性的核心征象是由七个密切相关的尺度组成的。它们是：(1)行动主义，(2)同亲戚的低结合率，(3)喜欢城市生活，(4)个人主义，(5)城市亚社区的层次低，(6)大众媒介的参与，(7)生命机会的社会分层低。他还把其他一些价值观念同现代思想联系起来，但这些价值观念只在较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这些价值观念是信任人，赞成体力劳动的态度，讨厌传统制度和强制机构。卡尔也注意到在个人的生涯中有冒险的倾向，在核心型家庭内赞成现代角色的态度。但奇怪的是，他竟然没有把职业地位和低水平的世俗化同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

总的说来，卡尔的研究支持英克尔斯的基本假设，即用定量方法描述的价值观念表征同较早时候用定性方法描绘的一样，是模糊不清的。由于他们各自的定义不同，很难将卡尔的

则，这些价值观念只能看作是工业化的另一个产物。在一个已被几个大国瓜分的世界里，这些价值观既不是实现动机的果，也不是因。

随着这些研究和其他研究开始凭经验将现代性的主要成份孤立起来，随着理论的发展，结构可望得到更大的有效性。于是，要对个人现代性的不同类型和程度加以描述便首先要解决态度方面的一致性问题。卡尔的研究已经凭经验证明广泛的一致性的存在。他在识别构成城市化核心特征的七种变量的尺度时指出："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在某个尺度中高于其他人，那么他在其他尺度上也会比较高，尽管这里面还有变化的余地。"具体地说明这些不同的变化是解释一致性问题的关键。

当这些研究被控制在社会经济状况中时，它们总是划分出三个国家在"客观条件"或结构指标上的差异。这使每一种研究都能表明人们所持的态度出现的频率较高，从而与这些态度之间的全等性有别。但是，他们的态度资料只涉及到某些群体，而结构资料一般都涉及到全国。卡尔在研究三个国家全体人口在态度方面的现代性时，缺乏模式分布或标准偏差的指标。而且卡尔的研究证明，只要"现代性"在**运算上解释**为"现代"群体（例如，城市居民）的态度模式，那么，通过这种运算上的定义就可以解决全等性问题。要从"结构条件"独立地引伸出"文化发展"（价值观和态度的变化），需要进行测量，否则，我们就无法弄清态度资料和结构资料之间的关系，因为"现代"群体的规模可能与发展**水平**而不是与发展**速度**更有关系。

顺序问题

态度现代化意味着意识的增长。在时间上，它是从一个立场向另一个立场的运动，从"传统到现代"。由于现代化是多维的，因而在这一概念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还有一致性问题和顺序问题。

当社会科学家在描述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特性时，他们都假定发展中的人在态度上经历了进步的转变。但这种假定是否有根据呢？假如我们先验地把某一组态度识别为"传统的"，而把另一组态度识别为"现代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具体地说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传统的态度是否在事实上转变为现代的态度。为此，需要进行纵向研究。我们需要知道移居到城市中去的农村居民是否真的改变了传统态度，并成为"现代人"。

费尔德曼和赫恩首先对现代主义的态度范围的这种简单顺序所作假设提出疑问。[1] 他们说，大多数有关现代思想的研究只使用横断资料。通常的方法是在城市居民中抽样，并把他们的态度叫做"现代的"态度。这种方法显然有局限性，并对"农村居民"抱有偏见。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本身产生了在现代性的态度成份中发现的一致性。这是因为态度的现代性被纯粹地解释为结构因素的派生物，诸如人们居住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农村生活等于传统态度，城市生活等于现代性，但农村生活的范围（例如，用从事农业的人口的百分比

---

① 费尔德曼和赫恩："现代化的历程"，载《社会关系计量学》，第29卷（1966年12月），第293页。

来表示)实际上是在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结构条件的一种功能。

约在十年以后，费尔德曼和赫恩继续对波多黎各进行抽样研究。他们指出：(1)那些仍是农民和那些由于态度发生**方向性**变化而改变了身份的人，在现代化过程(按照流动经历来定义)中并没有什么不同；(2)流动的经历确实按照态度变化的程度而有区别。例如，经历了流动(即经历了现代化)的人往往有较高的抱负；(3)但也有一些相反的情况。例如，有关现代思想的研究假定现代人往往重视教育。但是，费尔德曼和赫恩却发现流动的人在经历了流动以后，往往不重视教育的价值。不过，费尔德曼和赫恩很快又指出，“反教育”的态度在某些情况下应被视为现代的态度。就业机会的结构如果没有扩大，受了更多教育并不意味着就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报酬。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义的概念便会失去它的解释力。相反的态度反而习以为常。他们得出结论说：现代主义的基本影响是增强认知意识。“在一般的经济增长与人们本身的相对停滞之间必定存在着不协调之处。必须认识到在社会尺度的一端上——比如说教育——取得的进步与经济机会水平上的停滞之间存在着的差距”。①

态度“波”和结构“微粒”

全等问题——描述性的关系。对态度资料进行的跨国研究表明有一种程度非常高的态度趋同性，尽管在结构特征

① 费尔德曼和赫恩：“现代化的历程”，载《社会关系计量学》，第29卷(1966年12月)，第294页。

他要描述出忧虑和恐惧，全神贯注的事和挫折，体现在他所能想象的可能是最坏状况的看法”。[1]

坎特里尔用梯层表尺来排列回答者对他的“个人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对“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他是用这些话来阐述全等问题的：“他们对怎样把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放在梯层表尺的什么位置上，自然会产生古怪的想法，它同经济学家测量人们所处的发展阶段时所使用的指标是有关系的。”[2]

为测量全等的程度，坎特里尔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设计了一种复合指数来测量十三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用了十一个“结构变量”。按照这十一个指标中每个指标来排列，各个国家的位置于是便转变为一个从1.0到0.00的表。这样得到的社会经济指数如下：

国　家	现代化程度
美国	1.00
西德	.71
以色列	.67
日本	.60
波兰	.45
古巴	.35
巴拿马	.31
南斯拉夫	.19
菲律宾	.17
多米尼加共和国	.16
巴西	.16
埃及	.14
尼日利亚	.02
印度	.00

① 坎特里尔：《人类事务模式》，新不伦瑞克，1965年，第22页。
② 同上，第192页。

然后，坎特里尔进而获得社会经济指数与梯层等级的排列顺序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如下：

国家		个人	
现在	.47(P<0.5)	现在	.67(P<0.1)
过去	.39	过去	.56(P<0.5)
将来	.15	将来	.11

坎特里尔对等级排列进行了解释，他指出："正如所料，现在个人的等级排列同社会经济指标的关联最高——换句话说，最高的就是个人现在的亲身经历。其次就是个人对他过去在这个梯层等级中所处位置的估计，然后是国家现在所处的等级与它的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相当高的关联。至于未来，对于个人和国家来说，任何明确的关系都不复存在了。"[①]

坎特里尔的资料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客观的等级排列和主观的等级排列之间还存在一种**逆向关系**。在四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人们往往把自己现在的等级和他们国家现在的等级以及他们国家未来等级定得低，而用客观指数来衡量，它们都应定在有利的位置上。对欠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情况恰恰相反。

坎特里尔及其合作者确定的跨国比较，表明在社会经济指数上有显著差异，而在梯层等级即态度测量中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既然这两种资料都被假定为"标准化的"，这样的差别肯定不是由抽样技术所造成。他的研究结果充分证明，结构资料和态度资料之间存在着奇怪的差异。显然，工业技能的水平是先进国家固有的特征——与作为工业化的后果而出现的态度相比，这些特征更难"输出"(假定确实存在着输出的意

① 坎特里尔：《人类事务的模式》，第195页。

向)。人们可能说,工业主义的**成果**是现代化的主要原因,而工业主义的**过程**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国际比较研究中的另一个中心问题是态度研究和结构分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试图像米勒那样周密地衡量阿根廷、秘鲁和美国之间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在十五项与规范、价值观念和态度有关的尺度上存在差异。但是,在与这些国家有密切关系的人看来,这种差异却很小。[①]这种情况在下面这份著名的表格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表1)。

即使在秘鲁、阿根廷和美国之间,在轮流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平均差异稍大,仍然不能解决问题。59%与35%之间的差别当然是重要的,但对决定拉丁美洲或美洲各国之间是否存在着同质性的问题来说,就太不重要了。有人认为拉丁美洲只有在与美国进行对比时才能有所了解。然而,这份表格并不使他们感到安慰,因为,现代化显然带有"示范效应"。就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而言,这便意味着仿效和结合北美以成就为标准的价值观念。

这份表格中的数据表明,不仅在这三个国家中用以测量价值观念的项目之间存在着差异,而且在一些很重要的项目中,阿根廷更像美国,而不大像秘鲁。米勒没有对他的资料作出恰当的回答;相反,他对有关拉丁美洲文明已经稍受玷污的看法引起疑问。也许有人会认为,米勒的十五个项目并不完整,他把衡量个人获得满足同政治态度有什么联系等一套比较复杂的测量包括在内,就有利于排除他的研究成果中某些

---

① 米勒:"国际模式和规范的测量:比较研究的工具",载《社会科学季刊》,第48卷(1968年3月),第531—547页。

重复的方面。[①] 这似乎是对批评的有效辩护，但是，仅仅增加抽样因素的数目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每一个因素的解释力仍未得到检验。如果按结构参数来考虑，态度因素是否有关，主要取决于生产和消费的工业组织，而不是取决于由此产生

表 1　美国、秘鲁和阿根廷的平均级次以及秘鲁与阿根廷、秘鲁与美国、阿根廷与美国之间的级差

尺度项目	美国的平均级次 排位21	秘鲁的平均级次 排位21	阿根廷的平均级次 排位15	秘鲁与阿根廷的平均级差	秘鲁与美国的平均级差	阿根廷与美国的平均级差
1. 社会承受力	1.66	4.48	3.18	1.30	2.82	2.02
2. 卫生	1.38	4.66	2.93	1.73	3.28	1.55
3. 信任	1.75	4.86	3.27	1.59	3.11	1.52
4. 安全	2.33	4.95	3.50	1.45	2.62	1.17
5. 家庭	5.42	1.85	2.71	0.86	3.57	2.71
6. 儿童	1.33	4.43	2.80	1.63	3.10	1.47
7. 道德准则	2.00	4.90	2.75	2.15	2.90	0.75
8. 宗教	4.57	2.05	3.66	1.61	2.52	0.91
9. 阶级	5.00	1.38	3.07	1.69	3.62	1.93
10. 共识	1.57	4.57	3.92	0.55	3.00	2.35
11. 劳动	5.33	3.10	2.69	0.31	2.23	2.64
12. 民主	1.42	3.66	2.81	1.85	2.24	1.39
13. 工作	1.52	4.76	3.07	1.69	3.24	1.55
14. 公民活动	1.19	4.81	3.58	1.23	3.62	2.39
15. 财产	1.19	3.29	3.59	0.29	2.10	2.39
各类级次的平均差异				1.33	2.93	1.95

摘自米勒："国际模式和规范的测量"，载《社会科学季刊》，第48卷，第545页。

的个人在文化上对工业主义的后果持什么态度。

范斯坦收集的资料表明阿根廷和美国之间的客观差异比人们在态度研究中所想象的还要大得多。[②]例如，在测定通货

① 见卡尔：《现代性的测量》。

膨胀的螺旋形上升和经济增长率时，以1950年作为基线，指数为100，有关美国的资料表明到1957年，生活费用指数上升17%，阿根廷在同期的生活费用指数上升226%。其次，在此时期，美国出现的经济年增长率为3.5%，而阿根廷的年增长率则为1.9%。人们还会补充说，最近几年，尽管阿根廷的政权发生了转变，但国民生产总值没有表现出显著的“跃进”的趋势。再次，1957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439美元，而美国为2079美元。1957年以后的十年中，美国的人均收入持续增长，而阿根廷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却更慢了。目前，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680美元，而美国为4050美元。

美国和阿根廷确实有共同的现代化现象。例如，这两个国家的文盲率都非常低。两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比较高。然而，两国的人口分布颇不相同：美国的城市区域分布广泛，而阿根廷实际上只有一个大城市和一个首都地区，首都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5%。这两个国家在工会组织和中等教育等测量中都排在较高的层次上。

真正的重大差别在于美国公司在拉丁美洲的私人投资与阿根廷在北美的投资相比。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长率一直保持不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须再作详细的评述。同样，阿根廷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出口，对美国工业缺乏大规模的控制，这也是毋庸争议的。使用这些变量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变量，使人们无须进行态度研究中进行的那种同美国的模糊比较。例如在过去十年中，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总投资占国

② 范斯坦：“变化中的拉丁美洲与美国的外交政策”，载范斯坦编：《两个变革的世界：经济发展论文集》，纽约，1964年，第375－420页。

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令人失望地稳定不变；只有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巴拿马能够提高比例。1951 年至 1964 年，拉丁美洲的储蓄从 16.3%上升到 16.9%，而收入则增长了 50%以上。但是，在最近五年内，尽管人均收入较高，但储蓄并不上升，甚至略有下降。国家成就的最重要标志边际储蓄率至多也只能说没有增长，一直保持在 15%的水平上，与人均收入只有拉丁美洲几分之一的印度或巴基斯坦相比，要低 20—30%。如果要取得比较高的自我持续增长率，边际储蓄率至少要增加 50%，如果实现了充分就业的目标并且达到每年人均 2.5%的持续增长率，那么，工业增长率应该比目前几乎高两倍，农业增长水平也将高 50—60%。

在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的外汇也未能充分增长。由于家庭储蓄的流动似乎依赖外汇的补充——未来的投资者如果看不到可以获得外汇购买进口商品或机器的前景，也许不会储蓄——外汇的缺乏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储蓄的缺乏。

货币缺乏稳定性和通货膨胀在拉丁美洲四分之三的国家中依然存在。我们知道，货币的稳定不应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在正常情况下，要增加国内粮食的生产和供应需要好几年时间，因此，只能试图逐渐地达到货币稳定。然而，在一些国家（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内，即使通货膨胀率的下降没有达到计划的幅度，但按经济增长来看，代价似乎很高。货币的不稳定可能阻碍储蓄，并妨碍拉丁美洲向经济一体化前进。[①]

经济学家进行的一系列测量表明美国和阿根廷（以及整

---

① 参见罗森斯坦-罗丹："进步联盟与和平革命"，载霍罗威茨、卡斯特罗和杰拉西编：《拉丁美洲的激进主义》，纽约，1969 年，第 53—60 页。

个拉丁美洲)在一些主要领域中处于发展阶梯的两个相反的极端上。美国的出口远远超过进口,而诸如阿根廷等一些国家很难在进出口之间维持任何一种平衡。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国外私人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利润率在14%以上——这比纯粹在国内投资所获得的利润高得多。在同一时期里,阿根廷在国外的私人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利润率不到这个百分比的一半,在7%以下——比纯粹在阿根廷国内投资所获得的利润率少得多,也远远低于每年的通货膨胀率。欠发达国家和卫星国的关系;逐年的支付赤字;欠发达国家在先进国家中微不足道的投资金额;欠发达国家的人力向发达国家的流出;还有高价的成品从发达国家流向欠发达国家,而农产品和矿产却相反地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所有这一切加上前面提到的因素,便不难看出落后地区的现代化常常是以推迟工业化为代价而取得的。②

阿根廷和美国的例子代表了海森伯格所说的那种不能确定的情况。两个国家都展示出相似的现代化指标——即文化认同的指标,但是在工业化和对外贸易的各自指数之间却没有任何相互关系。根据杰曼尼的估计③,阿根廷在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尺上与德国、英国甚至美国排在同等地位上;而在工业化的表尺上,阿根廷的排列顺序接近巴西、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甚至接近一些非洲国家(见表2)。这一点有力地支持下述

---

① 进出口结构上的这种类似的不平衡在英国和法国等一些过分成熟的社会也存在。可凭推测来指出的是一些欠发达国家特有的过程也可以在超发达的现象中找到。

② 见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统计公报》,第3卷,第1期,纽约,1966年;《战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纽约,1964年。

③ 杰曼尼:《转变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布宜诺斯艾里斯,1962年。

表 2　现代化进程不同阶段中五组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数

（约 1950—1955 年）

	大量消费阶段				工业革命阶段		转变中的前工业社会			传统社会	
	美国	英国	西德	意大利	阿根廷	巴西	墨西哥	厄瓜多尔	刚果	海地	埃塞俄比亚
1. 经济发展											
a.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55 年美元）	2243	998	762	442	374	262	187	204	98	80	75
b. 能源消费	7834	4594	3266	992	1033	329	817	157	56	75	43
c. 农业人口（%）	12	5	14	29	25	61	58	53	84	-	83
2. 现代化											
d. 出生率（每千人）	24.9	15.8	15.6	10	23.7	45	47.3	47.1	—		—
e. 死亡率（每千人）	9.5	11.7	10.7	9.5	10	20	15	20	—	—	—
f. 平均寿命（岁）	71	71	67	65	64	45	50	45	—	22	-
g. 城市居民（每两万人）	52	67	44	30	48	20	24	18	8	2.5	5
h. 识字率（十五岁以上）	97.5	98.5	98.5	87.5	86.5	49.4	56.8	55.7	37.5	—	10.5
i. 大学生（每千人）	18.2	7.7	4.8	2.9	7.5	1.2	2	1.5	0.1	—	0.3
j. 选举投票率（成年人）	63	78	88	94	90	42	50	46	—	—	3
k. 中等职业阶层占全体在职人口的比例（%）	47	34	40	29	40	17	17	11	—	—	5.4

资料来源：a、c、g、h、j 项：耶鲁数据研究中心：《跨国比较基础》，纽黑文。

b 项：联合国：《统计年鉴》，1960 年。

d、e、f 项：联合国：《世界社会状况报告》，1957 年。

k 项：据米勒："社会流动比较"，载《社会学动态》，第 9 卷（1960 年）；杰曼尼：《转变时期的政治和社会》。

观点，即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如果整个的跨国抽样都是从城市化程度很高的那部分居民中取得的，那么回答问题的人所表达的价值观念可以代表现代化的态度，但不是全国的真正情况。[1] 这一点在最近有关阿根廷对越南战争态度的调查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项调查与美国进行的一次类似的调查所揭示的情况正好相反，它的抽样表现出各个阶级在态度上的鲜明界线。调查时提出的问题必须有明确的定性，这个原则——这是一个经常遭到践踏而不去执行的原则——在这次咨询性调查中表现出来。当询问到美国干涉的原因时，阿根廷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往往归咎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本质。在上层阶级中，只有 19%的人把这些看作是导致因素，而 50%的中产阶级和 45%的下层阶级的回答是这些就是原因。另一方面，上层阶级认为战争的原因是捍卫民主、自由和西方的需要（占 43%），有的从地位来作回答，认为这是世界强国维护声望的需要（占 36%）。下层阶级中只有 18%的人同意"捍卫民主"的回答，3%的人同意出于地位需要的回答。在如何才能解决战争的问题上，下层和中产阶级中赞成越南自决和维护越南主权的人分别占 65%和 62%；而上层阶级的抽样中，45%的人认为越南战争的解决在于遏制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政府体系的扩张。[2] 这证明阶级因素比通常的社会流动调查表上的推测看来对解释态度的差异更有力量。

① 见阿尔蒙德和维巴尔：《市民文化》，波士顿，1965 年。在接受他们所作的研究结果时，看来存在着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

② 见"社会调查：阿根廷人对越南战争的想法"，载《特写》周刊，1968 年 3 月 5 日，第 28 页。

解释关系的性质——因果关系的顺序

一些作者直截了当地把态度看作发展过程中的原因，而不去讨论结构的有效性、一致性、顺序和全等问题。麦克莱兰的"成就需要"理论虽然很有趣味，但难以承认它就是发展的推动力，因为其中有一个是否有效的问题。① 哈根取消地位尊严的理论似乎更牵强些，② 因为取消地位尊严之前要花整整一代的时间才能产生出重大的发展意义。另一方面，如果按照麦克莱兰的理论，人们得修改所有的儿童教科书和童话才能使它们显示出高"成就需要值"。即使到那时，要证实这一理论，还得等待一代的时间。

态度和价值观念在发展中所起的原因作用继续萦绕在社会科学的思考中。这种观点之所以经久不衰，其原因或许是没有一个社会结构可以同操作和维持这些结构的人割裂开来，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态度必然起原因的作用。这种演绎法简直是一种讽刺，然而，它却为用态度方法讨论发展问题奠定了基础。即使往往更加依赖客观(结构)资料的经济学家也对人的态度方面作出假设，例如在经济人身上大大贬值了的"理性"，就是这样。

提出产生价值观念与结构孰先孰后的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可以证明，这两者是互相联

① 麦克莱兰：《成就社会》，普林斯顿，1961年。麦克莱兰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成就需要理论。他在最近的著作中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很大的修改。尤见"训练后的个性变化"，载麦克莱兰和温特：《激发经济成就》，纽约，1969年，第324—335页。

② 哈根："经济增长如何开始：社会变革理论"，载《社会问题期刊》，第19卷(1969年1月)，第20—34页。

系着的。应用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是，人们应当在什么地方开始进入因果循环的关系？由于在逻辑上态度和结构既可以看成为因又可以看成为果，我们必须假定某种条件以便权宜地、省事地、有效地把其中一个当作因或果来考虑。然而，这里必须指出，虽然某一种态度能导致各种不同的行为，犹如各种不同的态度能导致某一种行为一样，但是，个人的行为如果不转化为群体的行动，就无意义，而群体行为如果不转化为制度化的行为同样也无意义。另一方面，过程的制度化虽然可以作出更强的有效断定，但不能保证对不同的人产生统一的作用。

因此，"来龙去脉型"的分析需要对态度与结构同时加以考虑。我们还需要了解这两者的关系是倍增的还是添加的。其次，我们需要了解这两种变化指标之间包含的时间差距。我们需要研究临界条件。正如在经济学中，任何一种经济在达到能够自我持续增长之前，或在起飞阶段之前，必须获得罗斯托所说的"先决条件"，[1]我们应当乐于知道态度对社会变革产生效力的临界点是什么。最有前途的研究道路是有关过程的研究，而不是在社会科学中长期以来特有的静态平衡模式。

研究者决不能忽视所用的数据在性质上的局限性。例如，用研究态度的方法去探讨变革和发展往往强调中产阶级所起的革新作用，然而，经理制只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交换体系存在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克劳斯纳在其研究整体社会的著作中写道："整体'社会'涉及把属于不同理论网络的概念联系起来。

---

① 罗斯托："从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载《经济杂志》，第66卷(1956年3月)，第25—48页。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双学科陈述的例子。一个'好的'双学科陈述包括两个术语，各自指不同的理论体系——例如，一个指个性，另一个则指社会体系；或指不同的亚体系——例如，一个指政体，另一个指经济。这种陈述还将提出某种机制作为中介把这两个体系中的事物联系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机制包括某个社会结构内部相互影响的过程。这个机制的功能是把一个体系中的事物转化为另一个体系中的事物。如果不提到机制就无法决定共发事件的原因。机制有可能先于独立的事件而存在，也可能是由独立事件或关联事件的相互影响所形成，也可能是存在于同独立事件或关联事件相邻的第三个体系或亚体系中。当独立事件与关联事件是同一个体系的两种状态，处于同一个环内，那是特殊情况，另一个体系中的机制则可以用来解释状态的变化。"

结论

选择内因论还是选择外因论，从本质上说就是赞成价值观念的理论（现代化）还是赞成利益理论（结构主义）的决定。讨论欠发达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讨论同落后状态有关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前提。同样，讨论停滞的外在原因实际上就是讨论利益的理论；也就是说，首要的问题是先进国家剥削欠发达国家所获得的利益。

许多论著表明，这种方法论的困境是由意识形态的重大差距造成的，因为有些人认为充分发达的国家需要研究发展不充分的状态，而另一些人认为充分发达的国家不需要研究发展不充分的状态。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先验的推测。很

明显，导致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都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试图把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作任何结合来考虑的理论家是那么少；朝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也微乎其微。利普塞特和索拉里编纂的讨论发展中国家精英的那本文集中，所收集到的论文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那些认为内部因素和价值观念是关键问题的社会科学家所写的论文，另一部分是那些认为外部因素和利益问题是关键的社会科学家所写的论文。① 那些持价值观念立场的人无一例外地把态度作为测量手段，而那些主张利益论的人则用结构变量来证明他们的观点。

以较新形式出现的方法论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把问题复杂化了。目前，为了解释差异，有人把倍数变量引入计算机的分析技术中，结果只增加了先前没有考虑过的因素。但是，那些相信因素具有添加价值的人却未能提供因素强度的表尺来解释目前的问题。奇怪而且不幸的是，因素分析竟然至今还不去深入调查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比，信奉天主教的绝大多数拉丁美洲人的生命周期是否造成不发展状态的一个更重要的因素。确实，在韦伯的辞令中，宗教因素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发展论者缺乏类似于向西欧和美国提供的那种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础。由于在分析中有增加变量因素的趋势而不是以压缩统计的程序来减少变量的数目，对这个基本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复杂化了。

达兰德认为，经济计划的主张在巴西基本上是用来动员

---

① 利普塞特和索拉里编：《拉丁美洲的精英》。

全国人民到政治体系中去的手段。[1] 于是计划的主要目的不是经济增长，而是政治动员。日本的"特例"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观点。这个国家的情况往往把欠发达国家或停滞社会的大多数分析弄得混淆不清。日本曾经表现出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框架下的高度国内发展，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它的高度渗透。然而，日本的经济发展并非在那种使人认为必不可少的革命以后才出现的。另一方面，对此也需要在结构框架方面作出解释，并迫使我们从日本封建阶级结构出发去解释日本的特殊性。这样，结构问题同国家形成的问题就直接联系起来了。

不管国家形成的分析有什么缺陷，也不管这种缺陷有多少，但它毕竟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迫使人们去考察国家双边交往中的交换体系。它集中讨论任何一个特定的欠发达国家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充分发达国家之间的直接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特定的情况下如何导致某种结果。因此，分析美国和玻利维亚的关系或分析苏联和波兰的关系，可能是讨论欠发展状态的关键性的中枢框架。国际性比较并不只是简单地对充分发达的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作一般的理解，而是要理解大国和小国之间非常具体的双边关系。这里正如阿普特和安德雷因所指出的，[2] 结构主义者和策略理论家共同证明谈判的形势对于欠发达国家有重要的作用，它们经常在谈判的形势下开始着手实现它们在国内要实现的明确目标和抱负。

---

① 达兰德：《巴西的计划：发展政治与行政》，查佩尔希尔，1967 年。

② 阿普特和安德雷因："比较政府：发展中的新兴国家"，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8 年，第 82－126 页。

结构方法可以让我们超越内在有机组织的解释系统而进入比较的体系。它还可以使我们能把欠发达的国内问题和帝国中的经济停滞问题区别开来。最后，它使研究者能找出发达的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维持着的关键性的相互影响的关系（通常是双边关系）。

索尔瑞斯和汉布林曾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把人口普查和选举数据同调查数据结合起来：[1]对于全国的、州的和郡的每个单位的数据，在调查态度反应时应取平均值。然后，可以把这种平均值的态度反应结合到同一单位中有关人口或结构等其他特征的分析中去。这样，衡量"赞成革命"这个调查项目内坚决赞成革命的回答者所占的百分比，可以同失业者（阶级分化的尺度）的百分比、离婚者的百分比（社会混乱的尺度），以及城市人口百分比（以居住在一万人以上的社区为标准）相互联系起来。

在方法论上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每一个亚单位作出概括的抽样调查是否充分。现存抽样很可能并不适用于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回答者是高度群集的。然而，设计一个能充分代表每一个亚单位的抽样在理论上是一件简单的事。既然分析方法可能局限于手头可用的调查数据，那就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进行新的研究以满足方法论的各种要求。这样的分析比目前的宏观分析更有许多有利条件。因为，这些分析一般来说，不包括任何态度数据。如果价值观念、态度和信仰在宏观水平上确实有其作用，那么，在这种分析中肯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

---

[1] 见索尔瑞斯和汉布林："1952 年智利的社会经济变量和支持左翼激进派的投票"，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 61 卷，1967 年 12 月，第 1053—1065 页。

制住差异。

科尔曼的报告《平等的教育机会》采用了相似的程序。[1]他的调查涉及学校的许多特征。在一种分析中，他把这些学校的特征同各种态度特征联系起来，后者为学校中个人回答者的平均值。它证实这些态度特征的确控制住了相当比例的不受学校结构特征影响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因变量就是学术成就。科尔曼的这种平均法受到了指责，主要是因为这种简化法不可能正确衡量各个因素的作用。既然人口和结构变量都是用平均比例来表达，那就没有理由说其他各种测量、特别是对态度的测量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取它的平均值并且纳入到同一种分析中去。

能否把态度看作是结构测量尺度中的又一个变量，尚在争议之中。使用心理测量也许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心理测量同其他形式的结构测量差不多。如果说过去所作许多努力似乎有些讽刺意味，那也仅仅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发展研究中的分析水平几乎没有超越集成的数据。目前所需要的恰恰是比迄今为止使用的更精密的测量方法。结构体系在发展问题的讨论中所作重要贡献在于它在概念上特有的丰富性，从而使研究者能把社会发展策略同社会历史相对应。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这是尝试性的，却是令人不能不接受的。首先，发展过程中包含着工业化和现代化两个亚单位。第二，这两个主要亚单位在空间和时间上可能是平行的，也可能不是平行的。事实上，已有的资料表明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有相当大的差别，在某些时期甚至是

---

① 科尔曼等：《平等的教育机会》，华盛顿特区，1966 年。

相互对立的。第三，正如海森伯格对波—微粒效应的研究一样，最好是对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分立过程进行分析和归纳，而不是对社会变化的性质作单一的假设。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赞同多元论的叙述。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过程中，只要把概念化的态度数据作为一组关键的因素，那便十分可能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样，在任何国家决定有关社会变革的优先考虑时，我们可以更好地弄清哪些因素是独立的，而哪些因素是相互依赖的。

15. 美国和西欧的公共教育、卫生和福利方面的政治学：增长和改革的潜力如何不同

阿诺德·J·海登海姆

〔编者按〕 海登海姆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政治学，曾与人合著《商业公会及其对政党的财政资助》(1968 年)，并著有《德国的历届政府》(1971 年)。

本文介绍了美国和西欧这些一般被认为是"先进"社会的国家如何在卫生、教育和福利等方面分配资源方式上的差异，从而促进了对有关现代化社会中趋同和趋异等问题的理解。作者把西欧各国普遍相似的政策同美国的政策严格地区别开来。他在结论中指出，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某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传统具有持久而广泛的影响。

比较研究学者对政策制订的政治动力感兴趣，而公共政策研究学者则渴望研究跨国背景下的全国性计划，目前两者都面临相似的困境。大量文献集中讨论决策过程，而很少注意政策的实质。有些是对消费水平进行统计分析，但这些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我已超越地理划分，而进一步探索某些政治因素在形成这种地理划分时可能发挥的作用，本着假设归纳的精神指出其因果关系。范围较广的问题有时需要富有大胆创新的解释性的理论体系。例如，为什么美国初等以上教育的发展"领先"于欧洲的发展模式，就像美国的公共卫生计划显著"落后"于欧洲的公共卫生计划那样？我采用的对策是，仔细观察欧洲的立法工具和行政工具——这里姑且称作管辖权——与美国具有相似职责的工具怎么会有不同，并探索其明显的后果。为什么欧洲"进口"某些社会政策例如社会保险等，就会成功地"美国化"，而其他一些社会政策却没有"美国化"？为什么美国扩大教育机会的模式在某些欧洲体系中很快被采用，而在另一些体系中则没有？要解释这些问题，我们就得深入了解制度上的差异为何把不同的机会和限制条件特别强加给提供服务者和利益获得者的利益团体，从而影响政策的目标和计划的执行。

公共利益

美国和欧洲的发展概况

在引进公共社会政策的前后顺序，这些政策引进后接着出现的覆盖面的扩展速度、利益扩展的速度和公共支出增长速度方面最重要的差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美国采用公共社会保险和一些其他各种维持收入的计划在时间上约比欧洲晚三十年，但它随后展现的增长速度却

条道路上发展”。[①] 确实，在近几十年内，美国社会保险开支的平均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相比，高于大多数欧洲国家。老年基本社会保险计划(OASDI)在美国深受欢迎，以至于随后的各种社会计划，如医疗保险等，都在这个基础上才变得易于推行。[②]

采用公共养老金的时间选择似乎取决于工会的发展，普遍的意识形态以及政府方面对社会要求预测的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普赖尔最早对公共计划的相关事物进行了统计测量。他发现工会的发展到 1913 年一直是与采用社会保险形成正比的唯一变量。[③] 但在欧洲，各国政府没有等待社会主义的工会或政党提出要求。恰恰相反，它们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例如德国的俾斯麦和英国的劳合·乔治——给予工人以社会利益，希望限制他们对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欧洲的上层阶级或者至少其中的一部分人发现，在 1914 年以前，工人在意识形态上比更具有个人主义和放任主义倾向的美国上层社会更容易接受社会保障计划。美国的工人组织发展缓慢且无规则，因而不能充分刺激美国去寻求先发制人的策略。

格林斯通认为，“工业经济秩序加在已经确立的赞成资本主义和联邦制的民主政治制度上面”[④] 限制了美国劳工的能力，以致无法把工人阶级的集体要求转变为政治问题。由此造

---

① 佐尔纳：《公众社会成就与经济增长》，柏林，1963 年，第 54 页。

② 马默：《医疗制度中的政治》，伦敦，1970 年，第 2 章。

③ 普赖尔：《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支出》，伊利诺斯，霍姆伍德，1968 年，第 475 页。

④ 格林斯通：《美国政治中的劳工》，纽约，1969 年，第 365 页。

成的美国工会的"政治行为的巨大差异",在社会保障方面得到证实。以塞缪尔·冈珀斯为首的占优势地位的美国劳工联合会(AFL)领导人反对那些支持社会保险的劳工领袖,后者认为社会保险是争取社会更大平等的一个步骤,声称"政府的规定往往把本国公民固定在各种阶级内,建立已久的保险制度往往使这些阶级僵化"。[①] 塞缪尔·冈珀斯把大多数公共福利措施看作是工会潜在的敌人,妨碍他们达到在同雇主谈判中可能追求到的那些目标。结果,"甚至像悉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等人正在把立法方法当作(英国)劳工的主要手段来讨论时,美国劳工运动领袖们却反对所有涉及法律和政治的行动方式"。[②] 三十年后,美国工会的福利政策目标"仍然没有许多欧洲国家实际上已成为立法的福利计划那么广泛"。[③]

在某些国家,工人已经合理地产生阶级意识的感情,占主导地位的工人联合会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们提出的要求往往不会产生严重的争议。工人联合会一般都提出或支持社会保险计划的建议,用以作为减少社会不平等的手段。瑞典和英国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德国,对立的和专制主义的政府本身都在与社会主义联盟竞争,用以控制工人阶级中的追随者。由于在这一斗争中,俾斯麦把社会保险计划当作手段来使用,因此,各种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党都起来反对社会保险计划。里姆林奇对美国和德国的工会领导人进行了比较,认为

---

① 里姆林奇:《欧洲、美国和俄国的福利政策与工业化》,纽约,1971年,第83页。

② 麦康奈尔:《个人力量与美国民主》,纽约,1966年,第83页。

③ 格林斯通:《美国政治中的劳工》,第363页。

是在政治上的”。[1] 现在，个人养老金计划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已经有所减弱，政治压力已经形成，要求采用扩展性的技术——例如，把救济金水平同生活费用指数自动地联系起来——在最近的二十年里，欧洲政治领导人推动了这种方法的采用。

教育：它是“起飞”更有利的先决条件

美国比欧洲更早把初等教育作为免费的公共利益来实施，但是，长期以来，它的分布效应一直受到限制，因为这类教育的提供一直是不平衡的，而且接受教育实际上常常是依靠自愿的。南北战争后，美国开始探讨建立统一的强制性初等教育制度，而普鲁士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确立了类似的制度。这时，无论美国还是欧洲，中等教育的规模和学生来源都非常有限。“社区中甚至只有一小部分儿童上中学……工人阶级常常把中学视为上层阶级的机构，与他们的愿望无关，对他们来说也不可能利用，因为在青少年时期挣钱养家糊口非常重要。”[2] 其后，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美国公立中学的规模和职能都得到了发展，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以同它相比。

在美国中等教育的“起飞”年代，每天都有新的中学建立起来，美国的十四岁至十七岁的儿童在全日制中学的求学人数迅速增加，入学率上升五倍，从 1890 年的 6.7%增加到

---

① 黍拉和基尔比：“若干国家在社会保险发展中的差异”，载《国际社会保险评论》，第 22 卷(1969 年)，第 139—153，145—146 页。

② 卡茨：“1870 年前的中等教育”，载《教育百科全书》，第 8 卷，纽约，1971 年，第 163—164 页。

1920 年的 32.3%，从此以后当然一直保持着上升的趋势。公立中学的增长同私人学校的相对减少(到 1940 年为止)是相符的，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想进中学读书的人"不论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和知识背景都可入学"。① 到 1928 年，美国进入普通和专科全日制中等学校年龄组的比例比欧洲高五倍。② 美国连续突破数量上的界限至少比欧洲提前了三十年。按照年龄组来衡量，美国中等学校的入学率在 1910 年前后突破了 10－12%，而欧洲一般是到 1945 年以后才达到这一水平；美国在二十年代初突破了 30%，欧洲到了六十年代才达到这一比例。③

美国初等以上公共教育的这种十分独特的"起飞"情况，如果仅仅用政治或经济的变量来解释是很难讲清楚的。用价值观念和信仰来解释似乎更显得合适些，因为这种教育同这种从社会文化主根中滋生出来的现象具有密切的关系。伯索夫的看法也许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他认为，"公立学校作为经济观念和理想主义价值观念的混合物，即后来被称作美国

---

① 埃德尔编：《美国教育二十五年》，纽约，1924 年，第 267 页。

② 1928－1930 年，年龄在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全日制学校入学率在美国为 33%，瑞典 14%，德国 16%，英国 16%。美国有五分之四的中学生进入普通中学；欧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学生进入职业学校。见汉斯："比较教育统计资料"，载《教育年鉴：1934 年》，伦敦，1935 年，第 172－173，180－183 页。

③ 按照班克斯所用资料，每千名居民中进入各类中学的入学率如下：

年份	美国	德国	瑞典	英国
1890	32	74	42	—
1900	68	89	42	—
1910	99	99	57	—
1920	247	117	61	83
1930	388	119	65	115
1946	581	205(1950 年)	267	283
1960	571	231	278	673

载班克斯编：《跨国按时期系列资料》，剑桥，1971 年，第 6 编。

生活方式的维护者和官方灌输者，与美国的国教几乎合二而一”。如果把它们同普遍应用的反对政府企业的禁止放任联系起来考虑，这些因素也许有助于解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公立学校为何是“美国社会改革者能与国家通力合作的唯一机构”。① 在欧洲，阶级特权与对抗，国家与教会之间存在的悬而未决的管辖权冲突，阻碍了利益集团之间的这种联合。

中等教育发挥的许多对于进步时代的上层分子来说有用的作用，其中包括大量涌入的非北欧移民的社会化，培养未来的雇主所称赞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巧等，最近一些文献很多提到这些方面。但是，在几十年“起飞”的关键时期，这种教育也一定曾经依靠美国佬那种善于讨价还价的意识。开支固然增加了，但被一些做法压缩下来，这在欧洲背景下不可能实行——而且以后也无法实行的。那里的中等学校是高标准和高地位的机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约有 90%的美国中学与小学合并在同一个校舍里，教师的平均薪水在 1903 年看来只有其他一般公务人员平均薪水的十分之六。② 甚至在比较富裕的二十年代，美国中等学校的人均支出只有初等教育的两倍，而在欧洲，相应的比例分别从两倍半至五点一倍。③

---

① 伯索夫：《不安定的民族》，纽约，1971 年，第 438、440 页。

② 法布里坎特：《1900 年以来美国政府活动趋势》，纽约，1952 年，第 39、60 页。薪水数据是作者根据以上资料来源计算出来的。

③ 汉斯：“比较教育统计资料”，第 171 页。从 1890 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中学的师资力量增加了九倍，1895 年，美国中学教师数量的增加大于德国各级学校教师数量的增加。美国教育在各种公共福利开支中占有的份额稳定上升，于 1929 年达到 56.8%的高峰。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起初只是缓慢地上升（1913 年为 1.3%），二十年代上升较快（1929 年为 2.4%）。然后，从 1947 年起再次迅速上升（1966 年为 4.7%）。

机构”，但几乎没有一个欧洲的工会领袖响应。[1]

然而，在这一时期，美国所有的利益集团中最流行的倾向，用韦尔特的话来说，就是采取以教育代替其他社会行动方式的基本策略来处理社会问题的程度。[2]因此，冈珀斯反对童工立法而支持较高标准的强制教育。像维勒那样的住宅改革家反对照搬欧洲的公寓模式，相反，他提出的规章立法不仅包括对地主的正规教育，而且也包括对房屋管理人的正规教育。人们在培训学校入学后“可以学到与工作有关的理论和实践”，[3]毕业后可以照看管理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的房屋。一位对此羡慕不已的英国游客提到，美国的教育把自己的地位成为“使国家免受公共慈善事业贫困化浪潮侵袭的模范”。[4]到1935年，教育仍然被说成是“唯一充分发展的社会服务”。[5]

社会服务与物质利益：为什么一些国家从未进入“起飞”阶段

欧洲公共社会服务计划除教育外，开始时往往规模不大，经过“起飞”时期，逐渐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美国相应的计划则常常落后于欧洲三十年至六十年，但与社会保险等维持收入的计划不同，美国的公共社会服务计划一

---

① 坎德尔承认欧洲将会慢慢地模仿美国普及中等教育的运动，因为欧洲教育的基础不是教育原理而是平等。见坎德尔："教育"，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5卷，纽约，1935年，第421页。

② 韦尔特：《美国的民众教育与民主思想》，纽约，1962年，第189、241页。

③ 维勒：《住宅改革》，纽约，1910年，第189页。

④ 莫斯利委员会关于美国的报告，伦敦，1904年，第398页。

⑤ 科姆斯托克："公共支出"，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卷，第7页。

般都增长不大。关于社会保险发展的动力问题，里姆林奇曾经指出，"人们能注意到，这一制度的扩大比它的创建要容易些，因为反对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已经减弱"。[①] 这一概括似乎对欧洲的社会服务计划来说也是确切的，但对美国的许多社会服务计划来说，就不是如此。

将近十九世纪末，美国各州和联邦的卫生计划开始实施后，用于民众卫生计划的公共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将近半个世纪里没有显著的增长，反对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是加强了，而不是减弱了。一个全国性的卫生委员会于1883 年流产，在 1953 年之前，公共卫生局一直是财政部的一个下属行政机构。美国公共住宅从未进入"起飞"阶段，仍然是一种停滞不前的象征性的计划。公共儿童福利服务以不固定的形式时而扩展，时而压缩，没有呈现出稳定的发展速度。[②]

建立公共卫生保险的建议第一次失败之前，美国的公共卫生开支在 1913 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0.4%。1932 年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0.7%。到 1964 年，根据官方统计，达到 1%；但如果扣除与防务有关的开支和研究开支，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仍保持不变，实际上可能有所下降。[③]从 1950 年到六十年代初，美国公共卫生服务计划中被国际劳工局列为社会保险开支的百分比从 10%下降到 6.6%，而瑞典却从 18%增加到 23%。[④]在公共住宅方面，支出统计为"不起飞"的

① 里姆林奇：《福利政策》，第 232 页。

② 梅里亚姆和斯科尔尼克：《美国 1929 年至 1966 年公共计划中的社会福利开支》，华盛顿，1968 年，第 253 页。

③ 梅里亚姆和斯科尔尼克：《社会福利开支》，第 192、214 页。

④ 国际劳工局：《社会保险的成本：第六次国际调查》，日内瓦，1967 年，第 322 页。

论点甚至提供了更具体的证明。[1] 1936年，公共住宅和低收入者的住宅补助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05%，1965年的比例与此相同。美国社会保险的赔偿费从1935年人均3.15美元增加到1955年的59美元，1961年增加到121美元，而公共住宅的人均支出在同期内分别从10美分增加至53美分和1.06美元。[2]

同社会保险和教育相比，对与公共服务的产生和起飞有关的因素的考察还不够系统。但是，正如下面在讨论医疗问题时将要表明的，同私人提供服务进行竞争的防护力量在美国的背景下却非常强大。看来这种力量不仅同在美国"反对社会主义"的号召总能获得较大的反响有关，而且还同连续执行这些计划的时间选择有关。约在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时间里，职业化大踏步地发展。与此相适应的一些熟练技术群体中的利益团体组织参与了社会上的许多有关服务。这种情况在大西洋两岸都发生过，但以美国进步时期最为明显。[3]

在欧洲，实行公共医疗保险计划的时间有的是在医生建立完善的组织之前，如德国就是这样，[4] 有的是在他们的组织产生凝聚力之前，如1911年的英国就是这样。不久以后，美国试图实行同样的制度，却遭到了一些专业医师的坚决反对，这

---

① 甚至连官方文件（梅里亚姆和斯科尔尼克：《社会福利开支》，第161页）都认为"支出数额仍然相当少"。

② 梅里亚姆和斯科尔尼克：《社会福利开支》，第193页。

③ 吉尔伯：《隐藏着的等级制：职业和政府》，纽约，1966年，第34－40页；史蒂文斯：《美国的医学和公共利益》，纽黑文，1971年，第3章；杜鲁门：《统治历程》，纽约，1951年；伯索夫：《不安定的民族》，第450页。

④ 纳朔尔德：《人寿保险与医疗保险的改革》，弗赖堡，1967年，第152页。

些人在前几十年中就大大加强了他们的职业认同，并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他们在美国的多元政治结构里成功地行使其否决权。[①] 同欧洲相比，美国从事公共服务的专业人员对政治家有更强烈的"本能上的反感"。他们认为政治家的影响妨碍了他们的职业自主性。莫舍指出，除了专业人员已经取得绝对控制权的领域外，许多这样的职业社会化都把政府视作"外部机构"。[②]

经营地产的利益集团对公共住宅计划的抵制获得成功，显然是由于他们的实力比较大，而不是由于专业人员的反对。[③] 但像社会工程之类的职业本来有可能积极赞同公共住宅计划，但事实并非如此。参加他们会议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在1930年前"没有一位发言人建议对住房实行公共补贴"，对于这项职业"在计划中没有充分保证给他们的同行们非常熟悉的那些家庭以合适的住宅"表示惊奇。[④] 在1937年开始的美国立法斗争中，主张实行公共住宅计划的人力量薄弱，被迫接受妥协，这就"持久破坏了公共住宅计划的实施"。根据查尔斯·艾布拉姆在1969年所说，这种妥协将"最终导致公共住宅计划的失败"[⑤]——这一预言因此越来越接近实现了。

---

① 史蒂文斯：《美国的医学和公共利益》，第7章；施拉巴奇：《埃德文·E·威特：谨慎的改革家》，麦迪逊，1969年，第112—115页。

② 莫舍：《民主制和公共服务》，纽约，1968年，第109页。

③ 弗里德曼：《政府与贫民窟的住宅：希望落空的世纪》，芝加哥，1968年，第105、109页。

④ 布鲁克：《1874—1856年社会工作的趋势》，纽约，1957年，第227、351页。

⑤ 艾布拉姆："住宅政策：1937—1967年"，载弗里登和纳什编：《城市的未来构想》，芝加哥，1969年，第36页。

管辖权

公共管辖权，私人市场和对公共利益的需求

里姆林奇在研究六个国家的社会保险发展时指出："大多数民主国家采用社会保险比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国家慢"。[①] 在民主国家里，实行社会保险的要求表达出来以后没有较早地结出政策之果，其部分原因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和美国都为自由派的上层分子所操纵，与传统主义较强的集权主义制度下的上层人物的思想相比，他们的思想与保护主义计划格格不入，其中包括对社会保险计划的敌视。在普鲁士，不仅官僚，甚至连工业家都赞成采用以家长制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保险。[②]

在普鲁士和奥地利，自专制主义时代以来，政府机构在提供社会服务方面一直起着比较积极的作用。他们的官员在地位上比英国和美国的官员高得多，而且由于他们负责公共事务的官方机构较早地沿着官僚政治路线进行改革，因此在效率和廉洁方面享有较高的声誉。[③] 英、美等国的许多政府职位在十九世纪初主要仍按庇护制的原则来分配，市民对在任官员的正直和效率相应地缺乏信任。[④]

---

① 里姆林奇：《福利政策》，第232页。

② 本迪克斯：《国家的形成与公民权：变化中的社会秩序研究》，纽约，1964年，第81—83页。

③ 安德森："十九世纪欧洲的官僚制度化"，载海登海姆编：《政治腐败：比较分析论文集》，纽约，1970年，第91—105页。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如何解释英国和美国冲破阻力而去采用他们过去讨厌的大陆计划所产生的后果呢？为什么劳合·乔治采用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比西奥多·罗斯福或伍德罗·威尔逊更为成功呢？大多数解释都曾强调意识形态的变化和英国工党的出现，但是，当人们把开始通过社会保险立法的时间同实行文官制改革的时间对照一下，就可以加强比较性的解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英国的诺斯科特—屈威林改革比美国通过彭德尔顿法案(1883 年)进行的联邦制改革早一个世纪。[5]到劳合·乔治提出其具有深远意义的公共福利建议时，英国公众早在六十年前已经消除了由于早先的经历和特罗洛普等作者笔下所产生的那种官员腐朽和官气十足的形象。这些改革使国家和地方的文官能够呈现出高度的效率和公平。在美国，相应的转变发生得较迟，也比较缓慢，甚至在联邦政府一级也是如此。到 1930 年，由联邦政府委任的官员大约有 80%还不是文官，因此弗兰克林·罗斯福认为，至少在美国公众当中对国家官僚机构行政能力的信任程度极低。

在美国开始讨论改革的时期，尤其是在进步党时代，由于对国家官员的公正和效率缺乏信任，那些以意识形态和私人利益为根据反对政府部门扩大的人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种不信任甚至阻碍了改革者提出给予公共管辖权

---

④ 芬纳："庇护制与公共服务：杰斐逊的民主制与公共服务业"，载海登海姆编：《政治腐败》，第 106—128 页。

⑤ 摩西斯：《英国的文官制改革》，纽约，1903 年。他的评价是"在改革开始时，英国和美国文官的情况非常相似"。这种看法也许有些过分。又见利普："按照美国的需要采取英国的政治惯例"，载《公共行政管理》，第 31 卷(1953 年)，第 317－330 页；卡拉德："论英国和北美文官的伦理"，载《公共政策》，第 7 卷(1959 年)，第 134—156 页。

以超出制定规章的权力。在大多数公共服务部门，我们都可找到一些例子：

关于1904年的社会保险计划：研究社会保险这项工作的著名专家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以大多数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低效率和浪费行为为主要理由，再加上是否违宪的问题，论证美国实行社会保险计划是个不明智的举动。他说："德国之所以取得事实上的成功是因为有十分称职的和独立的行政管理机构。用那种曾经控制美国（南北战争）军队的年金的行政机构来实行社会保险，会造成怎么样的结果呢？"①

关于1910年的住宅计划：主张贫民窟住宅改革的主要提倡者劳伦斯·维勒表示，"管理公共住宅需要高标准的行政管理，很难设想可由市政而不是由私人房主来承当"。政治家们一心只想获得任命权，文官的职位不能吸引称职的人。他说：

"我们的城市官员对他们现在所负有的职责履行得怎么样呢？我们的街道打扫干净了吗？我们的警察力量能被明智地管理吗？……公务员在玩弄特权和营私舞弊吗？……看来，我们只能把这么重要的试验长期搁置起来，直到政府的那些职能达到较好

① 布鲁克：《社会工作的趋势》，第259页。

的市政管理为止，现在已经引起了当局的重视。”①

关于1929年以前的福利管理：E·C·林德曼评论说，由于在美国这种国家里对公民权的看法，人们也许会认为“公共福利一词通常所指的社会服务完全被纳入政府机器中……然而，直到最近，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他认为已被集中化的公共福利服务之所以缓慢地发展是因为地方享有高度的自主权以及“社会工作者早就对政府的救济，特别是户外救济，持有怀疑态度。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可从美国政治的腐朽和受过训练的社会工作者缺乏参与和指导政府服务的机会方面看出来”。②

这样一些证明支持了拉考夫和谢弗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现有的活动范围”，极大地影响着“将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转化为政治要求和政治问题”。③美国进步党时代的改革家与同一时期欧洲的改革家不同，他们并不认为现存的政府机构，甚至包括全国政府机构，但主要是指地方政府机构，能够担负起新的行政职责。后来，对政府和地方政府甚至在考绩制的正式规定上也有大不相同的看法，直到社会保障法通过以后才迫使各个州建立考绩制，作为它们管理公共补助金援助计划的条件。这个步骤和后来采取的一些步骤只不过使州和地方

① 维勒：《住宅改革》，第79—83页。

② 林德曼：《公共福利》，第688页。

③ 拉考夫和谢弗："政治，政策与政治科学的理论选择"，载《政治与社会》，第1卷（1970年），第66页。

巴尔福法案将二千五百六十八个这样的董事会取消，把它们的权力转归地方当局，即郡议会和自治市镇议会，它们在早些时间已经合并为较大而更能独立发展的单位。"美国地方独立的政治传统使它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① 1917年，美国进行了类似的尝试，纽约州通过法案要求农村学校的董事会把权力交给地方政府，但因学校董事会断然拒绝服从而不得不废除。②

在美国，尤其是进步党时代以来，在使教育决策机构从政治性较强的地方政府权限中分离出来方面，教育工作者比提供其他服务者取得更大的成功。由于地方政府的结构和名称有很大的地区差异，它们的活动范围可以用教育开支的数据最简明地表示出来。根据这种衡量法，1903年，市和郡地方教育开支占60%，其余40%为学区、城镇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单位所分享。到1942年，学区等的教育开支占教育基金的75%，市和郡只占四分之一。③学校董事会主要是通过非党派选举产生并有自己的收入来源。这种机构上的分离往往给教育工作者和有关利益集团以更大的自主权，与其他没有获得这种特别认可的利益集团相比，他们或许拥有决定性的优势。④

美国是利益集团多元化的温床。教育工作者协会和家长协会都尽量利用这一机会，这无疑造成了二十世纪上半期欧

---

① 洛卡特："地方政府"，载《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9卷，纽约，1968年，第453页。

② 赫尔曼：《纽约州和大都市问题》，费城，1963年，第118页。

③ 法布里坎特：《美国政府活动》，第252页。

④ 索尔兹伯里："大城市中的学校与政治"，载《哈佛教育评论》，第37卷(1967年)，第424页。

洲和美国公共服务分配方式的差距不断扩大。在英国或瑞典，城市议员也许会提出质问，造价昂贵的高中游泳池是否应比建造老年人娱乐中心或为不富裕的中年人建造公园更优先考虑。但在美国，这位议员不仅会因为反对优先考虑以年轻人为中心的文化而头晕目眩，而且还很容易受到指责，说他超越正当权限。

孔斯在回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地方主义对教育的控制而产生的十分不平等后，想到"将有一场旨在迫使教育成为集中的政府功能的革命爆发"。①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各州教育基金所占的比例实际上已从 1890 年的约 32%下降到 1920 年的 17%。后来，通过最低限度基金计划，各州的补助有所增加，但由于各州的立法受到政治压力，重新分配的金额仍然很有限。地方税收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结果，美国同类学校获得资金来源的差异比欧洲大得多，因为欧洲的趋势是朝着集中拨款和管理的方向迅速发展。欧洲的资源和财政分配明显地有利于上层社会的中等学校，在没有设立小学以上学校的农村地区，儿童却没有机会继续升入哪怕是低质量的中等学校。② 但即使欧洲，工人阶级居住区内最不受重视的小学也得对付高标准的视察。坎德尔在 1930 年断言，美国地方政府对公共学校的控制将把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的许多儿童赶进又简陋又不卫生的茅棚中去，让那些工资极低、十分无

① 孔斯等:《私人财富与公共教育》,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0 年,第 45 页。

② 六十年代,黑什有三分之一的小市镇十年内没有培养出一名高中毕业生。见格雷夫:"西德的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及格率与学校改革",载《比较教育评论》,第 11 卷(1967 年),第 81 页。

知、未经过训练和毫无积极性的老师去教育他们”。[①]

在美国地方学校董事会制度下产生的学校经费和教师薪水的极端差异是欧洲那种由地方管理的福利服务体系中所难以想象的——甚至服务部门在行政管理上与地方政府分开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德国地方疾病基金会与美国学校董事会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必须为所在区域加入董事会的成员提供医疗服务，就像后者必须提供学校设施一样，但是很难想象富裕地区的基金会付给医生的工资竟会是贫困地区医生工资的两倍乃至五倍。德国疾病基金会同地区的医生协会达成集体协议，决定应缴款和支付款的形式。但是，同美国学校董事会相比，它们的决定在更大的程度上要遵守州和联邦疾病基金联合会、联邦立法机构和劳工部订立的标准。有关的所有人员，包括医生、基金会职员、工会和雇主都知道基金会必须严格服从联邦立法机构规定的基本准则以及行政机构对它的解释。[②]

相比之下，美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有三千多个独立学区没有拨给学校一分钱，它们的存在主要是“避免或尽可能地减少学校纳税”。一个业余研究团体在 1966 年得出结论说：“教育给那些希望建立合理的、明显的和称职的地方自治管辖权的人带来了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这个结论还说，“在公立学校方面，美国最关心的往往是转移人们对地方政府其他重要职能的注意力”，分离主义“常常导致支持公立学校的人同那些主张加强政府其他职能的人之间进行激烈的、有时

① 坎德尔：《美国教育二十五年》，第 214 页。

② 萨大兰：《行使否决权的群体政治：西德医疗保险改革的个案研究》，旧金山，1967 年，第 128、145 页。

是惨痛的竞争”。作者更普遍地强调，各种特殊的政府管辖区大量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权限交叉”，它一针见血地强调，美国致力于机械化和新建设的活力和想象力与他们在革新地方政府机构上的迟疑不决，形成鲜明的对照。①

联邦制的复杂性

美国联邦制的普遍性缺点之一出现在高层和中层的政府当局不愿意和(或)没有能力对由联邦和各州税收单独或共同提供资金的社会服务成绩实行充分的监督。在英国教育中，地方教育当局和全国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与美国学区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相似，英国国家督察员要检查行政管理和教学质量，并被人们认为能提高教学质量和统一教学水平。与此相反，美国各州的教育官员则把实施各项规定视为“同他们的公众教育观不相容”。他们说，“联邦政府官员表示不愿干预各州的特权，他们同样也不愿干预地方的特权”。② 在德国，州政府常常自愿遵循联邦政府的指导方针，以促进统一性。而在美国，各州政府甚至在法律上要求它们照办时也不遵循联邦的指导方针；因此，联邦政府官员在检查各州按照中小学教育法案使用联邦教育基金的三十八个项目时，至少有二十五个项目受到管理不善的批评。③

与西德等国的联邦制相比，美国税收在地区间的重新分

① 经济发展委员会：《地方政府的现代化》，纽约，1966年，第32—33、37—38页。

② 墨菲：“中小学教育法案第一项：实施联邦教育改革的政策”，载《哈佛教育评论》，第41卷(1971年)，第53页。

③ 全国残废儿童教育顾问委员会：《中小学教育法案第一项：1971年年度报告》，华盛顿特区，1971年，第6页。

社会服务的扩大

政府结构与专业人员的控制

与英国和瑞典相比，美国和德国都表现出一种更有选择性和更稳妥的扩大公共社会利益的倾向。因此，在英国和瑞典这两个一元化的国度里，在实行老年养老金制度后，过几十年又推行了维持收入的计划和家庭补助计划。但在美国和德国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1] 在这两个联邦制国家里，医生和教师这样一些职业人员在社会服务领域中似乎有更大的影响。1948 年，英国颁布了全国卫生服务法，1950—1964 年，瑞典对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革，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在 1945 年以后都没有制定法律在这两个范围或领域内进行调整性的改革。美国和德国的服务部门在这些领域中给予的公共社会利益低于其他国家的服务部门，在 1945 年后的几十年里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德国中等教育能力停滞不变，[2] 而美国公共卫生福利至少在 1964 年以前还有所下降。

尤其是从进步党时代以来，美国为了防止州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出现渎职或腐败的现象，一种流行的做法是，引入专

---

① 开始实行老年救济金和家庭补助的时间在瑞典分别是 1913 年和 1947 年；英国分别为 1908 年和 1945 年；德国分别为 1889 年和 1954 年。美国从 1935 年开始实行老年救济金制度。

②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资料，德国和奥地利是 1955 年至 1965 年间中学入学率增长低于 50%的仅有的两个国家。1955 年至 1965 年各国中学入学率的增长数据为：德国 1%，法国 107%，瑞典 34%，英国 48%。见《中学教育发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巴黎，1969 年，第 26—30 页。

家裁决制，由一些组织起来的专业团体根据法律和现状相结合，对涉及一些部门的重大政策实行控制。当英国通过法律建立职业登记制度时，各专业协会起到了维持这种制度的作用，但政府仍保持“最高权威”。政府有权任命各种专业理事会的理事，从而增加了这种权威。韦伯夫妇强调指出：“议会不愿给任何专业以全部自治权”。[①] 相比之下，美国各州的法律常常把制定授与资格证明和其他政策“当作内行专家的特权，使他们无须担心外行的反对”，[②] 从而“取消了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区别”。因此，亚拉巴马州立法机构直截了当地规定“亚拉巴马州的医学协会就是本州的卫生署”；而康涅狄格州的医学审查署则由医学协会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组成。1952年，有四分之三的州医生开业执照署全由医生组成，在其余四分之一的执照署中，医生也占多数。相反，大多数州的教育资格审查机构中却根本没有教师成员，只有一个州的这种机构完全由教师组成。[③]

职业的相对声誉一直是决定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优先为之提供服务的重要因素。这在美国和德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它同政府部门一致的密切程度联系起来。因此，在美国，有些职业部门的成员主要受雇于政府部门，例如教师。他们享有的声誉大大低于自行开业或由私人雇用的人。德国的情况有些相反：文官的地位较高，教授的声誉最高；大学预科的教师拥有“异常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可能相当于律师的地位，而

① 韦伯夫妇：“关于专业协会的特别补充说明”，载《新政治家》，第9卷（1917年），第47页。

② 卡里尔：《美国多元制的衰落》，斯坦福，1961年，第104页。

③ 利伯曼：《作为一种职业的教育》，英格尔伍德，1958年，第93—94页

医生的地位实堪忧虑。[1] 美国的医生甚至在连他们自己的大多数人也"看不起公共医疗职位"时，仍拥有最高的声誉。由于医生处在"成就与报酬体系的顶峰"，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们仍对"政治领域持傲慢和敌视态度，而政治领域在丑闻四起的时代却是受时髦人物欢迎的"。[2]美国医生在建立统一的专业标准时不大需要公共立法的指导(不是支援)。而美国的教师却发现各个州很不相同的规定和各种层次的资助模式为他们建立全国性的标准和资格证明制度并提高他们的声誉设置了巨大的障碍。[3]

在这两个国家里，由于宪法的规定，国家不能对这些服务领域行使管辖权，这与职业协会中出现安于现状的领导人的情况是符合的。在 1920 年后的美国医学界里，毕业于世界各大学的医生"自愿放弃"竞争美国医学会的领导职位，结果是全国、各州和地方各级医学协会的控制权"落到了少数只关心医学业务的盲目抵制改革的庸人手中"。[4] 1945 年以后，德国职业协会的领导人竭力反对结构变革。[5] 美国和德国医学协会的领导人都能维持高度的职业凝聚力，会员覆盖范围达到 70%以上。特别是在 1920—1950 年这一时期里，按照美国的

---

① 富里格："西德"，载布卢姆编：《教师工会与协会》，厄巴纳，1969 年，第 113 页；纳朔尔德：《人寿保险》，第 120 页。

② 格拉泽："医生与政治"，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 66 期(1960 年)，第 237 页。因此，一位著名医学杂志的编辑在 1951 年写道："今天医生面临的困境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政治是'肮脏的勾当'，而医学总是清白的职业。治愈人与损害人是不能合二为一的。"

③ 马萨诸塞州在 1854 年颁布强制性入学的法律，但密西西比州到 1920 年才通过这种法律。

④ 弗雷曼："一名医生为美国医学协会开的药方"，载《哈泼斯》(月刊)第 231 期(1965 年)，第 78 页。

⑤ 富里格："西德"，载布卢姆编：《教师工会与协会》，第 106 页。

标准，美国医学协会的会员覆盖度非常高，而按照英国的标准，英国医学协会的覆盖度是低的。[①] 美国医学界并不过分强调一般医生与专家的差别，[②] 但这种差别在欧洲医学界却根深蒂固，而且是英国医学协会"在危机时无法控制其会员"的根本原因。[③]

美国医学协会在对普通成员进行彻底教育的同时又有能力实现自己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它的主流派同国家有效地结合在一起"。[④]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对一个州的职业执照署所作分析表明，州长或其他负责任命的官员必须从职业协会提交的名单中选择全部被提名者的六分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法律要求他"适当考虑"职业协会的意见。詹姆士·W·费斯勒得出这样的结论："职业执照署实际上是职业协会的产物"，并认为它"基本上"丧失了自己传统的独立性。[⑤] 由于缺乏这种改革，美国医学协会的一位主席曾把卫生署说成是"把政府的力量加到医学方面去"。洛韦简明地归纳了这个过程："权力往往转让给'支持者的群体'，带来了特殊的后果。它把决策的权力交给利害关系最大的党派，从而消除了政治责任。"[⑥] 美

---

① 埃克斯坦：《压力集团政治》，斯坦福，1960年，第29页。

② 1929年至1959年间，美国专家医生和一般医生收入的差距缩小。前者的收入增加了大约两倍半，后者的收入增加了五倍。美国专科医学院的管理"基本上没有受到英国模式那么强烈的社会和规章制度的冲击"。一般医生与专家医生之间的关系以"没有明显的分工"为特征。见史蒂文斯：《美国的医学》，第95、185页。在美国，约有75%的医生从事专科医疗，但分工较细的英国医学界只有22%的医生从事专科医疗，德国则为43%。见希克：《医生与社会保险制度中的保健》，弗赖堡，1971年，第88、164页。

③ 埃克斯坦：《压力集团政治》，第68、107页；吉尔伯特：《美国保险制度的演变》，伦敦，1966年，第413页起。

④ 卡里尔：《美国多元制的衰落》，第110—111页。

⑤ 费斯勒：《州管理机构的独立性》，芝加哥，1942年，第49、60、70页。

⑥ 洛韦：《自由主义的终结》，纽约，1969年，第86页。

国新政时期社会福利计划的起草者爱德文·E·威特在美国医学协会不愿从反对医疗保险的立场上让步时所说的话，就是这种态度的例证。他说："只要医学界反对，我们就不会有医疗保险……我愿意让医学界自己去决定"。[①] 麦康奈尔指出其含意："将政治系统中的许多部分建筑在一批民间协会和其他小政治单位周围是根据美国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念选择的，并强调狭隘的、物质的价值观念的特殊效应。这种价值观限制了自由、平等和其他许多公共价值观念，其代价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还要大。"[②]

在欧洲教育中，没有大学文凭的小学教师与获得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之间的地位差别，仍然比美国或欧洲的普通医生与专家医生之间的差别大得多。德国的语言学协会把大多数中等专科学校的教师联合起来，以防止地位上的差异，这个历史悠久但有些奇怪的名称也说明它要维护人道主义的教育理想。一些进步的中学教师和大多数小学教师一道加入附属于德国工会联合会的教育和科学工会，但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教育和科学工会好几次"在薪水和地位问题十分突出的时候撤回了它对革新措施的支持"。[③] 大多数大学预科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往往会拒绝接受他们认为有可能降低大学预科的高知识标准"。有人甚至指控他们必要时会使用提高不及格率的手段来阻止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及格

① 怀特：《社会保险透视》，麦迪逊，1962年，第317页。

② 麦康奈尔：《民间协会的公共价值观念》，载彭诺克和查普曼编：《自愿者协会》，纽约，1969年，第160页。

③ 鲁宾逊和库尔曼："西德教育不进行改革的二十年"，载《比较教育评论》，第11卷(1967年)，第326页。

率的提高。[1]

职业与公共服务的扩展

尽管民间团体或公立的其他团体里有一个团体最为活跃，但美国的医生和德国的大学预科教师在最近几十年内都有助于使少数接受国家资助的服务者所占比例保持在可能接受者中的10%至20%。特别是在1965年美国实行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以前，获得美国公共卫生福利的人主要是贫穷者，这就使"环境卫生以外的公共卫生活动由收入很低的人所享受"。[2] 与此相反，在德国能够进入大学预科的少数有才华的少年主要来自上层社会。服务范围未能得到扩展的部分原因是没有将要求与参与投入的人正确结合起来。研究者把德国人同美国人进行比较，指出美国人选择的是"通过增加在校学习时间来改变生活方式"，[3] 而选择这种做法的德国人比例较低。美国要求提高公共卫生作用的人主要是较少参与政治的下层社会的成员。[4]

英国和瑞典的情况是，政治领导人能够令人信服地根据广阔的社会目标使公共服务得到合理的扩展，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全国性政党和群众组织把全国的立法权限和地方的行政权限有效地联系起来。美国的情况是，婴儿死亡率高于西方大多数国家，[5]美国的政治家们可能考虑过呼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

---

① 格拉夫：《西德的高级中学毕业考试及格率》，第81页。

② 安德森：《美国、瑞典和英国的健康保护能否公平》，纽约，1972年，第114页。

③ 卡托那、斯特伦普尔和赞恩：《愿望与富足》，纽约，1971年，第162页。

④ 维伯和尼埃：《美国的参与》，纽约，1972年，第280—284页。

考虑到改变这种模式需要实行有效的计划，要通过解决州和地方管辖权的纠葛，要同自愿的计划机构和私人医院发生关系，凡此种种考虑都使这种计划依然“悬而不决”。[⑥]尽管德国的教育制度比美国的卫生制度较为大众化，也较为一体化，但德国的政党和群众组织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不能将普及中等教育作为一个十分明显的社会目标。各种工会，包括代表小学教师的工会，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和地区之间的妒忌而发生分裂。在1950—1965年之间，甚至连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各州学校立法团提出的目标基本上“是从组织上巩固传统的学校制度”。[⑦]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从未试图像对立的压力集团那样组织公众力量对教育问题施加压力。

在这两种背景下，职业利益集团阻碍了政治领导人试图有效地把扩大服务同可能触发较高层次要求的广泛社会目标联系起来。在美国这种多元的制度下，地方政治管辖区通过资源或减免税收的手段竞相吸引富有经济实力的和声名卓著的稀有专业人才。专业工作者甚至比组织完善的熟练工人团体更容易把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西德的制度便不是如此，地方政府和疾病基金会等低级机构缺乏财政自主权。美国医学协会有意识推行的政策造成医生数量的不足而提高医生的价值，[⑧]他们的经济实力特别是在美国这种情况下更成为“压

---

⑤ 1960年的婴儿死亡率：美国2.6%，英国2.18%，瑞典1.66%。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在整个六十年代下降幅度不大。见安德森：《健康保护》，第148、243页。

⑥ 安德森在叙述国会所提出的试图影响疾病发生率的另一个补助计划时指出：“在英国和瑞典的观察家看来，……这肯定是难以实现的，除了授与联邦制和私人所有制提供保健服务的手段外，别无选择。”见《健康保护》，第177页。

⑦ 尼克斯多夫：《各州的政治对西德教育改革速度的影响》，佛罗里达大学，未出版博士论文，1970年，第135页。

为单位那样，强调它们所起的作用是提供卫生服务的工具。[1]在英国，国家卫生体制的设计者　　使安德森惊讶的一个部分，认为这不符合英国通常的工作方法——绕过地方政府，结果使地方行政人员声称，国家卫生体制法案构成一种“一百五十年来最大限度地剥夺地方政府职能的手段”。[2]

德国和美国的政府管辖区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由于扩大教育与卫生的计划而要委托给它们的职责。德国只有少数的几个州开始把地方政府合并起来，但甚至连这些州也没有把可能实行中小学一贯制的地区当作接纳学生能力的标准。[3] 在美国，管理和控制国家医疗制度和医疗计划的任务不可能交给县和市，也不可能交给并不存在的像德国疾病基金会那样的机构，而是基本上交托给蓝十字会这样一些中介组织。这些组织接受医学界而不是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和指导。难怪五年以后联邦政府用于这两项计划的开支急剧上升，而华盛顿的负责官员还在自言自语：“如果联邦政府把大部分事抓在手中，该死的，你还能对它施加什么影响呢？”[4]

职业协会与防守同盟

1911 年和 1947—1948 年，英国围绕着实行卫生计划展

---

① 汉考克：《瑞典后工业变革的政治》，辛斯达尔，伊利诺斯，1972 年，第 4 章。

② 马歇尔：《社会政策》，伦敦，1970 年，第 116 页；安德逊：《健康保护》，第 93 页。

③ 洛曼：“联邦德国中小学一贯制的演变过程”，载《国际教育评论》，第 17 卷（1971 年），第 55 页。

④ 伊格尔哈特：“卫生报告”，载《国民新闻报》（1971 年 7 月 10 日），第 1444—1445、1449 页。

国，中学教师的任职只要依据大学文凭，只要大学入学人数有限，从而为拥有学位的人维持一个卖方市场，他们就能保持自己的经济实力。[①] 这种地位使他们在1970年瑞典劳工市场形势逆转之前维持高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国家中相等的人。但是，在这两个国家的任何一国中，这都不是他们能够成功地抵制学校结构改革的决定因素。相反，美国医学协会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是由于成员的收入水平和他们掌握的储备力量，[②] 而且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在经济利益相似的基础上建立联盟。美国医学协会成员所控制的储备力量是他们的欧洲同行们望尘莫及的，因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只有在美国"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并以美国经济所特有的那种企业家态度把医院和医生的保险计划置于他们自己的监督和控制之下"。[③] 由此产生的医生—医院—保险公司组成的联盟，控制了储备力量，使它能够与商业协会有同等地位，对诺言相互支持。

相比之下，一些联盟在德国，为了阻止削弱贵族式的中学体制，起到了团结的作用，但基本上是建立在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士之中。这些人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在公共部门。德国语言学会组成的联盟是"高级中学、大学和教会"的文化传统形成或与它认同的阶层。库尔曼认为，这种传统在维持1945年

---

① 加林斯：《国立学校及其公会》，诺伊维德，1967年；海特："从瑞典的经历看教师、谈判与罢工"，载《加州洛杉矶大学法学评论》，第15卷（1968年），第842－876页。

② 在1956年的一项调查中，医学院的学生中只有4%说他们对公共卫生服务或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工作"很感兴趣"，60%的学生说"根本不感兴趣"。见格拉泽：《医生与政治》，第239页。1963年，从公立医疗保险部门和私立医疗保险部门中领取工资的医生所占的比例：美国约38%，西德约63－80%，英国90%。见希克：《医生》，第166页。

③ 安德森：《健康保护》，第66页。

以后西德上层社会的认同方面起着相互强化的作用。① 德国进行的职业教育改革为中等专科教育广开大门，但许多教师施加压力，试图阻止这项改革。各州的立法者对教师深表同情。他们深深感到教师们的意见十分有理，因为在遭受纳粹的蹂躏以后高级中学是复兴德国文化的重要工具，需要用高级中学去集中储备力量以教育德国的新一代精英，决不能削减它们的储备力量。他们的这种印象较瑞典国中同等的人更深。在瑞典，教育改革支持者却在同时赢得了胜利。他们认为需要让天赋较高的人冒成绩较低的险，因为“评价上的差异以及是否有可能作出评价”与“产生社会和文化统一”相比，毕竟是次要的。②

美国的教育政策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制订，而宗教则不受州政府管辖。德国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化政策构成了各州权力的核心，主要是因为中产阶级追随者对此发生兴趣。德国的高级中学、大学和教会几乎完全依赖国家的经费，却不为工人阶级提供服务，只有信仰天主教的工人阶级例外。甚至连大多数家长联谊会都是由中产阶级的家长构成，而且在州一级才有严格的组织，而不是在地方上有这样的组织。如果这些机构像美国的学校那样主要服从地方一级作出的决定，或者像英国的卫生服务那样服从国家一级作出的决定，他们可能更难采用关门的做法以维持阶级的偏见。但是，只要下层阶级的需要没有强烈地表达出来，很可能他们在州一级得不到同情，因为盘根错节的行政官僚机构在这个或那个承诺维护教

---

① 库尔曼：“教育改革与联邦德国的社会：1946—1966 年”，载韩滨逊编：《教育改革与社会进步》，斯图加特，1970 年，第 170 页。

② 胡申：《瑞典义务教育的分化问题》，斯德哥尔摩，1962 年，第 54 页。

育现状的机构中拥有"校友"或兼职的成员。库尔曼认为，由于对制约改革的模式缺乏一致的看法，官僚们能够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挑拨离间——让工会反对天主教，家长反对教师，中学教师反对社会民主党——借以相互抵消他们的影响。[①] 因此，中学教师成功地捍卫了他们"传统上高于小学教师的一切有利条件"。[②]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等一些"进步的"州在这些问题完全交织起来之前，1917 年有可能实施公共医疗保险，德国的黑森等一些"进步的"州也有可能在 1948 年实行中小学一贯制。但是，一旦全国公众动员起来了，大的社会目标能否超过某个相当团结的职业部门提出的教育目标或健康保护目标，这个问题只能通过全国性的立法来解决。

关于政策政治学的解释

有些学者经过抽样考察了各类政治单位之间在公共政策上的相互关系，他们在最近一些著作中似乎提出了好几种包罗万象的研究假设。有一个著名的研究小组曾得出结论说："政治"变量因素往往难以解释分配模式中的变量因素，而生态和社会经济的变量因素却重要得多。这种研究结果的产生，特别是依据美国各州开支模式的剖面研究。另一种解释以安东尼·金为代表，认为政治因素是重要的，但以信念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一种因素可能比其他因素更强有力。[③] 他的分析同我的一样，也是依据北美和西欧之间公共政策模式的对比。

---

① 库尔曼：《教育改革》，第 185 页。

② 富里格："西德"，第 106 页。

③ 金："观念、机构与政府政策的比较分析"，第 3 部分，载《英国政治学杂志》(即将出版)。

我的讨论也集中在宏观分析上，但仅局限于公共活动的一个广泛部门，即社会政策部门。我力求罗列出证据和论证来说明有几个类型的政治变量因素可能对不同的分配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还特别想通过阐释性地使用政策发展的事例来探索政治机构和利益集团的结构是否对长期的政策模式产生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既然有人已经提出反面假设，我就尽可能有力地并且有根有据地说明我自己提出的正面假设。

随后的讨论必将评估美国的政治机构在地方、州和国家等各个层次上，与欧洲政治机构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计划在时间顺序上和优先分配模式中的明显差异有因果关系。如果我提出的正面假设得到承认，那么，我的推断近乎合理是较为明显的，即利益集团在权力上的差异在美国有时大得足以迟不提供公共福利，医疗政策就是一例。也许有人会说，这里很少提及政党和国家政治机构。这是因为我所关注的是探索政党和国家政治机构赖以存在的下层基础。我希望对政党作为社会政策改革的媒介所起的作用进行更充分的探索。

16. 发达国家妇女地位的变化

朱迪思·布莱克

〔编者按〕 朱迪思·布莱克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曾与人合著《牙买加的家庭结构》(1962 年)和《1960 年西欧的人口普查》(1971 年)。

在后面一篇文章中，英克尔斯在讨论个人的现代性时指出在现代化过程中男人对待女人态度的变化。布莱克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一主题进一步作了详细的论述。她描述高级现代化阶段中阻碍妇女地位平等的各种法律和习惯的削弱过程，并指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突出之前，这一过程就一直在进行中。到七十年代，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有40%至 50%的成年妇女加入了赚取工资的非农业劳动大军。随着这一变化而来的是人身独立性的明显增强，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妇女参加工作仍然次于家务劳动。此外，布莱克还考察了先进社会在雇用妇女的职业部门以及对待妇女就业问题的态度方面

存在着巨大变化。

妇女的地位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人口学家的广泛兴趣。传统上，经济学、一般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调查研究人员集中注意力于男人的地位问题上：男人在社会中如何处于不同的等级地位，他们在一生中能获得的经济机会，他们能得到的尊重，以及他们能够行使的权力。关于阶级、地位和权力的著作罕有提及妇女的。这种对妇女社会地位疏忽的原因颇有启发性：妇女的地位是衍生的。从妇女在西方社会所处的地位来看，妇女只有希望在一生中都根据亲缘关系附属于男人：先附属于父亲，然后附属于丈夫。

奇怪的是，正是因为妇女的地位是衍生的，才能进一步解释人口学家对此的特别兴趣。妇女所处地位的性质以及她们与男人地位的不同，对人口学家关心的重要变量因素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再生产行为和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例如，人口学家曾经发现，由于妇女终生都与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她们一般都很主动地遵从社会对再生产的期望，诸如生儿育女的压力，直至成活儿子达到合乎愿望的数目为止。在工业社会中，妇女是否参加次要形式的经济生产，也就是说，除了男性劳力外，妇女是否构成社会可以依赖的"妇女劳动力"，这与妇女在家庭中的主要地位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最近几年一直缺乏劳力的国家里，如法国和瑞典等国，人们对妇女的地位中阻碍她们更广泛地加入劳动大军的那些方面，感到强烈的兴趣。

某些人口学变量因素的变化也对妇女的地位产生后果。这些变化也不能不引起人口学家的兴趣，他们像关心社会和

经济结构对人口行为的影响那样关心着人口趋势对社会的影响。随着工业革命而发生的移民变化以及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变化，似乎严重破坏了男人和妇女地位的对称。因此，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如果我们继续把某一种地位（如衍生的地位）当作**所有**妇女的主要地位，那么，不仅在合法性方面，而且在现实性方面都会产生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妇女运动一再兴起，每一次都愈来愈集中于妇女的衍生地位这个中心问题上。正如拉特杰尔斯大学的威廉·L·奥尼尔所曾强调的，“经验表明，若与把妇女束缚在家里的家庭、制度和社会习惯相比，妇女解放的表面障碍——如没有选举权、在教育和职业方面受到歧视等——还不算严重，而且比较易于改变。”这些运动提出要求，认为应该提供机会让所有妇女取得非衍生的独立地位，无须比男人做更多的家务来牺牲其家庭生活。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不管妇女在从属的层次上做的是什么，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主要地位远远没有改变。

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期望的背景下，今天高度发达国家妇女的地位又如何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妇女的地位在向独立的、非衍生的方向发展中是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妇女在许多活动中的变化是否只是浮在实质内容之上的表面变动？

我将提到的高度发达的国家是指西欧那些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如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英格兰和威尔士、芬兰、法国、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西德。除此以外，我还将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这样一些新大陆的国家包括在内。将日本和发达的共产党国家包括进来当然会增添对比的色

彩，但由于文化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又缺乏可比的统计资料，这样一种任务将会受到阻碍。由于1970年以后的各国人口调查的详细数字表还没有公布，甚至对上面提到的几个国家的分析也不是全面的。

在工业化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今天在妇女的地位上产生那么重要的紧张关系，就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妇女运动开始表示出来的那样紧张呢？简单地归纳起来可作如下的回答：妇女和儿童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丈夫和父亲的户外职业收入的同时，男人们的经济活动却日益脱离以家庭作为一个单位而有所贡献。这种家庭成员经济关系上的重大变化与工业化时期的人口从农村地区迁向现代化社会的城市工厂和官僚机构是有关系的。这种迁移使劳动逐渐脱离家庭环境，使男人们离家外出工作——这些工作不再需要妻子或家庭其他成员参加，成绩的评判标准着重于男人的个人成就。与此相反，随着男子的工作不再以家庭为单位，家务和家庭的压力却使妇女难以跟随男人到外面去寻找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的孩子也不易与成年人工作环境中高度理性和非人格的人际关系相融洽。因此，在农村的家庭农场和家庭企业的环境中，丈夫、妻子及其子女在经济上有相互依赖性，后来妻子和孩子逐渐成为男人的经济负担。尽管在男人贫穷、有病或去世的家庭中，家属也到工厂和矿山工作或当家庭女仆，但这类职业都是同一切贫困堕落联系在一起的。除非万般无奈，已婚妇女极少离开家庭，长时间地从事工业化过程中特有的耗尽体力的劳动。因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社会改革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使妻子仍能继续留在家里照料家务，使年纪较大的孩子能够上学。妇女的工作范围逐步地缩小

到只从事家务工作，男人（至少在观念上）成为经济生活的唯一参与者。妇女的地位不再单纯是衍生的；长此以往，她们的地位逐渐变得不对称，并且逐渐下降。

毫不足奇，到维多利亚时期的全盛时期，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逐渐演变出一种似乎是必不可少的道德观。它们力图使与工业革命和人口转变俱来的妇女地位的扭曲变成合理化和合法化。特别是它们力图以声称妇女的个性与行为实际上天生要受新的生活方式的制约，来证明它们的正确性。妇女们丧失了作为共同承担养家糊口职责的坚强伙伴和实际帮手的地位。她们成为浪漫的、受到约束的和令人向往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她们内心的脆弱需要悉心照料（并受到约束）。

然而，研究“妇女的地位”的历史学家，如威廉·奥奈尔、罗伯特·斯马茨和威廉·H·查菲等人清楚地说明，当妇女一开始被束缚在家庭里的时候，就奋起反抗。一些妇女不仅反对她们被排除在成年人生活的潮流之外，并使她们的衍生地位完全降为依附地位，而且还反对由此而造成的许多妇女因找不到丈夫或失去丈夫而受到的不平等对待。只要那些不能结婚或者是寡妇或遭遗弃的妇女被吸收到亲缘结构中来，并依附于父亲、兄弟、叔伯或其他男性亲戚，那么，妇女们就不可能不从男人那里获得自己的衍生地位。由于家庭企业不复存在，这样一些妇女或许除了充当家庭女仆（只有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才勉强可以容忍）外，她们在亲缘群体中不能发挥任何经济方面的作用。而且由于家庭为了适应经济机会而到处迁徙，家庭纽带变得松弛，社区的舆论也不再具有强制实行亲缘义务的功能。因此，无依无靠的妇女，无论是独身的、遭遗弃的，还是寡居的，都得在家庭以外寻找工作机会。从事这样的

工作是万不得已的，反过来却被看作是反常的现象。而“正常”的情况倒是妇女有一个男人来扶养她。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许多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相当长时间，独身妇女所占的比例很大。例如，在十九世纪中晚期，正当妇女们十分需要寻找配偶的时候，妇女结婚的年龄与待婚妇女的比例都在上升。根据约翰·哈吉纳尔的计算，在1900年前后，比利时、英国、丹麦、芬兰、荷兰、挪威、瑞典和瑞士仍未结婚的25至29岁的妇女占40%至50%，45岁至49岁的占13%至19%。显然，由于妇女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的孩子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小，男人们在接受这种“随时都可能失去的人”之前，不得不更加谨慎小心。

况且，甚至在那些确已结婚的刚毅男人中，也有许多人在他们的孩子还未长大成人时，就过早地去世，由他们的遗孀来抚养家庭，这种丈夫过早去世的可能性在现代背景下仍然很大。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彼得·R·乌伦伯格对美国的研究表明，在一十个出生于1890年至1894年之间并活到50岁的白人妇女中，有100人从未结过婚，225人没有生过孩子，165人虽有生育，但后来婚姻破裂（由于丈夫死亡或有意识的分离），只有510人（一半多一点）经历了妇女的“正常”模式，即她们的婚姻到中年还没有解体，并且生有儿女。最近几年，在工业社会中，尽管丈夫和妻子都能生存的可能性已有增加，老处女和无生育的人比例下降，但婚姻关系本身造成的人为的不稳定状态代替了由死亡造成的婚姻的不稳定状态。因此，在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妇女都是以妻子和母亲为终生身份的说法一直是不符合事实的。

即使在那些力图得到和留住丈夫的妇女当中，有人期望

很难断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妇女的就业倾向发生了一次革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有国家妇女总就业率反映出妇女的行为中有两个重要的对立倾向。第一个倾向是，在1950—1970年之间，除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外，所有国家妇女的结婚年龄都越来越小。每个国家结婚妇女的比例也比较高。1970年，在25岁至34岁内结婚的妇女比1950年多。由于在任何时候已婚妇女就业的比例都比未婚妇女的小，因此，在此二十年期间，这些妇女的婚姻行为导致了就业率的降低。然而，与此同时还有第二个倾向，即更多的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确实，如果这些年中已婚妇女决定就业的比例没有1950年高，那么所有国家的总就业率就会降低，在某些国家可能要比实际情况低得多。1950—1970年，几乎所有国家的妇女就业率都确实有所上升，这是因为已婚妇女就业倾向的增强足以抵消有更多的妇女结婚的倾向。

因此，人们可以看到，在1950年至1970年的二十年间，高度发达国家妇女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多的年轻女子结了婚(事实上，不结婚的很少)，但是增加就业活动至少扩大了一部分已婚妇女衍生地位的特征。在我们的分析中所包括的大多数国家中，不再是只有少数已婚妇女积极参与现代经济部门的活动。然而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已婚妇女的就业比例，妇女参加与年龄有关的劳动的模式、妇女从事的职业类型、妇女的相对收入以及以工作为首要的态度等，人们都会发现妇女参与经济活动一般只是她们在家庭内的主要地位的补充。这一点仍然是千真万确的。确实，已婚妇女扩大工作的行为使她们的衍生地位重新趋于平衡，这种平衡在工业化过程中曾

之一的女性劳动力每周工作不到35小时，英国几乎是六分之一，美国在1973年为四分之一。

妇女还明显地集中于教会、销售业、服务业这样一些类型的职业，她们被排除在那些有高度熟练的蓝领工人和经理人员的产业部门和服务部门之外。这种不对称的职业分布进一步证明大多数妇女尚未获得非衍生的地位。

有较大比例的妇女在专业部门和技术部门工作，会令人误解。在这类职业部门中，妇女集中在低层次的职业上，大多数职业妇女是教师、护士、图书馆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例如，在1970年，新西兰的女教师和女护士占职业妇女的80%，美国为63%(同1960年的71%相比，有明显的下降)。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瓦莱丽·金卡德·奥本海默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对女工需求量大大增加，是性别型工作(即规定某几类工作为“女性”的职业)的结果，也是因为这些特殊类别的工作都设置在经济中正在扩大的服务部门的结果。奥本海默对美国女工需求增长的原因所作的分析也适用于这里考虑的所有国家，其中加拿大、比利时、英国、威尔士、荷兰和瑞典已拥有充分发达的服务性经济(这些国家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是在服务部门)。

尽管在这些国家中，妇女的职业大致相似，但是对于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来说，指出声誉最高的职业层次中存在的差别是很重要的。康奈尔大学的马乔里·盖伦森曾经证明，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女医生所占的比例在各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在六十年代中期，丹麦、芬兰、瑞典、西德和英国的女医生比例从16%到23%不等，而美国只有7%。1960年，各国女牙科医生比例的差异甚至更为惊人：美国女牙科医生占1%，

挪威占五分之一，丹麦和瑞典占四分之一，芬兰则超过四分之三。然而，除了卫生医疗行业外，在这里所考虑的几个国家中，妇女在高级职业中的数字都不大。

不过，1960 年至 1970 年间，美国仍然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据我计算，美国女医生的数字增加 62%，她们在这类职业中的比例从 7%增加到 9%。女律师增加 149%，在这类职业中的比例从 2.4%增加到 4.7%。在工程技术、建筑业和大学教师中的数字增加 159%至 200%，在生命科学家和物理学家中增加了 106%。在这些领域中，妇女就业率的增长也比男人的就业率大得多，现在，妇女在每一类职业中都占有较大的比例。然而，在其中的一些高级职业里，大家知道妇女主要集中在下层。例如，尽管在高等院校教师中，女性占 28%，但她们绝大多数处于学术阶梯的低层次上。

从高度发达国家妇女的职业地位一般都比较低的观点来看，人们可以估计到，长年完全就业的妇女所挣的钱也不如男人多。研究表明，这种差异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妇女集中在低薪职业而工作又不是她们生活中的主要任务，并非是因为工资方面的歧视；男人通常受雇的连续性较长，工作时间较长，受到的职业训练也较多。即使如此，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里，计时工资的性别差额仍高达 40%(比白人和黑人工资的差异还要大)，一般劳动妇女显然还远没有获得独立的基本地位。

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能否有更多的妇女就业而改变她们的基本地位?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考虑各种影响妇女就业的因素，既要考虑就业妇女的供应，又要考虑经济部门对妇女的需求。关于就业妇女的供应，更多妇女可能感到

有就业自由，更多妇女可能需要就业，也有更多妇女可能为工作所吸引。然而，阻碍妇女就业的力量也在起作用。让我们更详细地考察这种情况。

更多妇女也许会感到有就业自由，因为她们的家庭规模仍然比较小。对这里考虑的大多数国家进行的调查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妇女希望家庭规模比目前更大些；事实上，如果真有证据的话，也只能表明妇女希望家庭规模甚至比目前还要小。其次，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大军时不再遭到强烈的反对。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盖洛普组织曾经这样提问："如果丈夫能够养活妻子，你是否赞同妇女到商业和工业部门去挣钱?"1945 年的调查发现，只有 18%的人赞成。几乎三分之二的人都强烈反对，16%的人提出附加条件，例如，如果没有孩子的话，他们赞成。在过去六年里，我在多次盖洛普调查中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结果是十分惊人的。到 1973 年 10 月，已有 65%的人赞同已婚妇女参加工作，而且，在 30 岁以下的回答者当中，83%支持妇女就业。

由于经济中的通货膨胀趋势、高离婚率以及她们的孩子比前一代人更迟离开学校以自谋生计，更多的妇女可能需要工作。由于笼罩在高度发达国家中的经济通货膨胀率迅速提高，家庭受到很大的压力，要通过增加家庭收入来维持生活水平。为了预防消费水平的降低，可能将一些妇女推入劳动力的行列，而她们在过去却从来没有仅仅为了增加自己家庭的支出水平而采取这种措施。

离婚的趋势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至少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几乎在本文所考虑的所有国家里，离婚率的增长都相当迅速。由于更多的妇女离婚，也由于更多的妇女在早期都

经历了两次以上的婚姻"筑巢"阶段,而不只是一次,因此,可能有更多的妇女需要工作。

此外,由于高等教育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期望而不是一种奢侈,子女离开学校自立的年龄继续上升,因此许多家庭面临着"生命周期压缩"。奥本海默利用美国人口普查的资料证实,男人只有在职业中达到比较高的地位时,平均工资才能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家庭的需要也达到了顶峰。这就是说,子女在这时已经长大,已到上大学的年龄。在工资不高或比较低级的职业中,男人在年轻的时候平均收入最高。结果,男人们在家庭支出最高的时候平均收入几乎与年轻的男人一样多,在某些职业中,他们的实际收入甚至比年轻的男人少。因此,这样一些人的家庭除非有额外收入作为补贴,否则生活水准就有下降的危险。生命周期的压缩看来是使许多中年妇女进入或重新进入劳动力行列的强有力动机。

由于更多的妇女所受的教育比她们的前辈多,也由于劳动时间越来越灵活,工作的收益越来越大,因此,更多妇女为工作所吸引。几乎在本文中所有被考虑的国家中,获得相当于学士学位的妇女的比例一直在增长,同受教育较少的同时代人相比,受教育较多的妇女更多地被吸引进劳动市场。此外,调查资料还表明,如果工作时间灵活机动的倾向不断增强,仍有一支庞大的妇女后备军在等待着非全日制的工作机会。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消除妇女在附加福利和职务提升方面所受到的歧视。例如,比利时实行了重大的社会保险改革,准许已婚妇女领取失业保险金,获得疾病现金补助,以及不限定的治疗假期以便离职生育后可以重新就业。

这种促使妇女就业的积极刺激因素被一些强有力的抑制

力量所抵消。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男人和女人全都认为女人的基本义务就是从事家务工作。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卡伦·奥本海姆·梅森和威斯康星大学的班里·L·邦帕斯对1970年美国生育研究中提出的有关性别作用问题所作的回答进行了分析,回答者是45岁以下的已婚妇女或曾经结过婚的妇女。他们发现,美国妇女对妇女基本地位的态度与在欧洲调查的结果以及妇女参加工作是次要义务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这次全国抽样访问的6740名妇女中,几乎有80%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男人在外面取得成就,妇女在家里照顾家庭,这对每一个有关的人都有好处。”只有不到一半的回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参加工作的母亲与不参加工作的母亲可以同样与子女建立亲切和稳定的关系。”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这样的说法:“如果母亲参加工作,学龄前的儿童就要受罪。”对于被访问的各种年龄的妇女,回答似乎没有多大差异。

由于这些调查清楚地表明,已婚的有孩子的妇女把衍生地位放在首位显然是合乎规范的,几乎没有什么高度发达的社会打算对已婚的就业妇女提供许多辅助性的帮助。甚至在法国和瑞典等国,即使这样为参加工作的母亲提供儿童保育的帮助被看作是社会职责,但提供的便利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往往是不充分的。在所有发达的西方国家里,一般来说,价格适中、烹调得好的盒饭是罕见的。因此,就业的已婚妇女还要依赖丈夫的帮助,调查表明,如果妻子有工作,但工作量通常不足,她们更有可能获得丈夫的帮助。结果是有家累的就业妇女往往会受到很重的压力。

1965年和1966年,亚历山大·萨雷及其合作者对东西欧十个国家以及美国和秘鲁的城市居民如何安排自己的时

间，作了重要的研究。他们证实，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已婚就业妇女的工作时间比就业的男子或家庭主妇的工作时间都要长。此外，在周末（尤其是星期天），当许多家庭主妇不再从事家务劳动时，就业妇女一般都要以两倍的时间用于家务劳动，显然是想努力弥补不足。萨雷及其合作者指出："就业妇女的困难处境在我们关于时间安排的所有记录中都可以看到。……她在完成了白天的任务以后，感到自己还要比其他任何人多干一两个小时，……她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反映在明显地压缩了所有的消遣活动，尤其是那些比较被动和重复的活动，比如坐下来读报消遣。"

这项研究结果与过去在法国、苏联、瑞典、芬兰和丹麦进行的独立研究的结果一致。确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开始出现的"性别作用"运动强调男人多做一些家务劳动和教养孩子的重要意义。如果妇女要增加家庭以外的就业机会，或者用瑞典妇女运动的领袖伊娃·莫伯格的话来说，如果她们所需要的不止是"有条件的解放"，那么，这种变化被视为不可避免的。然而，对大西洋两岸的调查研究都表明，男人一般愿意给女人以广泛的政治、公民和经济的"权利"，但只有在这些妇女也要履行做家务工作和照顾家庭的义务时才能给与。因此，妇女们面临着一种相对固定的结构性选择：要么是工作过重，要么是闲暇太多。如果许多妇女不选择过度劳动，那是不足为奇的。

当我们考虑妇女就业的需求时，妇女就业机会大大增加的可能性甚至更不容乐观。增加女工需求量的各种计划都假定将要出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在今后二十五年里是颇成问题的。而且除非受到良好教育的女性能离开

传统上由女性担任的职业，否则，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有好处也有坏处。女工所受的教育正在变得超过女性传统职业的要求。最近一些国家的出生率大幅度下降，说明大多数重要的女性职业如教师等，对妇女的需求量确实在减少，问题便更加复杂了。至于先进的经济不断向服务部门的转变能在多大程度上抵消这些消极因素，什么地方对妇女的需求最高，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调查。

所有这些消极因素暗示，除了其他同样的因素外，在发达国家对女性有吸引力的职业中，对妇女的需求量有一个上限。这个上限的存在就是瑞士这样的国家停止引进大量劳动力的主要原因。移民们从事瑞士男女都不愿做的工作。法国和其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涌入大量移民的发达国家也普遍流行同样的模式。

就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考虑高度发达国家是否有大多数妇女已接近获得非衍生的终生地位，看来是不切实际的。确实，与这个问题特别有关的调查资料更说明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很小。对大多数高度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相当多的就业妇女并不想就业，一般占一半以上的非就业妇女也不希望就业或者只希望做非全日工作。事实上，妇女最喜欢的似乎是非全日工作：这种工作实际上同她们的基本地位并无矛盾。

妇女们似乎也没有显示出普遍反对自己的衍生地位。例如，1972 年哈里斯要求对全国进行的抽样调查，向美国妇女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她们是否经常感到“有一个能够照料我的可爱的丈夫，对我来说，比我自己照顾自己重要得多？”以及“在养育好孩子方面所花费的精力与在商业或政府工作中拥有高职所花费的精力是否一样多？”在回答者当中，甚至在 30

与公正的教育和职业实践有关的目标，却普遍表示赞同。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等一些组织的骨干力量所得的支持迅速增长，而这种团体也日益能够为那些确实想身体力行的妇女的利益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和游说活动。

这些少数妇女能否在年轻的妇女中找到追随她们的新生力量呢？一些社会学家(我也是其中一个)认为，除非高度发达的国家继续严格实行按性别社会化的做法，否则她们就会在年轻妇女中找到新的追随者。妇女从出生以来社会化的有关证据表明，选择同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一致的个性特征和行为模式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强大压力支持。从事这个领域调查的学者有巴那德学院的米拉·科马诺夫斯基、马萨诸塞大学的艾丽丝·S·罗西、斯坦福大学的埃利诺·E·麦科比、密歇根大学的路易斯·W·霍夫曼、伍斯特州立医院的英奇·布洛弗曼及其同事们，以及雷德克利夫学院现任校长马蒂那·霍纳。他们的总的研究结果是，在男人因社会化而取得成功的目标和任务方面，美国妇女通过社会化却失败了。确实，似乎已经"获得解放"的工业社会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按性别去培养和教育孩子，还刚刚被人理解。1972 年，霍纳在她的一篇关于年轻人的著作中写道："很明显，在我们的资料中，我们验证的青年男女在过去七年中仍然往往用与占优势的陈规旧习相一致的，但与女性不一致或完全相反的方式评价自己并照此行事，这些陈规旧习即竞争、独立、能力、知识、成就、以及反映在心理健康和大丈夫气概上的领导能力。因此，尽管我们有一种文化和一种教育制度，它们在表面上同样鼓励男人和女人，为就业做好准备，但资料表明扎根于这种想象中的社会障碍，甚至更重要的，还有内在的心理障碍，实际上都把机

会局限于男人。”

这一研究对年轻女子的社会化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可能性绝不抱乐观态度。然而，当一个社会的“内涵”公开显示出来时，至少可以对它们进行详细的研究。在抚养子女方面，父母亲可能逐渐有了比较有见识的选择，因此能够更多地了解他们希望选择的促进因素和环境。例如，对儿童读物内容的分析就证明了这种倾向，即一些父母一旦意识到其中有不适合他们孩子阅读的内容就会加以拒绝。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大学的勒诺·J·韦茨曼和她的同事们对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获得考尔德科特奖（儿童书籍的最高奖）的书籍进行了内容分析。这些书籍的主要特征是看不到任何女性的人物，连动物也是如此。在对十八种获得考尔德科特奖的书籍进行的抽样研究中，韦茨曼和她的同事们发现这些书籍中关于男性的画有二百六十一幅，关于女性的画只有二十三幅。在这些书籍的书名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为八比三。将近三分之一的书籍中完全没有提到妇女，即使提到时一般也是一笔带过。在这些书籍中没有一个妇女有工作或有职业。极少数确实担任领导角色的妇女，要么是童话人物，要么就是神话人物。丽塔·莉尔杰斯屈姆在瑞典对儿童读物进行了类似的内容分析，表明男孩处于重视知识、行动和计谋的状态而女孩的特征是专心于衣着和个人外貌。

即使对那些根本上愿意充当妻子和母亲的妇女来说，当前的这种社会化模式是否适用呢？或者说这种模式的许多方面是否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幻想和弗洛伊德理论的遗风呢？布洛弗曼和她的同事们要求临床治疗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为成熟的健康男人、成熟的健康妇女和不分性

别的成熟的健康成年人提供其特征。结果，男人与不分性别的成年人的特征十分相似。但是，从健康的概念上来说，后者同妇女却存在很大的差别。布洛弗曼得出结论："临床医生很可能认为健康的妇女比较柔顺，较少独立性，较少冒险性，较易受人影响，较少进取心，较少竞争性，较易大惊小怪，感情较易受到伤害，较易激动，对自己的外貌比较自负，较少客观性，并讨厌数学和科学。这些特征的结合看来是一种描述任何成熟和健康的个人的最不寻常的方法。"

如果随着妇女有更多的教育机会而使社会化的模式发生某些变化，就像几乎所有高度发达的国家中都发生过的变化那样，那么，就有更多的妇女拥进研究的领域以获得报酬高和声望高的职业。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只是在很小的规模上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此外，在许多高度发达的国家中，例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格兰和威尔士和美国，妇女的就业机会则在不断增加。

这些百里挑一的少数妇女为了有所作为，是否都得放弃结婚和生儿育女呢？可能不是：她们仅仅是甘愿冒险而已。在一个结不结婚和生不生孩子之间的差别与过去相比越来越小的国家里，冒这样的风险似乎不太可怕。性关系没有严格地限制在婚姻的范围内，意味着晚婚或不结婚不大会是一种惩罚。甚至对于无业妇女来说，离婚的高度风险也使结不结婚之间的差别缩小了。对小规模的家庭甚至对从事全日劳动的家庭主妇来说，有了一两个孩子还去参加工作并非那么不正常。这两类妇女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子女在身边。

那么，为什么相当大的一部分妇女没有获得这种方式的"解放"呢？人们，包括我本人在内，为什么认为只有少数人才

会对变化中的社会化和机会作出反应呢?回答是,即使人们能够肯定这种变化势不可挡,但仍有某些基本的限制压倒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限制。例如,我们决不能把机会的平等同结果的平等混为一谈。假定有一个选择范围,我们必须预计到妇女的成就是可变的,就像男人的成就也是可变的一样。此外,教育和职业上的成就不可避免地将使有作为的妇女冒不结婚和不生孩子的风险。当她的女伴在追逐丈夫的时候,有事业心的妇女却无暇顾及,即使与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能需要的男人或可能需要她的男人在数量上更为有限。由于某些职业人满为患,使这样的冒险性加剧,结果许多妇女只好冒失去结婚机会的危险。

妇女的衍生地位由于真正的选择机会向她们开放而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当其他人被新提供的机会收罗殆尽,而还有一些妇女在犹豫不决时,那些基本上是妻子和母亲的妇女将会第一次出现供应上的相对短缺。假设出现这样的市场形势,男人们将不得不在有关妇女衍生地位的重要性上作出让步,这种让步是总统委员会和皇家委员会规劝不了的。不管作出的让步是什么样的,不管是指男人更多地分担家务和抚养孩子的责任、提供更多的经济平等和财产占有权的保障,还是取消道德的双重标准,它们都会使妻子和母亲的地位比现在有更大的变化,并使她们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妇女衍生地位的提高不可避免地要取代那种相对不利的地位。它意味着妇女有可能主要从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才能和精力的积极原因,而不是为了不要当“不过是家庭主妇”的消极原因来作出自己的选择。

预测各种层次的衍生地位和非衍生地位在某种平衡的状

17. 现代人的模型:理论和方法问题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

〔编者按〕 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学与社会学教授。在有关现代化理论的研究中，他在发展社会心理学的好几个领域里起着主要作用。他曾经采访过前苏联的一些由于受迫害而逃离本国的人，在此基础上对苏联社会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在《苏俄的社会变革》(1968年)一书中作了概括。他还对某些社会所特有的人格特征的共性进行过研究，与丹尼尔·J·列温森合撰"国民性:关于模态人格特征和社会文化系统的研究"一文(载《社会心理学手册》，第4卷，1968年，第418～506页)。近年来，他与戴维·H·史密斯共同指导有关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国个人现代性的比较研究，该文发表在《向现代人演变:六个发展中国家内的个人变化》(1974年)一书中。

本文总结了英克尔斯这项比较研究的成果。在研究这六个正在现代化的社会的过程中，他以分析

的、论题研究的和行为思考的方式为基础，用以解释个性的模式，这种模式可望在高级现代化的条件下占主导地位。

“现代”一词涉及很多关系，涵义极其深刻。它不仅可以用来指人，而且可以用来指国家，指政治体系、经济、城市，以及指学校和医院等机构，还可以指住宅、服装和举止。按照字面意思，这个词可以指当前的任何事物，它或早或迟取代了过去被公认的或作为标准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一艘替代划桨大帆船的航船曾经是现代的，就像汽船出现前的快速大帆船，原子能船出现前的蒸汽船曾经是现代的一样。这样看来，现代成为一种归类，而不是一个实体，是任意列举的事物，而不是一个概念。

许多学者曾经试图使这种看法具有更明确和更一致的形式。一种思路是把现代看作某种行为方式的具体表现，例如表现为教育、城市化、工业化、政府机构化、快速通讯和运输的模式。当然，其中的某些表现形式，例如城市，可追溯到人类历史上比我们通常称之为现代的时间还要早的时候，而其他一些发展，如工业化等，却不是这样。无论如何，当人们强调的是这些社会组织模式的一系列复杂或集合特征多少是在同时发展时，毫无疑问，十九世纪前，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看不到这样的共同特征，而这些特征到了二十世纪确实在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因此，现代可以视作我们当今这个历史时代文明特征的类型或形式，犹如封建主义或古典帝国是较早历史时代特征的类型或形式。这种文明形式并不是世界上处处皆有的，正如在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时并不是整个世界都存在封建主义

一样。同样，世界上出现现代性的任何特定地方也不是到处完全一样的。地方条件不同，特定文化的历史不同，开始现代化的时间不同，情况也就不同。

在这些范围内，在全国性的和下属机构这两个层次上存在着已获承认的集合特征。研究这种集合特征是不少学者研究活动的核心。罗伯特·沃特用十项特征来解释经济现代化；这些特征包括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和无生命的能源，劳动的高度专业化和非个人的市场的相互依赖，大规模的金融活动和经济决策的集中化，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1] 塞缪尔·亨廷顿[2] 用比较压缩的方式把政治现代化解释为三个过程：即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力取代许多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政治权力；新的政治功能的出现，例如法律的、军事的、行政的和科学的功能，都必须由新的行政统治集团来行使，这个统治集团是以成就为标准而不是以裙带关系为标准选择出来的。全社会内各个社会群体随着政党和利益集团等新机构在组织参与方面的发展而增强对政治的参与。

现代化研究的第一种分析思路把重点置于强调社会组织的模式，而第二种思路则更强调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模式。前一种方法更重视组织和行动的方式，第二种方法却认为思想和情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一种方法更关注机构，另一种方法更关注个人。第一种方法比较狭窄地局限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第二种方法则侧重于社会学和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主要把现代化当作认知、表达和评价

---

① 沃德：《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普林斯顿，1964 年。

② 亨廷顿："美国与欧洲政治现代化的比较"，载《世界政治》，第 18 卷(1966 年 4 月)，第 378－415 页

方法的变化过程来考虑。现代于是被定义为一种个人的反应模式，是一整套以某种方式行动的意向。换句话说，它是一种"风尚"或"精神"，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罗伯特·贝拉所表达的，现代可以不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①] 据此，若与以制度为定义的现代性相比，它并不太受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约束。如果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心理状态，那么，类似的心理状态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甚至在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希腊，都可能存在。

在现代化研究的两个主要课题里，对机构的研究受到的注意远远超过对个人的研究。确实，一种保守的估计是，在机构方面研究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著作比研究个人现代化的著作在数量上为二十比一。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成立的一个研究经济发展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小组，一旦充分认识到了这一事实，就决定把几乎全部精力用于研究现代化过程对个人的影响。[②]

我们的决定来自两个信念：首先，我们需要考察人类受到城市化、工业化、人口流动和大众传播的复杂影响时所受到的影响和付出的代价（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在许多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着一个信念，几乎是一个基本信念，即他们认为工业化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而且确实是过份的社会

---

① 贝拉："意义与现代化"，载《宗教研究》，第4卷（1968年），第37—45页。

② 该小组以亚历克斯·英克尔斯为首，主要成员有爱德华·瑞安、霍华德·舒曼和戴维·史密斯，主要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研究经费。对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的实地研究根据公法第480条由国务院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局以当地的货币给予资助。全国科学基金会对该计划中的某些主要研究阶段同意承担费用。空军科学研究局为翻译的技术研究和使用计算机提供经费。

混乱、社会纽带的中断，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失去方向，无所适从。尽管说法很多，但事实寥寥。我们从一开始就坚信，这些说法中有许多是夸大的，其他的没有证据可依，还有一些简直是错误的。我们相信，工业活动不仅可以，而且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实际上已经对经历过工业化过程的人，发生了教育和解放作用。我们觉得它能够提高他们的创造性，扩大他们在社会中的参与，甚至增强他们的个人价值感和尊严感。

我们的第二个信念是：一个现代社会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要求公民具备某种品质、态度、价值观念、习惯和意向，这些都可以通过他们在工厂里工作的经验得到灌输。现代社会以作为一个"参与"的社会为其特征。它要求公民乐于接受新的经历，接受革新，关注社区和全国各个层次上的公共问题，他们有鼓励和支持社会改革计划的效益感，并有能力自由地从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去，有能力在新的生活安排中把自己同新同事和新邻居融为一体。归结到一点，一个国家能够在工业上发展并进行大规模城市化，无须其居民在心理上经历根本性的变化。于是它只是有一个部门发达的国家，而不是真正的发达国家，更不是现代社会。这些只有某个小部门已经现代化而有大片传统主义穷乡僻壤的国家，如果想要避免可怕的全国性的分裂对它们产生影响，就必须寻找某种方法把所有公民团结起来并融合到社会的现代部门中去。许多学者强调，发展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历史充满着中断和停止发展的戏剧性事例。① 我们认为，工业或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并不

① 参见埃森斯塔特："现代化的中断"，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异》，第12卷（1964年7月），第345—367页。

会随之产生其他变化，因为居民毕竟要在新的行业和新的政府机构中工作，消耗它的产品，处理它的要求，对它的号召作出反应，并与它的功能形式发生关系，但没有在心态上、态度上和习惯上发生变化，这样的情况就很有可能发生。

因此，我们的现代化研究必须以普通人——新进入工业部门的农民和工人——为核心。这种研究应该探讨这些人在遇到新出现的现代秩序中的新机构——工厂、城市、大众媒介、政党、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时的体验。我们的研究应当在现代化过程最为明显、对现代人的需求最为迫切的发展中国家里进行。为了避免把基于某些十分不符合事实的特殊属性单纯地综合起来并过早作出结论的危险，我们进行的研究不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好几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为了容许我们解开据称是产生现代性的复杂的影响网络，我们觉得我们的研究不应当只处理某个单一的影响来源，而应当精确地控制和测量大批的变量因素。这种类型的分析应当以大量的抽样为基础。这些抽样的取得是有目的性的，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对我们的研究涉及的理论性和描述性问题作出回答。为了防止产生偏见，我们觉得我们的研究不应当依据某一种单一的、简单的和狭窄的现代概念，而应当以一种复杂的、详尽阐述的、有差异的概念为基础，从而使我们能够分别地研究现代性的各种因素和组成部分——实际上这会使我们可用事实去检验是否真正存在着“现代人”这样一种事物的观念。

有了这一套详细规定以后，我们开始在六个发展中国家，即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进行大规模的比较研究。哈佛大学关于发展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研究计划中有许多侧面，我在这里选择了其中或许是最根本的

比较现代的人，难道不是太自以为是了吗？把外国的技术等同于现代的倾向不只是在西方普遍存在。在印度的比哈尔邦，如果有人认为用木炭烹调的食物比干牛粪饼烹调的食物味道更好，或者坚持说工厂里织出的布摸起来比手工织的布更柔滑，那么，他也被当作比较现代的人。他在这两点上也许是对的，但我们是否应该仅仅因为他使用木炭或工厂里织的布，就把他看成比较现代的人呢？

这些问题很微妙，很复杂，也很难，要花我们很多时间，但是如果我要把所有这样的问题都进行研究，那我就永远不能接着说明我们怎样解决我们研究中的问题了。确实，我敢说一个人要把他在这些问题上的真正观点解释清楚，并不在于他在这些问题上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采用精确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他设计出来测量现代性的。

我们以调查表提问的方式进行访问，涉及大约三十个不同的题目，对每个问题都做了一定深度的探讨。所有这些重要题目都经过考察和检验，以评价它们同我们总的研究目标有多大关系。有些题目我们曾认为特别重要，但现在我们仅仅把它们看作是次要的题目。还有一些题目我们过去没有用标号和字母加以区别，但我们在实地调查或分析过程中，发现它们与其他题目同样重要，同样有价值。然而，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在这项研究中，除非有充分的理论根据把题目同现代化联系起来，否则，我们就不采用这个题目。这种理论或者是我们所接受的，或者是得到权威们证实的，而这些权威在这一领域里的观点是在检验中证明为重要的。我在描述这项研究的过程和提出我们的调查结果时，我相信我们的大多数决定显然是被研究成果证明为正确的。

我们研究的三十多个题目不是随意列举的。它们有明确的内部结构，这种结构产生于我们计划中的主要研究目标。它们反映出参加这一合作项目的全体成员的兴趣和观点，也反映出研究现代化过程的主要学者所提出的理论。尽管每一个题目可以合情合理地单独地进行探讨，但我们一开始就设想把其中的一些项目结合起来，作为态度和价值观的复合体或共存的事物。在我们看来，它们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概念，也是我们这项研究的中心焦点。这一小套或一组题目构成了我们对个人现代性进行研究的**分析模型**。

然而，这个模型并没有涉及研究现代化的学者们向我们指出的属于现代化过程中主要伴随物或结果的所有题目。这些普遍的观点中，有许多是得到某些证据支持的，但仍要进一步加以检验。其他一些观点实际上还没有得到实地研究所得经验的检验，还有一些观点我们不仅认为是错误的，而且要证明它们是错误的。第二套题目是在比较折衷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不能把它们看作在某种独特的模式或特征群中结合在一起。每一个题目都能独立存在或消亡，不影响任何其他题目的存在。我们把它们称作现代化的**专题**。

分析模型和专题主要都是对态度和价值观念的研究。我们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个人可能用现代的倾向思考和说话，却依然用比较传统的方法**行动**。可以说，对现代化过程的最终检验不是它能教一个人对调查表上的问题作出“现代”的回答，而是它能把人造就为在日常生活中像现代人那样行动。我们不能认为现代的**思想**和现代的**行动**之间的联系是自动的和完全的。事实上，我们很有理由认为这种联系是微妙的和难以确定的。因此，我们决定收集资料，以便让我们能够依

据行动而不是言论来判断人的现代性。对个人现代性的这种检验，我们称之为**行为测量**。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简要地说明现代化研究三种方法中每种方法的理论和内容。这三种方法即分析模型、专题和行为测量，实际上它们是在我们的研究中精心设想出来的。

分析模型

我们一开始就希望提出一种关于个人现代性的理论，这种理论不会盲目和武断地把西方的习惯和西方的价值标准强加在发展中国家的公民身上。然而，在对现代性进行测量时不带价值观念色彩是十分困难的。所有我们认为已经现代化的主要国家，除日本和俄国外（如果你愿意把俄国算作东方国家的话），都有欧洲的传统。在它们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中有一些因素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也是维持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因此，要把这些因素与这些欧洲社会中实际上的"传统"因素区别开来是十分困难的。这些传统因素只是偶尔同比较现代的机构发生联系，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时代被"拉入"比较现代的机构。例如，人人都注意到日本人，实际上还有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上层分子，是怎样穿上了西方商人的服装和鞋子的，尽管事实上这种衣着决不是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避免抽象地列出各种价值观念，而是提出一份现代品质的清单，这些现代品质满足了管理工厂的要求或需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提出把工厂作为现代社会独有的机构之一，我们不会遇到什么争议。实际上，工业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很大一个部分。许多人认为它是最基本

的成份。工业化反过来要依靠工厂——大规模的生产企业，它们把许许多多人聚集在一个工作场所，按照正式的规则中表达出来的合理考虑系统地规定他们之间的关系，依靠无生命动力的集中和技术的系统应用，接受主要依靠技能和行政管理能力的权威统治集团的指导。

作为一种机构，工厂是不分国籍的，它不是英国的、法国的、荷兰的，就这件事来说，也不是欧洲的。它不违背任何大大小小的宗教团体的重要戒律，也不排斥任何人进入这样的地方，或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无论是伊斯兰教、印度教，还是佛教，所有这些宗教的信徒们都发现易于在工厂从事工作。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想从工业中获得好处，所以把工厂当作现代化的关键，把外来制度及其有关的习惯和价值观念的表面上的压力减少到最低程度。因此，我们提出，把那些很可能是通过参与像工厂之类的大规模现代生产企业而被灌输进去的品质归类于现代的品质，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工厂如果要充分有效地运转，它的工作人员就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

当然，有许多方式可把工厂看作一个机构。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所列举的工厂生活的性质和必要条件是详尽无遗的，甚至是明确无误的。但作为工厂生活的一种属性，这些题目中每一个都是重要的，同时也是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有着更普遍关系的人的一种性质。我们还进一步缩小题目的范围，特别集中于我们认为值得注意并对来自农村的朴素工人影响最大的那些工厂组织的特征。我们把工厂当作学习场所，当作安排事物、思考和感觉的学校，它与传统的农村形成明显的对照。这种特殊的兴趣可以证明我们所用的上述方法是正确的。当然，在城市环境中长大后进入工厂的人对他们在其中成长的环境

与他们进入工厂后遇到的环境之间的反差不会太注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设想所选题目是最值得注意和最有影响的。只有这项研究的经验才能表明我们的假设是何等准确。

至于我们如何从研究工厂组织而推导出这些性质，也许已经很明显，也许还没有说明白。不幸的是，在这份报告中，我只能局限于扼要地说明在我们的分析模型的框架内被解释为现代的那些性质。由于在这一点上我不能提供具体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些题目，为了现在的目的，还是让我直说，我们只不过把现代人解释为具有这些性质而已。

乐意接受新经验并对革新和变革持开放态度构成了我们对现代人的定义中的首要因素。我们认为，传统的人不太愿意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感觉和行动方式。因此，我们所说的本身只是一种思想状态、心理倾向和内心的准备状态，而不是由于它所达到的技术水平而使个人或群体有可能掌握的特定技术或技能。因此，对我们来说，一个即使用木犁耕田的人，有可能在精神上比已经使用拖拉机的人更现代。其次，愿意接受新经验和新的行为方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情况，例如，愿意服用新的药品或使用新的卫生方法，采用新的种子或不同的肥料，乘坐新式运输工具，或求助于新的信息渠道，赞成新的婚礼形式，对年轻人实行新的教育方式等。当然，个人和群体可能会在一个生活领域显得比在另一个生活领域更愿意接受新事物，但我们也能把乐于接受革新看作是普遍的一般特征，这种特征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我们把具有这种心理准备的人看作是比较现代的。旨在了解乐于接受新经验而提出的代表性问题如下：

我们使用一系列不同的衡量方法来估计个人愿意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意见的程度。一个最粗糙的指示方法是他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说"我不知道"或"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的次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我们对他在回答有关他的国家、社区和家庭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时的次数和题目进行评价。

如果一个人的见解具有比较民主的倾向，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人是比较现代的人。在这里，我们指的是他能表明对**周围各种不同的态度和观点**有较多的了解，而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认为人人都有同样的想法，而且同他本人的想法一样。在我们的思想中，一个现代人能够承认不同的观点；他不必由于害怕因为承认了差异就会动摇他自己的世界观，从而矢口否认这些差异。他也不大可能会用十分专制的或划分等级的方式对待不同的观点。他既不会自发地接受在权力层次上比他高的人的观念，也不拒绝明显地在他之下的人的观点。也就是说，**他对不同的见解能积极地作出评价**。我们检验这些评价是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与村长或其他传统领袖有不同想法是否适当？也可以问他，在讨论重要的公共问题时，是否应该认真考虑他的妻子或年轻儿子的看法？事实证明，这些问题是很敏感的指标，有助于我们把一个人同其他人区分开来。我们相信这也是我们将要叙述的现代性的最终一组特征中的重要因素。

与我们对观点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但作为一个独立的方面来对待的，是我们对**信息**的测量。我们认为，成为现代人不仅是某人有其见解，而且是指他在获取事实和信息来构成那些见解的依据时，比较主动和积极。你被明确地要求回答你对资本家是坏的这个问题有何看法，那是一回事，而在实际上知

道莫斯科和华盛顿是什么和在什么地方，又是另一回事。

时间是我们在进行详细测量时的第三个题目。如果一个人着眼于现在或未来，而不是迷恋过去，我们就认为他是比较现代的。如果一个人承认遵守时间，也就是说按程序表办事是合理和合适的，甚至可能是他愿意的，我们就认为他是比较现代的。他与那种认为遵守制度是坏事或者认为有其必要但不幸地也是痛苦的人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人在安排自己的事务时有准确的时间，有规律和秩序，我们也认为他是比较现代的。

这种对时间的态度与现代性测量的关系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也向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指出按一般的定义去测量传统的人和非传统的人之间现代性的差异是错误的。例如，我们认为玛雅印第安人的时间观念比他们的西班牙统治者更强，而且把这种观念一直维持到今天。事实上，当你从拥有的科技水平或权力程度来定义为非现代人时，他会表现出我们定义为现代的人才能具备的那些品质。我们是在说人的品质，反过来它也可以反映一种文化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在任何时间或地点出现，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可以更广泛地传播，但并不等于说这类国家可以垄断这些品质。

功效是第四个题目，它在我们对现代人的概念中特别重要。现代的人相信，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能学会控制环境，以便实现自己的目的和目标，而不是完全被环境所支配。例如，一个有功效感的人会对“你是否相信人类有朝一日能充分了解洪水、干旱和传染病等这类事情的原因”这样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认为，较有功效感的人，即使从没有亲眼见过水坝，也会说：“是的，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能做到。”

当然，功效感不只局限于关于人类有可能控制自然的感

但是即使如此，如与最传统的秩序相比，现代社会比较重视和实践这样的安排。在最传统的秩序中，报酬更加依据权力和特殊的地位，有时也由那些控制利益分配的人随心所欲地决定。报酬应根据某种规则而不是根据某种兴趣，报酬结构应尽可能地同技能和相对的贡献一致，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作分配公平感。按照这样明确的说明，这个原则最明显地适用于诸如工厂和政府机构等组织。当这个原则应用于其他角色，例如消费者对待商人，市民对待官员时，它常常被称作**普遍对待**原则，与**特殊对待**原则对立。

我们对分配公平感的主要测量方法来自对一组问题的回答。在这些问题中，我们首先确定一个普通工人的薪水为标准(假如每月一百卢比)。然后提问，监工、工程师、工厂经理和几种职业工作者(如医生和学校教师)的**相对**工资应为多少。为衡量对特殊对待原则的态度，我们在有些国家里还增加了一些关于特殊待遇的问题，例如，我们问我们调查的对象，一个到公共机构办事的人在办事之前先去找其中的一个朋友或熟人联系，这样做对不对？

抱负、教育和新知识。每一种文化都有传统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农民和构成老百姓的其他人中传播最广，也最被强烈地相信。在这些背景下，正规学校常常被用来达到宗教的教育目的，并且专心致志地用于灌输和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较发达的国家中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世俗学校和新知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激进的革新。这些学校讲授的科目和传播的价值观常常同传统的智慧互相竞争，实际上是挑战或对抗。凡是对正规教育和在学校里学习读写算等技能感兴趣并给予较高评价的人，我们称之为比较现代的人。这些人认

为现代知识甚至科学并没有侵犯神的领域，因为神的领域只剩下了一种神秘的东西，只能通过宗教来接触，而科学和技术却是为人类迫切的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来造福于人类。为了测量人们在这个领域中的态度，我们提问：如果学费不成问题，一个人应该让他的儿子上多少年学？学校应该更多地传授道德和宗教呢？还是应该传授实际技能？并且问，父亲希望他的儿子将来从事什么事业？

了解和尊重别人的尊严是许多人认为现代世界里已经丧失了的品质。如果我们要判断这种品质事实上是否在传统社会里更加根深蒂固而且传播得更为广泛，那么有许多情况显然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传统社会作为比较的标准。许多知识分子深信一切人生活在前工业和前城市时代的时候，都有更高的个人尊严，尽管他们消费的物品比较少。我们很难相信这种意见是正确的。诚然，我们在这项研究中持有一种比较激进的立场，认为工厂可以是一个教育场所，它教会人们较多地明白下属的尊严，并在人们对待他们时知道有所约束。我们觉得，与大多数传统农村里农民同他们的主人、老板、首领或保护人之间的关系相比，工厂经理更须尊重工人的尊严。确实，我们期望现代人不仅将会对工作环境内的弱者和下属的尊严提供更多的保护，而且将会把这一原则扩展到其他关系中去，从而将表现在对待妇女和儿童等一切只有较低地位和较少权力的人的行为上。因此，我们问："男孩的尊严不如大人的尊严重要，和大人一样重要，或比大人更重要，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正确？"

分析模型与现代人

总之，这一组十到十二个题目构成了我们对现代人的分析模型。现代人与传统社会的普通人相反，他们接受革新和变革，容易感受他本人及其周围那些人的新经验。他的这种开放性一部分表现为尊重正规教育，相信科学技术的试验和开发有潜在好处。他的开放性也表现为对外部事务发生兴趣，寻求各种事物的新的信息来源，包括未必同他的直接生活发生联系的公共事件。他对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关心和参与反映在他对范围广阔的各种问题持有意见，了解他周围的人在观点上的差异，容忍不同的观点，尊重那些比他弱和地位较低的人发表意见的权利。比较现代的人有较大的功效感。他感到不大受命运的摆布，并且比较相信人们通过自己或与他人协同的努力能够组织起来主宰自然，安排社会事务，以保证人类有适当程度的安全，不受灾害、冲突、疾病和饥馑的侵袭。这种功效感部分地基于他对同伴的信任感，对组织，对上级、同事和下属的可依赖感，并有合乎情理的把握，认为他们会履行对自己的义务。这种感情使他确信在完成共同任务中的本人职责时会得到他所需要的支持。计划对他来说是达到他的个人目标和完成他所参与的集体任务的十分宝贵的方法。与这种价值观念有密切关系的是有严格的时间感和坚持周密安排事情的重要性。现代人期望获得与他的技能和他对共同努力作出的相对贡献相符的报酬。对他来说，他承认教育和技术本领的价值，并期望得到相应的报酬。但他也认为这些报酬是由正规的体系决定的，为普遍适用的原则所制约，而不是只局限于某

进行一些选择。只要我们大家都承认这是有界限的表述，是有待验证的分析模型，而不是教条式地宣称我们所指出的因素是绝对的、准确的，而且是能够合理地纳入态度现代性定义的唯一因素，那就并无害处。

然而，我们对于现代性的任何方面的设想无论是多么清楚和恰当，我们在测量上的努力可能是不充分的。因此，把愿意接受新经验当作现代人的特征，也许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向一个人询问是否愿意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也许并不能充分检验出他对新经验的开放态度。尽管我们十分自信，在这接受新经验的例子中，我们找到了对有效提问的关键措词，但在其他例子里，诸如时间适应和尊严等，就不是那么信心十足了。不幸的是，如果事实证明某个特定方面与现代性无关，尽管我们的假设与此相反，却没有绝对的检验告诉我们事实真的如此，也不能告诉我们是否它们明显地毫无关系是因为我们所提的问题很尴尬或不适当。凡是我们未能发现有联系之处，我们只能尽可能老老实实地逐个审查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否适当。

尽管我们对已经选择出来进行研究的一些方面所作假设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最根本的假设，即所有这些方面相互联系起来，成为我们明显地标明为“现代人”的特征群，仍然可能是错误的。功效感也许确实是可以将一个人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而且我们或许已经成功地对它进行相当准确的测量。易于接受新经验和尊重下属的尊严方面也属于这种情况。但不能由此自动地接着说，有高度功效感的人也乐意接受新经验，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说他们还要小心谨慎地不去羞辱那些比他们弱的人。我们的研究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这些品质确

实凝聚在一起，它们是一种特征集合体，具有其中一种特征的人便会表现出具有其他特征。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我们说的不仅仅是那些具有这种或那种现代特征的人，而且是那些可能有意义地被描写为整体上是现代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类型的人的存在只是一种假设，还需要用证据来验证。而且，如果有人有兴趣遵循我们的研究，他不一定需要接受这种复合“现代人”的一般观念，对我们列举的各个方面也不必照单全收。假如没有实际的特征集合体，发现谁具有接受较高教育的愿望或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而且了解什么力量使他们具有这些有限的特征，可能是很重要的。

相反，也许有人会完完全全地接受这样的思想，即确实有一个结合在一起的态度特征群，但是对某些具体方面（实际上是它的不同部分）的假设，则予以否定。例如，我们已经提到的一种普遍的看法——参加我们这个项目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说没有这种看法——即同传统的村民相比，现代人对别人尊严的敏感性和尊重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在时间感和对计划的兴趣方面，人们也可能持同样的怀疑态度。毕竟，经营一个家庭农场要有严格的时间感，没有事先作好计划的农民很容易发现自己在收获季节远远落在人们后面。相反，工厂工人更多地是跟着工厂的汽笛、机器或流水作业线的节奏走，而且他可把大多数工作的计划让监工和工程师去做。因此，易于接受新经验和功效感的特征也许能结合在一起，而且在更多城市产业工人当中发现，强烈的时间感和对计划的高度评价也结合在一起，但这是农民有力地拥有的比较普通的价值观念。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我们这个现代性分析模型同其他观念的关系。当然，我们为自己的观念所展示的这种独创性感到

骄傲，但近来提出的有关现代人的其他许多模型似乎和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因素。我们已经提到，勒纳对观念领域感到兴趣，他用"移情能力"的概念或"设身处地的能力"来表达。他还提出，一个流动的社会"必须促进合理性"，也就是说，"人们把未来看作是可以操纵的，而不是注定的，他们的前途应当用成就而不是用血统来决定"。[①] 我们在这里可以认识到他所强调之处同我们的功效感以及抱负和技术本领的概念中所强调的十分相似。其次，勒纳说到流动的人是"以他对新环境的各个方面认同的能力而与别人不同；他有某种机制，当他所不习惯的经验对他产生新的要求时，就需要这种机制去适应"。[②] 这种观点又与我们提出的易于接受新经验和对变革持开放态度显然非常相似。

我们的现代性概念同其他好几位学者提出的那些现代性概念中的因素之间，也可以看出相似之处。例如，罗伯特·沃特在《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一书中，提出了他称之为"知识现代化"的八个特征。其中有些项目与我们所说的学习新知识的愿望、接受变革、尊重别人的尊严和观念增长等题目非常相似。伊锡尔·普尔也不是从国民生产总值，不是从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比例，而是从全体人口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来为现代化下定义。他所描述为现代的那些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有一些因素与我们所说的功效感、抱负和易于接受新经验的题目近似。[③] 威尔伯特·穆尔列举的与现代化

---

① 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格伦科，1958年，第48页。

② 同上，第49页。

③ 普尔："交流在现代化和技术变革过程中的作用"，载霍塞利兹和穆尔编：《工业化和社会》，巴黎，1963年，第275—293页。

相适应的“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原则”包括解决问题过程中的合理性、遵守时间、承认个人之间有限的但有系统地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获得成就和流动愿望等，每一个特征都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我们列举的题目。[①]确实，我们可以在远至十九世纪末古典经济学的同一领域的著作中看到对类似题目的描述。因此，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断言，有一些品质造就了伟大的工业民族，这种品质不是某一个职业所需要，而是所有的职业都需要，诸如“当需要时事事齐备，当出了错误时能迅速采取行动并说明原因，并使自己能很快适应工作细节的变化……”。[②]

按照上述论据，我们难以论证我们的现代性分析模型是稀奇古怪的，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尽管我们把工厂作为一种组织来开始考虑，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过程及走它自己的道路，但我们的分析模型包含的许多因素与其他从别的起点开始并在不同的理论指导下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所提出的模型是相同的。我们列举的题目比大多数模型的题目有更广的范围，我们的研究也许的确更强调某些题目，诸如功效感或易于接受新的态度等。尽管如此，大家列举的题目基本上是相似的。我们坚持认为这个模型的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现代态度相互连贯的特征集合体，这一点或许有些与众不同，但许多对个人现代化深思熟虑的学者所使用的方法中也含有这种观念。因此，主要的区别在于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对现代人的品质下定义。我们还超越了这个观念，把它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测

① 穆尔：“培养良好行为和责任感的策略”，载弗里斯和埃恰凡里亚编：《拉丁美洲经济发展的社会方面》，第1卷，麦地那，1963年。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8版，伦敦，1946年，第206—207页。

量，从而使我们的定义能起作用。我们还进一步让这些思想同时放在几个不同文化中去接受事实的检验，以确定人的性质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我们的现代人模型，并且确定使人成为现代的那些力量。

专题

现代人的分析模型主要产生于对工厂生活需要所作的理论思考。我们选择这些组成部分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组成部分凝聚成为一种心理特征群。这种概念不是随心所欲地想出来的，显然是有明确的限制和高度的选择性。研究现代化过程的学者在讨论它与个人因素的关系时常常把其他一些问题当作核心问题来对待。其中一些因素被鉴别为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他们假设，除非这些问题能够解决，否则一个社会是否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仍将大有疑问。另外一些因素被鉴别为随着现代化的结果而产生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代价，即人们为获得某些利益，比如他们要进入现代世界而要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每个问题都有它自己的倡议者。他们殚精竭虑地来作阐述和研究。他们的论点中有些是依据许多证据；另一些则纯粹是陈述某种观点，尽管它似乎有些道理。

我们的研究小组中有一两名成员对其中的某些问题特别感兴趣。为了满足他们的兴趣，我们着手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对其他问题的兴趣不大，但是那些看来仍然被公认为有重要意义的问题，我们也不能不把它们纳入我们的研究之中。因此，我们将从新的背景中提供进一步的资料，用以

论述现代化研究的标准问题。其中有一些问题过去已经进行过比较孤立的研究，我们的研究则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把它们相互联系起来。最后还有一些属于第三组的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管是普遍的观点还是专家的见解都有错误，我们要借这个机会看看是否有证据来证实或推翻这种观点。

由于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被单独论述的，又因为这一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产生于任何共同的想法和统一的理论，因此，我们把这一组问题称作为我们的现代化"专题模型"。我们的这一部分研究工作要讨论十个重要的领域，其中有几个领域又被进一步划分成为几个重要的亚题目。

除了宗教可能是例外，社会中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会比扩大了的亲缘关系结构更经常被描述为现代化的障碍或牺牲品。威尔伯特·穆尔总结了普遍的观点，他说："总的说来，传统的亲缘关系结构是工业发展的障碍，因为它鼓励个人依赖它所提供的安全，而不是依靠他本人的意志。"① 把这些家庭纽带想象为现代化过程的牺牲品，在M·B·德什穆克的一份关于德里移民社区的报告里有很好的描述。德什穆克说："缺乏社会归属感，贫穷的压力，以及城市环境的不良影响，使得……在农村中看得那么神圣的家庭纽带"在移民居住区内却是"毫不重要了"。②

---

① 穆尔：《工业化与劳工》，伊萨卡，1951年，第79页。

② 德什穆克："德里：关于流动性移民的研究"，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南亚工业化的社会含义研究中心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含义》，加尔各答，1956年。

回顾了这一问题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常常断言、不断增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确实会削弱扩大了的亲缘关系的活力，这种说法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强调扩大亲缘关系纽带的社会，都是那些带有强大的氏族制度的社会，例如在中国，或者在那些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复合社区，或者在几代同堂的扩大了的家庭，都环绕着亲缘关系来组织生活，例如著名的南斯拉夫的扎德鲁加家族，所有兄弟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共同占有家庭财产，在共同的土地上耕作，大致平等地分享这种合作经济的收益。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当城市化扩大了亲缘之间的人身距离而工业雇佣制度削弱了亲缘之间经济上的依赖性时，表现为共同居住、经常互访以及在劳动中相互帮助的亲缘关系纽带的力量也遭到削弱。我们设计的一系列问题，调查居住情况，访问方式和彼此帮助之类的状况，都是为了检验这些假设是否符合事实。

我们一方面准备接受这些一直很普遍的假设，一方面也要提出有些激进的结论，即工业雇佣制度实际上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增强家庭纽带。[1] 我们觉得许多有关家庭和现代化的共同论点过于笼统和一般化，它们把扩大了的家庭同直接的家庭混在一起，没有区别亲缘关系的程度和类型。例如，当现代化的经历削弱了扩大了的家庭的纽带时，很可能会增强男

[1] 许多著作，包括刘易斯对墨西哥的研究，兰伯特对印度的研究以及侯赛因对巴基斯坦的研究，都提到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条件下家庭纽带的稳定性，甚至提到比较传统的家庭纽带的稳定性。见刘易斯："没有中断的城市化：个案研究"，载《科学月刊》，第75卷，第1期（1952年7月），第31—42页；兰伯特：《印度的工人、工厂与社会变革》，普林斯顿，1963年；侯赛因："达卡，东巴基斯坦的技术变革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含义》，加尔各答，1963年。

人与传宗接代的家庭之间的纽带，并导致他更少地依附母亲而更多地依恋妻子。[①]此外，当一个人迁移到城市以后不再重视更扩大了的亲缘关系的纽带，但作为一个产业工人，生活状况的不断稳定和改善又有可能使他能更充分地承担亲缘关系中的某些义务，至少与他仍然在农村当农民谋生而生活没有保障、比较贫穷的兄弟相比，更能承担这些义务。我们提出一组有关亲缘关系义务的问题来检验这种关系，诸如：

> 假定一个年轻人在工厂里工作。他好不容易才积蓄了很小一笔钱。现在他的亲戚（每一个国家都要选择合适的亲戚，比如远房堂兄弟）来找他并告诉他急需钱用，因为他完全没有工作。你认为这位工厂工人有多大义务必须同他的这位亲戚分享他的存款？

妇女的权利

与家庭关系的变化模式有密切联系但范围更广泛的是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问题。世界上大多数的传统社会和社区即使不是严格地属于家长制，至少也属于强有力的男性统治。在伊斯兰教中也许可以发现极端的例子，男人每天都要祈祷，感谢真主没有使他成为一个妇女。

我们预言，促进现代化力量的解放会对男人的态度发生

① 这种观念同古德对全世界家庭变化模式的研究所得出的主要结论相符。古德注意到工业化的唯一附带物似乎是扩大了的亲缘关系纽带的削弱，家系模式的消失和核心型家庭的加强。见古德：《世界革命与家庭模式》，格伦科，1963年。

承担宗教仪式方面的许多义务，尤其是因为地方性宗教设施不足，他如一定要承担这种义务，就会遇到麻烦。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在城市中，随着宗教设施的增多，比较容易接近，收入比较稳定而且比较多，产业工人会发现支付宗教礼拜仪式所需要的费用不再是一种负担。

老　年　人

在大多数传统环境里，老年人的特殊作用与家庭的力量和宗教的活力有密切关系。对老年人表示尊重，事实上是表示崇敬，常常被认为是传统社会最明显的标志和最显著的美德。人们普遍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有两个最共同的，而且事实上也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产物是削弱对老年人的尊重和年轻人文化的产生。在年轻人的文化中，老年不再被视为受人敬仰的年高德劭的状态，而是人们不愿接近的可怕的甚至是恐怖的状态。

对于老年人的问题和对于家庭和宗教问题一样，我们也不愿自然而然地接受占优势地位的观点。伴随着现代化而产生的结构变化，看来显然一定要削弱老年人的特殊地位。例如，在技术革命时代，农村中历经沧桑的老年人在与依靠最新科学进步的农业专家的竞争中，很难无限期地维持其权威。年轻人将在工厂和商店里自谋生路而不再依靠父亲的土地和牲畜，父亲对他们的权威不可避免地要被削弱。大众媒介和其他新式而有竞争性的生活方式，又必然使老年人难以权威地实行旧的规范和行为方式。

然而，我们也感到，许多分析家或许夸大了工业化对老年人方面的侵蚀作用。城市生活本身并没有什么事情要求人们

对老年人不尊重，工业经验中也没有什么事情明确地教人们抛弃老年人。在农村中，许多老年人遭到孩子的抛弃是因为孩子们无力养活他们。有报酬地受雇于工业的人随着工资的稳定增长和生活状况普遍地更加稳定，使享有这些利益的人更加注意履行对老年人的义务。他们与农村中务农的比较传统的农民相比，可能同样是那么尊重老年人。

政　　治

许多学者都把政治现代化引证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条件。[1]在描述现代政治体中的公民的特征时，他们常常用"参与"一词来表述，就像他们常常使用"动员"一词一样。人们有一种期望，即现代政治体中的公民不仅对那些与他的直接生活有关的事情发生浓厚的兴趣，而且也对他的社区所面临的较大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他的效忠被设想为超越了对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扩展到对州和国家及其领导人。他可望参加政党，支持候选人并在选举中投票。

我们的研究并不在于回答下述问题，即一个能够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社会是否仍然用传统的政治制度来进行管理。我们也不想去进行检验，除非公民也进行"参与"和"动员"，现代政治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运转。然而我们能够说，在态度和价值观念上现代的人怎样在政治倾向方面也表现出是现代的。我们设计的这项研究，使我们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去理解什么社会力量在人们身上产生了那种社会学的政治研

① 派伊："导言"，载派伊和维伯编：《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普林斯顿，1965年。

究认为是现代政治体中的公民所必需的或向往的品质。因此，我们在多达五十个国家里增添了大量的提问，从而使我们能够评估我们的调查对象在专门属于政治方面的或与政治有关方面的态度。我们的提问包括政治参与、对政治家和政治过程的态度、对政府的工作效率以及政治知识和信息水平的评价。

信息媒介

就像戴手表往往被当作人们向往现代世界的第一个戏剧性的迹象一样，得到一架收音机也许可以看作是他实际上与现代世界相结合的行为。丹尼尔·勒纳在研究中东的现代化时，把人们接受大众媒介的方式作为他把各种因素分类为传统的、过渡的和现代的因素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他的确认为，“没有发达的大众交流体系，现代社会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功能”。① 他指出，现代的模式，

> 显示出某种与全球有关的组成部分和后果。在任何一个地方，识字率的提高往往会增加传媒的影响，而日益增加的传媒影响又“伴随着”更广泛的经济参与(人均收入)和政治参与(投票选举)……实际上，世界各大洲所有正在进行现代化的社会都重复出现……相同的基本模式。……②

由于研究现代化的其他学者，如伊锡尔·普尔和卡尔·

---

① 勒纳：《传统社会的消逝》，第 55 页。

② 同上，第 46 页。

多伊奇等，都非常强调大众交流，并把它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之一，我们感到不得不把它列为专题模式中的一个论题。我们所用的假设是，现代人会有更多机会使自己处于大众交流媒介的影响之下—— 报纸、电台、电影，如果可能的话，还有电视。至于现代人是否因此会避开比较传统的信息和劝诫的来源，如农村中的老人，传统的政治领导人或宗教神职人员，那仍未可断言。有关交流行为的研究经验表明，那些同某些信息来源保持积极联系的人，与所有信息来源（传统的和现代的）接触频率也是最高的。然而，我们十分相信，当需要对不同的信息来源进行评价时，比较现代的人更为相信和最能依赖较新的大众媒介，而不是那么现代的人则更多地依赖比较传统的信息来源。的确，我们预料最传统的人将会把新型的大众媒介，诸如电影等，视为有可能是危险的和有害于年轻人的道德的。

消　　费

在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作用是公民生活中最有问题的一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一再听说，除非大量人口进入货币经济并开始需要和购买现代的大众消费品，否则，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这种论点认为，不然商品市场就太狭小，不足以支持能够有利地经营的民族工业，货币流通太慢，不能满足现代货币制度的需要，税收制度的基础太薄弱，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遇到所谓失控的通货膨胀现象，可能是由于对消费品不能控制的需求，这种需求远远超过生产能力，而且更严重的是远远超过了财富和生产力的增长。结果，国民支出大大超过了国民收入。这些支出到了如此的地步，使它们用于消

费而不是用于未来的生产投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交替出现，形成恶性循环，经济的稳定性受到破坏，进一步投资受到阻碍，接踵而至的必定是经济停滞甚至衰退。

经济学家也许能够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明显矛盾。就我们来说，我们感到自己并不想确定那些主要相信积蓄的人更现代呢，还是那些认为应该用刚获得的收入去购买卧床、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或他的国家中最值得向往也能合理地得到的现代大宗生产新产品的人更为现代。最终我们还是站在倾向花钱的一边。我们预测，不那么现代的人会受他的传统的指导和环境的鼓励，把节俭看作美德，而对追求商品则认为毫无意义，甚至有些不道德的成见。相反，我们预期城市的刺激和在工业中工作会使人们相信，世界上有丰富的商品可供所有的人享用。我们也预测，城市工人比较坚固的经济地位，或许再加上比较容易获得贷款，会促使他们证明自己的消费道德观念的正确性。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收集关于一个人拥有的和希望拥有的商品的资料，并调查他对节俭、对随便花用的看法。

社会阶层的划分

一般对传统社会所下定义是，有封闭的阶级系统，它的极端是拥有严格的种姓结构。流动性极小，人们生来就处于那个地位，直至死亡。儿子继承父亲，代代相传。社会地位和声望主要是依据长期确立的、世袭的家庭关系来确定。权威令人畏惧又受到尊重，而且往往是敬畏，对它恭顺备至。在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里，所有这些社会阶层划分的特征都被认为是完全不同的。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关于社会阶层划分的态度和

价值观念预期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声望更多地以教育与技术能力为基础，人们普遍相信，为了自己，特别是为了孩子，流动是有可能的。向产业劳动或白领工作转变，在大多数亲身经历者看来，是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成为社会的一员，在国家政体中可以与其他人有同等的地位。为了检验我们研究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模式，为了评估人们对于社会阶层划分和社会阶级的态度变化与现代化的影响之间以及与其他领域中的现代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们提出一系列问题去调查与社会阶级和社会流动有关的态度和经历。

心理调整

在对工业化批评者中最普遍的看法莫过于认为工业化破坏了社会的基本纽带，破坏了社会控制，从而造成了个人的迷惑、混乱和不稳定，最终使那些被“赶出”农场并“赶进”大工业城市的人穷困悲惨，甚至精神崩溃。人类学家斯洛特金写道：

> 不管工业化似乎多么兼收并蓄，因为工业化通常都是一种根本革新，但工业化及其支流都会产生文化重组……如果强制性的迅速工业化通常会导致严重的文化失调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个人的失调，那么迅速工业化是否值得？或者说，保持社会和个人的调整能力以维持文化组织是否更为重要？[1]

---

[1] 斯洛特金：《从田野到工厂》，格伦科，1960年，第31页。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说法背后的各种假设。我们的印象是，在许多传统的农村中，谋生的压力实际上只是为了活着而承受的压力，往往是巨大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许多地方的情况肯定是这样的。在智利，接近封建制度的大规模庄园（或即他们所称的“芬多”）里的大部分农业雇工也属于这种情况。最近对农村生活的实地研究及对村民生活的叙述都揭示出猜忌、欺诈、利用、冲突和仇恨，我们很难想象这些必然会导致很好的调整和心理健康。相反，我们却注意到，向工业劳动的转变似乎常常能保证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大的安全。随着向城市迁移而来的是自我表达和进步的机会，以及地位和声望的提高。我们觉得，这些情况实际上会促进产业工人的心理健康，甚至在发展中国家有时发生的混乱背景下也是如此。对比较发达国家中心理健康与职业和地位的关系进行的一些研究所提供的证据，使我们对这种比较激进的立场具有信心。这些研究一致证明，精神病与社会地位以及在工业组织内的地位呈反比关系。换句话说，技术和收入比较高的人一般心理比较健康。

似乎有充分理由可以把从农场迁移到城市工作，从新工人变为有经验的工人，视为地位的提高。因此，有理由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制度紧密结合的有经验的工人也许比仍在农场劳动的人有更好的心理调整。这种意见不能被认为否认初到城市而失去了他们所熟悉的地方的安全感但还没有在工业秩序中找到稳定位置的人，更有可能发生心理抑郁症。

要检验这些看法，我们需要对个人的心理调整进行测量。因此，我们提出几个相当简单的问题，即对自己的工作、社会地位和机会是否满意等，犹如在工业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用来测量心理调整并作为指标的那些问题。不过，我们主要还是依

靠对心理调整进行的简单检验方法，通称社会身心失调症状测验法。事实证明，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对在文化上处于不同情况的个人心理卫生，进行迅速而又简便的诊断。我们也掌握着句子填空测验法。这种方法主要用以测量人际关系中的个性特征，但有时也可用来说明心理调整。

这就是我们对个人现代化的分析模型进行补充研究时使用的全部专题。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我们最初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是把它们视为有关个人现代化题目中互不联系的组合。我们对每个题目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不同的评价。然而，对所有题目都进行检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们有这样的想法，即所有这些不同的题目，至少是其中的一些亚题目，可能反映出现代性的一个共同的基本方面。比较独立于扩大了的家庭的一些人对实施计划生育也会更感兴趣，更易于接受对自然情况发展的科学解释而不是宗教解释，也更能受大众交流媒介的影响。

行为模式

社会学常常被指责为过分抽象，脱离社会生活的具体实际情况。即使在社会学家离开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研究现代化这个领域时，他也必然会在他自己和他对社会行动中的人的直接观察之间，安放一种工具，即他的调查表。只要社会学家愿意对大量的个人进行研究，他就没有很多选择余地。而许多人却过快地把那些仅仅在态度范围内发生了变化的人所发生的变化作为不重要的事。但是，我们不能相信这一点是对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常常受到自己身临其境的舆论气氛的巨

大影响。如果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所听到的全是能导向现代行为的意见，他很可能就会凭其冲动也朝着那个方向行动，即使年长的人仅仅是表达看法而不是自己以现代方式采取行动。然而，我们知道，调查提问不必局限于有关态度的问题。它也可以用来引出有关回答者行为方面的资料，我们十分知道许多提问对象有可能拥护，甚至可能真心实意地采纳现代的态度和观点，但他又很可能在日常的人际关系中继续按照通常的传统方式行动。因此，我们希望尽可能获得我们的提问对象在实际行为方面的资料。我们把为这个目的所收集的材料，称作"行为测量"，把它们集合起来，便构成个人现代性的第三个模型，或称"行为"模型。

根据自报的行为测量，实际上就是按照提问对象陈述他做过某些事情或没有做过某些事情来对他自己进行评价。例如，可以要他说明他是否参加了投票，报告他一星期参加了多少次宗教礼拜仪式，读过几次报纸或听过几次收音机，是否和妻子谈论政治、工作和抚养孩子，谈了多少次。当然，这种自报的行为也往往不尽属实。一个人可能无法准确地记住某事，或者他可能记得很清楚，也会按照他希望产生的印象给你这样或那样的回答。不过，在询问提问对象的观点时也要冒同样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可能，便不把这种自报的行为当作与我们判断一个人的现代性有关的证据。

尽管如此，我们充分感到自报行为测量中有潜在的局限性，所以要我们合理地动用这样一些客观上可以查证的测量方法来补充。这些测量方法中，有些已经列入我们的提问程序，可使我们对所有的提问对象进行评价。例如，一个人报告说，他每

天都读报，听收音机。我们若要检验他的报告有多大准确性，就要让每个人说出几种报纸和电台节目的名称，我们也可以检验他们对新闻中显眼地出现的政治领导人的熟悉程度。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人也有可能确实听了收音机却说不出任何节目的名称。当我们发现这一点时，我们除了能判断他的回答是否真实外，还可以了解到有关他本人的某些重要的东西。

最后，我们通过调查表而获得的有关行为的客观测量，还要用来自外部的资料，特别是来自研究对象所在工厂的资料来补充。收集这种资料本身就存在着一些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将调查局限在每个国家的工厂工人的亚样板中。然而，为了这个亚样板，我们要在工作环境和工厂档案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每个工人表现的资料。在亚样板中，每个工人可以通过监工或其他上级管理人员对他在依赖性、抱负、灵活性、胜任能力、小心谨慎和是否为别人考虑等方面的一系列尺度上衡量高低，而被作出评价。此外，我们查阅了工厂的档案，并且记下了其中有关这个人的生产能力、出勤记录、遵守时间、参加培训以及提升途径等的任何资料。因此，我们试图讨论被许多人解释为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方面——它带来的结果是更艰苦、更有规律以及对劳动技能要求更高的工作，简言之，就在于生产率的提高可能会导致经济的进步，而经济进步被认为是政治和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基础。

结论

个人现代化的三个模型（分析模型、专题模型和行为模型），在我们这项研究的形成中指导着我们的思考，因此它们

的标志在我们提问的内容和调查表的整个设计中一目了然。这三种模型着重的不同情况，对保证我们在每个领域内选择题目的合理的透彻性是有用的。同时，它们又能防止我们用过分狭窄的观点去看待现代化进程。这三种模型之间的不同可以看作相互依赖的变量因素，它们使我们能够十分精确地决定研究那些一般认为产生现代性的影响。这三种模型合在一起，可以作为一种合适的组织原则，其中包括我们这项研究所要探讨的各种题目和领域。确实，它似乎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连接点，把前文提到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我在（表1）中完整地列出了我们的调查表里的主要专题，每个专题用代码加以识别，并按照关系最密切的模型来归类。

尽管这些模型在组织我们的思路时都有用，但它们确实带来了一些人为的，或者至少是武断的划分，它们未必是天生就出现的。这些模型导致我们把某些领域划分成三个部分，而这些领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结合在一起的整体。例如，在讨论观点的领域时，这种三个模型的安排导致我们把与那个领域有关的一般态度当作分析模型的一个部分，把对大众媒介的态度当作专题模型中的一个题目，而把一个人收听收音机的次数当作行为模式的一个题目。有些人显然会把我们提出的三个模型的区别置之不顾，并把所有这些问题当作对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介和观点的一种更全面研究中的不同方面来对待。

应用于任何一个领域的东西确实可以合并起来应用于所有方面。尽管每个模型从理论和经验特征来说本身都是合理的，但所有这三种模型都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更全面、更统一和更基本的方面的体现，可以把所有这三种测量方法的

罢了。事实上，我们的资料分析从经验上对这些看法进行的检验，都证明那些可以称作测量个人现代性的各种方法的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而决不是那么明显的。

人类已经迁徙了若干个世纪，但是，现代的国际性移民不是整个民族的迁徙，而是个人或团体离开自己的社会到另一个能提供更多机会的社会里去寻求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新大陆国家的居民基本上就是以这种方式增加起来的，这是来自旧大陆的脑力和体力的大规模移植。今天，许多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正在从欠发达国家迁移到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去，因为发达国家能够提供他们更多达到自己目标的机会。有人批评当代的这种人口迁移造成了欠发达国家的“人才外流”，剥夺了这些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十九世纪也有人对人们移居城市所遗弃的“荒村”悲叹不已。然而，这种持续不断的重新定居实际上也是全球城市化的一个方面。对那些移居的人来说，为自己达到目的是一种比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崇高的价值观，随着技术熟练工人的迁移，忠诚也从本国转向全球的大都市，而这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所必需的。

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同样起着把许多较小的跨国忠诚纽带同世界联结起来，从而把分割的世界组合起来的作用。一个世纪以前，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只有十来个，今天已经增加到约三千个，如果按目前的这种速度增加，到 2000 年可能会达到一两万个。它们有可能包括宗教、职业和商业等形形色色的团体，把具有共同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只有在全球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们联合起来。这些团体中约有三百个是跨国公司，看来它们要把世界上大部分的制造业和贸易都集中在自己手中。

与国际移民相似，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增多也常常被看作是对旧秩序的威胁。由于没有合适的国际法以制约民族国家内部移民活动的方式来制约国际性的移民活动，因此这种移

民活动被看作是强国欺骗弱国的工具。然而，在较大的意义上，世界范围的商业和职业组织的增多不过是各国内部发展的必然延伸，在一定的时候必然会要求建立机构，以便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予以制约。全球的利益集团正在有力地迫使别人接受它们的要求，因此可以预料，旨在创立全球性政治结构的跨国政治运动即将形成。这种国际力量的产生并非幻想，但也不可能在二十世纪实现。目光较远的人应当把某种形式的国际一体化视作现代化进程跨越国界的延伸。那些关心未来世界秩序的人，应尽可能地了解较早跨入现代化阶段的社会的经验来谋求对他们将要面临的问题作出预测。

18. 工业社会的趋同问题：对当前理论的批判

伊恩·温伯格

〔编者按〕 伊恩·温伯格于1969年去世，年仅30岁，但已成为著名的有深刻历史意识的社会学家。他著有《英国的公学》(1967年)，论及英国教育政策的发展如何对多方面的社会变化作出反应。他还在“不复存在的社会问题”这篇论文中论及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解决。

在有关现代化的著述中，趋同是有重大争论的问题之一。现代化是否一种全球性的溶化剂，把现代以前的价值观和制度消灭掉，还是后者与科学技术、工业化、教育和城市化一同保存下来？国际一体化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继续缩小把社会分割开来的各种差异。

温伯格在本文中对有关趋同的长期争论作了评述，并进一步指出，由于证据的缺乏，目前这一问题还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他建议学者们在今后

的比较研究中继续注意，同时收集有关趋同和趋异的证据。

前言

各个工业社会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个重大问题自社会科学诞生以来，尽管有时不幸地被当作一种假设来对待，但在理论上已经引起人们的重大兴趣。对进步持有乐观态度的启蒙思想家都赞成趋同论，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全"人类"的完善，而不是社会中某些群体的完善。[1] 主张把个人而不是人类看作研究的基本单位，即思考的前提，是一种激进的、反相对论的观点。因为如果世界各地所有的个人都有同样的行动，那么，社会组织的形式必须在本质上有相同的属性，并朝着结构相同的方向发展。从道德上说，善是无处不在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暹罗国王向路易十四派遣使者，但路易十四却没有向暹罗国王派遣使者。"可是，约翰逊在《拉塞拉斯》的文学想象中把外交使团派遣到了阿比西尼亚，大概是为了清除自己思想中的种族优越感。对"高尚的野蛮人"的崇拜不仅是十八世纪浪漫主义的一个成份，它还表明欧洲人，甚至连法国人，也从他们茹毛饮血的同时代人的简朴生活中学到了某些东西。许多人像启蒙思想家那样认为以开明专制君主为形式的国家，能不断改善自己的社会，而且往往把知识分子

① 伯里：《进步的观念》，纽约，1955年；贝克尔：《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堂》，纽黑文，1935年；马丁：《十八世纪的法国自由思想》，纽约，1963年。

这样的中间群体看作君主在实现这一伟大事业中的盟友或顾问。各种社会的政治结构的趋同，即都具有强大的国家、知识的精英和成熟的舆论(此词源出十八世纪革命以前的法国)，看来不是不可能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于米拉波没有将这种幻想付诸实践，幻想未能成为现实，而革命前的那种乐观主义就变成了孔德和德梅斯特尔的悲观主义。① 如果说前者还试图保留他的前辈们的某些乐观主义，那么后者看来至少退到了菲尔默的立场，否认成文宪法的有效性，吹捧君权神授的重要性。②

实际上，启蒙思想家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激进，他们深受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他们为开明专制君主所作的辩护使两种倾向普遍流行。这两种倾向对后来的现代化理论家和主张工业社会趋同的理论家有深远的影响，而工业社会趋同的理论则构成了现代化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首先，他们利用中世纪分权固定性和哥特人野蛮说的神话，那是一种十分流行的浪漫主义思想。这同以能动的态度看待社会的进步变化和开明专制君主集权力于一身形成对照。第二，他们离开了培根、霍布斯和洛克所创始的经验主义传统，断言政治制度都具有民主的基础。他们认为，国家与社会成员是互不相关的因素，把它们结合在一个综合体时便形成了一个最高的政治体系。按照这种观点，其中每个因素握有多大权力在理论上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每一个因素的力量可以测量出来，其稳定性和效率可以用科学术语来解释，并演变成政治体

① 布拉姆森:《社会学的政治背景》，普林斯顿，1961年。

② 德梅斯特尔:《论上帝与社会》，芝加哥，1959年。该书著于1808—1809年。

系应当加以仿效的模式。曾经庇护过君主合法地位的神性已被漠视，因为上帝的影响据称无法测量，是后来演变成为语言哲学观点的一种征象。

启蒙思想家确实按照体系进行思考，因而有助于把牛顿的机械论引入社会研究的领域。他们认为国家就是按照某种体系所组成的社会。在理论上与自然科学进行类比加强了他们的观点。然而，尽管他们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但从本质上看却不属于经验论者。

在十九世纪，进化的理论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和达尔文的影响下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种理论使马克思、斯宾塞和其他学者相信，尽管工业社会的起源不同，却有共同的目标。至于世界上的其余地区，据说由于西方历史和世界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可以期望它们会有相似的发展。[①] 马克思预期，所有的生产过程和社会组织最终都将建立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②] 因此，这些原理的相似性意味着社会结构和功能上存在的趋同。马克思、李斯特、赫尔德布兰德和布赫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阶段理论。这些理论中一个共同的方法论的假定是，各个社会都以一种共同的分阶段前进的方式向工业化发展。[③] 工业化的成功加强了进步的观念，并为此提供了佐证，费伊说，它被人们当作公理来

---

① 马苏尔："从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看西方文明的特点"，载《美国历史评论》，第67卷，第3期(1962年4月)，第608页。

② 霍塞利茨："卡尔·马克思论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发展"，载《社会和历史的比较研究》，第6卷(1964年)，第162页。

③ 施皮格尔："经济发展的理论：历史与分类"，载《思想史杂志》，第16卷，第4期(1955年10月)，第520页。

接受。①但是，文化相对论并没有寿终正寝。韦伯把注意力转向新教的伦理，并指出其他任何宗教中都没有与它相对应的成份，以此来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出现的原因。这毕竟是韦伯对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但是，有关工业社会趋同的解释几乎还没有触及到文化差异，这也许是因为工业化仍局限在欧洲和北美的缘故。这个地区中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同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各国之间的文化差异相比，就显得比较小。此外，经济学家从他们的前辈启蒙思想家那里借鉴了关于人的观念，因而也就接受了有关人类行为的普遍臆断，至少没有关注这些臆断可能受到文化的限制。从某种观点看，他们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理论在构筑理论模式时，可以不受文化相对论的干扰，因而能够大大超越其他社会科学。然而，重要的是，无论经济科学在诸如价格理论等这样一些领域中取得多大的进展，它都忽视了文化，忽视了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这意味着它永远不可能创立起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理论。当然，已经提出的理论往往在西方的发展问题上显示出一定的解释能力，因为这些理论模式的构筑是以历史学的因素和社会学的因素为前提的。只有当这些理论应用到西方国家以外的地区时，它们的前提才会显得令人讨厌地明显。②

这种对知识社会学有限的，因而必然是不完全的侵入，证

---

① 费伊："进步的观念"，载《美国历史评论》，第 52 卷(1947 年)，第 232 页。

② 波斯坦在批评当前经济发展的"离土"模式时指出，"人们所提出的大多数理由都有利于十分强调工业，这些理由都是经济方面的，而大部分经济方面的理由又都是历史的。"见波斯坦："从欧洲农业史看欠发达国家的农业问题"，载《第二届经济史国际会议论文集》，第 2 集，埃克斯昂普罗旺斯，1962 年，第 11 页。

府机构和其他机构中去，国家权力范围的扩大，对普遍了解的技术原理的依赖及类似的整合机制的发展。[①] 我们在往往是有限的和非宏观的目标下进行的社会学比较研究中可以看到许多实证。[②]尽管一些对比较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也有可能假定衡量趋同的不明显的标准，但他们常常决定强调少数趋异现象而忽视趋同的广大领域。对于苏联的研究也许是个例外。这项研究似乎只满足于指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趋同现象。[③]

也许由于缺乏有关趋同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的经验研究，尤其是缺乏先进工业社会的经验研究，所以一些学者受到影响，对趋同的概念持怀疑的看法。[④] 最近出现了一个批评浪潮，甚至否定最有限的趋同。费尔德曼继英克尔斯和鲍尔之后强调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有限的趋同现象。[⑤]霍奇、西格尔和罗西则发现，从 1925 年至 1963 年，尽管美国的劳动力和

---

① 见埃森斯塔特："现代化，增长与多样性"，载《印度季刊》，第 20 卷（1964 年 1—3 月），第 17—42 页；如想了解某些标准的反面论证，可见他的"现代化的中断"，载《经济发展和文化变化》，第 12 卷，第 4 期（1964 年 7 月），第 345—367 页；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纽约，1966 年；斯梅尔塞："变化机制和对变化的调整"，载霍塞利茨和穆尔编：《工业化和社会》，海牙，1966 年，第 2 章，第 32—54 页；多伊奇："社会动员与政治发展"，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 55 卷、第 3 期（1961 年 9 月），第 493—515 页。

② 有关主张进行有限的比较研究的论点，见本迪克斯："比较社会学研究中的概念与归纳"，《美国社会学评论》，第 28 卷（1963 年），第 533 页，他在该文中警告说："许多概念不是真正的归纳。"

③ 索罗金："美国和苏联的相互趋同：向混合型的社会文化发展"，载《国际比较社会学期刊》，第 1 卷（1960 年），第 143—176 页；霍罗威茨："工业发展的社会学概念和思想概念"，载《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期刊》，第 23 卷，第 4 期（1964 年 10 月），第 363 页；迪莫克："苏联的企业管理：与美国的比较研究"，载《公共行政评论》，第 20 卷，第 3 期（1960 年），第 139—147 页。

④ 有关先进工业社会趋同的现有资料，见温伯格："现代化、精英和阶级"，载温伯格编：《英国社会》，纽约，即将出版。

⑤ 费尔德曼："工业社会的性质"，载《世界政治》，第 12 卷（1960 年 7 月），第 618 页。

工业化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但是，对职业声望的排列顺序仍保持不变。霍奇、特雷曼和罗西还证明了工业社会和非工业社会在职业声望排列顺序方面的相似性。① 由于工业社会里发现了家庭体系的多种形态，由于在一些社会里存在的核心家庭体系可能先于工业化，因此，工业化和核心家庭体系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怀疑。② 布鲁默研究了早期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影响，并有意识地驳斥了工业化与社会解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的论点，认为工业化过程对社会的影响"完全是中性的"。③ 戈德索普否认社会分层型式上的趋同现象是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现象，他特别提到了美国和苏联。④ 德·施韦尼茨对工业化与民主之间存在的联系提出疑问。⑤克罗泽在研究先进工业社会的管理组织时，曾强调一些重大的官僚机构模式具有相似的文化由来，而海尔等人则尽管发现了这些一致性，却因文化对于界定管理任务的影响而留下深刻印象。⑥ 克拉克·凯尔及其同事们在回顾他们

---

① 霍奇、西格尔和罗西："1925—1963年美国的职业声望"，载《美国社会学期刊》，第70卷，第3期（1964年11月），第286—303页；霍奇、特雷曼和罗西："职业声望的比较研究"，载本迪克斯和利普塞特编：《阶级、地位与权力》，纽约，1966年，第309—321页。

② 戈德："工业化与家庭变化"，载霍塞利茨和穆尔编：《工业化和社会》，第237—259页；拉斯莱特："人口史与社会结构"，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7卷，第4期（1965年），第582—594页；拉斯莱特：《我们失去的世界》，伦敦，1965年。

③ 布鲁默："早期工业化与劳动阶级"，载《社会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60年），第5—14页。

④ 戈德索普："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层"，载哈尔莫斯编：《工业社会的发展》，基尔，1964年，第97—123页。

⑤ 施韦尼茨：《工业化与民主》，纽约，1964年。

⑥ 克罗泽：《官僚机构的现象》，芝加哥，1964年；海尔、吉塞利和波特："经理任务的文化模式"，载《工业关系》，第2卷，第2期（1963年），第95—117页。

构相似性的困难，他比任何当代的工业化理论家都更敏感。[1]

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似乎是唯一对趋同充满信心的理论家。英克尔斯在他的探索性研究中，把工厂制度和职业结构作为已知的事实，并且运用刺激—反应模式，发现不同国家的人尽管在文化上存在着差异，但对工业化却以一种相似的方式作出反应。[2] 大卫·麦克莱兰的信徒们坚持认为，想要取得成就的倾向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高度的成就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前提。[3]

在社会学家中，列维可能是准备承认趋同可能性的唯一理论家。他说，随着现代化程度的增加，"相对地现代化了的社会之间的结构一致性的程度也随之增加，无论这些发生变化的社会原来的基础存在多大的差异"。[4] 他用列表的方式来表示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个工业社会之间的趋同，并表明它们逐渐地"趋向于某种不可能再高的高度现代化"。[5] 西奥多森表示从列维那里得益非浅，认为非西方社会的瓦解和重新

① 见他所著《社会变迁》，恩格尔伍德 克利夫斯，1963年。

② 英克尔斯："工业人：地位与经验、感性认识和价值观念的关系"，载《美国社会学杂志》，第66卷，第1期(1960年)，第1—31页；又见他的"人的现代化"，载韦纳编：《现代化》，纽约，1966年，第10章，第138—150页；韦斯科普夫："工业机制与个性结构"，载《社会问题杂志》，第7卷，第4期(1951年)，第1—6页；关于对韦伯的"心理学分析"以及寻找十六世纪末期英国清教主义中现代化的心理根源的初步尝试，见巴布"英国人性格的起源"，载《历史心理学问题》，纽约，1960年，第145—218页。

③ 麦克莱兰：《重视成就的社会》，普林斯顿，1961年；莱文：《梦想与行为》，芝加哥，1966年；罗森："巴西的以成就为标准的特征与经济增长"，载《社会力量》，第42卷，第3期(1964年3月)，第341—351页；布雷德伯恩和伯卢："成就需求与英国工业增长"，载《经济发展与文化动态》，第10卷，第1期(1961年)，第8—21页。

④ 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普林斯顿，1966年，第2卷，第709页。

⑤ 同上，第710页。

清楚不过，这是圣西门学派和列宁主义关于智人统治这一格言的重新出现。对于那些对群众的迟钝和落后感到失望的分析家和活动家来说，这一格言始终是他们特别喜爱的见解。[①]

趋同：现代化和进化的功能主义理论

趋同的概念往往与现代化理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反之，现代化理论又常常借助于帕森斯、穆尔、斯梅尔塞、列维和埃森斯塔特的进化—功能模式。[②] 现代化被解释为利用无生命的资源来大量增加人类的成就，从而对相互依赖的社会体系的结构安排产生多重结果。[③] 社会于是逐渐从小规模的、传统的、重视亲缘关系的和相对地说无社会分层的单位，向一个

---

① 圣西门想建立一个"牛顿委员会"，来处理被法国大革命打乱了正常秩序的世界。见他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他同代人的信"(1803年)，载马卡姆翻译与编辑的《圣西门选集》，牛津，1952年，第1—11页。福伊尔认为，这些理论是受经济周期论的影响，见福伊尔："何谓异化：一个概念的来历"，载《新政治》，第1卷(1962年)，第116—134页。

② 穆尔说，功能均衡模式"实际上是有关现代化结果的一组给人深刻印象的归纳"。见穆尔："社会变化与比较研究"，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15卷，第4期(1963年)，第524页；又见帕森斯：《社会：进化与比较的观点》，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斯梅尔塞："社会关系的现代化"，载韦纳编：《现代化》，纽约，1966年，第8章，第110—121页；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埃森斯塔特：《政治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学方面的论文集》，海牙，1961年；"社会的变异与分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9卷，第3期(1964年)，第375—386页；《现代化，抗议和变迁》，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6年；此外可参见他的其他文章；费尔德曼："进化理论与社会变迁"，载巴林杰、布兰肯斯坦和麦克：《发展中地区的社会变迁》，波士顿，1965年，第11章，第273—284页；博克："进化，功能与变化"，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8卷，第2期(1963年4月)，第229—237页；马什：《比较社会学》，纽约，1967年，第29页。

③ 列维说，"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程度，多少要视其成员利用无生命能源的程度，以及(或)利用工具来增加其努力的功效。"见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第1卷，第11页。

有高度分化的组织和任务的大规模工业社会发展。传统的行动体系(诸如家庭等)的范围在收缩,而工业体系(诸如市场等)的范围则在扩大。无生命资源的应用在穆尔的术语中是"强制"社会体系中相互依赖的成份去适应工业化。① 由于有意识的变革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也由于各社会都要解决各种与工业化有关或无关的问题,工业社会乃是各社会的"目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用各种方式否认各个社会间存在着共同的目的。反对这种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反对趋同理论:

一、有人往往不加鉴别地接受进化理论,以此来解答作为均衡分析的功能分析所长期面临的困境。这种解答是有用的,然而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社会学研究往往同横向分析难以控制地联系在一起,而新进化论对于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问题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和有限的解决办法。许多现代化理论所固有的观念都重蹈了启蒙思想家们非经验的和由思想认识导致的错误。这些观念包括科学精英作为一个整体处于支配地位,国家发挥不可避免的和日益扩大的作用,国家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善意促进,以及人们所向往的现代性与传统社会中僵化的野蛮性之间的对立等等。这在克拉克·凯尔及其合作者所写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并提出了工业化精英的类型学。② 即使对相互竞争的精英之间的争夺了解得十分透彻的西尔斯,也在他的一些著作中过分强调了知识分子精英的作用。③ 塞利格曼强调精英们为了达到发展的目的,必须进行

---

① 穆尔:《工业的冲击》,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65年,第12页。

② 见凯尔、邓洛普、哈比森和迈尔斯:《工业化与工业人》。

③ 西尔斯:"新兴国家政治发展中的知识分子",载《世界政治》,第12卷(1960年4月),第329—368页。

“整合”(难道是整合为一个铁板一块的阶层吗?)。[1] 他的基本设想是,社会发展的工作是把精英从群众中分离出来。精英是最杰出的现代化的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国家,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并把群众动员起来。精英分子对现代化的矛盾心理,常常被作为一种残余的反殖民主义而不予考虑。精英分子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的扩大自然相互交织在一起。埃森斯塔特在其著作中对此非常强调。

有趣的是,对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精英的强调恰恰发生在先进社会的分析家们注意到西方存在着精英的时候。[2] 在强调精英时,除了复述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外,还应作一些避免误解的重要说明。如果所有的先进社会确实都出现精英,他们的力量会互相抵消,或者把过多的时间花在谈判上,而不是用于决策上。高水平的教育意味着精英们不能随便以专家自居,因此,他们要付出大部分努力来投身于那些心怀不满和受过教育的外行前面。专门化意味着每个精英——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技术统治的精英——在内部都是四分五裂的。科学精英可能过分依赖政治上的紧迫要求,借以建立一个永久的权力基础。在发展中国家,精英受到国际政治和经济现实的限制,也因不能控制下属而受到限制。[3] 他们对现代性的矛盾心理,可能只是他们在认识上难以合理地协调,因为他们既欢迎变

---

(1) 塞利格曼:"精英的招募与政治发展",载《政治学杂志》,第 26 卷(1964 年),第 612-626 页。

(2) 见凯勒:《在统治阶级之外:现代社会中的战略精英》,纽约,1963 年;古尔德:《技术精英》,纽约,1966 年;关于不同的观点,见达尔:"对统治精英模式的批判",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 52 卷,第 2 期(1958 年 6 月),第 463--470 页。

(3) 戴伊鲁普:"欠发达国家政府活动的局限性",载《社会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1957 年),第 147 页。

革，又希望保留社会的文化。

二、有人认为社会体系的相互依赖被夸大了。然而，实际上只有费尔德曼和穆尔提到了这一点。①就像工业化的定义基本上就是技术化那样，紧密的相互依赖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一种功能－技术－决定的关系。它产生了一种与马克思主义颇为相似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功能－技术－决定取代了经济基础的推动力。有趣的是，历史学家西里尔·布莱克也非常强调技术的重要作用。作为分析社会在早期阶段对工业化适应的一种手段，这样的强调有其优点，但仍然是一种不高明的预言。尽管它在结论中为差异性论证，但它的前提限制了工业社会的多重方向性。另一方面，穆尔和列维等理论家则非常重视传播的作用，尤其是技术传播，尽管批评他们的人抱怨说，结构－功能主义并不承认这一点。但是，记得下面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技术的传播与政治模式的传播一样，都要通过文化的过滤。技术也不例外，因为技术特别依赖抽象的科学原理，所以，它对社会组织产生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

三、进化论设想，社会体系中已经现代化了的各个方面的"幸存"以及那个社会体系朝着工业化和高度现代化的"变化"，能够导致产生"全面转变"的错误观念。趋同理论却相反，认为只要"传统"的行为模式消失，趋同便会发生。理论家有时对帕森斯模式中的变项考虑得过分认真，并为一种从普遍性到特殊性，或者从单一性到普遍性的简单和线性的发展过程辩护。②这种趋同似乎排除了与工业化无关的某个部分或方

---

① 费尔德曼和穆尔："工业化与工业主义，趋同与趋异"，载第166页。

面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全面的"社会变化和工业社会的变化往往使人们不加思考地接受波拉尼和罗斯托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基本上是社会发展的"阶段"论。[③] 例如，泽博特采用了罗斯托的模式，并在对美国、苏联和欠发达国家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说："人们可以合理地期望世界经济将向某些共同的特征趋同。"[④] 根据现代化技术性的定义，没有一个社会能避免这一过程，因为所有的社会至少都要用一点无生命的资源。[⑤] 从长远的观点看，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逃避"全面转变"。阶段论者使用了通常是从西方工业化中推导出来的一些模式，把它们综合成为一套普遍原理。按照其定义，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都在向西方模式趋同。霍奇曾注意到事实上这些理论是中世纪等级思想的再现，它们虽是古物，却未被阻止重新出现。[⑥] 人们只是慢慢地认识到，西方工业化的某些方面，例如具有能动作用的城市化，并不会理所当然地在其他地区也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⑦]

---

② 霍塞利茨：《经济增长的社会学方面》，格伦科，1960 年。社会学理论经常被这种简易的两极对立的划分方法所吸引，见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以及涂尔干的《机械与有机的关联》。

③ 波拉尼：《大转变》，纽约，1944 年；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纽约，1960 年。

④ 泽博特：《竞争共存的经济学：增长引起的趋同》，纽约，1964 年，第 146 页。

⑤ 列维说："现代化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它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见列维：《现代化与社会结构》，第 31 页。

⑥ 霍奇：《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的早期人类学》，费城，1964 年；据说城市革命导致了埃及在文明顶峰僵化和停滞。霍克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史前根源"，载霍克斯编：《过去的世界》，纽约，1963 年，第 491 页。

⑦ 关于城市化在新兴国家中产生的反面影响，见豪泽："城市化研究综述"，载豪泽和施诺编：《城市化研究》，纽约，1965 年，第 1 章，第 1—47 页。

意味着功能上紧密相互依赖的朝向"全面转变"的趋同，因此产生了"重现"的谬见。这是指正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必定会"重现"先进的、已经现代化了的社会的发展过程，因为它们都通过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体系中产生出来的现代化的压力而全面转变。这种模式假定先进的工业社会已经实现了趋同，已经达到了某个极点或某种平衡。这种谬见首先出现于十九世纪的胚胎学，当时海克尔论证说，从生理上说，作为存在的个人在他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将重复全人类的一般发展过程。"重现"必须承认两种思想，一种是承认功能上既相互依赖又有分化的机构领域能成功地整合的思想，另一种是承认积累性成长的前提。与任何其他理论家相比，埃森斯塔特更多使用"整合"和积累性成长这两个概念，有时把它们看作希望，有时又似乎把它们看作是"解围者"。

西方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常常会与这些国家中出现西方的结构相混淆。勒纳把现代化主要看作是交流的过程，他坚持认为制度不可能简单地输出并与新的环境融为一体，但它们会产生转变的效果。他说，"传统社会正在从地球表面上消失，因为地球上的人不再希望按照它们的规则生活。"[①] 他的意思是说，非西方的社会结构太僵化，是反对工业化的，因此必然会阻碍经济增长。然而，纳什对坎特尔新开办的一家工厂所进行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并不一定要打破传统的行为模式。[②]无论工业化是土生的还是外来的，从逻辑上说都不一定要摧毁从前存在的一切。工业化往往有助于摧毁旧事物的过

① 勒纳："制度的转变"，载汉密尔顿编：《制度的转变》，达拉姆，1964年，第14页。

程。人们常常会忘记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即英国在十九世纪中的结构是保守的，冯·兰克就把英国看作是保留欧洲中世纪残余制度最多的国家。[3]

四、趋同的必然论，启蒙思想家的乌托邦理论，"全面转变"论，紧密的功能相互依赖论和"重现"论，所有这些理论往往使现代化理论变成了一种派生的理论和目的论。理论家们有时十分善于预料到这些理论会招致批判。他们为了避免被指责为目的论者，于是用否定趋同论来保全自己。列维由于正确地使用了"结构要素"，便没有被批评为目的论者。因为如果断定这些要素的存在是必需，其结果就是目的论。[4] 但是，分析家们往往对发展几乎有一种控制论的观点，把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看作是投入，以一种恒定的方式来改变体制，并把它纳入预先规定的轨道。正如凯尔等人那样，为了避开趋同问题，他们陷入了一种本质上属于宿命论或纯机遇的学说，既否定预言的可能性，又否定预言的可靠性。其次，趋同事实上不是作为机遇变化的结果，而是作为纯机遇的结果而产生，此事尚不十分清楚。目的论用预先选定的若干变量因素来解释现象使历史不能得到准确的分析，因此这是以点盖面。

五、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认为工业社会里人格的结构是相似的，需要成就的观念是现代经济人似乎都具有的特征。然而，我们所遇到的工业人或企业人都具有普遍的特征。它与十

---

② 纳什：《原始经济制度和农民经济制度》，旧金山，1966年，第110—119页。虽然坎特尔作为一个实验环境完善到了几乎与外界十分接近的程度，但是，连纳什都对自己的实验结果感到吃惊。

③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纽约，1928年，第93页。

④ 见列维："结构功能分析"，载《社会科学国际大百科全书》，纽约，1968年。

九世纪的经济人同样都是文化的反映。[1] 这样的一些分析往往忽视了社会结构，甚至设想社会结构具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以至于只要投入一次成就需要值(N Ach)就会引起令人吃惊的连锁反应。因此，企业家精神在发展中国家里不是没有重要意义，但是，正如巴雷特在对伊博人的研究中指出的，企业家精神可能也是结构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种输入。[2] 结构排列在理论上只是一种假设，它们的特殊性和相似性必须根据事实去确定。企业人的理论通常就是精英理论，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这种理论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

趋同的可能性

至此，我们已论证了以下三个观点：第一，专门用实际经验来证明趋同的研究一直很少。第二，趋同的观念由于同进化—功能说的现代化理论联系在一起而受到妨碍。第三，现代化理论家常常否认工业社会的趋同，而进化—功能说的谬见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现代化社会趋同的想法。

还有两个重要意见需要提出。支持趋同论的经验性研究虽然极少，但可以合理地增加。其次，只要人们牢记，由于各个社会在工业化过程开始以前就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它们可能随着工业化而实现趋同，那么，一些从实际经验研究中获得的证据看起来好像是否定了趋同的观点，诸如最近在有关职业声望排列顺序的研究中所获得的证据，实际上可以用来支

① 勒纳："制度的转变"。

② 巴雷特："伊博人在接受工业化中的成就因素"，载《加拿大社会学和人类学评论》，第5卷(1968年5月)，第68—83页。

持趋同论。如果我们把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社会群体加以比较，如果不把趋同的概念说得那么绝对，那么情况尤其如此。先进社会与欠发达社会之间的差距，以及对这两种社会都做出概括的尝试，掩盖了以下事实，即大规模的工业化即使在西方也只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工业化早期阶段能被观察到的趋同现象十分显著。由于大规模的工业化最近才开始，这一事实必然会否定现代性和传统性之间的完全对立，同时却也强调了趋同的相对性。工业社会为什么如此复杂和各不相同，原因之一就是前工业的结构并没有消失。趋同的相对性还必须与年代顺序的认识结合起来。人们常常讨论工业化的先驱国家和较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好像它们之间的唯一重要差别就是后者在经历相同的进程时具有某些有利的条件。然而，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在实现工业化的时间上相对地说并不悬殊，这表明在一定的技术和社会结构下工业化进程的方向必定是相似的。今天试图实现工业化的一批国家尽管目标同先驱国家相似，但是可能要经历完全不同的过程。这些国家同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可能要对传统发动激烈得多的冲击。我们大家都知道，先驱国家所共有的那种结构安排，例如被英克尔斯假定为工业化条件的集中的工厂、工业城市和劳动力等，一些较晚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根本不存在这些特征。

其次，构成理论所使用的演绎方法否定了趋同论，但在逻辑上又引导到趋同论。它忽视来自实际经验的证据，因而难以通过增加新的资料将理论进一步加以发展。应该强调的是，这是对构成理论的这种方法所作的批判，而不是对功能主义的批判。正如贝尔肖所指出的，正在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中一个反

有一种限度。他否认派生性的趋同，而主张“依赖性的趋同”，把这种趋同描述为“从不同的来源中产生出来，但受到共同文化媒介影响的那些相似性”。③ 工业社会和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社会之间的趋同也许就是从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的某些有限可能性中产生出来的相似性，尽管这个过程发生的时间各种各样或工业化过程之间存在着的差异是明显的。这种相似性应当从实际经验中推导出来，不含有目的论，也没有共同的、贯穿其中的或作为基础的对应物。趋同的概念基本上是适应的有限可能性与起源的多样性所形成的对比。趋异也是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有可能发生变化中的变异，虽然并不会发生完全的混乱。但愿我们将进行比较研究，既认识到趋同，也认识到趋异，而不是先在理论上排除其中的任何一种可能性。

② 戈登威泽：“文化发展有限可能性的原理”，载《美国民间文学杂志》，第26卷(1913年)，第259—290页。

③ 同上，第269页。

19. 相互依存关系是神话还是现实?

理查德·罗塞克兰斯和阿瑟·斯坦

〔编者按〕 理查德·罗塞克兰斯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国际和比较政治学教授兼形势分析中心主任，著有《国际关系：和平还是战争?》(1973年)。阿瑟·斯坦是形势分析中心的副研究员。

生活在石油短缺和国际性通货膨胀时代的人们看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强。但是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政治的学者仍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本文提供的新资料意欲证明，在过去五十年里，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某种形式显然有所发展，并对政治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民族主义仍然非常强大，以致罗塞克兰斯和斯坦对于民族国家是否有能力应付合作的挑战表示怀疑。虽然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在增强，但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制约这类活动所必需的经济机构仍然非常落后。

向将产生什么结果，尚难确定。我们希望本文能提供新的资料，对各执一词的主张稍作调和，试看能否在它们之间起一种平衡作用。

关于相互依存关系中不能解决的分歧问题之一是对这个名词没有公认的定义。人们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见解。按照最通常的意思，相互依存关系是指利益上的一种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其他国家也要受这种变化的影响。[6] 第二种意义来自经济学，指一个国家对外部经济发展的"敏感性"增强时，就出现了相互依存的关系。[7] 这种"敏感性"可以觉察得出，也可以觉察不出。[8] 最严格的定义是由肯尼思·华尔兹提出的，他认为相互依存关系是一种需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解除的相互关系。[9] 这种定义在两个意义上与其他定义不同：(1)它假定在相互依存的单位之间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关系，因此，如果这种关系受到损害，各方都将受损失；(2)按照华尔兹的定义，这种一方受到另一方行动影响的相互关系不一定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因为这种影响可能不是"代价很高的"。由于人们对这个主要名词使用了不同的定义，因此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当代世界中是否存在着相

⑤ 见基奥恩和奈：《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注 4；金德尔伯格：《跨国公司》，注 3。

⑥ 这个意义接近莫尔斯和扬提出的那种说法。莫尔斯写道："当两个或两个以上部分(个人、政府、公司，等等)的特定行动互为因果关系时，这种行动的结果就可以理解为相互依存的行为。"见莫尔斯："跨国的经济过程"，第 29 页，注 4。又见扬："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载《国际杂志》，第 726 页。

⑦ 见库珀：《相互依存关系经济学》，第 59 页。

⑧ 又见托利森和威利特："国际一体化与经济变项的相互依存关系"，载《国际组织》，第 27 卷(1973 年)，第 255－271 页。

⑨ 见华尔兹："相互依存关系的神话"，载金德尔伯格编：《跨国公司》，第 205－207 页。

互依存关系得出不同的结论。

与此同时，华尔兹得出结论说相互依存关系的程度很低或正在下降，这种说法甚至可以根据他本人使用的严格定义来引起争论。华尔兹的论点大致如下：凡是有劳动分工或功能专门化的地方都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这些单位不像那些履行不同功能或提供专门性服务的单位，在相互提供服务并且依赖各自的专门化时，就产生了相互依存关系。相反，如果各个单位是相同的单位，它们不能提供不同的商品或服务，那么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减弱了。华尔兹还断言，当各个相同单位的能力不相等时，它们的相互依存关系最弱，于是这些国家不可能也不会彼此考虑。因此，国家如果在法律上是相同的单位，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之间的实际能力有了更大的差异，现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处于最低点。然而，这并不令人惊愕，因为有人坚决主张，"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会增加和平的机会"是"错误的结论"。① 把这一论点归纳起来，那就是当(1)各单位不相同和(2)各单位能力比较相等时，相互依存关系的程度高。

有些评论可以提出反驳。首先，如果完全从积极的意义上(即各个国家利益的不同是直接的，而不是反向的)考虑相互依存关系，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怎么会成为冲突的原因。如果相互依存关系的破坏确实使各方付出很高的代价，这倒将会成为促进全面国际合作的一个因素。其

① 华尔兹："相互依存关系的神话"，载金德尔伯格编：《跨国公司》，第205页。

次，如果确实是不同的单位之间产生关系时相互依存的程度可能高，那么也并不能讲明白，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异就是高度相互依存关系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形式，即军事联盟，就是在各国彼此提供同样的防务资源时形成的。通过集中使用这些资源，它们获得了单独使用时无法获得的共同安全，然而，这里无需劳动分工。显然，这种防御纽带的破坏会付出很高的代价。[①]

如果军事联盟的关系无可怀疑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那么敌人或对手的关系中便会表现出高度的相反的相互依存关系。假如一方的地位增强，另一方就要遭殃，因而它们的利益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在存在这种高度相互依存关系（反面的）之处，也未必有功能差异或分工。恰恰相反，对抗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之所以产生，部分原因是对立双方旗鼓相当：它们为同样的目标而竞争，利用相同的技术，力图战胜相同的联盟，或试图获得相同的地盘。而且旷日持久的竞争很有可能使它们更相似。最后，对手之间甚至还会产生出某些确实是相互依存的目标。如果它们都处于各国等级阶梯的最上层，那么阻止其他国家削弱它们的共同地位便成为一种共同利益。如果战争有可能互相造成大规模的破坏，那么它们在相互妥协与和平共处方面便有一种共同利益。

有人也许会争辩说，当代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最高度发达的国家之中，而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之间具有最大的相似性。从军事上说，这些国家有能力彼此造

① 奥尔森和泽克豪泽："联盟的经济理论"，载拉塞特编：《国际政治的经济理论》，芝加哥，1968 年。

为市民获得最大程度的福利时，它们必然常常会轻视其经济和政治伙伴的利益。公民们可能也会反映出这种态度。他们并不是指望国际体系，而是指望本国的政府来谋得经济和政治利益。社会主义、国有化和国内的经济计划都会把本国的标准强加给国际经济力量。自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以来，几乎用任何一种定义来说的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都已增强。这种发展对相互依存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人们也许由于所有这三种定义，预期民族主义会削弱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们也许会论证，如果各国只图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顾及世界体系的其他部分，那么，各个单位之间的联系肯定要削弱。然而，如果民族主义的目标要依靠国际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支持行动来实现，那么，民族主义就不能孤立地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依存关系不仅不会削弱，富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反而可能导致较高的反面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二十世纪民族主义的增强并不需要削弱相互依存关系。我们仍然不知道相互依存关系将增强还是削弱，也不知道相互依存关系将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本文下面几节将要专门讨论过去一个世纪的统计资料和发展情况，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回答这些问题。①

---

① 相互依存关系也可能因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增强。见斯科尔尼科夫：《技术的国际作用》，伯克利，1972年；又见他准备在1970年9月在洛杉矶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第六十六次年会上发表的"未来技术的国际功能含义"；鲁杰："集体财富与未来的国际合作"，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66卷(1972年9月)、第874—893页；邓宁："技术、美国的投资与欧洲的经济增长"，载金德尔伯格编：《跨国公司》。

贸易部分

如果我们想对目前的相互依存关系有较深的理解，那么贸易部分将是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有人断言相互依存关系的程度很低或正在削弱，这些人的论点之一是，国家的工业化，至少在其后期，意味着对外贸易的依赖性会不断减弱。随着制造业经济的发展，各国更加依靠自己制造必需的商品，更少依赖向其他国家进口。卡尔·多伊奇和亚历山大·埃克斯坦在一项开拓性的研究中试图用过去各个时期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测量这种现象。[1] 他们的结论是，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所增加，但在国家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则有所下降。

然而，多伊奇和埃克斯坦所用数据是否证实了他们的结论，却不能肯定。例如按照这两位研究者提供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时在几个国家的数据中十分接近最高点。[2] 而且，多伊奇和埃克斯坦的研究是以当前的美元数为基础的。[3] 上个世纪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往

---

① 多伊奇和埃克斯坦："国家工业化与国际经济部门比重的下降，1890－1959年"，载《世界政治》，第13卷（1961年1月），第267－299页。

② 又见利普西：《美国对外贸易中的价格和数量趋势》，普林斯顿，1963年，第39—44页。

③ 没有什么标准可以用来确定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以何种比率更为正确，其中一种是以当前的美元价值为基础，另一种是以不变美元价为基础。在有限制的情况下，如果以当前美元价值为基础，这个比率会趋于零，这同用不变美元价为基础时表示出仍有相当数量的对外贸易没有关系。（对此我们要感谢理查德·N·库珀）然而，在多伊奇－埃克斯坦的研究中，即使以当前美元价值为基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比率也是相当高的。因此，以不变美元价为基础去考虑更能说明问题。

往会使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抬高，但由于运输的革命性进步，进出口价格并没有急剧上升。[①] 因此，罗伯特·E·利普西按照1913年的不变美元价对美国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重新计算。正如表1所示，对外贸易所占的比率并无长期下降的趋势。

表1　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每十年的平均值

（按1913年的不变美元价计算）

	出口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1880—1889	6.25
1890—1899	7.24
1900—1909	6.64
1910—1919	7.69
1920—1929	6.35
1930—1939	5.06
1940—1949	7.93
1950—1959	6.65

资料来源：见利普西：《价格和数量》，第430－431页。本表制作时使用库兹涅茨关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由于库兹涅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估计偏低，因此，官方统计无法用来扩大库兹涅茨一系列统计数字的范围。

依据其他基础进行的计算也证实了同样的结论。表2说明美国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在1970年前甚至呈现出略有增长。

① 下表说明最近十年出现了这种现象：

1970年若干国家的进口、出口和消费品价格（单位：美元，1963年＝100）

国家	出口	进口	消费品价格
日本	110	106	149.5
西德	114	110	120.4
法国	112	107	130.9
英国	112	110	139.3
美国	121	120	128.9

资料来源：《国际财政统计》，第24卷（1971年12月），第32、33、35页。

人们得知在计算十九世纪的比率时压低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因而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被抬高，因此关于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并没有下降甚至还可能增加的结论更为有力。多伊奇和埃克斯坦承认，他们对国民生产的估计“往往低估经济中的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1] 他们准确地指出，工业化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很多是由于服务部门的增长，但是在计算上一世纪国民生产总值时，就是这个部门却被大大地低估。因此，要把现有资料与高度工业化造成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下降的结论相符是很难的。

表2　　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每十年的平均值

（按1958年不变美元价值计算）

	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1930—1939	4.91
1940—1949	4.34
1950—1959	4.93
1960—1969	6.06

资料来源：美国政府：《总统经济报告》，1972年。表中显示的比率较低，是因为使用了官方的没有压低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数。

然而，即使许多发达国家与外国的关系非常密切或正在增强，贸易结构的变化仍可能导致较低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说相互依存关系只有在破坏这种关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时才存在的话，那么有人可能会认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贸易同今天相比更具有真正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典型的贸易交往也必须包括用工业品交换原料，而今

---

[1] 见多伊奇和埃克斯坦："国家工业化与国际经济部门比重的下降，1890－1959年"，载《世界政治》，第13卷，第210页。

天的世界贸易中，有很多部分包括发达国家之间的制造品交换。既然从理论上说，这些国家能够采取替代进口的计划，人们就可认为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减弱了。[①]

确实，制造品的贸易随着时间而大大增加。表3说明自1950年以来全世界初级产品、石油和制造品出口的趋势。初级产品的出口几乎翻了一番，石油出口几乎增长三倍，制造品的出口却增长到七倍。

这些趋势可以从表4中得到证实。该表说明，自1954年以来，原料在发达国家的进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而工业制造品的比例则已上升。毫不奇怪，制造品贸易的日益增长是同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增长相联系的。表5说明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在最近三十年中的增长最为引人注目。

表3　1950年至1969年世界制造品、石油和初级产品出口趋势

（单位：10亿美元）

	初级产品	石油	制造品
1950	30.28	—	22.97
1955	31.13	8.59	33.77
1960	36.71	10.63	57.74
1965	46.02	15.05	92.45
1969	56.02	21.54	149.73

资料来源：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华盛顿特区，1971年。从1955年开始，石油归入国际贸易标准分类的第三部分。这份资料不包括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贸易。将这些结果与赫施曼提供的资料进行比较是饶有趣味的。见赫施曼：《国力与外贸结构》，伯克利，1945年，第141-145页。赫施曼发现自1913年至1937年，各

① 见华尔兹："相互依存关系的神话"，载金德尔伯格编：《跨国公司》，第210页。

然而，这些趋势与相互依存关系并未增强的结论是符合的。工业国家具有灵活的经济，可以不付出很大的代价就能减少彼此的依赖。但是，这还必须考虑到另一个论点。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主要在于交换制造品，但它们在贸易中对一些具体国家和具体商品的依赖也正在加强。阿尔伯特·赫施曼使用过一种指数，从100(即某个国家只对一个贸易伙伴出口)到很低的数字(某个国家对许多国家的贸易平均分配)。[1]这种测量法通称吉尼系数，即用某个国家的那部分贸易数额平均数总和的平方根乘以100。它的上限是100，下限如假定贸易额在一百个国家之间平分则为10。1945年，赫施曼用它来计算一个国家的贸易对另一个国家的依赖程度。十三年后，迈克尔·迈克利对各国对某种具体商品贸易的依赖程度提供了一种估计。[2]我们于是根据这些新的资料修改了1961年到1968年的估计。这些证据是无可争议的：最近发达国家之间制造品贸易的增长并没有使它们的经济摆脱一些供应国，也没有减少它们对某些具体进口商品的依赖性。人们或许会感到奇怪，工业国家的贸易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一些具体国家，而且总的说来更加依赖某些具体商品的供应。欠发达国家可以增强它们在这个体系内部的独立性。表6说明某几个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赖同某些具体国家进行贸易的吉尼系数的变化，表中分别提供了进口和出口的指数，说明贸易在地理上的依赖程度。

---

① 见赫施曼：《国力与外贸结构》，第98—100页。

② 迈克利："进出口的集中"，载《经济杂志》(1958年12月)，第722—736页。

表 6　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在地理上集中的吉尼系数的变化

(1954 年　1968 年)

	出口	进口
德国	3.5	4.2
日本	9.9	−7.3
法国	4.4	8.8
意大利	6.2	2.2
英国	1.9	1.0
美国	5	4.9
巴西	−4.7	−1.2
墨西哥	−15.1	-17.1
加纳	−10.8	−19.4
土耳其	−1.6	3.2

1954 年的数据依据迈克利："进出口的集中"；1968 年的数据是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贸易方向年鉴：1966 年—1970 年(华盛顿，1971 年)的资料计算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除了对日本的进口外)，吉尼系数的变化都是向正面发展的，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在地理上更集中于某些供应国和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吉尼系数表明，除土耳其外，各国的贸易在地理上变得不大集中，因此它反映出依赖程度较小。表 7 为对某些具体商品贸易的依赖性提供了相似的证据。

除法国和英国的进口变化外，过去十年中主要发达国家商品集中的程度已有增长：同以前相比，发达国家现在更加依赖某些具体商品的进出口。发展中国家没有显示出这种情况，

墨西哥对具体商品进出口的依赖显著地减少。这些调查结果修正了关于工业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减弱的结论。发达国家中的贸易集中正在增强。供应国和市场的多样化较难达到。就此而言，所有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增强。①

表 7　某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在商品上集中的吉尼系数的变化

（1961 年 -1968 年）

	出　口	进　口
德　国	1.21	0.53
日　本	2.98	0.93
法　国	1.18	--0.95
意大利	0.03	3.27
英　国	0.04	－0.81
美　国	2.86	3.86
巴　西	－0.19	--1.49
墨西哥	－21.14	－2.92
加　纳	－1.38	－3.68
土耳其	8.98	－6.77

资料来源：《国际贸易统计年鉴》，1961--1968 年，注 23。

还有一点。测量相互依存关系最令人满意的方法并不是

① 总的说来，外贸部门对于衡量相对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用处似乎不像过去分析家们所主张的那么大。尽管发达国家中的对外贸易正在相对地和绝对地增长，但这种贸易只体现制造品的交换。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如果政府能在若干工业国家中找到替代进出口市场的东西，那么，集中的日益增强的影响不一定会增强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即使在经济上存在着替代性，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还存在着政治代价问题以及这一过程中涉及到的政治范围问题。关于对用贸易来衡量一体化的著作所作评论和极好的书目，见克拉克和韦尔奇："作为衡量一体化的一种尺度的西欧贸易：对各种解释的整理"，载《冲突问题杂志》，第 16 卷（1972 年 9 月），第 363－382 页。一体化理论家们也许会发现考察贸易和其他跨国经济部门，包括下文提到的那些部门，都是有益的。这种尝试之一在托利森和威利特的"国际一体化"中作了概述。

衡量这种关系破裂时所付出的代价，而是经济利益对彼此的直接作用有多大。如果A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B是否受到影响？在十九世纪，经济单位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但政治统治者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他们的单位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忽视了外部经济变化对国内经济体系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社会内部的政治变化使政治领导人不可能忽视外部经济力量对国内的影响。因此，他们今天对外部经济变化作出强有力的反应。现在，经济的影响在政治领域中已被充分理解。所以目前在政治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远远超过了十九世纪。

投资部分

投资部分也显示出相似的模式。那些认为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减弱的人可以表明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海外投资模式的变化。[①] 那些断言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增强的人则把注意力集中在最近对外投资的巨大增长和投资模式的变化上。[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外投资的增长中有很多是直接投资（这种投资能导致外国公司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中的一个重大部分）。相反，有关十九世纪末资本流通的主要权威著作却说，"在1914年前，长期投资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证券投资而

① 例如，华尔兹指出，"在1910年，英国海外投资的总值比它的国民收入大一倍半"，然而，美国目前只占18%弱。见华尔兹："相互依存关系的神话"，载金德尔伯格编：《跨国公司》，第215页。

② 见库珀：《相互依存关系经济学》，第3、4、5章；莫尔斯："跨国的经济过程"，载基奥恩和奈编：《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第36—37页。

表 8　美国投资在地理上的集中

(1929 年—1959 年)

	1929	1936	1943	1950	1959
吉尼系数	33.02	34.41	34.20	34.68	37.60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美国在外国的商业投资》，华盛顿特区，1960 年，第 92 页。1959 年以后的数字或许会表明集中程度更高，但商务部的统计不再按逐个国家列出投资数字。

了。[①] 直接投资比证券投资意味着与外国有更大的利害关系。对制造业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投资使美国投资者的活动和关注集中在狭窄的范围内。它同某些特定的市场和特定的各种企业有了更大的利害关系，要比过去付出更大的代价。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绝对增长与它的其他国民生产总值指数的相对增长是一致的。以国内当前美元价格或不变价格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对外投资部门已有迅速的增长。表 9 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以 1950 年为基准年，这些相对的增长率更加显著。

随着美国直接投资帐面价值的惊人增长，美国对外机构活动量的增长也超过了它对国内的关注。[②]1957 年与 1968 年间，国内销售量增加不到一倍，而制造业部门在国外的销售量却上升了三倍多。1968 年，制造业部门在国外的销售量为国

① 当然也可以认为，供方国家和买方国家的数量减少不一定会提高对美国这种业务交往的费用。有些资源可能比较便宜，但这种情况确实减少了美国在政治上的主动性，缩小了美国的政治活动范围，从而使它的利益与剩余的资源供应或市场有更紧密的联系。

② 见本文附录表 F。

内制造业销售量的10%。

表9　1968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指数

（1959年＝100）

按当前美元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179
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148
对外直接投资	21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美国在外国的商业投资》，第92页，注35；《商业概况》，第50卷（1970年），第28页；《总统经济报告》，1972年，第195—196页。

表10　1968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指数

（1950年＝100）

按当前美元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303
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	199
对外直接投资	551

资料来源：同表9。

美国各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收益的增长也快于对国内投资的收益。自1950年以来，各公司的国内利润增加了50%，但对国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却增加了450%以上。[①]到1969年，国

① 见本文附录表G。

外直接投资的收益已增加到占国内投资收益的28%。[1]

其次，对于对外经济部门愈益全神贯注，并不限于美国。多国公司的发展已经如此引人注目，以致"今天(世界上)最大的五十个经济实体中，有三十七个是国家，十三个是公司。在一百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就有五十一个是公司"。[2] 据估计，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由它们的母国在国外的这种企业的业务创造的。[3]

当然，对外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自1913年以来确实是减少了，但这种投资类型的出现也使资本的所有者在对外部门有很大的利害关系。与十九世纪的情况相反，目前的对外投资不仅仅是贷款，而且是部分的所有权，其中包括对生产机构的控制。技术转让现在是直接投资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既然技术投资如此重要，如果技术的所有国要威胁它们，那将是莽撞。但是，既然关系的破裂要付出如此高的代价，那么，相互依存关系也肯定很强。

当相互依存关系不突出的时候，它的政治意义也不大。1913年，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只有很低的政治特征：政府不会对外部经济的影响作出反应，也不想加以控制。因此，1913年极高的投资额并没有多大的政治意义。今天，对外投资部分的增长率以及政府的政治反应能力的不断增强使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和意义。

---

① 如果把来自国外其他(非直接)私人资产的收入计算在内，可能会高于28%。

② 布朗："民族国家、多国公司和世界秩序的变化"，美国农业部油印本，1968年，引自麦克黑尔：《跨国世界》，奥斯汀，1968年，第8页。

③ 弗农：《处于困境的主权》，纽约，1917年，第383页。

金融方面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经济体系的金融方面的运作有了很大的变化。在1880--1913年的金本位制下，短期资本流动既不像最近几年那样广泛，也没有那么大的破坏性。[①]能够用作"流动资金"的数量现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关资料表明有710亿美元的各种货币(主要是美元)可用作短期交易。这些数额巨大的资产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个国家，很容易会破坏国内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力量。1968年，流入西德的国外资金多达国内货币供应量的8.9%，使各种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尝试大大受到限制。同年法国有22%的国际储备外流，迫使法国中央银行中止扩张主义的政策。[②]1972年7月的投机活动对美元造成极为紧张的局面，致使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只在一天之内就购入15亿美元来防止美元价值低于1971年12月18日史密森协定所规定的水平。[③]不到十四个月后，投机活动迫使美元又贬值10%。德国在一天中就吸收27亿美元来交换马克。史密森协定一度似乎是个长期解决办法，现在已被抛弃了。

如果要使这种带有巨大数量集合货币的突发性投机活动不致破坏国内的货币稳定和经济进步，而且或许不致引起整个世界贸易体制的崩溃，各国政府必须协调它们的反措施。在

---

① 见布卢姆菲尔德：《国际投资浮动的模式》，第37页。

② 见克劳斯："私人国际金融"，载基奥恩和奈：《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第181—183页。

③ 《纽约时报》，1972年7月19日。

过去五十年中，不断增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导致产生了借款总协定（GAB）、各种货币互换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的扩大，以及实行特别提款权（SDR）。然而，这些措施以及其他各种悬而未决的措施能否将充分控制西方和发达国家的短期资金流动，尚难肯定。贸易金融结构的相互依存关系正在增强，但要保证它不致成为一种反向的相互依存关系，各国政府必须进行更高度的合作。[①]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其他变化使这个体系有所转变。旧的金本位制（当然）是以黄金作为交换媒介的。外汇作为储备，被最低限度地使用。1913 年底，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仅为 96300 万美元，其中一半以上为俄国、印度和日本所有。[②] 相比之下，官方的黄金拥有量是这个数字的五倍多。[③]随着向金汇兑本位制的发展，国家储备占外汇拥有量的比例急剧上升。附录中表 I 清楚地表明在 1945 年，黄金占国际储备的 70%，而外汇在储备总额中只占 30%。可是，到 1971 年底，黄金只占世界储备的 30%，而外汇却占 60%，新类型的国际储备（特别提款权和黄金份额）占 10%。

如果同这些年份世界贸易的增长联系起来分析，这些数字甚至更有启发意义。1945 年，非共产主义世界的世界出口总额为 342 亿美元。到 1971 年底，世界出口总额估计为 3340

---

① 见斯特兰奇："美元危机：1971 年"，载《国际事务》，第 48 卷（1972 年 4 月），第 194 页。

② 布卢姆菲尔德，《国际投资浮动的模式》，第 7 页。

③ 同上。林德特认为外国货币的使用相当广泛从而对传统的看法（以及阿瑟·布卢姆菲尔德的看法）提出异议。然而即使林德特提供的 1913 年的资料，也表明只有 113200 万美元的外汇储备，占世界总储备的 15.9%。他也认为这些官方外汇余额有一半以上由俄国、印度和日本控制。见林德特：《主要货币与黄金，1900—1913 年》，普林斯顿，1969 年，第 12、13、76、77 页。

亿美元，是1945年的9.77倍。这意味着1945年以来世界出口的价值每八年增加一倍多。这种增长比外汇拥有量的增长率高一倍多，比国际总储备的增长率高三倍多，几乎是黄金拥有量的增长率的八倍。1945年，国际总储备比世界出口总值多39%，到1971年底，国际总储备只有一年出口总值的40%。因此，国际储备拥有量赶不上贸易的增长速度，而它们之间的增长速度之所以保持着这样的差距程度，是因为外汇拥有量的巨大增加。

这种变化也表示国际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黄金是无差别的资产，它可以从任何部门取得，也可以用于任何部门。一个国家必须全面控制其贸易，而不是针对一些特定的国家。今天，双边贸易关系变得更加重要，在进行那种贸易的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加强。更重要的是，当这些国家的货币用作交换媒介时，它们有责任控制自己的金融政策，其他国家在其偿付能力上也有金融方面的直接关系。在国际交换中，后者要尽量不使储备货币跌得太低。因此，对于英镑和美元要采取保值措施。现在，瑞士法郎、德国马克和日元都已经用作储备，维持这些货币储备的价值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有利害关系。这些货币可能在稍后一个阶段采取保值措施时获利。十九世纪拥有黄金不会产生与此相同的利害关系，也不会产生相同的相互依存关系。各国政府由于认识到了这种对货币的依赖性，现在已经建立了新的储备单位——特别提款权(SDR)。它的使用与进一步扩大，完全取决于国际协定。现在，金融体系中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变得正常了。

政治部分

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发展自1913年以来有两个主要趋势。在1919年和1939年之间，主要趋势基本上是强调各国的支配地位，首先从政治上，然后从经济上力图减少它们对其他国家的依赖。由于战前联盟的作用不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强了各国依靠自己的趋势。三十年代出现的和平时期的结盟对危机和战争时期没有多大意义。诚然，与这个联盟对立的主要强国只有德国和日本。苏联、法国、英国和意大利都摇摆不定，美国则仍然置身事外。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逐渐认识到，如果没有帮助，它们就无法确保自己的防务安全。国家的自给自足再也不能提供完全的保障。紧跟着广岛事件，许多国家还得出结论，大战是如此可怕，以致它们无法承受。从此以后，甚至在敌对国家之间，最低限度的合作也必不可少，为消弭和处理危机作出了安排。

然而，近年来，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并不是由于军事上的刺激而增强的。甚至可以说，公众与统治者的疏远也增强了这种趋势。当代的政府依赖的这样一种信息和专门技能的财富使街道上的普通人来不及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更不用说能够作出精确的判断。在这些情况下，选举逐渐变成象征性的过程，基本上失去了思想内容。既然人们不能充分了解他们的政府，他们往往会不信任它们，并憎恨那些当权者。但是，对国内当权者的不信任并不导致对国际的忠诚和支持产生新的中心。如果各国的政府机构固定不变，那么国际和

去更为重要"。[1] 当上层统治者向外看时，群众却要他们的民族政府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卡尔·凯泽称之为(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纵向相互作用"，这种情况在近几十年来大有增加。凯泽论证说，"如果不存在纵向相互作用，(世界政治单位之间)高度的横向相互作用便不可能导致产生国家之间的政治"。他接着说："民族政府采取干涉主义的程度越高，政府的政策在国际社会层次中的推行也就越脆弱，因为国际社会可能反对这些政策的实施。民主结构加强了这种关系，因为它迫使政府必须对动乱作出更积极的反应。"[2] 于是他得出结论说，民族国家参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是横向和纵向相互作用的乘积的一个函数：国家参与国际政治＝横向相互作用×纵向相互作用。[3] 这个等式表示：如果纵向相互作用增强，而横向相互作用保持不变，那么国家之间的政治将会加强。但是，如果说国家之间的政治就是衡量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任何一种尺度，那么这个结论是难以接受的。如果纵向的结合和相互作用大大增强，例如建立一个极权国家，那么国家之间的政治几乎肯定会减弱而不是增强。这种纵向相互作用的增强可能会促使与其他国家和社会的横向相互作用减弱，也会阻止国际主义的增加。受到革命冲击的国家最不易同其他国家和社会发生横向相互作用，决非偶然。如果国内专心致志于纵向的革命过程，那就往往会割断同其他机构的联系。在具有高度纵向结合的共产党国家里，"政府机构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长

---

① 见华尔兹："相互依存关系的神话"，第 208 页。

② 凯泽："跨国政治：多国政治理论"，载《国际组织》，第 25 卷(1971 年)，第 812 页。

③ 同上。

期干预"走得最远，它们与其他国家和社会发生的横向联系最少，这也是毫不奇怪的。因此，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纵向相互作用总是增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

结论

今天的地球在一个民族主义的世界和一个国际主义的世界之间保持着平衡，民族主义进程中的纵向相互作用走向新的高峰。国家之间进程中的横向相互作用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都强，而且正在迅速地增强。正如凯泽和莫尔斯所指出的，① 纵向相互作用使横向相互作用与政治和政府的目标发生关系。如果纵向相互作用没有这么大，世界也许就会回到 1913 年非政治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去。然而，国内的社会变革和纵向相互作用的进一步迅速增加不但不会增强国家之间的政治，反而会使它终止。

国内政府处于纵向相互作用和横向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由于满足选民并获得国内支持的愿望，它们被迫向某个方向努力。由于这一体系中高度的横向结合，它们又被迫朝另一个方向努力。如果它们要应付当代重大的跨国现象——多国公司、私人金融转让的无比巨大的影响以及继续贸易的问题——他们必须相互合作。这两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各国政府要在经济和财政政策上满足选民的要求，它们可能要更充分地与其他国家合作。然而，在经济民族主义

① 凯泽："跨国政治"，第 811—812 页；莫尔斯："跨国的经济过程"，第 44—45 页。

附录

表 A* 1954 年和 1968 年某些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各种类型交易的贸易分布百分比

	年份	I	II	III	IV	总计
西德	1954	16	25	8	51	100
	1968	9	47	14	30	100
日本	1954	12	16	20	53	100
	1968	5	27	1	67	100
法国	1954	28	24	7	41	100
	1968	21	63	7	9	100
意大利	1954	32	41	20	7	100
	1968	16	45	2	37	100
英国	1954	11	22	16	50	100
	1968	7	54	17	22	100
美国	1954	34	26	23	17	100
	1968	26	61	7	6	100
巴西	1954	37	1	13	49	100
	1968	37	8	7	48	100
墨西哥	1954	2	28	27	44	100
	1968	16	22	22	40	100
尼日利亚	1954	15	1	15	70	100
	1968	17	8	6	69	100
巴拿马	1954	38	1	65	-3	100
	1968	45	1	48	6	100

I:以粮食和原料交换粮食和原料。

II:以制造品交换制造品。

III:以商品交换"无形项目"。

IV:以制造品交换粮食和原料。

注:这里是利用阿尔伯特·O·赫施曼的方法计算的,见赫施曼:《国力与对外贸结构》第 7 章。数据引自《1954 年和 1968 年国际贸易统计年鉴》。

表 B* 1936 年、1950 年、1959 年、1968 年美国直接投资帐面价值按地区的百分比

地区	1936 年	1950 年	1959 年	1968 年
发达国家	51.2	48.3	56.5	66.9
加拿大	29.2	30.4	34.2	30.1

西欧	18.8	14.7	17.8	29.9
欠发达国家	48.4	48.6	39.1	28.8
拉丁美洲	41.9	37.7	27.6	20.2

*未计算的百分比是由于有一种称为国家不确定的类别。

表C　1936年、1950年、1959年和1968年美国直接投资帐面价值的分类百分比

分类	1936年	1950年	1959年	1968年
采矿和冶金	15.4	9.6	9.6	8.4
石油	16.1	28.8	35.1	29.1
制造业	25.6	32.5	32.6	40.6
公用事业	24.5	12.1	8.1	4.1
贸易	5.8	6.5	6.9	8.1
农业	7.2	5.0	2.2	—*
其他	5.4	5.6	5.5	9.7

*没有单独列为一类。

表B和表C的资料来源:《商业概况》(1970年10月),第28页;美国商务部:《美国在国外的商业投资》,华盛顿特区,1960年,第92—93页。

表D　1957年和1968年美国净资本流量的地区百分比

地区	1957年	1968年
发达国家	40.1	58.4
欠发达国家	55.5	35.7
加拿大	28.9	19.5
西欧	11.6	31.2
拉丁美洲	46.9	21.1

表E　1957年和1968年美国净资本流量的分类百分比

分类	1957年	1968年(初步计算)
采矿和冶金	8.0	1.7

石油	56.7	33.3
制造业	17.4	36.5
公用事业	7.7	*
贸易	1.7	*
金融和保险	7.8	*
杂项	0.6	28.4

* 没有单独列为一类。

表D和表E的资料来源:《商业概况》(1970年10月),第29页;美国商务部:《美国在国外的商业投资》,华盛顿特区,1960年,第137页。

表F　1968年美国制造业在国外和国内部分的指数

(1957年=100)

制造品出口	189
制造业机构的对外直接销售	326
对外销售总数	262
美国制造业的增值	193
制造业在美国的销售量	175

资料来源:国内销售量:美国政府:《总统经济报告》,1972年,第244页。

增值:1957年:美国调查统计局:《1966年制造业的年度调查》,1969年,第2辑;1968年:美国调查统计局:《1968年制造业的年度调查》,1971年。

制造品的出口:《美国统计摘要》,1970年,第480页;《美国统计摘要》(1963年),第875页。

各机构销售量:《商业概况》(1970年10月);美国商务部:《美国在国外的商业投资》,华盛顿特区,1960年,第110页。

表 G　国外地区投资的收益和国外收益与国内公司收益的百分比

	海外直接投资的收益		海外收益对国内收益的百分比
	百万美元	指数（1950＝100）	
1950	1,892	100	9
1951	2,365	125	13
1952	2,457	130	15
1953	2,386	126	15
1954	2,534	134	16
1955	3,036	160	14
1956	3,527	186	16
1957	3,799	201	18
1958	3,260	172	19
1959	3,589	190	16
1960	3,969	210	19
1961	4,278	226	21
1962	4,815	254	20
1963	5,247	277	20
1964	5,827	308	19
1965	6,384	337	17
1966	6,732	356	16
1967	7,170	379	19
1968	8,268	437	22
1969	9,497	502	28

收益类是由下列两项相加得出的：

(1)美国海外直接投资收益。

(2)直接投资的专用权使用费和各种费用的收入。从其他(非直接)私人资产获得的收入不包括在内。

资料来源：

利润：1950－1962 年：《商业概况》，1965 年 9 月，第 53 页；1962－1963 年：《商业概况》，1966 年 7 月，第 5 页；1964 年：《商业概况》，1968 年 7 月，第 24 页；1965－1966 年：《商业概况》，1969 年 7 月，第 22 页；1967－1970 年：《商业概况》，1971 年 7 月，第 18 页。

专用权使用费和各种费用：《商业概况》，1970 年 6 月，第 34－

35 页。

海外直接投资收益：1950—1959 年：美国商务部：《国际收支统计补编修订本》，华盛顿特区，1963 年，第 184 页；1960 年：《商业概况》，1962 年 8 月，第 22—23 页；1961 年：《商业概况》，1963 年 8 月，第 18—19 页；1962 年：《商业概况》，1964 年 8 月，第 10—11 页；1963—1970 年：《商业概况》，1971 年 10 月，第 28—29 页。

表 H　　净欧洲货币市场规模的估计 *（单位：10 亿美元）

年份	欧洲市场	全部欧洲货币
1964	9.0	* *
1965	11.5	* *
1966	14.5	* *
1967	17.5	* *
1968	25.0	* *
1969	37.5	44.0
1970	46.0	57.0
1971	54.0	71.0

* 指欧洲内部各银行之间的存款，其中包括银行对于它们本国的资产和债务。

* * 国际清算银行未作估计。

资料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1964—1968 年的欧洲美元：《第三十九届年度报告》，巴塞尔，1969 年，第 149 页。

1969—1970 年的欧洲美元：《第四十一届年度报告》，巴塞尔，1971 年，第 164 页。

1969—1971 年的欧洲货币：《第四十二届年度报告》，巴塞尔，1972 年，第 155 页。

1971 年的欧洲美元：《第四十二届年度报告》，巴塞尔，1972 年，第 148 页。

表 I　　国际储备(单位:10 亿美元,截至年底为止)

	1945 年	1955 年	1965 年	1971 年
黄　　金	33.3	35.8	41.4	39.2
其中美国	(20.1)	(21.8)	(14.1)	(11.1)
外　　汇	14.3	17.0	23.0	79.5
其中美元	(4.2)	(8.3)	(15.9)	(51.1)
英　　镑	(10.1)	(7.6)	(6.7)	(7.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黄金债券状况	—	1.9	5.4	6.9
特别提款权	—	—	—	6.4
合　　计	47.6	54.7	69.8	132.0
附世界出口	34.2	84.0	165.4	334.0 *

* 以每个季度的统计资料作为年率来表示。

资料来源:1945 年、1955 年和 1965 年的资料,见库珀:《相互依存关系经济学》,第 51 页。1971 年的资料,见《国际金融统计》,1972 年 9 月。

20. 未来技术的国际功能意义

尤金·B·斯科尔尼科夫

〔编者按〕 斯科尔尼科夫是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1958年至1963年任美国总统科学技术事务特别助理，著有《科学、技术与美国的外交政策》(1967年)和《技术对国际社会的强制作用：技术发展与国际政治体系》(1972年)。

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都在某种形式上把技术看作是现代变化的根本缘由。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之后、人均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导致了专门化、相互依存关系和一体化。这些过程一开始就影响到地区性的共同体，使人类活动的结构有所转变。小于民族国家的行政结构不再拥有很大的主权。许多人预言，总有一天民族国家本身也将让位于拥有更大管辖范围的结构。

斯科尔尼科夫在这篇文章中探讨了未来若干年技术可能采取的方向。这种发展产生的压力，可能会要求互有利益关系的国家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技术的进展和技术的日益增加的应用，对于各国所面临的国际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与原来在通常意义上估计的影响往往大不相同。技术不但不会把国家的主权意识减少到最低程度，似乎反而增加了这种意识；它不但不会阻止弱小国家的兴起，反而使这类国家数目的增多成为可能；它不但不会使政府在外交方面的态度和观点有急剧的变化，反而容许继续以“传统”的方法处理国际事务。

本文将概述技术的继续迅速发展与国际未来的密切关系，把重点放在技术对国际跨政府机构的影响方面。在今后的一二十年内，技术的发展很可能会产生重要的成就，它对国际体系的要求，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强度上，都将远远超过今天对国际体系的要求。这些要求是由于国家的独立行动越来越受到限制而产生的，与之俱来的是十分强烈地需要国际机构来执行国际行动。其次，由于与许多技术有关的决策的传播，这些要求具有某种“不可避免性”，就是说，政府对这些要求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忽视。这些结论将对目前流行的国际体系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种模式认为，主权国家在争取安全和利益时把决策的主要地点放在各国内部。这些结论对现有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的现有态度能否适应已经变化的形势，也将提出问题。技术的实际形势证明它处在无限悲观和洋洋自得之间的位置上。在各种地区，尤其是被污染的地区，播下了空前大灾难的种子。更多的资料将会表明，世界现在正面临着不可逆转的环境变化，需要采取果断而又紧迫的国际政治行动，尽管现有的资料还不能证实这样一种结论。①

国际组织的具体功能可以用以下几个类型来表示：

一、服务

1. 信息交流

2. 资料的收集、分析和对自然现象的监视

3. 提供咨询和建议

4. 促进国家和国际性计划的实现

5. 计划的协调

6. 制订联合计划

7. 小规模的资金筹措

二、创立规范和进行分配

1. 为建立规范而收集数据，进行分析

2. 建立标准和规则

3. 费用与收益的分配

三、遵守规则和解决争端

1. 对遵守标准和规则进行监督

2. 实施标准和规则

3. 调解、说明和仲裁

4. 关于标准和规则的起诉

5. 判决

四、行动

1. 资源、技术的运转及开发

2. 技术援助

---

① “人类对全球环境的影响”，见《重大环境问题研究报告》，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0年。

3. 对研究、分析和发展的指导

4. 对科研项目的资助

环境的改变

这也许是最新的重大技术课题，得到公众和政界的极大重视。各国政府突然发现自己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对"环境"加以保护。每个国际组织也以某种方式直接参与。对于有些组织来说，这件事正在成为它们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我们可将有意识地控制气候的技术（已有的或可能有的）分成三类：微观气候的变更，风暴的变更，以及大规模的气候变更。无意中造成气候或气象的变更也是可能的。

在微观气候变更中使用了云的催化试验。有关的证据表明，局部地区的降雨量能增加5%到20%。按照T·F·马隆的预测，到1980年，"经过实践证明的技术能局部地增多或减少自然降雨量"，到八十年代末，"人们能够在数百英里以外顺风的地方任意地增多或减少降雨量的可能性很大"。[1] 这样，在各国内部和邻近的国家之间肯定会产生水的分配问题。其次，在行动方面也可能出现国际合作的需要，例如云的催化有时需要在别国领土上或在国际水域上进行。最后，它将产生各种国际问题：如何分配大气层生成的、但很有限的淡水资源。

---

① 马隆："大气科学的发展现状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密切关系"，载《科学与技术对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华盛顿，1968年，第82—97页。这本论文集收集了1968年6月16—17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和美国科学院科学与公共政策委员会特别小组联席会议上提出的论文。

显然，国际资源分配的重大问题将会存在。

转移或制服飓风的前景也已在望。美国（1969年8月）用碘化银的试验似乎已取得成功，使德比飓风的最大风速隔天轮流减少31%和15%。[1] 如果变更活动使飓风的路线发生偏移，就有可能由于造成损坏或被剥夺水资源而提出索赔要求。有关飓风变更的活动必然要在国际环境中进行，有时甚至要在几个国家地域内进行。在技术范围内还有大胆的计划，想用化学品（炭黑）融化北冰洋的冰盖，在白令海峡筑一条大坝（常常由俄国科学家提出），或驱散北冰洋上空的乌云，或把温暖的太平洋水抽进北冰洋盆地。[2] 其目的是要根本改变北半球的气候，尤其是使广大的西伯利亚地区变得温暖和潮湿。消除北冰洋覆盖的冰层产生的后果，可能会像人们预言的那样，完全是有益和有利的（西伯利亚、欧洲以及远至撒哈拉大沙漠，随着降雨量增加而气候会变得比较温暖），但也有可能因此出现一个新的冰期，并在格陵兰岛冰盖融化后，有可能使海洋水位大大上升。显然，在容许实施这类计划之前，需要有足够的有关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资料。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实施这种计划需要的资源，或许不会超出一个大国的能力（同欧洲大陆的一些大水坝相比，建造白令海峡水坝的费用完全是可行的）。况且，尽管像使西伯利亚变暖那样的工程经济支出大得出奇，但是由此产生的刺激也会是巨大的。世界上有哪个国际机构会管理这样的工程项目呢？

---

① “风暴眼的新进展”，载《新科学家》，1969年12月25日、第44卷、第681期，第630页。

② 鲍里索夫：“我们能控制北极气候吗？”，载《原子能科学家公报》，第25卷、第3期（1969年3月），第43—48页。

矿物燃料消耗增加所致。二氧化碳"层"产生的结果是挡住了地球表面反射的太阳能，从而产生一种温室效应。二氧化碳的增多在1940年前与地球表面温度的增加是有关系的，但与后来的温度下降无关。对这种现象可能作出的解释是大气微粒的污染超过了二氧化碳的集中，那就是，城市、工业或农业活动中产生的尘埃能影响热量的平衡，它的方向基本上与二氧化碳相反。尘埃阻挡了太阳的辐射，因而减少了到达地球表面的能量。此外，在低层云的形成中，尘埃构成了它的核心，把一些增多的太阳辐射反射回空中。"现在，平均约有31%的地球表面由低层云覆盖着，这个数字如增至36%，温度将下降约摄氏四度，接近回到冰期所需要的下降数字"。①

另外还有一些值得十分注意的可能性。由于地球表面人为的改变，地球的反照率（直接向外反射正在到达的太阳辐射的百分比）也正在发生变化。稠密的城市地区和公路反射的太阳辐射多于森林或农田。这些变化也会降低地球表面的温度。另外，在大气层的上层，像火箭的排出物等这样一些未知的因素，也可能影响辐射的传送，喷气式飞机或超音速运输机的水蒸气排出会在很高的空中散播冰结晶，产生云雾，这种云雾具有尚未确定、但是潜在的重要后果。② 至于可能发生的灾难，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但是总而言之，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地使用技术，造成了大气层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地球的气候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危险在今后的二十年内将会以极为重要的方式出现。

---

① 布赖森和温德兰特："大气污染的气候影响"，1968年12月27日，提交给美国全国科学进步协会的论文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证据。

② 布赖森和温德兰特："大气污染的气候影响"。

仅从这里举出的有关人类大规模损害环境的几个现象，就使我们接受教训，认为将来必须有国际机构。我们有必要对环境改变的过程有更多的了解，以使事先对大规模行动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作出策划。控制技术的机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具有独立国家能力的机构一直到某种"不偏不倚"的国际机构。具有真正国际能力的机构必然会产生一些对损害和索赔要求进行上诉、仲裁、强制和估价的辅助机制。

考虑对大规模技术实行国际负责，甚至采取国际行动以掌握大规模技术，作为一种方法来保证利益的平等分配，并真正关心可能造成的有害副作用，也许是必要的。一些耗资巨大的计划也必须被纳入国际的活动范围。

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迅速发展，社会的需求和消耗都以指数增长。到 1985 年，世界人口预计将从 1970 年的略多于 35 亿增加到将近 50 亿，这就要求粮食、能源和自然资源增加 40%以上，才能维持目前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水平。① 由于各国经济水平的大幅度增长和工业化的相应发展，这些需求实际上将大大增加。然而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就必须使用大量的化学肥料和杀虫剂，运输和烧去越来越多的燃料，处理越来越多的农业和工业垃圾，把更多的耕地转用于建筑住宅和公路，砍伐更多的森林，寻找更多的淡水供应等等。所有这一切将会大大地改变我们目前的环境，大大地增加环境污染问题。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而有极其复杂的相互关系。不从整体考虑，就不能充分判断某一方面的变化所

①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世界人口状况"，备忘录之二，秘书长文件，E/CN9/231，1969 年 9 月 23 日（1969 年 11 月 3—4 日，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第 15 次会议）。

带来的影响与其他方面的密切关系。

使用滴滴涕及有关的有机氯化物来控制虫害，是一个重要因素，使之有可能养活目前的世界人口，提高其健康水平。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些杀虫剂在食物链中的日积月累会毒害一些动物。许多动物种类已经受到危害。在某些情况下，沉淀的浓度已经超过了目前人们所能承受的限度。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新发展是一份报告中所说的，滴滴涕干扰海面浮游植物群的光合作用。这种现象对海洋生物资源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①] 有几个国家现在已经禁止或大大压缩与滴滴涕有关的化合物的使用，美国在 1969 年 10 月中旬也采取行动。至于是否对滴滴涕可以采用有效的代替品，还存在着争论。即使有这种代替品，成本可能很高。因此，我们必须在饥饿或疾病为一方和以滴滴涕用量逐渐增加为另一方之间作出艰难的选择，也必须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停滞之间作出选择。谁来进行这些选择呢？还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办法吗？最后，还有谁来支付费用呢？深有启发的是，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目前进行的辩论中，发展中国家远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关心污染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国家排出的工业硫磺污水据说在另一个国家会变成硫酸。[②] 使用无硫燃料最容易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将会切断中东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市场。为了满足文明对能源不断增加的需求，油船的规模扩大，于是海上的石油污染对鸟类、海洋生

---

① 埃利希夫妇："向大海获取食物的神话"，载《星期六评论》，1970 年 4 月 4 日，第 53—65 页。

② 梅兰比："英国能弄得干净吗？"，载《新科学家》，第 43 卷，第 668 期（1969 年 9 月 25 日），第 648—650 页。

物和海上游乐都产生严重影响，成为重大的威胁，一场事故就会变成一次巨大的灾难。海底石油资源的开采也有可能产生偶发事故，而这种开采在最近的将来肯定会迅速增加。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这些危险，它们至少将会提高石油价格——还有政治后果。

处理固体废料这个总的问题范围极大。据估计，仅美国一国今天固体废物的数量为：一亿四千万吨烟尘和有害气体，七百万辆汽车，二千万吨纸，四百八十亿只罐头，二百六十亿只瓶罐，三十亿吨废石和矿渣，还有与其他各种废物一起排出的五十万亿加仑热水。[1] 由于塑料和其他在环境中不会被消蚀的容器得到有意识的发展，废料处理问题更加严重了。

使用核动力作为主要能源预期的很大增长，将大大加剧安全处理原子废料的问题，这也将改变核动力工业的经济。甚至连"正常"运行核电站释放出来的较低的辐射，也可能成为严重问题。[2]

环境变化对国际功能的含义

对变化中的环境进行研究、分析和资料收集工作是非常必要的。目的有以下几个：

1. 在连续的基础上，简单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2. 判断目前趋势可能产生的影响，确定可以容忍的程度；

---

(1)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委员会第47次会议："人类环境问题"，秘书长报告，E/4667号文件，1969年5月26日，第5页。

(2) 康芒纳："对待环境的态度：一种几乎是致命的错觉"，1968年12月28日在得克萨斯的达拉斯举行的美国科学发展协会年会"由技术发展引起的难以预料的环境灾害讨论会"上的报告（油印本）。

3. 必要时发展、取代或更改目前的做法；

4. 就改变行动过程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可获得的利益确立严密的数据，以供政治决策之用。

这些显然是最迫切的一系列需要，而且是现在已经得到许多国际组织承认的。① 获得资料（从政治上看）是此项工作中比较容易的部分，但事实证明，要在资料涉及的问题上进一步采取行动则更为困难。

最主要的需要是对废水废气、固体垃圾的处理，油船的航行路线和航运事故中采取的行动建立国际规范。事实上，贸易的自由流动也需要在各国之间有统一的标准。凡是在污染有更微妙影响的地方，凡是在某些领域中污染状况的改善需要在国内作出不寻常的限制的地方，出现的政治问题更为严重。例如，如果要对每年的草地覆盖面积（涉及地球的反照率）作出限制，或对某一特定技术的年度总使用量作出限制，我们就会对一些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国际规则（在许多国家，甚至没有国家的规则）可以遵循的领域产生严重影响。如果我们能够作出一项判断认为某项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可能会严重加剧环境问题的话，那么，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进行限制，本身就会变成重大的政治问题。未来的和平利用核爆炸技术和变更气候的技术及现在已有的超音速飞行技术，都可能会受到限制。

建立规范也意味着对其他职能，尤其是分配问题作出规定，因为检验标准的费用或禁止使用某些技术的代价不是平均摊派的。放弃使用杀虫剂和除莠剂或用其他东西来替代，不

① "人类环境问题"，前引联合国秘书长报告，该报告为1972年在瑞典召开的人类环境问题讨论会拟定总目标。

仅要用美元来衡量其代价，而且要用人类的生命和健康来衡量。同样，某些国家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对于控制工业废料的费用不同，它们对某些资源的依赖程度或对某些工业的侧重也不同。谁应该付款——是生产者、消费者，还是受具体污染最严重的国家？这如何决定？其次，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会受到它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影响。因此，单就维持公平竞争而言，所订规则也必须是国际性的；而普遍使用的规则可能会损害某些国家的竞争地位，因而引起了平等问题。

分配功能需要有申诉和仲裁的机制。发展公平合理的技术分析手段是主要的。对损害的估计和索赔程序有必要解决违反国际标准的问题。最后，为了保证服从，还要有监督和强制执行的措施。一般说来，和现在的情形一样，这些措施可能仍然是“被动的”，也就是说，各国只有在考虑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的基础上自愿遵守规则。如果说现有的形式还不合适，那么就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动的”强制手段。

海洋

海洋是人类最早一些技术开发的中心，也是人类最初试图制订国际法加以限制的领域。今天，它们是最新技术的应用场所，因此是对国际法作出更多重新考虑和修正的原因。提取水下有机物和矿物资源的技术迅速发展，对海洋资源，尤其是海底石油开采的可能程度，人们的知识也有提高，对能源需求继续成倍地增长——所有这一切合在一起，造成了与海洋资源的争端有关的政治和法律问题。由于投资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刺激，技术发展使在越来越深的水下环境中进行活动已

有可能。人们预期，大陆架是“世界上最大的矿物燃料供应地”，因此很快就能领会技术发展的动机和潜在的利益。[①] 其他海底资源也有潜在的利益，尤其是锰、镍、铜、硫和“碎岩”矿物。

当然，需要对付的最大国际问题是谁拥有海底上面和下面的资源，也就是说，谁有权利越过大陆架去开发，并为自己谋利？不管建立什么机构来控制海底，它不仅要有一种手段来决定谁有权拥有海底，而且要规定一定的程序，公开地分配所获利益。此外，不管通过国际机制，还是根据国家之间的协议，都必须有一种手段来监督和强制执行决议、规则和标准。

关于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问题，有几个重要方面。第一，目前捕鱼的方法和技术趋向于最大限度地增加产量。虽然这个问题还存在着争议，但是有些科学家估计，海洋的潜在产量不会比目前的年收获量（约六千万公吨）高出很多。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海洋资源可望达到的最高数量也少于目前捕捉量的两倍。[②] 事实上，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捕鱼力量的增加，除非采取有效的控制方法，否则渔业资源会陷于枯竭。第二方面是对于鱼类迁移方式的知识日益增长，如果这种知识能使一个国家捕捉到在传统上由其他国家在不同的迁移期才能捕捉到的鱼，或者在鱼还未孵卵以前的迁移期就捕捉，那就会产生不少麻烦。第三方面是水产养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人为地改进海洋的营养价值来“提高”鱼类产量。

---

① 费伊、马克斯韦尔、埃默里和凯彻姆：“海洋科学与海洋资源”，载格利恩编：《海洋的用途》，恩格尔伍德 克利夫斯，1968年，第17—68页。

② 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委员会于1970年4月9日—15日在罗马举行的第五次会议：“世界指导性计划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渔业问题”，1970年1月26日。

几项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具有很大重要性的其他海洋活动将成为不久的将来科学技术大发展的焦点。运输的发展方向是建造较大和较快的货船，还有可能是真正的潜艇。军事应用也倾向于建造具有威慑力的较大和声音较小的核导弹潜艇，发展更多的水下侦察装置，也可能发展更强的反潜艇力量。随着地面的武器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海下导弹发射装置变得越来越重要，可能完全代替地面的导弹发射。海下环境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武器控制措施的主要中心，事实上也确实已经如此。

由于上述这些增多的利用，海洋环境的拥挤问题就产生了。许多技术应用是在同一海域之内，捕鱼船、运输船、海底无人驾驶救生船和永久的钻井台有可能拥挤在一起。因此必须建立全新的航道规则和条例。

国际功能的含义

不管为深海海底建立了怎样的管理制度，它必然要涉及超越国家管辖权限的资源开采。可能涉及的是批准权，也就是说要建立标准和作出选择。如果那种制度确立了对海底的管理权或资源的所有权，那么，所有派生功能都将随之产生，从批准权到建立规范，监督规则，申诉，仲裁和采取行动。

在捕捞规则方面，人们也看到了相似的基本功能：否定某个国家的利益和权利而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利益和权利；存在着申诉、监督、强制执行决定的机构；以及具有逐步扩大或获得独立技术情报的能力。为了防止捕捞过度而造成的蛋白质物种严重枯竭的危险，必须采取类似的步骤。利用海洋所造成的拥挤问题也需要有国际机构来处理，只不过影响较小而已。

外层空间

从事空间发射的国家无疑将继续进行空间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政治上不那么紧迫。[1] 从外部空间获得经济效益并尽量减少费用承担，其利益关系无疑将增加。卫星的利用有助于森林和农业活动的计划与管理，这方面近来取得了某些进展。卫星系统由于它能用各种传感装置探测大面积地区，将为用水的分配、农作物种植规模的预测和其他许多陆上管理活动提供难以估量的信息。这种服务一旦被正规地纳入国家经济体系，很可能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卫星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用途，那就是探测矿物和有机资源。卫星很可能用于勘探矿物，或者至少可以鉴别地面上有希望开采的位置。这种信息可能有巨大的经济和战略意义，因而产生了信息的控制与获得、技术应用的控制以及国际行动方面许多麻烦问题。

用作中继通讯系统的卫星数量会大大增加，以满足对通讯渠道不断扩大的要求。随着通讯频道的容量大增，波束(在地理上)的覆盖被明确规定，功率的加强和其他专门能力的发展，通讯系统本身也可能变得日益复杂。将来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全球系统，还是建立多国系统，目前还不清楚。对频率的需求将增加无线电频谱的分配问题。目前正在发展的卫星直接

---

① 这一部分的材料有多种来源，但主要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全国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地球卫星的有益应用”，华盛顿特区，1969年；“有选择的空中目标及其与国家目标的关系”，即巴特尔纪念研究所的报告，1969年7月15日致国家宇航局的第EMJ—NLVP—TR—69—2号报告。

广播扩大了家用天线或共用天线的作用。据联合国直播卫星工作小组估计，向共用天线或家用接收机的直接广播到1975年在技术上可以行得通。[①] 然而，直接广播系统的实际发展将取决于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技术标准。

为了研究、探索、开发、监测和执行的目的，对行星及其周围情况进行观察的兴趣有所增加，这将导致以卫星为中心的资料收集和传播系统的发展。这些卫星将是十分复杂的，有自己的传感器，并同遍布全球的传感器和数据读出站连接起来。这种系统也将增加对频率和空间轨道分配的压力，并将产生国际与国家间的管理、经济效益、信息安全和联合计划等各种问题。

和采取高速海运一样，空运的发展也需要大大改进空中导航能力，在今天飞越大西洋航线方面，这种需要已经十分明显了。卫星导航系统很可能对这样的需要提供最能令人注意的解决办法。适当分配频率和轨道的需要以及管理问题，又将成为中心问题。

外层空间的功能含义

上述这些情况已经十分明显，而且事实上已经导致产生几个新的国际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有国际通信卫星组织，它是通信卫星的联合组织，还有欧洲航天研究组织和欧洲发射工具发展组织。第一个国际性功能要求将是为了上面提到的许多系统提供运行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政治原因，国家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都不充分，不能作为永久性的安排。外层

---

①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空委员会，关于直接广播卫星世界小组的报告，1969年2月16日，A/AC，105/51号文件。

空间活动能力所产生的一些信息，尤其是有关可能存在的新能源、鱼类迁移和气候的信息，会产生严重的经济甚至战略后果。因此，有关信息的所有权以及为国家或商业利益集团利用的可能性等重要问题，必须通过国际手段来处理。

这些系统中的一些系统一旦运转，人类的整个活动领域将要逐渐依靠它们——例如，气象预报、导航和空中交通管制、种植计划等等。因此，为了公平和在政治上可行等理由，将会产生强大的压力，使这些系统成为国际管理的系统。对于地球上的某些地区，许多系统可能要收取不同的费用，给予不同的利益。因此，利益和费用的分配以及价格政策问题，必须通过国际机构来处理。某些通信系统有获利的潜力，至少会严重影响到同一地区现有的地面基地系统的获利潜力。复杂的平等问题必须采取国际行动来解决。设备的获得也将产生经济平等问题。哪些国家将接到发展和获得设备的合同？国际通信卫星组织现在已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希望分享通信卫星的发展和生产所带来的经济和技术利益，显然是隐藏在各种竞争性建议后面的动机。

对分摊空间发展和开发费用的兴趣，可能会鼓励人们对更多的空间合作活动作出远远超过现在所能想象的努力，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会涉及国际机构。直播卫星将引起一些棘手的问题，如卫星本身的技术标准、电视的标准、对广播覆盖面和干扰（包括失真）的规定等问题，当然还有频率和轨道分配的问题。此外，也不能排除需要对广播内容采取某种形式的国际控制。地面附近的空间活动大大增加，必然也要有一个空间管理组织能为空间各种事先估定的使用建立规则并进行分配。由于空间现在和将来有可能被用于军事活动（主要是监

要，而不是根据目前的技术和经济的需要，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

资源匮乏的功能含义

为了确定资源的实际状况，当务之急是要对地壳进行国际性的地球化学调查。由于世界资源分布不均，也由于无法确定这些资源的范围，两者加在一起，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有一种国际性的办法，来共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这些资源。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显然是当今最大的原料消费国，可能比其他国家捷足先登，把那些资源用于自己的经济发展，这会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会产生压力，要求设立机构来管理、分配和控制这些资源的使用。此外，资源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直接关系到污染问题。因此为了控制污染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规定可能很好地实现限制各国对各种原料的消耗。

粮食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绿色革命"似乎至少推迟了一场威胁全世界的饥馑，但它只是几个因素巧合的一种产物。这些因素是：培育新种子技术的及时发展；重要地区的气候良好；以及农民们愿意种植新品种。然而，只要人口的压力继续增加，这种发展只能是暂时的缓解，而不是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指导性农业发展的世界计划"旨在强调从当时到 1985 年的一些与粮食有关的问题和需要，它指出，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必须超过 1962 年的 2.8%，达

看来是能够制造出一种既可长期不育而又可以暂时用于怀孕的药品。如果一旦需要国家来控制生育,这将是一种最容易采用的技术。然而,目前为发展和检验新药品的做法却极不可能使这种药品得到发展。① 困难在于:(1)新药由美国粮食和药物管理局在美国的环境中试验,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的环境中试验;(2)新药发展的安全条件是那么严格,以致由于费用原因而令人不敢进行,而且漫长的试验期也使它难以迅速解决人口问题;(3)没有独立的国家或国际科学申诉机构可使美国粮食和药物管理局以科学的依据提出自己的决定和反对意见。② 人口控制所需的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这是一个尚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许多人认为,用于家庭计划生育的现有技术,加上健康发展计划,已足以应付这项工作——因此还需采取一些新的国际措施,以改变这项发展的基本规则。

结论

斯坦利·霍夫曼曾简洁地评论说:“主权之船正在漏水。”原来提到的独立意识以及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错觉。今天的许多技术发展充其量也只能表明这种说法只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在使用这许多技术时,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达成约束自己行动自由的协议,因为不然就无法使用技术,或者遭到各种各样的报复。对于这种约束,各国通常是自投罗网,在这种意义上说,可以认为这种约

① 杰雷西:“新的节制生育化学药品的发展预测”,载《科学》,第166卷,第3904期(1969年10月24日),第468—473页。

② 同上。

束是各国自己设置的。然而它们却是对主权的限制。令人惊奇的是,国家主权已经遭受何等的侵蚀。实质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必需的国际功能,今天都已有极为相似的东西。有些功能是起码的,或者是事实上存在的。但是另一些功能,即使在政治上难以驾御的地区,却出人意料地广泛和有效。要评估现有的国际体系能否演变成为八十年代所需要的功能,关键在于今天的功能论所处地位。然而,即使跨政府组织的全部组合目前表现得很好,几年之内国际体系将被要求增加所承担的任务和职责,也会使它不堪重负,除非我们今天就未雨绸缪,有意识地为那时作好准备。况且,国际机构的一般工作尽管在某些领域卓有成效,但仍令人有很大的怀疑,即若不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它是否就能为职责的扩大和增加提供充分的基础。

国家行动的自由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转为国际组织的职责有所增加,意味着决策的核心被迫不断地从国家转向国际领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各国不一定会丧失它的发言权,但越来越多的问题将要在国际环境中解决。看来很可能出现一种趋势,使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在利害攸关的领域内将日益依赖国际组织,从而加强国际决策的扩展。

然而,也有一种相反的趋势,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技术问题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色将会增加。过去,技术问题相对地说对政府的利害关系很少,但现在它们的影响使它们处于政治舞台的中心。这些特点还意味着国家对失去任何控制权更为敏感。因此,赋予国际机构任何职责都会遭到强烈抵制,因为各国政府对这些机构只能实施有限的控制。也可以说,这些技术问题会像今天的国家安全与权力关系这样一些"高度政

治性"的问题一样，成为政府更为集中关注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在社会中到处存在，与个人和利益集团又休戚相关，因而各国政府永远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成为一言堂。事实上，国家方面的政策一体化常常是为了国际组织的有效工作而提出的，今后甚至将会变得更难实行。情况可能是这样，对于必不可少的一体化，我们得指望国际方面来实现，而不是主要在国家方面来实现。如果是这样，那么就有另外一种方式，决策的中心将移向国际舞台。

这些由先进技术及其副作用引起的问题，在本质上强调事物的相互关系。逐渐地，人们不能明确地把这些问题分成可以贴上"海洋"、"农业"、"健康"等标签的各个部分，而是它们彼此相互影响。这在国际上如此，在国内也是如此，并将在未来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使国际组织的裁决和协调变得简单可行。况且，现代技术体系和组织体系的复杂性和规模，也使革新的任务极为困难。

我们可以表明，在某些国家已有好的开头，它们的公众对本文分析的问题、尤其是环境控制和污染问题的兴趣已有增加。这种公众兴趣在政治活动中表达出来，终将导致对人类及其工作进行控制。不管这种控制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它将是人类生存所需要的。随着公众对人类环境保护问题的兴趣日益增加，看来人们越来越会认识到，当环境问题的影响超出本国时，各国政府就无权在技术领域内单独行动，这种认识将如何发展，人们尚在拭目以待，但这种认识势必成为向国际决策方向迈进的先决条件。

技术本身也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可能

带有危险的“卢德分子”①色彩。至少美国有这种情况存在。由技术引起的问题还得通过技术本身来解决，这种反技术的作用会严重阻碍保护未来环境的进程。它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施加压力，将科学和技术的预算减少到最低限度，并紧紧控制着那些对认识和改善全世界面临的自然和社会问题非常重要的那些领域。

国际组织必然要在一个政治环境中发挥作用，但这个政治环境也会发生变化。核武器竞争及政治紧张的加剧，总的说来都将大大地影响应付本文提出的一些问题的可能性。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发展也会明显地对国际机构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也必将会参与解决这些与技术有关的问题。人们可以预料，重大的利益冲突将成为南北紧张的重要根源。

不管今后二十年的政治发展如何，“不可避免”的技术发展必将会对国际体系提出重大的新要求。国际体系朝什么合适的方向发展，一部分必须取决于人们根据今后二十年的需要对现存国际机构所作的评价。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是否只要“演变”就已足够，还是需要一场“革命”，这是个有争议的判断。各国政府及各国际组织会及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吗？即使对国际体系稍作改革便可适应，情况也是如此。显然，了解有关问题是当务之急。

---

① 卢德分子(Luddite)，1811年至1816年英国手工业工人中参加捣毁机器运动的人。——译者

21. 跨政府关系和国际组织

罗伯特·O·基奥恩和约瑟夫·S·奈

〔编者按〕 罗伯特·O·基奥恩和约瑟夫·S·奈分别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合编有《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2年)。奈还著有《支离破碎的和平：一体化与地区组织的冲突》(1971年)。

政治发展以行政当局权限的逐渐扩展为特征。在西欧，从中世纪初的王国(见本书第二编斯特拉耶的文章)演变为十九世纪的民族国家和今天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表现出一种统一的模式，尽管这种模式曾使人类生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发展得极其缓慢。民族国家也许只是政治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但事实证明正是这种组织能异乎寻常地获得其成员的忠诚，并且能抵制将主权让与更大的实体。

基奥恩和奈的这篇文章承认，各国通过联合国和其他跨政府组织所进行的合作不十分成功；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尚未产生出什么影响。然

而，他们论证，跨国组织产生了人们对各民族共同利益的一种理解。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些利益也将对政府组织产生影响。作者在陈述其论点的同时，也评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并讨论了定义问题，这些问题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对进行创造性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

对世界政治进行的“现实主义”分析一般都假定：国家是唯一重要的行为者；国家是作为单位采取行动的；国家的军事安全目标支配其他目标。[①] 以这些假定为基础，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组织——这里限定为跨政府组织——只不过是政府的工具，因而本身并不重要。同世界联邦主义者的希望和梦想相比，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却反映了现实：在当代世界中，国际组织并不是强有力的独立行动者，甚至像联合国这种相对来说是全世界的组织，都极难在重大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研究世界政治的学者较少注意这些实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联合国想充当维持和平重要角色的希望破灭以后，尤其如此。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作为上述关于国际组织结论的基础的现实主义模式，现在正在受到怀疑。面对着各种行为者和问题的日益复杂，一些分析家开始更加注意跨国关系。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将坚决主张，如果人们能认真地思考对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模

---

① 有关这一专题的全面讨论，见基奥恩和奈编：《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2年。关于以综述为基础的论点汇编，见汉赫尔曼、瓦斯克斯、奥利里和科普林提交国际研究协会的论文“摩根舍色彩：以数据为基础对计量国际关系研究的评价”，1973年3月。

式提出的批评，他们不仅会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概念产生怀疑，而且还会对有关国际组织的普遍概念提出疑问。如果人们从现实主义的假定中摆脱出来，他们也许还能说明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塞缪尔·P·亨廷顿在最近一篇有关跨国关系的重要文章中，明确地认为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相对地说不大显著。他说：

> ……国际主义的含义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一致。……每一个国际组织在某些时候发现自己恰恰受到产生它的那个原则的限制。
>
> 国际组织要求各国之间协调一致；跨国组织要求各个国家相互接近。……国际组织体现独立国地位的原则；跨国组织则力图忽视这个原则。
>
> 然而，当国家的一些代表和代表团在联合国全体会议和安理会进行无休止的辩论时，跨国组织的代理人却在忙忙碌碌地来往于各大陆之间，编织着把整个世界连在一起的网络。
>
> 国际主义是死胡同。①

和亨廷顿一样，我们从下述论点出发，即跨国关系在世界政治中有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关于国际组织的作用，我们却得出很不相同的结论。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1973年4月），第338、339和368页。

在系统地展开本文的论点之前，我们必须先简要地讨论一下应当如何对跨国关系下定义的问题。亨廷顿对“跨国组织”所下定义是它们具有三种特征的组织：它们是大规模的官僚机构；它们发挥特殊的功能；它们跨越国界发挥这些功能。他明确地把政府实体，如美国国际开发署或中央情报局，跨政府实体如世界银行等，还有非政府组织如多国企业、福特基金会和罗马天主教会等包括在内。这种定义的优点是它指出了政府与非政府的官僚机构在跨越国界活动方面的相似性，但是，它也使两者之间的差异含混不清。亨廷顿的某些陈述显然只适用于非政府组织。例如，他论证“跨国组织的活动……通常没有政治动机，也就是说它并不想影响当地社会内的权力平衡”。[①] 但是，这种说法难以适用于美国国际开发署或中央情报局，而他却把这两个机构都指明为“跨国”组织。他以关于多国企业的论著为依据，主张跨国组织在人事安排上朝着不同国家的模式发展。在这种模式中，处理各个国家事务的分支部门基本上由当地人员来管理。但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美国国际开发署或中央情报局有这种人事安排模式；空中战略管区，即亨廷顿定义中的另一个跨国组织，就更不用说了。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似乎背道而驰，且在亨廷顿讨论这些趋势时，他也发现自己已经把“美国政府控制的跨国组织”同私人团体区别开来了。[②]

把亨廷顿的定义引入其中的反常状态使我们相信，为了大多数目的而保留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58页。
② 同上，第348—349页。

这样才能便于我们检验政府活动与非政府活动的模式之间的差异以及这两者的相互影响。只有当人们持续不断地应用组织理论去解释从事跨越国界活动的大规模官僚机构的行为时，采用亨廷顿的定义似乎才是明智的。

这种论点还导致我们去重新考虑我们自己过去使用过的定义。我们将在本文中把“跨国”一词局限于指非政府的行为者，而把“跨政府”一词局限于指政府的某些下属单位，它们在国际政治中的行动有独立于较高当局的相对自主性。① 换句话说，当我们不把国家设想为唯一的行为者时，我们可使用“跨国”一词，而当我们不把国家看作是作为单位来行动时，我们就用“跨政府”一词。

我们选择定义并不仅仅是个语义学问题，而是与本文的论点直接有关。跨国活动使各个社会之间变得更加敏感，可能会导致政府更加努力去控制这种非政府的行为。如果不只是一个政府作出这样的努力，那就会导致各国政府之间相互对别国政府采取的政策非常敏感：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可能有意无意地阻挠别国政府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各国政府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必定要考虑到别国的政策。其结果很可能会是试图把政策协调一致，这将增强政府对分支部门内的官僚机构的直接接触，特别是在多国的背景下，这种政策协调可能会为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中发挥出重要作用创造机会。

① 这里稍微修改了我们前面使用的定义。我们用“跨国的相互影响”来指其中一方是“非政府的行为者的相互影响”，而“跨国关系”一词则用来指包括“跨国和跨政府的相互影响”在内的一般类别。我们相信这未必会引起混淆。对于对我们使用的语言和思想进行的有启发意义的批评，参见瓦格纳：“消除国家：最近关于国际关系的三种观点”，载《国际组织》，第28卷(1974年)。

在下面的论证中，我们将首先阐述我们的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后面几节将讨论国际组织在推动或促进各种跨政府关系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国际组织作为跨国体系中政策干预场所的功用。我们在结论中将回过来谈跨国关系、跨政府关系和国际组织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这个问题。

跨政府关系

上个世纪，各国政府越来越专心于试图控制它们所统治的那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结果，它们对国外的动荡越来越敏感，因为这种动荡有可能影响到它们自己社会的发展。例如，在政府对国民经济负有责任的背景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一体化使政府的政策不但对其他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利率变化产生敏感，而且对非政府投机者的资金流动也产生敏感。多国商业公司和银行等跨国组织都有扩展的决心，从而使这种敏感更大，跨国交流费用的减少也增强了这种敏感性。

随着官僚机构日常处理工作的范围扩大，它们发现为了用可以接受的代价去有效地处理所产生的许多问题，必须相互直接交往，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外交机构处理。[1] 政府之间的交往有所增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有利于官员之间的直接接触，而这些官员过去主要是被看作政府的国内代表。用一位前白宫官员的话来说："外交关系中的主要事实是，外交事务是由各个部通过它们在国外的相应官僚机构用各种正式的和

---

[1] 凯泽首先提出了他称之为"多国官僚政治"的理论，特别见他的"跨国政治：多国政治理论"，载《国际组织》，第25卷(1971年)和"威胁民主进程的跨国关系"，载基奥恩和奈编：《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

非正式的联系来进行的(在联盟政治中尤其如此,但有时在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① 这样的接触一直存在着。所不同的是,随着官僚机构越来越复杂,交通和旅行费用减少,跨政府接触的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②

我们对跨政府关系所下定义是那些不受政府内阁或行政首脑的政策控制或严格指导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一系列直接的相互影响。因此,我们把最高领导人的政策当作“政府官方政策”的基准。最高领导人对各部门的行为缺乏控制显然只是程度上的问题,在实践中决不是毫不含糊的。中央行政机构的政策通常是不明确的,在细节上尤其如此,而且在不同的组织层次上,政策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一个人的政策是另一个人的手段”。③ 正如某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中央的政策总是华夫饼似的;行为者从中切下自己需要的那一块并结成联盟,按他们的水平来改变政策”。④ 尽管如此,把所有行为者等同起来,忽视负有“制订行动方针”责任的政治等级制度和维持某种等级目标的政治等级制度的存在,实际上既是对宪法也是对政治现实的曲解。⑤ 正是因为这种中央政策越来越难于对付更复杂的问题,人们才预期政府之间相互作用的机会

---

① 弗兰西斯·巴特1972年7月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对外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所作证词。见《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对行政组织部门的含义》,第110—111页。

② 有关美国的数据,见坎贝尔:《外事谣言工厂》,纽约,1971年,第204页。关于英国的数据,见桑普森:“英国外交政策机构”,载凯泽和摩根编:《英国和西德:变化中的社会与未来的对外政策》,伦敦,1971年。

③ 鲍尔:“政策形成之研究”,载鲍尔和格根编:《政策形成之研究》,纽约,1968年,第2页。

④ 这是1972年2月8日霍克默思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跨国关系研究小组研讨会上所作的评论。

⑤ 克拉斯纳:“官僚机构重要吗?”,载《外交政策》,第7卷(1972年)。

和重要性业已增强。

很可想象，负责中央对外政策的行政官员，如总统和首相等，本身将试图以各种方式合作，而这些方式是与他们各自的官僚机构的行为冲突的。然而，我们只把那些与最高领导人的行动相对立的下级官僚机构的相对自主的活动当作跨政府活动。否则，我们就会有反常的观点，认为国家首脑的会晤是"跨政府政治"的事例，实际上，违背既定政策的新建议往往就是在首脑会晤时提出的。这正是我们所要批评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模式不适当的典型事例。我们这个术语的要旨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处于组织等级结构顶端之下的官僚机构的接触上，而不仅仅是给传统模式很容易把它纳入的行为贴上新的标签。

鉴于我们关注的是跨政府关系可能为国际组织创造的机会，我们在本文中将集中讨论政府的从属单位之间的合作行为。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跨政府关系同世界政治的其他方面一样，也不能排除存在着冲突。有时，从属单位之间的直接接触本身也许就是互相冲突的。一个典型情况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和苏联的海军"密切监视"对方的活动，而它们的高层官员则殚心竭虑地设法控制这种监视活动。因此，我们强调的是合作的直接接触，但并不排除跨政府的利益冲突的可能性。

我们要把本质上是合作的跨政府行为的两种主要类型区别开来。一种是跨政府的**政策协调**，指在没有高层政策详细指导的情况下力图使政策顺利执行或对政策进行调整的活动。另一种过程，即**跨政府联盟的建立**，指政府的从属单位与其他政府中有共同想法的机构建立联盟以反对它们自己的行政机

箭导弹事件中，英国人在美国宣布取消这一计划前，对美国计划的心满意足状态"由于两国空军之间不断地相互保证而增强，美国空军视女王陛下政府为坚强的盟友，反过来也是如此"。[1]

经过一段时间的规律化协调以后，态度上可能会发生变化。同样一些官员经常会晤，有时会产生一种同仁感，如果他们都从事某项共同的专业，例如经济学、物理学或气象学等，这种同仁感可能会加强。个别官员甚至会部分地按照他们所属的跨国集团而不是纯粹从所属的国家来确定自己的任务。伽德纳·帕特森在五十年代讨论贸易歧视时论证："歧视所付出的一个重要代价是必须定期地在半公开的场合为它提出报告并为它辩护……这个代价之所以巨大，并不只是指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也许是指'俱乐部'——即同一专业的同仁——的许多成员指责其他某个成员没有实行某些国际义务而产生的麻烦。"[2]

因此，规律化的政策协调模式产生的态度和关系至少能最低限度地改变政策或影响政策的实施。在密切的联盟或联合体中，例如在美国与加拿大之间，[3]或在英联邦各个成员国之间，这种关系特别明显。即使在政治上彼此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利害关系相似的政府机构之间偶尔也会出现政策协调。根据新闻报道，从事空间合作技术谈判的美国和苏联官员无论如何已远远超越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当时授予他

① 诺伊施塔特：《联盟政治学》，纽约，1970年，第37页。

② 帕特森：《国际贸易中的歧视：政策问题》，普林斯顿，1966年，第36页。

③ 见霍尔斯蒂："美国和加拿大"，载施皮格尔和华尔兹编：《世界政治中的冲突》，坎布里奇，马萨诸塞，1971年。

们的权限。[1]

规律化的政策协调模式的重要意义不只是我们所引用的那些例子。随着这种做法的普遍使用，跨政府的精英网络由此产生，共同的利益、职业的趋向和私人的友谊把各国政府的官员联系在一起。[2] 即使态度上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与中央政府政策的观点也没有很大的偏离，同仁感的存在也会产生出一种灵活的谈判行为，因此不需要逐个问题或在每个阶段都作出让步。詹姆斯·科尔曼曾经提出，在"政治银行帐户"中，政治上的贷方和借方之间在精神上的算帐，不再要求一切都要直接支付，这种"政治银行帐户"的产生取决于同仁小群体的存在。[3] 这种行为一度只是君主和外交家的特权，当它在各国政府中普遍形成时，政策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非集中化了。研究诸如欧洲共同体或中美洲共同市场等共同市场政治过程的学者所报告的许多事例最鲜明地说明了这种行为的存在。许多事例证明，正是同仁感的产生才使官员和大臣在许多情况下能够迫使进行在其他情况下不能进行的政策协调。[4]

跨政府联盟的建立

当不同政府的从属单位和（或）政府之间的机构共同使用

---

① 《纽约时报》，1971 年 12 月 4 日、6 日和 16 日。

② 我们对精英网络这个问题的思考是由我们的朋友和受到敬重的同事，已故的伊凡·瓦利尔启发的，他在 1974 年 1 月去世以前一直在对拉丁美洲的精英网络进行系统研究。

③ 科尔曼："政治货币"，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 64 卷（1970 年），第 1074—1087 页。

④ 见林德伯格和谢恩戈尔德：《欧洲未来的政体》，恩格尔伍德·克利夫斯，1970 年；欣曼："有关欧洲经济共同体官僚机构关系的一些初步说明"，载《国际组织》，第 20 卷（1966 年）；奈："中美洲的地区一体化"，载《国际调停》，第 56 期（1967 年）。

构的渗透。1961 年，当美国气象局同国务院对联合国关于控制世界天气监视网的立场发生分歧时，美国气象局长打电话给加拿大气象局长，讨论了他们两个气象局的共同利益。这两个气象局的立场于是成为加拿大政府的立场，反过来挫败了美国国务院的提议。[1]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国防部官员担心，如果拖延将冲绳岛归还给日本控制，便会损害美日关系，于是他们同日本同行一起为日本的信件商量措辞，保证他们能通过正当的途径，促使美国政府机构作出合适的反应。[2] 1968 年，奉派负责同西班牙为军事基地进行谈判的一名美国空军将军未将谈判进程通知随行的文职官员，就同西班牙的同行进行秘密磋商，并对一项谈判文件达到一致，事实证明此项文件是国务院不能接受的。后面这种情况表明跨政府联盟并不总是成功的：有利于西班牙政府的协议虽已达成，但被美国否定，于是参议院中出现了否决西班牙协议的反应。[3]

显然，建立一些明确的跨政府联盟的必要条件是政府从属单位之间有广泛而大量的接触。在某种意义上，一定程度的跨政府政策协调可能就是这种明确的跨国联盟的先决条件。第二个必要条件则与政府从属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最高

---

① 迈尔斯："内层空间和外层空间的跨国关系"，载基奥恩和奈编：《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

② 依据同一位参与者的谈话（1972 年）。

③ 气象局和西班牙军事基地的例子说明美国政府是分裂的，而较小的国家显然有比较统一的政策。从一致性方面来看，这些关系的不对称分别有利于加拿大和西班牙。西班牙、国民党中国、以色列和加拿大都在利用美国政府的规模和分裂而产生有利于自己的不对称的一致性，用以平衡有利于美国的不对称的力量。见基奥恩："小盟国的大影响"，载《外交政策》，第 2 卷（1971 年）。关于加拿大的事例，见斯旺森："美籍加拿大人的聚集点之一：华盛顿特区"，载《国际问题》，第 27 卷（1972 年），第 185—218 页；崔尔斯得："美国和加拿大"；奈："跨国关系和洲际冲突：事实分析"，载《国际组织》，第 28 卷（1974 年）。

行政领导人的中央控制程度有关。为了实现一个跨政府联盟，一个政府的从属单位必须认识到它同另一个政府或该政府一些从属单位之间的共同利益至少大于它同本国有关机构的共同利益；中央的行政控制必须非常松散，足以使这种认识能转化为同有关的各国政府或机构进行直接接触。表 1 根据这两个方面来说明四种政治形势。

表 1　对外政策中的利益冲突与行政权力：四种类型

从属单位之间或从属单位与中央外交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程度	行政权力控制下属行为的程度：低	高
高	1. 政策分裂	2. 全国性冲突
低	3. 全国性联盟	4. 等级结构

在第一种类型中，政府体系中的从属单位最有可能寻求或最易于寻求跨国联盟。政府各从属单位之间的高度利益冲突表明有可能会形成同其他政府从属单位的有利联盟；行政权力的程度低则表明中央官员阻止这种联盟的能力较小。相反，在其他三种类型中，通常对于统一行为者的设想更可能在外交活动中有效，尽管原因不同。在第二种类型中，强大的行政机构里包含着冲突，从属单位可能看到潜在有利的跨政府联盟，但不敢试图直接实现这些联盟。在第三种类型中，国内政府从属单位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少，保证了选择国内的联盟一般似乎比选择跨政府联盟更有吸引力，即使没有强大的中央控制，情况也是如此。当然，第四种类型说明传统的政治形势：有效的等级结构强化了全国联盟。

政府从属单位之间比较经常的接触，政府等级结构的松

弛(行政控制程度低)以及政府内部的高度利益冲突都是产生明确的跨政府联盟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本身还不充分。首先，对于可以实现的联盟，具有共同利益的行为者必须能够把他们的力量有效地结合起来。即政府之外的行为者的政治储备力量(诸如资金、声望、信息以及在必要时由国际组织的规则要求的同意)至少对于政府内部的一些行为者来说是有价值的。这就需要一种比较开放和没有排外情绪的政治背景，因为在一个排外的社会里，外国资源会因为它是来自外国而被严重地降低价值或被消极地对待。即使在民主社会里，合法的跨政府行为和叛国行为之间的界线可能也不明确。

对于可能聚集的资源的需要，表明跨政府行为在功能上有明确规定的国际组织活动等有争议的领域中特别重要。组织程序本身，即联盟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保证一个行为者的资源——至少是它的投票权——可以对其他行为者有用；只要组织有一种专门化的和有功能的取向，各国代表的行动可以不受最高领导人或他们的代理人的严密监督。比较一般的情况是，政府政策固有的敏感性越大，对于一些跨越国界的问题更愿意接受共同决策，那么跨政府谈判的合法性也可能越大。一个国际组织象征着各国政府相信有必要作出共同决策，往往会加强这种活动的合法性。

国际组织与潜在联盟

频频召开的国际会议以及国际组织的其他活动有助于增强跨政府的接触，从而为跨政府联盟的发展创造机会。1945

年至 1965 年，跨政府组织的数量增加了二倍多。非政府组织增加得更快。[1] 在欧洲，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在这种接触的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结果，“各国经济和行政精英逐渐进入共同决策的席位上”。[2] 这些精英并非完全来自外交部门，而是来自各国政府机构的许多部门。这种模式不只限于欧洲：1962 年，有二千七百八十六人代表美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其中除一部分来自国务院外，更多的人来自政府其他部门。[3]

各国政府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以应付常常是在国际组织的主持下处理的不断增加的事务，包括这样的国际会议。由组织来决定哪些问题应当集中在一起解决，哪些问题应当分别考虑，有助于决定各国政府内跨部门的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性质。因此，从长远观点来看，国际组织将影响政府官员如何确定“问题的领域”。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税贸易总协定的存在有助于把政府的活动集中在货币和贸易领域，而不是集中在私人直接投资的领域，因为在后一领域里不存在类似的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把官员聚集在一起，这一事实将促使我们去注意这些组织对于推动世界政治中潜在的联盟起了多大作用。各国政府的许多从属单位尽管事实上还没有相互接触，但有着共同的利益或互相补充的利益。如果某个成员的独立行动有助于为其他成员的利益服务或者反过来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说某些潜在的联盟事实上已经是“默契的联盟”。国际

---

① 辛格和华莱士：“全球体系中的跨政府组织：1815－1964 年”，载《国际组织》，第 24 卷（1970 年）；安杰尔：《和平在行进：跨国的参与》，纽约，1969 年。

② 林德伯格和谢恩戈尔德：《欧洲未来的政体》，第 80 页。

③ 贝奇曼：《“另一个”国务院》，纽约，1967 年，第 92 页。

组织在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颇为重要但鲜为人注意的作用就是提供场合为政府各从属单位将潜在的或默契的联盟转变为明确的联盟，其特征是联盟伙伴之间的直接交往。在这一特殊的政治法术中，国际组织提供了物质上的接触机会，实现相互作用的议事日程，以及产生合法的气氛。非正式的讨论自然都在国际组织的会议上出现，有了这样的背景，本国政府中的其他从属单位就很难反对这些接触。

为什么有些潜在的联盟会活跃起来，而另一些联盟却始终是潜在的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人们很容易就会明白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都有庞大的军事预算）相似的利害关系为什么没有反映在超级大国军事官员的跨政府联盟之中，但可能较难说明在一种稳定的通货制度下，中央银行家的共同利害关系是否由于跨政府的接触而得到充分体现。再举一个例子，美国农场主——因而也是美国农业部——在谋求进入欧洲市场时所能得到的天然盟友是欧洲的城市居民和欧洲对财政和消费有兴趣的部长们，而不是欧洲的农场主和农业部长们。然而，美国的农业官员和欧洲的非农业官员之间很难组成这种潜在的联盟，因为在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定期的接触。这里包含的困难同欧洲农业部长之间现有的密切联系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点很有启发意义。凡是具有密切合作关系模式的同类机构都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并参加相同的国际组织，在那些共同利害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联盟，比那种包括不习惯于相互密切合作的各类行为者的潜在联盟可能会容易得多。

因此，即使没有一个十分活跃的秘书处，国际组织也同世界政治中的许多问题有关，因为它们有助于把潜在或默契的联盟转化为明确的联盟。当许多问题联系起来或者在某个接

受了广泛委托的机构中处理时，异质的联盟就会形成。接受狭隘委托的机构则排斥这样的联盟。因此，国际组织限定把许多问题合在一起考虑，而且拒绝讨论其他问题，就可能对世界政治中的政治进程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并不需要国际组织的秘书处人员去进行活跃的游说活动。

然而，国际组织的第二个重要作用是积极的作用。大多数跨政府组织都有秘书处，它们和所有官僚机构一样，有自己的利益和目标，这是由工作人员和支持者的相互影响而决定的。国际秘书处既可被视为联盟的催化剂，又可被视为联盟的潜在成员。它们所掌握的独特力量往往是信息和国际合法性的气氛。正如罗伯特·考克斯所说，“行政首脑需要同国内的压力集团结成联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决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对外’政治上，而必须知道如何使国内的政治为有利于他的政策而起作用”。[1] 根据本文第一节列举的政府各从属单位参加跨政府联盟的条件，我们预期国际秘书处或秘书处的组成部分会与有共同利益的政府从属单位或非政府的组织建立明确的或不明确的联盟。

部分国际秘书处与各国政府结成联盟的例子不难发现，许多组织都有一些部门被视为某些政府的领地。[2] 在某些情况下，秘书处的低级官员暗中向一些政府游说来挫败他们的秘书长已宣布的政策。[3] 联合国驻发展中国家的专门机构的

① 考克斯："行政首脑"，载《国际组织》，第 23 卷(1969 年)，第 225 页。

② 例如见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贫困国家的压力集团"，载考克斯和雅各布森编：《影响之剖析：国际组织的决策》，纽黑文，1973 年。

③ 马吉曾谈论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僚机构人员同非洲各国政府密谋推翻主管人关于重新设立两个机构的决定。见马吉："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合作的困境"，载《国际调停》，第 580 期(1970 年)。

代表们常常支持保守的政府部门去反对他们在中央计划机构中的对手。[1] 智利保守派曾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来巩固他们的政治地位。[2] 哈罗德·雅各布森在谈到世界卫生组织时认为"许多政府派驻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几乎都可以看作是该组织的主席在派出国政府部门中的代理人或说客"。[3]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组织倡议组织跨政府联盟,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或它们自己的从属单位被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吸引到联盟中去。

然而必须承认,国际组织这种积极建立联盟的作用通常受到严格的限制;它们决不能保证成功。但是秘书处对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不管持消极态度还是提出正面挑战,通常都缺乏吸引力。秘书处官员往往发现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是帮助政府或政府部门用不同方式去观察问题并以革新方式使用它们自己的力量。正如罗吉指出的,建立世界气象观测网不是超国家的行动,而是世界气象组织(它被大多数国家的气象局视为盟友)帮助协调的一系列国家的行动,以鼓励其研究成果的分布。[4] 同样,莫里斯·斯特朗把联合国环境署的作用解释为促进在成员国中建立新的环境协作单位,对它们的盟友起着

---

① 戈顿克:"多边援助及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载考克斯编:《国际组织:世界政治》,伦敦,1969年;杰克逊报告提供的有关例子表明他的研究"揭示的一个又一个事例都证明部长们都赞同与他们有关的机构所提出的政策(例如,农业部长赞成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政策,教育部长往往赞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同他们的政府对联合国体系的整个政策直接发生冲突"。联合国:《联合国发展体系能力之研究》,第1卷,日内瓦,1969年。

② 见赫希曼:《进步的历程》,纽约,1965年,第291页。

③ 雅各布森:"世界卫生组织:医学、地方主义与管理政治",载考克斯和雅各布森编:《影响之剖析》,第214页。

④ 罗吉:"世界天气监视网",未公开出版,1972年。

提供信息和提高声誉的作用，从而鼓励它们对“国家利益”重新下定义。①

联盟的建立常常逐渐转化为跨政府的政策协调。在长期和有些扩散的基础上，作为政策协调和国际会议的结果而出现的是交流与联盟同样重要，都能为特殊问题而形成联盟。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国际组织有利于各国政府“国内”机构的官员面对面地会晤，而这些政府在传统的国际政治中几乎没有发生过联系。国际组织中有战略思想的秘书处能够很好地计划各种会议，希望起到跨政府交流的作用。经常性的互相影响能改变官员对他们的活动和利益的看法。鲍尔、普尔和德克斯特在讨论美国对外贸易的政治时指出，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各类利益集团对决策的压力会导致人们用完全机械的观点去看待持续的过程，而且会忽视交流有逐渐改变“自私”观念的重要作用。②

国际组织参与的条件

当跨政府关系在某个特定的领域中普遍形成时，在什么样条件下我们可以预期国际组织即跨政府组织会参与进来呢？有一些情况比较明显，即国际组织本身产生了精英网络。因此，考克斯和雅各布森描述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特征是它们具有广泛的“参与亚体系”，把各国的工会、雇主和政府官员同国际劳工组织的秘书处联系起来，保健专家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僚机构联系起来。③

---

① 依据1972年与斯特朗的谈话。

② 鲍尔、普尔和德克斯特：《美国的商务和外交政策》，纽约，1963年，第35章，尤见第472页—475页。

然而，更一般地说，我们预期国际组织在需要由某种中央枢纽或中央机构进行协调的问题上会逐渐卷入跨政府的政治，这就是指国际组织很有可能最广泛地卷入复杂的、多边的问题，因为在这些问题中，主要的行为者认识到，他们需要信息，也需要与其他行为者交流。这些都要在斯科尔尼科夫列举的传统功能之外加上去。这些传统功能是："(1)提供服务，(2)建立规范和进行分配，(3)监督遵守规则和解决争端，(4)开展行动。"[4]只要政治模式采取了跨政府的方式，行为者数量的增加往往会使他们更需要同别的(往往是不同类型的)行为者进行交流，也更需要有关技术和政治状况的信息。由知识渊博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国际秘书机构，即使没有传统的权力，也有机会把自己置于这个重要的交流网络的中心，从而产生像中间人、促进者和新方法建议者那样的影响。它们仍将依靠各国政府来获得资金和合法权力。但政府的有关机构也可能会以这一整个系统中合法行动者的名义依靠它们获得信息和政策协调，这些是实现其自己的目标所需要的。

国际组织及其对跨国体系的干预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与世界政治和国际组织有关的两个方面，即跨政府联盟的活动范围和联盟的成员。由

---

③ 见雅各布森：《世界卫生组织：医学、地方主义与管理政治》，第194－205页；考克斯："国际劳工组织：有限的君主制"，载考克斯和雅各布森编：《影响之剖析》，第114－127页。

④ 斯科尔尼科夫："科学与技术：国际机构的含义"，载《国际组织》，第25卷(1971年)，第772页。

表 2 “人才外流”的跨国体系

	非律宾的村庄	马尼拉（出口处）		波士顿（入境港）	配备外国医生的美国医院
政策干预点，与可能减少“人才外流”的措施或促进“人才外流”的反策略	1 非律宾国内（通过财政或其他刺激性措施，劝阻医生留下）	2 非律宾边界（拒发出口签证或强征出境税）	3 国际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派医生到非律宾）	4 美国边界（限制人口签证）（反策略：鼓励熟练技术人员入境）	5 美国国内（对外国医生歧视）（反策略：招聘外国医生）

国内措施、边界控制和国际组织，原则上都可以相互补充、抗衡或替代。因此，从整个体系的观点来看，政策问题抽象地说，不过是发现最有效的某个干预点或某一组干预点。对于货币体系，一位经济学家也许会问：金融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外汇管制和（或）贸易壁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规则变化等等，哪一种组合会产生所想得到的平衡？实际上，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并在不同的政策干预点上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它们在体系的管理上有共同的利益，但也很有可能发生冲突。某些既得利益者宁可只使用某些潜在的政策干预点，而且只通过特殊的方式。另一些既得利益者可能会反对全面控制跨国体系，因为他们会从这个体系中获得利益。因此，选择干预点本身就是重要的决策，它对随后的行动施加约束。只要对某一个国际组织的控制对跨国体系产生了影响，或提供手段以阻止对这一体系中其他某个政策点进行干预，这个组织就可能成为在政治冲突中举足轻重的组织。

行为者的策略和国际组织的用处

如果跨国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中都是重要的，那么，仅仅从"主权"和"国家利益"方面来解释其结果是不够的。其中还有一个分配问题。一些行为者可能会认为他们反而受到跨国活动的影响，并将寻找策略去对付这些被觉察到的问题。

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作出的最明显反应是利用主权来反对跨国方面的敌手。只要在国家有效的控制范围内，拥有国家政治力量的群体就能够扭转不平衡状态。在国际贸易领域，设置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是常见的策略，为了限制直接投资，偏向本国的群体可以采用没收、严格控制或禁止资本和技术流动的办法。如美国的劳联－产联支持限制性的伯克－哈特基法案作为立法手段来解决"逃出工厂"和"职业出口"的问题。

在相互依存的背景下，国家寻求解决办法的主要困难，在于这些办法不但不起作用，反而可能引起国家之间的政策冲突，因为各国政府都试图抵制其他政府的行动所造成的有害影响。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损人利己"问题，适用于相互依存关系较强的各种问题。国家采取行动减少**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有害影响可能产生加强**政策**相互依存关系的矛盾效果，就是说，这种措施可能由于某些政府要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必须增强对其他政府的行动依赖的程度。

在这种政策相互依存的情况下，政府的从属单位可能会求助于跨政府的政策协调或建立跨政府联盟，如同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利用现有国际组织来促进这些关系。然而，在非政府行为者作出大量跨国行动的背景下，这不仅可能导致跨政府联盟的建立，而且有可能成为非政府代表和政府代表的混

合联盟。例如，根据海洋法会议预备会的一次叙述，美国内政部的官员和某些多国企业的代表（两方面都赞成广义的大陆架定义）游说外国政府代表反对美国已经宣布（由国务院和国防部提出的）狭义的大陆架政策。[1]

对于政治储备力量主要在国内的行为者来说，这种策略并不适用。行为者一旦觉察到国家自我分隔的策略徒劳无益，或者试用这种策略而没有取得成功时，他们可能设法使问题政治化（即增加对问题的争论）。他们会希望通过不断增加的争论提高政府对该问题的重视——以便减少跨政府的和跨国的政治策略的范围，然后由中央政治官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直接对公众负责的官员——在国际上与代表本国利益的群体进行谈判。这可以称作坚持国家利益的策略（以1971年的尼克松－康纳利政策为代表），有别于（伯克－哈特基法案所表明的）保护国家的策略。因此，正如罗伯特·拉塞尔指出的，随着关于货币问题的争论增多，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与实际工作的官员中结成的跨政府联盟甚至在1971年事件前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2] 这种策略很可能会导致以不同前提为基础的国际组织的衰落。然而，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地利用国际组织引起高层官员注意，这些问题也可能政治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就是贸易领域的一个例子，联合国对跨国公司活动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说来，任何问题都不可能无限期地得到政府的高度

---

① 这种情况是两名政府官员对我们叙述的。又见霍立克："海床造成了奇怪的政治"，载《外交政策》，第9卷（1972－1973年）。

② 拉塞尔："1960－1972年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跨政府交叉"，载《国际组织》，第27卷（1973年）。

重视。政治化也许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至少能为政府下层官员解决特殊问题建立新的结构和提供新的设想。国际组织在这个"非政治化"阶段也可能是重要的，它再一次促进跨政府联盟。但重要的是，如果真正出现重组，由此形成的联盟便和从前不同了。在早期不能实现的潜在联盟，现在也许变得有可能结成，不同的群体都可能得益。因此，为监督汇率的浮动而设立的一个国际货币组织会与六十年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很大不同，因为后者的前提是汇率固定，但可调整。为把非关税壁垒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而设立的一个国际组织，与那种在数额上加以限制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相比，或许能给保护主义群体的联盟以更大的发展余地。

因此，和常见的情况一样，基本策略要在国家分隔和国际合作间作出选择，这是无可争辩的。国际合作有许多方面，对群体利益和规范的价值观来说具有颇为不同的含义。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利益集团的国际策略可能采取以下三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1)在确立的政策框架内利用跨政府联盟或跨国一跨政府的混合联盟，并通过已建立的国际组织；(2)把问题政治化，使之脱离跨政府的谈判，重新强调政府高级官员的作用；(3)作为政治化时期的后果，把问题重组，使新的跨政府联盟和混合联盟更为有效，也许是在新的或真正改变了的国际组织领导之下。尤其是第二种策略和第三种策略并不互相排斥，而可能是反映一个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当我们把国际化当作处理跨国问题的策略来考虑时，我们应该作出这样的区别。

结论

我们所选择的例子清楚地说明我们并没有把国际组织参与跨国联盟和跨政府联盟看作必然会促进全球的福利或平等。国际组织和其他政治机构一样，反映了其中强大的行为者的利益和态度。国际组织施加影响的机会决不能保证它们的自主性，或为公众造福的献身精神。在某些情况下，某些国际组织的机会增加，也许会导致罗伯特·杰克逊所批评的国际努力的支离破碎，或导致追求处境优越的集团的利益，而牺牲比较不幸的大多数人口的利益。跨政府政治对民主控制的效力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很严重的。[1] 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组织的影响以我们在这里提出过的一些方式扩大，也许是不可取的。没有什么魔杖可以让人们不必对国际组织的活动进行详细和逐一的合乎规范的分析。

就经验性的预测而言，我们的预测不同于国际功能主义者的预测，也不同于那些认为跨国体系和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各国政府过时的人所作的推测。[2] 尽管功能主义者的设想中有一些恰当可取的因素，但我们仍要提出下列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些看法更有一些道理。

跨政府关系的发展以及国际组织的参与其中，一般都是由上层分子试图应付已经增强的社会相互依存关系的行动而激发出来的。能动的非政府力量常常引起政府加强控制的努

---

① 见凯泽："威胁民主进程的跨国关系"。

② 例如，安杰尔：《和平在行进》；米特拉尼：《有效的和平体系》，芝加哥，19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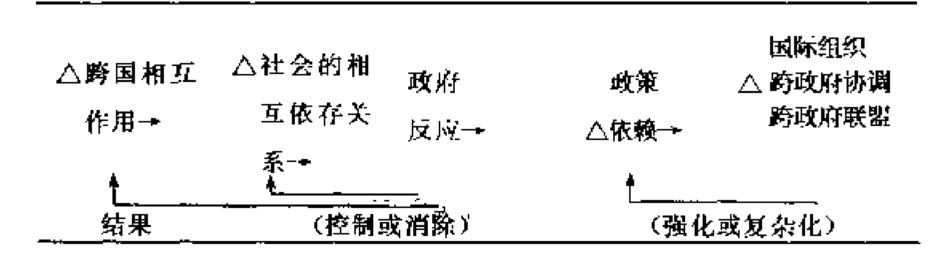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力。然而，作为上层分子之间交往的增加所产生的副作用，跨政府政治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可能增加政策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是说，有关的行为者——各国政府的中央外交决策机构、其他政府机构、跨国的行为者或国际组织的秘书处——的政策将越来越取决于其行为的成功或其他行为者的反应。屈从某种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也许就是为了避免屈从另一种形式而付出的代价。应付政策相互依存关系的努力必然将进一步扩大国家之间议事日程的范围，涉及更多的官僚机构（国家的、国际的和跨国的），因此为跨政府关系提供更多机会。对于最高领导人来说，这将进一步引起问题，即对自己的权力范围以及对跨政府进行活动的官僚机构失去有效的控制。赞成跨政府政策模式的群体和那些支持坚持国家利益或保护国家利益的群体之间的持续斗争可能会延续下去。表3简单地用图示方法说明可能造成这类政治斗争的因果关系。

这不是说国际或跨国的解决办法优于国家的解决办法，也不是说国际机构总是只有长处。我们只是想确定国际组织在某些有争议的领域——如在跨政府联盟的活动场所和成员中和跨国体系的潜在干预点——中所起的政治作用。国际组织不一定会"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国家的行为者的活动场所"，或因为它们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一致"而就是软弱的。[1] 哪个官僚机构代表国家？谁确定"国家利益"？它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是否存在着跨政府的协调？是否存在着跨政府的、跨国的和国际的行为者的混合联盟？从这些问题来看，那么总是而且只有跨国组织"忙于来往于各大洲之间，编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8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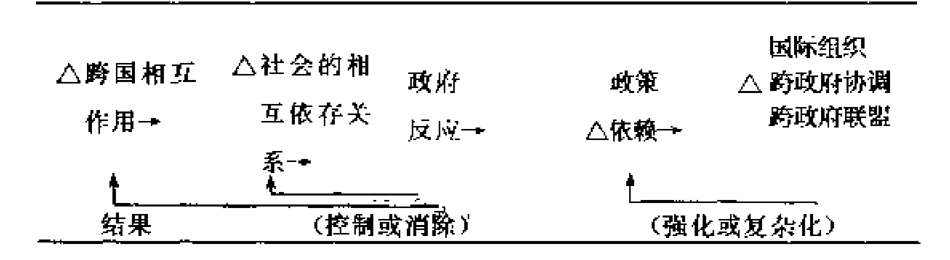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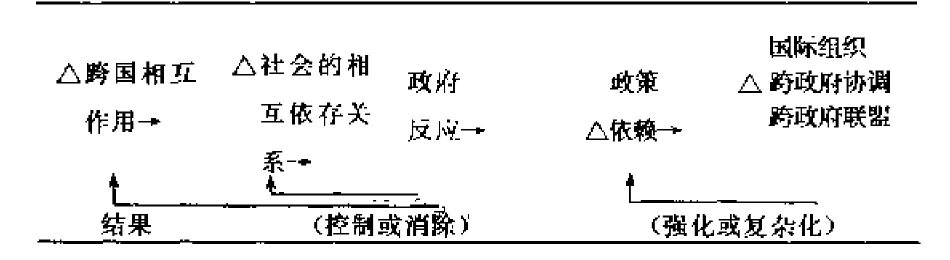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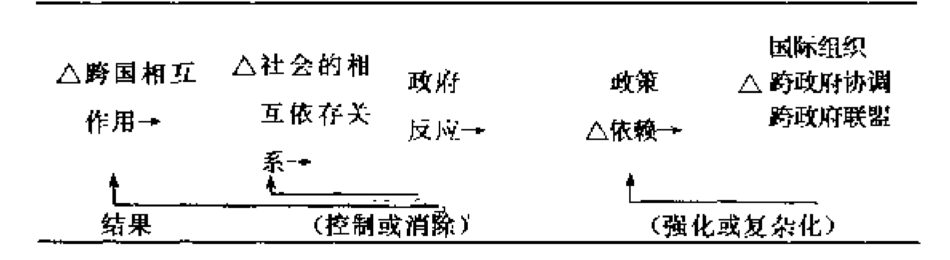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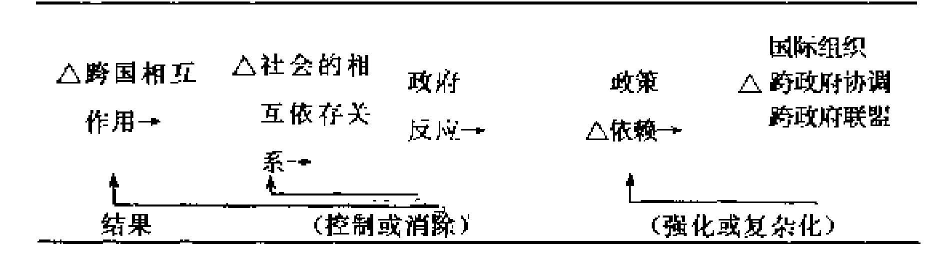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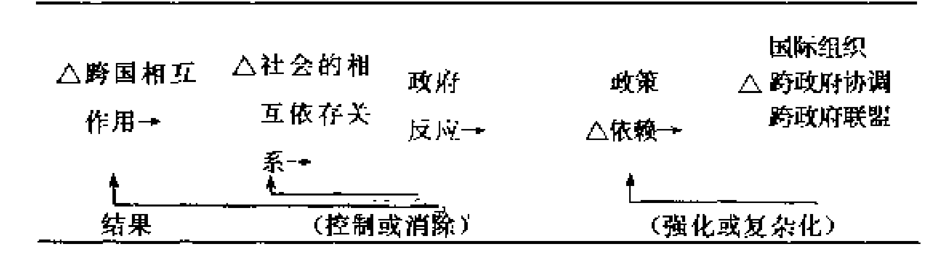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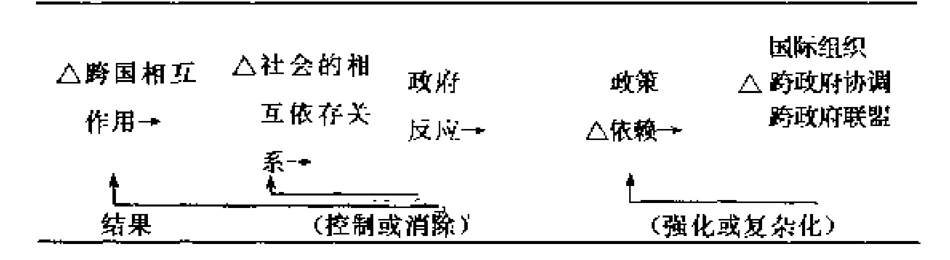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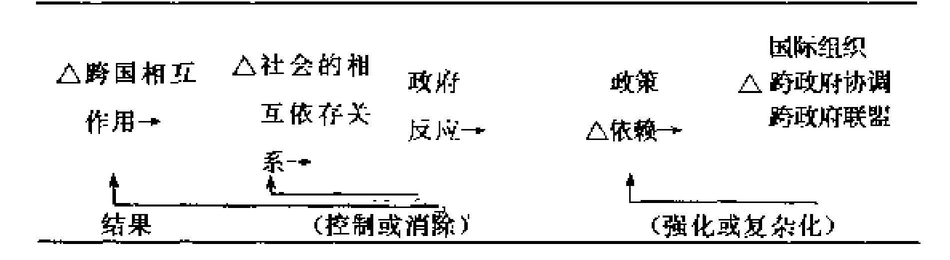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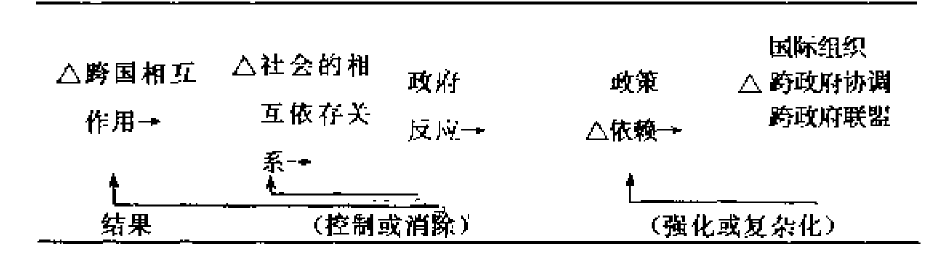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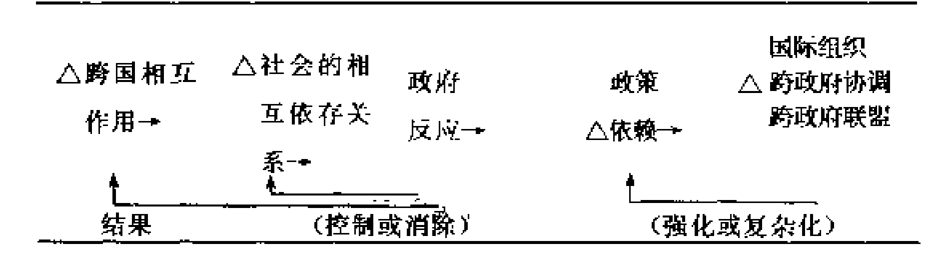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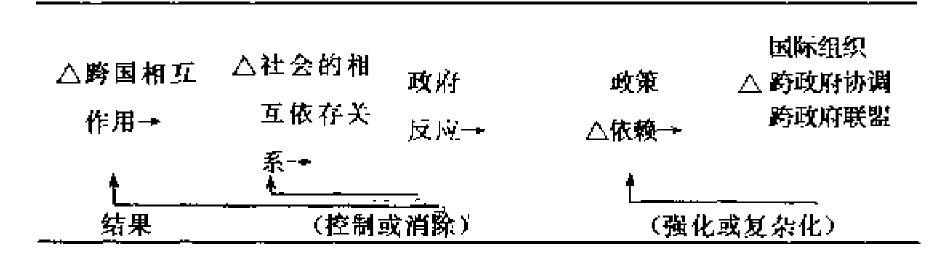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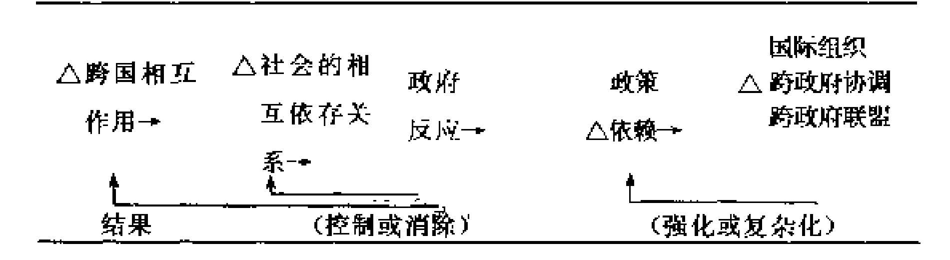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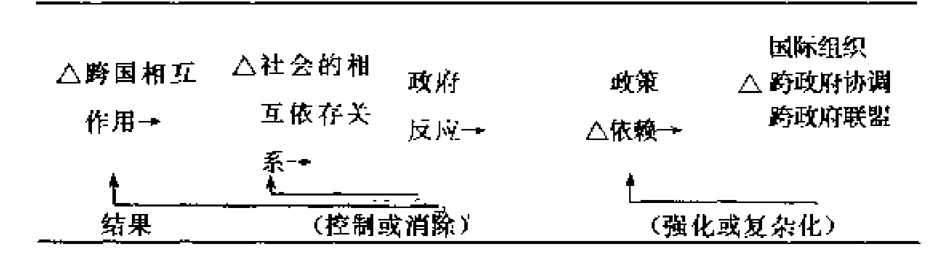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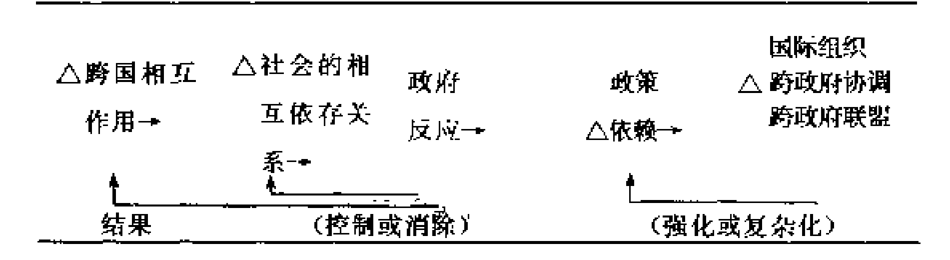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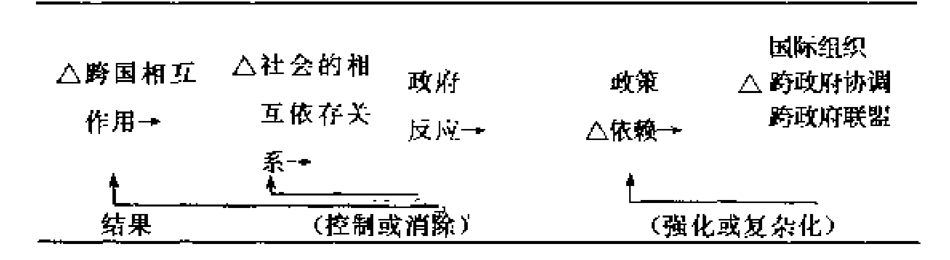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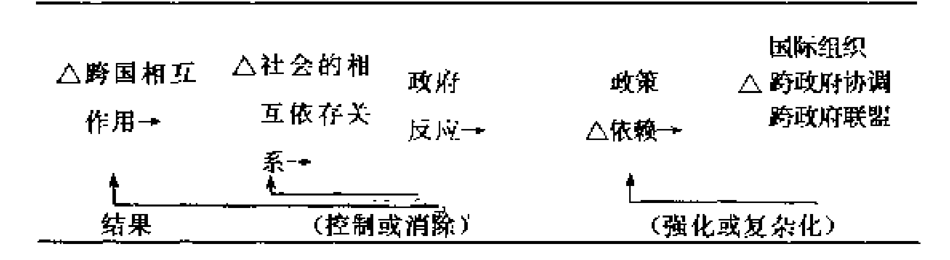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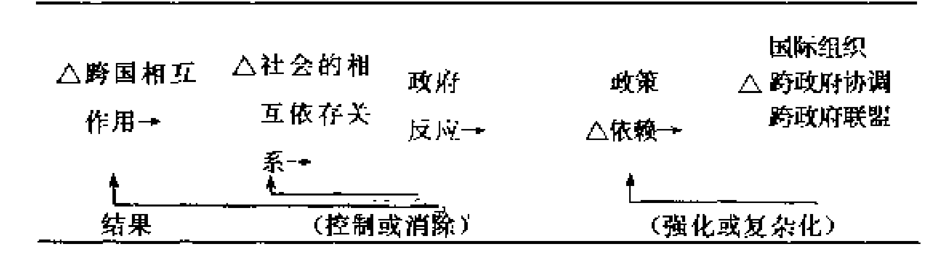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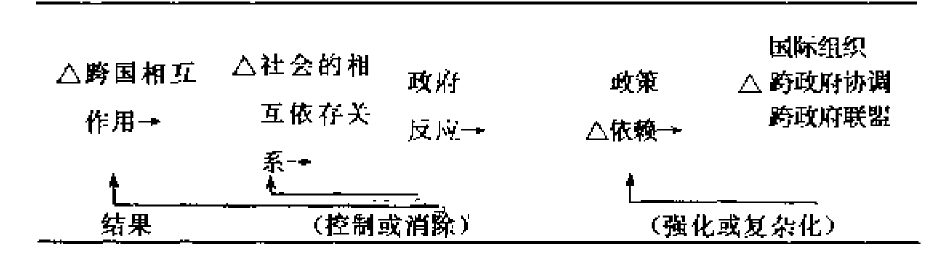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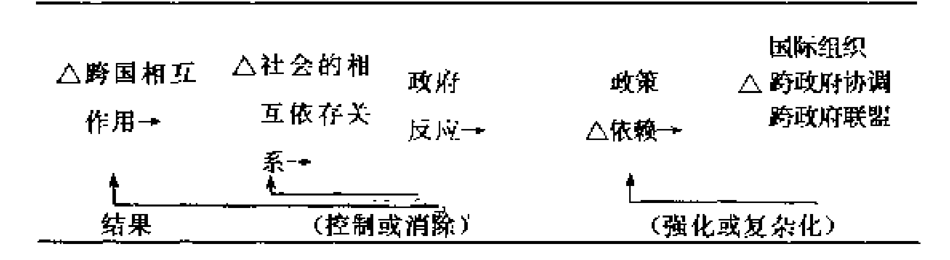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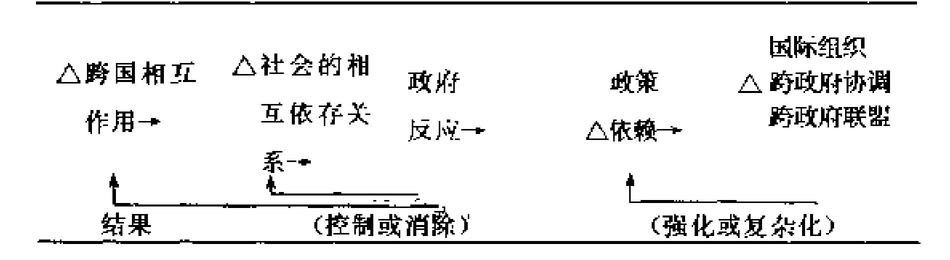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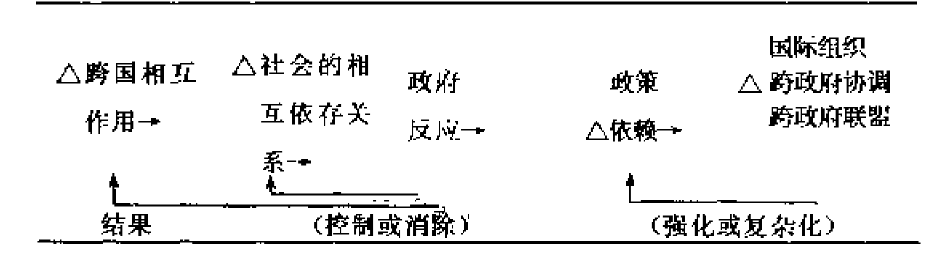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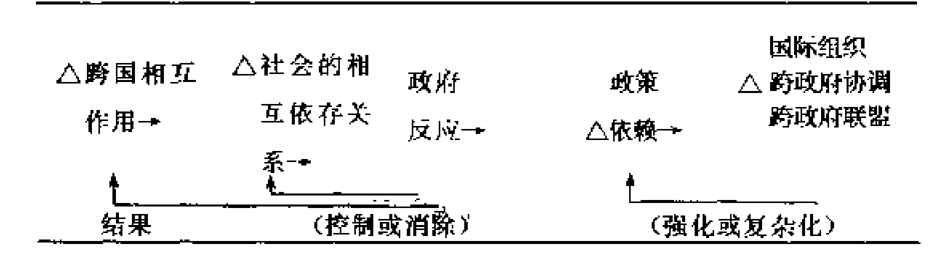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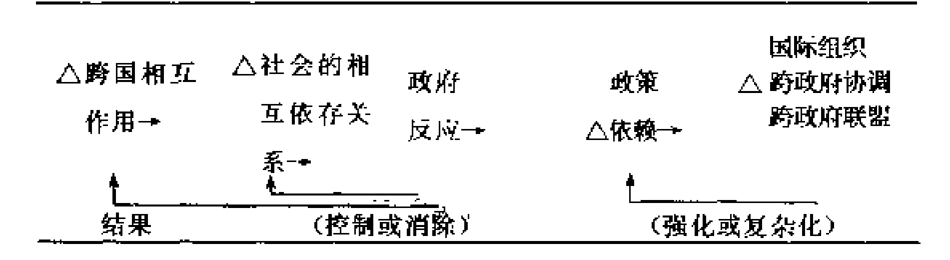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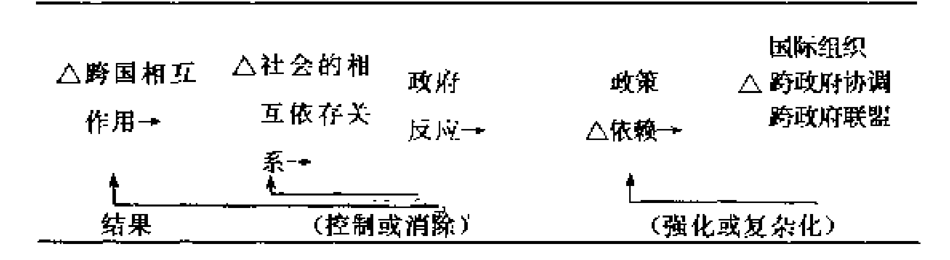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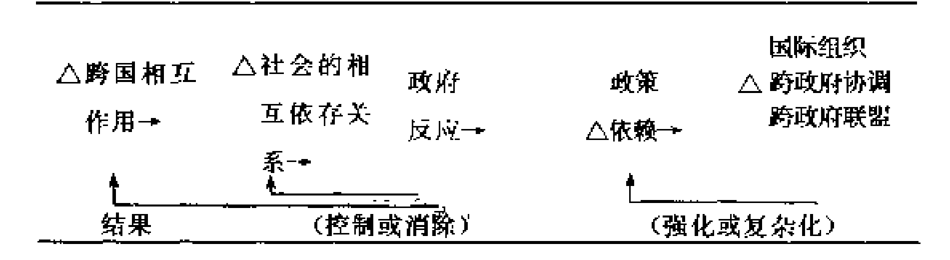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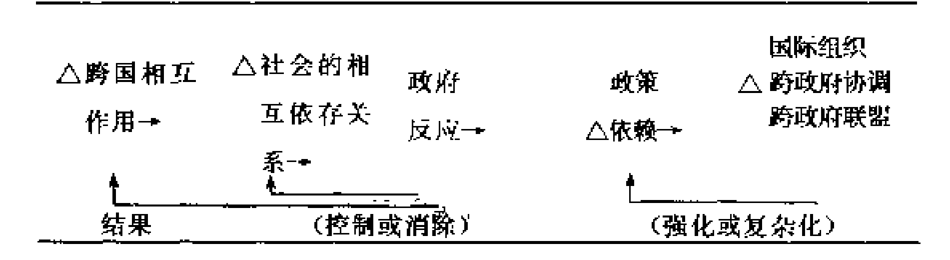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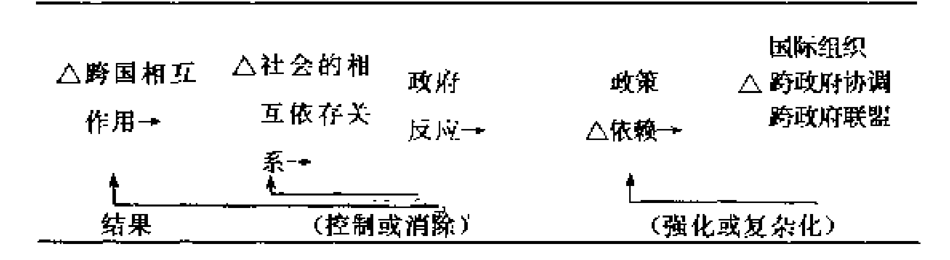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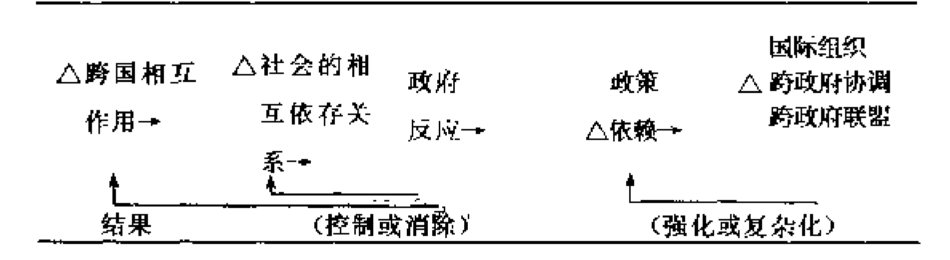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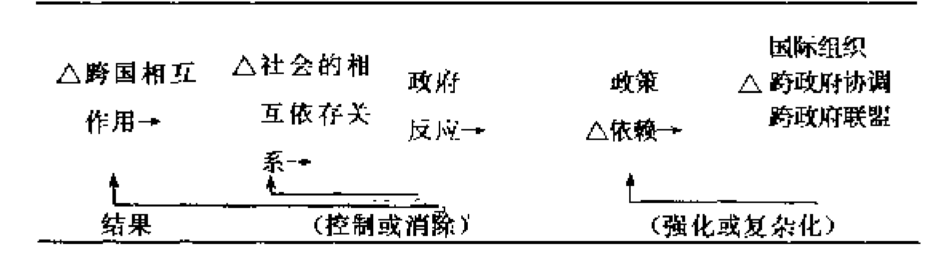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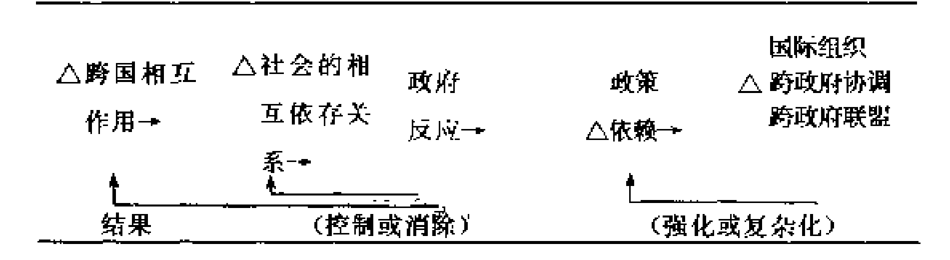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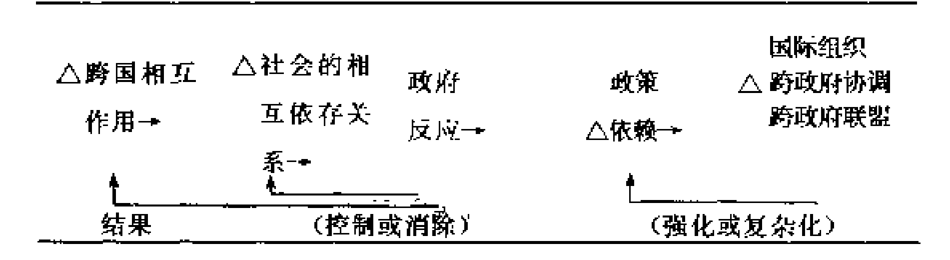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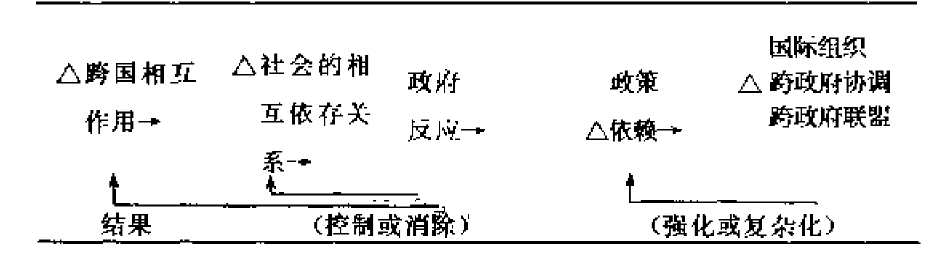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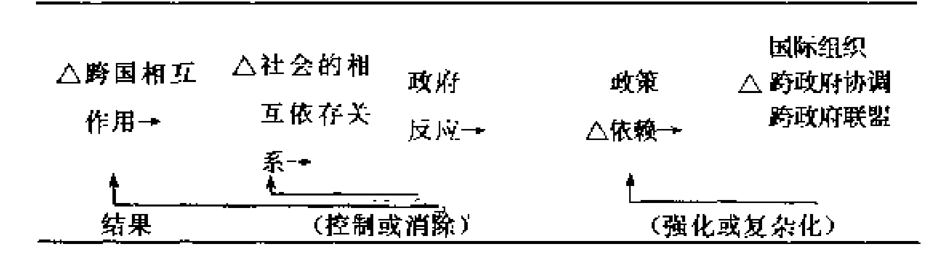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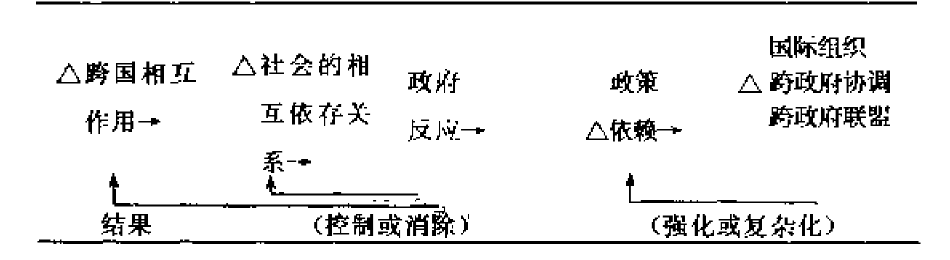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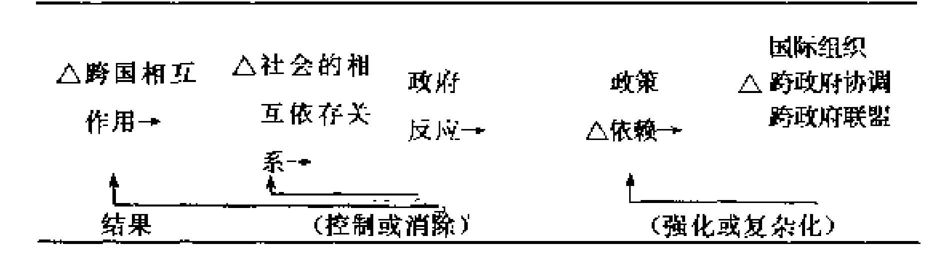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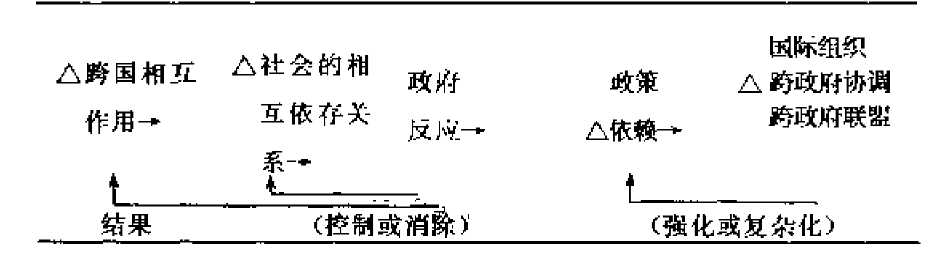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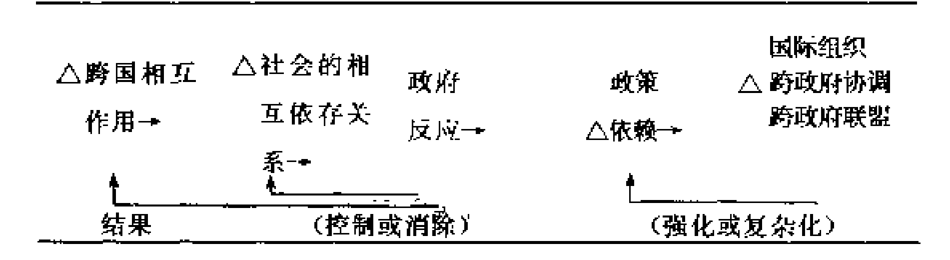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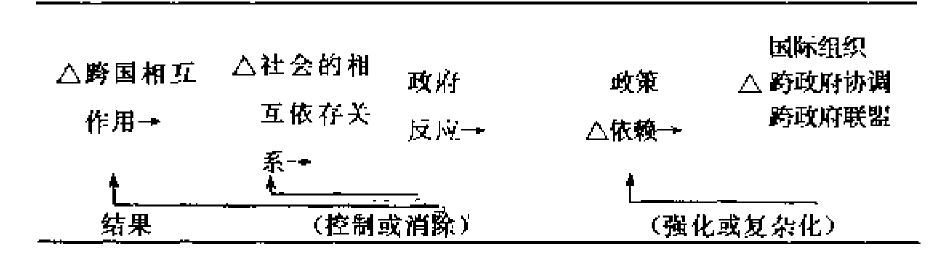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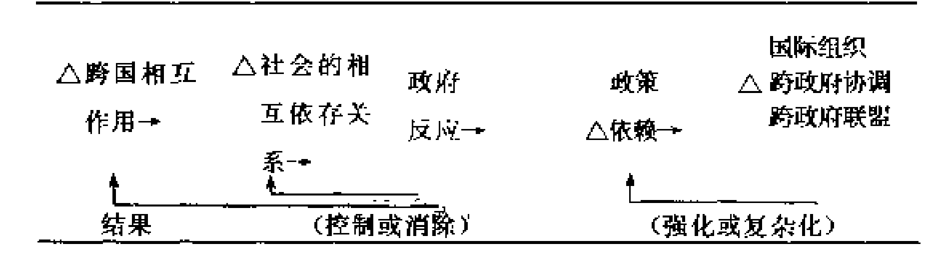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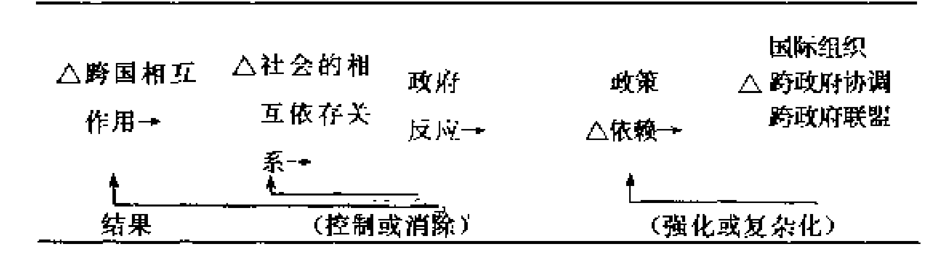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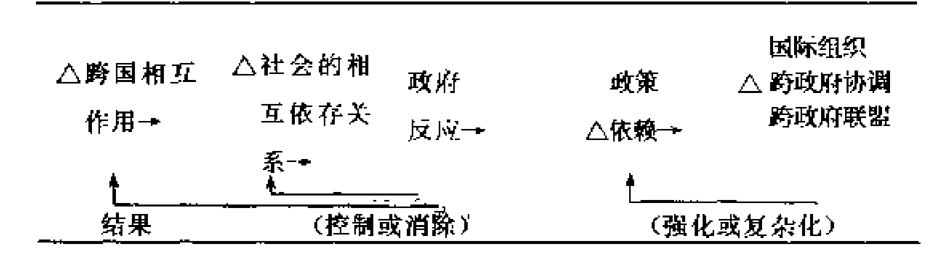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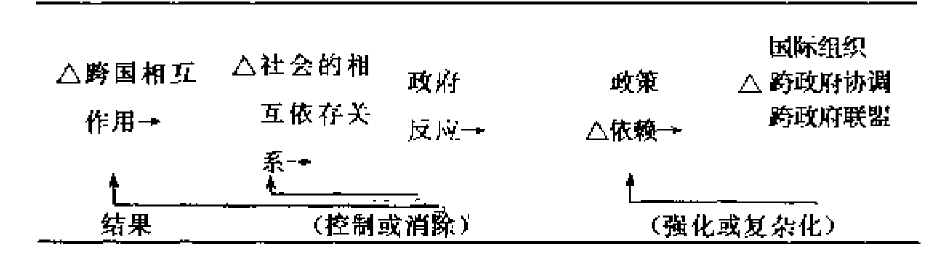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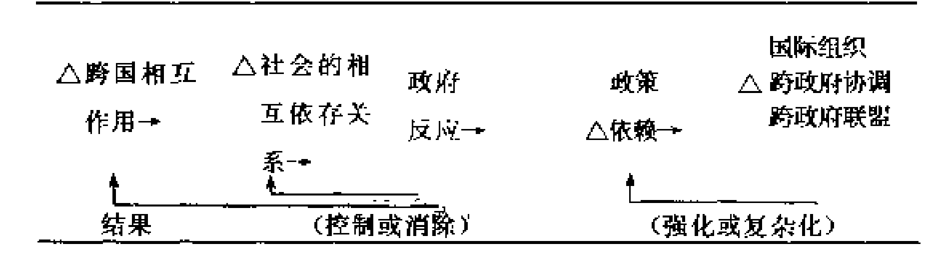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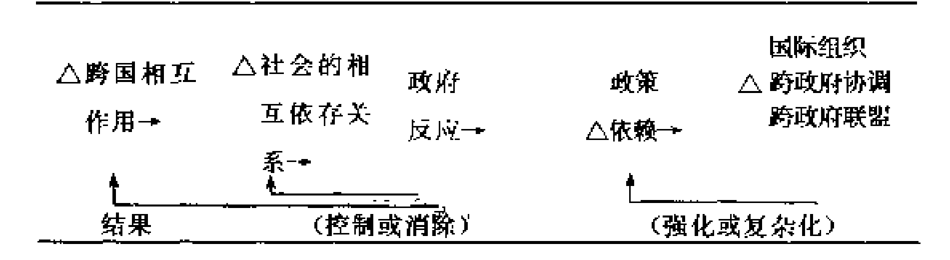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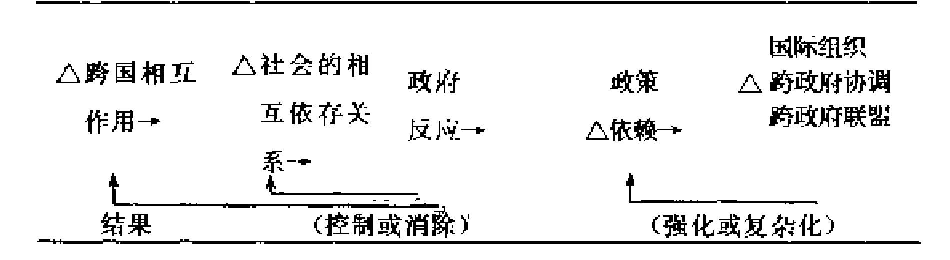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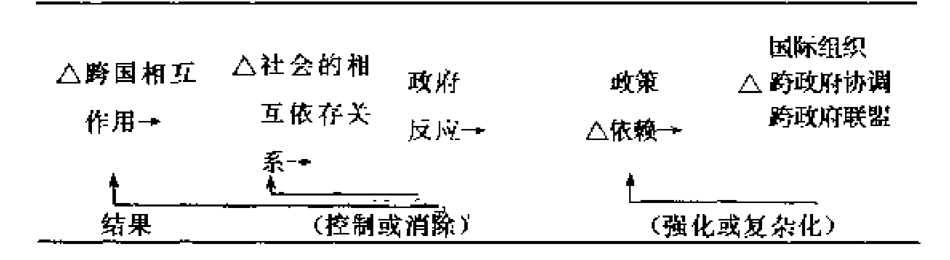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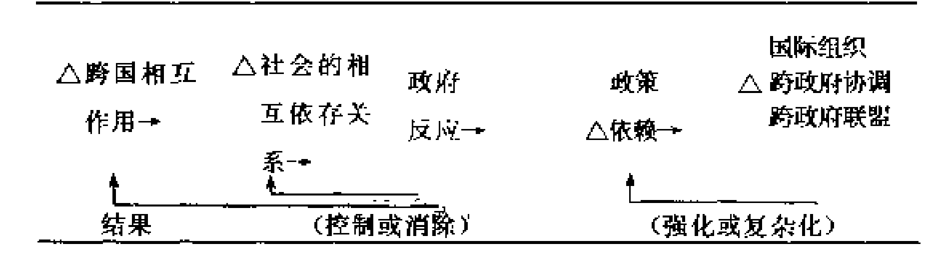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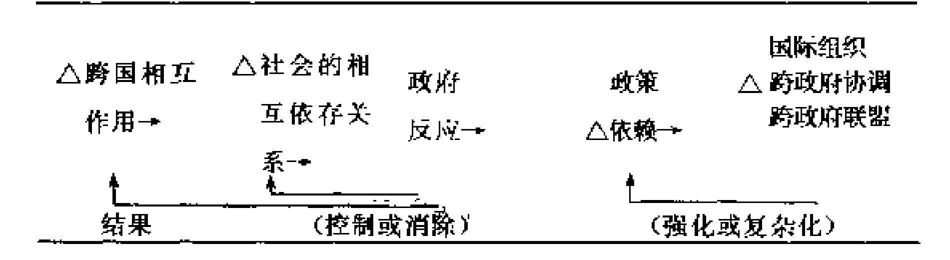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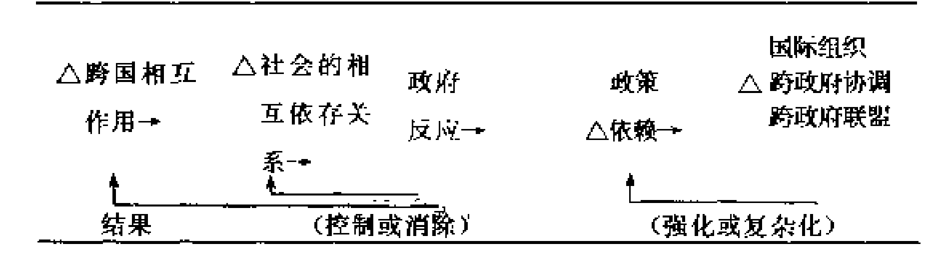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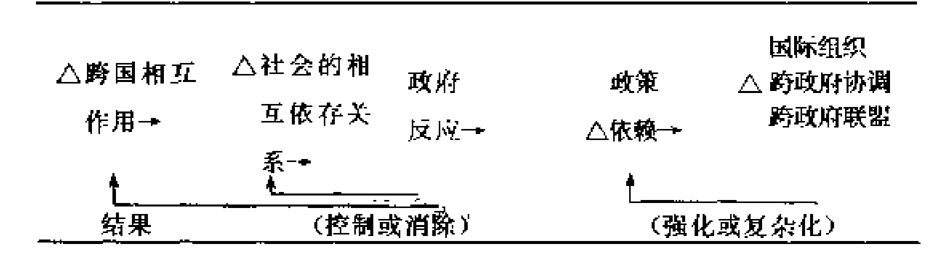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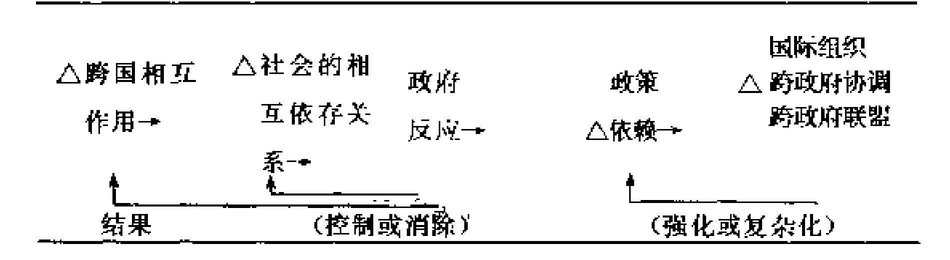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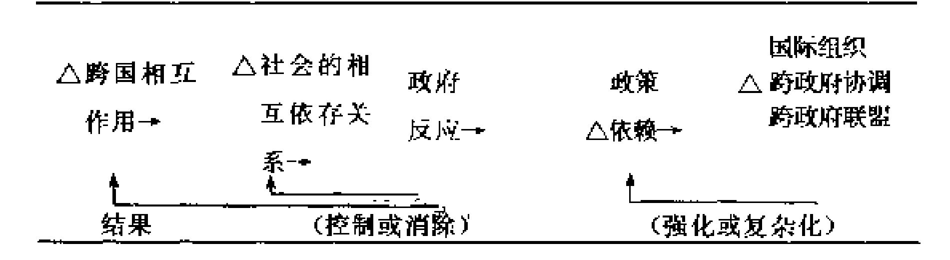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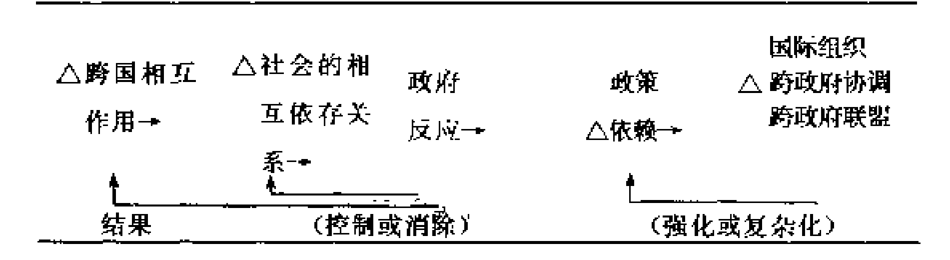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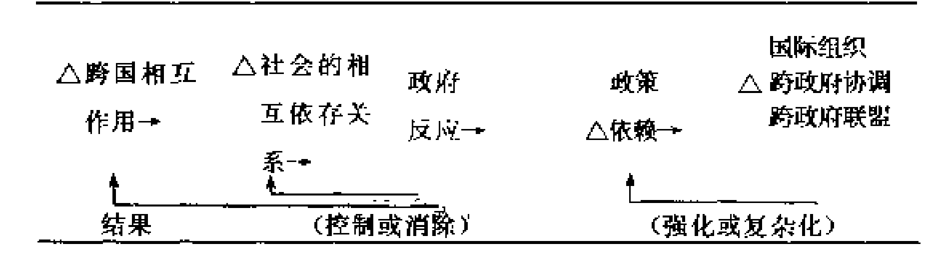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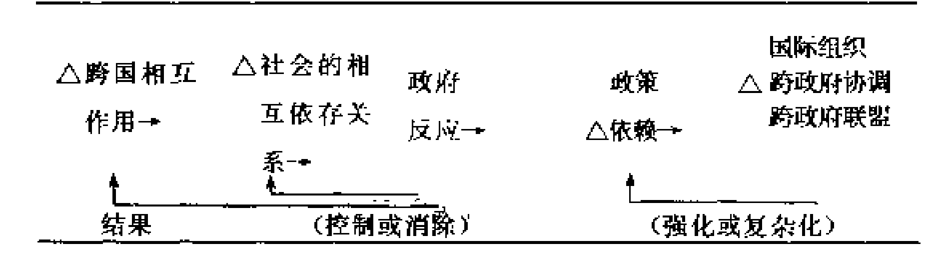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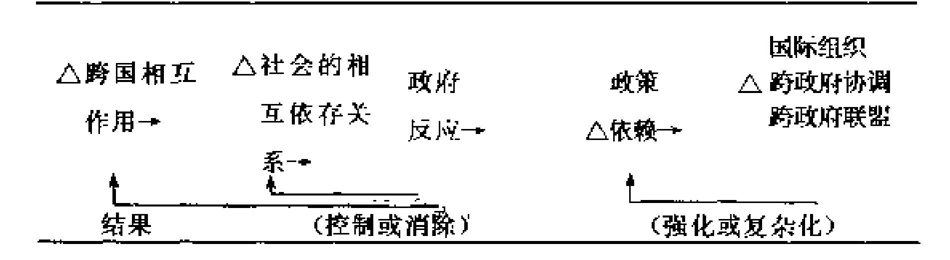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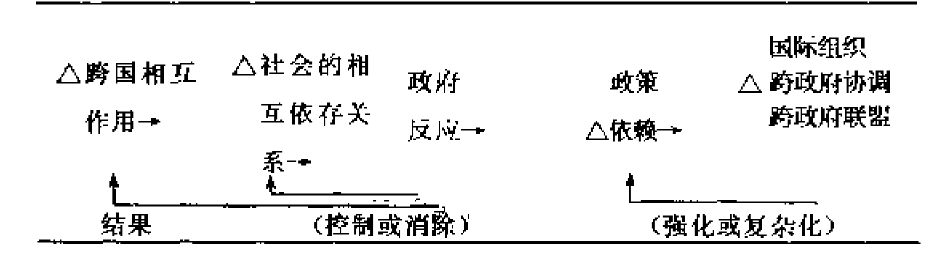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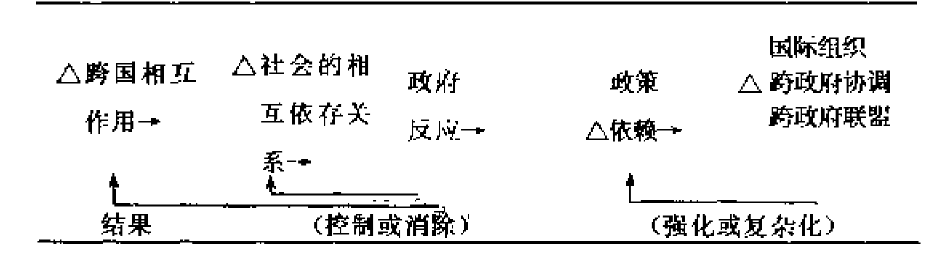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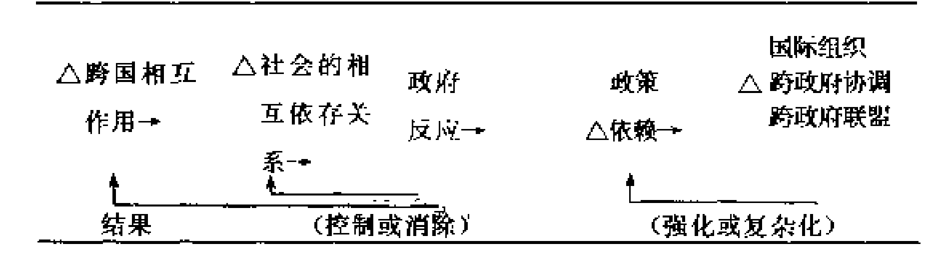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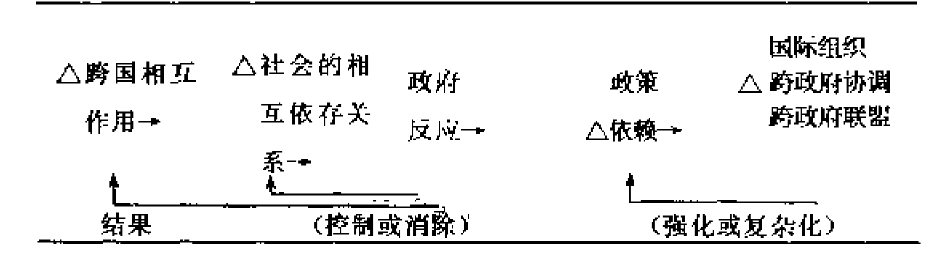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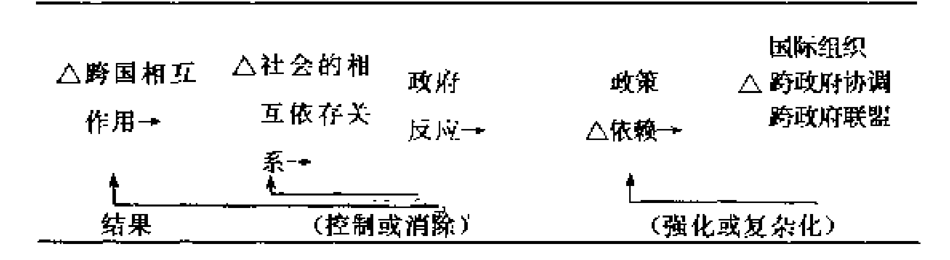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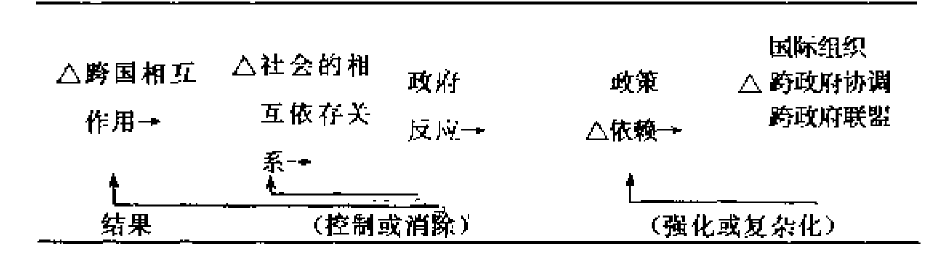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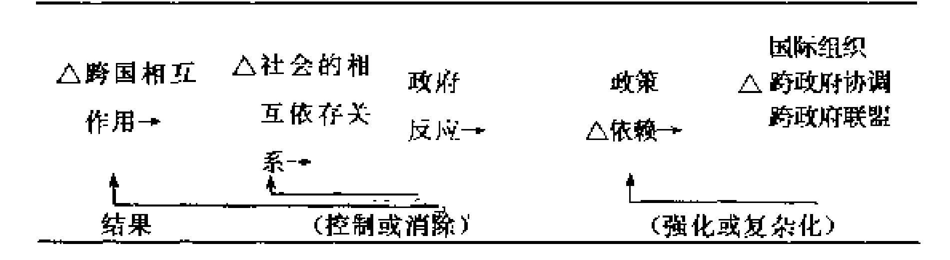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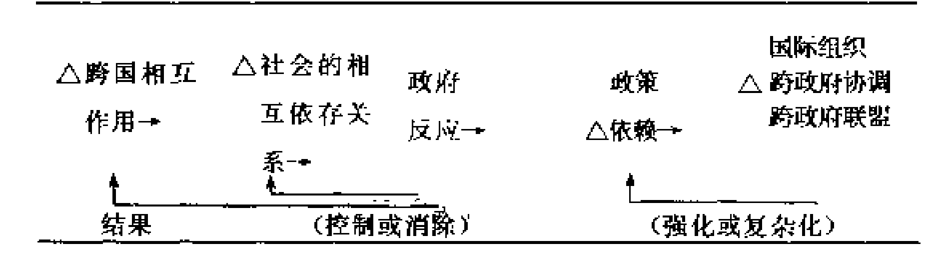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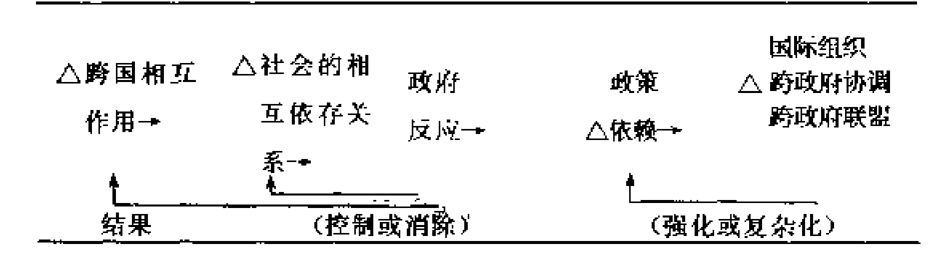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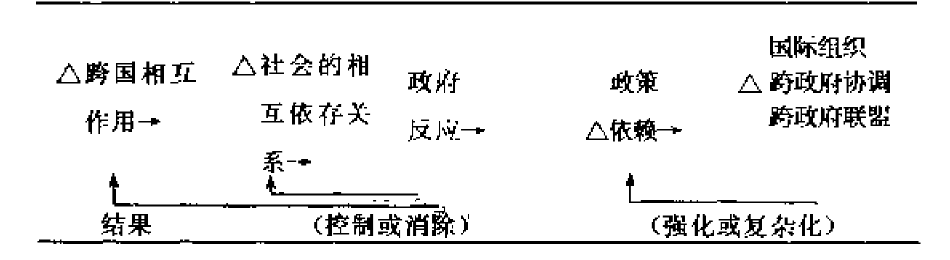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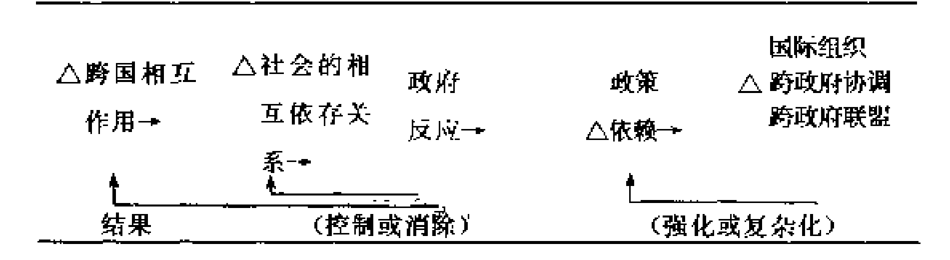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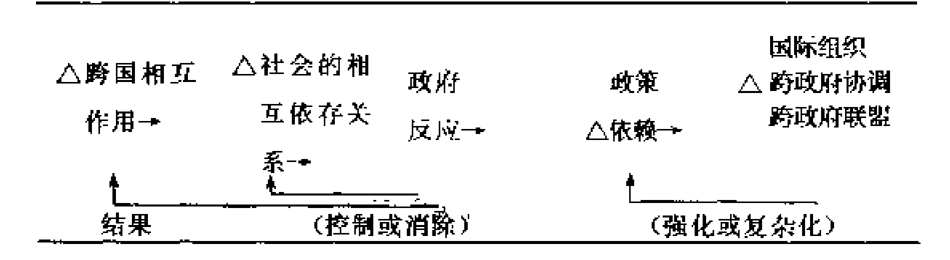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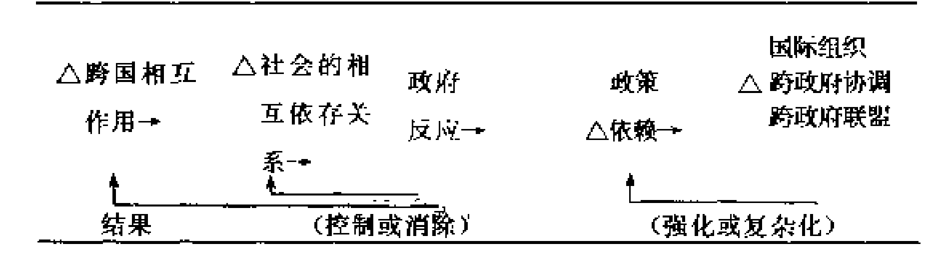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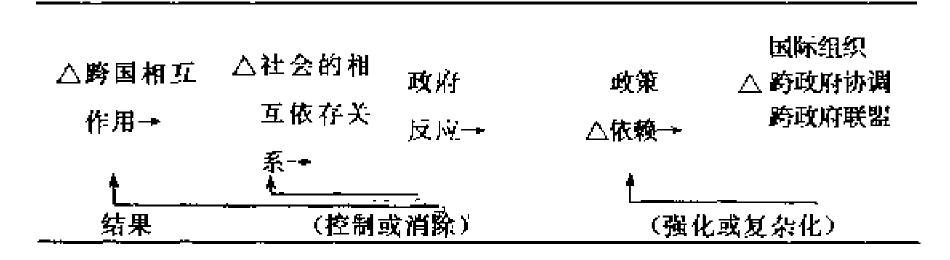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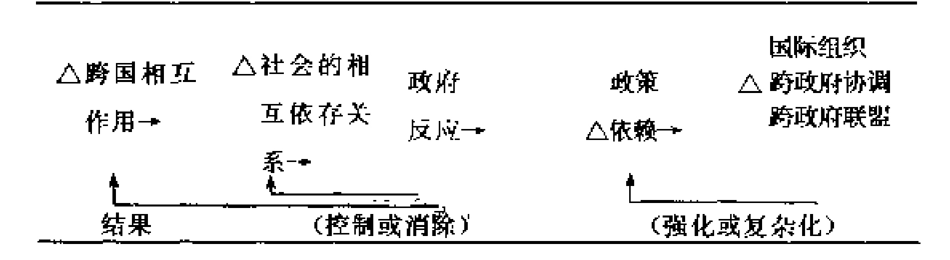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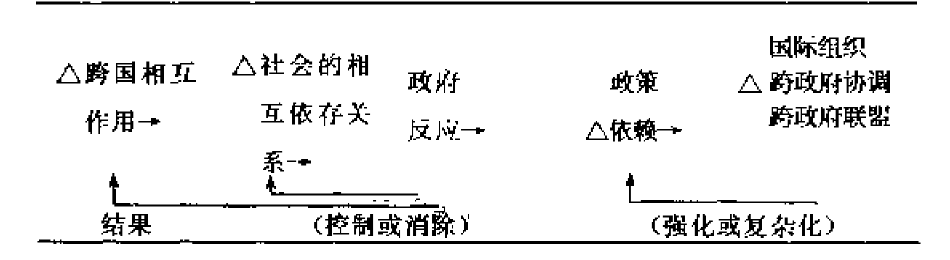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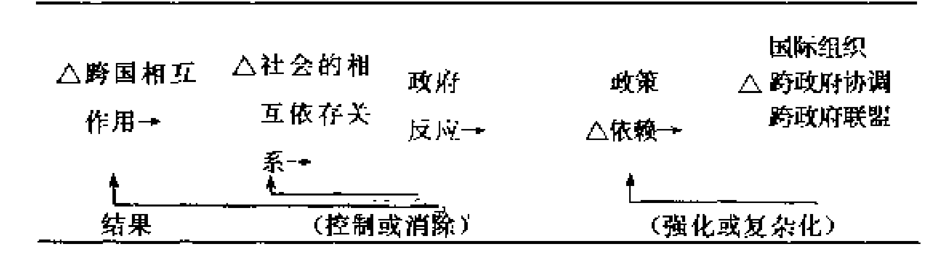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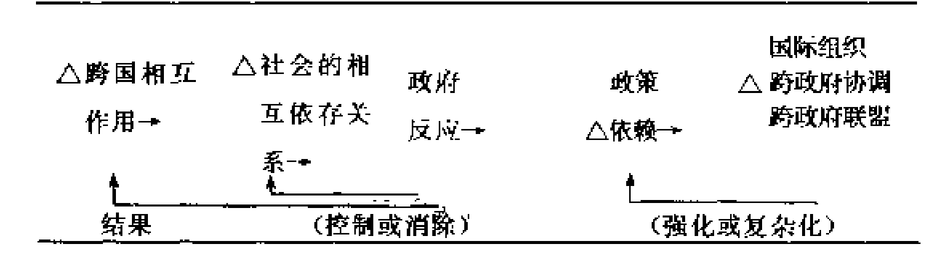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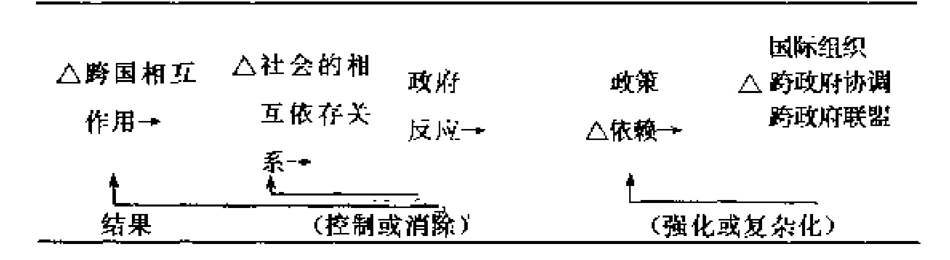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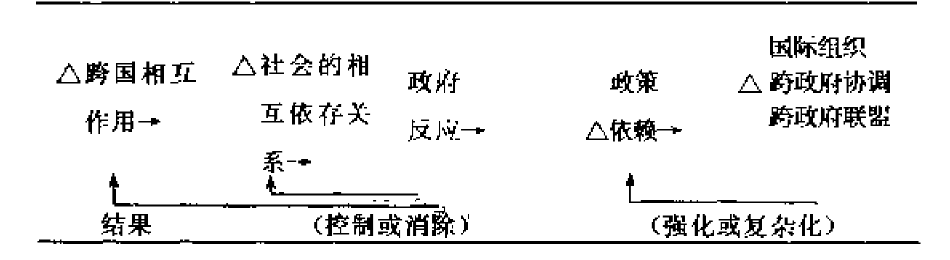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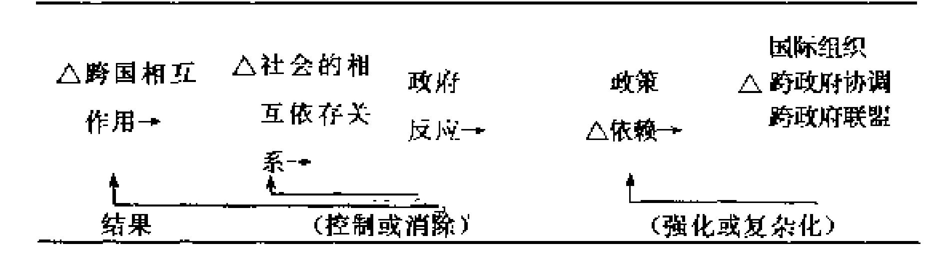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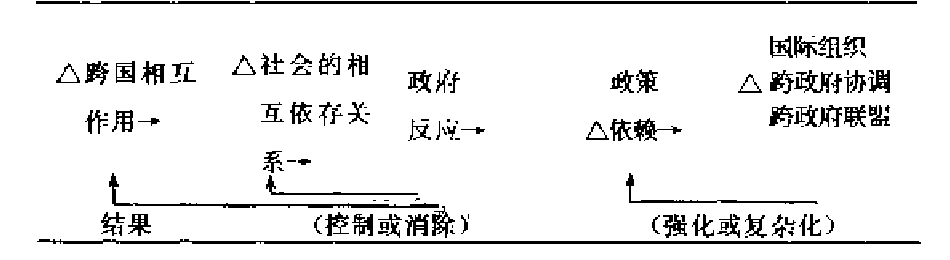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 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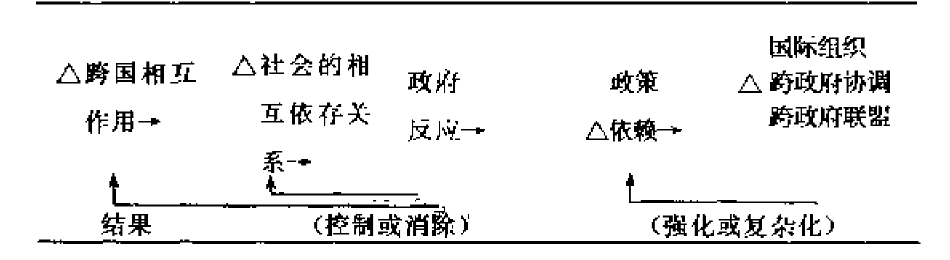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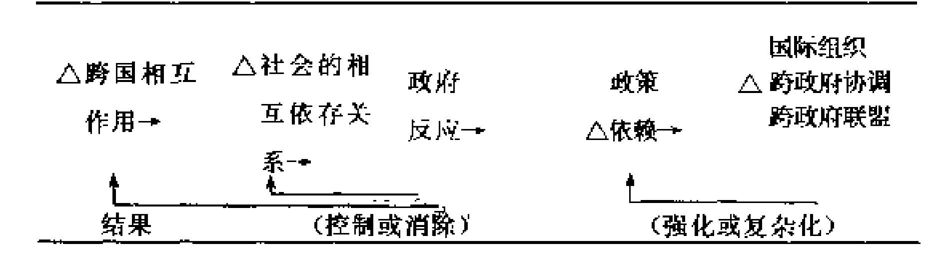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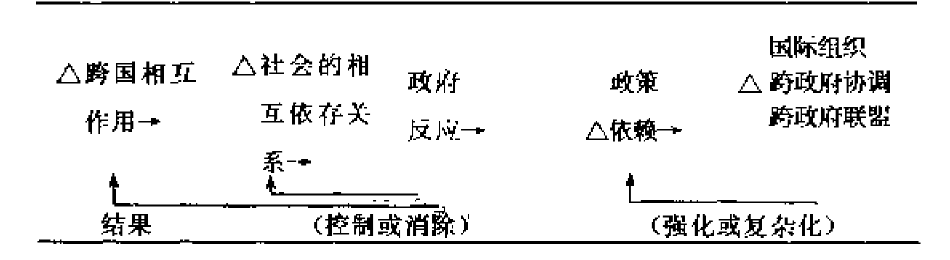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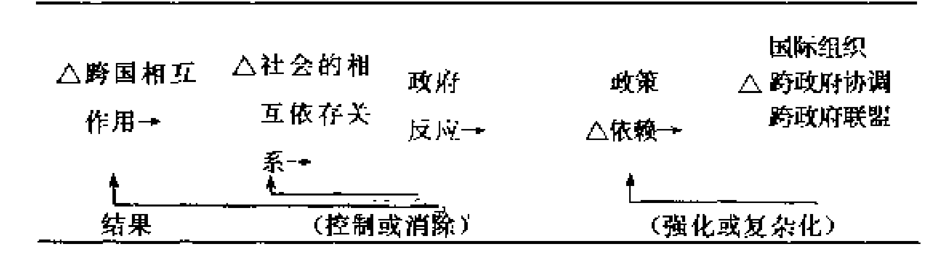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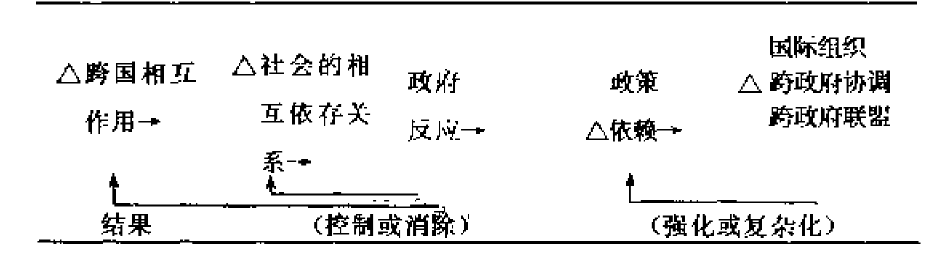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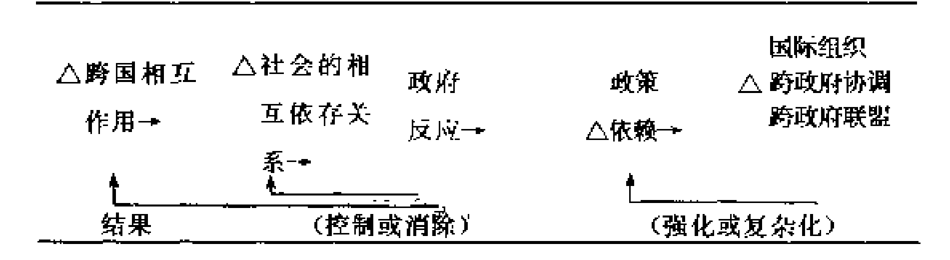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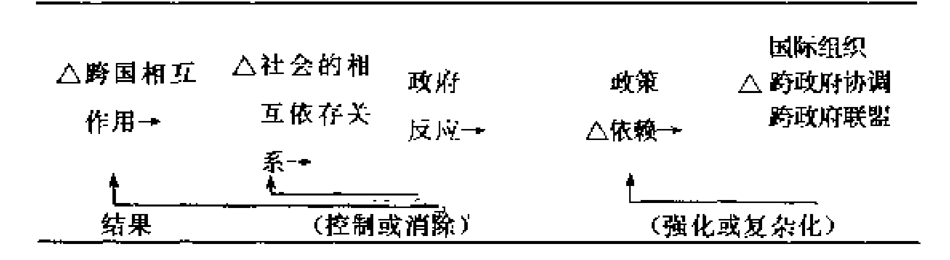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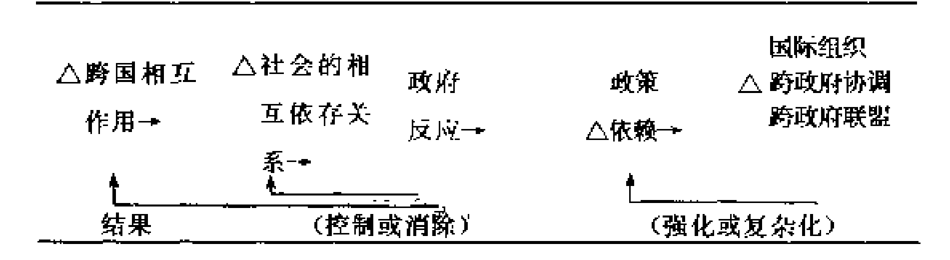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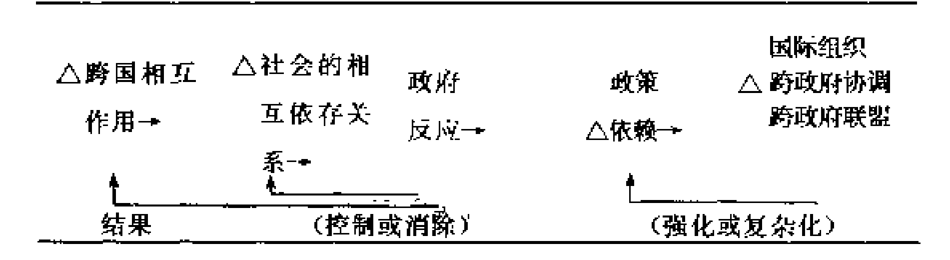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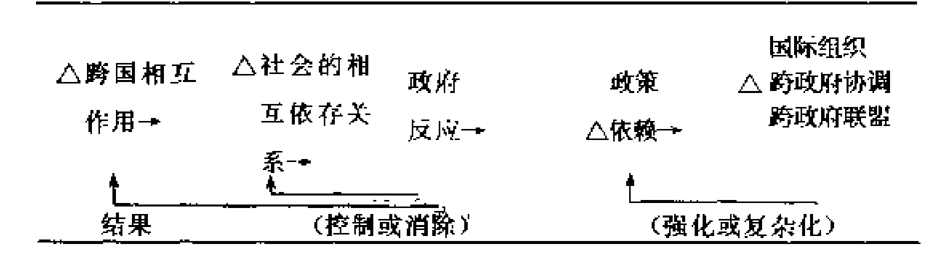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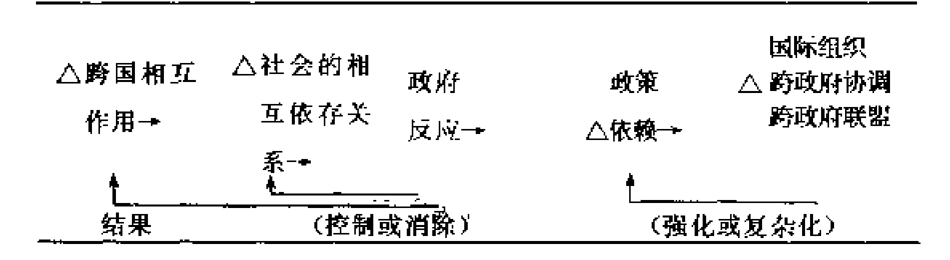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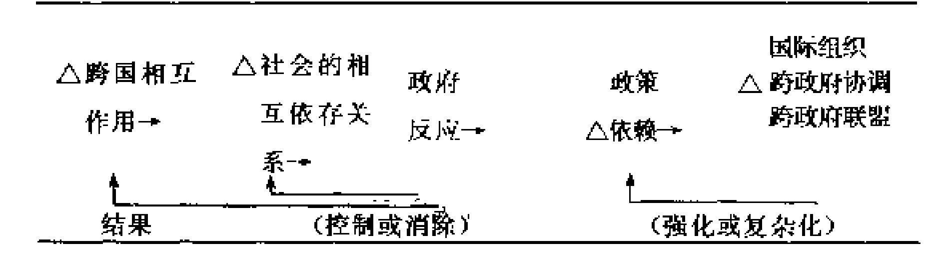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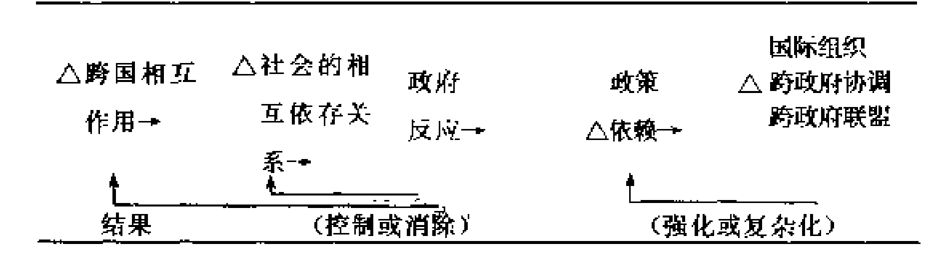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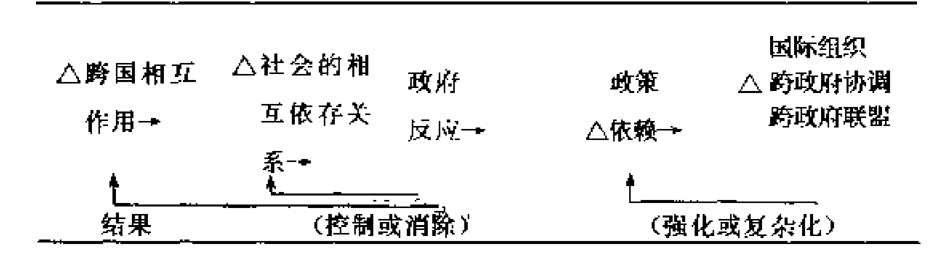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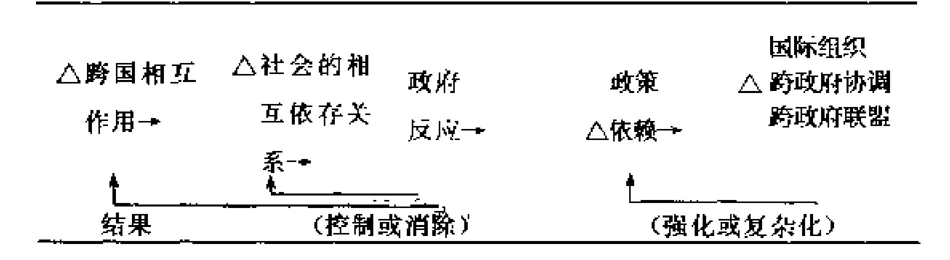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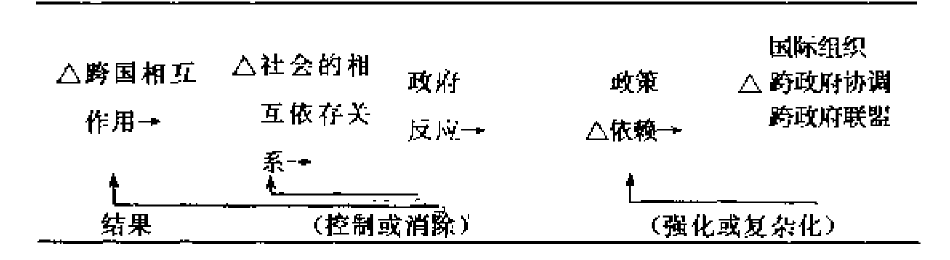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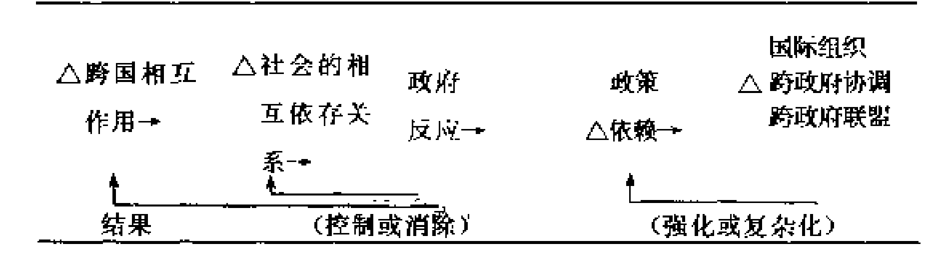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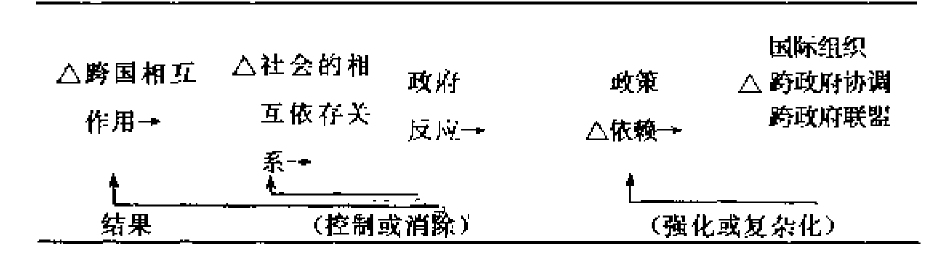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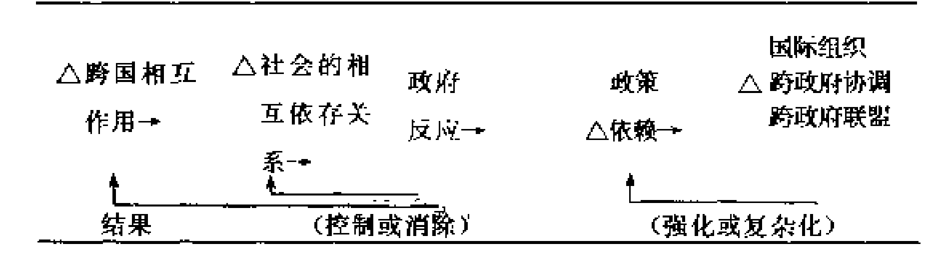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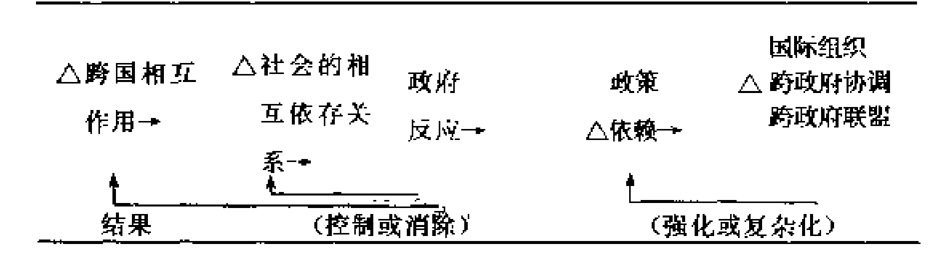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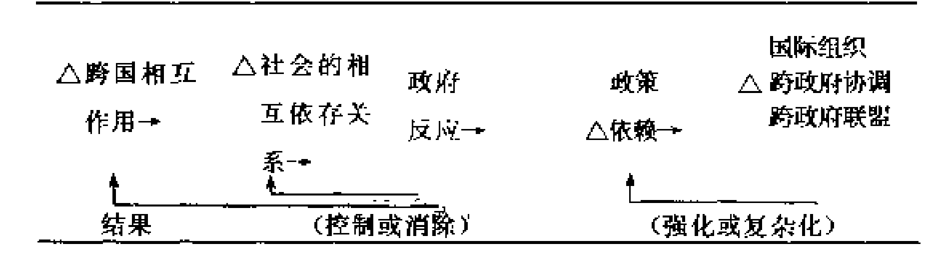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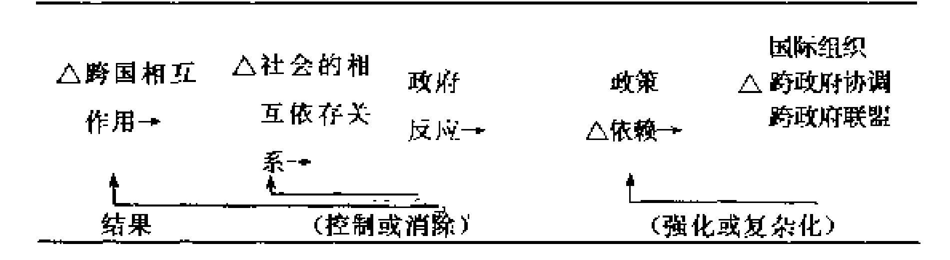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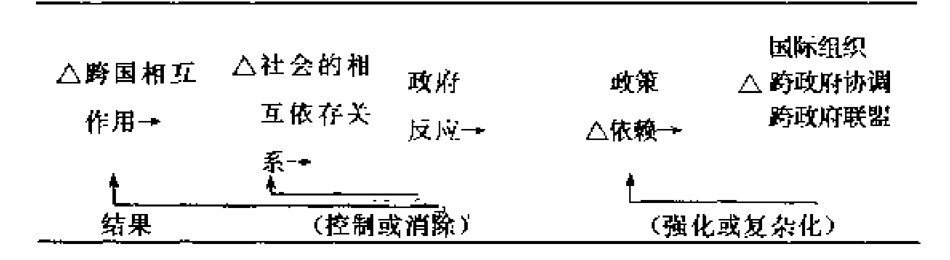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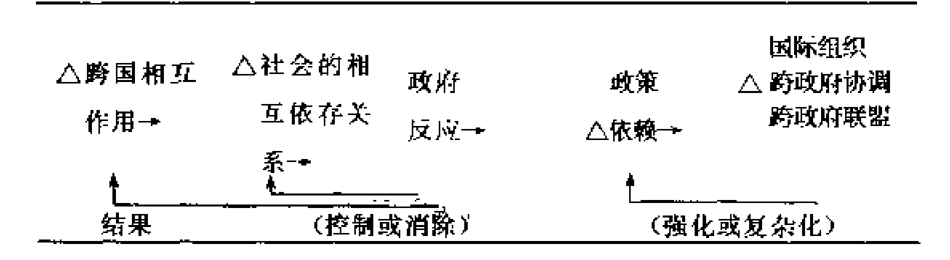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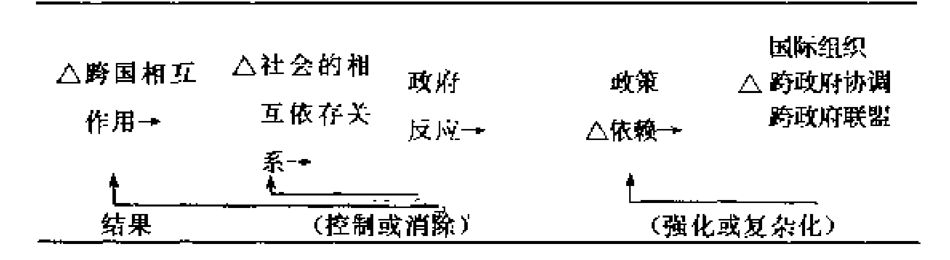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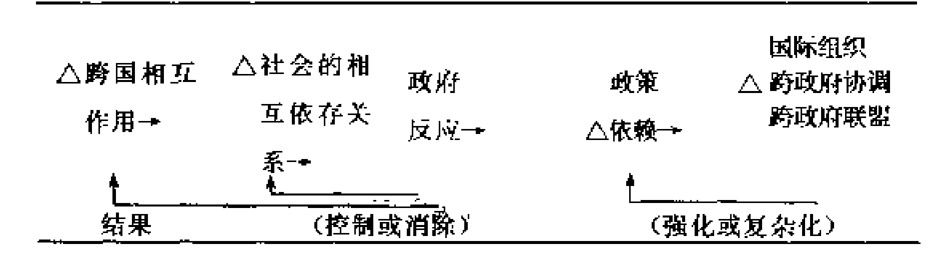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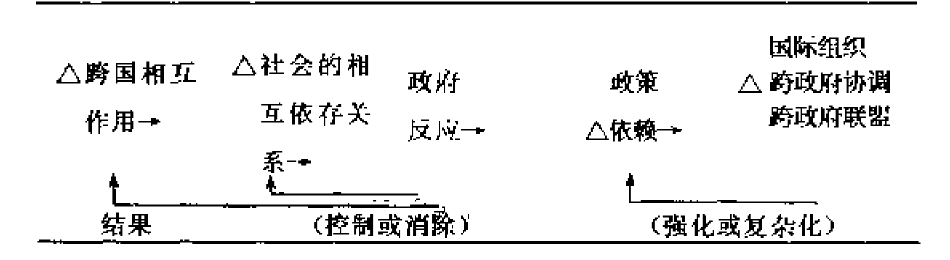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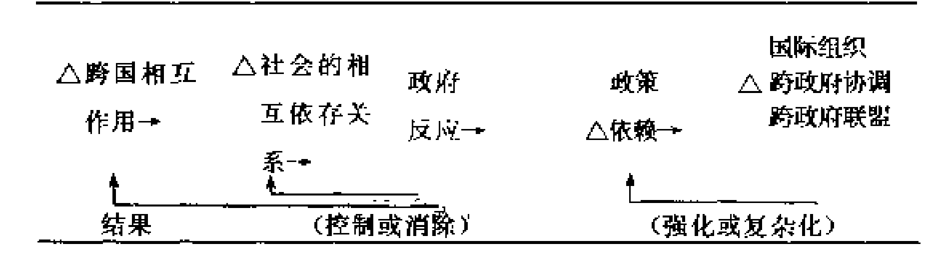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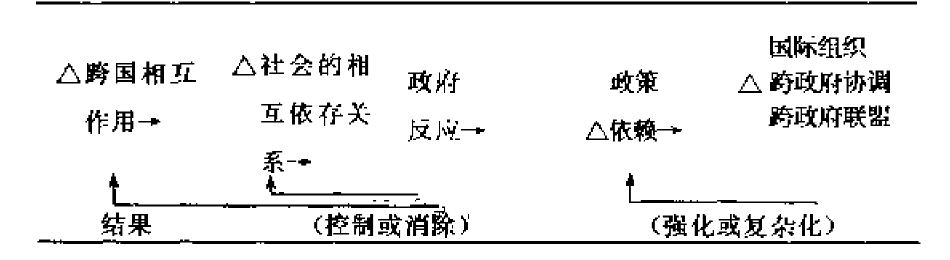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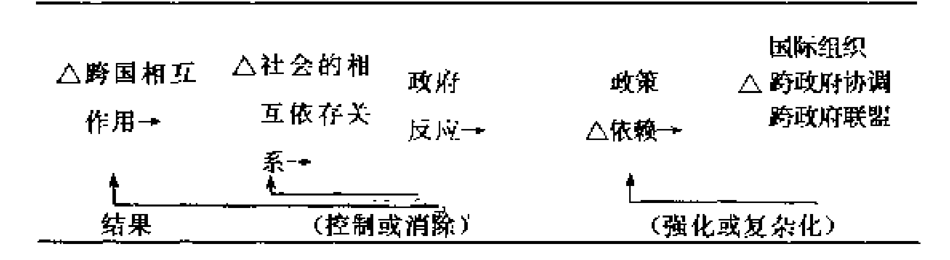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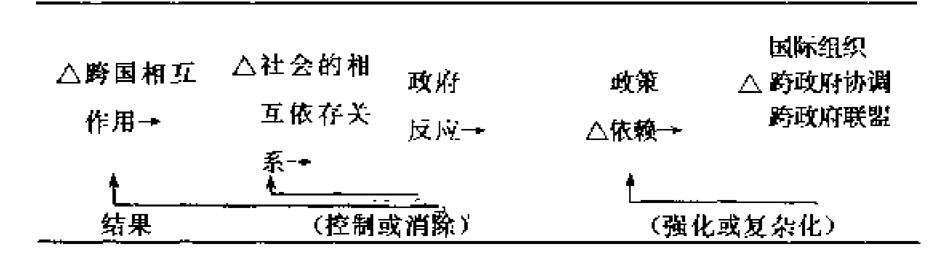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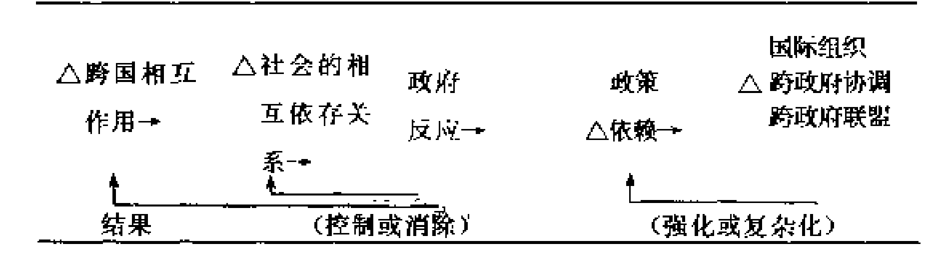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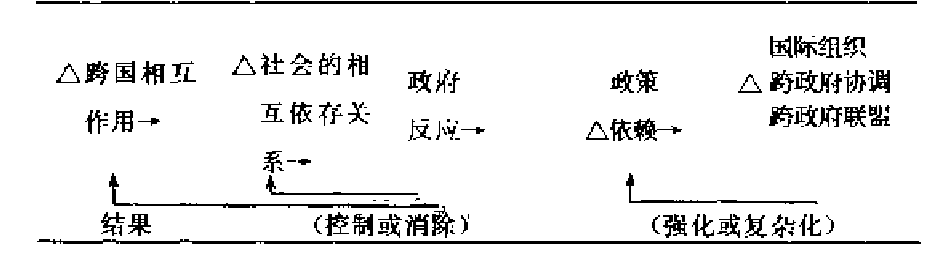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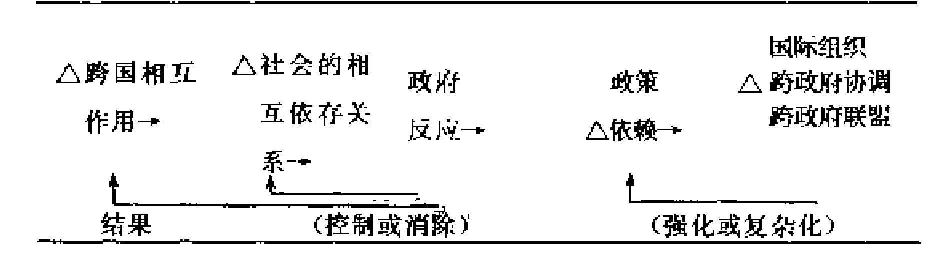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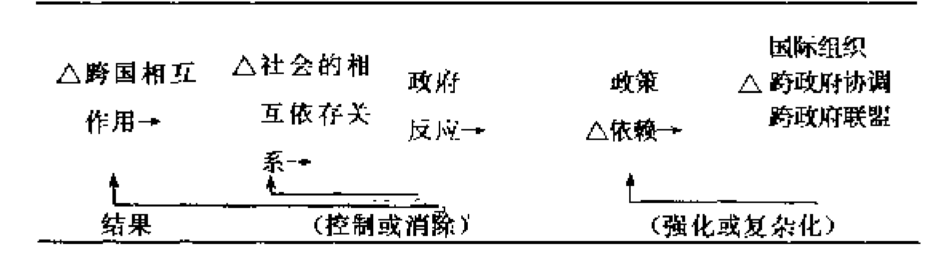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25卷，第339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18卷(1971年)，第73—91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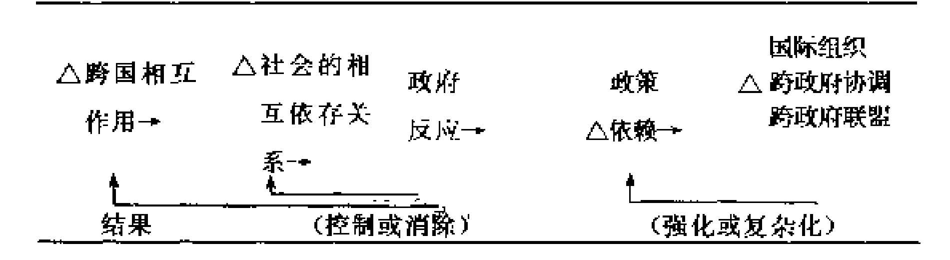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1]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2] 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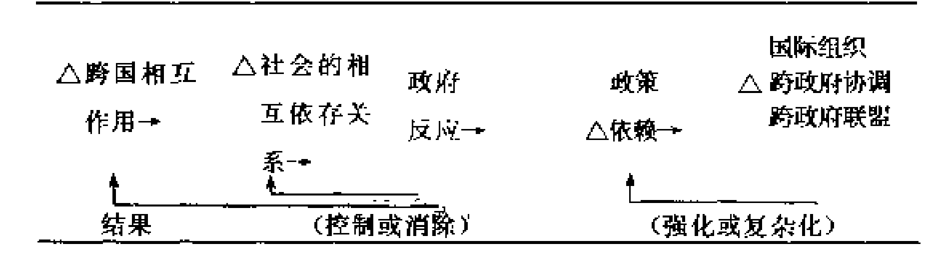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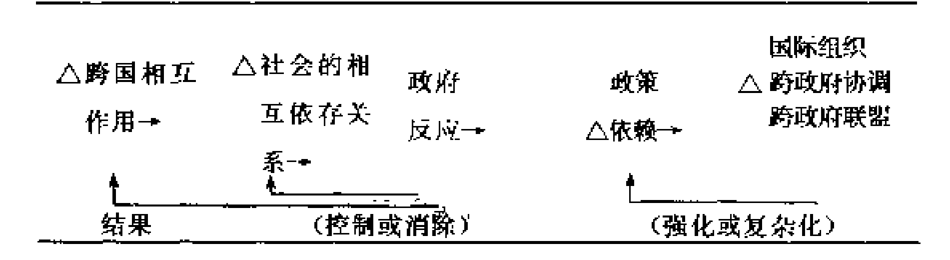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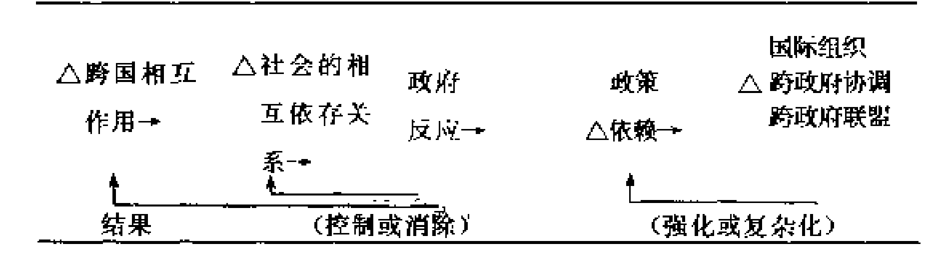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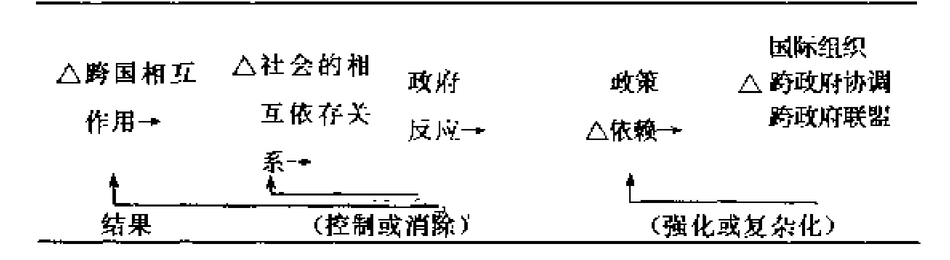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

表 3　有关跨国体系和跨政府关系的假设因果关系



织着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网络”。[①]

对于创立和管理国际机构的那些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政策任务是自问是否有活动的领域让国际组织把自己的活动同各国政府的从属单位紧密结合，从而能够对这个领域施加影响。正如罗吉指出的，传统上把国际政治和国际组织想象为处于国家“之上”的实体，不恰当地束缚了对国际机构的想象。[②]理解了一个问题的跨国和跨政府的政治策略，并理解问题中的技术、经济或军事的性质，就能对组织策略和组织机构进行比较广泛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还可有建设性的后果。

国际组织罕有最理想的效率，它们常常不能令人满意。作一些改进是可能的，但许多政府官员始终发现难以同它们相处。不过，在可以预计的将来，看来它们会成为不可缺少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们在世界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以及对各种问题的影响值得引起更多的注意，而且是以新的方式加以注意。

---

① 亨廷顿：“世界政治中的跨国组织”，载《世界政治》，第 25 卷，第 339 页。

② 罗吉：“国际组织结构：偶然性、复杂性与现代后的形式”，载《和平研究会论文集》，第 18 卷（1971 年），第 73—91 页。